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

新闻出版总署"十五"国家重点规划图书

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

● 主编 戴元光 童兵 金冠军

理论新闻学卷

● 童兵 林涵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 SHI JI ZHONG GUO XIN WEN XUE YU CHUAN BO XUE

本书出版获伊斯顿教育基金资助

20世纪
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

● 主编 戴元光 童 兵 金冠军

理论新闻学卷

● 童 兵 林 涵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童兵,林涵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0
ISBN 7-309-02994-1

Ⅰ.2… Ⅱ.①童…②林… Ⅲ.新闻学史-研究-中国-现代
Ⅳ.G2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66937号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642892(编辑部)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7.25 插页 2
字数	448千
版次	2001年10月第一版 200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5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

编委会

总　　序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以上文明史的国家，两千多年前就有关于传播的概念，关于传播活动的评价、关于传播技巧与传播思想的论述。但是，正如国际著名传播学家余也鲁教授所评价的，一个有如此丰富的文化背景的民族，一直没有人在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方面下功夫，实在令人诧异。

20世纪是我国新闻事业发展最为迅速、影响力最大的100年。当我们立足新世纪去审视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所走过的风风雨雨的历程时，不仅为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虽历经艰难却不断前进而感慨万千，也为我国新闻与传播学学子虽遭困厄，却"操持不苟"、"日穷万卷"而自豪与骄傲。

20世纪前50年，中国的传播业是在西方传播业的影响下，在殖民文化、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重压下缓慢发展的。1949年后，中国新闻与传播事业曾稳步发展，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有过很大的发展和进步。但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我国新闻传播事业与国际新闻传播业距离越来越大，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文革"时代，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惨遭劫难，新闻与传播事业处于停顿甚至倒退的状态。值得庆幸的是，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新闻与传播事业飞速发展，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拨乱反正，逐步走向法制的轨道。

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专门研究是从新闻传播史开始的，有近200年的历史。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出现了记述和探索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史的论文。20世纪初叶，已有关于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著作，1917年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至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1927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是1949年前影响最大的新闻传播史论著。1949年以后，中国新闻史研究进入新时代，尤其是改革开放的1978年后，新闻传播史研究成为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最活跃、研究队伍最大、成果最丰

富、发展最快的研究领域。据不完全统计，仅最近的20多年，中国大陆就出版了100余部新闻传播史研究专著与教材，发表了5 000多篇论文。

我国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起于近代报业出现以后。1873年，《申报》发表了《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是迄今所能见到的较早的理论研究文章。1918年蔡元培先生创立了我国第一个新闻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1919年，徐宝璜撰写了我国第一部新闻传播理论著作《新闻学》。20年代后，列宁的报刊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40年代，中国共产党开始系统研究列宁的报刊思想和新闻传播理论。总体看，1949年以前，我国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无大的建树。1949年后到“文革”前，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虽有进展，但成果不多。我国大陆的现代新闻传播理论研究首先是在清理“文革”的破坏和干扰，从新闻传播理论的ABC开始的，这不能不使中国的新闻学子的心灵受到震动：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新闻传播理论如此之滞后。改革开放后，新闻传播理论研究逐步开展，并有实绩。80年代初就有几部理论著作先后出版，但大体上仍未摆脱“左”的影响。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虽受到多方面的干扰，但研究成果已颇丰，水准不断提高。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真正取得突破性进步的，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后。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来，我国大陆先后出版各类新闻学著作、教材和普及读物达2 000余种。

人的传播活动是从第一声啼哭开始的，我国的先贤圣哲们对传播的认知非常悠久且非常深刻，职业传播者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早在春秋战国和先秦时代，就有“揽宾客”、“养”学生，“著书本天下”之风气，但传播学在中国的出现却比西方晚半个世纪。20多年前，西方人把传播学概念传进中国大陆时，我们对“传播学”这个词还非常陌生。20多年来，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经历了痛苦而漫长的过程。传播学学科地位在中国的确立，是许多学者不惧“困厄”，孜孜追求的结果。从禁区到发展为二级学科，仅跨越了20多年。20多年时间，等于中国电视从发展到初步普及加上网络传播初步发展的时间，等于一个孩童从第一声啼哭到大学毕业。但我们还是有理由欣慰：我们的书架上有100多部中国人的专（译）著，1 000余篇传播学论（译）文。从1997年起，我国已有传播学的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

新闻业务的研究起步较早，但研究范围较小。过去关心的主要是采写编评等实务，忽视对新闻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研究；对新闻是不是商品，新闻的功能究竟是什么，新闻媒介集团化产业化问题，也缺乏深层次研究。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陆共发表新闻业务方面的论文、论著、教材、译著、作品集等 1 800 多部（篇）。

最近几年，我国关于媒介经营管理和新闻法学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发展，新闻与传播学学科、相关学科包括传播心理学、传播伦理学、舆论学、宣传学、公关与广告学的研究，这几年取得了相当可喜的成绩，并有向交叉、边缘、应用方向发展的趋势。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新闻法学研究备受关注。大陆新闻法学的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1980 年新闻学界首先提出研究新闻法的问题，1984 年，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成立新闻法研究室，1988 年，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成立。进入 90 年代，研究新闻法的论文逐渐多起来，内容涉及新闻自由、知晓权、名誉权、舆论监督等，并于 1991 年和 1993 年召开了新闻纠纷与法律责任研讨会，90 年代中期起，一些理论著作陆续出版。

20 世纪是世界新闻传播事业空前发展的一个世纪，传播媒介从单一的印刷媒介（报刊图书）发展到广播、电视、电影和网络媒介。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虽落后于西方，但也有很大的进步，包括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即：1949 年前印刷媒介和广播的发展，1949 年以来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发展，1978 年以来传统传媒、电子传媒和网络传媒的发展。经过这三个阶段，我国大陆的新闻传播事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现在我国大陆有 1 900 多家有（无）线公共电视台，900 多家广播电台，2 000 多家报纸，8 000 多家刊物，每年生产 200 多部电影，1 000 余部电视剧。网络传播虽起步于 1995 年以后，但网民却已达到 2 000 万，而我国传播学者对网络传播的关注还较早。

综观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走过的百年历程，我们不能不认识到，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现状与国际研究水准相比，与我国近 13 亿人口相比，与我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新闻与传播市场相比，与我国初具规模的新闻与传播事业相比，与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相比，是不相称的，是应该有危机感的。

我国的传播学研究最薄弱的是基础理论研究。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首先是缺乏对西方国家传播理论的系统梳理和研究。提到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大概没有人否定，谈到西方的政治文化和精神文化，有

些人是否定的。不能说西方的科学技术非常先进，而政治文化和精神文化一无是处。研究西方文化也不是为了马上去实行它，而是去认识它，消化它，也包括吸收它、批判它，甚至改变它。文化的同化、被同化，文化的异化和移情是客观的和正常的，害怕西方文化是下策，增强自身的免疫能力才是要紧的，何况许多文化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是无国籍的。其次是学术研究环境不够宽容，干扰多。学者应当立足现有的基础，从现状去看未来，研究未来，预测未来。研究未来，预测未来，就要看到现在的不足，就要有批评精神。没有批评精神的学者不能算是真正的学者，批评(包括反批评)越多离真理越近。我国大陆现在实行的许多改革开放政策，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是无法想象的，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是难以想象的，但邓小平同志以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胆略去实践，走出了一条新路。新闻传播也一样，80年代末，还有人批评把"广播、电视、报纸"称作"传播媒介"，现在大概不会，但有些人对媒介产业、媒介市场、媒介消费、媒介兼并很敏感，提到"新闻自由"、"新闻商品属性"、"产业化"就恐惧，就过敏，好像这些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加入WTO在即，这些问题是回避不了的，关键是我们要去研究，做前人没有做、不敢做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加强理论研究和新闻学、传播学科建设是新千年的首要任务，因为新闻学和传播学都已经成为一级学科，而对于它们的发展却不能没有系统研究；传播学的中国化研究刚刚开始；网络传播的许多问题还很模糊；加入WTO将给我们带来许多新的研究课题。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是十几位作者三年多时间的研究成果，是两岸三地专家学者的共同心血，是集体的智慧和劳动成果。它展示了100年来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勾画了它们发展的基本轮廓。

早在1995年就设想写50年(1949－2000)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1996年，童兵教授应邀去兰州大学讲学，在同戴元光叙旧时，共同探讨了组织专家研究100年(1901—2000)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问题。在认真磋商后，初步设想从七个方面研究100年来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即理论新闻学、新闻史学史、应用新闻学、传播学、宣传学与舆论学、公关与广告、台港澳新闻与传播学，商定了拟邀请的专家，开始筹集启动经费，并于1996年底开始启动。1998年夏，童兵教授、明安香教授、邵培仁教授、徐培汀教授、夏鼎铭教授、金冠军教授、戴元光教授等聚会上

海大学乐乎楼，就研究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进行了讨论，并达成共识。

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方明伦教授一直关心本研究的进展，并同专家交流学术问题。著名新闻传播学专家宁树藩先生、丁淦林先生、夏鼎铭先生、彭家发先生审读了编写大纲，并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吴小美先生、樊凡先生、魏永征先生、刘树田先生、朱敏彦先生、孙旭培先生、曹家麟先生、张国良先生、霍红辉先生、徐维杰先生、陈力丹先生、李良荣先生、丁柏铨先生，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许多具体的帮助。复旦大学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许多专家学者为本书的编写出谋划策，并一直关心本书的编写进度。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20世纪已经过去，21世纪的曙光已沐浴大地。新闻与传播学学子已登上新世纪的航船！

编委会

2001年1月1日

前　言（代）

作为起源，实践先于理论；一旦把实践提高到理论的水平，理论就领先于实践。

费尔巴哈：《遗留的格言》

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恩格斯：《〈反杜林论〉旧序》

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

难道真理探讨者的首要义务不就是直奔真理，而不要东张西望吗？假如我必须记住用指定的形式来谈论事物，难道我不是会忘记谈论事物本身吗？

真理像光一样，它很难谦逊；而且要它对谁谦逊呢？对它本身吗？真理是检验它自身和谬误的试金石。那么是对谬误吗？

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

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人类进步，须克服迷信、偏见和物质的三种形式的阻碍。

雨果：《〈海上劳工〉序》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序言》

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清晰的线条、丰富翔实的史料，论述了20世纪百年中国理论新闻学的发展历程，依次分析了：中国新闻学研究在20世纪初所面临的时代背景与学科背景；随着报业的发展和西学东渐，由术入学，第一批新闻学著作的问世；20—40年代理论新闻学著作的出版高潮；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传入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新闻学研究的重新展开；“文化大革命”对新闻科学的扼杀；改革开放后新闻学研究的兴盛与走向繁荣。作者总结历史，注重史实本身，注重采集第一手的史料，做到论从史出，论述有据。

目 录

上 编

中 编

下 编

上　编

第一章

跨入20世纪之际

第一节　20世纪在传播史上的地位

20世纪是新闻事业发展最为迅猛、最为齐备、影响力最为广泛与深刻的100年。这100年中，构成新闻传媒大家族各种媒介——广播、电视、新闻纪录电影以及在此之前已经问世的报纸、期刊、通讯社，都有了空前的发展，作为新闻事业人才支援与智力后盾的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也以神奇的规模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影响力，成为新闻大家族的重要成员。

这里想借用美国南加州大学安那堡传播学院教授弗德瑞克·威廉斯在《传播革命》一书中的十分形象的分析。这位教授巧妙地把人类来到世界上至2000年间大约360个世纪浓缩为一天24小时，那么结果令我们发现，就传播活动而言，整个早晨毫无变化，接近下午才略有改变。今天我们四周无处不在的传播媒介，在子夜前的片刻才刚刚发明。

按威廉斯的推算，人类的这360个世纪是这样从传播通道中走过来的：

新的一天开始0点：人类开始使用公元前34000年的语言；

早晨3点：无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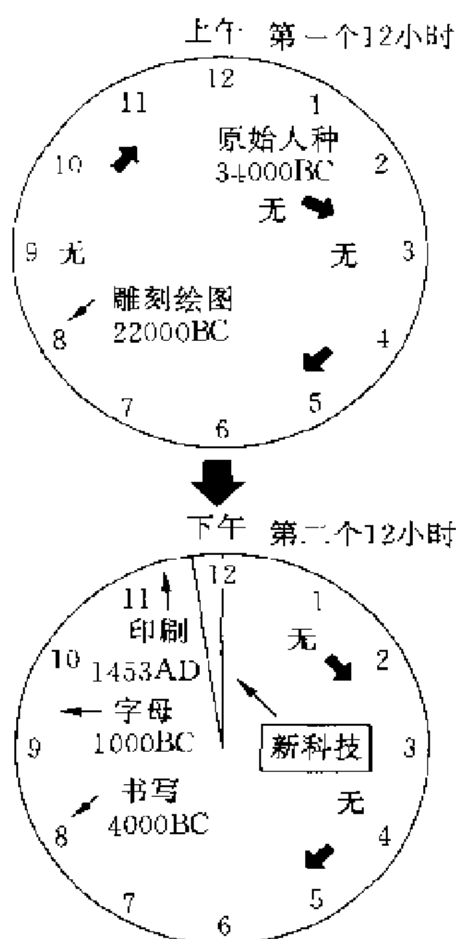
上午8点：洞窟壁画；

正午12点：无变化；

下午6点：无变化；

晚上8点：公元前4000年的文字。

如果再精确地推算，还可以看到：



一天360个世纪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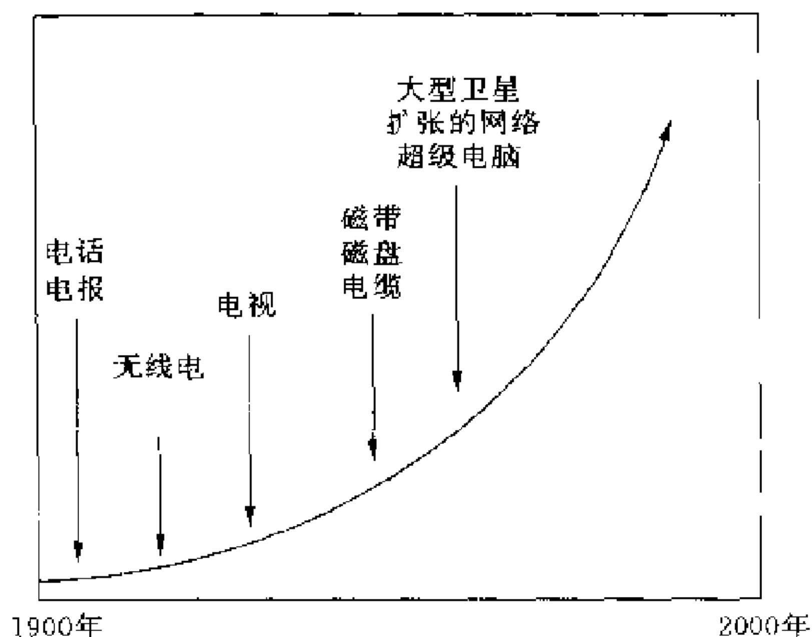
黄昏之前，变化并没有真正开始。这就是说，在"整整一天"中间，人类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使用的只是一种传播方式——语言，使用文字的时间大约只占六分之一。使用文字的时间在晚上8点40分即埃及象形文字问世，接着在9点28分出现字母。而后有一段时间歇止，10点左右，荷马史诗出现，它可能是最古老的文学。从10点38分到11点01分，罗马帝国一闪而逝。至此，360个世纪的百分之九十六已经消失。

大约又过了10个世纪，接近子夜11点38分，古腾贝格的圣经雕版问世。11点53分，蒸汽印刷术出现，传播工具革新的步调开始加速。紧接着，11点53分24秒有了电报，11点54分38秒架设第一道横跨大西洋的有线电缆。电话（11点55分02秒）和留声机（11点55分04秒）在稍后几秒出现，在迈向2000年前，此刻我们已经度过了百分之九十六点六的光阴。

在这最后几分钟内，新的传播科技突飞猛进。而我们正处于加速曲线的顶端。传播以电话、电报、电影、商业广播和电视的形式蔚成企业。

在短短的最后几分钟内，一系列重要的传播方式和工具出现了，它们是：

无线电报、电影摄影机：	11点55分47秒；
商业广播	11点56分48秒；
有声电影	11点57分04秒；
最早的电子计算机	11点57分40秒；
电子摄影法发明	11点57分50秒；



加速曲线图

电晶体发明　　　　　　　　　　　11点57分52秒;

彩色电视生产　　　　　　　　　　11点58分02秒;

新闻传播科技发展的步调在子夜前两分钟速度更快,它领着我们步入20世纪80年代。商业电视产生于子夜前;电脑的能力大增,价格却下跌;庞大的传播网成立;卫星传播成为商业新成就;新的传播进入家庭,包括电脑。距2000年的"最后两分钟"内,有下列重大的发明与创造:

倒数104秒:苏联"史普尼克"人造卫星发射;

倒数101秒:立体声FM广播;

倒数92秒:第一颗商用卫星上天;

倒数87秒:分时电脑;

倒数85秒:电子传播与电脑作业合并;

倒数78秒:手提电视摄影机;

倒数74秒:微电子回路;

倒数62秒:电脑记忆单位再改进;

倒数61秒:家用电视记录装备;

倒数49秒:时为1980年,传播工具的革命继续进行。

威廉斯教授还编写了记录人类传播方式革命与进步的里程碑。他认为,下列各项的发明与创造,对于人类的传播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公元前35000年:克罗马农时期,推测已有语言存在;

公元前22000年:史前雕刻画;

公元前4000年:泥板上的闪族文字;

公元前3000年:埃及早期的象形文字;

公元前1800年:腓尼基字母;

公元前1000年:希腊早期的字体;

公元前600年:最早的拉丁碑文;

公元前450年:希腊人开始利用信鸽;

公元前130年:亚历山大建造图书馆;

公元350年:书取代了卷轴;

公元600年:中国出现印刷的书籍;

公元676年:阿拉伯与波斯开始使用纸与墨;

公元1200年:欧洲的纸墨艺术;

公元1453年:古腾贝格所印的圣经;

公元1562年:第一份意大利的每月纪闻;

公元1594年:第一份杂志出现于德国;

公元1639年:第一份印刷刊物出现于北美;

公元1642年:布莱斯·巴斯可(Blaise Pascal)发明第一部计算机(只处理加算);

公元1709年:英国的版权法;

公元1791年:美国宪法第一个修正案;

公元1819年:大卫·纳比尔(David Napier)发明第一部平版印刷机;

公元1827年:金属板上的照片;

公元1830年:Koenig蒸汽印刷发明;

公元1834年:查理士·巴贝吉(Charles Babbage)的"分析引擎"(即电脑)原则;

公元1835年:山姆·摩斯引介电报;

公元1846年:轻便印刷机;快速印刷;

公元1855年:大卫·休斯(David Hughes)的印刷电报;

公元1866年:横跨大西洋电缆完成;

公元1876年:亚历山大·葛拉汉·贝尔(Alexander Grahan Bell)发明电话;

公元1888年:确认无线电波;

公元1895年:马可尼发明无线电报术;

公元1900年:经由无线电波传送演说;

公元1912年:电影成为一大企业;

公元1920年:家庭电视正研究当中;

公元1927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示范电视;

公元1936年:《生活杂志》创办;

公元1942年:美国出现第一部电子计算机(电脑);

公元1946年:切斯特·卡尔生(Chester Carlson)发明全录复印技术;

公元1947年:电晶体发明;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ies);

公元1849年:第一部可储存式的电脑;

公元1951年:美国推出彩色电视;

公元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枚地面卫星"史普尼克";

公元1958年:立体声录音;

公元1961年:按键电话推出;

公元1967年:美国发射"电星"卫星;

公元1968年:手提式录影机问世;

公元1970年:开始广泛使用微电子晶片;

公元1975年:电视平面屏幕发明;

公元1976年:电视电脑游戏首度大量上市;

公元1978年:影碟系统作市场试验;

公元1979年:示范3-D电视;

公元1980年:家用电脑价格大众化(500美元以下);

公元1980年:太空摄影技术有新突破;

公元1981年:两种影碟系统大量上市;

公元1981年:"哥伦比亚"号太空船完成一次成功的任务;

公元1982年:欧洲协会发射复式卫星;

公元1982年:实施数据电话的重大进步。

传播技术里程碑①

从上面长长的人类传播科技进步里程碑可以看到,在20世纪(1900～1999)人们的发明与创造,比以往任何世纪都多。我们不能轻视和否定文化的延续累积作用,不能轻视和否定万千年传播方式进步的伟大历史功能,但必须看到,今天我们四周的新闻传播传媒,今天人们用于信息交流与分享的主要手段,绝大部分是20世纪发明与创造出来的。在浓缩成"一天"的360个世纪的"时钟"里,24点前的最后几分钟传播科技的进步,比前23个小时56分所有进步的总和还要多,影响还要大,当是不争的事实。

这是即将逝去的20世纪的光荣。

总结和评价即将逝去的20世纪的这种光荣的意义,也正在这里。

第二节 世界新闻事业发展轨迹

在对20世纪新闻传播的轨迹作了极为宏观的考察之后,需要对19、20世纪之交的时刻全球的新闻传播与新闻事业的一般状况作相对微观的描述。

新闻传媒大家族中,资格最老的当数报刊、报纸与期刊。

16世纪末及17世纪初,威尼斯手抄新闻(亦称威尼斯公报)(1566)、德国特别新闻(1568～1604)、德国法比新闻(1594～1635)等不定期新闻纸在欧洲各国,已普遍发行。16世纪末叶,欧洲邮政驿站制度建立,为新闻定期刊物产生提供条件。德国观察周刊(1590年创刊,1609年开始定期发行)、德国法兰克福新闻(1615)、德国法兰克福邮报(1616～1866)、英国新闻周刊(1622～1641)、德国马德堡新闻(1626～1955)、法国公报(1631)、西班牙公报(1641)、瑞典大众邮报(1643)、荷兰新闻报(1656)等报纸,是那时第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定期新闻出版物。

17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世界上第一批日报和许多国家的重要

---

① 本节所引材料(一天360个世纪示意图、加速曲线图以及传播技术里程碑),均出自美国学者弗德瑞克·威廉斯所著《传播革命》。该书由台湾学者韩玉兰翻译,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公司1983年出版,详见该书第25～34页。

报刊先后出版。举其要者，有德国的莱比锡新闻(1660)、英国牛津公报(1665)、荷兰科学新闻(1665)、丹麦新闻(1666)、墨西哥公报(1679)、英国乌斯特邮差报(1690)、英国每日新闻(1702)、俄国新闻报道(1702)、奥地利维也纳新闻(1703)、英国评论杂志(1704)、美国波士顿新闻信(1704)、罗马新闻(1714)、俄国彼得堡新闻报道(1728)、丹麦百林日报(1749)、加拿大哈力法克斯公报(1751)、挪威基督教消息报(1763)、法国巴黎新闻(1777)、瑞士新苏黎世新闻(1780)、伦敦泰晤士报(1785)、西班牙巴斯隆纳日报(1792)、印度世界报(1794)、全德新闻报(1798)、澳大利亚公报(1800)、阿根廷电讯新闻(1801)、英国曼彻斯特卫报(1821)、英国星期时报(1822)、古巴海岸日报(1832)、法国新闻报(1836)、英国世界新闻(1843)、美国纽约时报(1851，初为纽约每日时报)、法国费加罗报(1854)、英国每日电讯报(1855)、德国法兰克福新闻(1856)、法国时报(1861)、阿根廷新闻报(1869)、阿根廷民族报(1870)、日本每日新闻(1872)、中国申报(1872)、意大利米兰晚邮报(1876)、日本朝日新闻(1879)等①。

报刊史通常把报业分为官报、党报、现代报业三个时期。官报系政府自己出钱办报，报纸为政府所有，言论及新闻方针完全由政府决定，报纸的使命在于成为政府的喉舌与工具。政党报纸系由政党出钱主办，报纸为政党所有，言论及新闻方针由政党决定，党报的宗旨，在于争取人民对本党的支持，成为本党的喉舌与工具。

一般认为现代报业始于19世纪30年代，而盛于60年代。现代报业发展的条件，离不开政治民主、工商发达、教育普及、科技进步。就出版现代报纸所需之必要科技条件而言，大致在19世纪中叶以后已陆续具备，如：

1814年，发明蒸汽印刷机；

1839年，发明摄影；

1844年，发明有线电报；

1847年，发明印刷轮转机；

1853年，发明木浆造纸；

1857年，发明越洋海底电报；

---

① 上述各报及其排列参照台湾李瞻教授著《世界新闻史》，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66年版，第1～12页。本书作者略有改动。

1867年,发明打字机;

1876年,发明电话;

1877年,发明留声机;

1886年,发明自动排版机;

1895年,发明无线电报。

这些科技发明,"每项都是现代报业的功臣","轮转机使报纸印刷发生革命,木浆造纸使报纸成本大为降低,电报之发明,使新闻传递迅速,报纸内容丰富。"①

同官报、党报相比,现代报业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有独立经济基础,为自由企业之一环;

第二,有独立的言论及新闻方针,不受政府、政党或其他外力之干涉;

第三,大量销售,对公共事务具有巨大影响力;

第四,客观而公正地报道和处理新闻。

报刊业进入20世纪以后,有巨大发展。目前世界上约有8000家日报,如果加上两日报、半周报、周报等,全球大约有75000种报纸。全球平均每千人拥有日报百份,日本、瑞士等发达国家每两人拥有一份日报。杂志的发行量多得难以统计,估计全世界出版的杂志在15万种以上。

现代新闻通讯建立于19世纪,迄今已有150多年历史。世界第一个新闻通讯社,由法国人哈瓦斯(Charles Havas)所创办。1825年,哈瓦斯于巴黎设立一个新闻社,并遍游欧洲各国首都,分别设立通讯员。各国通讯员的新闻通讯经邮局或专人送至巴黎,然后经翻译和编辑,再送至各订户。1835年,哈瓦斯将新闻社正式改为哈瓦斯通讯社。1849年,曾在哈瓦斯通讯社供职的沃尔弗创立了沃尔弗通讯社。路透也曾在哈瓦斯通讯社任译员,他于1851年成立路透通讯社。这个世界上第三个成立的通讯社,至19世纪末叶,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通讯社。1870年,欧洲这三个通讯社同美国的纽约新闻联合社建立"连环同盟",将全世界划分为四个势力范围,各占一块。这种态势,一直维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1892年,同东部新闻联合社、新英格兰新闻联合社共同组成纽约

---

① 参照台湾李瞻教授著《世界新闻史》,第14页。

新闻联合社的西部新闻联合社退出，正式改组为美联社。1907年，美国另一家大通讯社合众社诞生。美联社也于1914年退出连环同盟。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将沃尔弗社改组为德国通讯社。在20世纪，最终形成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法新社（1940年哈瓦斯停止活动，至1944年改组为法新社）、俄国塔斯社等五大国际通讯社共分天下的格局。

广播与电视是20世纪的宠儿，也是这个世纪的产物。在七八十年代的发展史上，它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世界和人类产生着极其重大的影响。在20世纪现代新闻事业的大家族中，这两种传媒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1895年，意大利科学家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在英国政府的鼓励下，完成了无线电广播的初步发明。次年，在英国邮政总局总工程师普瑞斯爵士（Sir William Preece）的面前，他又成功地表演了这一发明。1901年，英国在海岸灯塔建立14个信号电台和6个海岸电台，以迅速报告远洋海轮的到达和与海上船只保持联络。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也先后建立了这种海岸电台。

1897年，英国成立无线电报公司。1899年，马可尼访问美国，同年美国马可尼无线电报公司成立。其他国家的马可尼公司，亦先后于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加拿大、阿根廷、俄国成立。1903年，马可尼在各国指导的海岸电台，达48个。

1906年，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工程师及匹兹堡大学物理学教授范斯顿（Reginald A. Fessenden），在靠近纽约地方建立实验室，并于圣诞之夜播出布道演说及音乐。这是以无线电直接广播声音的开始。

1908年，法国人弗来斯特（Lee De Forest）在巴黎建立无线电实验台。1909年，他到美国以无线电直接播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著名歌唱家卡罗素的歌声。1917年，他又于纽约州建立实验台，播出演说、歌唱、音乐和有关选举的新闻。

1919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建立广播电台，广播市场行情和报告气象消息。1920年，底特律建立实验台。美国匹兹堡西屋电器公司的广播电台成立于1920年11月2日，有幸成为美国第一家申请商业执照的无线电台。

自美国举头，各国电台纷纷成立。1922年，法国、英国均正式设立广播电台，每日按时播出节目。在以后三年中，先后设立电台的国家

有: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丹麦、芬兰、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挪威、西班牙、瑞典、瑞士、南非、俄国等。1927年,广播电台已遍及欧洲,同时也向非洲、亚洲和拉美发展。据联合国1973年对187个国家和地区调查,这些国家中只有3个没有广播发射设备,它们是不丹、列支敦士登和圣马力诺。到80年代,这三个国家也有了发射设备,换言之,全世界的国家和地区都有了广播设备。

电视的历史远比广播短暂,但其科技物质条件的铺垫却不比广播晚。1817年,布尔兹列斯(Jons Berzelius)发现物体具有一种质光体。1837年,约瑟夫·梅(Joseph May)发现这种质光体可以电能来传递。这两项发现,说明了任何物体的影像都可能以电子讯号予以传播。

1884年,德国科学家尼普科(Paul Nipkon)发明旋转盘扫描式的播送方法,为现代电视发明奠定了基础。1926年,英国科学家贝尔德(John A. Baird)首次进行了电视播出的实验。1929年,英国广播公司同其签约,此后贝尔德的实验电视常常从伦敦电台播出。1936年起,英国广播公司便正式播出电视节目,标志着现代电视正式问世。

美国贝尔电视公司从1927年起开始电视广播的实验,在华盛顿与纽约之间通过有线进行传递,1930年又于纽约大剧院作示范表演。这样的实验电视台,至1937年美国已有17个,而第一家请领执照的商业电视台,于1941年6月在纽约正式成立。

在20世纪30年代,从事实验电视播出的国家,除英国、美国外,尚有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与俄国。德国人自己声称,他们从事实验电视早于英国,从1934年就开始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妨碍了电视事业的发展。从总体上说,电视事业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的。美国由于工业发达和经济繁荣,因此规模巨大的商业电视首先出现于美国。1949年美国即有10个商业电视台,到1950年即猛增至107个,1957年更增至529个,1964年达到607个,约为当时全世界各国拥有电视台的五分之一。

电视传媒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大众传媒,据统计,跨入21世纪前夕的1998年,全世界193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13个国家没有开办电视节目,而大洋洲的马绍尔群岛共和国虽有一座电视台,却是美国军队办的,严格地说,该国也应列入未开办电视的国家中。这样,全世界共有179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电视。在当今世界,在发达国家几乎

每户拥有一架电视接收机，发展中国家每百户也在 50 架以上。我们的时代，进入了电视传媒时代。

同以往的传播世纪相比，20 世纪的传播具有自己独特的色彩。

从第一节到本节的叙述中可以发现：

从约公元前 4000 年到 1453 年，自人类发明文字到第一架印刷机的使用，时间相隔为 5000～5500 年。

从 1453 年到 1838 年，自人类使用印刷机，使资讯传输转变为经由传媒的传播，接着又是电报的发明与使用，开始以符码来代替符号（文字）进行传播，时间相隔为 385 年。

从 1838 年到 1929 年，即第一个实验电视台签约并播出（1929）及英国广播公司正式播出电视节目（1936），距电报的使用为 91 年（或 98 年）。

从 1929 年到 1965 年，即从电视台实验播出到第一枚人造通讯卫星发射成功，使人类新闻传播进人一个新的时代，期间只不过相隔 36 年。

越来越快的传播方式更新的节奏，说明科技革命为传播革命提供着飞跃的翅膀与无穷的动力。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多媒体”和“信息高速公路”又为人类的新闻传播增添了新的动力和描画着新的前景。

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多元化的传播手段的选择。台湾学者程之行先生在《新闻传播史》中为我们罗列出大家都在广泛使用的传播工具 24 种：

关于听觉传输方法的工具有：行动电话、留声机、扩音器、无线电广播接收机、音讯录制及播放器、电话等 6 种；

关于视觉（或视听结合）传输方法的工具有：照相机、电脑、电子邮件、图文传真机、电影、图片复印机、电影放映机、电报、电读、电传打字排版机、电视接收机、排版机、打字机、录像机、显像电读、显像电话、电传图片、文字处理机等 18 种。

处于世纪之交的人类，生活在“一个以线路相联接的世界”之中。1993 年 4 月 5 日出版的一期《新闻周刊》中，对我们这个世纪的人的生活与工作有这样的一段描绘：

> 若干种可能性已告出现。在办公室，相距甚远的机构受雇者正在进行视觉会议（即电子会议），与此同时，他又利用个人电脑处

理一些东西，譬如说，财务或法律文件。……在家中，如想像之所及，把任何或所有的设施用上，包括你的电视机、有线节目选择器、个人电脑、手提录影记录器、无线电收音机、电话机在内，一齐用上，而后，一个命令，使电视机将《飘》这部电影作出个别映现，或来把你银行存款调整一下；或者，当你在和一位亲密的朋友在电话中谈心时，将电子邮件送向某一个目的地。①

第三节　中国新闻事业百年素描

遵奉以史立论的原则，我们认为中国新闻事业的雏形——邸报产生于唐朝。自唐朝邸报至清代京报，历时一千余年。此类报纸，以士大夫阶级为读者主体，内容不外乎宫廷生活、诏令奏章及官员升迁任免，同现代报纸，相去甚远。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文化大量传入中国，外人开始在中国纷纷创办报纸杂志。最初外人的报刊，多为月刊，次为周刊，最后为日刊。外报不仅为我国现代报业之始，并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亦有深切的关系。这些报刊中，较显要的外人创办的中文杂志有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特选撮要(1823)、天下新闻(1828)、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各国消息(1838)、遐迩贯珍(1842)、中外新闻七日录(1865)、六合丛谈(1857)、教会新闻(1868)、万国公报(1874，由教会新闻易名)、小孩月报(1875)、益闻录(1878)、亚东时报(1898)、大同报(1906)等；外人发行的中文日报有中外新报(1858)、华字日报(1864)、闽报(1898)、上海新报(1861)、申报(1872)、字林沪报(1883)、新闻报(1893)、同文沪报(1900)、天津时报(1886)、顺天时报(1901)、盛京时报(1906)；外人在华的英文报纸有广东纪录报(1827)、中国文库报(1832)、香港公报(1841)、德臣西报(1845)、孖剌西报(1857)、士蔑西报(1881)、南华早报(1903)、北华捷报(1850)、字林西报(1864)、远东释疑(1867)、文汇报(1877)、上海泰晤士报(1901)、大陆报(1911)、密勒氏评论报(1917)、远东评论(1904)、汉口自由西报(1923)、中国时报(1886)、京津泰晤士报(1894)、华北明星报(1918)、华北邮报(1937)、北京英文日报(1910)、北

① 译文转引自程之行：《新闻传播史》，第556～557页。

京时报(1914)、人民论坛报(1925)等;此外,还有第一份外人用外文办的报纸,即1822年发行于澳门的葡文报蜜蜂华报。

据统计,外人所办报刊,最先出现在澳门,从1822年至1839年,在澳门出版的葡文报刊达9种,而各地的英文报刊仅8种,中文报刊3种。鸦片战争后,情况有了改变。从战后至1894年,各地共出版外文报刊约80余种,中文报刊70种(海外不计)。外文报刊中,葡文报刊25种,除少量法、德、日等文报刊外,余则全是英文报刊。

延绵多年的外人报刊,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尤其是世纪之交的政治与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笔者认为李瞻先生在《世界新闻史》中对此分析颇有见地,兹录记如下:

> 中西文化交流,虽汉唐有之,然交融会合,则自基督教东来始。外报本为外人在华传教、经商之媒介,惟至鸦片战争前后,我国朝野对当时之世界,仍属懵懵懂懂。故外报侵入后,对我国社会及国人之观念,均有重大深远之影响,兹举数点如左。
>
> ① 外报为我国近代报业及政论报纸之序幕;
>
> ② 外报对我国近代思潮具有启蒙作用,进而促成清末"维新"及"革命"运动;
>
> ③ 外报注重工商业之报道及其发展,直接刺激我国近代工商业之诞生;
>
> ④ 外报主张废除科举,建立新式教育制度,此有助于清末教育制度之改革;
>
> ⑤ 外报鼓吹科学新知,直接引起国人对科学研究之兴趣。
>
> 上述均外报之功绩。然外报系以本国利益为前提,言论鲜难符合我国之利益。又因我国处于次殖民地之地位,故常常因外报淆乱视听,挑拨离间,而妨碍国策,动摇国本,尤其因外报遍布我国,操纵我国舆论,此对我国民族自信心之戕丧,实在无法估计。①

前有提及,中国自唐邸报至清官报,均系官方发行之报纸,人民无从发表意见。后有少量政论报纸如万国公报,因系外人所办,亦无法表达国人之意见。及有民报问世,如昭文新报(1873)、上海汇报(1874)、香港循环日报(1874)、上海新报(1876)、广州广报(1886)等,这些报纸皆为当时深悉外情者所办,可惜国人此时尚多数不知报纸为何物,难以

① 李瞻:《世界新闻史》,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66年版,第948页。

加以利用。直至甲午战败,我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因之而强学会之中外公报、强学报兴起,遂开我国报纸论政之先河。此后维新与革命两派之报刊,纷纷创办,均以政论为本,使我国报业进入政论报纸时期。此时正是世纪之交。政论报纸的蜂起,是该时期报业最重要的特征。

这一时期维新派创办的杂志主要有中外公报(1895)、强学报(1895)、时务报(1896)、清议报(1898)、新民丛报(1902)、新小说报(1902)、政论(1907)、国风报(1910);革命派出版的杂志主要有译书汇编(1900)、开智录(1900)、国民报(1901)、游学译编(1902)、新湖南(1903)、湖北学生界(1903,后改为汉声)、浙江潮(1903)、江苏(1903)、二十世纪之支那(1905)、民报(1905)。同一时期维新派所创办的报纸主要有国闻报(1897)、时务日报、时报(1904)、京报(1907)、时事新报(1907)等。此外,前述中外公报和强学报,从形式上看当属报纸,但因其注重言论而忽视新闻,所以有的史家将其归于杂志而不属报纸,这种分析,似有道理。革命派的报纸,举其要者有苏报(1896)、中国日报(1899)、大公报(1902)、国民日日报(1903)、警钟日报(1904)、神州日报(1907)、民呼报(1909)、民吁报(1909)、民立报(1910)等。

世纪之交的中国报业,是以革命派战胜维新派,民国报业勃兴革命舆论大振为特色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历经两次办报高潮。维新变法运动期间是第一次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全国出版的中文报刊达120种之多,其中80%是国人创办的。辛亥革命期间是第二次高潮,从1905年8月至1911年10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出版的报刊在200种以上。

民国之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致新报馆纷纷成立,盛极一时。1912年,全国报纸达500余种,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占其六分之一。1921年,全国定期报刊共1137种,其中日报550种,到1926年,全国日报增至628种。至1947年,全国日报更增至1781种,杂志1763种。

让我们来例举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报章杂志。拿杂志说,重要的学术杂志有孔教会杂志(1913)、科学(1915)、观象丛报(1915)、清华学报(1915)、民铎(1916)、新教育(1919)、史地学报(1921)、北京大学月刊(1919)、学林(1921)、法政学报(1922)、社会科学季刊(1922)、国学丛刊(1923)、华国(1923)、国学季刊(1923)等。政论、文学与时事性杂志中,拥袁派的杂志主要有庸言(1911)、不忍(1912)、雅言(1913)、大中华

(1915)；反袁派杂志主要有独立周报(1911)、国民(1913)、正谊(1914)、甲寅(1914)。由陈独秀、李大钊发行主编的杂志有新青年(1915)、每周评论(1919)、向导(1922，为中共机关刊)。"五四"前后的其他杂志主要有太平洋(1917)、新潮(1919)、建设(1919)、解放与改造(1919)、星期评论(1919)、创造季刊(1922)、努力(1922)、国闻周刊(1924)、现代评论(1924)、语丝(1925)、远东(1925)、独立评论(1932)。

这一时期的报纸，反袁的报纸主要有民权报(1911)、中华民报(1911)、国民新闻(1911)、益世报(1915)、中华新报(1915)、民国日报(1916)；拥袁报纸有大共和日报(1911)和亚细亚报(1915)等。民初至抗战，北方新办的重要报刊则有晨钟报(1917)、京报(1918)、世界晚报(1924)，而南方新办报纸则有商报(1921)、晨报(1932)、大晚报(1932)、新民报(1929)、救国日报(1933)、民国日报(1923)、华侨日报(1925)、工商日报(1925)、星岛日报(1938)。

国民党系统报刊的产生与发展，在这一时期占有重要影响。国民党党报系统的主要报章有中央日报(1927)、华北日报(1929)、英文北平导报(1930，由国民党接办北京导报而改称此名)、武汉日报(1929)、西京日报(1933)、东南日报(1927)、西康民国日报(1939)、香港国民日报(1939)。

中国无产阶级报刊和中国共产党报刊在这一时期得以产生和发展。除前面提到的由陈独秀、李大钊发行主编的3家杂志外，还有共产党月刊(1920)、劳动界(1920)、劳动音(1920)、劳动者(1920)、劳动与妇女(1920)、劳动周刊(1921)、工人周刊(1921)、先驱(1922)、中国青年(1923)等杂志，热血日报(1925)、红军日报(1930)、红色中华(1931)等。

抗日战争中，中国报刊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发展自己的事业。在国民党系统，在"陪都"重庆有22家报纸坚持出版，以扫荡报(1932)为代表的200种军中报纸发展起来。在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一批优秀报刊坚持出版与发行，重要者有新中华报(1939)、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中国青年(1939)、中国妇女(1939)、共产党人(1939)、中国工人(1940)、中国文化(1940)、解放日报(1941)、新华日报(1938)等。在国统区还有救亡日报(1937)、抗战(1937)等一批报刊。

抗战以后，1946年，全国日报约千余种，其中由国民党党营报纸约400种，军营报纸约170种，民营报纸430种。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除早已形成的国民党党报报团之外，民营

报纸也出现了报团。各报团所辖报纸大致为：

国民党中宣部报团：计有南京、上海、福州、昆明、贵阳、成都、重庆、桂林、长沙、长春、沈阳等地之中央日报，杭州、上海之东南日报，武汉日报、华北日报、天津民国日报、西京日报、香港国民日报等。

和平报团：原有的军报系统（扫荡日报）改称，于南京、上海、汉口、广州等地发行。

大公报团：于上海、天津、重庆、香港发行。

益世报团：于天津、北平、南京发行。

世界报团：计有北平世界日报、世界晚报、重庆世界日报、上海立报。

新民报团：于南京、上海、北平、重庆、成都发行。

大刚报团：于南京、汉口发行。

大光报团：于广州、汕头、广州湾、海口发行。

力报团：于长沙、衡阳、桂林发行。

星系报团：先后计有星岛日报、星岛晚报、星洲日报、星中日报、星槟日报、星暹日报、星泰晚报、星光日报、星华日报、星粤日报与星闽日报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报业花开两枝，台湾部分将设专卷叙述。总的情况是，日据时代，台湾最初不准刊行中文报纸，直至1932年，始特许台北试办中日文各半之新民报。1944年，台湾只有6家日报，即台北台湾日日新闻、兴南新闻、台中台湾新闻、台南台湾日报、高雄高雄新报和花莲东台湾新报。这一年，日本当局为实施报纸合并统一政策，把这6家报纸合并为台湾新报一家。光复后，即将此报更名为台湾新生报。据1965年台湾省新闻处统计，台湾计有报纸29种，通讯社39家，杂志785种，广播公司32家，广播电台63家。其中主要日报有中央日报（1949）、新生报（1945）、中华日报（1946）、公论报（1947）、联合报（1951）、征信新闻报（1950）、大华晚报（1950）、民族晚报（1950）、自立晚报（1947）、青年战士报（1952）、台湾日报（1964年由东方日报易名）、英文中国邮报（1952）、英文中国日报（1949）。

下面我们详述内地的报业发展状况。根据1950年春全国新闻工作会议调查统计，全国有公私营报纸253种（其中日报175种）。另据1954年统计，全国专区以上报纸共258种，其中，各级共产党机关报151种，工人报纸17种、农民报纸23种、青少年报17种、民主党派和

民主人士及其他团体主办的报纸15种、专业报纸14种、少数民族报纸21种。报纸发展至1957年为364种，1960年为396种，1965年"文革"前为343种。"文革"之后，报纸锐减为1978年的186种。改革开放以后，报纸历经两次发展高潮。第一次是1985年前后，全国报纸总数增加到1445种。第二次是1992年前后，1993年初全国报纸达到2040种，是中国报纸史上最高数字，是1978年的11倍。至1995年，中国的各种新闻传媒在数量上都达到有史以来最高水平，全国使用统一刊号的报纸2202种，使用地方刊号的报纸6453种，共计8655种，是1978年186种的46倍强；全国使用统一刊号的杂志8135种，使用地方刊号的杂志10263种，共计18398种，是1978年930种的19倍强。由于从1996年起对报刊实行以治散治滥为核心的调整，对使用地方刊号的报纸杂志进行分流，报刊数字将有所减少。因此，1995年的报刊总数，将是中国在20世纪报刊发展史上的最高数字。从数量上看，它代表着中国报刊业发展的最高水平。据新闻出版署公布的数字，1998年全国出版报纸2053种，出版期刊7999种。从1996年开始，中国大陆地区也陆续出现了一些有中国特色、不同于西方的报业集团，这是20世纪中国报业又一特点。截止1999年6月，已有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新民联合报业等6个报业集团。及至2000年，中国已拥有15个报业集团。

现在让我们回顾百年来中国通讯事业的发展。

自1872年路透社于上海设立分社，该社独霸我国通讯社市场60余年。民国之后，虽也有一些通讯社成立，但其规模与影响，均难望路透社之项背。

国人自办通讯社，始于1904年广州的中兴通信社，其次是1908年清驻外使馆随员在比利时创办的远东通信社和1911年在广州创办的展民通信社。1912年和1913年两年内，全国相继成立多家通讯社，主要有广州的公民通信社、上海的民国第一通信社、上海通信社、武汉的湖北通信社、长沙的湖南通信社和北京通信社。这些通讯社大多只有一两个工作人员，新闻来源主要靠剪报和译报，自采的新闻很少。1918年，邵飘萍于北京成立新闻编译社；1921年，胡政之于上海创办国闻通讯社；1924年国民党于广州建立中央通讯社；1928年外交部于上海创办国民通讯社(后改称国民新闻社)，张竹平于上海设立申时电讯社，方有一定规模和影响。据统计，1926年全国有通讯社155家，影响最大

者为国闻通讯社和申时电讯社。

1927年,中央通讯社北迁南京,1932年实行改组,成立总社,到1936年止先后在上海、汉口等地设立11个分社,在昆明、西宁等省会与重要城市派驻通讯员30余人,初步形成全国通讯网络。同时,中央社又同路透社、哈瓦斯社、合众社、海通社等签订互换新闻的合同,这些通讯社的电讯,均由中央社统一抄收编发。这样,中央社既垄断了新闻来源,又拥有无线电传播新闻的专用权,成为国民党新闻事业的支柱。

1931年在瑞金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红色中华社,该社肩负出版红色中华报和少量通讯社业务的双重任务。红中社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创办通讯社事业的发端。西安事变以后,红中社改称新华社,红色中华报易名新中华报,依然是报、社合一。1939年,中共中央决定新华社与新中华报从组织上分开,各自成立独立的编辑部,共同受中央党报委员会的领导。抗日战争时期,新华社从只有十几个人,发展到总社有100多人,并在各抗日根据地共拥有9个总分社、40多个分社,成为一个独立的通讯社。而及至1948年底,新华社总社共有工作人员754人,每日发稿8000至2万字,抄收外电十多万字,出版参考消息、各地来稿、电讯清样、新华社电讯稿等6种刊物,并和国内20个总分社、分社建立了无线电报联系。

1950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新华社为集中统一的国家通讯社的指示。同年,国家新闻总署发布关于统一新华通讯社组织和工作的决定。根据这两个规定,新华社各地总分社、分社结束战争年代与地方报纸报、社合一的分散状态,工作、人事组织与财务统一归属新华总社。新华社从中共中央的宣传机关改组成为中国国家通讯社。

1952年,以海外华侨、港澳台同盟和外籍华人为对象的民间通讯社中国新闻社成立。起初,编辑机构附设在新华社内,对海外100多家华侨报纸通过广播发稿,每天广播5000字,后增加到8000字,同时向海外航寄新闻稿《中国新闻》,还发行有关中国风光、文物、建设等内容的照片,后又增加供应文字特稿、摄制电影、制作唱片、出版画报等项业务。中国新闻社简称中新社,1957年脱离新华社独立,规模也日益扩大。目前,中新社和海外170多家报刊、电台、电视台有供稿关系,北京—香港—美国之间建立了电脑数据传输网络,并利用此网络向世界各地供稿。1985年以来,除大量发文字稿外,每年发行各种新闻图片5万多张,已拍100多部电影、电视片。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通讯社事业有了全面发展。在中国，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是国家通讯社。它在国内除台湾以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建立了分社，并在40多个重要城市设置了支社、记者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建立了分社，在各大军区设置了10个记者站；在澳门建立了分支机构。在世界各地，新华社已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分支机构；还在香港、开罗、墨西哥城、内罗毕设立了亚太、中东、拉美、非洲4个专区总分社，并设立了欧美编辑部。全社现有工作人员7000多人。新华社总社设总编辑室和国内新闻编辑部、国际新闻编辑部、对外新闻编辑部、体育新闻编辑部、新闻摄影编辑部、参考新闻编辑部等业务部门，每天用7种文字、24小时不间断向国内外发稿100多万字，每年编发各类新闻照片近3万张底片。此外，新华社还出版新华每日电讯、参考消息、经济参考报、中国证券报、中国图片报、瞭望周刊、半月谈杂志、环球月刊等40多种报刊，加上新华出版社，全社形成了一个包括报、周刊、半月刊、月刊、双月刊、季刊、年鉴在内的新闻报刊系列和新闻书刊出版发行系统。

最后简述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

同报纸一样，中国广播事业是由外人最早兴办的。1923年，上海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开播，是中国境内第一座广播电台。它是由美国商人奥斯邦创办的。1924年，美商开洛电话材料公司主办的开洛公司广播电台开播。1924年，北京政府交通部颁布中国第一个关于无线电广播法令《装用广播无线电接收机暂行规则》，有条件地允许民间安装收音机。交通部又指示东北无线电长途电话监督处在北京、哈尔滨、沈阳等地筹建广播电台。1926年，哈尔滨广播无线电台成立，这是国人自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次年，天津、北京广播无线电台相继开办，1928年，沈阳电台也宣告成立。这些都是官方电台。与此同时，民间电台也先后出现。1927年，上海新新公司广播电台开播；同年，北京燕声广播电台成立。

1928年，由陈果夫创办的中央广播电台开播，是为中国政府大规模建立广播事业之始。1932年，远东最大之电台在南京开始向国内外广播。以后陆续在洛阳、长沙、福建、河北、西安、重庆建台。据1936年统计，全国计有广播电台51座，总功率10万瓦。

1948年，国民党政府各广播电台，实行企业化，改组为中国广播公司。迁台后，中广公司先后设台湾、台中、台南、高雄、嘉义、花莲、宜兰、

苗栗、台东等9台。军队播音总队设台北、台中、高雄、花莲、左营、金门、澎湖等7台。其他尚有空军、警察、幼狮、正声、民本等电台,总计32家,共63座电台。全台湾有各式收音机200万台,平均每千人约167台。

中国共产党属下的人民广播事业,始于1940年12月30日试播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当时,这家电台归属新华社的口语广播部门。后来,由于器材等困难,于1943年春停播。1945年抗战胜利后正式恢复播出。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事业管理处改组为中央广播事业局,它既是新闻宣传机关,又是事业管理部门。1950年全国共有各级人民广播电台65座。1952年,对7个大城市的33座私营广播电台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全部收归国家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广播电台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个台的前身即上面提到的新华广播电台。从1950年起,中央台开始播出少数民族语言节目。1954年开办对台湾广播节目。1950年起,开办对外广播,呼号为北京广播电台。当时使用英、日、朝鲜、越南、缅甸、泰、印度尼西亚等7种语言对外国听众广播。1950年4月,国家新闻总署发布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要求大力发展基层收音站。至1952年,全国共建立广播收音站23721个。至1956年,中国对外广播的规模也由1950年的居世界第12位上升到第5位。1992年,作为国家电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展到7套节目,每天播音128小时,其中两套对全国广播的普通话节目,一套对少数民族广播,两套对台湾广播节目,一套对北京地区广播的调频立体声文艺节目,一套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广播,中国对外广播的国家广播电台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目前使用38种外语广播,还有对华侨、华人和我国驻外使馆广播的汉语普通话、以及广州话、客家话、厦门话和潮州话广播。各地广播电台总数至1999年初达千座左右。

中国的电视事业是从现在的中央电视台(当时叫北京电视台)发展起来的。中国酝酿创办电视事业起始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向国务院提出在北京设立电视台的方案,得到批准。1957年,中央广播事业局成立北京电视台筹备处并着手人员、器材等准备工作。1958年5月1日,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开始试播,同年9月2日,该台正式播出。同年10月和12月,上海电视台和哈尔滨电视台(今黑龙江电视台)也先后开播。至1961年初,全国已有26座电视

台(包括实验台、转播台)。

在台湾,1962年4月28日,合资创办了台湾电视公司,并于同年10月10日开播。至1965年10月,建成全台湾电视广播网,每日播出7小时半,此时全台湾拥有电视机已达10万台,平均每千人不到10台。此为台湾电视事业起步阶段。

中国的电视事业从1958年至1998年40年间有了长足的发展。从1958年至1978年,我国共有电视台38座,而至1998年,全国已有综合电视台880座,教育电视台近千座,有线电视台自1976年创办,已有700余座,用户达5000多万户,其中中央电视台已能覆盖全球98%的地区。中央电视台的9套节目和各省市自治区电视台均已上了卫星。1958年中央电视台初播时只有50名工作人员,现在全国已有各类电视从业人员近50万人,40年间翻了1万倍。1958年全国只有50架电视机,1998年有3.2亿架电视机。1958年中央电视台每周共播出6小时节目,现在每日共播出162小时。40年间,中国的电视事业,成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中的佼佼者。

以上便是我们对百年来中国新闻传媒从起始到迅猛发展的鸟瞰式的描述。本书的主要任务是对百年新闻理论建设作详尽的考察与分析,回顾百年传媒衍变,只是为新闻理论建设提供一个广阔的背景和确定研究的对象,因此不可能也不必要对传媒发展花费过多笔墨。从以上简略的陈述中我们已经不难看出,报刊业从19世纪发生,在20世纪有了脱胎换骨的根本性的进步。真正现代报业的形成,是在这个世纪。通讯社、广播、电视,则基本上是本世纪的成就,是20世纪传媒的宠儿。

以后,本书将在这一点上展开对百年新闻理论的回顾与评论。

第四节　新闻传播活动和新闻事业——新闻学研究的对象和主体

新闻学是一门研究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事业及其规律的科学。本书第二章的内容将表明,新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是在20世纪出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新闻事业正式形成之后,急切地需要对之进行系统研究以认识其规律,并依据对这些规律性的认识进一步运用和推进新闻事业,也正是这些

现代新闻事业问世之后，系统的理论考察与研究也才有可能展开。从总体上说，新闻学是20世纪的科学，是20世纪的产物。

新闻学最初的研究对象是关于报纸的性质功能特征的考察，所以新闻学起初被称为报学。这在中外几乎全是如此。及至有了关于通讯社、广播和电视的研究之后，新闻学才有了较为完全的内容，新闻学也就从起初的报学走向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学。

报学之初，也还没有直接进入报纸性质功能特征考察的领域，而是起步于新闻采访写作以及新闻价值判断等较为操作层面的内容。换言之，对术的陈述多于对学的考量。从实务经验的总结到史料的整理再到学理的探讨，即术的层面再跨入学的层面，是所有应用性社会科学的共同轨迹。新闻学也走过并继续经历着这样一条治学之路。

作为一种真正的科学研究，感性经验的总结必然会导致理性思考的深化，只要实际存在着这种深刻思考的需求和容忍进行深刻思考的学术环境。这样，最初的报学研究必然会深入到一些同报业传媒相关的较为广泛和较为抽象的领域。比如，人类为什么需要新闻信息的传受活动？新闻传播的产生需要哪些客观条件和主观动力？人们根据什么价值取向去衡量与选择新闻？再比如，传播学研究的几个最基本问题，诸如5个W，在新闻学研究最初时刻都已提出：传播什么新闻？谁传播？通过什么媒介（最初自然是报纸）传播？为什么传播？传播以后结果又如何等等。在中西各国新闻学研究最初问世的一批著述中，都闪烁着这些睿智思考的出色成果。

在现代传媒——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没有问世以前，新闻传受活动已经为不少有识之士思考，而在它们诞生之后，则成为新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这些现代传媒所组成的新闻事业本身也成了新闻学研究的对象和主体。这是因为，在现代传媒没有产生以前人们的新闻传播活动，在多数情况下是无人组织的人际传播，即便是组织传播，也是规模和影响相对狭小的传受行为。而现代传媒所进行的新闻传播活动，往往是以全社会为传播空间的大众传播，其规模之巨和影响之广，为以往的人际传播难以企及。这种情况，新闻学的研究领域有了极大的拓展，对于新闻传媒与新闻传播相关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美学以及诸种自然科学的考察，不少内容都纳入当代新闻学研究的范围。国内外一些学者指出，新闻学及其相近的传播学，以及由新闻学与相邻科学组成的新闻边缘科学，竟然有30多门！但作为新闻

学研究时主要对象与主体，仍然应该是新闻传播活动和新闻事业。

事实表明，中国新闻学100年来的研究领域和科学成果，基本上是以新闻传播活动和新闻事业的兴衰衍变作为对象和主体的。只是在本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才分出些精力，涉足某些新闻边缘学科领域。这方面的成果，较集中的有新闻哲学、新闻文化、新闻心理、新闻经济等学科。但同前者相比，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评价：新闻学研究有所成就，但成果不算富足，新闻边缘科学刚刚展开，鲜有收获。

纵观百年新闻学研究的成就与经历，能否这样评价：关于新闻边缘科学的研究虽不足20年，成果初结，但它已经使新闻学研究的领域有了极大的拓展，为新世纪的研究指点了新的天地，开辟了新的领域，并提出了新的研究重点和要求。从这个角度说，20世纪最后20年新闻学多层面研究，功不可及。如果说，本世纪起始时，中国人从西方学者的新闻学研究成果获得许多宝贵的启示和直接汲取学术营养的话，那么在这个世纪最后五分之一时间里，中国学者在新闻学研究中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一些学者在新领域中作出新的探索及其初步成果，人们将在新的世纪中逐渐看到它们的影响和意义。

中国新闻学者在20世纪探讨新闻学中所走过的这样一条路子，规定了本书将基本上紧随着前几节所描述的新闻传媒的发展而逐次叙述新闻学研究的足迹，但在最后几章将在继续遵奉以新闻传播活动和新闻事业为主要对象与主体的同时，适当拓宽至同新闻相关的一些邻接学科的描述与评价。这种以史立论、论从史出的研究原则，也大致规定了全书的叙述方式和成文风格。

第二章

世纪之交的理论新闻学研究

第一节　西方理论新闻学研究鸟瞰

一、从新闻教育起步的新闻学研究

我们在第一章第四节曾经提出，新闻学经历了由术到学的学术进步的路程。科学意义上的新闻学建设，是从本世纪才开始的。新闻学的发凡，是同培养新闻人才的新闻教育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

最初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新闻从业人员，通过培训与教学，使年轻人掌握从事新闻传播和报刊印制的必要技艺。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的军事领袖李将军(Robert Lee)战后出任弗吉尼亚州的华盛顿学院(现已改为华盛顿·李大学)院长。1869 年他向学校的董事会提出建议，设立 50 名报业奖学金，凡有志于从事新闻工作者，一方面在学校接受传统的理论教育，另一方面必须到当地的印刷厂实习，不但借以获得实务经验，同时把实习所得的酬金交付学费。可惜他的这项设想，在他翌年逝世后就被搁置了。1870 年，康乃尔大学以讲座的形式，提供有关新闻方面的知识的课程。初期学生们的兴趣不高，到 1876 年，仅有一位学生获得结业证书。1873 年，堪萨斯州大学开始讲授印刷学知识。密苏里大学从 1878 年至 1884 年，宾夕法尼亚大学从 1893 年到 1901 年，先后开设新闻学方面的课程。前者课程偏重于新闻史，后者是学校正式课程，由前芝加哥论坛报财经版编辑强生(Joseph F. Johnson)主持，可惜他走后后继无人，不得不停办。

至于新闻学学校，最早可能要算 1875 年由瑞士人蒲尔德列在柏美尔特创立的瑞士柏美尔特新闻学校了。可惜在中国找不到关于这所学校更多的记载。一般认为，世界上正规的新闻教育是从本世纪初开始

的。1904 年，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首先开设四年制新闻学课程。在此之前，这所大学于 1902 年已在英文系的名义下开办了新闻课程。同在 1904 年，威斯康星大学也举办了新闻学讲座。

第一个成立新闻学院的，当首推密苏里大学。1908 年，该校成立新闻学院，由著名的威廉斯(Walter Williams)博士任院长，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所颁发新闻学位的高等学府。

著名报人普利策对新闻教育的推动功不可没。1903 年，普利策向哥伦比亚大学建议，捐赠 200 万美元，协助该校创办新闻学院，另捐 50 万美元设立新闻奖基金。在捐款时，他表达了心中的愿望：由此开始将新闻工作提升到专业的水平，同时逐渐使新闻工作成为社会上最受尊敬的行业。

最初，新闻教育并没有受到社会甚至新闻界本身的重视。开办之初，诸事进展并不顺利，但在往后的 20 年，发展却相当迅速。由下面的表格可见，从 1910～1927 年，17 年中美国新闻院校发展的数字：

年　份	1910	1911	1912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	1927
校　数	4	7	10	11	15	19	19	24	26	28	28		54

根据 1924 年时这些学校所做的一项调查，大部分院校认为报道、阅读、写作、社论、文学批判、历史、比较新闻学、新闻伦理是新闻教育的必修的基础课程，因此这些院校的课程设置，大部分偏重新闻实务的训练，对于理论的研究则基本上是空白。奥勒冈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艾伦(Eric W. Allen)在 1929 年出版的新闻学季刊上指出，在过去的 24 年里，所有新闻科系的教授，没有一个人写过一篇有水准、有分量的研究论文，包括研究所的学生在内也是如此①。

新闻教育偏重实务而忽视理论的状况，到 20 年代后期有所改变。新闻教育院校除了继续强调实务训练的重要性之外，开始以科学和统计研究方法，探讨同新闻传播相关的人文和社会现象。

新闻教育之所以能够出现这种可喜的变化，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新闻学研究此时已有重大突破，开始从对新闻传播的经验描述走向较为抽象的理论思考。

① 以上资料见郑贞铭：《新闻原理》，(台)五南出版公司 1995 年 8 月初版，第 76 页。

新闻学是研究新闻传播活动和新闻事业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它是随着近代报业的产生发展而诞生的。近代报业的发源地之一在德国，所以德国也成为最早研究新闻学的地区。作为这种研究的一批成果是：

17世纪末期，一些德国大学生以报业为研究对象写出了一批学位论文；

1845年普尔兹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新闻史专著《德国新闻事业史》；

1895年在德国科赫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新闻研究所。

然而，嗜好理论的德国人像他们在哲学上的贡献一样，他们在新闻学研究方面的成就的特点是：偏重史与论的探讨。这同西半球的美国侧重新闻实务的研究，成了鲜明的对比。

同德国新闻学者为伍的是日本的新闻学者。1929年，日本的学者小野秀雄在东京帝国大学（现在的东京大学）建立新闻研究室。他是日本新闻教育的鼻祖，也是日本新闻学的奠基人。以他为代表的日本新闻学者把自己的注意力也放在理论与历史的研究上。

我们不妨把德国和日本的这些新闻学者称为理论学派，他们大多数是大学的教授，擅长与有志于理论探讨。相对的一派是惟实学派。或者说对应用新闻学较多感兴趣的一派。他们的代表人物大多为美国的新闻学者，这些学者不少同时也是报人。比如，1924年出版的新闻学权威理论著作《新闻学原理》的作者卡斯柏·约斯特（Karspa Johnst），担任过美国报纸主编人协会会长、圣路易地球—民主报主笔。

然而，我们不得不指出，最早问世的一批新闻学研究性著作，主题都是新闻事业史。其中的作者有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威拉德·瓦·布莱耶、锡拉丘兹大学的M·莱尔·斯潘塞等，而其中最早、最知名、对中国影响也最大的当数休曼（Hilman）所撰写的史论结合的作品《实用新闻学》。休曼的这本书包括美国报馆进化史、新闻业同盟会、妇女与新闻事业、美国版权法以及新闻采编方法等章节。由于这是最早译介到中国的新闻学术著作，对中国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研究影响很大，本书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详加评介。

新闻学研究，除了报刊史这一主题外，另一重大主题便是报纸的采（访）、写（作）、编（辑）、评（论）四大实务。早期的作品，绝大部分属于后者。这样的结局之所以形成，主要原因是新闻教育起先认为是传统的

师徒间的技艺传授,所以实务训练乃是第一位的内容。台湾的郑贞铭教授对中国新闻教育70余年的历史作过分析,认为无分国内外,关于新闻教育的发展方向,大致可分为四种。

1. 以实务训练为本位——这是传统的、也是最盛行的新闻教育制度,以培养从事实务工作的记者和编辑为主要目的。

2. 以社会科学为依归——这一类的学者,主张新闻教育乃是将社会各种知识传授给学生的桥梁。因此新闻教育的内容,应该和社会科学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这一项主张,虽然不像传统实务派的影响力那么大,但是近年来新闻教育的走向和课程设计,受到这一派的影响很大。

3. 以人本主义为目的——这一派的人,认为新闻教育是一种文化的工具,它不但塑造社会舆论,而且在社会上扮演一个道德仲裁者的角色。基于这种社会责任的影响力,新闻教育应该多强调人本主义方面的思想和课程。这一派的主张,对近年新闻课程的修订,也起了一定程度的作用。

4. 科学性的传播研究——这一派是近年来结合统计和电脑之后的产物。以统计和电脑为辅助工具,针对各种不同的传播模式、传播理论和传播效果,作数据方面的分析。①

郑教授的这一分析,不仅概括了中国台湾各新闻院校多年新闻教育的情况,也勾勒出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以及美国等许多国家新闻教育走过的路程。这些情况,至少从内地多所新闻院校来看,这四种路向至今仍然存在,只是有的偏重于其中一两项,有的则四种俱全。

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反映出从报业到大众传播业对新闻教育的实际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说明新闻学研究自身的深化与衍变。对于新闻学的变化,从新闻学的产生,演变到今天,包括了对新闻的采编、新闻评论,以及各种新闻传媒的性质特征的全面研究的展开,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报学、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换言之,新闻学的研究范围,也由早期的报纸采访编辑,扩展到包括对新闻本身、使用的媒介、传播行为、传播影响力,以及传播媒体的社会责任等各项问题的研究。人们对于从报学拓展为新闻学,是无可非议的,因为现今的传播媒介,已不是以往那种单一的报纸,而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通讯社、新闻

---

① 参见郑贞铭:《新闻原理》,第77页。

纪录影片整个新闻传媒大家族，单一研究报纸的报学，显然已无法涵盖所有传媒，新闻学的出现，那是势在必然。对于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则有许多不同见解。有人认为大众传播学是新闻学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是新闻学的高级发展阶段。有的认为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学科领域。李瞻教授指出，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的区别，主要在研究范畴的不同。前者仅研究新闻、新闻媒介及其与社会之关系，而后者则包括对传播动机、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过程、传播大众与传播效果的综合研究。而且这些研究必须要以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等作基础，然后才有圆满的结果。[①] 李教授的这一分析不无道理。不过进入当代社会以来，新闻学研究如果不深入到受众之中去深入地探讨新闻传播的动机、渠道、效果，如果不对传播的对象——广大读者、听众、观众以及新闻传播的内容等作具体的考察，这种新闻学研究是难以有所成就的。笔者以为，大众传播学的研究范围，在于它除了对新闻传播媒介之外，还包括图书、电话、文艺演出等一切社会信息载体的研究，大众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量化法，而不似新闻学，偏重于性质法。在今天中国大陆，新闻学研究借用大众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已成事实。一些冠以"新闻传播学"的著作，也陆续问世。这些便是对笔者分析的一些佐证。

二、四种理论的研究

对百年新闻学研究的历史作一番综合考察，就世界范围看，的确走过了一条从狭隘报学到较广泛的新闻学的路子。从20世纪初，关于报学的著作少量出版，到20世纪20～30年代形成一个高潮，这些著作大部分涉及报史与报纸实务，间或也有部分讨论报业理论与新闻传播原理的专著，但总的说，对包括报纸在内的新闻信息传播进行宏观的、抽象的研究并不多见。这种综合性研究，直至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才出现。这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20世纪新闻学研究的中心主题和基本理论体系。直至本世纪90年代国内外出版的新闻学著作，都如出一辙地评述报业的四种理论，便是笔者结论的最有力的说明。

无论是西方新闻学者还是中国新闻学者（中国新闻学者中包括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学者）都认为，关于报业四种理论的考察，是20世纪西方新闻理论的最重大主题和最主要内容。当然，在电子传媒出现

① 参见李瞻：《新闻学》，（台）三民书局1994年第12版，第28页。

之后,"报业"亦成为新闻业的代名词,此时的新闻学研究,实际上已跨出传统的报业范围,进入对包括文字传媒与电子传媒在内的大新闻业的研究。

下面想对这四种报业理论及其在20世纪的演绎,作简洁的评介。这个理论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引用他们的基本观点。这四种理论是极权主义报刊理论、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共产主义报刊理论、社会责任报刊理论,可以分别简称为国家统制论、天赋人权论、阶级斗争论和社会责任论。

(一)国家统制论

1450年,古腾贝格(Johann Gutenberg)发明现代印刷术,为现代报业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手段。但中世纪的欧洲,是极权主义的黄金时代,故印刷术和新闻纸问世以后,立即成为教会和政府的统治工具。这一时期正值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时代,人民也需要更为有力的传播媒介,迅速传播新思潮。教会和政府为了镇压自由思想的传播,乃规定了极权主义的报业制度即国家统制论。

行使国家统制论的国家控制新闻传播的法律措施是:

1. 出版特许制。1538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建立皇家特许制度,这是世界上最早开始的出版品登记许可制度。1557年,英国为了统一管理出版商,成立皇家特许出版公司。该公司规定,会员之间得互相检查出版物的内容。经批准的忠于王室的会员组成特别工作小组,赋有审核入会和开除会籍的权力。公司的特许状中规定,王国之内,除公司会员及女王特许外,其他出版活动一律停止。1566年,枢密院命令出版商缴纳相当数额保证金,保证不出版未经许可的作品。1570年,成立皇家出版法庭,专司审理叛国、煽动及诽谤罪等出版活动,该法庭还可不经辩护程序,径自对疑犯处以任何刑罚。1586年,伊丽莎白女王一世颁布出版法令,规定:

(1) 一切出版品须送皇家出版公司登记;

(2) 除牛津、剑桥大学外,伦敦布外一律禁止印刷;

(3) 除非教会同意,出版商不再增加;

(4) 任何出版品均须经事先许可,并接受检查;

(5) 皇家出版公司,对非法出版有搜查、扣押、没收及逮捕疑犯的权力。

英国的这种特许制度,实行近200年,至1695年,才正式废除。

英国式的这种极权主义法制，欧洲各国都有，如法国的波旁王朝(1589～1793;1814～1830)、西班牙的哈普斯堡王朝(1516～1700)，都采用此种制度。

2. 征收“知识税”。18世纪，英国政府向报纸、广告及纸张征税，史称“知识税”。1712年，国会通过印花税法案，正式向报纸、广告及纸张课税。由于税率沉重，开征不久，伦敦报纸即有一半停刊。直至1861年，方全面停止这种征税。

3. 津贴制度。自17世纪始，一些政府即以津贴报纸、收买记者为手段，以达到控制舆论的目的。获得津贴的报纸，不仅每年从政府处拿到大量直接津贴，还有得到各种内幕消息及免费邮寄的便利。这种津贴，直至19世纪广告成为报纸主要收入之后，才逐渐失去影响力。

极权主义报业理论的形成，从哲学上看，有它相当的思想基础。提供这些哲学理论的，是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马克威里(Niccolo Machiavelli)的君王论、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巨灵论、黑格尔(Geolge W. Hegel)的权利哲学。他们为国家统制理论提供的哲学观点主要有：

1. 个人离开社会便无意义，不完整，并且毫无价值。极权主义者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个人乃社会的一部分。个人必须生活在社会中才有意义，若是脱离了它则无法生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有如细胞和身体一样，前者是后者的组成部分，但前者无法单独存在。

2. 社会和国家是集体意志力表现的实体。文明的发展，乃是由社会集体努力的结果。个人必须附属于社会，才能获得自由的最高境界。因此，国家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东西，是由全民意志力共同凝聚起来的实物。

3. 社会和国家的价值至上。个人利益，必须有助于公众的团体利益才能得到实现。个人乃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个人的生存条件，必须依附于社会的发展才有继续的必要。个人的存在，是为了社会和国家的至高无上的价值，个人没有独立的理由和价值。有必要的时候，国家有权要求人民作出牺牲。

4. 知识的多寡，因人的聪明才智有所不同，而真理则是绝对惟一的，真理常由心智高人一等、位居统治阶级的人所拥有。

总之，人性的本质、社会和国家的本质、人民和国家的关系、知识和

真理的本质这四个方面，形成极权主义报刊理论的哲学基础。① 在国家统制论中，报业的主要功能是作为教会和君主的工具而存在，人民个人的思想和意见必须服从社会和国家的意志，人类的真理是由少数居于社会顶层的聪明人掌握，因此，只有服从这些权力中心的领导层的统治，个人才有存在的价值。这是极权主义报刊理论的核心。

社会发展已足以证明这种学说的荒谬。这种理论曾经对社会的进步与报业的健康发展造成巨大破坏。这种理论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德、意、日法西斯时代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法西斯政权的垮台和世界进步势力的壮大，极权主义报刊理论的影响已大大减弱，而在另外一些国家里，这种理论也换上了新的包装。

(二) 天赋人权论

天赋人权——自由主义报业理论，起源于 17 世纪的英国和 18 世纪的美国。但这种报业理论的哲学基础，可追溯至古代的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与近代的英国文化。

大约在公元前 800 年，犹太人的作品中就表现出自由与平等的思想。希伯来圣经中指出：

> 人生而相同，死也相同，而且我们也不能拿走一点东西而去。所以，不管人为造成何种阶级，但在上帝的眼中，每人都是平等的。
>
> 人类间一切人为的不平等，并不重要；在天堂中，主人与奴隶没有任何不同。

古代犹太人的这种平等思想，至中世纪推动他们建立一个近似民主政府的政权。这一政权曾引起欧洲国家的关注，并成为英国人民迈向民主政治的推动力之一。有学者指出，古代希伯来文化对自由主义主要贡献有二：个人价值；平等观念。②

古希腊对自由主义的贡献也有两项：个人自由的观念和平等民主的观念。在那里，通过设立一种“诗人”职务而时时提醒人民重视政治关注文化，当时的统治者允许诗人根据自己的见闻自由发表意见。公元前 900 年的著名诗人荷马(Homer)，就是这样一位受人民爱戴的诗人。后来，古希腊的许多哲学家，如苏格拉底等所宣扬的平等主义，也

---

① 参见施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9～10 页；郑贞铭：《新闻原理》第 46～47 页；李瞻：《新闻学》，第 50～56 页。

② 参见李瞻：《新闻学》，第 82～83 页。

为自由主义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武器。

世人称英国为近代民主政治的摇篮，这有赖于她的文化的巨大贡献。

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与笛卡尔(Rone Descarts)，坚决反对旧权威，主张以理性为达到真理的途径。到了伊丽莎白末期，天主教徒出版商卡特尔(William Carter)，主张人民应有讨论政治的自由。新教徒出版商辛格顿(Hegh Singeton)，猛烈攻击国教的建立。另一位出版商华尔夫(John Walfe)，不是皇家出版公司会员，不断抨击出版特许制度。1644年政治评论家华尔温(William Walwyn)在国会发表演说，强调宽容精神，主张出版自由，攻击特许制度。经济学家罗宾逊(Henry Robinson)亦强调"自由讨论"和"自由判断"的重要。他说，无人能独占真理，真理越辩越明。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新闻自由请愿书(1644)，是反对极权主义、主张出版自由最伟大的文献。在这篇著名的演说中，他提出了四个重要观点：

1. 清教徒国会控制出版事业，系沿袭天主教宗教法庭之不当权力，毁灭无数优秀作者的心血，可谓以暴易暴；

2. 管制出版及新闻检查，不仅证明读书是危险之事，而且是人类的重大灾难，因为出版品乃理性的结局，其价值重于个人之生命；

3. 压制出版及新闻检查，并不能消灭煽动诽谤的言论，最大效果仅能将其驱于地下而已；

4. 压制出版及新闻检查的实际效果，只是迫害真理，阻碍人民的所有学习。

弥尔顿在演说中向国会要求：在所有自由中，请给我根据良心，自由获知，自由说明，自由辩论的权利。①

人们公认杰弗逊(Thomas Jeffeison)是美国第一位自由主义哲学家。他的思想大部源于洛克及当时法国自由主义学者。约翰·洛克(John Lucke)被尊为17～18世纪自由主义之父，现代民主政治哲学的奠基人。洛克认为人是理性动物，每个人都是独立、自由、平等的，每个人都有天赋而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如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人类在自然状态中，由于缺少法律和没有裁判官，没有保障"公正"的强力，所以自然权利的享有，仍有许多不便。因此，彼此协议成立契约，个人

---

① 参见李瞻：《新闻学》，第89～90页。

放弃部分权利，组织政府，专门负责维持社会的秩序，保障人民的权利。但政府的权力，仅限于人民的委托，超出人民委托的限度，人民可撤换政府。政府如不服从，人民尚有革命的自然权利。杰弗逊在洛克演说的基础上，尤其强调"分权"学说和"个人第一"的观念。他认为，个人远比政府重要，如果人民的知识水平提高，并有灵通的消息，只需要一个权力最小的政府就够了。从这一观点出发，他指出报纸有三种功能：

1. 教化人民提高文化水准；
2. 供给新闻服务民主政治；
3. 监督政府保障人民之自由权利。

在杰弗逊的一生中，对报业始终坚持这样两项基本信念：第一，报业在民主政治中，其基本功能是服务性的；第二，为了完成服务民主政治的目的，它必须享有新闻自由。

由于上述哲学家们的无畏言论和新闻工作者争取新闻自由的卓越斗争，终于使自由主义报业理论得以形成，自由主义报业得以发展，并在社会政治中发挥巨大作用。因此至19世纪中叶，汉特(F. K. Hunt)在他的新版著作(Fourth Estate)中宣称，报业是僧侣、贵族、平民以外之第四阶级，以有别于行政、立法、司法三大部门之外的权力中心，而新闻记者也取得"无冕之王"的称号。

天赋人权——自由主义报业理论在实际生长发展中经过了三个阶段。以英国报业为例：

1. 要求出版自由。这一目标以1694年英国废除出版法案始告实现。

2. 要求意见表达自由。这一目标以1792年福克诽谤法案的通过，1832年颁布改革法案，1861年废除知识税和印花税以及独立报纸的兴起为标志，得以确立。

3. 要求资讯传播的自由。一次大战后，针对"机密消息"范围的扩大，新闻界提出"人民有知的权利"。二次大战后，新闻界又提出采访自由与消息交流的自由。这一目标，就世界范围看，尚未完全实现。

进入20世纪以后，报业进一步沦为资本家牟利的工具，报业兼并日益加剧，报业伦理趋于败坏。现代的新闻自由，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同最初的天赋人权论的理想已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自由主义报业理论面临着重新检讨评估。这种情况下，促使一种新的报业理论的问世。

(三) 阶级斗争论

西方学者把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新闻事业以及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称为共产主义报业，把这种报业理论称为阶级斗争报业理论，并且认为这是极权主义报业理论在"共党社会"的一种新的发展和新的形态。

西方学者指出，阶级斗争报业论的哲学源泉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是"社会辩证原理"与阶级斗争唯物史观。台湾地区学者对此有更详尽的演绎，不妨作全面的摘录：

"我们现在把共产主义传播媒体的特性作一归纳：

1. 大众传播是一种统治工具。换句话说，大众传播是政府和党用来巩固政权的工具之一。传播媒体最重要的任务，不是用来传递消息，而是作为帮助共产党和它的政权维持政权的文宣工具。

2. 传播机构在经营和管理上跟党和政府有密切的关系。由于传播媒介的言论必须配合党和政府的政策，为了确保这项任务的顺利推行，传播机构遂被纳入整个官僚机构的一环。其运作和管理，直接受制于官方的指挥。

3. 传播机构不仅是领导阶层统治国家的工具，同时也是党和行政机构用来凝聚内部力量的文宣工具。党和行政系统的最高层，往往利用传播媒体，把党意和政策传达给下面的人知道。很多时候，最高当局也会利用传播媒体，'泄露'一些正在拟议中的政策，借以试探一下党内的反应。如此不但达到收集党内意见的效果，同时也避免日后公开对立的尴尬场面。

4. 传播媒介是党和政府独自拥有的宣传工具。宣传的对象，不仅是对境内的国民，在国际上也代表了国家的观点和立场。在国际政治上，这些官方媒介所透露的讯息，其实也代表了该国的政策。

5. 它们有严格的责任承担制度。任何违背官方立场的言论，都必须接受处罚，程度视违背情况的严重性而定。"

西方学者特别注意到阶级斗争报业理论对于新闻自由的认识，有别于自由主义报业理论。对此，台湾地区学者也有较为详细的分析，认为阶级斗争论对新闻自由的主要观点是：

1. "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

2. 共产党的新闻媒体，只享有"传播政府的观点"的新闻自由。

3. 任何传播媒介都没有批评或反对官方政策的新闻自由。

4. 报业只有为社会所共有，才能不受资产阶级的控制，才能真正表达民意。

5. 新闻自由与责任归属是不可分割的。

西方新闻学者认为，共产阶级报业理论和极权主义报业理论在观念上颇为相似，但实际运作上是有差别的，表现在：

1. 传统的极权主义对传播媒介只作消极的限制，它只规定什么是不可做的；共产主义则积极地介入传播活动，不但规定不可以做什么，还进一步规定必须做什么。

2. 极权主义报业的最高责任是拥护并巩固现有政权的稳定；共产主义报业除了上述的责任，还负有输出革命，全世界共产主义化的最大责任。

3. 极权主义报业是一种受到控制的媒体，基本上同政府没有明显的从属关系；共产主义报业是党和政府所整体策划的庞大机构中的一环。①

（四）社会责任论

西方学者认为，正像共产主义理论是从极权主义理论演变而来，社会责任报业理论，则来自自由主义报业理论。自由主义理论起源于17、18世纪的极权社会，而社会责任论则是20世纪社会的产物。

在天赋人权——自由主义报业理论中，我们已经提到19世纪西方报业步入大众化报业之后出现不少亟待改进的弊病，这里我们要详细地引述美国新闻学者彼德森（Theodore Peterson）所分析的现代报业的缺陷：

1. 运用其巨大的影响力遂其自私自利的目的。尤其是报业的老板，利用新闻报道的方式，宣扬个人的政治、经济立场，而压抑反对意见的传播。

2. 报业屈服于大企业的操纵之下。广告商得以影响报纸的编辑方针及社论立场。

3. 报纸对抗社会改革。尤其当社会改革与报业老板的个人理念或商业利益有冲突时，报纸往往成为社会改革的绊脚石。

4. 报道时事新闻过分注重它的表面及煽情的部分，忽略了隐藏在事件背后的实质意义。娱乐新闻则缺乏内容。

① 阶级斗争论这部分内容的论述，参见郑贞铭：《新闻原理》，第62～65页。

5. 报道内容常常危及公共道德。

6. 报道内容常常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侵犯到个人的隐私权。

7. 报纸为极少数大资本家所控制;由于新的报业难以生存,危及自由及公开的意见交换市场。

与此同时,作为自由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也受到挑战。首先,现代心理学发现,人的理性力是有限的。人类并非完全为理性动物,其选择亦非经常正确。人类行为主要受潜意识支配,而生活的目的,主要在满足当前的迫切需求和愿望。如果要健全社会,首先必须通过教育,改善社会组成分子——人的素质。不经过教育,人类潜在的原始的兽性便会逐渐出现,若任其完全的自由,人就会变成自私、短视,甚至不惜牺牲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私欲。显然,"人性本恶"在这里取代自由主义理论借以确立的"人性本善",占了主导的作用。

其次,自由主义理论所强调的一些天赋不可剥夺的权利,在工业化社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文明社会中,均已公认"社会公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则,个人自由的行使,以不妨碍整体利益为前提。换言之,个人自由权利绝对不受干涉的理想,在新的社会中,在社会个体之间相互依赖程度大幅提高之后,变成过时的想法。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于1947年正式提出"社会责任的报业理论"。该委员会由时代周刊发行人鲁斯(Henry R. Ruce)资助,由芝加哥大学校长霍金斯(Robert M. Hutchins)博士任主席,委员多为全美各著名大学的教授,并有享有盛名的外籍学者应邀参加,中国的胡适博士亦是其中之一。该委员会于1946、1947两年连续出版7种丛书,其中一种名为《自由而负责的新闻事业》,首倡"社会责任论"的报业主张。1956年,美国著名新闻学者与传播学者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等人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中详尽地阐述了这一理论。

社会责任论起初不但没为美国新闻界接受,反而受到猛烈抨击。指责者认为,新闻自由委员会大部分成员多属学术界人士,没有新闻传播专业经验。但英国却对之有热烈反应。英国报业总评议会在国会敦促下于1953年成立。之后,德国、土耳其、比利时、奥地利、韩国等,相继成立类似的组织。这一理论逐渐在全世界产生广泛影响。

根据新闻自由委员会报告的意见,社会责任论的主要观点是:

1. 权利与义务是相对的。新闻传媒和传媒工作者既然享有法律所保障的权利,也就有义务去承担应负之责任。社会责任论仍然奉新闻自由为基本精神,但它的前提是"没有不尽义务的权利,没有不负责任的自由"。因此,要拥有真正的新闻自由,传媒和传媒工作者就应恪守法律,实行自律,以负责任的态度去完成自己的社会使命。

2. 新闻界要以明确的责任心作为新闻报道和言论方针的依据。新闻报道必须真实、正确而有意义。言论必须公正和正确。为确保传媒对社会发生积极的影响力,政府可以制定法规。如果私人的新闻传媒未能对社会善尽责任,政府可直接经营新闻事业,以保障人民知的权利,以及拥有畅通的消息自由流通的管道。

新闻自由委员会以现代化社会的需要为前提,列出5项新闻事业的工作目标,他们以这5项目标,作为评估新闻界表现的标准:

1. 准确、全面而有深度的新闻报道。

2. 新闻传媒应该成为意见交换和批评的论坛,这种交换和讨论不因老板的反对而改变。

3. 新闻传媒应广泛代表各种社会团体,成为彼此沟通的桥梁。

4. 新闻界有责任帮助社会界定和澄清自己的目标和社会价值,倡导新的观念和开拓新的事务。

5. 新闻界要对当今事务提供充分的信息,以保障"知的权利"得到实现。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保障公民知的权利之间取得平衡,是新闻界的重要工作。

新闻自由委员会提出社会责任理论,在全世界已产生广泛影响。有的观念,已为新闻界普遍接受,比如:

1. "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并重,权利必须伴随义务。

2. 新闻自由若妨碍公共利益,政府有权制定法律加以规范。

3. 新闻事业不一定非得私人经营才能摆脱政治的干预。私营的新闻事业以牟利为目的,追求利润的重要性往往超过了责任感的要求。因此公营的新闻事业也有存在的价值,可提供竞争和制衡的作用。

4. 新闻伦理、公共利益和公众安全是必要的。主张节制犯罪煽情报道,力避"报纸审判"。

5. 政府有权约束新闻界。主张政府应积极参与,必要时得使用公权力以保障真正的新闻自由。

6. 调和个人主义的过度膨胀。社会责任论放弃了自我为中心的

伦理观念，强调社会公益应高于个人利益。[①]

社会责任论问世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它的批评也不乏其声，大致集中于三个方面。

1. 社会责任论主张新闻事业应承担社会责任以建立"自由而负责的报业"是正确的，但它提倡政府得制定法规，政府与社会团体可"强迫"传媒履行社会责任。这里缺乏必要的条件与前提的规定，易为一些政府与团体干预与侵犯新闻自由制造口实。有的学者认为，对于传媒的监管，应由立法机构来立法，而不应由政府或团体来行使立法权，这样会损害到传媒对政府与团体的监督。

2. 社会责任论主张政府直接创办新闻传媒以平衡私人传媒。有人批评这一主张会影响到报道公正和意见公开，危害新闻传播的市场化经营。有学者指出，这一主张如改为由政府协助，创办非营利性之公营传媒，则更为妥当。

3. 社会责任论指出自由主义理论下报业商业化之趋势，其分析与批评是正确的，但它本身并不能消除传媒商业化的这些流弊。换言之，它并非是一剂万全的良方，因此，必须另择新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相继提出"民主参与的传播理论"，它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领域，开启了新的新闻传播思潮，但目前尚未成为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郑贞铭和李瞻两位教授曾对上述在本世纪广泛研究的四种报业理论进行比较分析，这里转摘郑贞铭教授的研究成果如下(为更清晰起见，笔者对部分内容作了修改)[②]：

比较内容	极权主义论	共产主义论	自由主义论	社会责任论
起源地区	16～17世纪的英国，至今仍在一些国家奉行	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现今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	1688年之后的英国，后扩及美国及西欧国家	20世纪的美国，后扩至英国及大多数西方国家
哲学基础	君主或政府的绝对权威不容挑战	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论	理性主义和天赋人权说	权利与义务统一学说

① 这些分析，参见郑贞铭：《新闻原理》，第68～72页。

② 分别参见郑贞铭：《新闻原理》，第72～73页；李瞻：《新闻学》，第301～305页。

（续表）

比较内容	极权主义论	共产主义论	自由主义论	社会责任论
主要目的	巩固及扩展当权者的地位及权力	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现社会主义制度	传播与娱乐，寻求真理，监督政府	传播与娱乐，强调经由公开讨论取得共识，令传媒维护公众利益，防止滥用新闻自由
传媒使用	经由政府特许的人士或组织	共产党或拥护政府的忠贞人士	具有相当财力的任何人士均可进入媒介市场	具有需要的任何人均可自由使用
传媒控制	政府利用特许制、执照、新闻检查方式及征收知识税	新闻检查、人员监控、财务物资及政治控制	自我修正，或由消费市场调整	社区意见，消费者行为，职业法规，政府监控
运行禁忌	对于政府及当权者的批评	对于共产党的目标及党的领袖的批评	诽谤、猥亵、战时煽动、新闻侵权	威胁个人隐私权及公共利益及公众安全
传媒从属	私人或公共的	公共的，主要是党和政府的	主要是私人的	私人经营，必要时政府可介入或创办
主要特征	虽然不一定为政府所拥有，仍充当政府统治工具	为政府拥有，纳入党和政府机构的文宣工具	主要用于监督及制衡政府的工具，同时满足社会其他需要	媒体必须负起社会责任，如果做不到，政府可介入迫其执行社会责任

三、其他理论课题的研究

外国新闻学者在20世纪的新闻学理论研究，除了上述四种报业理论外，还对下列新闻理论进行了探讨：

（一）新新闻主义理论

美国新闻界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一种新闻主张，由汤姆斯·沃尔弗（Thomas Wolfe）首先提出，倡导用写小说的方法报道新闻，必要时可以虚构。这种理论攻击传统的真实报道新闻的原则是墨守成规、原始主义。他们提出记者和作家的混合是“新闻学的新哲学”，认为主

观想象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只有使用艺术概括，用艺术手法写出来的新闻才是高于真实的作品。沃尔弗把自己观点的拥护者称之为"新新闻记者"，"记者与艺术家的混合体"。这种新闻主张受到美国严肃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者的反对，也受到文学界的批评，认为它不仅有损新闻的声誉，也有失文学的尊严。但是新新闻主义思潮对西方新闻传播实践仍有一定影响。

（二）调查新闻学

20世纪70年代首先在美国出现的新闻学观点，因其倡导调查性报道而得名。当时，《华盛顿邮报》两名年轻记者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因对水门事件的成功报道而声名大起，此后调查性报道颇受青睐，对调查性报道的研究也由此受到关注。这种新闻观点认为，新闻记者的社会使命，就是要主动而无畏地捕捉重大社会黑幕丑闻，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报道，力求揭示出深层背景，并向公众展示产生这些黑幕丑闻的社会根源，推动社会改革。实际上，调查新闻学是过去西方社会"扒粪报道"在新形势下的发展。由于一些冲击力大的揭丑报道往往会触及有势力的财团与政党，因此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调查报道自80年代以后有所减少，并转入对一些风险较小的社会问题的揭露，因此，"调查新闻学"的热度也随之降温。

（三）精确新闻学

一般认为精确新闻学的创始人是美国新闻学者菲利浦·迈耶(Philip Meyer)，他在1971年出版了《精确新闻学》。他在书中指出，传统的新闻采访和处理新闻的方法，只偏重耸人听闻的情节和作一般性的描述，使得新闻报道难以做到真正的准确与客观。新闻记者应该广泛地运用社会治安和其他人文科学的方法来采集、加工新闻信息，并从社会、历史、政治和经济的角度去分析新闻材料，揭示社会事件真相，以提高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具体的方法，迈耶提出可运用计算机技术进行选择性调查、数量分析、内容分析、中间测量等等。在此书出版后的十几年里，精确新闻学的研究十分流行，并介绍到不少国家。

（四）发展新闻学

这是由发展中国家的新闻学者提出的新闻学理论，从本世纪70年代问世并逐渐发展起来，并进一步扩延至西方发达国家。

发展新闻学理论认为，西方传统的新闻学由于受到政治偏见和价值观念的限制，导致在这种理论支配下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报道，一时

追求怪异的突发事件，片面报道这些国家的战争、内乱、灾难、犯罪及各种落后现象，而对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进步与发展不屑一顾。为此，这些国家的新闻学者提出要打破国际新闻传播中的这种不平衡和不平等的状况，建立世界新闻传播的新秩序。他们还要求，西方新闻界应当改变传统的新闻价值观念，完整而全面地报道新闻事件，既报道突发事件，又报道非事件性新闻。他们还强烈要求西方传媒扩大报道面，全面真实地反映发展中国家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新进展。

受发展新闻学的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新闻界建立了区域性的跨国联合通讯社、电子传媒组织，进行国际新闻报道的改革，加强地区性新闻合作与交流，努力建立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在这种新局面的推动下，一些西方国家的新闻学者也开始重视和开展发展新闻学理论，并重新审视和改变以往的新闻传播秩序。

（五）倡导新闻学

这是美国于本世纪60～70年代流行的一种新闻学理论。类似中国的评述（述评）性报道。这一理论要求记者在依据大量事实的报道中，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与观点。这种混杂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的报道样式，完全突破了西方一直提倡的客观报道的模式，因此多数人并不赞成，但也有部分新闻传媒认同并实行。不过总的说来，这种理论在二次大战后西方出现的各种新闻学理论中，没有多大影响力。

（六）多视角新闻学

又称多维新闻学。这种在70～80年代出现的新闻学理论，提倡运用多维透视的方法，多视角、多方位地全面、立体地反映完整的事物和社会事件，反对当时一些新闻传媒出于猎奇而支离破碎地突出报道某个侧面或某个事件。这种理论旨在世界进入新技术革命新时代以后，利用新的传输手段和丰富的信息资源，扩大报道面和加强报道深度，促进传统新闻取向与审视角度的改变。关于多视角新闻学的理论尚有待系统化和理论化，但这种主张已引起全球许多国家传媒研究者的关注。①

世界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传播学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已超出人们对新闻学研究的投入。40多年来，传播学研究的成

---

① 以上6种新闻学理论研究的资料，参见徐耀魁主编：《西方新闻理论评析》，新华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49～52页。

果、投入的研究力量和它在学科群中的地位，都令人刮目相看。但新闻学研究并没有停止，在中国等一些国家，传播学的影响直至80年代才姗姗来迟，在此之前新闻学的地位还是举足轻重的，在一些学科领域还有新的突破，而传播学尚在译编与评介的初级阶段。

对于新闻学研究的这种状态，《西方新闻理论评析》的作者有一段相当准确的评述，不妨摘录如下，并作为本节的结束：

> 尽管自50年代以后，传播学的研究与发展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在传播学与大众传播事业最为发达的美国，似乎越来越超越传统的新闻学领域，并大有“吞并”和凌驾新闻学之势。然而，在传播学盛行中被挤到边缘的新闻学，仍然坚守着它独有的地位，并不断被执著的研究者们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出现不少与新闻学接壤的边缘科学，即新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哲学等学科交叉产生的新闻心理学、新闻哲学、新闻社会学、新闻文化学、新闻法学、新闻伦理学、新闻管理学等。
>
> 因此，从传统研究新闻业务的新闻编辑学、新闻采访学、新闻写作学、新闻评论学，发展到广泛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各社会科学研究交叉的新闻学边缘理论。新闻学长久不衰的生命力，反映了社会实践对这门学科不可缺少的需求。随着人类社会不断走向信息化，新闻学将向综合化、多学科化的趋势发展。这样，未来的新闻学必是具有实践性强、理论性不断提高的、具有独特地位的一门传统学科。①

第二节　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学术梳理

一、现代报刊史前期传播思想

1966年，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李瞻教授竭八年之精力，完成百万字的《世界新闻史》，请新闻耆老马星野先生作序，马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 中国提倡新闻教育，已有50余年的历史，而新闻学术仍滞留在启蒙时期，拓荒时期，凡是办新闻教育的人，受新闻教育的人，都

---

① 徐耀魁主编：《西方新闻理论评析》，第53页。

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新闻学术还是一片荒原，新闻学校中虽然有不少进步，但乃是师资缺乏，教材缺乏，设备缺乏，与其他学科比较，如法律，如工程，如教育，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此中原因，当然是新闻学的历史太短，实也由埋头苦干，从事新闻学研究的人太少所致。许多学新闻学的，教新闻学的，都实际从事于新闻事业，生活紧张，工作繁重，没有时间与心力，再来致力于研究工作。①

这段话颇能概括海峡两岸研究新闻学的基本状况。又是30多年过去了，两岸的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情况有了相当的改进，但同其他学科相比，包括同一些历史不长、"资格"不老的新学科相比，中国新闻学的进步，还是步履蹒跚，不尽如人意。同第一节中西方这个论那个论比起来，我们是充满着汗颜的。但拿大陆来说，临近世纪之交最近20年，新闻学研究的步伐，还是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要大得多的。

这是百年来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总的评价。

对于信息、尤其是政治信息的传播来说，中国人有着厚重的文化积累。中国历史号称"上下五千年"，这其中有许多关于传播活动的睿智成果。中国自黄帝立国迄今4600余年，朝代更易，国家分合，但始终维持一个统一的民族群体，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统一的华夏文化将亿万人聚集成一体。这种文化是由天从人欲的民本思想、沟通上下的民意制度和以仁为本的伦理道德三种因素组合而成的，其中民意的畅通，是几千年传播活动生生不息的最根本的制度保证。

大量古籍表明，自三代开始，便有各种途径，使天命与民意相通，使统治者得以博采众议，庶民意图亦能上达。有关史籍记载如：

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②

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唉；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亡者也。桓公问：吾欲效而为之，其名云何。对曰啧室之议。③

---

① 李瞻：《世界新闻史》，马星野序，第3页。

② 《尚书·虞书·舜典》。

③ 《管子·桓公问》。

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①

先秦时代，存有许多上下沟通，令民意畅通的管道。《左传·襄公十四年》中，师旷向晋平公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谏失常也。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②这段论述，说明了通民意之重要，又说明了先秦时代对民意之重视。

台湾王洪钧教授主编的《新闻理论的中国历史观》中有一段论述："民本思想及民意制度诚应视为对我国古代新闻及传播研究之重要课题，也应视为中国传播哲学之基础。但我国古代，尤其是儒家思想中所蕴含的言责观念及言论，弥足珍贵。西方对传播研究，在理念上，在制度上，在方法上极为进步。西方文化，尤其重视言之权利。在商业广告及政治说服之诱因下，传播之效果研究更借行为科学及心理学之理论及实务，卓有成就。但如我国古代传播思想中，如此强调言责之重要，与西方对言权之提倡，则成为强烈对照。因此，古代之言责精神也是作为基于中国文化研究新闻理论之依据。"③

王洪钧教授指出，孔孟思想中确视言论与行仁之关系，一如器与道，合之实属一体。他认为，孔孟思想中对"言"之理念，至少包括三方面，一是"言"对于个人修身，扩至社会人心，乃至国家兴亡皆有重要关系，仅从"言忠信，行笃敬"，以及"一言而丧邦"、"一言而兴邦"，可以知之；二是"言"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有邪说淫辞，也有忠告善道，故主张多闻，择善而从；三是任何人不可"巧言令色"，因其"鲜矣仁"，必须言顾行，言思敬，言而有信。所以不仅要慎言，而且要注意言的时机和言的对象。

中国古时不仅把言责看得比言权更重要，而且非常重视言的真实与明确，所以自古以来，历朝历代都有史官之设。有学人指出，中国文

---

① 曾虚白：《中国新闻史》，（台）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66年版。曾书在"汉唐邸报至清末官报"节释中国古代口述新闻内引称：旌，幡也，尧设之五达之道，令民进善也，如琼曰："欲有进者，立于旌下言之。"而舜则有诽谤之木。参见该书第61页。

② 朱传誉：《中国民意与新闻自由发展史》，正中书局，1974年，第79～80页。

③ 王洪钧主编：《新闻理论的中国历史观》，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3版，第11页。

化在科技方面之最大贡献，雕版及活字印刷术可称其一；在人文科学方面，史官制度则具有独特的意义，更为世界各古老国家所仅见。史官制度乃是世代相传，由专业化的史官对天道神事，降及人事，尤其是天子之事，作及时而真实之记载。这种记事法，在当时固可传之于远近，重要者在为后世留下记录。

长久以来，中国史官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工作方法和记史传统。就工作而言，史官的工作主要有两种，一是逐日记录当时发生的天下之事，以后又延及修史；二是访查考证史料真伪以明今鉴外。史官最可歌颂与发扬之传统，就是不虚善不隐恶之直书精神，"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史官的这种传统，被认为是当代新闻记者不可缺乏的基本素质。因此，在中国新闻学研究刚刚起步的时候，人们就指出新闻记者和史官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的历史记事传统可以滋润中国新闻事业。

古代社会，重视庶人之议，庶人之谤，皆以为民意，而为国君所求，以施政之参考。其中，还特别看重士人之议，因此，中国历来又有"士人清议"的传统。

据新闻学者马骥伸研究，认为"士"是一种"专业的以思考为责任的人士，也即知识分子之先驱"。例如孔子，以教育和讲学，"打破原属贵族阶层的士，泯灭了阶级的畛域，注人新的血液，产生新的生命，使士在中国历史上担任了更重要的角色。"[①]

中国历史上，士之人仕者，称为卿士，可有权奏议、集议、谏诤，甚至专掌议论。[②] 士之不人仕者，不在官僚体系之内，而仍保持士之身份，更具士之清望。他们的议论，不但有深厚的学术素养，更有"道"的导向，"循其理，得其宜"，因他们没有官职之累，所议之理，更超脱，更无私。是故自古以来，士人清议，向为执政者所看重。考察历代士人清议，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士人之议与古代庶人之议之谤不同，议政之士人多属不治而议论类似专业的言者，贤良方正，学有专精，有很高的质量。二是清议的话题，多与当时政治与民生有关，是社会最为关心的问题。三是士人之议论，不但有克己之德，怀民之心，而且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情怀与侠风。

---

① 参见王洪钧主编：《新闻理论的中国历史观》，第40页。

② 如秦置议郎，专掌议论。汉则特征贤良方正任之，秩六百石，晋以后废。

士人清议的这种传统,不仅为清末民初的我国党报兴起时许多知识分子报人所继承,而且不少当时的报人,议事论政也大有古之士人的侠义风范。所以马骥伸教授说,“近百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及舆论界始终以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自期。”[1]对此,王洪钧教授有一段总结性评述,笔者以为说得十分贴切:

> 时代递变,古代之清议,诚不能复现于今日,但今之新闻事业,尤其是报刊,其议论精神,就理论而言,差可为清议之延续。我国现代报业,或以19世纪初叶外人在南洋创办华文报刊为滥觞。至19世纪之70年代,商业报纸陆续出现仍多属外国商人所经营。但国人办报,几亦于同时出现,至1895年中日战争后,国人办报之风渐盛,主要包括革命报纸及士人报纸两大类。其所以然,实因清末世人愤于时政日衰,国亡无日,乃纷纷创办报纸,以言论儆政府,并唤醒民众。革命报纸,甚至揭竿而起,口诛笔伐,作推翻满清之宣传。若干革命报人竟因而身殉,其悲壮固不亚于东汉之清议及相继发生之党狱。可知和国早期报业自其始也,便已充分继承了士之地位,以议论尽书生报国之责任。[2]

上面我们从史官记事制度和士人议政传统十分概括地描述了中国新闻传播及新闻理论研究的文化背景。报人和学者们进人20世纪的新闻理论探讨时,我们的前人在新闻传播理论的许多层面,也已经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成果。作为记载20世纪新闻理论研究轨迹的书,不可能详尽展示颇为丰富的几千年的研究成就,但对其作些简洁的回顾,以为对20世纪研究描述的起点,还是必要的。

对于自先秦至清末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国内外特别是海峡两岸学者中主要成果,笔者认为主要是这样四部巨著:

王洪钧主编:《新闻理论的中国历史观》

曾虚白:《中国新闻史》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

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

本节论述,不少内容借重于上面多位学术先进的成果。作者的工作,仅限于对众多史料与分析,作若干学术的梳理与阐发。

包括新闻传播在内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骄傲。传播

---

①② 参见王洪钧主编:《新闻理论的中国历史观》,第46页。

学大师施拉姆对于中国文化曾有极高的评价。他说：

> 我们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学习科学研究方法与理论的人，看见中国长春的文化，和她悠久的传的艺术传统，总免不了会肃然起敬。我们常想，中国人那种深邃的智慧和洞达，要是有一天能用来帮助西方人多了解自己的工艺知识，增深我们在实验方面的体会，该是多么好的事。许多人已注意到现代中国人在传的学问上认识的深刻与精到，不但反映了悠久的历史传统，且常能推陈出新。[①]

中国关于新闻传播和传播行为的研究，应该早于先秦，但以先秦为较集中较精辟的开始。这是因为，不仅历史至先秦有了较好的经济与政治的发展，而且呈现出百家争鸣的于人文科学进步的重要条件。所以梁启超说，"以思想家的资格创造思想，惟先秦诸哲独善其能。"[②]台湾学者蒋伯潜也指出，"我国学术史上底黄金时代，是在周秦之际，因为东周后半期，春秋末年和战国，诸子百家风起云涌，立说授徒，各成派别。"[③]

先秦思想自古便有"九流十家"之分，其中，儒、道、法、墨、名、纵横、杂家等 7 个学派，对于传播活动皆有所论述。台湾辅仁大学教授关绍箕对于儒家的孔子、曾子、孟子、荀子，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韩非，墨家的墨子，名家的公孙龙，纵横家的鬼谷子，杂家的经典《吕氏春秋》(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所作)中的传播思想及论述，作了较全面的阐析。徐培汀和裘正义两位学者则对这些人的传播思想，进行了综合性的分析。

以徐、裘两位学者的研究，认为先秦诸子的传播思想，表现为三个方面，即：一、对于信息传播一般规律的认识；二、关于劝服思想的认识；三、对于民主思想和言论自由的认识。

(一) 对于信息传播一般规律的认识

1. **传播过程中有效信息的递减与失真。**《荀子·非相》中，指出信息传递中递减规律的存在。荀子指出，"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

---

① 宣伟伯著，余也鲁译述：《传学概论》，(香港)海天书楼 1977 年版，序，第 6 页。

②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台)东大书局 1980 年版，第 14 页。

③ 蒋伯潜：《诸子学纂要》，(台)正中书局，1959 年三版，第 1 页。

2. 重视传播工具。重视传播工具，诸子出于两方面认识，一是为了解决信息因时递减的难题。《墨子·明鬼下》指出，"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知，故琢之磐石，镂之金石以重之。"二是为了扩大传播范围。韩非子认为法令一类信息，只在官员中发布是"非法术之言"，主张：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因此，要寻求更为有效的传媒达到广泛传播之目的。

3. 注重劝服传播的研究。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已有多种传播活动，其中尤其重视劝服的探讨。《荀子·大略》说，"导之以道，而不以强"，就是今日之所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而不以势压人"的意思。

在劝服传播的研究，先秦诸子对技术层面下的功夫更多。孟子说，"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① 意比劝服传播应持续经久。对劝服对象，要"因材施教"，在方法的选择上，应"举一反三"、"叩其两端"、"引而不发"。

诸子们在当时已经发现，由于虚假信息的反复刺激，会使人信以为真。《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中有"三人言而成虎"一说。孔子的学生中又有曾母三闻其子杀人而后信的记载。所以曾参反对道听途说，提出"君子不唱流言"、"流言灭之"。②

4. 传播过程中的失实和审察。《吕氏春秋》有"察传"一章，论述审察传播失察的意义。指出，"传言不可以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吕氏强调，"闻而不审，不若无闻矣！"

之所以出现数传而黑白混淆，诸子分析其原因为：一是词语模糊，词多类非而是，是而非。二是物物相似，数传面不易分。三是传播者出于自身需要，传播上作了增删即"妄言"。

因此，"察传"的作者提出三个"察传"的原则，第一要博学，不因无知而虚言。第二要熟论，会识别真假。第三要验之以理，运用逻辑和常理加以验证。

5. 对传者的道德要求。先秦诸子强调对传者的道德自律。《墨子·明鬼下》指出："天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人耳目之实，察知有与无之议者。诚惑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

---

① 《孟子·尽心下》。

② 高明注译：《大戴礼记今注今译》，（台）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版，第150、145页。

无。"《荀子·儒效》亦指出:"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以为诬,外不自以欺。"墨子强调实践,信"耳目之实"。荀子提倡不诬不欺,都是十分明确的道德规范。

(二)关于劝服传播的思想

前已提及,先秦诸子特别重视劝服传播的研究。在当时,大致形成较为完整的劝服传播思想。这同当时的政治斗争激烈复杂是有关的。诸侯争霸,列国征战,主要是两条战线,武装斗争靠打仗,思想论战靠劝服。孔子周游列国,讲诵弦歌不衰。孟子雄辩无敌,捍先王之道而不疲。墨子遍从人而说之,"裂掌裹足,日夜不休"。荀子年方十五便游说天下,著书告四方。一个一个,全是劝服大师。他们关于劝服传播的主要思想如下:

1. 信——传播的要求。诸子把"信"看成是传播的基本要求,"国之宝也","言之瑞也,善之主也"。《老子·八章》说,"言善信,政善治"。《墨子·尽心下》说,"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商鞅把"信"看作治国的三要素之一,说,"国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①]吕不韦把信看成传播要则和人的道德标准,特作《贵信》篇,指出:"天地之大,四时之化,而犹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②]

如何才能信?诸子也有论说,诸如"扬言者寡信","轻诺必寡信","有诸己之谓信"。大致要求传者要从严要求内容的真实,不夸大其词,同时又要注意传者的形象,不信口开河,随意承诺而失信于人。

2. 实——传播的内容。诸子要求传播真实信息,一是追求信,二是对受者智慧的尊重。《韩非子·忠孝》说,"古者黔首,悗密惷愚,故可以虚名取也。今民儇诇智慧,欲自用,不听上。"

诸子论劝服,强调"名实"关系,即概念与事实的相互关系。春秋战国时变动迅速,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旧名常不能适应新实,所谓"名实不相怨之矣"。因此诸子要求名实相符。《荀子·正名》说,"制名以指实","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墨子·十取》说,"以名举实"。《韩非子·向辨》则要求"形名参验",主张"必采其言而质其实","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

诸子也强调以事实的力量进行劝服。孔子修《春秋》,曾谓:"我欲

---

① 《商君书·修权》。
② 《吕氏春秋·贵信》。

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韩非也提出"举事实,去无用",反对"竞言"、"虚言"、"妄言"和"微妙之言"。

在论述劝服时,诸子们提出身教重于言教。孔子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吕不韦将"身教"列为"不教之教,无言之诏"。

3. 譬——传播的技巧。先秦诸子十分注意劝服艺术即"谈说之术",也就是劝服传播中使用口头或书面语言的技巧。他们把高超的谈说之术概括为"分别以喻之,譬称以明之"。① 譬者,"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知之",②用通俗形象的语言来解释新的事物与深奥的道理。

先秦诸子对于"譬"术,有许多论述,也有很成功的实践。在论说各术,如"辟(譬)、侔、援、推",譬是最常用、最重要的一种技巧。他们认为,譬喻法可以收到很好的劝服传播效果,在于它能在受众自己的经验范围里,既明白所述之理,又听来饶有情趣,因而乐于接受。

(三)先秦诸子的民主思想和言论自由观

中国很早就有民主思想,这与中国民本主义早早确立是有直接关系的。早在《夏书》,《五子之歌》中便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句,有研究者疑为后人伪托,但说明当时已有此类观点,这从《尧典》中也可找到佐证。《尧典》说,"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至周,倡民主的言论已不少。《国语》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不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故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

① 《荀子·非相》。
② 《说苑》。

思想家政治家有这样的言论开放观点，同当时已有“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有关。《皋陶谟》中说，“都，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则圣，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兢兢业业，一日一日万几、天旷儒官，天工，人其代之……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达于上下，敬哉有土。”君王受命于天，而天心是借民心来体现的，所以必须敬天爱民，尊重民意。

诸子的民主思想在此基础上又有进步。孔子在《论语十六·季氏》中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孟子·尽心下》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甚至还提出相当民主的政治主张：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而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①]这种观念，同启蒙时期欧洲思想家的主权在民思想颇为接近了。道家也有较开放的民主思想。《老子·道德经下》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也是尊奉民心民意的表现。

对于民众的言论自由，诸子取支持与维护的立场。子产在郑国行新政时创办乡校，听取人民意见。他对反对设乡校的人说：“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之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犯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②]子产不仅不去干涉民众的批评还以民众意见为药石，修正政策。这种以舆论为师的见解，较之召公的舆论疏导见解，又进了一步。

秦灭六国而统一中国，实行车同轨书同文，推动传播的发展，但同时又“焚书坑儒”，毁灭古籍，令传播事业萧条与停滞。项羽攻入秦都，再次焚烧古籍，令传播事业又一次遭到浩劫。新闻史家认为，秦除为今后的传播活动的广泛开展在文字、驿道等方面创造必要条件，出现了以书面形式传播官方新闻外，没有太多的贡献。

---

① 《孟子·梁惠王下》。

②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汉对传播事业的恢复与发展曾有重大贡献。纸的发明，书籍买卖，邮驿的完备，邸馆的设置，是其中重要几项。

秦汉的传播思想，同先秦相比没有大的发展。除前已提及的吕不韦《吕氏春秋》中的论述外，主要有朝议制度和政治传播中的些许民主色彩，同诸子百家的丰富多彩的传播思想相比，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东西。

隋唐的传播事业有很大发展，一是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并逐渐成为人类传播活动的主要媒介。二是邸报的出现使官方新闻传播系统正式形成。三是科举制度的设立在社会上倡导“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风气，推动了文化的普及与教育的发展。由于此时社会文化事业的整体发展，令这一时期的传播思想也有新的进步。

中国传统的官报编辑思想在此阶段开始出现。在统治阶级领导阶层和士人心目中，官报是具有政治倾向性和相当权威性的宣传工具。人们开始注意到邸报的新闻性，因此这类不完备的报纸（或称雏形状态的报纸），大多以记事为主。

由于这一阶段官方新闻的传播较前代自由与迅速，藩镇之间的信息的横向交流也允许进行（互通牒报以示无外），因而言论自由的思想也有所发展。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德宗时的丞相陆贽。他力主以民为本，以民生为重，力倡通民情，除民扰。他提出，“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为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尽天下之情，以天下之心为心，则我之好恶，乃天下之好恶，安在私托腹心以售其侧媚也；以天下之耳目为耳目，则天下之聪明，皆吾之聪明，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惑者。”①

此时文籍中出现“新闻”一词的使用。唐尉迟枢《南楚新闻》中有新闻；孙处玄文中也有“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句，均是最早使用“新闻”的代表性作品。

文人们对文风也有较多的关注和论述。一是提倡为文宜质朴实在。《隋书·李谔传》提出，“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要求“屏出轻浮遏止华伪”。二是提倡为文力求简要。文人刘知几提出：“叙事之工，以简要为主”，“文约而事主，此述作之尤美者也”。②

① 《陆宣公奏议》。
② 刘知几：《史通·杂说下》。

二是提倡写文应真实。白居易提出，只有“其事核而实”，才能使“采之者传信”。[1]

对于传播科研来说，宋代最重要贡献是发明活字印刷术，由此而推动了刻书业的形成和邸报、小报的繁荣。

宋代邸报在唐邸报基础上有了全面发展，变得成熟而广有影响。从内容看，宋邸报具有中央政府公报的性质，但在传播方式上已向现代报纸变化。而作为民间报纸的小报的出版，表明当时初步出现的专业“编辑记者”，对于新闻传播规律已有肤浅认识，比如报道内容的新闻性、时效性，报业的独立性、营利性等。

宋时中央对新闻传播和出版管理已经有了国家统制和立法调控的体制与作法。限制传报、防止泄密以及禁谒规定已较为完备，并有了新闻检查制度的设立。宋王朝规定，以“定本誊报”制度实行事先检查，以事后审阅制度实行追惩违规之新闻出版活动。宋朝还通过实行申报不得翻刻的办法开始保护作者的版权。这些内容，构成了宋代出版法规的基本内容。

明清两朝代时500余年，西方的现代报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而我国的早期报刊——现代报业的雏形，在封建制度下，仍无大的发展。在南宋，官报与小报有较快进展，至元代却中断了。及至明代，官报得到恢复，且在出版上引入印刷技术，但到清代又倒退到手抄。宋代兴旺的民间小报，到明代受到压抑，至清代才成长起来，但由于清统治者的特殊政策，令小报成了民办的官报。

就传播思想而言，明清两代的新闻统制思想进一步形成。明清时期，官报均被纳入政府机构，成为文官制度下的一个职能部门。统治者对官报采取“笼中养鸟”政策，在官方划定的报道范围内，官报有一定的报道自由权。一旦超出这个范围，便会受到约束。政府还供给民间小报以消息，允许小报利用官方传播网络发行，但又严厉打击民报中的“伪钞”、“伪奏”，使小报纳入自己的宣传思想体系，这种办法，实际上取消了真正源于中国民间的信息传递体系——民间小报。

这一时期报纸的编辑思想有些许进步。作为准官方的邸报等，开始摆脱原先的官报体系，可以有意识地选择一些“不同政见”（自然是很微弱的）以及社会新闻和灾害新闻，在表达方式上也可以生动活泼一

---

① 白居易：《白氏长庆集》。

点。这时的民办报纸都是私人经营的，因此办报人开始形成初步的经营思想，如送报售报时力求迅速方便，在内容选择上多一点内幕消息和最新动态以吸引读者，在采访中也通过贿赂官员衙役以谋取有味材料。各报房之间，也开始有所竞争。这为中国今后过渡到真正的现代报业，准备了若干经验与条件。但总的看来，由于明清王朝严厉的言论控制和愚民政策，广大民众仍无法掌握大量的社会信息，民众对传媒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以往经验的水平上。[①]

二、现代新闻传播思想的传入

如果说，从先秦至明清中国已经发生着一般传播思潮的衍变，使这一漫长的数千年成为中国新闻传播思想的孕育期；那么，从清朝后期至进入20世纪的半个多世纪的时期，则是中国新闻传播思想的萌芽期，国人的新闻传播思想在这几十年中外报刊实践的基础上，已有不少光辉的、富有启迪性的、但又不系统不完整的论述与阐发。

如果说，以往几千年的传播思想的孕育，多数情况下是对一般性的传播实践的诠释与阐发，那么接近世纪之交的许多传播观点，基本上是对以报纸杂志为对象的研究性结论，新闻理论的色彩已相当浓重。

中国新闻传播思想的发生，同中国最早的现代报业的出现——首先是外国传教士的报刊活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外国传教士怀着各种复杂的目的，为中国带来了第一批现代报刊，也传递着西方早期的办报理念。

不少传教士是遵奉"征服中国人的心"的使命到中国办报的。清廷实行严厉的锁国闭关政策。嘉庆皇帝曾说："自此以后，如有洋人秘密印刷书籍，或设立传教机关，希图惑众，为有满汉等受洋人委派而传播其教，或改称名字，扰乱治安者，应严为防范，为首者立斩；如有秘密向少数人宣传洋教而不改称名字（洗礼也）者，斩监候；信从洋教而不愿反教者，充军远方。"[②]在这种条件下，传教士改为在接近中国边境地区办报，力图通过报刊，将基督教思想秘密地渗透到各阶层人士中去。1815年米怜在马六甲出版《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问世的。

米怜后来谈到创办该刊时说，该刊的根本目的是阐扬宗教，其余的

---

① 此节分析，参见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83～84页。

② 参见《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

一切相对而言都是附属的，但也不容忽视，知识和科学始终是宗教的奴婢。[1] 可见宗教宣传在当时之重要。早在1807年马礼逊来华传教时，有位商人问他："中国六亿兆，先生思化之呼？"马回答道："余不能，然上帝能之。"可见最早一批传教士对传教之使命还是十分执著的。

19世纪30年代之后，来华传教的人士日增，并由各自分散走向联合行动。1830年成立"广州基督教联盟"，1934年又成立"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教会势力开始同各国资本势力公开结合。由传教士郭士立于1833年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他谈到该刊宗旨时说，"这份月刊是为保护广州和澳门的全体外人的利益而创办的，其目的在于使中国人了解我们的技艺、科学以及道义，从而打消他们高傲排外的观念。……本刊编者更愿意采用摆事实的方法，使中国人确信他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2]这一宗旨表明了相当多的传教士报刊在华举办的目的与心态。如果说，过去米怜、马礼逊来华办报以传播教义为追求的话，那么从郭士立起，则主要以宣扬西方文明为首位了。1837年起，《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被选为"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机关报，该会宣称自己办会的目的，"在将这个天朝王国带进世界文明民族联盟的一切努力失败之后，看它是否会屈服于智力的大炮，给知识以胜利的棕榈枝。"[3]

"智力的大炮"在华普遍设立，其目的是十分明显的。西谚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反其意而观之，传教士办报刊为了传播"西方文明"，却也为中国带来了国人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的办报理念和见识了西方的新报。最初由传教士们传来的现代报刊的思想大致有：

1. 报刊文章必须通俗易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序中规定，报章文章以简短、通俗、引人阅读为三原则。郭士立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也立志把该刊办成"通俗的吸引的读物"。而中国士大夫直到80多年之后，才提倡白话文和白话报，而完全以白话为文首义，更待百年后的"五四"运动之后。由此可见这些传教士的意见之可取。

2. 推介出版自由观念。马礼逊曾在《广州记录纸》上以《印刷自由

---

① 参见米怜：《基督教在华最初十年之回顾》。

② 参见《中国丛报》(四)。

③ 参见《中国丛报》(三)。

论》为题的文章中，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出版自由观点和天赋人权学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登过一篇《新闻纸略论》的文章，向中国人介绍欧洲报纸产生的历史与现状，并以中文明确提出"新闻自由"概念。

3. 初步阐述报刊的社会功能。早期的传教士报刊指出报章的功能在开启民智、传播文明。但这些报刊有其心，无其力。报刊真正起到开民智启民心的作用，则是鸦片战争以后。而受影响的，首先是知识分子。

进人50年代以后，以《万国公报》为代表（初为《中国教会新报》），刊登了许多推介西方新闻学知识的文章，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产生一定的影响。台湾政治大学教授赖光临认为，"及至《万国公报》创刊，传教士将其所知悉之西方报业思想、知识与报刊体例，透过是报传播于中土，中国报业之现代化，于兹肇始。"①

此时向中土传播的主要新闻观念有：

1. 报刊功能：广见闻、通上下、寓劝惩。《万国公报》15期上《新闻纸论》指出，"新闻纸之文，上自朝廷为官，下及商贾庶民。其讲理，则表扬忠孝节义，有关于世道人心；其言教，则天文地舆以至器物草木昆虫，莫不载理而论，皆有卓识方敢笔之于书，其雅者则学士文人彰其才德，其俗者即街谈巷议莫不搜罗，即今日之时势，今日之是非，无不可畅谈，不必趋势，此皆有益于身心，可与史书并观者也，且闻见岂不日新哉？"

《万国公报》第37期上有文指出，西国之新报由省而府而县，大小官员及乡镇商民，无一不观，凡国家行一事出一令，必登新报，人民一见新报，遵举无违。由此上下通情，内乱不生，外侮不来。

《万国公报》主笔范韦在《万国公报第二百册之祝辞》中指出，"杂志报章者，社会之公共教科书也，杂志报章之记者，社会之公共教员也，无论上流，中流，下流以及种种之社会，其知识之一般，大都取资于杂志报章者居多，新事新理新物之研究之表见之发明，无不先睹见于杂志报章。一纸飞行，万众承认。"故报章拥有劝惩教化之功用。

2. 编辑方针的独立性与一贯性。《万国公报》主编林乐知在《教会报大旨》中提出该报方针为："作者唯实事求是不叩虚无而索有，不向寂寞以求音，事之是录之，事之非去之，以大公无我之心、作大公无我之报，听阅者之去取可也。"此语道出该报所主张的方针，真实，独立，大

① 赖光临：《西方教士输人之报业观念》。

公。这种贯彻始终的方针，于中国报业有相当影响。

3. 舆论与报刊主笔之权威。《万国公报》著文强调报刊"若夫主持舆论，阐发政见，评议时局，常足为一国前途之导向方针也，砥柱也。"①因此，该报强调主笔应有卓越人士担任，他应有良史之才、文字表达之才、切中世务之才。该报还指出，现在报馆之所以不能广设，皆因此种人才之缺乏，所以"故欲出报，必先储才，使深通时务之主笔较多，而后报馆之裨益于民者始大。"②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商业报纸跟随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势力的扩张，很快发展起来，取代教会报刊而居主导地位。这些商业报章，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具有现代报业色彩，远胜于教会报刊。作为当时较有影响的商业报纸之一的《上海新报》在创刊号中指出：

> 大凡商贾贸易，贵乎信息流通。本行（上海英商字林洋行）印此新报，所有一切国政军情，市俗利弊，生意价值，船货往来，无所不载。类如上海地方，五方杂处。为商贾者，或以言语莫辨，或以音信无闻，以致买卖常有阻滞，观此新报，即可知某货定于某日出售，届期亲赴看货面议，可免经手辗转宕延，以免买空盘之误。③

有研究者指出，《上海新报》不仅完全以经贸消息为主要传播内容，而且在中土第一次明确指出作为办报根本目的的"信息流通"这一现代新闻观念。

接着《上海新报》出现的另一份有深远影响的商业报纸是《申报》。这家报纸不仅在新闻业务上展示了西方新闻思想，而且还以一系列新闻学文章，推介西方的新闻学观点。经其阐介的主要新闻观点有：

1. 关于新型报纸的性质。《申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邸报"别于"新报"》的文章提出，"邸报之作成于上，而新报之作成于下"，即新报是在民间传播的报章，其传播对象是普通民众。新报还是营利性质的报业。《申报》作《论本馆作报本意》指出，报纸"其谋疏义以仅谋利者或有之，其谋利而兼仗义者亦有之……虽曰必能媚悦报者，方可多销报纸，亦本报不屑此浅计也。"此文直言《申报》将义利兼顾。

2. 关于新报的社会功能。强调新报可使人们足不出户便可知天

---

① 范韦：《万国公报第二百册之祝辞》。
② 李提摩太：《广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起略》，《万国公报》(三十)第134卷。
③ 参见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120页。

下事。“自新闻纸出，而凡可传之事，无不遍播于天下矣。自新闻纸出，而世之览者，亦皆不出户庭而知天下矣。”而在中国，不少事“惜乎闻于朝而不闻于野，闻于此而不闻于彼，虽有新闻而未能传之天下”，办新报则望向西方学习，广播新闻，以“惠大益于天下”。[1]

3. 关于报纸新闻采写的要求。《申报》创刊时发表《本馆告白》，指出，“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务求其翔实无妄，使观者明白易晓。”这既是新闻价值取向，又是对取材与写作的要求。以后，又发表《采访新闻启》，要求提供十方面新闻。此外，对文稿写作和采写人员的素质也提出明确要求，并以“有闻必录”为原则。有研究者指出，这也许是西方早期“有闻必录”一词的最早引入。

三、国人办报思想的萌生

19世纪30～40年代，国人有先知者，已认识到办报刊之重要。林则徐办《澳门新闻纸》，魏源出版《海国图志》，其目的都是“放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对于现代报刊的巨大意义，尚没有足够的、深刻的认识。

50～60年代有洪仁玕和他的《资政新篇》。洪极力倡办“新闻篇”即报纸，目的在遍上下信息，收民众公意，监督百官忠诚清心。他由于在香港生活6年，因而建言可允民间办报，懂得报业可以营利，还建议要制定一定的法规管理报业。由于他的新闻观念全收于官方文件，对社会并无影响，他本人也没有创办报刊的实践。

60～70年代出现几家国人自办的报刊，办报人也发表若干报业与传播的观点，但既无分量，也无大的影响。真正称得上具有办报思想的第一人是王韬。他论述报纸性质功能的三篇文章《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省会城宜设新报馆》、《论中国自设西方日报之利》，有资格成为最早研究新闻思想的论文。王韬的主要新闻传播观点是：

1. 以明确的政治目标办报。王韬明确声称，他办报之目的，在以“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区区素志，如是而已。”[2]他主张报纸要议论时政，沟通上下，唤起民众，卫国攘夷。

---

① 参见《申报新报缘起》，1872年5月4日《申报》。

② 王韬：《上潘伟如中丞》，《弢园尺牍》，第206页。

2. 倡言报刊言论自由。王韬主张办报必指陈时事,无所忌讳,当局应取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政策。他期盼中国也出现类似英国那样的报刊言论自由:"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言以为准则。"①

3. 系统论述报纸功能。王韬在香港生活工作22年,又是职业报人,对现代报纸的社会功能有全面认识。他指出,第一,报纸可使民隐得以上达,第二可使君惠得以下逮,第三可令内事外达,即使中国事为外人所知。

4. 强调主笔之人一要有才二要有德。王韬对于主笔的人选,提出严格要求,"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其中,德道尤为重要。"主笔之所持论,人心之所趋向也","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②

王韬所办的《循环日报》,以政论见长,他的上述新闻观点,又明显地具有政论报刊思想的特点。因此,人们认为王韬是国人中最早论述政论报刊思想的人。稍后于他的另一位办《盛世危言》的报人郑观应,也持政论报刊思想,其中有的方面,又有所发展。郑观应更加重视现代报纸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的"日报与议院,公议如秉炬"观,把报纸与议会说成是民主社会两大支柱。他还强调国家应有报律,规范主编笔政。因此,在中国新闻传播思想处于萌芽状态的最初阶段,国人中间,他和王韬成为代表性的人物。

维新变法运动极大地推动中国新闻传播思想的发展。其中,以康有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最有影响力,也最具代表性。如果我们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新闻传播思想看成20世纪中国新闻学研究起始时期的成果,那么可以说,康梁的思想则是19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思想的集大成者,是半个世纪国人探索新闻传播规律的最高成就,因其标志着资产阶级报刊思想萌芽期的结束。

康有为明确提出了政党报刊思想。他提出,"思开风声,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合大群非开会不可",而开会当通过开办报纸而"先通其耳目"③。此"合大群"即为结党,办报不仅为结党而先作舆论准备,建

---

① 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

② 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及《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

③ 参见《康有为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

党之后仍要通过报纸作宣传。他在草拟强学会章程时，把"刊布报纸"作为学会任务之一。他要求会员参加党报的工作，"各同志条陈新会章稿，皆发交本党机关报登录。"①

康有为在变法中主张立官报以统一思想，又主张审查各省所办报刊，"择其精善进呈，发备圣览；其有悖谬不实，并令纠禁"。② 为此，他上折请求立法。在《请定中国报律折》中他提出："臣查西国律例中，皆有报律一门，可否由臣将其节译出，凡报单中所载，如何为合例，如何为不合例，酌采外国通行之法，参以中国情形，定为中国报律。"③

在领导维新派报刊的长期实践中，康有为对报纸功能有了较全面认识。他说："报馆之益，盖有四端。首列论说，指陈时事，常足以匡政府所不逮，备朝廷之采，其善一也；胪陈各省利弊，民隐得以上达，其善二也；翻译万国近事，借鉴敌情，此善三也；或每日一出，或间日一出，或旬日一出，所载皆新政之事，其善四也。"④

梁启超的新闻传播思想，在其老师康有为的基础上又有重大发展。由于他不仅从事报刊工作时间长，而且有许多研究报刊规律的专论，是中国世纪之交最重要的新闻理论家。为了叙述的完整性，我们将其在20世纪初发表的著述也在此一并陈述。

梁启超首先提出报刊的耳目喉舌作用。他将报刊喻之为国君和臣民的耳目和喉舌，报刊的作用正是"去塞求通"。他说，"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之内，犹同室化。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作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而"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⑤

梁启超对于报刊的职能的认识，明显地高于前人，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提出报刊有两大天职："一曰，对

---

① 《国民宪政会简要章程》，《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② 康有为：《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③ 参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④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

⑤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

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这一见解，比他过去认为报刊主要为国君"宣德达情"之说，也有完全转变。他说，"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不宁唯是，政府受国民之委托，是国民之雇佣也；而报馆则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也。"报纸对政府不再如臣僕唯唯，而"当如父兄之视子弟，其不解事，则教导之；其有过失，则朴责之"。① 谈到报纸对民众的教育向导作用，梁启超说，"报馆者，作世界之动力，养普通之人物者也。""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者也。"②

梁启超重视舆论的作用。他不仅给舆论下了正确的定义："夫舆论者何？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③还指出造成健全舆论的 5 个要素即"五本"之说，这 5 个要素是常识（持论有据）、真诚（立论为国）、直道（不畏强御）、公心（不挟私心）、节制（不依情行事）。

作为政治宣传家和报刊活动家，梁启超还总结出报刊宣传的 8 项原则。这 8 项原则是：忠告、向导、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画、下逮。他最为强调的，是宣传应用"变骇为习"之原则。对此，他曾有这样的阐释：

> 彼始骇甲也，吾则示之以倍可骇之乙，则能移其骇甲之心以骇乙，而甲反为习焉；及其骇乙也，吾又示之以数倍可骇之丙，则又移其骇乙之心以骇丙，而乙又为习矣。……诸君若欲导民以变法也，则不可不骇之以民权；欲导民之民权也，则不可不骇之以革命，当革命起，则并民权亦暇骇，而变法无论矣。……大抵所骇者过两极，然后所习者乃适得其道。某以为报馆之所以导民者，不可不操此术。④

积累了长期报刊工作和报刊斗争经验，又对传播规律潜心钻研著述，梁对当时中国报刊的性质和办报原则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他这方面的论述，也对后人有所启迪。他指出，"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⑤他举例，如《时务报》、《知新报》者，已是一党之报了。

---

①② 参见《新民丛报》第 17 期，1902 年 10 月 2 日。

③ 参见《国风报叙例》。

④ 参见《新民丛报》第 17 期，1902 年 10 月 2 日。

⑤ 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第 3 册。

梁启超认为，报纸在社会政治中是"第四种族"：报馆"此殆于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①]这些论述，明显地印有西方新闻学的浓重影响，其表述又有中国特色，表现出梁启超的经验与体会。基于对报纸巨大作用的认识，他又提出言论独立的思想，他为"言论独立"的辩护是这样展开的：

> 夫极之所以有益于人国者，谓其持论之能适应乎时势也；谓其能独立而不倚也；谓其独指陈利害，先乎多数人所未及察者而警告之也；谓其能矫正偏颇之俗论而纳诸轨物也；谓其能补多数人常识所未逮，而为之馈贫粮也；谓其能窥社会心理之微，针对发药而使之相悦以解也；谓其对于政治上能为公平透亮之批评，使当局有所严惮也；谓其建一议发一策，能使本国为重于世界，四邻咸知吾国论所在而莫敢余侮也。[②]

梁启超对于办报原则有全面归纳，有研究者指此代表着梁氏办报思想几达巅峰期。梁启超提出考量报刊"良否"有四条标准：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细忖这四条，确有道理。办报有多种声音，"牟利亦宗旨也，媚权贵亦宗旨也，悦市人亦宗旨也。故为报馆者，不可不以热诚慧眼，注定一最高之宗旨而宗之。"梁启超强调，"若为报者能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斯可谓真善良之宗旨焉矣。"[③]余下三条，也都有充实的理由。

此外，梁启超对报章文体及他身体力行之政论文风格，对后世的影响也十分深刻。尽管体例文风也属新闻理论应内含的内容之一，但限于篇幅，只能由新闻业务卷的同事们去完成了。

作为资产阶级新闻思想萌生期的完成者，主要是康有为及梁启超。但严复，谭嗣同，汪康年等同时代的人所言所行，也有自己独特的贡献，在此也简补几笔。

严复认为报纸的功能，"一曰通上下之情，二曰通中外之故"。由于他曾留学西方，对于通中外之故尤为重视。他说，"为各国并立之国，则

①③ 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

② 梁启超：《京报增刊国文祝辞》，《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2册。

尤以通外情为要务；昧无外情，则坐井而以为天小，扪籥而以为日圆。若是者国必危。"[1]对通中外的重视，强于康梁。此外，他在对报纸和杂志的异同，新闻与政论的关系等方面也有自己的看法。

谭嗣同对报纸与历史的论述有独到之处。他说，"报纸，即民史也。彼夫二十四家之撰述，宁不烂焉，极其指归，要不过一姓之谱谍焉耳。于民之生业，靡得而详也；于民之教法，靡得而纪也；于民通商惠工务材训农之章程，靡得而毕录也，而徒专笔削一己之私，滥褒诛于兴亡之后，直笔既压累而无以伸，旧闻遂放失而莫之恤。谥之曰官书，官书良可悼也。不有报纸以彰民史，其将长此汶汶暗以穷天，而终古为暗哑之民乎！"[2]此语道出谭嗣同的卓绝见解，他认为报纸应不同于以往历朝历代的官书，应刊登民生民事，成为"民史"。

谭嗣同最早提出"兴民权"的思想，办报即为民权而争。他说，"盖方今急务在兴民权，欲兴民权在民智。《湘学报》实距声宏，既足以智其民矣，而立论处处注射民权，尤觉难能可贵。"所以他主张办报纸不仅要"开风气，拓见闻"，还要使人民知晓自己的"应尽之权"，致最终"公权于民"。[3] 这无疑已是民主政治的思想了。

汪康年一生以报为业，他的新闻思想也有特色。在报纸功能的认识上，他强调报纸对政府的匡正监督作用。他撰写的《京报发刊献言》中，指出："处今日之时，合同志结团体力纠政府之过失，以弭目前之祸，犹具晚也，遑恤其他？"要"假发言论之权，以尽己之天职"，"遇有应匡救应警告之事，报纸甫经刊登，一时即闻于政府，冀可收从善如流之效。"[4]他办《刍言报》所定宗旨，即是：匡救政府，警觉社会，纠正舆论。

汪康年对于订立报律的重要性和主要内容有所阐述，在当时尚属独到且详尽。他说，"吾国报馆，进无法律之保护，退无社会之后盾，敌之劲而得援，与我之孤而无助，益相去万万。"他的报律内容有四个方面：1. 令准民间开设报馆，非此不能推动报业发展；2. 保护报刊言论"凡设日报者可不必洋牌，而忠于国家之论可益多"；3. 中外报刊一视同仁，中外报刊一律依律办理；4. 协调报馆间的关系。[5]

---

① 严复：《国闻报缘起》(1897.10)。

② 谭嗣同：《湘报后叙》，《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

③ 谭嗣同：《与唐绂丞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

④ 汪康年：《京报发刊献言》，1907年2月15日《京报》。

⑤ 参见：汪康年：《上瞿子玖相国书》，载《年谱》。

至此,我们已将20世纪前中国新闻传播思想的发展作了一个极为简略的回顾和粗疏的梳理。在20世纪开始和发展的新闻学理论研究,是在华夏几千年传播思想的文化厚土中发生的,是从外人在华新闻活动的理论启蒙中开始的,是国人对最初的报刊实践的经验总结中起步的。可以说,中国在20世纪渐次深人的新闻理论研究,是以一定的理论积累为出发点的。

中　　编

第三章

新旧政制交锋中新闻学的进展

第一节　革命党人的新闻学理见解

一、革命报人的代表性观点

不少新闻学研究者认为，维新变法时期和"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两次热潮。在这19世纪末至20世纪最初20年间，由于新旧政治制度的剧烈交锋，推动着新闻学从术入学的进化，人们对新闻术的运作日臻完善，对新闻学理的研究渐入门径。

梁启超作为维新变法中的主将，在报刊理论上有着卓越的贡献。但是，由于历史发展趋势使然，以孙中山为领袖的革命派的新闻传播活动和新闻学观点，终于占了上风，为中国政党报刊思想的完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革命报刊中较早发表报刊思想文章的是年轻报人郑贯公。他对于设立机关报刊的意义有特殊认识，指出："报纸能宣布公理，激励人心，何异政命告示？报纸能声罪致讨，以儆效尤，何异裁判定案？报纸能密查侦察，以显其私，何异侦探暗差？报纸能布其证据，其斥其人，何异警察巡兵？报纸能与人辩证讼冤，何异律师？报纸能笔战舌争，何异军人？"据此，郑贯公极而言之，"不必匕首，不必流血。笔枪可矣，流墨可矣。咄，此何物？咄，此何事？曰：报纸也。"[①]郑贯公又在《开智录缘起》中写道："民贼之辈竟欲以强力压塞民口，败坏国民发言之权而夺其幸福，使自由之窒哑不能高鸣，良堪病叹，仆等久怀慨愤，故于瀛海一隅，合众志士，兴坛倡论，以争自由发言之权及输进新思想，以鼓舞国民

---

① 参见郑贯公：《拒约必须急设机关日报议》。

独立之精神为第一主义。"这种与民争言论自由的革命精神,是同以往维新派人士的言论完全不同的。在《有所谓报》发刊词,他的革命志向则更为鲜明:"报纸以言论塞异族独夫之胆,以批评而褫夺一般民贼之魄,芟政界之荆榛,培异权之萌蘖……察人情之趋向,激社会之热肠……以寓言讽时,讴歌变俗,因势利导,化无用为有用……"①

郑贯公从办政论报纸的立场出发,提出办报刊10个原则,即:

1. 报律不可不先定也;
2. 调查不能不周密也;
3. 翻译不能不多聘也;
4. 讴歌戏本不能不多撰也;
5. 文字不能不浅白也;
6. 门类不能不清楚也;
7. 报费不可不从廉也;
8. 校对不可不小心也;
9. 告白不可不选择也;
10. 图画不可不多刊也。

这十条中,郑贯公从报业方针到采编管理以及法律调控,都有提及,说明革命党人在长期报刊工作中,对于革命报业,已有全面审视。

章太炎是主编革命派机关报《民报》和《大共和日报》的又一干将,他的报刊思想,有许多新的见地。他在主持《苏报》笔政时称,"报作为发表舆论之天职","本报务以单纯之议论,作时局之机关,所有各省及本埠之琐屑新闻,概不合本报之路,严从沙汰,以一旨归。"②

章太炎对舆论的巨大作用十分重视。他曾认为,"尝观清政府之灭亡也,非以兵刃,乃自言论意志亡之"③但他又不似郑贯公那样极而言之,而是主张先以舆论开路,复以革命取之。他说,"公明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④他重视舆论与报纸工作,又不认为舆论与报纸工作万能,"不是平民革命,怎么辟得这些瘴气?"⑤

章太炎对于西方言论出版自由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一方面,他痛

① 参见郑贯公:《惟一趣报者有所谓》,1905年7月18日《有所谓报》。
② 参见1903年6月3日《苏报》。
③ 章太炎:《新纪元报发刊辞》,1912年5月《新纪元报》。
④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⑤ 章太炎:《民报一周年庆祝大会演说》,《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229页。

恨清王朝的言论出版专制，认为西方文明国家的特征之一，即实行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西方并没有真正实行法律所承诺的自由，他对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施行剥夺民主自由的做法，尤感困惑与不平。他说，"始创自由平等己国之人，即实施最不自由平等于他国之人。……今法人之于越南，生则有税，死则有税，乞食有税，清厕有税，毁谤者杀，越境者杀，集会者杀，其酷虐为旷古所未有。……此法兰西非始创自由平等之法兰西耶？"①

章太炎是捍卫言论出版自由的斗士。民国成立之初，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以民国报律尚无颁布之前，先行《暂时报律》。章太炎对此极为不满，撰文逐条驳斥，以为此举是对舆论的钳制。章的观点虽有偏颇之处，他的言行也有部分派别斗争的成分，但面对民国新政，他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维护经革命而得之的言论出版自由，仍令人敬佩。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废止《暂行报律》时说，"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善从恶改，古人以为常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过事摧抑者。该部所颁《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谓满清钳制舆论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②

另一位革命报人于右任的报刊思想，在民国报业和以后的报业实践中也占有重要影响。这位以创办"竖三民"（即先后创立《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的报坛骁将，以隐而不露的方式论述自己的党报主张，以"全民"的旗帜行"党之议论机关"之实，这位报人算是"中华第一人"。《民立报》处处声称自己"更非一二党派之言论机关"，而是"四万万民众共有之语论机关"。实际上，该报的党派色彩是十分鲜明的，它公开为"民党"（即同盟会）"战胜政府"、"改造中国"的目标辩护呐喊，又表示不赞成报纸有"党见"和"成心"，说什么"党见有则人才沦落，故不敢有党见"，"成心生则论据偏陷，故不敢有成心"。③ 有研究者认为，于右任这种"隐而不宣的党报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党报思想虚弱的一面"。④

于右任所拟定的报刊宣传方针，在革命党人当时的报刊活动中具

① 章太炎：《五无论》，1907 年《民报》第 16 号。

② 孙中山：《大总统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文》（1912. 3. 9）。

③ 参见《〈民立报〉之宣言》，1912 年 2 月 23 日《民立报》。

④ 参见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 189 页。

有代表性。《民立报》曾撰文总结自己的宣传策略："英雄处事，目的贵坚，手段灵活，目的贵一，手段贵多，有一百目的，不妨有百手段；又不妨百变其手段"。① 有研究者指出，《民立报》如此说，也如此行。"辛亥革命起义，上海《民立报》日事制造利于革命之电报新闻。"有人回忆说，"撰述诸人，夜间计划鼓吹方式，撰写各处电文，使清疆吏相互猜疑，如先载湖南响应，九江独立，南昌、安庆起义（其实浔、湘尚未独立）"。② 新闻假到可以任意闭门造车，完全不理世上事实，也真正做到了于氏所谓"手段贵活"、"百变其手段"。这种实用主义、急功近利的做法，完全置新闻真实性于不顾，是当时政党报纸的一个通病。

于右任对于报刊言论的独立自主原则有充分的论述。他十分看重言论在政党报纸中的地位，宣称《民立报》"之志愿在造成国民党正当的言论机关"，"以唤起国民责任心为宗主"。③ 他对于报刊言论的基本要求是：一、正当；二、独立。正当者，"不敢以讹言乱国是；不敢以浮言伤国交；不敢以妄言愚弄国民。所自期者，力求为正确之言论机关而已。"他提出要以"志、仁、义、智、勇、公、洁、忠信、讽喻、财力"十要素确保言论的正当。为保言论之独立，于右任提出，要"并修吾先圣先贤、闻人巨子自立之学说，以提倡吾国民自立之精神；搜吾军事实业、辟地殖民、英雄豪杰独立之历史，以培植吾国民独立之思想。重以世界之知识，世界之事业，世界之学理，以辅助吾国民进立于世界之眼光。"④ 值得注意的是，于右任对于言论独立的意义，有超过先人之处。他说，"有独立之民族，始有独立之国家；有独立之国家，始能发生独立之言论。再推而言之，有独立之言论，始产独立之民族，始能卫其独立之国家。言论也、民族也，国家也，相依为命；此伤则彼亏，彼倾则此不能独立者也。"⑤ 这种把报刊言论同国家与民族独立自主联系起来一齐考察的思想，既难能可贵，又深刻不凡，对后人极富启迪。

二、孙中山报刊宣传思想

被报界奉为"中国最伟大之主笔"的孙中山，其报刊宣传思想在中国之地位，自然无庸赘言。

成为革命先驱之后的孙中山，首先把造成"党的喉舌"看作办报的

---

① 参见1912年3月6日《民立报》。

② 参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朱峤三：《辛亥武昌起义前后记》。

③④⑤ 参见于右任：《民立报发刊词》，1910年10月11日《民立报》。

主要目的，这也表现他对党掌握的报刊性质的总的认识。他指出，“政治之发动，足以导其机；学术之进境，足以救其编；风俗之堕败，足以匡其失；即社会之改革。人心之纠正，亦唯记者是赖。”[①]他撰写的《民报》发刊词，对此更有鲜明论说：

> 繄我祖国，以最大之民族，聪明强力，超绝导伦，而沈梦不起，万事堕坏，幸为风潮所激，醒其渴睡，旦夕之间，奋发振强，励精不已，则半事倍功，良非夸嫚。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心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之所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吾于《民报》之出世觇之。

孙中山对于报刊的宣传功能有全面的认识。他是在革命斗争的正反经验的总结中认识这种宣传工作的威力的。后来对此孙中山有深刻的检讨。他说：

> 余于乙未举事广州，不幸而败。后数年，始命陈少白创中国报于香港，以鼓吹革命。庚子以后，革命宣传骤盛，东京则有戢元丞、沈虬斋、张溥泉等发起《民报》。上海则有章太炎、吴稚晖、邹容等借《苏报》以主张革命。邹容之《革命军》、章太炎之《驳康有为书》，尤为一时传诵。同时国内外出版物为革命之鼓吹者，指不胜屈，人心士气，于以丕变。[②]

孙中山认为宣传工作做得深入，能够宣传革命道理，其作用“比用剑还有力”。他在《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中说，武昌起义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由于清兵自动放下武器不作反抗，而“那些清兵有自动力的根本原因，完全是由于我们宣传的效果，他们受了宣传，都赞成我们的主义，所以便不来和我们反抗。”孙中山指出，不仅在战时，就是和平建设时期，宣传工作也是不可缺少的。在《建设杂志发刊词》中，孙中山说，“当革命时代，报界之鼓吹不可少，当建设时代，报界之鼓吹更不可少”。在建设中，报界要“鼓吹建设之思想，阐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功”。孙中山还指出，宣传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在《党员不可存

① 参见伍超：《新闻学大纲》序。
② 孙中山：《中国之革命》，《总理全书》。

心做大官》中，孙中山说，“我们用以往的历史证明”，“世界上的文明进步，多半由于宣传”。因此，“宣传的奋斗，是改变不良的社会，感化人群”。

基于对宣传工作威力的认识，孙中山明确认为，一个政党必须有自己的报刊，而党的报刊作为党的武器和工具，也就能发挥更大作用。他在《言语文字的奋斗》中说，“本党自改组以后，知道要想革命彻底成功，便要注重宣传”。在《中国革命史》中，他又说，“民报成立，一方为同盟会之喉舌，以宣传主义；一方则力辟当时保皇党劝告开明专制要求立宪之谬说，使革命主义，如日中天。”

作为革命家和宣传家，孙中山十分重视宣传艺术和宣传原则，据台湾学者和内地学者研究，孙中山关于宣传工作的基本原则可从四个方面归纳，即至诚、亲近、适合、有恒。孙中山指出，要想做好宣传工作，“须拿‘至诚’做基本，有了‘至诚’做基本，便是有了宣传材料，便是得到奋斗的能力，假若没有‘至诚’，就是有了高深的学问、雄辩的口才，永远还是没有成功的希望。”[①]所以孙中山把‘至诚’看作获取成功宣传的要旨，是基本态度。他还指出，“所用的宣传方法，对人而论，应该是就近及远，先对父母兄弟说明，再对亲戚朋友的一般普通人说明；就措词而论，所说的话，应该亲近有味，要选择人人所知道的材料。”[②]“亲近”，主要指方法。孙中山还指出，宣传务请对方明白，因而“适合”就很重要。比如，“要一般农民都容易觉悟，便先要讲农民本身的利益。讲农民本身的利益，农民才注意。如果开口就是讲国家大事，无知识的农民，怎么能够起觉悟呢？”[③]最后是“有恒”。孙中山指出，“担负宣传的任务，应该有恒心，不可虎头蛇尾，今日热心奋斗，明日便心灰意冷。因为要人心悦诚服，不是一朝一夕、一言一动能够收效果的。必须把我们的主义，潜移默化，深入人心，那才算有效果。”他提出做宣传要有持续不断下功夫的劲头，“如果不能继续做去，便是不明白革命的道理。假若真明白了革命的道理，便有恒心。”[④]

由于重视宣传，自然对舆论也看重。孙中山对于舆论有自己独特

① 孙中山：《言语文字的奋斗》。
② 孙中山：《女子必须明白三民主义》。
③ 孙中山：《耕者有其田》。
④ 孙中山：《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

的看法和政策。孙中山的名言是："舆论是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①这里，他阐明了事实—舆论—报刊三者间的依存性，只是事实与舆论的位置有所不妥，所以在别的场合他多次讲到有了事实才有报纸的记载。关于报纸与舆论，他指出报纸把先知先觉者的"革命之学说""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即造成舆论。正是这种舆论，推动着社会的进步。《民报》对此曾有解说："若夫革命报之言论。其了解不待有专门知识之人。故其始也发表人之意思，而为舆论所趋附，自渐造成舆论，则凡主之人之意，以之为代表，而横靡一世，其效力孰可比耶？"②

出于对舆论功效的重视，孙中山取"舆论归一"的态度和政策。他总结辛亥革命成功的经验，即是全国革命舆论的一致。在《各报言论须求一致》中，孙中山说："此次推倒满清，固赖军人之力。而人心一致，则由于各报馆鼓吹之功。各报之所以能收效果者，由于言论一致。"他指出，"引舆论为一途，亦吾党进行上不能已之事"。③为此他要求报界做到："今日认定宗旨，造成健全一致之言论。"④同时，他还要求限制不正当的舆论，剥夺反动舆论的言论出版自由："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⑤

三、革命报人新闻传播思想之归纳

以孙中山为领袖和代表的革命报人的新闻传播思想，是20世纪开始以来第一个最富学理性和实践性的新闻学理论成果，海峡两岸的研究者对此都有很好的归纳和给予很高评价，这里以方汉奇教授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六章第九节第三目《孙中山和资产阶级革命报人的新闻思想》，和由李瞻教授撰写的《新闻学》第六章第一节及第二节的论述为依据，略作概括的评价。

方教授及他的同事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特别是1903年至1911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报人的新闻思想，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为革命办报，把鼓吹民族民主革命作为报纸的首要任务。

是否主张以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革

---

① 孙中山：《各报言论须求一致》。
② 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三期。
③ 孙中山：《中国同盟会意见书》。
④ 孙中山：《各报言论须求一致》。
⑤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命派与改良派的根本区别，把推翻清政权的专制统治明确规定为革命报刊宣传工作的首要任务，是革命派办报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在此之前，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一些人曾经提出过报纸是国之利器，"有益于国事"，并以"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为其"天职"的观点，但对革命派报人来说，他们办报绝非为了有益于"清国"，而是要推翻这个"政府"。革命党人办报，就是为了唤起国民起来革命。他们办的报纸之一《汉帜》在创刊词公开明确地宣称："推倒专制政体，鼓吹民族主义，大声疾呼，惊醒睡魔。挽狂澜于既倒，扬国旗于将来"。[①] 以此为宗旨者，乃当时革命报刊的主要特色，也是党人报刊思想的重要内容。

第二，强调报刊在政治斗争中的战斗作用。

对于报刊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有明确认识。革命派因为视办报为革命主要手段，对于这种作用自然更为深刻。这一时期，西方报刊学说已初步被介绍到中国，新闻学者对报刊在政治斗争中重要作用的论述，常为革命报人引用。如秋瑾把报纸称为革命队伍中的一个"师团"。郑贯公把报纸比之为"政权"、"法庭"等。如前所述，这位少壮派报人极而言之："不必匕首，不必流血，笔枪可矣，流墨可矣。咄，此何物？咄，此何事？曰报纸也。"

第三，公开申称党报的党派性，主张利用机关报以鼓吹革命。

革命报人不仅承认报纸有党派性，而且公开宣称自己的报纸就是党的机关报，是党报。他们甚至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为榜样，办好自己的报纸。孙中山要求把报刊宣传看成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把创办党的机关报看成关系到革命成败的重要任务，还极力主张通过党报向民众输灌革命思想。

第四，报纸和记者是国民的代表和舆论的代表。

革命报人在承认报纸的工具性、政治性、党派性的同时，还宣扬报纸的国民性，认为自己的报纸反映了人民的意志，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是"社会之公器"和"国民之代表"。[②] 他们给自己的报纸命名为"民报"、"国民"、"民呼"、"民吁"、"民立"、"民声"，同时又赞同西方新闻学中所谓报纸是"第四等级"（又译"第四种族"）的观点。

第五，报纸不仅反映舆论，还可以影响舆论和制造舆论。

---

① 转引于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37 页。
② 《世界公益报：〈告白〉》，转引自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第 636 页。

革命报人高度重视舆论的功能，认为舆论者，一切事业之母也，指出要革命，必先造成革命之舆论。而要制造舆论，则必须依靠报纸，因为报纸具有"左右舆论之势力"，[①]"一纸之出，可以收全国之视听；一议之发，可以挽全国之倾势"。[②]革命报人还指出，报纸制造舆论，主要靠政论，因此他们都努力把报纸办成"正确之言论机关"，并由此更加强调维护言论自由的权利。

李教授对于孙中山等革命报人的"三民主义报业思想"的归纳，是从总结孙中山的报业哲学人手的。他认为孙中山三民主义报业哲学的基本原则有五个：

第一，新闻自由并非人人享有。孙中山认为，社会愈文明进步，则人类"性善"之程度愈高，否则，则反是。现人类虽逐渐进人文明，但为时尚短，故原有之恶性尚未尽除。同时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又有"人同兽争，人同天争，与人与人争"三个阶段，而当前就是人同人争，也就是"善人与恶人争，公理与强权争"的时代，善人主公理，其性善；恶人主强权，其性恶。故人性"有善"、"有恶"，不可一概而论。俟人类进入大同世界，则人性必可逐渐臻于至善之境。但在当前"善人与恶人争"之过程中，新闻自由乃"性善"者享有之权利，"性恶"者不得享有之。孙中山是故主张"革命民权"，而不主张"天赋人权"。[③]

第二，国家在新闻活动中应担任一个积极的角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主张国家有无上权威，也不主张国家（政府）的权力应至最小限度。国家的基本功能，在造福及服务人民，它不论在任何公共事务中，包括新闻事业，都应担任一个积极的角色。

第三，新闻事业应做大众讨论与批评的论坛。孙中山认为，国家的基本功能在造福与服务人民，国家为了给人民创造更多的幸福，还须建立一个"万能政府"。但人民对于国家创造幸福的方法如何？成效如何？以及人民如何管理这个万能政府？这些问题，除了行使四种直接民权外，最重要的就是让人民经常而充分地自由发表意见。所以三民主义的报业制度，就是绝对保证报纸必须作为大众讨论与批评公共事

---

① 秋瑾：《中国女报发刊词》，《秋瑾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页。

② 《国民日报发刊词》，转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47页。

③ 参见孙中山：《周应时著〈战学入门〉序》，崔载阳：《国文哲学研究》，（台）正中书局1960年版，第261页。

务的意见论坛。

第四，新闻事业应是一种教育及公益事业，而不应是一种营利事业。孙中山认为人的天赋有"圣、贤、才、智、平、庸、愚、劣"，或"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与不知不觉"之分，[1]但不主张圣贤才智统治平庸愚劣，也不主张先知先觉压迫不知不觉，而是以"服务"之人生观，弥补天赋之不足。但为了社会繁荣进步，必须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以圣贤才智领导平庸愚劣。这种觉后知、觉后觉，以及圣贤才智领导平庸愚劣的最重要的工具，就是新闻传播事业。所以新闻传播事业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公益事业，而不能是一种商业，因纯生意经，无法达成教育及公益事业的目标。

第五，新闻事业应由智慧最高、道德最好的人士主持，而不应由市侩去掌管。孙中山认为，服务的公益事业是一定要由最富责任心与道德感的人士来负责的，否则便不能达成教育与服务人民的目标。同时三民主义的报业，主要任务在充当大众讨论与批评公共事务的论坛，如果让商人或权势阶级主持新闻事业，便会阻止大众不同意见的表达，而无法达成报业的积极功能。

李瞻教授在归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报业哲学之后指出，国父对于中国报业制度，未有具体之指示，实属遗憾，但他一生服务多份报刊，多次发表对于宣传工作的谈话，以及在许多著作中议及报业工作，由此可看出他对于中国报业的期望。这一评价，可以看作同方汉奇及其同事的评价略有不同。

据李教授研究，被列人孙中山三民主义报业期望的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报刊应充分报道新闻。

孙中山对清政府实行愚民政策，将报纸悬为厉禁，致使人民生活在黑暗之中有深刻揭露。孙中山写道："（清政府）堵塞人民之耳目，锢蔽人民之聪明。尤可骇者，凡政治书多不得浏览，报纸尤悬为厉禁。是除非本国外，世界之大事若何？人民若何？均非所知。国家之法律，非人民所能与闻。……所以中国人民，无一非被困于黑暗之中。"[2]针对这种状况，孙中山始终主张开放报禁，并利用各种传媒向民众广泛报道国

---

① 参见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三讲》，《国父全书》，（台）阳明山国防研究院1963年版，第232～233页。

② 参见傅启学：《国父孙中山先生传》，（台）中央文物供应社1965年版，第11页。

内外大事。他在订立兴中会章程时特别强调开放报馆："本会拟办之事，务须利国裕民者方能行之。如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才，与大利以厚民生，除积弊以培国脉等事，皆当惟力是视，逐渐举行……"①他将办报列于所办四项大事之首，足见对办报馆传新闻之重视。

第二，担负教育责任。

孙中山认为宣传是"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神圣事业，如果宣传的观念是利国裕民，有益社会，那么宣传就是教育。他指出，"宣传的奋斗，是改变不良的社会，感化人群。"②他从孔子周游列国到自己举办《民报》的一系列事实，说明宣传教育的意义。

第三，服务民主政治。

孙中山指出，报业服务民主政治的途径有三：一为让人民讲话，二为领导舆论，三为支持民主政府。孙中山强调指出，"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实相符，必须这个国家真是以民为主，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像这个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③而让人民讲话，一是议会，二是报纸，而人民讲话最重要地方只有报纸。孙中山认为，报界是在野指导社会，十分重要。对于民主政府，孙中山认为报纸应取支持的立场，这是因为，"报纸在专制时代，则利用其攻击，以政府非人民之政府；报纸在共和时代，则不利用攻击，以政府乃人民之政府也。"④

第四，促进国家建设。

孙中山强调报刊负有支持和推进国家建设之神圣使命。他亲撰《建设杂志发刊词》指出，中国的"国际地位，犹未能与列强并驾，而国内则犹是官僚舞弊，武人专横，政客捣乱，人民流离者，何也？以革命破坏之后而不能建设也。所以不能者，以不知其道者，吾党同志有见及此，故发刊建设杂志，以鼓吹建设之思潮，阐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功。由是万众一心以赴之，而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

---

① 孙中山：《香港兴中会宣言》(1895.2.18)，《国父全书》，第352页。

② 孙中山：《党员不可存心做大官》，《国父全书》，第929页。

③ 参见孙中山：《国民会议为解决中国内乱之法》，《国父全书》，第1012页。

④ 孙中山：《各报言论须求一致》，《国父全书》，第488～489页。

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此建设杂志之目的也……"

第五，报业应该公营。

1921年，孙中山完成实业计划一书，全书所订实行民生主义六大计划，包括新闻业在内的"出版工业"为第五项计划。关于出版工业的性质，孙中山是这样说明的："此项工业，为以知识供给人民，是为近世社会之一种需要，人类非此无由进步。一切人类大事，皆以印刷记述之；一切人类知识，皆以印刷蓄积之；故此为文明之一大因子。世界诸民族文明之进步，每以其每年出版物之多少衡量之。……吾所定国际发展计划，亦须兼及出版工业，若中国依予实业计划发展，则四万万人所需出版物必甚多。须于一切大城乡中设立印刷厂，出版一切，自报纸至百科全书。各国所出新书，以中文翻译，廉价出售，以应社会公众之所需要，一切书市，由一公设机关管理，结果乃廉。"①孙中山的主张十分清楚，作为出版工业主体的报业，应属公营，绝非纯营利之工具。

上述孙中山的报业哲学观点和关于新闻传播业的理想，同前述方汉奇教授及其同事所归纳的孙中山为领袖的革命党人报业思想，从不同角度全面地总结了中国进人20世纪最初20年的主流新闻思想，这些思想是中国报人在没有形成独立的新闻学科之前，通过大量的报刊实务工作，体验与概括而成的报业理论，是中国20世纪研究理论新闻学的最初阶段的成果，它集中反映革命党人对新闻学理的见解。这一成果的主要形式是论文，专门性著作除新闻史即报业史外，无一理论著作。

第二节　大众化报业思想的初步认识

一、大众报刊的政治文化功能

中国在世纪之交之际，出现了少量的游戏类报刊和白话文报刊，前者反映着社会对大众化消遣性文化的需要，后者则是通俗化了的新闻政治文化。

游戏报刊"以诙谐之笔，写游戏之文"。②《字林沪报》的附刊《消闲报》发一文《释〈消闲报〉命名之义》说明了这类报刊的宗旨："一篇人目，

① 孙中山：《实业计划第五计划》，《国父全书》，第108页。

② 《论〈游戏报〉之本意》，转引自《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页。

笑口即开，虽非调摄精力之方，要亦为遣闷排愁之助也，此事为当道诸公消闲者也。”

但游戏报刊并非一味玩物丧志、游戏人生。也有的是嬉笑怒骂，作振聩发聋之笔。《论〈游戏文〉之本意》对此见解有详尽的说明。文章指出：“《游戏报》之命名仿自泰西，岂真好为游戏哉？盖有不得已之深意存焉者也。慨夫当今之世，国日贫矣，民日疲矣，士风日下，而商务日亟矣。有心世道者，方且汲汲顾景之不暇，尚何有恒舞酣歌、乐为故事而不自觉呼？然使执途人而告之曰：朝政如是，国事如是，是犹聚瘖聋跛躄之流，强之为经济文章之务，人必笑其迂而讥其背矣。故不得不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亦觉世之一道也。”①

可见，芸芸游戏类小报，因不乏迎合小市民趣味作茶余饭后消闲之用浅供市人欣赏玩味的文艺读者，但也有以游戏三昧玩世而表种种对社会关切之意的报刊。在世态不振的时代，也算是一种宣泄与度世的媒介吧。

白话文报纸则是以通俗文字传播的新闻类或政论类报刊。这类报刊对于维新派人士用以启蒙民智、开启风气有着积极意义，对于把传统的受古文束缚的报刊推向现代化大众报刊也功不可没。1904 年由改良派人士彭翼仲在北京创办的《京话日报》，在当时北京文言文报纸发行未有满千份者的情况下，销量竟达万份，是当时白话文报刊中的成功代表。1909 年该报发表以“瑞卿魏同春”署名的文章，用民间喜闻的唱词形式，讲述现代报纸的好处，全文如下：

论报馆好处

各报馆抡铁笔挣察文明
采新说求实是开化新风
结团体益民智补录要政
兴国势增学问智远无穷

报如同我国民前途大幸
广言路储才子通达下情
登贪官言污吏劝其修政
直言谏非是仇情理不同

① 转引自《中国新闻史文集》，第 33 页。

智理者被人劫须当知重
知过改悔前非是大英雄
贤能者如独见不能迷众
不悖才违公众人皆乐听

古语云良药者有益于病
忠正言逆其耳有益于行
卫报馆如修路前途隆庆
报馆灭如道路高凹不平

先无报谁能知兵工矿政
国家事商民家无处探听
报如日照九洲天地共庆
无报馆居圜圄黑暗无灯①

这篇唱词相当全面地唱出了报纸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所以有研究者指出，这是一篇"新闻学论文"，它指出了报纸"挣赛文明"、"开化新风"、"益民智"、"增学问"等教育功能，"广言路"、"达下情"、"直言谏"、"登贪官言污吏"等舆论功能，"知兵工矿政"、"国家事"的传播功能，是"对改良派报刊思想的一种概括"。②

另一位白话文报纸的报人裘廷梁曾在《时务报》上发表文章阐述办白话文报的主张。他说，"无古今中外，变法必自空谈始，故今日中国将变未变之际，以扩张报务为第一义。欲民智大启，必自广兴学校始，不得已而其次，必自阅读始，报安能人人而阅之，必自白话报始。"何故？他分析说，中国读书人少，不通古今，不知中外，且古文字义和文义太深，故力求浅显，倡白话文报纸。③

裘廷梁创办《无锡白话报》时，自定三项任务，一是演古，即用白话演绎古代典籍中"足以扶翼孔教者，与西事相发明者"；二是演今，发表"中外名人撰述之已译已刻者，泰西小说之有售理者"；三是演报，刊登"中外近事，西政西艺，外人之论说之足以药石我者"。用通俗的白话

① 转引自陈华：《古今新闻逸趣》。
② 参见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227～228页。
③ 参见《时务报》61册。

文，在报纸上发表上述三方面内容，使读者广为闻达。[1]

其实，早在1876年3月30日，在《申报》出版4年后，申报馆就出版自己的附刊《民报》，它是一份供文化水平较低的社会底层人士阅读的通俗小报。上海英文《字林西报》曾发文对其作过这样的评价：

> 我们已经看到申报馆印行的一种新报的创刊号，它名叫《民报》，此报的特点是用通俗文字写的，而力求使读者易于了解其内涵。举例来说，每句之末都空出一格，人名及地名分别用直线和点线标于其旁。只消读过两年书的华人，便能阅读此报，而其定价仅取铜钱五文，当能深入《申报》所不能达到的阶级和店员劳工之类，该报隔日发行一次。[2]

但是《民报》的经营犹如昙花一现。真正有价值和意义的白话报到19世纪末才发展起来。裘廷梁后来改名裘可桴，他的《无锡白话报》也更名为《中国官音白话报》，宣传内容和报道方式大有改观。在该报第19、20期合刊上裘可桴发表题为《论白话为维新之本》的文章，历数文言的弊端，从八个方面阐述白话之益处，这些益处是：省目力、除娇气、免枉读、保圣教、便幼学、练心力、少弃才、便贫民。他由是得出结论："愚天下之具莫文言，智天下之具莫白话"，"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兴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3]

《中国白话报》对这一时期白话报刊、白话运动的推动最力，影响最大，其对新闻传播思想的进步也最有贡献。这份报纸创刊于1903年，终刊于1904年，共出版24期，主编林獬，笔名白话道人。他在《中国白话报发刊词》中对于白话报纸的特点、性质、功能有相当细腻的阐述与说明。他首先十分形象地描述出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局势：

> 天气冷啊！你看西北风呜呜的响，挟着一大片黑云在那天空上飞来飞去，把太阳都遮住了。上了年纪的这时候皮袍子都上身了。躲在家里，把两扇门紧紧关住，喝喝酒，叉叉麻将，吃吃大烟，倒也十分自在。唉！倘使你们列位，都看见这几天的《中外日报》、《新闻报》中间所载的什么"东省警闻"、"俄事要电"，知道奉天已经失守，旅顺口一带兵船几十只往来不断，日本、俄罗斯一旦开了仗，

---

[1] 参见裘廷梁：《无锡白话报序》。

[2] 转引自胡道静：《报坛逸话》，世界书局1946年版，第86页。

[3] 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791页。

> 我们中国这么危险，想到此地，只怕你远年花雕也喝不上口，清一色双台和也忘记碰下来，就是那清陈宿青广州烟也吃得没有味道哩！

这一段文字，把读报人的意境写得多么具体、细致，阅者设自置地，会没有触动吗？白话报的魅力，自然比文言报要动情，不是这样吗？这种行文，真是开了报纸的新天地。

接着白话道人以白话与文言作对比，说明文言报与世隔绝同人民的不合：

> 我们中国人，向来是很有良心、很爱国家的，为什么到了这时候，动也不动，响都不响呢？这个原因，都是为着大家不识字罢了！不识字便不会看报，不会看报便不晓得外头的事情，就是大家都有爱国心，也无从发泄出来了。

作者指出目前中国虽也有几份报纸，但这些报纸全是办给读书人看的，而读书人除了说几句空话，写几篇空文，不能做什么事；做工的、种田的、做买卖的、当兵的又没有本钱读书，见到之乎者也诗云子曰不喜欢，所以这些报纸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处。要把世界大事告诉普罗大众，开个演说厅，请十八省男男女女都来听演说，又可惜话听不懂，演讲人也没有"加响的喉咙"让十八省人都听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为着这事，足足和朋友们商量了十几天，大家都道没有别的法子，只好做白话报罢，内中用那刮刮叫的官话，一句一句说出来，明明白白，要好玩些，又要叫人容易懂些。"作者指出：

> 倘使这报馆一直开下去，不上三年包管各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孩子们、妇女们，个个明白，个个增进学问，增进识见，那中国自强就着实有望了。

白话道人的这席话，非常形象地指出了白话报同文言报的不同，说明了白话报的特点和功能。这篇发刊词，其实也是一篇极好的新闻学的论文。从白话报纸身上，可以看到大众报刊的这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功能。

二、大众化报刊的新型办报方针和新闻理念

20世纪初叶中国出现大众化报刊，除了以其特有的鲜明的通俗性外，还有着不同于过去旧报刊，尤其是文言报刊和政论报刊的新的办报方针与办报理念。

这批新型报刊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英敛之创办的《大公报》、狄楚青的《时报》和史量才接办的《申报》。

梁启超对《大公报》有过这样的评价："天津之大公报，有特色，有新论，实可称日报进步之一级。"[1]英敛之在《大公报》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曾写出题为《说报》的论文，这篇论文反映的新闻观点，颇有新意。在论文中，英敛之首先指出现代报纸有7个特征：

1. 现代报纸不同于"史记百家"。史记百家所载皆前代之遗闻，以往之故事，且篇幅浩繁，文辞高古，非文人学士不能遍观。而"报纸则文酌今古之宜，赏为雅俗所共，浅深各随乎所见，耳目总觉其常新"。[2]

2. 现代报纸不同于"宫门辕门之抄"和"京报官报"。宫门抄之类只行于仕宦，不及于闾中，而"报纸则合朝野而编摩，极体制之美善，上自公卿，下至士庶，皆可不出户而识天下之事。"

3. 现代报纸不同于进谏采风。过去依靠进谏采风沟通上下，联系朝野，而"报纸首列论说，务使博闻，虽公局外之闲谈，要在集思而广益，但使民间疾苦达诸长吏庭除"。

4. 现代报纸不同于一地之记载。一地的记载，地理有限，包涵有度。而"报纸则采录东西洋，甄记及南北极，无远弗届，有闻必传讵忧一物不知"。

5. 现代报纸不同于"志怪之书"和"稗局小说"。志怪之书和稗局小说顾事或荒诞无稽，文或典深难读，而"报纸则明白易晓，真实不浮，事必简而能详，文亦质而不俚。"

6. 现代报纸不同于一般传媒。一般传媒记载受到内容局限，包涵不足。而"报纸则大而国家政令之因革，远而人情风土之异同，中外交涉之要务，商买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惊愕可喜之事，凡是新人听闻者，无不具于尺幅。"

7. 现代报纸不同于传统传媒。传统传媒不作行情，不登广告，而报纸"登载买卖之行情"，"记轮船之进出"，"行号广登告白"，"电传紧要新闻"。

通过英敛之论文的总结，可见我国进入20世纪以后，新闻传媒尤其是现代报纸的社会功能已经十分广泛，人们对之也有相应的认识。

英敛之对于报纸的舆论监督功能也有全面的论述。由于英主张报

---

① 参见《新民丛报》。

② 对英敛之所述各点均参见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英敛之文详见1904年1月6日《大公报》。

纸应有主持公正的理念，所以他在《大公报出版弁言》中声称："本报但循泰西报纸公例，知无不言。以大公之心，发折衷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为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①]寥寥数言，铿锵有力。在另一篇题为《说国家思想》中，他把"国民之向导"、"政府之监督"列为报纸的两大责任。《大公报》除以论说评说国是，还以大量新闻报道批评时政。王芸生、曹谷冰在《英敛之时期的旧大公报》中，称《大公报》"敢言人所不敢言，也登人所不敢登"。《大公报》既以"大公"相标榜，在言论上也就尽量做到独立与公正，既不"如寒蝉之无声，漠视吾国沉沦而不救"，也不"胶执己见，党同伐异"，更不"意存趋避，拗曲作直，指鹿为马，信口雌黄，求悦当今一二人之耳目，不顾天下后世之唾骂"。[②]此为后《大公报》提出"四不"方针的立足基础，"四不"即"新记大公报"时期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方针，此方针曾对中国民间报纸产生深刻影响。

英敛之既重视报纸巨大的社会作用，重视发挥报纸对社会尤其是对政府的监督功能，又非常强调报纸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他拟定的《大公报序》上宣称，"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他在同时期写的另一篇文章《原报》中也指出，"泰西人视报纸为人生要务，民智之开，报纸之多，国之所以强也"。有如此大之作用，报纸也就"该负起应有之责任"。前已提及，他在《说国家思想》中已明确强调，报纸的责任在"国民之向导"、"政府之监督"。根据这样的信念，他对当时一些报纸不负起该负之责任十分不满。这些不负责任的现象主要有：对愚民迷信的邪说津津乐道推波助澜；不仅不监督政府反以为"终南之捷径"、"发家之诗书"；恩怨偏私，糊涂满纸，恫吓敲诈，拉杂成篇；宗旨曰"兴利除弊，实质诲嫖诲淫"。英敛之对这种种有负社会责任的弊端进行了尖锐批评。

英敛之强调要从办报人做起，克服弊端，承担社会责任。他说，"尤有要者，必须有诸己，而后有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世未有以其昏昏能使人昭昭者也"。[③]他在天津报界俱乐部的一次会议上发

---

① 1902年6月18日《大公报》。

② 1904年9月10日《大公报》。

③ 英敛之：《某报发刊祝辞》，参见《安蹇斋丛残稿》，转引自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232页。

表演讲指出,"国家之大患,莫患于不通,而所以通之者,端在报。但社会积弊,则讳莫如深,惟愿报纸歌功颂德,深恶报纸指摘弊病。吾辈为在大处着眼,不能畏忌权势,不能瞻徇私情,更不可逞其私愤,应如何力持公理,为国家谋治安,为人民谋幸福。应如何结一团体,扶正抑邪,兴利除弊。使社会稳受其益,此吾辈开宗明义第一章,所当筹计谋求者也。"①应该指出,英敛之的这些论述,不仅正确全面,批评尖锐深刻,在我国对于新闻传播学理的阐述方面,他也是少有的代表人物之一。这说明我国大众化报业产生之初,报人们便注意到了报刊的社会责任问题。

狄楚青办《时报》,得到梁启超的全力帮助。梁由于在日本了解了大众化报业,因而在原先的政论报刊思想上有所突破。《时报》是狄受康有为之命在上海创办的,所以《时报》上发表的新闻传播思想,大致反映了狄、梁两个人的新闻理念。

《时报》的发刊词和发刊体例由梁启超撰写,体例主要是对新闻业务的一些规范,但也涉及新闻价值、新闻选择等不少同理论新闻学相关的主题。对于论说的规范与要求,《发刊例》提出4个方面规定:

> 第一,本报论说,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非好为模棱,实鉴乎挟党见以论国事,必将有辟于亲好辟于所贱恶,非惟自蔽,抑其言亦不足取重于社会也,故勉避之。
>
> 第二,本报论说,以要为主。凡所讨论,必一国一群之大问题。若辽豕白头之理想,邻猫产子之事实,概不置论,以严别裁。
>
> 第三,本报论说,以周为主。凡每日所出事实,其关于一国一群之大问题,为国民所当厝意者,必次论之。或著之论说,或缀以批评,务献蒭荛,以助达识。
>
> 第四,本报论说,以适为主。虽有高尚之学说,恢奇之言论,苟其不适于中国今日社会之程度,则其言必无力而反以滋病,故同人相勖,必度可行者乃言之。

"公"、"要"、"周"、"适"四字,作为对论说选题与阐释的要求,反映了当时梁氏对报章言论的要求,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时人对新闻评论的价值指向的认识。对于新闻报道,梁氏则又提出"博"、"速"、"确"、"直"、"正"五个要求:

① 参见马光仁:《我国早期的新闻界团体》,《新闻研究资料》第11辑。

第五，本报纪事，以博为主。故于北京天津金陵，均置特别访事；其余各省皆有坐访。又日本东京置特别访事二员，伦敦、纽约、旧金山、芝加哥、圣路易各一员，其余美洲澳洲各埠皆托人代理。又现当日俄战事之际，本馆特派一观战访事员随时通信。又上海各西报、日本东京各日报及杂志，皆购备全份，精择翻译。欧美各大日报，亦定购十余家备译。务期材料丰富，使读者不出户而知天下。

第六，本报纪事，以速为主。各处访事员，凡遇要事，必以电达，务供阅者先睹为快。

第七，本报纪事，以确为主。凡风闻影响之事，概不登录。若有访函一时失实者，必更正之。

第八，本报纪事，以直为主。凡事关大局者，必忠实报闻，无所隐讳。

第九，本报纪事，以正为主。凡攻讦他人阴私，或轻薄排挤，借端报复之言，概严屏绝，以全报馆之德义。①

上引关于纪事（新闻报道）所要求的五点，涉及新闻的真实性、准确性、广泛性以及报道人的公正性、正直性等问题。这些基本要求，既是对前几十年中国报业的经验总结，又体现新闻学者对新闻传播基本规律的初浅认识。有如此详尽的理论概括，实在难能可贵。

狄楚青初同维新派康梁有紧密联系，办时报初期多方得到梁氏协助，但他后来对康梁的政治主张不以为是，联络日少，而在办报方针上，他在梁氏提出的上述关于论说纪事方针上持之以恒地贯彻始终并不断有所创新，还进行了一系列在中国报业史上有影响的改革，如短评的设置，印刷的创新（首次倡用两面印）等。《时报》时期的报业思想表明，中国的新闻传播思想研究，在经验层面上已走向成熟，而理论层面的深入，还有待开拓。

初为《时报》主笔，后接办《申报》的另一位中国报人史量才，则以"史家办报"，在新闻传播思想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

章太炎称史氏为"史家办报"②，渊于史量才多次讲过这样的观点：

---

① 所引论说及纪事各条，均转引自《中国新闻史文集》第66～67页。

② 章太炎：《史量才墓志铭》，参见《章太炎全集》。

"日报负直系通史之任务"，"同人则以史自役"。[①]

有学者指出，史氏的"史家办报"思想有三层含义：第一，认为报纸同历史记录一样，是将历史事件如实地记录下来，传诸后人，他把报纸称为"史家之别裁，编年之一体"[②]、"此戋戋报纸，或将为修史者所取材乎？"[③]

第二，报纸评论和剖析历史，又高于历史记录。史量才说，"日报者，属于史部，而更为超于史部之刊物也。历史记载往事，日报则与时推迁，非徒事记载而已也，又必评论之，剖析之，俾读者惩前以毖后，择益而相从。"[④]

第三，报纸主要是文化传统的载体。史氏认为，民族生命系于文化，而文化之传后无穷者为历史，报纸则"息息负历史文化之重责，又同时力趋于时代之前，应环境之演化，开风气于方新，所求不负其使命者"。[⑤]史量才还认为，文化传统有经纬（纵横）两个方面，"其自邃古，至于并世风气升降，国祚隆替，载在史乘，一以贯之者，谓之经。其表被瀛海，草偃宇域，俾并世得荷教化之流泽者，谓之纬。"报纸"能同其经不能穷其纬"[⑥]，主要功能在纵向传播。[⑦]

作为非政党报纸的商业报纸经营者史量才，对于独立自主的办报方针有较多的论述。这一方针，在史量才看来，首先是报业在经济上要独立。他说，申报"现在营业收入可以供用，故可自信不受任何方面津贴，虽十年来的政潮澎湃，敝馆宗旨，迄未偶迁"[⑧]。其次是报纸持论公正，言论独立。史氏办报，主张"不偏不倚"，他说，自己办报，"非为私，而为社会国家树一较有历史之言论机关"，[⑨]他把"持论主张公正，新闻主张翔实"作为申报的口号。[⑩]史量才的这种"史家办报"思想和"独立办报"方针，大致反映出中国传统士人学者风范，也折射出西方早期商业报业思想对中国20世纪报人的影响。据记载，1921年美国新闻学者格拉士访问中国，史量才在欢迎会上致词说，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

---

① 史量才：《申报六十周年鉴之旨趣》。
② 黄炎培：《史量才先生生平》。
③⑥ 史量才：《申报发行二万号纪念》。
④⑤ 史量才：《申报六十周年鉴之旨趣》。
⑦ 此处史家办报分析，援引自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237～238页。
⑧ 张蕴和：《办报梁罪争耶》，《申报月刊》3卷12期。
⑨⑩ 瞿绍伊：《史先生办报之志》，《申报月刊》3卷12期。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与顷者格拉士君所谓"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一语，敝馆宗旨似亦隐相符合，"且鄙人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①

在报纸的社会功能方面，史量才提出劝导舆论、服务社会的思想。在中国新闻传播思想初步奠定的时期，史氏的这一思想也是有意义的。他指出，"国家赖舆论以匡救，社会赖舆论以改进"。他认为，读者不能唯报纸所记载者是从，但报纸可以对社会舆论进行劝导。他把"对政府尽舆论之刍荛，对国民尽贡献之责任"作为办好申报的方针。② 他向以"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为口号，人称："平日先生之于报纸，持论主张公正，新闻主张翔实，孳孳为社会谋利，尽国民天职"。③ 史量才的办报实践表明，他的"服务社会"，主要是通过举办常识增刊、普及文化教育等"策进文化"的举措实施的。

作为民初"报界奇才"的名记者黄远生，他的关于报纸的舆论监督功能与新闻记者的基本修养的论述，是这一时期不可忽视的重要思想。

黄远生指出，"经验证明，凡是反映人们社会生活、体现人们精神力量的文字，发表和传播开来，就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反响和感应。无论这个感应是肯定还是否定，赞同还是反对，都不能不是这些精神产品所传播激发而产生的效果。因此，这些精神力量的传播越是奋发有力，而它的效果就越是迅速、深刻和广泛。"④对此，作为平民政治的提倡者，他主张报纸要"为民主社会请命"，"专向有权责之人督责"⑤。对于当时的专制统治和对社会舆论的压制，黄远生主张实行有法律保障的"言论独立"，在"人人须服从相当之法律"的情况下，报纸便可以成为国民意愿的代表。

即便有了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也不能令人人承担新闻记者的责任。因为当记者须凭资格。黄远生指出："新闻记者须有四能：(一)脑筋能想；(二)腿脚能奔走；(三)耳能听；(四)手能写。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所存，以时访接，是谓

---

① 史量才1921年12月23日在申报欢迎格拉士莅馆时的致词。
② 参见史量才：《自序》、《最近之五十年》。
③ 瞿绍伊：《史先生办报之志》，《申报月刊》3卷12期。
④⑤ 黄远生：《平民之贵族 奴隶之平民》，《少年中国》周刊1912年11月20日。

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余无一于此,何能为新闻记者!"[①]

第三节 中国新闻法制思想的萌生

一、清末报律四则

中国古代已有管治新闻传播出版物及新闻传播行为的法律及制度。宋代,因朝报、小报每易引起政治上的浮言胥动,朝廷屡次下令禁止。淳熙十六年(1189),闰五月二十日下诏:今后有私撰小报,唱说事端,许人首告,赏钱三百贯文,犯人编管五百里,即为一例。自宋以后的种种规定,均非系统的专门的新闻法规,我们可以说中国自宋已有法制思想的点滴资料,但尚无完备的系统的法制思想。

至19世纪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洪仁玕提出过现代新闻法制思想的若干火花。他在《资政新篇》中提出,"准富民纳饷,禀明而设"报馆,其中已含有注册登记办报的思想。在注册时,规定要注明出版地址、出版人、出版时间和售价。他还规定政府应对报道的真实性作严格要求,"只须实写,勿着一字浮文","伪造新闻者,轻则罚,重则罪",但对"朝廷考察若探未实者",凡注明"有某人来说,未知是否,俟后报明"者,"则不得责之也"。这些观点零零星星,事后由于未能付诸实践,所以也未能成为未来的新闻法制思想之渊源。

以前我们阐介过的一些报人、学人也有宝贵的新闻法制思想的若干论述,但都未成气候,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也都无法成为立法内容。直至清末,新闻传播法规的订立,才提上议事日程。光绪二十四年(1898)夏,醉心维新的德宗,从御史宋伯鲁奏请,收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为官报,并于6月29日下谕:"泰西律例,专有报律一门,应由康有为详细译出,参以中国情形,定为报律,送交孙家鼐览。"此旨可视为推动中国研拟近代新闻传播法规之始。[②] 由于维新失败,计划无法实施,但此时报刊风行已无法阻挡,清廷只能转而取钳制政策。这样,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至宣统三年(1911),13年中,清廷前后颁布大

---

① 黄远生:《忏悔录》,《东方杂志》1915年11月10日。

② 参见张宗栋:《新闻传播法规》,(台)三民书局1983年9月再版,第13页。

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报馆暂订条规、大清报律四项有关新闻出版事业的专门法，实施注册登记、保证金和事前检查等法律制度，使民众逐步丧失创办报纸的自由，言论自由也受到极大限制。

大清印刷物专律由当时商部、巡警部、学部会同拟订，于1906年颁布，分为大纲、印刷人等、记载物件等、毁谤、教唆、时限六章，共42条。专律大纲第一条规定，"京师特设一印刷注册总局，隶商部、巡警部、学部，所有关涉一切印刷及新闻记载，均须在本局注册"。明确指出，中国实行注册登记制。第二章第一条规定，"凡未经注册之印刷人，不论承印何种文书、图画，均以犯法论。凡违犯本条者，所科罚锾，不得过银一百五十元，监禁期不得过五个月，或罚锾监禁两科之。"这一章第九条规定，"凡印刷人印刷各种印刷物件，即按件备两份呈送印刷所在巡警衙门，该巡警衙门即以一份存巡警衙门，一份申送京师印刷注册总局。凡违犯本条者，所科罚锾不得过银五十元，监禁期不得过一个月，或罚锾监禁两科之。"这条规定中国实行追惩制，惩处也不过严。

专律的重点在防范和打击革命出版活动尤其是革命报刊的传播。第四章毁谤含19条，差不多占全专律一半，这一章的限制也相当严厉。第二条规定，"所谓毁谤者有三：（甲）普通毁谤，（乙）讪谤，（丙）诬诈。"第四条规定，"讪谤者，是一种惑世诬民的表揭，令人阅之有怨恨或侮谩，或加暴行于皇帝、皇族或政府，或煽动愚民违背典章国制，甚或以非法强词，又或使人人有自危自乱之心，甚或使人彼此相仇，不安生业。"第六条规定涉罪之人，"左开诸人等，均与毁谤法案有关者：（甲）作毁谤之人，（乙）印刷毁谤之人，（丙）谤件出版所之主人，（丁）谤件出版所之经理人，（戊）谤件之发卖人、贩卖人或分送人，但本条所列之五种人均须知情者。"其余各条，规定对于普通谤者，可以民法、刑法处分之，而对讪谤案，则可监禁10年，罚锾5千元，或并罚银与监禁。这种立法的指向，是十分清楚的。

为进一步扼杀革命报刊，清巡警部于同年又拟订报章应守规则，共九条，前七条均为禁载规定，内容包括：

不得诋毁宫廷；

不得妄议朝政；

不得妨害治安；

不得败坏风俗；

凡关外交内政文件，如经该管衙门传谕报馆秘密者，该报馆不得

揭载。

凡关涉诉讼之案，于未定案以前，该报馆不得妄下断语，并不得作庇护犯人之语。

不得摘发他人之阴私，诽谤人之名誉。

后两条一条系更正规定，“记载有错误失实经本人或有关系人申请更正者，即须速为更正。”另一条规定：“除已开报馆外，凡欲开设者，即须来所呈报批准后，再行开设。”这条规定，把前面专律规定的注册登记制度改为了批准制，开办报馆已不再如过去那样自由，唯开办条件，这个法规没有详尽指明。

1907 年颁布的、由民政部拟订的报馆暂订条规，同上述报章应守规则内容差不多，其中强调指出，“凡开设报馆者，均应向该管巡警官署呈报，俟批准后方准发行。”明确规定，由批准制取代过去（仅仅一年前）的注册登记制。

1908 年，由清政府商部参照日本新闻纸条例，拟具大清报律，经巡警部修改，民政部及法部会奏，交宪政编查馆复议后颁布，并于宣统二年（1910）由民政部再加修正重行颁布。这个经由较完整的立法程序过程的新闻传播立法，参照西方法律制度，是清朝新闻立法的最后一个成果。这个法律也把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尽行剥夺，是清政府垮台前最反动的一个法律。

大清报律共 45 条，重点是规定保证金制、事前检查制和严厉的禁载限制。

报律第四条规定，“发行人应于呈报时，分别附交保押费如下：

每月发行四回以上者，银五百元。

每月发行三回以下者，银二百五十元。

其专载学术、艺事、章程、图表，及物价报告等报，得免交保押费；确系开通民智，由官鉴定，认为无庸预交者，亦同。”

报律第七条规定，“每日发行之报纸，应于前一日晚十二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星期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一日午十二点钟以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随时查核，按律办理。”

明定禁载限制体现于第十条至第十四条。第十条：“诉讼事件，经审判衙门禁止旁听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一条：“预审事件，于未经公判以前，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二条：“外交、海陆军事件，凡经该管衙门传谕禁止登载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三条：“凡谕旨章奏，未经阁钞、

官报、公报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四条规定同前报章应守规则所定差不多，为：“左列各款，报纸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害之语；败坏风俗之语。”这条规定较前更为严厉。前指诋毁宫廷等报道这里指“语”，即话都不准“揭载”。

但大清报律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了版权保护的观念和法规，报律第三十九条规定：“凡报中附刊之作，他日足以成书者，得享有版权之保护。”第三十八条规定，“凡论说、记事，确系该纸创有者，得注明不许转登字样，他报即不得互相抄袭。”这些规定，开中国版权之先河，在大清这个禁锢言论出版自由的法律中，是少有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法律规定。

清朝末年制订的关于新闻传播的四个法规，不仅以限制与钳制言论出版自由为目的，一个比一个强化政府对新闻传播业的控制，而且连这样的法也并不执行，仍然处于以权代法的状态。有报纸揭露和批评说，“官吏对于报纸，不经过法律之裁判，而遽从而封禁之者，其野蛮实与格杀勿论同科”。[①]

二、民初新闻传播法制

鉴于清廷对言论出版自由的压迫和对民主政治的向往，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于 1912 年 3 月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第六条第四款，明定人民享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虽然清廷在 1908 年 9 月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中也有“臣民于法律范围之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但只是一个宪法大纲，而且也不是民主政治制度下的真正自由。是故可以说，具有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上的上述规定，是中国宪法关于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首次规定，有着时代的意义。孙中山不仅这样制订法律，还带头履行法律。罢却内务部暂行报律，即为其中一例。

1912 年 3 月 4 日，南京政府内务部以大清报律未经民国政府声明继续有效，例应废止，但因帝制方灭，百事待举，不克在短时期内制订出报法，乃拟订临时报律，通令全国遵照。该报律共三条，为：

（一）新闻杂志已出版及今后出版者，其发行人及编辑人姓名，须向本部呈明注册，或向就近地方高级官厅呈明，咨部注册。兹定自令到之日起，截止阳历四月初一日止，在此限期内，其已出版之新闻杂志各社，须将本社发行人及编辑员姓名呈明注册，其以后出版者，须于发行

---

① 参见 1911 年 8 月 5 日《神州日报》。

前呈明注册，否则不准其发行。

（二）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除停止其出版外，其发行人及编辑人并坐以应得之罪。

（三）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被污毁人得要求其更正。要求更正而不履行时，经被污毁人提起诉讼时，得酌量科罚。

从法理考察，上述三条规定，在一个法治国家和立志以法治国的国家里，都是合理与必要的。但它们却遭到当时的报业团体"全国报界俱进会"的反对。该团体致电孙中山，表示强烈不满，其理由是：1. 该暂行报律之宣布，未经合法程序；2. 议会将制订出版法，故不宜先有报律。章太炎在题为《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的指责中说："亡清诸吏，自知批政宏多，遭人指摘，汲汲施行报律，以为壅遏舆论之阶。今民国政府初成，杀人行窃诸事，皆未继续前清法令，声明有效；而独皇皇指定律，岂欲蹈恶政府之覆辙乎？"[1]孙中山对于报界的批评，完全接受，下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他指出，"案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善从恶改，古人为常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过事摧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2]民初的这一报律争议和孙中山的果断决定，表明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新闻法制思想中，是将保护公民的新闻出版自由放在第一位的，同时又坚持即便是必要的立法，也要遵循法定的立法程序，而不应由任何政府部门擅自拟订，立法的合法性和对法律解释的准确性，须经过立法机关方能得到保障。这一新闻法制思想，对今后的中国立法是有启发的。

三、袁世凯时期新闻立法的倒退

抱有君临中华野心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从 1912 年至 1914 年先后颁发戒严法、治安警察法、报纸条例和出版法，通过这些治安法规和新闻传播管制法规，实施新闻统制，扼杀公民在民国建立后获得的言论出版权利。报纸条例和出版法是管治新闻传播业的专门法，这里略作分析。

报纸条例于 1914 年 4 月 2 日经袁世凯制订，由国务总理孙宝琦、内务总长朱启钤副署公布，次年又作修改，由国务卿徐世昌副署公布，

---

① 参见 1912 年 3 月 7 日《大共和国报》社论。

② 参见 1912 年 3 月 9 日《大总统法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文》。

至1916年黎元洪任大总统后明令废止。该条例共35条,兼采特许制和保证金制,只是删除了大清报律中的事前检查规定。条例的第二条规定发行报纸得由警察官署认可。第四条规定充任报纸发行人、编辑人、印刷人的资格条件。第六条规定交纳保押费的金额,特别规定若在京师及其他都会商埠发行报纸得加倍交纳保押费。第十条规定禁载限制,计有:淆乱政体者、妨害治安者、败坏风俗者、外交军事之机密及其他政务经该管官署禁止登载者、预审未经公判之案件及诉讼之禁止旁听者、国会及其他官署会议按照法令禁止旁听者、煽动曲庇赞赏救护犯罪人刑事被告人或陷害刑事被告人者、攻讦私人阴私损害其名誉者。这许多规定,完全是大清报律之翻版。比之大清报律好一些的,是第九条规定:"每号报纸应于发行日递送该管警察官署存查。"废止了原来的事先检查而改为追惩制。

但是这一点点开放也很快改变。1914年12月5日颁订的出版法第四条规定,"出版之文书图画,应于发行或散发前,禀报该管警察官署,并将出版物以一份送给官署,以一份经由该署送内务部备案。"第八条规定,"编号逐次发行,或分数次发行之出版物,应于每次发行时禀报。"而在此前已颁布的戒严法规定,"戒严地域内,司令官有执行左列各款事件之权……停止集会结社,或新闻杂志图画告白等之认为与时机有妨害者"。这样,巧妙地恢复了事先检查制,执政者认为不合时宜者,可行扼杀之权。出版法还禁止从国外引入有妨其统治的出版物,对租界内的违禁报刊,也以立法手段加以阻碍。第十二条规定,"在外国发行之文书图画,违犯前条各款(即禁载限制——引者注),不得在国内出售或散布。"第十三条规定,赋予警察官署对于违犯禁载规定的出版物"没收其印本及印版"的权力,将压迫出版物之手,伸进了租界,租界出版物一进入警察官署的地域便可没收。这样,孙中山建立民国并在反对暂行报律中所维护的言论出版自由,便荡然无存了。

至此,我们可以对中国进入20世纪最初20年新闻法制思想的萌生阶段,作一个简单的小结。首先,通过立法管治新闻传播的观念已经确立。无论是晚清的统治者、袁世凯等军阀政客,还是孙中山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都已认识到,进入20世纪之后,政府要管治新闻传播业,必须通过专门的新闻立法这个惟一的管道。所以,灭亡前的清廷居然还会推出四个新闻出版法规,连日夜梦想君临华夏的独夫民贼也不忘拼凑出版法。新闻必须实行法治的观念,已日益深入人心。

第二，新闻立法，应该根据民意，经由立法机构，通过合法的程序来拟订。这一思想，在民国的建设者的头脑里是十分明确的。章太炎攻击暂行报律，不能说完全出自公心，报律三条，在当时也实为必要，但孙中山仍以恢宏襟怀废止他的政府所拟订的报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三，对于新闻传播法规的架构，既有保障言论出版自由的条文，又有防范滥用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这种认识，也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大清报律，骨子里是为防止革命报刊的传播，但还是并具了一般公民开办报馆的法律保证。袁世凯的出版法和报纸条例也是这样。这表明西方新闻传播法规，已广为一般统治阶级层所了解。

第四，统治阶级对于言论出版自由的防范压制，主要通过出版批准（或特许）制、保证金制和新闻检查（尤其是事前检查）制等法规实现的。人们考量一个历史时期内言论出版自由得到保护还是受到压抑，主要看法规中有无这些规定。废除这些规定，成为今后人们确立和争取广泛的言论出版自由的目标。这一观念的建立，为今后的民主革命指明了方向，也为新闻法制建设确立了努力的目标。

上述四个方面，是中国新闻法制思想萌生的标志，也是中国新闻法制思想研究的初步成果。

第四章

由术入学:第一批新闻学著作问世

第一节　从报业到报论:第一个20年的总结

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从19世纪末期到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的一段时间,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萌芽期,历经了从报业活动到报业理论的学术开拓和学术初立的衍变。这一时期,虽还不可能有成部的新闻学专著出现,但关于报业基本运作规律及其作用机制已有十分深入的论述。20世纪20年代之后中国有徐宝璜《新闻学》等奠基之作问世,同这一时期报论之完备是分不开的。我们在第三章中,曾对从梁启超到孙中山等人的报业思想作过较为详尽的分析,而在本章评介第一批新闻学著作之前,有必要对这些报业思想作一定的概括与小结。

笔者以为,由徐培汀教授和裘正义副教授执笔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七章,对处于萌芽期的报业理论已经进行了较为全面和中肯的梳理与分析。这一节,笔者将主要引述他们的研究成果。①

徐、裘两位认为,这一时期报业理论,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政党报刊思想,报刊宣传思想,报刊舆论观,言论出版自由,新闻控制思想,报刊的社会责任思想,报刊业务思想。下面分别作些简洁介绍。

一、政党报刊思想

维新报人和革命报人都认为,"开会"与"办报"是两件在当时十分重要的事件。"设会"以联络党人,办报以鼓动民众。经过维新变法与辛亥革命先后两次政党办报高潮,已初步形成政党报刊思想。这一思想的要点是:

---

① 请详细参见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254～272页。

(一) 政党为体,党报为用的体用关系。有体有用,我们党的宗旨和作用才能发挥出来,这两件事就是一件事。是孙中山常说的话。这是因为:第一,党是报纸的组织保证(即为体)。孙中山指出,要做宣传,就要有一个便利的机关,这个机关就是党。第二,党通过报纸的宣传功能(即为用)发挥作用。第三,党报编辑部同时又是政党的组织机关,合二为一,如同盟会机关报《中国日报》,又被称为"党务军务之进行机关";1906 年孙中山要求于右任把《神州日报》办成"东南八省的革命宣传与组织机关"。①

(二) 党报是党的"喉舌"。这种"喉舌"作用,一是代表政党发表意见。如《民报》成为"革命党发表最高意见之机关",梁启超指出党报"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二是以党报为基地向民众实行宣传。康有为要求党报"深明大义,鼓励大众"。郑贯公指出报纸要"输进新思想,鼓舞国民独立之精神"。孙中山号召党报向民众"输灌"先进的思想主义。三是党向敌人展开言论斗争以捍卫党之主义。史载民报初立,即力辟当时保皇党劝告开明专制鼓吹立宪的谬说。郑贯公更直接主张以言论寒异族独夫之胆,以批评而褫夺一般民贼之魄,芟政界之荆榛,培异权之萌蘖。

(三) 以全民性掩饰党性和阶级性。在理论主张,资产阶级报人一方面要求将党报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无所不用其极地以各种手段通过党报达到各种目的(所谓手段贵活、贵多,百变其手段),另一方面又总是千方百计地掩饰党报的这种鲜明党性与阶级性,以"四万万民众共有之言论机关"自居,标榜"为民请命","代民立言"。其中缘由,可能一则"党派"这一名词在中国当时是带贬义的,二则党派往往存在多种派别,互相攻讦,而以"民众代表"出现则可减少种种误会与麻烦。但在实际的报刊斗争中,是很难达到以万民代表而谋一党之利的双全目的的。这种情况的出现,表现了资产阶级报刊思想的欺骗性与软弱性。

二、报刊宣传思想

近代报刊在中国一出现,就与宣传功能密不可分。到政党报刊阶段,报刊的宣传思想已全面形成,对于宣传的意义与作用、宣传宗旨、宣传与受众、宣传方法等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一) 报刊宣传的意义与作用。革命报人认为,宣传就是"感化人

---

① 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稿内《陈少白时代之中国日报》。

群"，是将"学说"、"理论"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以鼓舞人心，增多热力，令人人知所适从。无论革命还是改良，都要发动民众，改变其原来思想，影响其行为，这一切都离不开思想。康有为鼓吹通过宣传"发明大义，鼓舞大众"。孙中山更是全面地阐发宣传的意义，他强调革命成功"实报纸鼓吹之力"。

（二）报刊宣传的宗旨。报刊宣传十分重要，其宗旨正确而高尚就成为前提。郑贯公指出，办报是为了宣传一定的政治主张，"输进新思想"，其有宗旨且宗旨正则尤为重要，"无宗旨则立意靡定，直为记事传单"。梁启超说，"凡行一事、著一书，皆不可无宗旨，惟报亦然。""故为报馆者，不可不以热诚慧眼，注定一最高之宗旨而守之。"改革以后的《苏报》声称，"本报务以单纯之议论，作时局之机关，所有各省及本埠之琐屑新闻，概不合本报之格，严从沙汰，以一旨归"。①

（三）报刊宣传与读者观念。报刊宣传的对象主要是民众，为使读者接受宣传，报刊宣传者就必须"察人情之趋向"，适合民众之利益。是故梁启超提出宣传取材要"下逮"，倘若"侈谈学理、广列异闻，自炫其博，而不顾读者之惟恐卧，此则操术最拙者也"，"虽有高尚之学理，恢奇之言论，苟其不适于中国今日之程度，则其言必无力而反以滋病"。章太炎强调宣传行文要"谐俗"，文章要"径直易知"。少壮派邹容的《革命军》，具有强大的宣传鼓动力，"籍非不文，何以致是也"，受到革命党人的广泛赞誉。对照邹容，章太炎自我检讨说，自己作宣传"文不谐俗"，故持之数岁仍"世少和者"。②

（四）报刊宣传的方法。最早重视报刊宣传方法的梁启超提出报刊宣传的"八德"之说，即忠告、向导、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通、下逮等8种宣传方法。孙中山强调宣传"四原则"，即至诚、亲近、适合、有恒，这"四种原则"既是对宣传态度的要求，又是宣传方法的讲究。此外，这一时期报人还提出一些易生歧义但不无启发的方法。如梁启超提出"变骇为习"法，孙中山强调"灌输"法，于右任提倡"百变其手法"。这些方法，在当时曾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在宣传学理上颇值得深究。

三、报刊舆论观

这一时期报人在古人舆论观念的基础上，结合近代西方民主政治

① 参见1903年6月3日《苏报》。
② 参见章太炎：《〈革命军〉序》。

思想，通过报刊宣传的实践与总结，形成较为完整而深刻的报刊舆论学说，这一学说是20世纪最初阶段报刊论说的重要部分。

（一）报刊的舆论反映功能。 早期改良派报人重视报纸"下情上达"的作用。汪康年认为报刊反映舆情，应"直言无隐，冀以草野之见闻，以备朝廷之采择"。康有为认为，报纸使"民隐咸达，官匿皆知"，可以达到"启沃圣听，发扬耳目"的目的。尔后革命报人则进一步强调，报刊反映舆论，主要在于表达民意、代表民意。《苏报》自称"发表舆论"为报馆之天职，《民立报》强调自己是"四万万民众共有之言论机关"。徐培汀教授指出，维新派与革命派这两种舆论观之差异，主要在于对"民口"的认识不同。激进的维新派报人谭嗣同认为，人有别于禽兽在于"其能言"，报纸反映舆论，等于给民众一张说话的嘴巴。这种认识水平仍停留在"下民受屈，有不能自鸣者，新报纸为之鸣"的层面。[1] 而革命报人的"民口"思想，则把反映舆论视作民众之基本权利，郑贯公认为办报以呼民声，在于争取"国民发言之权"，"声罪致讨"，"笔战舌争"，使报纸成为民众民主自由的武器。这一分析，意在说明维新派报人与革命派报人对于"民口"的不同见解，但在报纸应负反映民情之责的认识，则双方是一致的。

（二）报刊的舆论监督功能。 梁启超很早就提出，报馆者，即据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实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章太炎强调报刊"正言匡世"的作用。郑贯公指出记者有监督政界及代民鸣不平之特权。汪康年认为，报刊应"假发言论之权，以尽己之天职"。英敛之指出，报纸是一国舆论之代表，政府之监督。黄远生则明确提出报刊为民生社会请命、专向有权贵之人督责的社会监督思想。

（三）报刊的舆论导向。 梁启超指出，报刊的导向作用，表现在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朝廷之涂径者也。梁启超强调，报馆应作世界之动力，养普通人物者也。为此，办报人要导人以真理，不可拨之以感情。章太炎指出，报刊要反映舆论又不要充当舆论的尾巴，"毋以众情踊动而失鉴裁"。孙中山明确要求报刊一要成为舆论之母，化革命真理为民众常识；二要引导舆论为一途，反对反动舆论。

四、言论出版自由

近代报人很早就注意并吸收西方社会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思

---

[1] 参见谭嗣同：《〈湘报〉后叙》，杨鉴堂：《总论新闻报有十益说》，《万国公报》第九年407卷。

想，并恳请和呼吁皇帝保护臣民的言论出版自由。这种封建意识与西方民主思想的结合，在20世纪初有了改变。梁启超对西方的民主政治学说十分赞赏，说，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诚以此两自由苟失坠，则行政之权限事不能立，国民之权利万不能完也。章太炎从法治高度强调报刊的言论自由的意义，指出如果政府"钳制舆论"，则是自处"卫巫之地"，为诸公监谤。在本世纪初民主潮流的冲击下，连清朝统治者也不得不在其《钦定宪法大纲》(1908)宣称："臣民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这种假惺惺的做作自然可笑，但毕竟说明言论出版自由意识在当时国民心目中的地位。

五、新闻控制思想

清朝末年和民国初期，在西方国家新闻控制思想影响和中国报业社会功能的作用下，新闻控制思想和政策举措逐渐形成和出台，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创办官式报刊以积极地影响、引导舆论，另一方面是颁布法规和实行各种检查制度以限制报刊出版及其功能的发挥。

(一) 官报思想的形成。这一时期统治阶级大致对官报性质和作用有了共识，认为官报的作用有三：一是沟通政治，"上宣德意，下达民情"，强化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二是启发民智，正统人心，谋统一而杜分歧，使社会舆论归于一致；三是以官报的权威性而压抑民间报刊的传播。但在官报的实践中，并没能实现上述作用。起初，这种官报同过去的邸报并无多大区别，到民国则成为同社会大众传媒分离的政府公报，对民众没有太大的影响。

(二) 新闻出版法制思想。当时的新闻出版法制思想是在要求颁布法律以保障民众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的呼吁中提出的。康有为请定报律，即为防止深文罗织，诬以颠倒混淆之罪。汪康年也因"吾国报馆进无法律之保护，退无社会之后盾，故之劲而得缓，与我之孤而无助，盖相去万万"等劣状而要求速定报律。①

清廷颁布的几个新闻出版法令，虽从本质上看为限制新闻出版自由，是以现代法制为外衣行封建新闻统制之实，但它们毕竟勾勒出关于现代新闻出版法制的内容与范畴，令国人产生新闻法制的意识。民初

① 参见汪诒年：《汪穰卿先生年谱》。

的报律之争和以后几个出版管理法令，虽谈不上有保护民众的出版自由的意义，有的甚至还是对钳制自由的强化，但"依法管治"的理念，还是在国人头脑中有所深入。

六、报刊的社会责任思想

这一时期，报人们在谈及言论出版自由的同时，也都谈到报刊在享有自由权利的时候，也必须负起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虽然这种社会责任理念，同西方的报业社会责任理论不可同日而语，但也足以表明，中国报人对于新闻伦理已有早期的认识，并贯彻于自己的办报方针与报道行为。

中国报人早期对于报刊社会责任的认识，一是出于知识阶层几千年以来一脉承继的忧国忧民情怀，二是出于对报刊巨大社会影响力的体验。国人最早在创办《华字日报》时就规定了这样的办报宗旨："使民智日开，而益奋其爱国之念"。[①] 此后，爱国爱民成为我国近代报刊的主旋律。而从王韬开始，更是对报人的职业道德提出具体而明确的规范，如要主笔"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又要以国家为重，"凡关国事军情，例不许印"。到了梁启超，更把社会责任思想系统化了。如他把衡量报纸"良否"的四条标准定为：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

中国报人把言论独立视为对社会尽责的前提。梁启超力主报纸要成为社会"公言"，应确保"与一切个人关系及党报无涉"。在商业报刊的经营中，英敛之仍主张"以大公之心，发折衷之论"，并且"言人所不敢言"。面对当时一些报刊和报人的践踏报业道德的行为，英敛之呼吁，"结一团体，扶正抑邪，兴利除弊，使社会隐受其益"。在难以如理想般尽其社会责任时，报人们仍持"独善其身"原则，如黄远生说，"继自今，提倡个人修养，提倡神圣职业，提倡人格主义，则国家社会虽永远陆沉，而吾之身心固已受用不尽矣。吾之忏悔，此物此志而已。"[②]

七、报刊业务思想

这一时期由于大众化报纸开始兴盛，所以对于报刊业务规律的关注有了加强，其中的理论水准也有所提升。有研究者认为，我国近代报人在新闻思想上明显跛足，对于报刊的功能及社会效果的论述较丰，而

---

① 参见林友兰：《陈蔼亭与香港华字日报》。

② 参见黄远生：《忏悔录》，1915年11月10日《东方杂志》。

对新闻传播规律的探讨较少.这种情况至20世纪初叶,有了部分的改变。这些改变的成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新闻特质的认识

中国人参与新闻传播已有经年,但对新闻特质的认识,还是近代的事。这种认识,由浅入深,不断地由片面进入全面。最初人们对新闻的认识是"新奇"。为求新奇,有时不免失之真实,所以报人最早对新闻传播的要求便是真实报道。王韬即说,报纸报道,切忌"采访失实,记载多奇"。至《时务报》,又在真实性之外提出新的要求:时效性。该报要求,"所登新闻,均择聚要有证之事,凡郑燕市虎之闻,概为严删。"此为真实性所限。又说,"各地访友,凡重要之事,均令即行电告,裨阅者先睹为快。"这就是时效性的要求了。此外,也涉及到"重要性"。

至20世纪,报人的新闻观又有新发展。梁启超一反政论报传统,把新闻放到政论之前以示重视。他说,报纸不徒重主笔,而重时事,他要求,或访问或通讯或电报,"费重资以求一新事不惜焉"。为此他提出新闻"确而速"的要求。他在为《时报》撰写的发刊例中,进一步提出新闻的"博、速、确、直、正"的全面要求,实际上揭示新闻报道的广泛性、时效性、真实性、客观性和公正性诸种特质。英敛之也从新入听闻、真实客观、通俗适度等方面表明自己对新闻特质的认识。黄远生还提出了新闻"系统"的观点。所谓系统,就是通过综合和归纳事实,全面报道,而反映事实的本来面目。他指出,以新闻反映物之繁杂和报刊"耳目"孤简,新闻报道往往非物之真象,因面新闻报道切忌妄作判断,宜以客观代替主观,方能全面地反映事实。

（二）对新闻工作者素质的认识

《万国公报》已经提出报人须为"学识兼优"之士,"其明足以察理,其才足以辨物,洞见无遗,词能达意"。《申报》招聘访员时,"采访新闻之友必须学识兼长,通达事务,并植品端方,实事求是者"。由斯始,中国报业对报业工作者的素质一直持较高标准。郑贯公强调,凡记者需有学问,无学问则见理不真。不能以不学无术、眼光不到之人,一任其道听途说,草草塞责了事,必也魄力雄,善驰骤;脑力足,善记忆;腕力足,善速录。黄远生对记者素质的要求阐述得既全面又通俗,即"四能":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这些基本要求,延及今日,也这么表述。

（三）报章文体和新闻之风

早期国人对新闻文风的认识见之于洪仁玕和郑观应。洪认为,

新闻只须实写，勿作一字浮文，主张对伪造新闻者，轻则罚，重则罪。郑指出，盖新闻者，浅近之文也。主张新闻"据实直书，实事求是"，尽删浮风，一秉直纯。总之，早期国人对新闻文风的认识，集中于据实报道。

戊戌变法前后，报章文风流行通俗明快、自由洒脱的风格。梁启超的报章文笔，令后人仰慕模习。白话文报纸问世以后，通俗简洁，令百姓畅通无阻，成为报章文风主流。

进入 20 世纪以后，人们对报章文风的认识趋于全面。《大公报》曾论述新闻文风，认为新闻文风应"文酌今古之谊，赏为雅俗所共，浅深各随乎所见，耳目总觉其常新"。对于新闻写作，该报要求：明白易晓，真实不浮，事必简而能详，文亦质而不俚。从新闻的选择到写作的风格，应该说已论述得相当全面与准确。

对于从梁启超康有为到孙中山章太炎等人从报业到报论的新闻思想研究的上述概括可以看到，当时国人关于报业理论的研究比过去大有长进。这 20 年的研究，呈现出下面的若干特点，也就是具有明确的优点与不足。

第一，研究的内容。偏重于报刊功能与作用，对于新闻传播规律有所涉足但不深入。由于变法和革命都离不开报刊宣传（一开会二办报），加之办报对于政治宣传立竿见影的快速效应，报人关于报刊的社会功能尤其是政治宣教功能有充分的认识和较多的论述，而对于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则甚少涉及，纵有谈论，也限于新闻报道本身。

第二，研究的水平。由于许多对于报业理论的阐发是从经验与体会的层面出发，随感式的抒发和经验性描述是这一阶段研究的主要形式，既无研究的专门人才，又无研究的专门著作，因而这一时期报业理论研究的总体水平不高。

第三，研究的底蕴。部分是较多接受过西方文化成果的开放的中国文化人，部分是有较好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初通西方报业的中国文化人，这两者的结合还是初步的、肤浅的，而且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远胜于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这一阶段中国的报业理论，有很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

第四，研究的影响。由于许多报业理论观点是通过报章发刊词、启事、序文、报业论文向全社会公开发表与传播的，因而这种面向公众的新闻学知识的普及加上日益重要的国人阅报习惯的养成，收到较好的

效果,一些专业新闻学词汇也逐渐成为社会大众词汇。这一特点,胜于后来关在小圈子里的书斋式研究的社会影响。

第五,研究的异化。报业功能的研究令国人普遍重视现代报刊的功用,也让统治者纷纷出版官报以统制舆论;法制的威力令报人向往依法保障言论出版自由,也使统治者通过出版立法钳制新闻自由。在报人鼓吹下,中国报业虽迟于西方200余年而在维新变法与辛亥革命中两次掀起发展高潮,充分显示出现代报刊的魅力。在退却民初报律三章中曾经阐发过卓越的新闻法制思想的光芒,人们在民初又不断受到所谓现代新闻法制的嘲弄。这一切反常情况的出现,固然有着种种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缘由,但新闻学研究的不彻底、理论层次低和过分实用主义也是一个原因。

这一切,为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新阶段——由术入学的真正意义上的学科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急切的实践的需要推动着这种研究一步步走向系统化和深刻化,又先天地决定着在以后几个历史时期中国新闻学研究的若干难以避免的缺陷和不足。

第二节 学从西方来:西方新闻学的移植

一、今朝国人对新闻学的认识

严格意义上的新闻学(the science of journalism)自建立发展至今,不足百年。所以新闻学是本世纪的科学结晶。

早期的传播媒介,偏重于传统印刷媒介(printed media),尤其是报纸,所以我国初期业界以"报学"概括以名之,如我们在第一节从报业到报学所析。从20世纪20、30年代始有广播、电视"电子媒介"(electronic media)以后,新闻学研究范围扩大,新闻学的对象涵盖所有现代新闻媒介(news media)。

百年研究史表明,新闻学研究大致分为历史新闻学(historical journalism),实务新闻学(practice pragmatic journalism)和理论新闻学(theoretical journalism)三部分。这在前章已有交代。本书侧重于第三部分即理论新闻学,重点阐述百年新闻理论研究史迹。

台湾学者彭家发结合20世纪新闻学研究成果分析,认为新闻学的研究范围(主要从理论层面),大致应包括下列五个方面:

（一）资讯层面（informative dimension）

通过个案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对事件报道之公正、周延、可读性及其他相关性作研究。来源研究，可从报道内容、追溯记者的采访过程、技巧，以检视来源是否妥当，还研究其真实性、自主及有无偏见等。

（二）表达形式（format dimension）

这部分研究包括各种新闻文体、版式、节目和多媒介制作之"多媒介档案"，包括风格、艺文风尚、呈现策略与传统，以及媒介产品特性的种种媒体形式瞻观。

（三）词类包装（rhetorical dimension）

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由于蕴潜着的价值态度和观点诸项因素，任何叙事活动，都涉及到见诸建构与形式的修辞层次。这种修辞层次反映一定的文化形式、当代典范、界定异见，能压抑或强调、消沉或激起公众反应，而新闻业者则可能习而不察。因此，透过修辞分析，可以确定新闻输出某些更具影响力的层面，如社论类的意见篇幅的比较，看其阶段性取向，或窥其不同意见之辩论焦点印证媒介意见领袖的功能。

（四）媒体（media dimension）

由过去单一的报纸研究转向文化范围内，在产业条件、限制和功能方面审视相关的政策、措施，以提升制作者和消费品质，如媒体技术因素及条件、文化模式，不同媒体所表达的新内容等角度的研究，具体题目如电视新闻特性研究、电视新闻与印刷媒介新闻之比较研究等。

（五）媒介情境（media context）

关于报纸中的通俗文化、公告等内容对新闻工作之影响的研究等，细心检视媒介情境，又可分为 5 个方面：

1. 国际层面：哪些因素影响国际新闻的流通？在卫星、有线电视发展中，技术、经济以及媒介特性对国际新闻的影响等。

2. 本地层面：法律、总体经济因素、有形与无形政治系统、历史与传统关联性、特殊政治气候（如危机）、文化运动、经济转型以及其他社会现象的研究。

3. 媒体企业本身：报社、广播、电视台等新闻机构企业本身组织与经济状况之研究，报业与诸如广告、制纸业关系，媒体企业发展史、媒体运作等研究。

4. 专业层次：新闻业的社会功能及其专业规范、道德规范，新闻工作者的工作特性、思想方式和方法等研究。

5. 编辑台上:研究新闻价值、新闻选择标准、报道方式及立场,这方面的研究,又可细分为新闻稿源、传播形式、知识、自我约束、道德、技术冲击、编辑把关、读者认知、业员性别、传统观念、职业理想等。[1]

彭家发教授的上述见解,代表着经历百年研究之后,人们对于新闻学应该涵盖的学术范围的新认识,是比较全面和细致的。内地的学者,从80～90年代发表的论文和专著看,一般认为理论新闻学的研究范围,大致应包括三个方面:

1. 新闻传播(新闻传播行为及其发生原因,传播规律及特征);

2. 新闻事业(新闻事业发生原因,新闻事业运作规律,各种传媒之特征);

3. 新闻传播和新闻事业运作与社会诸因素之互动(与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民族、科技等互存互动的特点、机制、规律,新闻角色扮演、规范、功能、权利与义务等)。

上述三方面合成一句话:新闻学是一门研究新闻传播、新闻事业及其规律的科学。

这一认识,同样是经过百年探索之后,人们对理论新闻学的认识。总之,两岸学人对于新闻学的认识,同我国在本世纪初时对新闻学的认识与理解,已有许多不同。前面讲过,在本世纪第一个20年,人们基本上是从报业认识到报业理论的研究开始进入新闻科学的殿堂的,而以后,新闻学研究有了总体水平的提升,即由术入学,开始了较为全面、系统和深层次的研讨。这种研讨,是以撰写新闻学专门著作为标志的,而国人撰写新闻学专著,又是从译介西方第一批新闻学著作起步的,所以笔者将本节标题拟为:学从西方来。

二、中国新闻学的源头

史载17世纪就有一些德国大学生以报纸为研究对象写作学位论文。由普尔兹撰写的《德国新闻事业史》于1845年出版,史称这是全球第一本历史新闻学著作。此后,美国的华盛顿大学于1869年、堪萨斯州大学于1873年、密苏里大学于1878年、宾夕法尼亚大学于1893年,瑞士的柏美尔特于1875年,都先后开办过以印刷工艺、新闻采编等为对象的训练班、课程班和专业、学校,用于教学的讲义和教材,也应视为最早一批研究成果。进入20世纪之后,这类讲义、教材和专著更是层

[1] 参见彭家发:《基础新闻学》,(台)三民书局1992年9月版,第4～8页。

出不穷，因为这时期一批专门研究新闻传播技艺与理论的大学问世了。

1900 年，由所罗满撰写的《德国新闻事业史》问世，这是第二本关于德国报史作品。1910 年召开的德国社会学大会上，社会学家麦克思·韦伯提出："社会有必要进行最纯粹的科学研究的第一个课题，就是新闻的社会学。"[①]进入 20 世纪以后，以新闻传播为专门对象的这门新兴学科，随着新闻教育层次的提升、新闻专业的普遍开设，专门性研究著作的不断问世，也日益得到世人认同。可以说，20 世纪 20 年代之后，新闻学已作为一个独立的新兴学科，树立于人文与社会学科之林了。

1916 年莱比锡大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新闻学研究所。随后，明斯脱大学于 1919 年、科伦大学于 1920 年分别办起了新闻研究所和报刊与舆论研究所。1926 年，汉堡大学法学院和弗莱堡大学先后创立新闻研究所，紧随其后，柏林大学也于同年办起了德国新闻研究所。次年，哈列大学成立新闻研究所。说德国是全球最早开展新闻学研究的，应该是言之有据的。

美国也是很早涉足新闻学研究的国度。史载早在 1810 年美国就出版了汤姆斯(Isaiah Thomas)的两大卷本《美国印刷史》，虽说该书主要记述印刷业，但也谈到了印刷报纸的情况。1869 年，李将军在华盛顿大学倡办报学课程。1873 年，美国第一本新闻史著作《美国报业史》由哈德逊(Fredeic Hudson)撰写并出版，被认为是美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1895 年报人戴纳出版《办报艺术》。1903 年，休曼出版美国第一本《实用新闻学》。8 年之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出版了另一本《实用新闻学》，同年又一本以实用新闻学为对象的书名叫《报纸写作与编辑》的著作在威斯康辛出版。

在最早一批新闻学著作中，有研究者认为，最具代表性而内容又最系统的，当推日人松本君平之《新闻学》，美国学人休曼之《实用新闻学》。以后我们将作专门评介。

在西方国家新闻教育趋于普及、新闻学研究初步展开的推动下，中国的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也开始启动。1911 年，全国报界促进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倡议成立"报业学堂"，未果。1918 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起成立"新闻学研究会"，并在政治系四年级开设新闻学选修课，

---

① 参见小山荣三：《新闻学》，转引自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 275 页。

延请北京《晨报》主笔徐宝璜任教授，讲授"新闻学大意"，这是中国有正式新闻学教育的开端，徐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新闻教育第一位大师"和"新闻学的开山祖"。蔡元培又请《京报》创办人邵飘萍担任"新闻采访学"讲师。徐的讲稿经多次修改定名为《新闻学》，于1919年由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出版，后又于1922年由当时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黄天鹏予以重印，易名为《新闻学纲要》，卷首有黄氏序言一篇，卷末增附作者其他新闻学论述4篇。邵飘萍曾有编写一套新闻学丛书计划，其中第一本定为概论性的《新闻学总论》，内容包括新闻事业性质、记者的地位与资格、报馆的组织、报纸内容与形式、报纸简史和通讯社事业等；第二本定为《实际应用新闻学》，又名《新闻材料采集法》，其中部分章节已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上讲授过；第三、四本分别为《新闻编辑法》和《广告及发行》，俱已拟定写作计划。1923年，北京京报馆首先出版第二本《实际应用新闻学》，作为平民大学新闻系讲义使用。1924年出版原丛书计划第一本的《新闻学总论》，此书中内容，邵氏曾在法政大学讲授新闻学时作过讲义使用。可惜的是，由于1926年邵飘萍不幸被奉系军阀杀害，第三、四两书未能问世，成为中国新闻学研究史上一大遗憾。

徐、邵的《新闻学》和《实际应用新闻学》，是国人自己所著研究新闻学的划时代作品，以后本书也将作专门评介。

1920年，全国报界联合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会议，再次倡议设立新闻大学，连组织大纲都获通过，但又是没有付诸实践。

192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在普通文科内，创办报学系，成为我国大学举办新闻系之始。该系系务由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主笔柏德逊(Don Patterson)主持，并发行英文《约大周刊》。1924年，美国新闻学者武道教授(M. E. Votaw)来华主持系务。由此也可窥知我国新闻学之西风东来，受西方影响之深及之久。

新闻史专家认为，中国早期的新闻学研究，可划为三个时期，而这三个时期各呈现一次新闻学研究的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于维新变法时期，第二次在"五四"时期，第三次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如前所述，第一次研究对象主要是报论，第二次虽然还是以报论为对象，但已出现专门的研究性著作，即由报论进入报学阶段，第三次是新闻学著作大量出版的兴旺时期。[1]

---

[1] 这种历史分期，参见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277~281页。

第二次新闻学研究高潮以1918年10月4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为起端，至1927年戈公振出版《中国报学史》为结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新闻学研究团体的兴起和新闻教育的创办；大众化新闻传媒作为研究主体，其研究成果则成为新闻学研究的主流；一批里程碑式新闻学学术著作出版，如前面提到的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以及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自然，国人自撰新闻学专著，首先是从译介西人的新闻学著作开始的，这些西人著作介绍到中国来，成为我国新闻学研究的一个源头。

三、松本君平之《新闻学》

日本新闻学者松本君平的《新闻学》，是中国最早译成中文出版的西方新闻学专著。

松本君平又名松本世民，生于1870年，卒于1944年，早年留学美国，获布朗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期间曾任《纽约论坛报》记者。归国后，担任首相伊滕博文随员，曾到欧洲各国考察，对当地新闻事业的强大大为惊讶，受到欧美学者研究新闻科学的启发，认为日本没有此类研究是一大缺憾。于是，他于1900年在东京创办三年制之东京政治大学，亲自开设新闻学课程。这座学校虽以培养日本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外交官和新闻记者为目的，但特别重视新闻学课程。在此之前，他已编成新闻学的讲义一册，于1899年出版，是日本第一本新闻学著作。190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局将之译为中文，是我国最早的一本新闻学译作。《新闻学》一书的内容，涵盖英、美、法、德、俄等欧美五大国新闻事业概况。1900年，东京博文馆以洋装精印本重印时，该书易名为《欧美新闻事业》。中国于1903年出版中文版时，该书易名为《欧美新闻事业》。

这本书共36章，内容之一是介绍欧美五国新闻事业现状，并阐述现代报纸的职能，以及新闻从业人员在报业管理、采访、写作与编辑等部门的实际工作经验。

当时正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打了胜仗的日本，更积极谋求对外扩张，因为松本君平十分重视报纸的政治作用。所以在本书的原序中，启首就写道：

> 君侧之权衰，移于政府矣；政府之权衰，移于议会矣；议会之权衰，移于新闻纸矣。考古今制驭天下之权之重力，十六世纪以前，君侧也；十七世纪之后，政府也；至十八世纪，则在议会；至十九世

纪之末叶，则不可不归诸新闻纸。苏老泉曰："当罚者，天下之公；是非者，一人之私。""春秋"者，圣人以是非代赏罚也。夫新闻纸无君主之神权，无历史之因藉，而能判是非别赏罚，其犹古先圣哲以其道德权衡，于帝王政府以外，自立门户之意乎？周道衰微而"春秋"作，君侧政府议会衰而新闻纸起，今之新闻纸殆古之"春秋"。

松本君平这本书除欧美新闻事业外，还有下列丰富的内容：近世文明与新闻之德泽，第四种族之发生，新闻社之组织、采访部，略记法与采访记者，地方通信者，文选部之经验，通信队之编成，采访者职务及资格，新闻编辑局工作，编辑事务、电报、论说及主笔等记者，新闻理事，社员之制约、访问记者及新闻记者之访问，为新闻记者之道，编辑新闻之注意，特别记事，杂志及新闻文学之注意，匿名寄书，诽谤之言论，新闻记者之报酬，职业的新闻记者，公人之新闻记者，近世新闻之发达及特性，新闻图画，英国新闻记者之保护会，新闻记者之养成及新闻记者之势力及使命等。纵观这些章节及内容，可见洋洋洒洒，自史至论至新闻实务，全在作者笔下。这从一个方面也表明，新闻学在走上独立研究之始，史、论、实务的区分不是那么分明，实务经验的描述远多于抽象学理的探讨。大致一般学科初立，莫不如此。

徐培汀和裘正义两位学者对松本君平的这本书作了较系统的概述，认为《新闻学》指出了同新闻传播相关的五个关系：

一是新闻与文明的关系。松本君平从产业革命、民主政治入手，研究近代新闻事业的兴起与"近世文明"的关系。该书指出，"新闻之与社会相为因缘，社会之进运日益强大，而新闻之发达，亦从以可知也。""自蒸气力发明，世界人类便利交通横贯地球，搜集创见新闻之事。"这是产业革命对新闻事业的影响，而民主政治对新闻事业的影响则表现为："唤发人类思想之自由，益助此文运进步者，则近世之新闻事业也。"①

二是新闻与社会的关系。松本君平认为，新闻事业"不徒为社会之耳目，实为社会之镜照。"所以新闻报道，"不在粉饰社会之现象，而在据实直书，以供社会之评断，作社会鉴镜。"新闻报道应充任社会之耳目，凡宇宙万象，无精粗巨细，皆可一一揭载。同时，新闻亦应受社会制约，"社会美，则其镜明；社会恶，则其镜晦"，据此，松本君平认为，"有闻必录，新闻社之义务，如是而已。善恶与否，以待读者自定评也。"

---

① 此段引语及以下二至五点的引语，均引自松本君平之《新闻学》。

三是记者与政治的关系。英人肯特(K. Hunt)于1860年在伦敦出版之"The Fourth Estate"一书中，曾记载一名为麦哥里的贵族目睹记者在议院记者席的风光而感叹说，"记者席已成为王国的第四阶级"。松本君平认同此说，并进而提出新闻记者"以明敏之才干，灵秀之神经，握区区一管，以指挥三大种族之趋向"，认为"新闻记者既可为一代之师表，于政治是为党派之方针，即全国思想之进步，尤以新闻之引导为多"；"新闻记者，本有政治家之天职"，故国民之意见，"常随有卓识之新闻记者为转移，以是其一抑一扬，是以决彼等运命之浮沉，其一毁一誉，即可为最后舆论之宣告也。""故政治者，乃新闻记者之役也"，"是以新闻记者，必须广有政治之知识，而精通其政体之理论与运用。"

四是记者与业务的关系。在《新闻学》中，松本君平认为新闻事业"乃搜集新现象之事实，著为新过去新未来评论，而我之印刷，以通知公众之事业也。至夫此新现象，如何而搜集之，编辑之，评论之，一切分配各地，俾众周知之法及讲究理论之学，是为新闻学。"他尤其重视探访记者的作用，认为"探访部不特为眼目而已。为耳也，为手也，为足也，即编辑者与外部社会之惟一连锁也。"因此，"以探访者机敏与否，即可以卜新闻纸之盛衰。"他要求探访记者具有身体健康、思想锐敏、诚实三大要件。

五是营业与事业的关系。松本君平从事新闻事业的时候，世界报业进入大众化商业报纸已达半个多世纪。因此他认为，新闻事业既是一种事业，又是一种商业。作为事业，这种事业"有以发抒怀抱，感化一代之心"；而作为商业，"即以新闻为营利之事业，则新闻乃商品之一种。"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商品经营好坏直接同质量相关，"亦如市场中之货物然。货品良则购之者多，货品劣则购之者少。此一定之理。"松本君平指出，报业经营，关键在有经营管理之才。①

松本君平这本书问世，对世人确有震惊启迪之功。在当时，新闻学是否是学，甚至是否有资格称学，不少人是抱怀疑甚至反对态度的。在日本，当松本君平拿着《新闻学》这本书找学者田口卯吉征求意见时，田表示惊讶，说，"新闻之业，亦有学乎？"②

这本书出版之后，不仅对日本，而且对中国学者的启示，都是相当

① 以上五点论述，参见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281～284页。

② 参见彭家发：《基础新闻学》第二章，注④，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245页。

强烈与巨大的。梁启超十分推崇这本书，说，“松本君平氏著《新闻学》一书，其颂报馆之功德也，曰：‘彼如预言者，驱国民之运命；彼如裁判官，断国民之疑狱；彼如大立法家，制定律令；彼如大哲学家，教育国民；彼如大圣贤，弹劾国民之罪恶；彼如救世主，察国民之无告苦痛而与以救济之途’”。① 1903年8月7日上海出版的《国民日日报》发刊词和1919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出版的徐宝璜的《新闻学》，都引用过这本书中的观点。从中可以看到西方新闻学著作对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影响。

四、休曼之《实用新闻学》

休曼是出版美国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实用新闻学》的学者。1913年国人史青将此书译出出版，令此书成为中国最早译出并出版的第一本实用新闻学著作。

休曼(Edwin Llewellyn Shuman)生于1863年，卒于1941年，一生从事新闻工作，写过许多新闻学著作。1894年，写过通俗性新闻学教材，后来于1903年撰成《实用新闻学》一书出版。1913年，上海广学会由署名史青者执笔(生平不详，有说史青即当时申报馆主史量才②)，翻译此书。

这本书共16章，内容广泛，有：美国报馆进化史，责任与俸给，访事人之遣扰法，采访，新闻访稿，新闻业同盟会，记者，新闻事业，星期增刊，美术室，妇女新闻事业，告白(广告)之文，登载告白，乡邑报章，破坏名誉之法律及美国版权法。在这些内容中，新闻实务占很大比重，主要之点有：

1. 指出美国报纸经历了政论报纸(独立前)、政党报纸(19世纪30年代前)和大众化商业报纸三个阶段。

2. 关于新闻的采访与写作。休曼认为，美国《先驱报》(纽约)于1859年首创访问式采访法，而在南北战争时期始用“倒金字塔结构”新闻写法，从1852年起，美国报纸开始采用标题。

3. 关于报纸功能与新闻报道的要求。休曼指出报纸有两大基本功能：一为反映，二为评介。新闻之要点，应尽纳于第一节(即第一段)中，而以五个W(何事、何人、何地、何时、何故)“能概括于第一节内最

---

① 参见梁启超：《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册。
② 参见彭家发：《基础新闻学》第226页。

妙”。他主张“新闻内勿得加以批评议论”，“务求意言两尽，不蔓不支，而又极明晰”。至于新闻评论的写法，“论当其一也”；“凝练肃括，二也”；“于一事之情实，无不周知，三也”；“词达可诵，四也”；“见理透物，造语奇警，五也”。[①]

4. 重视广告和制作广告。

5. 重视新闻法制。在新闻学著作中论述新闻法制，休曼的《实用新闻学》为第一人与第一书。其中休曼论及诽谤法和版权法。

休曼指出，诬构（即现时的诽谤）成立的条件有二：一为恶意，二为足以毁坏他人名誉的社会后果。制裁诬构与保障自由并不矛盾。休曼认为，“报告新闻，有自由也。批评人物，有自由也”，但是，“自由者，非放纵之谓”，不可“自由刊载想象之语，报复之辞，谩骂之文”。

休曼认为，报馆及报会于所搜罗之新闻，未经刊行者，按普通法律，亦为财产之一种，故无形之版权，乃所以保护未经刊行之著述，犹之家具器物，不得为他人擅自窃取耳。不经同意“转载全书或书中紧要部分，是为侵害版权”，“无论用何方术，就原书改作之，模仿之，移易之，以掩其翻刻之迹，皆属侵害版权”。“苟转录之文，非所以代原作，原作之销数不因之而滞，即非侵害版权也”，“文学记者批评书籍，往往引用原本成作，而不得以翻印论著，即以此故——唯须标明出处耳”。他指出，“已有版权之文，可以转载者，为欲奖励学问也。然后起之人，剿袭前人辛苦经营之成作，以为己有，殊非公平之道，此版权所以有专律也”。他主张以法律制裁侵权之人。

休曼的《实用新闻学》一书以中文出版之后，影响广泛。1987 年，由俞家宏教授牵头，又再次将该书校订后收入《新闻文存》出版。

五、徐宝璜之《新闻学》

徐宝璜是中国最早的新闻教育家和新闻学者，他的《新闻学》是国人自撰的第一部理论新闻学著作，被称为“破天荒”之作，他本人则成为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开山祖”。

《新闻学》原名《新闻学大意》，最早在 1918 年 9～11 月《东方杂志》15 卷 9～12 期上发表，第二次修订稿在同年《北京大学日刊》连载，第三次修订稿在 1919 年《新中国》杂志第 6～8 号上发表，第四次修订稿定名为《新闻学》，1919 年 12 月 10 日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名义独

① 参见休曼：《新闻学》。

立成书。

《新闻学》原系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及为政治系四年级开设的选修课的讲稿。1919年初版时校长蔡元培作序时说，“北京大学于去年新设‘新闻学研究会’，请文科教授徐伯轩（徐宝璜字伯轩）先生为主任，先生草《新闻学》一篇，一年以来，凡四易其稿而后定，并征序于余。”“新闻学之取资，以美为最便矣。伯轩先生游学于北美时，对于兹学，至有兴会，归国以来，亦颇究心于本国之新闻事业。今根据往日所得之学理，而证以近今所见之事实，参稽互证，为此《新闻学》一篇，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①]蔡序指出了徐氏之研究，实源自于美英西方，又加上对中国报业之新研究，说明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渊源。

对于中国新闻学研究的这一源头，徐宝璜的自序中也有提及。他说，“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本书虽仍不完备，然对于新闻学之重要问题，则皆为有系统之说明；而讨论新闻纸之性质与其职务，及新闻之定义及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②]徐氏这一番说明，点明两个问题，一是他从西方获得不少新闻学书籍作自己著作参考，二是时至20世纪20年代，西方新闻学书籍中对于新闻学原理研究的著作仍十分少见，说明拓荒时期理论新闻学比历史新闻学与应用新闻学要落后得多。另外，徐氏1912年从北京大学毕业以官费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新闻学与经济学，也肯定受到西方新闻学的影响。他回国之后长期在新闻界执业和在新闻专业执教，一生都对新闻学研究乐此不疲，说明了这种影响之深切。

《新闻学》全书14章，6万余字。各章标题为：新闻学之性质与重要，新闻纸之职务，新闻之定义，新闻之精采，新闻之价值，新闻之采集，新闻之编辑，新闻之题目，新闻纸之社论，新闻纸之广告，新闻社之组织，新闻社之设备，新闻纸之销路，通信社之组织。新版书后有附录，收集徐氏《新闻学》一书出版后的几篇主要论文，大部分属理论新闻学范畴的论题，如新闻纸之性质与价值，新闻纸与社会之需要，新闻事业之

---

① 蔡元培：《新闻学蔡序》，《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序文部分第5～6页。

② 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序文部分第9～10页。

将来等，

从全书内容看，《新闻学》一书属于新闻学概论、通论一类的著作，因为除了新闻史之外，本书相当篇幅讲的是应用性问题，如新闻之采集，内含16节，占全书四分之一。但最值得重视的，还是它的理论论述部分。这部书主要的理论观点有：

（一）新闻学以新闻纸为研究对象

徐宝璜在第一章一起笔就写道：

> 尝考各科学之历史，其成立无不在其对象特别发展以后。有数千年之种植事业，然后有农学林学。新闻纸之滥觞既迟，而其特别发展，又不过近百年事，故待至近数十年，方有人以其为对象而特别研究之者。研究结果，颇多所得，已是构成一种科学，不过尚在青年发育时期耳。此学名新闻学，亦名新闻纸学。既在发育时期，本难以下定义，姑曰："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得一正当解决之学也。"此虽稍嫌笼统，然终较胜于无。①

徐宝璜的观点非常清楚，即新闻学就是新闻纸学，以新闻纸作为这门新兴科学的研究对象。徐氏还指出，新闻纸学的研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报纸编辑、报社组织和报业经营。

（二）新闻纸的社会功能

论述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新闻纸之后，徐宝璜接着在第二章中论述新闻纸的社会功能。在当时，徐氏说的是新闻纸的"职务"，即现代语言"社会角色"、"社会使命"。他说：

> "新闻纸"之名词，在英文为newspaer，在日文为"新闻"，国人亦简称曰"报纸"，曰"报章"，曰"新闻"或曰"报"。其职务有六：为供给新闻，代表舆论，创造舆论，输灌知识，提供道德，及振兴商业。而前三者，尤为重要。②

徐氏对这三个主要功能分别作了论述。

1. 供给新闻。徐宝璜说，"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之事实也。"故新闻者，第一须确实，第二须新鲜。"凡闭门捏造，以讹传讹，或颠倒事实之消息，均非新闻。""明日黄花之消息，亦不能认为新闻。盖新闻有如鲜鱼，鱼过时稍久，则失其味。新闻逾时稍久，其价值不失

① 《新闻学》，第1页。
② 《新闻学》，第4页。

亦损矣。"徐氏指出,"以真正之新闻,供给社会,乃新闻纸之重要职务,亦于社会有极大之关系。"①

2. 代表舆论。徐宝璜认为,新闻纸今日之代表舆论的"代表性",远比过去广泛,"昔则仅为对于政府而代表国民之舆论也,今则又应对于世界而代表国人之舆论;昔则仅代表国民而监督政府也,今则又应代表国民向政府有所建议或要求。"为此,新闻纸的责任,"应默察国民多数对于各重要事之舆论,取其正当者,著论立说,代为发表之。言其所欲言而又不善言者,言其所欲言而又不敢言者,斯无愧矣。"②

3. 创造舆论。徐宝璜指出,"新闻纸不仅应代表舆论也,亦应善用其势力,立在社会之前,创造正当之舆论,而纳人事于轨物焉。"而创造之法有三,一为登载真正之新闻,以为阅者判断之根据。二为访问专家或要人,而发表其谈话。三为发表精确之社论,以唤起正常之舆论。③

及至输灌知识、提倡道德、振兴商业三个新闻纸功能,徐宝璜也有详细论述。他指出,"新闻纸之在文明各国,已成为社会教育最有力之机关,在文化运动中,占其重要之地位。故输灌知识,遂亦为其重要职务之一矣。""新闻纸应立在社会之前,导其人正当之途径,故提倡道德,亦为新闻纸职务之一。""广告者,商业之媒介也。而新闻纸之广告,尤为有力。"此外"又聘请有专门智识之人,编辑商业专栏……亦足助商业之发达。"④

(三)新闻价值

徐宝璜明确而简洁地提出了新闻的定义,即:"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他详尽地递进地分析了构成新闻的要求应该是:新闻为事实→新闻为最近事实→新闻为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新闻为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接着,徐宝璜指出,"推定最近事实是否为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标准,曰新闻之精采。新闻之精采者,乃足引起多数人注意某事实之物也。凡最近事实,有之者即可推定其必为多数阅者所注意,故为可登于报之新闻,无之者则可推定其必不为多数阅者所注意,故不成为新闻也。"⑤由兹可见,新闻之精采,即人们心理

① 《新闻学》,第4页。
② 《新闻学》,第5~6页。
③ 《新闻学》,第6~7页。
④ 《新闻学》,第7~9页。
⑤ 《新闻学》,第17页。

上对某事实积极反映之产物。徐宝璜分析说,这种积极的心理上的关注,包括个人利益的注意;人类对某些事实,如人命之损失、财产之损失、奋斗之精神等的关注;求胜之竞事;著名人物之姓名;著名机关之名称;事情之希奇等,都可以致使新闻变得精采。这是令新闻精采的传播效果上的考察,而之所以令其有效即精采,则由于事实本身有价值。

徐宝璜在第五章新闻之价值中,指出,"新闻之价值者,即注意人数多寡与注意程度深浅之问题也。重要之最近事实,自能引起较多人数与较深程度之注意,故为价值较高之新闻。次要之最近事实,仅能引起较少人数与较浅程度之注意,故为价值较低之新闻。……故吾人可定一公例曰:取数新闻而比较之,其价值乃与其重要之程度为正比例。"[1]他又指出,"新闻如鲜鱼,登载稍迟其价值不失也损","故吾人可下一公例曰:同一新闻,其价值与发生及登载相隔之时间为反比例。此相隔之时间愈短,则新闻之价值愈大,愈长则愈小也。"徐宝璜为此还介绍西方各大新闻社为提高时效采取三种方法:用敏捷传信方法、增加发刊次数与随时改版。[2] 徐还指出,"吾人又可下一公例曰:同一新闻其价值与发生及登载相隔之距离为反比例。此相隔之距离愈短,则新闻之价值愈大,愈长则愈小也。"徐为此介绍西报通过出版各地特版发表当地新闻以"缩短"地区之差的先进做法。

在徐宝璜看来,新闻价值的组成因素包括事实的重要性、新鲜性(时间性)和接近性(即地区距离)三个方面。

(四)应用新闻学的几个原则

《新闻学》六、七、八、九四章论述的是应用新闻学的几个原则与方法,包括采集、写作、编辑、社论四个方面。

所谓新闻之采集,"乃将记载某事之各种材料,集合于一处之谓也。"[3]采集并非偶然之事,实有一定之方法,大致为日常探访与特别探访。徐宝璜对于新闻来源的获得、因人访问与因事访问、报告集会的采访、电话采集、发展新闻的采集(涉及多方面采集和连续采集)、特别新闻(需专门知识及经验)的采集等,均有详尽的经验的推介。

徐宝璜对于访员之资格和访问应守之金科玉律(即注意事项及责

---

① 《新闻学》,第24页。
② 《新闻学》,第25页。
③ 《新闻学》,第31页。

任规范）有明确阐述。他指出，“访员既兼采集与编辑二种职务于一身矣，欲求尽职，不可不具下列几种重要之资格”，即敏捷、勤勉、正确、知人性、有强健之记忆力、有至广至深之知识。[1] 他所提出的关于访员采编新闻应守之事项十六条，可以说条条是“金科玉律”，是宝贵的经验之谈，如采访要掌握全部事实，切勿视谣言为事实；对于新闻价值的判断当自为裁夺，不当信读者之褒贬；敏速办事，但勿乱忙；尤不可受贿，为他人隐藏；访问题，不可当面笔记；除非某报所登之新闻，素来确实，切不可转录之；广告性质之新闻，不可登于新闻栏内等。

徐宝璜强调“编辑之根本义”有四点，即翔实、明了、简单、材料安排之适当。他说，“新闻纸者，社会之耳目也，而访问与通信员者，又新闻纸之耳目也，故其责任甚重。”“新闻纸对于各事有所主张，或保守，或进取，或赞成，或反对，日日于其社论栏内发表之，拥护之，乃正常之事也。‘新闻政策’如作此解，吾人对于新闻纸之主张，纵或有怀疑之处，然不能咎其有一定之主张也。换言之，‘新闻政策’之当存在，无可疑也。”但如果不是这样，每天造谣挟私，这种“新闻政策”则不可取，“绝无存在之余地”。[2] 编辑对于新闻的处理，如分类、格式、访稿、新旧编辑法的选择、新闻标题等，也各有法，徐宝璜都一一作了详细介绍。

谈到社论时，他指出，“新闻纸之‘社论’一栏，乃其正当发表对于时事之意见以代表舆论或创造舆论之地也。”他主张此栏应与新闻栏严分界限，社论发表意见，新闻栏专登新闻，若混两为一，则流弊甚多。社论要想充当正当舆论，为事甚难，一要以新闻为材料，二要有透辟之批评，三要使用简明之文字，四要抱正大之宗旨，“主持笔政者，应有清白之胸怀，爱国之热心，公平之性情，听良心之驱使，作诚恳之文章，为众请命，或示人以途，总以国利民福为归。虽有所触忌，亦见义勇为，当仁不让。如是则其所撰之社论，自为读者所重视，政治因之改良，社会因之进步。”[3]

（五）新闻纸之广告

徐宝璜指出，广告收入是新闻纸最重要的收入。他说，“新闻纸最要之收入，为广告费，至其卖报所得，尚不足以收回其成本，此世所熟知

---

① 《新闻学》，第45～47页。
② 《新闻学》，第56～57页。
③ 《新闻学》，第83页。

者也。故一报广告之多寡,实与之有莫大之关系。广告多者,不独经济可以独立,毋须受人之津贴,因之言论亦不受何方之缚束,且可扩充篇幅,增加材料,减轻报资,以扩广其销路。又广告如登载得当,其为多数人所注意也,必不让于新闻。""况广告者,乃有力之商业媒介。""又广告者,从事之媒介也。……故为发达商业计,便利人事计,一报又有谋发达其广告之必要也。"[①]

徐强调发展报业广告,得以正当为规范。他说,"广告者,与货物有别。商人对于货物,无论何人,凡愿付相当之代价者,均可举以售之。而新闻社对于广告,则不可如是。当先审查其内容何如。若所说者为实事,而又无碍于风纪,则可登出之。"[②]

(六)新闻社之经营与管理

徐宝璜指出,"新闻社者,一制造厂也。国人亦称之曰报馆,或曰报社。其原料固多,而必要者,为墨、纸与新闻。其产品即每日所发刊之新闻纸。"[③]新闻社的生产,一张新闻纸之字数,多至十万言,仅至多不过二十四小时即可发行,因此必须有良好的组织与完备的设备。

新闻社的组织大抵包括编辑部、营业部、印刷部三部。大新闻社还设有审理部,徐宝璜以《纽约世界报》设立该部之目的为例说明成立审理部的必要:"增进正确与公道,纠正粗心之处,并排除弊端与弄弊者"。[④]

徐宝璜特别重视新闻纸的推销,他说,"一报之销路,与其生命大有关系。销路广者,势力雄厚,广告发达;销路狭者,势力薄弱,广告不旺。"[⑤]推广新闻纸,应注意方法当与不当,正当方法有:增进材料之品质与分量,减轻报资,发送之敏捷,发起改革运动,设立问答栏,记者个人之道。

(七)新闻通信社之组织

徐宝璜指出,"通信社中之功用最大者,当推新闻通信社。彼乃一种不出版之新闻纸,应事实上之需要而产生。"[⑥]此外尚有传记通信社、

① 《新闻学》,第85页。
② 《新闻学》,第86页。
③ 《新闻学》,第90页。
④ 《新闻学》,第97页。
⑤ 《新闻学》,第102页。
⑥ 《新闻学》,第104页。

图片通信社、小说通信社等，其作用类似新闻通信社，均为新闻纸供给相关材料。

以上七点，是对《新闻学》所涉主要内容的概述。笔者以为这七个方面，是徐宝璜这部中国国人自撰首部理论新闻学著作的学术精华。1930年黄天鹏在重版这部书中作序，从多方面评价徐宝璜其人和其书。他说：

新闻学的第一本书，本来就不容易作的，然靠先生的大才，终于脱稿了。对新闻学上的重要问题，都有精当的解剖，而厘定新闻的定义与价值，新闻纸的性质与功用，都有独到的眼光。他如采访、编辑、印刷、发行各方面，在在有"言简意赅"的精论，后来新闻学的著述，大半受他的影响。

先生是新闻教育第一位的大师，新闻学界最初的开山祖，《新闻学》在新闻学史上应居最高峰的位置，我自信这话并不是私人的谥誉……[①]

方汉奇教授对徐宝璜的新闻学有更为全面和中肯的评价，兹录于下：

伯轩先生的这部专著，成书于七十五年前(方汉奇文作于1993年)多数观点，渊源于西方，今天看来，自然有一定的局限。但是，这部书有关新闻事业普遍规律的论述，如有关报纸功能的论述，有关新闻主要因素的论述，有关新闻与意见应该分离的论述等等，对今天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研究工作者，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部书有关"新闻如鲜鱼"的论述，有关新闻工作者应该重视心理学研究的论述、历久弥新，和今天的某些新闻学研究工作者的观点，十分接近。这部书有关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的论述，以及对广告新闻、有偿新闻和新闻记者收受贿赂"以非新闻而假充新闻"等新闻界丑行的谴责和批评，虽时隔多半个世纪，仍如震雷惊电，发人深省，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②]

六、邵飘萍之《实际应用新闻学》

邵飘萍撰写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又名《新闻材料采集法》，是我国第一本论述采访的学术专著。邵原名镜清，更名振青，字飘萍，是清末民初名记者。他依据十余年记者生涯经验，又借鉴美、日新闻学著作、

① 《新闻学》，序文部分第15页。
② 《新闻学》，序文部分第3页。

并以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与平民大学新闻学讲学的讲稿为蓝本，综合编成《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由京报馆出版发行。

本书共14章，分别为外交记者之地位，外交记者之资格与准备，外交记者之外观的注意，外交记者之工具与杂艺，访问之类别与具体方法，访问时之种种心得，外交记者之分类，探索新闻之具体方法，新闻价值测定之标准，新闻价值减少之原因，裸体新闻应记之项目，原稿之外观的注意，原稿内容之注意点，余白。

邵飘萍的主要新闻观点和业务主张，较多地反映在他的另一本书《新闻学总论》，该书对一般新闻规律的阐述较多，而《实际应用新闻学》则主要阐释采访写作方面的原理与实务，但其中依然有一部分对于基本规律的论述，所以我们的分析，主要落笔于这部分内容。

由于邵飘萍两次东渡日本，有较多机会观察日本新闻事业，阅读新闻学著作，并在日本创办东京通讯社，担任大阪《朝日新闻》社顾问，因此他的新闻学观点，留有西方新闻学的影响，他的叙述中，也常常援引欧美和日本一些著名记者的采访经验和相关论述。邵氏在这本书前面的"赘言"中这样说：

> 鄙人对于新闻之学，愧未深造。本书内容要点，前年曾在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中演讲一部分，后又在平民大学讲演若干节，系参考欧美、日本学者之专门著述，及自身十余年来实地经历所得，以极浅显之理论，供有志青年之研究。①

这段交代，既说明了这本书的特点，又点出作者参考了西方学者的著述，是西学东渐的产物。

（一）新闻在报纸上的重要地位

邵氏高度重视新闻在报纸上的地位。他说：

> 报纸之第一任务，在报告读者以最新而又最有兴味，最有关系之各种消息，故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惟新闻。
>
> 报纸上所发表之评论，乃依据新闻中之事实而加以批判者，新闻不真确则评论亦自难期公平与适当。
>
> 是故报纸价值之有无大小，与新闻材料之敏捷丰富真确与否，有最密切之关系。②

---

① 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见《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81页。

② 《实际应用新闻学》，见《新闻文存》第385页。

邵飘萍分析中国新闻事业之幼稚腐败，固有政治上、社会上一切设备均尚未能脱离幼稚腐败之可怜境域，而报纸为一切事物之缩影，自不能单独发展而不受环境之束缚，而报纸自身也有幼稚腐败的地方，而亟须加以改良者就是新闻的不足和无味。因此，要改良报纸，必先从改良新闻入手。

（二）新闻记者是社会、国家和世界之耳目

邵氏指出：

> 外交记者（访员）之处地位为社会、国家、世界之耳目。人类各种新事之表现，皆难逃耳目之鉴察，其取作材料，载诸报纸，发为批评，则犹之耳目的所闻所见者转达于脑府。无耳目，则脑府顿失其功用，于此可以知外交记者所负之任务及其地位为何如矣。[①]

邵氏分析社会上不少人不重视记者之功用，原因之一是记者中"更多不健全之分子"，"不能自重人格，对于新闻材料不求实际之真相以忠实态度取舍之；或受目前小利之诱惑，或以个人意气汩没其良知，视他人名誉为无足轻重，逞其造谣之技，一旦被人指摘，则以'有闻必录'之无责任心的表示。"[②]

邵飘萍对报业流行的"有闻必录"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 愚意我国报纸中时见所谓"有闻必录"之无责任的表示，乃最易流于不道德之"专制的"恶习。以革新进步自任之外交记者，万万不可沿袭之，以招社会之厌恶与轻视。曩在北京大学及平民大学讲演新闻之学，曾对于"有闻必录"一语再三攻击，愿有志于新闻事业者，振起其责任心，凡事必力求实际真相，以"探究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此愚所不惜叮咛反复，冀学者能始终尊其职务，庶可以引起社会依赖之心。[③]

（三）新闻记者之资格与准备

邵飘萍认为，记者为新闻界战斗之壮士，其所处地位极为重要，所以对于新闻记者的资格，应有很高的要求，而有志记者工作的人，则必有很好的准备。邵飘萍指出，记者的资格与准备，包括三个方面：品德、知识与身体。

---

① 《实际应用新闻学》，见《新闻文存》第387页。

② 《实际应用新闻学》，见《新闻文存》第386页。

③ 《实际应用新闻学》，见《新闻文存》第386～387页。

1．品性为第一要素

邵飘萍指出，"外交记者发挥其社交之手腕，与各方重要人物相周旋，最易得一般社会之信仰，亦最易流于堕落不自知而不及防，盖因其握有莫大之权威，则种种利欲之诱惑，环伺于左右，稍有疏虞，一失足成千古恨矣。故外交记者精神上之要素，以品性为第一。所谓品性者，乃包括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此外交记者之训练修养最不可缺者。"①

2．必需之知识与经验

邵飘萍认为，新闻记者依分工不同，必具有一二门专业学问。在中国，由于记者分工不能如欧美日本新闻事业发达之国家那么细，每个记者以一人而兼各种事物之访员，故具有一二门专门学问外，尤须富于观察各种事物之常识，且必谙熟几国之语言，否则其观察力活动力必将减少，导致听信不合理与无常识之风闻，即作为消息材料以欺阅者。又凡为外交记者于专门学问及普遍常识之外，尚有几种独特之智能，此类智能，大部分系积经验而成，惟天才优者，则加以经验更易发挥其能力。邵氏认为，外交记者之独特智能，包括知新闻之价值、观察力推理力联想力、细密与注意、机警与敏捷、善于不计个人名誉（个性抛弃）和保密新闻来源之能力、及把握事先声明不发表和知事实而不予登载的能力等等。

3．身体之健康

邵飘萍认为，由于外交记者须随政治上、社会上之事故而活动，有时不眠不食亦不觉其苦，所以其生活最不合于普通卫生之规则，凡预期成功而尽职之决心者，必有健康之身体方足以副之。否则身体影响于精神，成功即属无望。所以他提出，凡准备为外交记者的人，少年时代即当注意于体育，练成极强固之身体，方可以供活动而耐勤苦，此为未入社会以前之准备。此外，外交记者须与各方人士周旋，空气污浊之交际场所如嫖赌等应酬切勿卷入，以防身心受害。

（四）新闻价值及其测定标准

邵飘萍主张外交记者对于新闻价值之有无大小，应有充分了解，"一闻而知香色味之立能辨别，固须学识经验两者俱备，养成一种特别神经。"②他

---

① 《实际应用新闻学》，见《新闻文存》第388页。

② 《实际应用新闻学》，见《新闻文存》第450页。

参照美国新闻学者的论述，提出测定新闻价值有四个标准：

1．爱读者之人数。他提出，最佳之新闻即为贻爱大多数人以最大兴味者。这是因为，新闻事业，本含有树言论权威及使营业发达两种意味，两者互为因果，皆须以使有多数人爱读之手段。所谓有价值之新闻，第一即在多数人爱读而已。于此应研究多数人何以爱读？则必直接间接与多数人不无关系，而为彼等所皆欲知之事。

2．时机之适当与否。"新闻"云者，如其名之所示，以新为主，故今日之事为新，昨日之事为旧；昨日之事为新，前日之事为旧；此时之事为新，前一时之事为旧。新闻之得时与否，又不仅以早为标准，而有"适当时机"之意味。有的事不宜早报，其有"时机不适"之弊；有的旧事可作新事记载，谓有适当时机。

3．距离远近之关系。凡发生于本地及近处之事，比诸远处者价值为大，盖多数读者皆以自己为中心，故此中心之周围，愈近而感情愈切，凡本地之事自较诸远方者为注意。

4．兴味之集中与变迁。邵飘萍指出，西方国家人民对于政治问题，中国人民对于社会经济皆为关心，因为这些问题皆同百姓利害相关，所以阅者有兴味。这种兴味是经常变动的，所以记者当时时注意世事之变迁。能满足阅者兴味的新闻，是有价值的新闻。记者对此不可不加以深入研究。

邵氏在引述西方新闻学者提出的上述四项新闻价值测定标准时还指出，由于种种因素的原因，新闻价值是可以减少的。所谓"减少"，则此类新闻非无相当价值，惟因有瑕疵而减少。其原因大致如次：

1．含有广告的意味者。"所谓广告性质者，不仅在商品上用之，医生律师之名誉，文学家艺术家之作品，军人之战功，官僚之治绩，是皆广告而已。……凡报告新闻之外另含其他目的者，即系广告的性质。外交记者如遇半含新闻半含广告之材料，可削去其广告（有作用）之部分，若系全有作用者，则直弃之如遗，绝勿受人愚弄转以愚弄读者，否则即大损害新闻之价值。"①

2．揭发人之阴私者。"报纸之性质，在有'公告性'。若与国家社会无关之个人私事，竟为揭发于报纸乃违背德义，非人道之甚者。故凡个人私事，不问其善恶，皆不得用作新闻之材料；否则即大损害新闻之

① 《实际应用新闻学》，见《新闻文存》第458～459页。

价值。"①

3. 有害社会风俗者。"报纸为社会之教师，其感化力之大，殆过于电影戏剧，故凡有害社会风俗之事，不可作为新闻而任意披露之。所谓有害社会风俗者，最当注意之点，为猥亵与残忍，淫书画淫戏之禁止。与夫刑法进步行刑秘密，无非恐有害于社会风俗，而增长其淫乱性与残忍性耳。然则报纸上又安可违反此义而不加检点乎？"②

（五）采访心理研究

邵飘萍积十余年从事外交记者之经验，提出采访过程中对被采访者心理把握的问题。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他指出了这样几种情况颇给人以启发：

1. 采访前要略知采谈对象。他说，"外交记者对于访问之人，固希望谈话结果之非常圆满，则其人与各方之关系不可不略知之；否则谈话中即易发生龃龉不快之感，致访问之失败"。③

2. 谈话时之擒纵。"外交记者之访问，最希望其人之健谈，但具体之问题，外交记者不可不预先设定，至谈话时乃用擒纵之方法。……当其谈话奔放时，则设法擒之。若其沉默，则设法纵之。"④

3. 注意对方面目。外交记者对访问人谈话时，必要时注视对方之面目，"其理由，一则表示敬意，世有对人谈话而目视他处者，实至不敬之举动。二则可以知所言之诚伪，凡当面谈话之诚伪，与书面所述之诚伪，必在谈话时为辨，所谓'察言观色'；善鉴别者自不能逃其耳目。三则可以知对方对我之意向，如其人已倦于谈话，或者他事萦于心中，或对我已有不快之感，外交记者注视而即知，应立图补救之策。"⑤

4. 留意意外线索。外交记者之对人谈话，尚有谈话之外的材料，如被访者之状态、癖好等，皆应留意。得到这种意外材料，记者应注意两点，一是"不可即示惊诧而对之穷追其所以然，否则彼将觉悟而后悔，或即要求'顷所言者，我不应泄漏，请勿披露于报纸'，则等于未闻矣。"二是"不可立即告辞。如闻一语觉为重要而起立告别，则其人又将觉悟而为上述之要求，是仍不能作为新闻之材料也。故必闻之泰然，若未闻

① 《实际应用新闻学》，见《新闻文存》第 459 页。
② 《实际应用新闻学》，见《新闻文存》第 460 页。
③ 《实际应用新闻学》，见《新闻文存》第 412 页。
④ 《实际应用新闻学》，见《新闻文存》第 413 页。
⑤ 《实际应用新闻学》，见《新闻文存》第 414 页。

者，使其人不觉，无所约束，翌日披露于报纸，彼固不能责我也。"①

5. 具备应变能力。访问时记者应"吾人胸中，自有经纬，取舍井然，双目炯炯，注视其面，以察所言之诚伪，以表高尚之敬意，纵知其误，当时绝不说破之，其欲言不言，半吞半吐之语，尤当加以注意，或即擒住问之，勿令逃逸，以观察力推理力联想力并用，未有不明若观火者。"谈话时，"最忌之发问"即为"有何新闻否乎？""无异给谈话者以一大警告，谓'尔不可妄言，我乃图取新闻来也。'此时谈话者必答曰：'没有什么新闻。'立加警戒，从此缄口不言矣，此大违于访问之目的者也。"谈话时，也不可用纸笔抄录，"最有关系之秘密消息，每闲谈中无心出之，在谈者或未因新闻记者在前而特加戒备也。若遇幼稚之记者，无听言记忆之能力，突出纸笔以从事抄录，是无异警告谈话者曰：'现在尔所云云，明日皆在报纸上披露也。'谈话者一得此种警告，或即中止不复续谈，至少亦必立减其真实性与秘密性之价值，矫揉造作而后出之，以免除其自身泄漏机密之责任。故优良之外交记者，听到重要处，心中十分注意，而外形毫不惊诧，惟泰然首肯，使人敢于尽量发表，及至握手道别。"

对于邵飘萍所著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后人给予很高评价。作为第一本应用新闻学著作，在基本理论上也有重大建树。徐培汀、裘正义两位学者有这样的评价：

> 邵飘萍这本《实际应用新闻学》著作，既有首创中国新闻采访之功，但也不可避免反映早期新闻学研究中的弱点，即：1. 从整个学术体系来说，尚未超出西方资产阶级新闻采访的框架结构与学术体系；2. 尚未从"经验型"探讨上升到理论性研究；3. 书中也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如认为记者是"无冕之王"，可以超越阶级而独立存在，这是时代的局限。②

从徐、裘两位的评价看，对邵氏的首创头功似肯定还不够充分，而在当时要超出西方学者的体系是不可能的。实际上，邵氏的理论见解与经验分析，至今仍有相当的现实意义，说明邵氏的科学前瞻性和对采写规律的深刻揭示。对此，笔者认为应有全面的更多的肯定。徐、裘两位指出的三个不足，确实存在，这是"时代的局限"，这种解释是历史主义的、实事求是的。但这些不足，不影响邵飘萍作为在中国建树应用新

---

① 《实际应用新闻学》，见《新闻文存》第414～415页。

② 参见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324页。

闻学第一人的光辉。

七、戈公振之《中国报学史》

戈公振系中国报人与新闻学家,先后在上海国民大学、南方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新闻系任教。1925 年为国民大学报学系讲授中国报学史,遂一边教学,一边著述,著有《中国报学史》、《新闻学撮要》、《新闻学》等书。其中《中国报学史》作于 1926 年,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1928 年再版,1930 年三版,1935 年四版。解放后,1955 年三联书店重印,中国新闻出版社于 1985 年再印。1943 年在日本曾出版日文版,更名为《支那新闻学史》。港台也分别翻印过此书。

在戈氏《中国报学史》之前,已陆续有几本报刊史著作问世。但这些著作,有的是地方报刊史,如 1917 年姚公鹤出版了《上海报纸小史》,有的仅限于中国范围和新闻领域,如蒋国珍早于《中国报学史》两个月出版了《中国新闻发达史》。戈公振的书则不同,他一方面讨论了同报刊相关的许多新闻学问题,另一方面从文化学角度,通过中西两地的文化比较,有叙有论地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国报刊史。因此,在中国新闻学术史上这本书占有重要位置,是历史新闻学的奠基之作,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而全面研究中国新闻事业史的开创性学术著作。

《中国报学史》全书分绪论、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之现状等 6 章,叙述了从古代邸报到 1926 年初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演变的全过程。书中辑录了大量报刊原始材料和报刊插图,十分珍贵。戈公振在书中对外报的文化侵略和清廷及北洋军阀政府的新闻统制政策进行了有力的鞭挞,成为本书的一个鲜明特色。

按徐培汀、裘正义两位学者分析,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从新闻学角度考察,研究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报刊史是一门科学

戈公振指出,"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他分析说,"近年我国留学欧美之对报纸有研究者,日有归国;同时欧美之名记者,又多来我国考察,足迹所至,必有关于报纸之演讲及种种讨论;而报馆因营业上之发展,亦渐有改良之倾向,于是报学之在我国,遂引起兴味而下一种子"。[1] 徐、裘两位认为,戈氏是中国第一位把报刊史作为一门学问来

---

① 《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 1928 年再版,第 2 页。

研究的学者。

戈氏的上述引语表明，即使是中国的历史新闻学研究，也有着欧美的影响。1927年2月，他曾自费出国考察欧美、日本新闻事业，并出席同年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新闻专家会议，这对戈氏日后的新闻史学研究及《中国报学史》的出版，也有推动作用。

(二) 从文化学角度考察报刊史

戈公振从中国文化的视角提出中西报纸发展的不同，指出我国古代就有官报，在世界上为最早，何以独不发达？“其故盖西人之官报乃与民阅，而我国乃与官阅也”，“故官报从政治上言之，固可收行政统一之效；但从文化上言之，可谓毫无影响”，中国“官报之惟一目的，为遏止人民干预国政，遂造成人民间一种‘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之心理；于是中国之文化，不能不因此而处于黑暗状态矣”。[①]至于外报对于中国文化之影响，既有“中西文化融和之机大启”，但其目的不外传教与通商，“以厉行其殖民政策而已”[②]。从文化流弊而言，“一部分乃养成许多boy（即‘西崽’）式之人才，舍本逐末，为彼辈之走狗，得不偿失，无过于此”。[③]

(三) 研究报学以改进新闻工作

戈公振分析古今人们对报纸的重视与评价有所不同，认为今人对报纸之重视，同报纸之作用日益巨大是分不开的。他说，“往者社会之视报馆，盖卖朝报之流亚，服务其间者，文人之末路也”，记者的社会地位很低，报刊在民众心目中信誉不高。“今报纸渐成社会之日用品，人民之耳目喉舌寄之”，于是报刊和上面的新闻作品受到人们的欢迎，于是采访有学，编辑有法，学校列为专科，书肆印为专籍，这一切变化，皆由于“报纸之最高目的，期合乎人群之需要”。戈公振于是积极倡导研究报学，以进一步改进新闻工作。[④]

(四) 主张实行言论自由积极反映舆论

戈公振对于洪宪以后军人柄政言论自由受损表示不满，说，“言论自由，为报界切肤之问题，此问题不解决，则报纸绝无发展之机会。”[⑤]

---

① 《中国报学史》，第65页。
② 《中国报学史》，第372页。
③ 《中国报学史》，第112页。
④ 《中国报学史》，第382页。
⑤ 《中国报学史》，第378页。

为此，他认为，“吾意服务报界文字方面之人，既以先觉自命，为争绝对的言论自由，应先有一种强固的职业结合。纵报馆之主持者以营业关系，不得不屈服于非法干涉之下；而自主笔以至访员，为尊重一己职业计，则不必低首下心，同一步骤。果全体认为有采某种行动之必要者，则全体一致进行，宁为玉碎，无为瓦全，有背弃者共斥之，使其不齿于同类。总之，在位者不论何人，绝不喜言论自由，其摧毁也亦易。一方面固在报界一致团结，以与恶势力抗，而一方面人民又当为报纸之后盾。随时防止恶势之潜滋，不稍松懈。盖思想不能发表，徒成空幻，思想者必甚感苦痛，而郁积既久，无所发泄，终必至于横决，国家命运之荣枯系之。拥护言论自由，实亦国民之天职也。”①

戈公振又主张，报纸要积极反映舆论，指出，“民主政治，根据于舆论；而舆论之所自出，则根据于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谓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哭泣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音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有价值而非仿造。否则报纸自报纸，国民自国民，政府自政府，固丝毫无关系也。”②

据徐、裘两位介绍，后人对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这本书也有批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书名，实际是报刊史，书名却是报学史，报学者，乃关于报纸之学说，戈氏的这本书以报刊历史为主体，论报学内容并不多，造成书名与书中内容名实不符。二是关于对“新闻形体”的解说，后人颇多议论。关于这一点，略作介绍。

戈氏书中有这样一段评述：

> 关于新闻之形体之见解则有三：（一）主张为发生事件之自身，（二）主张为发生事件之报告，（三）不云发生事件，不云其报告，直接主张为时宜性及一般性之自身。（一）与（二）根本为同一旨趣，但若求适合于报纸内容所限定之标准，则（二）较（一）之见解为适当。但若以（一）与（二）为同一旨趣，根据布乃雅（Bleyer）之见解而推阐之，则易陷于谬误，以为发生事件之自身（即固定事物）即为新闻。所以取此见解者，由新闻之具体的事项以求新闻与否之甄

① 《中国报学史》，第378页。

② 《中国报学史》，第381页。

别，此于实际上虽若便宜，但于报学之处置上，有散漫而不明显之憾。由科学的眼光以决定新闻之形体者，即为（三）之见解，即哈润登（Harrington）与弗润开宝（Frankembery）之性质说（quality theory）。由此见解而言，性质与具体的事实乃同一体，其结果可以避免谬误，不致以新闻事实之自身为新闻与否之区别，只须包含上述性质之事实，均可作为新闻，而广告一物为新闻与否之问题，亦即易于解决。盖新闻既作为一般抽象的性质而加以承认，同时又将新闻作为一种具体的特别性质带有所谓报纸之背景，详言之，即报纸内容之一般发生事件，当然含有时宜性及一般性。此二者非对立而存在，乃以联合而互相维系之状态，作为新闻之要件。新闻既为一种性质，故由感觉力而采取以后，其时乃发生主观的外形。①

后世有人指责戈氏的此种论述是资产阶级新闻学中的"性质说"的表现。从上文分析，这种批评也许是站不住脚的。戈公振并不反对新闻本源于事实，但并非一切事实皆可人新闻。他主张，只有具备了时宜性和一般性的事实，方可成为新闻。因而他把时宜性与一般性同事实一直看成是新闻的本源即"形体"。在《中国报学史》中，所谓时宜性，戈氏指出，时宜性也就现实性，但现实性一词不如时宜性，因为后者强调是事实之后又复强调是新的事实。"若将现实性及时宜性除去，则报纸尚有何物存在乎？"②所谓一般性，戈氏又指出，"报纸之一般性，指普通报纸之内容有一般兴味而言。""于是一般性与时宜性，充塞于报纸之内容；报纸之所以能独立存在，其基础在此，其所以根本巩固之原因也在此。"③

戈公振对于新闻事业史有广泛而卓越的研究，对于新闻理论也常常有浓厚兴趣和深刻论述。在《中国报学史》中如此，在其他著作中也如此。在其病逝前三年撰成的《新闻学》（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中，有不少精彩的理论章节，兹录摘几节说明之：

……人类为着生存，时时要防野兽或异族的侵害。有时需要的力量，要超过一个人或一个部落，到此时才知道群的利益。而传播消息的方法，也就因此发生。因为言语和手势的效果，所能达到

① 《中国报学史》，第18页。

② 《中国报学史》，第10页。

③ 《中国报学史》，第12页。

的范围很小，所以野蛮人，有将木段挖空，敲之发大声，以互相告警的，这就是一个例。后来又有摇铃击鼓种种方法，到现在还习用。不过声浪所能达到的范围，仍是有限，所以后来又有日间举烟夜间举火的方法。在我国北方，有许多烽火台，到现在还存在。而欧洲举火的方法，据云当时有很精确的，仿佛后来的旗语。经后人逐渐改良，遂成了今日应用极广的电气符号的基础。①

这段记述，把先人新闻与信息传播活动十分具体而详尽地陈述出来了。戈公振在书中对于帝国主义通讯社侵害中国的新闻权也提出过批评，这种见解是很敏锐的、超前的。他说：

中国报纸上所登载的国外消息，大部分是路透社所供给，这是人人知道的。同时因为到现在还没有一个通信社足以代表全中国，所以有人要购买中国消息的，也只有向路透社接洽。所以从新闻权上说，路透社却公然的做了中国的代表，同时中国的消息，也就成了他的专利品。②

所以我们要有一种觉悟，以国家为前提，由政府和报馆协力合作的组织一个大规模足以代表全国的通信社，一方面以中国真确的消息，供给全世界；一方面阻止外人在中国宣传。如此，我们新闻界，方有自立的机会。进一步为世界新闻事业整个发展，使彼此民族间更得接近与了解计，我们不也应该负起这种责任吗？③

戈公振很早提出过消息是商品的观点。他在这本书里写道：

等到交通便利以后，人类接触的机会较多，不能像以前老死不相往来，休戚毫不相关了。所以一种消息，在人们聚集的地方，往往能流传很广，成为街谈巷议的资料，因为人类有求知和求先知的欲望，所以就有人迎合这种要求，而公开通信就发生了。从此以后消息就成了商品，只要出代价就可以买得新闻。④

对于报纸的社会属性，戈公振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

报纸以报告新闻为原则，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组织复杂的社会中，更成为流通消息，交换意志的惟一枢纽。所以要实行

① 徐宝璜：《新闻学》，商务印书馆1930年4月初版，第1页。
② 《新闻学》，第24页。
③ 《新闻学》，第25页。
④ 《新闻学》，第35页。

民治政体，全在报纸能负起责任去做。在君权时代，本无民意可言，等到民报发生，才获得言论自由。不过一部分却为政党所操纵，只能见到一党的意见，不能见到全体人民的意见。一部分又为商人所把持，只见到一般资产阶级的意见，不能见到全体平民的意见。这都是一种缺憾，是不能为讳的。①

戈公振在书后还表示了对未来中国报业的希望与理想，他说：

所以将来社会进步，人民智识和道德的程度日高，报纸虽不必收归国有，却可由公众推举道德家、法律家、学问家、和优秀的新闻记者等人，公同主持编辑业务。就是希望这种报纸，真能发挥民治精神，有春秋笔则笔削则削的无上权力，不为任何势力所左右。这种趋势，已经逐渐成熟，在先进国的最优良的日报，已经多少带“这种色彩，这也就是我们对于报纸的一种理想。②

八、任白涛的新闻学著作

这一时期还有一位新闻学者必须提到，那就是任白涛，他从西方新闻学著述中移植不少有助于中国新闻学的东西，又在理论新闻学和应用新闻学以及历史新闻学等三方面均有卓越的建树。他1916年即赴日本留学，在攻读政治经济学的同时又参加大日本新闻学会，成为它的首届会员，并于1916年冬至1918年夏完成中国人自撰的第一部《应用新闻学》初稿，但却迟于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于1922年(李书版权页如此注明，疑为1923或1924年)11月方出版问世。1935年至1937年任又完成《综合新闻学》4册6卷，130万字，其中第一、二两册于1941年出版。可惜的是，第一、二两册排印差错太多，任撤回三、四两册，致全套书未有机会出版。

《应用新闻学》一书前有任白涛自己写的短序一篇，记录该书从撰著到出版用去六、七寒暑的时光，从中颇能看出当时中国第一批新闻学研究涉足者的相似经历和勤奋，以及向西方新闻学学习与撰述的情况。这里转录文首一段：

忆吾少小之时，即嗜报纸成癖。逾冠，与海上二三家报社缔特别通信之约，而遂置吾身于新闻界，此十年前事也。然吾当时对于新闻事业，兴味虽极浓厚，却甚不满意于中国新闻界，偶有感触，辄

① 《新闻学》，第38页。

② 《新闻学》，第39页。

记录之。若于新闻杂志中见有涉及新闻纸及新闻记者之事，无论残简零篇，更悉珍重收藏。私愿于他日为一书，初未知有所谓"新闻学"也。嗣以祖丧退职。继复东渡三岛，始知二十世纪之学术界，早有所谓"新闻学"者，插足其间，而流布三岛者，且亦累月经年矣。课余，于坊肆遍搜新闻学一类之典籍，旁稽各种新闻杂志，终仿杉村氏著"最近新闻纸学"之体例，编制此书，一九一六年冬属稿，一九一八年夏完成。①

这段文字一是叙说了任白涛对新闻学研究的执著，二是交代了《应用新闻学》借鉴了日本新闻学者杉村广太郎著的《最近新闻纸学》一书的体例。《应用新闻学》分引论和总论（含新闻事业与新闻记者、新闻社之组织及报纸之制作两章）、搜材（含概说、新闻之定义及价值、新闻之搜集、实际上之访事职务四章）、制稿（含概说、文稿之实地制作两章）、编辑（含概说、编辑部之组织、编辑部之搜材、编辑上之实务四章）四编，另有附编欧美报纸史略和余录世界的新闻学，后者系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兼万国报界大会会长威廉博士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记录。

从全书看，《应用新闻学》阐述了从报社组织到采写编辑全过程中的新闻业务知识，其间仍有大量涉及理论新闻学的精辟论述。下面就这方面的主要论述作点评介。

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中，涉及理论新闻学论题的，主要在第一编总论和第二编搜材中的第二章新闻定义及价值。其中的主要观点有：

（一）报纸之威力

任白涛从英国政治家巴克称新闻记者为宪法上之第四威力谈起，指出报纸巨大的社会威力。他说：

> 夫报纸之威力，既于君权方盛、议会万能之十八世纪之英国，博如斯之定评。若民主思潮澎湃冲激之二十世纪之报纸，于重大威力之上，更加重大之使命焉，概可知矣。世人又有谓假令孟德斯鸠生于今日，决不仅唱三权分立之学说，良以监督三权，俾不陨越，而对于凡百社会之向上发展，又复丁宁恳切，指导诱掖，以操持思想界之主权者，固有赫赫之报纸在也。要而言之，报纸者，近世文明产生之原动力也。报纸之发达，与世界文明之发达，为正比例。但就一国家而论，内治无报纸为前导，则修明无望，外交无报纸为

① 任白涛：《应用新闻学》，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9月三版，序第2页。

后盾，则失胜难期。故报纸威力之雄伟堂皇，殆有非专制君主之压力，万灵宗教之神力，以及坡靡金汤之炮火，纲维乾坤之电气，所可相提并论者矣。

民本政治，胜于官僚政治者，要在不以少数私人决国事，而以公众舆论决国事。健全舆论之造成，民治国人民之责任也。以舆论而行国家之政治，民治国人民之权利也。苟无报纸为之提示、倡导，则焉能造成健全之舆论，又何由得预国家之政治。故民治国家之报纸，实为造成舆论之冶金炉，而运用政治之推进器也。①

（二）新闻事业之特质

任白涛对于报纸等新闻事业性质有较深刻的认识，他指出现代新闻事业的特质可用“公共的”、“人类的”、“教育的”、“艺术的”四点加以概括。他说，“新闻事业特质之第一应述者，则社会之公共机关是已。彼营利的或名誉的事业，只计及少数人之利害荣辱为标准。主张则透明无色，态度则公平不偏，是为经营新闻业者当守之要则，报纸之权威信用，皆视尊重此要则之程度为差等。”②

任白涛强调，报纸业务不能以一国家或一民族为目标。因为一国家一民族只是人类之一部分，维护一国家或一民族之福利，更须顾及全人类之福利。所以“举凡足为吾人类之障碍者，皆当努力排除之，是又现代报纸中所应具之绝大要素也。”③是故将人类之工具，列为新闻事业又一特质。

任白涛指出新闻事业的另一特质是它的巨大的教育功能。他说：

处今之世，能日日告我以新事件，供我以新知识者，莫报纸若矣。吾人一日不读报纸，斯一日与社会事情相隔离，即一日逊于时代之进步。故报纸实为广义的社会教育机关，而其功效之神速，绝非学者之讲述、政客之演说、宗教家之劝导，所能届及者也。④

报纸之教育有功用，非专恃乎言论、批评。即片片数行之记事中，亦含有多少之智识，可为读者新见闻、新观察之资料。例如读外国电报，则知世界之情势。读政治记事，则知政局之表里。读商

① 《应用新闻学》，第1～2页。
② 《应用新闻学》，第4页。
③ 《应用新闻学》，第7页。
④ 《应用新闻学》，第8页。

况记事，则知经济市场之动静。读市井杂报，则知百事作息之真象。总报纸之全部，殆无一而非实用学问之种子也。[1]

为达到这种教育目的，任白涛指出报纸的写作与编排，务以通俗为最重要。他说："报纸既负有社会教育之重任，故其论评、记载，务以通俗为旨归。其促进社会之迁善也，亦宜渐而不宜急。抑无论何种事业，太过于社会程度，则难告成功。世运之进步，非将百步、五十步、一步飞渡，乃步步循序而进者也。故制作报纸妙谛，在使社会了解，即其见地只较社会先一步，示进步之方向于社会，夫然后始能满足社会之需要，以尽其诱掖指导之责任也。"[2]

讲到新闻事业的艺术的特质，任白涛指出，"报纸上之文字，非仅为活字之行列。于材料之选择，记事之标题，纸面之编辑，皆含有多量艺术的要素。"他以报纸同公报作比较，分析报纸对于艺术性显示的重视。他说，"试取公报与报纸比较对照，则公报不分问题之轻重，事件之繁简，只以依样葫芦之方法，记载之、编辑之已耳。若夫报纸，则能使职务旁午之读者，随手翻阅，一瞥标题，即可判别问题之意义，明悉事件之要领。盖以报纸上，处处皆施有足以感动读者之艺术故耳。"据此分析，任白涛提出，"报纸对于社会之情状，若单为平面的叙述，则决不能鞭人题里，穷形尽象，以餍读者之希望，必须为立体的观察而后可。换言之，事物之来，不仅为直线的处理，宜为曲线的描写，是即艺术作用之极致也。"[3]

任白涛已经看到了现代报纸不仅拥有正面的积极的作用，也同时具有负面的、消极的作用，这是相当难得的。他说：

> 报纸更有一绝大作用，即潜入人心陶冶情感是也。此种作用，能使吾人之心理感奋、默化，使吾人之情操，进于纯正优美之域，同时也能蠱惑群众，诱起不良之现象。前者，基于热诚的爱群观念，及社会的同情。后者，则造孽之妖魔也。约言之，报纸，实备有造人第二天性之能力。[4]

（三）新闻记者之地位、资格及修养

任白涛借用西方社会对记者的比喻，说明记者地位之重要。他说：

---

① 《应用新闻学》，第 8 页。

②③ 《应用新闻学》，第 9 页。

④ 《应用新闻学》，第 10 页。

"无冕之帝王""社会之师表"等语,为从来对于记者之尊称。拿破仑以记者之笔,胜于三千毛瑟,更为至有意味之喻言。彼所以享有如是之隆誉,具如是之伟力者,以彼之背后,依彼毫端腕下而为进退者,既不知有几千几百之人民,彼之褒贬,俨同史乘,且经几千百年而不能磨灭者也。①

正由于新闻记者具有如此大之功能,所以新闻记者自然应有大公无私之人担当。任白涛说:

新闻记者之生涯,要在捧忠实笃诚之肝胆于真理、事实之前。其生命、其觉悟、其勇气、其良心、其情感、悉为真理、事实所同化。故不可不排小我,抛小主观,以服其任务。质言之,新闻记者必为纯正无垢之自然人,始克完成其光辉赫赫之天职。②

任白涛讲到新闻记者之立场时,有一段论述是需要作些分析的。他说:

新闻记者更有一最要之自觉,则社会之第三者是也。彼但将应有之事实,观察之、记载之、批评之。彼之眼中,不许有敌我之区别。彼之心底,不许怀某种之成见。不问如何之时际、场所,其地位、态度,常为超越的、独立的、客观的。质言之,新闻记者实为冷静慎重之社会检察官,提出案件之材料于社会,是则其惟一之任务耳。③

从词句上看,新闻记者"不许有敌我之区别",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能的。记者怎么能不分敌我,没有爱憎呢?实际上,任白涛自己在这本书里也处处表示出对敌寇侵犯我国的憎恨之情。从实质上体会,他在这里主要讲的是记者应该尽量做到客观公正,不带偏见和成见。笔者主张从本质上理解任白涛的上述论述。

任白涛十分看重新闻记者同其雇主——新闻社、报社老板的关系中保持自己尊贵人格。他说过一段当时一般学者极少提及的话语:

新闻社主与社员之关系,与商店之于雇佣人,迥乎不同,而对于从事编撰之记者犹然。譬如诸学校教师,个属以金钱聘定者。若谓校长与教师有雇主与佣人之关系,愚夫亦必笑其谬,盖就形式上言,虽为主雇与被雇,而因其职务之性质,二者之关系,确有不可以概论者。新闻记者即恰如学校之教师,决非社主之佣人。

①②③《应用新闻学》,第11页。

除受相当俸给外，其地位、资格、及人格的权威，于社主之间，无些微之高下。有时其地位比较社主尚觉尊重者，以社主只为一社之主宰，而未必能亲执记者之业务故也。要之，记者服务于新闻社，须有巩固之保障。否则恐俳优其人、屈曲其笔，而言论之声价扫地矣。①

对于新闻记者的资格及修养，任白涛首先提出，新闻记者应有健全的常识。他指出，一般人皆要有知识，方能胜任职务，而新闻记者光有一般知识不够，必须有相当健全的知识，"新闻记者必要之常识，比诸一般常识，尤当较高一等，即于变通常识之上，又须有相当之素养。详言之，新闻记者必有大学卒业程度之基本知识，更为潜深之研钻，明己国之情事，通世界之趋势，遮几可全其'无冕之帝王，'社会之师表'之责任。更退一步言之，新闻记者纵不必以极高深之专门知识立身，然无论何种学者之学说，悉不可不理解之，且能对之下明确的观察，即所谓高等之理解力是力。故新闻记者必要之常识，谓之高等常识。"②

任白涛指出，新闻记者仅具笔墨之伎俩，或文学的才力，还是不行的，"新闻记者之职务，决非弄墨舞文之徒所能称。"③新闻记者真正之能力，在对于事实正确之观察，明了之记述，公平之批评，则善矣，而尤其传事实之"真相"为主眼。记者只有有形的学问，即前述大学卒业之学力是不够的，还须有无形的学问即经验。"必学业与经验兼备，然后方可称为优秀之记者。"④

为习钻知识，任白涛主张学习外国一主笔的言论"起卧于报纸之上，食墨斗"，从社会实践中学习。要记者通一二种外文。在当时，任白涛尤其主张要熟习日文，因为日本军阀对于中国张牙舞爪，怀抱种种幻想。新闻记者研究学问之方法，与他种专门学者稍有不同。"新闻记者之学问，决不可离乎'现在'及'实际'之二点。例如研究历史，由古代及于中世、近世，普通之顺序也。新闻记者以现在为出发点，而及于过去、渐次追源于古代。即非由原因至于结果，乃由结果溯及原因，同时更须注意于'将来'即问题之开展是也。他如政治、外交之研究，尤应以现在情势为集中观念。"⑤

---

① 《应用新闻学》，第 12 页。

②③④ 《应用新闻学》，第 13 页。

⑤ 《应用新闻学》，第 14 页。

对于知识方面的要求，任白涛强调：

新闻记者必要之资格，就时间言之，第一，对于现在，须能理解迅速。第二，对于将来，须能观察正确。第三，须熟谙最近过去之事情。就空间言之，于包罗万象之宇宙中，能看出问题，并能注意面积广阔之问题。必将此两个概念确实保持，则新闻记者之知识，庶可圆满运用也。①

任白涛指出，新闻记者资格与修养的第二个方面，即要求记者具备刚健的意志。他说：

新闻记者，因其职务之尊严，地位之崇高，故当具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之精神。笔可焚而事实不可改，身可杀而良心不可夺。若此浩然精神所赖以培养而保持者，刚健之意志力也。

新闻记者之理想，当沐化于美善二字之域，决不许稍涉黑暗龌龊之乡。其步履偶一失足，即由九天而坠九渊。此危险之机会与恶魔，殆无时不追随于彼之周围。极言之，新闻记者之敌人，固不仅为社会之蠹寇、神奸。即于彼之自身，亦当念兹在兹，以自觉之刃，拟于喉间，以励精其职务焉。②

任白涛还讲到新闻记者的报酬问题。他说，新闻记者所受之物质报酬，有时比他种职业者少，但他种职业者不能获得之精神报酬，新闻记者则独享之。“斯因为新闻记者之所荣，亦即新闻记者人格堕落之机之所伏也。彼意志力薄弱之记者，不知精神的报酬为可贵，徒津津焉唯物质的报酬之是求。于是资本家、野心家，伺其弱点而饵以所欲者，以买其欢心，使曲其笔，作一己之企图，是为新闻记者通有之怪状也。此种怪状，纵于法律上幸免构成其罪名，而于道德审判之前，则决不容赦。即其精神上必受自然之责罚，所谓良心之制裁是也。”③

（四）新闻之价值

任白涛没有提出关于新闻的定义，但他引进过一位美国学者的新闻定义，即“以适当机敏之方法，寄兴味于多数之人者，‘新闻’也。”“与最大多数读者以最大兴味者，最良之‘新闻’也。”④

---

①②《应用新闻学》，第15页。

③《应用新闻学》，第16页。

④ 参见《应用新闻学》，第28页。

任白涛依据这一定义提出，在对事件进行考量时，会提出："当有几许读者对此而有兴味乎"的问题，此类考量，即为"新闻价值"之问题。

任白涛说，"'新闻价值'之前提要件有三，即'新''速''确'是已。此为稍具新闻知识者之所知。后二者，诚千古不易之定论。至于'新'字，有时未必因之判断'新闻'之价值。即其事若与时下问题相关切，纵极陈腐，亦有价值。"①因此，判断新闻之价值，在于看引起兴味否及多少，凡可满足吾人之希望、动起吾人之情感者，即为有兴味之新闻。

任白涛根据美国教授德列亚的分析，转述了构成新闻价值的几个"价值标准"，即非常事、竞争、人类的兴味、儿童的兴味、动物的兴味、娱乐及嗜好之兴味、地方的兴味、著名的兴味、家庭及职业之兴味以及兴味的结合。他对各项标准作了简略的解释，举出若干事例以作示范。

非常事一项，任白涛说，"非常事，奇怪事，因其背离吾人生活之常态，故无论于何处发见，皆足惹人注意，动人兴味。一般人之日常生活，循规蹈矩，以从事其业务，吾人对之，决不能动起何种兴味。"因此，"优秀之记者，能于寻常事件中，看出异常之部分，特别加笔，以动读者之感兴。"②

竞争一项，任白涛指出，"世间各种竞争，皆为兴味之的。如政治之竞争，事业之竞争，游戏之竞争，此等竞争皆自得胜利之欲望而发生，最足动吾人之情感者。故凡以胜利为目的之，其结果无不可成有兴味之'新闻'。"③

人类的兴味项，任白涛认为，"人类的兴味云者，乃我侪对于他人之行动、思想、感情等之兴味，即人与人相结之同情心是也。""由是而知同一事件中，若具有关于多数人之程度者，即为最有价值之'新闻'。"④

儿童之兴味项，任白涛认为，关于儿童之新闻也有特殊之价值，因人们对儿童有兴味，故凡关于儿童之趣事趣谈，无不堪作新闻材料。

动物之兴味项，任白涛指出，"吾人每于动物表现近乎人类之智慧

---

① 参见《应用新闻学》，第 29 页。
② 《应用新闻学》，第 29、30 页。
③ 《应用新闻学》，第 30 页。
④ 《应用新闻学》，第 31 页。

或特有之性质时，必感多少之兴味，而于记述此事之'新闻'兴味自必更浓。故访事员当材料缺乏时，动物园中，大有运笔之余地也。"①

娱乐及嗜好之兴味项，任白涛认为，吾人对于特种娱乐或嗜好，有相当爱好，因此，关于这类事件的报道，能引起多量同好的注意，故凡关于世间所有之人类的嗜好及娱乐，自成一种有价值之新闻。

地方的兴味项，任白涛说，"某地方人，对于某地方事有兴味，而对于他地方之事件中与地方有关系之部分，尤感兴味，即'新闻'之兴味，恒以事件发生场所与销行场所之距离远近而有差是已，距离远，斯兴味浅。譬之，投石于池，生最大之波纹者，为投石之场所，愈远则波纹愈小矣。"②

著名的兴味项，任白涛指出，读者所亲近的人物场所事件外，有名的人物、场所及事物，较一般的人物、场所及事物，读者感到前者更有兴味，由这些人物、场所、事物构成的新闻，价值也大。

家庭及职业之兴味项，任白涛指出，"兴味固有种种，然使无论何人必系最大之兴味，则应尤逾于家庭之幸福，及职业之繁荣者。盖此类事件，纵如何平凡，而与人间交接，极亲切也。凡百'新闻'之价值，大抵皆系于此。""是故'新闻'之价值，尚须依其直接影响于读者生活之程度范围而定，影响之程度高，范围广，'新闻'之价值，乃益增大。"③

兴味之结合项，是对前述各种兴味之总结。任白涛指出，"一事件而系多种之兴味者，是谓之兴味之结合，乃最有价值之'新闻'"，"以其有惹起多数读者之强大吸引力故也。"④质言之，一事件含有最多种之兴味，这条新闻也肯定很有价值。

任白涛指出，上述各项标准系借鉴美国学者的论说，未必项项尽适合于我国，但我国报纸及新闻记者偏重政治而轻忽社会方面，遂使报纸与吾人实际之生活，似毫不相关者，借鉴美国学者之论，可以醒矣。

任白涛在这本书中还分析过新闻价值被减杀的条件，这些条件大致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含诈欺性的广告臭味者"，会减杀原良好新闻之价值。任白

---

① 《应用新闻学》，第32页。

② 《应用新闻学》，第32～33页。

③ 《应用新闻学》，第34～35页。

④ 《应用新闻学》，第35页。

涛指出，"如何之好材料，苟含广告的臭味，其价值即不能无所折扣，盖必严施笔削，方可登录。若其全部以欺诈的广告为目的者，则字纸篓中之物耳。"①

第二，"涉及个人之隐私者"。报纸之特质，在万事公开。新闻若有关个人隐私之类，则不宜公开，皆无新闻价值。因"妄揭个人私事于公开之报纸，如其为恶，则当受法律及良心之制裁。即令非恶，而其事既与群众无涉，群众对之自不感何等之兴味，更无公开之必要矣。"②

第三，"背乎善良之风俗者"。"卑猥、残忍，或与人以大不快之感，及其他背乎善良风俗等事，皆无'新闻价值'。登载卑猥之事，各国法律，大抵皆悬为例禁。残忍不快诸事，则新闻社当自加制裁。盖指导社会、化成民俗，乃新闻记者之天职，断不可取媚一二恶劣读者，以自贬其价值也。"③

《应用新闻学》除上述四方面涉及理论新闻学论题外，在二编三章新闻之搜集中尚有谈及心理把握，在四编三章编辑部之搜材中有对捏造电报之批评，都同理论新闻学有关，但一来论证不集中，二来并无太多超过他人著述论及此题的内容，在此不再赘言。大致《应用新闻学》对于理论的贡献，就这四个方面。

综合和集中任白涛新闻学研究成果的是他的《综合新闻学》，共6卷4册。第一册含导言和第1、2两卷，由长沙商务印书馆于1941年7月出版，进一步除介绍英、美、日的新闻学观点与著作外，突出地介绍了德国理论新闻学观点和著作。其中第1卷为总论，论述报纸与社会、政治外交、伦理心理、读者的诸种关系。第2卷叙述原始的公告形态及通信方法，介绍上述各国传媒历史和整个传媒的治举。第二册(含第3卷)为采访技术和通讯方法，于1943年出版。第三、四册有原稿但未正式出版，这两册含4、5、6三卷，其中第4卷为编辑与撰述，第5卷为经营管理，第6卷为杂志。从总体上看，《综合新闻学》一则没有出齐，难有真正广泛的社会影响，二则至40年代时，中国已有一大批新闻学新作出版，《综合新闻学》也难有很大的社会影响。所以本书也不作详尽介绍了。

---

① 《应用新闻学》，第36页。

②③ 《应用新闻学》，第37页。

至此，我们就中国新闻学研究的西学东渐阶段，围绕着从译解日、美新闻学者著作到自己独立撰写新闻学著作，渐次介绍了松本君平、休曼的新闻学著作，又评价了我国学人自己撰写的有代表性的新闻学著作。我们从后者的新闻学著作中常常可以明显地见到西方新闻学的影响，看到西学东渐的发展轨迹。

第五章

新闻学研究蜂起和流派纷呈

20 世纪 20～40 年代，是中国新闻学术研究蜂起和新闻教育勃兴的时期。就全国总体而言，由于西学东渐的学术路径使然，美英新闻学观点及研究方法在当时新闻学术界占据主要地位。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报刊活动了解的增多，使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点及研究方法也渐有影响，在革命根据地则占据主要地位。随着日本入侵中国步骤的加剧，法西斯新闻观点也有所滋长。这一时期，国民党统治全国，形成较完整的新闻统制体系，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及新闻体制，对中国新闻界的影响不可低估。总之，这 20 多年是中国理论新闻学形成以后发展最活跃，各种新闻观点形成、传播和交锋最激烈的时期，是流派纷呈、学术繁荣的时期。

第一节　理论新闻学著作出版高潮

据《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①]的不完全统计，1903 年我国第一部新闻学书籍问世起到 1949 年 9 月止，全国印行的书籍 468 种。这其中除很小一部分是 1903 年至 1919 年出版之外，大部分系 1920 年以后问世的。按书目分类办法，大致如下。

一、新闻学概论

新闻学概论主要是研究理论新闻学的理论基础部分。该书目收集的书在这一部分中又细分为专著与教材、论文集与资料汇编两部分。

① 林德海主编：《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1903～1987)，新华出版社 1989 年 7 月版。该书目主要根据北京图书馆藏书编纂，此外利用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等藏书，没有广泛收集散落于各地图书馆及有关高校新闻专业资料室的藏书，所以统计资料不够完备。

1. 专著与教材部分，除译作松本君平的《新闻学》、休曼的《实用新闻学》，以及前面提到的徐宝璜的《新闻学》、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和《综合新闻学》外，尚有：徐宝璜《新闻学纲要》(《新闻学》重版本加上徐晚年撰写的4篇论文)、孙壹衣《新闻平议》、徐宝璜和胡愈之《新闻事业》、邵飘萍《新闻学总论》、伍超《新闻学大纲》、戈公振《新闻学撮要》、燕京大学周刊《新闻学说略》、周孝庵《最新实验新闻学》、译杉村广太郎《新闻学概论》、译后藤武男《新闻纸研究》、陶良鹤《最新应用新闻学》、黄天鹏《现代新闻学》、李公凡《基础新闻学》、吴晓芝《新闻学之理论与实用》、曹用先《新闻学》、黄天鹏《新闻学概要》、黄天鹏《新闻学入门》、谢六逸《实用新闻学》、刘元钊《新闻学讲话》、梁士纯《实用新闻学》、俞爽迷《新闻学要论》、孙怀仁《新闻学概论》、谢六逸《实用新闻学》(与前同名另一著作)、任毕明《战时新闻学》、张友鸾《战时新闻纸》、姚任《实用新闻学》、储玉坤《现代新闻学概论》、戈公振《新闻学》、上海申报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讲义》、中美日报读讯会《新闻学的基础知识》、吴宪增《国民基本新闻学》、叶之知《新闻知识入门》、柯天《新闻工作基础知识》、管翼贤纂辑八本集《新闻学集成》、鲁风《新闻学》、田玉振《新闻学新论》、艾秋飚《科学的新闻学概论》、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史梅岑《新闻学纲要》、张西林《最新实验新闻学》、恽逸群《新闻学讲话》、译史泰特《新闻学的理论与实际》、上海文化函授学校《新闻学》、陈锡余《新闻学概论》、晋南日报新闻班编《新闻学讲义提纲》、陈醉云《小朋友新闻》、夏世琦《小学生新闻学》、王一之《综合宣传学》、萨空了《宣传心理研究》等。这些著作加上少数几本的再版本，共计52种。

2. 论文集与资料汇编部分，有傅双元《报学讨论集》、黄天鹏《新闻学论文集》、黄天鹏《新闻学刊全集》、黄天鹏《新闻学名论集》、天庐主人《天庐谈报》、黄天鹏《报学丛刊》、王澹如《新闻学集》、黄天鹏《新闻学演讲集》、李锦华和李仲诚《新闻言论集》、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新闻学研究》、袁殊《学校新闻讲话》、管照微《新闻学论集》、上海记者座谈会《记者座谈》、梁士纯《新闻学概观》、复旦大学新闻学会《报展：上海复旦大学三十周年纪念世界报纸展览会纪念刊》、张忧虞《新闻之理论与现象》、汉口市新闻纸杂志暨儿童读物展览大会《新闻纸展览特刊》、袁殊《记者道》、中国青年记者协会《战时新闻工作入门》、杜绍文《中国报人之路》、华北新闻记者协会《华北新闻记者讲习会讲义集》、杜绍文《战时报学讲话》、中国新闻学会《中国新闻学会年刊(一)》、中华新闻学会《中

华新闻学会年刊》、张鹤魂《新闻纸的几个问题》、田玉振《战时新闻工作的途径》、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新闻工作指南》、中国青年记者会山东分会《新闻工作选辑》、刘豁轩《报学论丛》、东北日报社《新闻工作手册》、新华社冀鲁豫分社《新闻工作选集》、华东新闻干校《新闻工作文选》、华中新华日报社和新华社华中分社编委会《新闻工作文选》、冀南日报社《新华工作文选》、鲁中南报社和新华社鲁中南分社《党报工作文选》等35种。

二、新闻事业

论述新闻事业一般状况的著作有3种，即译安格尔《新闻事业与社会组织》、燕京大学新闻讨论会《新闻事业与困难》和新闻战线社《新闻事业建设论》。新闻事业部分又分为新闻政策、新闻事业经营与管理、新闻法与新闻自由、报刊与通讯社、广播等几方面。

1. 新闻政策部分有：杜超彬《新闻政策》、赵建新《新闻政策》、梁士纯《战时的舆论及其统制》、赵占元《国防新闻事业之统制》、赵超构《战时各国宣传方策》、穆超《非常时期的宣传政策》等6种。

2. 新闻事业经营与管理部分有：吴定九《新闻事业经营法》、刘觉民《报业管理概论》、钱伯涵和孙恩霖《报业管理与组织》、詹文浒《报业经营和管理》、李次民《报业技术与管理》等5种。

3. 新闻法与新闻自由部分有：袁殊《新闻法制论》、卢豫冬《新闻法制》、孙义慈《战时新闻检查的理论与实际》、余戾林《战时新闻法》、凌其翰《出版法》、张九如《战时言论出版自由》、马星野《新闻自由论》、中央日报资料室《新闻自由宪章》等8种。

4. 报刊与通讯社部分有：王解生《新闻纸改造》、岛谷亮辅《报界之将来》、胡仲持《关于报纸的基本知识》、张悠悠《报纸常识》、中美日报读讯会《简型报纸编辑经验》、敏朋《如何创办地方小型报》、绥德分区文教大会秘书处《大众黑板报》、鲁中大众社《怎样办黑板报》、张坚白《怎样办好黑板报》、丁毅《黑板报》、李春兰《农村广播台和黑板报》、林音频《怎样办好农村黑板报》、曹伯韩《街头壁报》、黄天鹏《小学壁报编辑法》、骆何民《怎样编壁报》、任白涛《国际通讯机构及其作用》、国际世界文化合作院《无线电广播的文化教育作用》、彭乐善《广播战》、谢六逸《新闻教育之重要及其设施》等19种。

三、新闻记者与通讯员

这一阶段对于新闻记者(访员)的研究有所加强，出版的著作有：黄

天鹏《新闻与新闻记者》、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黄天鹏《新闻记者论》、天庐《怎样做一个新闻记者》、李达《宣传学与新闻记者》、聂世琦《新闻记者》、汪馥泉《记者常识》、刘光炎《战时新闻记者的基本训练》、卜少夫《战地新闻记者讲话》、晋察冀分社集体讨论孙犁执笔《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冀鲁豫书店编辑部《为什么要当工农通讯员》、黄海大众通讯部《工农通讯经验》等13种。

四、新闻业务

应用新闻学著作中，也有不少讨论涉及理论新闻学议题，故也将其统计进去。这一阶段代表性的著作除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外，不少作品对后世影响颇大，如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其中一些著作和作品，有相当的理论新闻学色彩，有的则可为理论新闻学的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与佐证材料。

这一阶段，关于新闻业务一般论述的著作出版6种，它们是：董郁青《念八载新闻实践学》、王文彬《报人之路》、程其恒和蓉又铭《记者经验谈》、王保元《新闻技术》、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编委会《人民新闻的采访、写作和编辑》、晋绥日报社《新闻业务文选》。

1. 新闻采访学方面：王文彬《采访讲话》、陆诒等《新阶段中一般新闻采访工作要旨》、中美日报读讯会《实用采访学》、王研石《实践采访学》、陆诒等《采访讲话》、宓伽《新闻采访学》，以及前述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共7种。

2. 新闻写作学方面：黄天鹏《新闻文学概论》、胡鸣祥《投稿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新闻写作研究》、中美日报读讯会《新闻写法》、黄天鹏《新闻文作法》、赵德新《写稿讲话》、黄继厚《天津报纸十年来之记者长篇通信》、谢六逸《通讯练习》、冀热辽新华分社《怎样写通讯》、金照《怎样写新闻通讯》、施星水和唐戊中《新闻通讯的写作》、蒋寿同《散文研究》、中美日报读讯会《新闻文艺作法》、白陈群《新闻与速记》，计14种。

3. 新闻摄影方面：邓锦辉《新闻摄影原理》1种。

4. 新闻编辑学方面：周孝庵《如何编辑新闻》、周孝庵《编辑新闻的实际工作》、张九如和周翥青《新闻编辑法》、郭步陶《编辑与评论》、中美日报读讯会《新闻编辑术》、宫达非《大众化编辑工作》、宫达非《大众化编写工作》、冀鲁豫书店编辑部《编辑写作怎样群众化》、章丹枫《编报与读报》、李次民《编辑学》、谢崇周《新闻标题理论与技术》、章先梅《报纸印刷术》等12种。

5. 新闻评论学方面：张鹤魂《新闻评论》、程仲文《新闻评论学》、郭步陶《评论作法》、郭步陶《时事评论作法》、中美日报读讯会《评论作法》、李春鹰《社论写作》等 6 种。

6. 新闻资料工作方面：谢六逸《新闻储藏研究》和中美日报读讯会《剪报经验谈》2 种。

7. 新闻作品方面：这方面的成果丰富，有申报新闻函授学校《报文选读》、潘公弼《时事大观》、时事新报《时事新报选粹》、卜郎特《摩登新闻丛编》、陆诒等《新华通讯集》、新华社东北总分社前线分社《怎样报道战斗和战役》、梁启超《中国报纸社论文字》、赵雨时《北平晨报社论集》、罗承烈《新民报社论》、胡秋原《时代日报社论第二集：肃奸和惩贪》、胡秋原《时代日报社论第三集：士风与学风》、胡秋原《时代日报社论第四集：战局与欧局》、胡秋原《时代日报社论第五集：兴党与建国》、胡秋原《时代日报社论第六集：雪耻与兵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中国国民党党报社论集（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中国国民党党报社论类编》、（国民党）中央海外部海外社论评论委员会《海外社论选编（第一集）》、陈彬和《申报社论选》、曾虚白《大晚报评论选》、潘公弼《时事新报评论集》（1933）、潘公弼《时事新报评论集》（1934）、复兴日报社秘书室《复兴日报星期论文集》、上海导报社《导报言论集》、福建中央日报社论委员会张志智《福建中央日报评论集》、新中国报评论委员会《新中国报评论集》、戈公振著邹韬奋编《从东北到庶（苏）联》、长江《中国的西北角》、长江《塞上行》、长江《西线风云》、肖乾《人生采访》、王浩《北平去来》、程善之《程善之先生时评汇刊》、张季鸾《季鸾文存》、络清华《络清华先生言论集》、译勃脱兰《中国的新生》、译勃脱兰《华北前线》、译杰姆斯・贝特兰《北线巡回》、译根室・史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译福尔曼《中国解放区见闻》、译福尔曼《中国解放区印象记》、译福尔曼《北行漫记》、译史诺《中国的新西北》、译史诺《红旗下的中国》、译史诺《西行漫记》、译斯特朗《为自由而战的中国》、译史沫特莱《打回老家去》、译宁谟・韦尔斯《续西行漫记》，共 47 种。

8. 广告学方面：甘永龙《广告须知》、蒋裕泉《实用广告学》、蒯世勋《广告学 ABC》、苏上达《广告学概论》、苏上达《广告学纲要》、孙孝钧《广告经济学》、刘葆儒《广告学》、王贡三《广告学》、罗宗善《最新广告学》、赵君豪《广告学》、陆梅僧《广告》、吴铁声和朱胜愉《广告学》、译井关十二郎《广告心理学》、如来生《中国广告事业史》，计 14 种。

9. 报刊发行与读报方面：徐润若《新闻发行学》、张明养《时事研究法》、罗又玄《时事问题研究》、吕绍虞《书报杂志阅读的方法》、金仲华和杜平《报章杂志阅读法》、张明仁《怎样阅读书报杂志》、中美日报读讯会《新闻读法》、守攻《如何读报纸》、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读报常识》、太岳新华书店《读报常识》、佚名《读报常识》、余戾林《读报入门》、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读者常识》、巴克《少年阅报指导》、杨荫薄《经济新闻读法》、杨培新《经济新闻读法》、金仲华《国际新闻读法》、杨东莼《国际新闻读法》、余戾林《平时新闻读法》、卢豫冬《战时新闻读法》、吴好修《战时国际新闻读法》、陈希周《英文报阅读举偶》、葛传椝《英文报读法入门》、周思良和朱生豪《英文新闻纸读法》、温致义《怎样读英文报》、李慕白《英文报纸读法》、罗茜《日文报纸译读法》、中共西北中央局宣传部《活跃在农村的读报组》，共28种。

五、世界新闻事业历史与现状

这一时期研究世界新闻事业史的著作有：李昭实《世界报纸大观》、程其恒《各国新闻事业概述》、小说世界社《世界新闻事业》、甘家馨《欧美新闻界鸟瞰》、谢六逸《国外新闻事业》、余戾林《世界近代新闻界大事记》、容又铭《世界报业现状》、龙之鹏《各国新闻事业透视》、杜超彬《最近百年中日两国新闻事业之比较观》、译淮尔《日报期刊史》、黄梁梦《新闻记者外史》、余戾林《新闻家》，计12种。

这一时期新闻事业国别史及外国报人也有研究成果，关于日本有：包天笑《考察日本新闻记略》、张友彝《日本新闻发达史》、任白涛《日本在华的宣传政策》；关于英国有：马星野《英国之新闻事业》、大中华书局《英国之女记者》、译梅益盛《马礼逊传》、译清洁理《马礼逊小传》；关于美国有：译弗朗克·穆德《美国的新闻事业》、袁殊《新闻大王——赫斯特》等，计9本。

六、中国新闻事业历史与状况

这一时期对于中国新闻事业史与状况的研究成果颇丰，各部分情况大致如下：

1.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部分，除前面提到的蒋国珍《中国新闻发达史》和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外，还有戈公振《中国报纸进化之概况》、兼士《中国报纸变迁史略》、张静庐《中国的新闻纸》、黄汝翼《新闻事业进化小史》、黄天鹏《中国新闻事业》、马荫良《中国报纸简史》、郭步陶《本国新闻事业》、邵介《中国报史述略》、余戾林《中国的报纸》、胡道静《报坛逸话》、中

美日报读讯会《新闻史纲》、阐丹枫《近百年来中国报纸之发展及其趋势》、胡道静《新闻史上的新时代》、章佩萱《中国报业史》等，共16种。

2. 近代新闻事业部分，赵君豪《中国近代之报业》及再版本、余戾林《中国近代新闻界大事记》、章士钊《苏报案纪事》、燕京大学新闻讨论会《今日中国报界的使命》、黄炎培《最近五十年》、中央政治学院《审查全国报纸杂志刊物总报告》、王汉中《新闻事业法令汇编》、赵敏恒《外人在华的新闻事业》，计9种。

3. 抗战时期新闻事业部分，吴成《非常时期的报纸》、王新常《抗战与新闻事业》、陈文干《抗战军事与新闻动员》、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总会决议《新阶段新闻工作与新闻从业员团结运动》、任白涛《抗战期间新闻宣传》、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训处《编报须知》、《全国新闻检查会议总报告》、程其恒《战时中国报业》、张友鸾《去到敌人后方办报》、赵君豪《上海报人的奋斗》、太行新华日报《一九四五年编辑与通讯工作》、（日伪）国民政府宣传部中央报业经理处《新中国新闻论》、（日伪）中央电讯社调查处《东亚新闻记者大会特辑》、《华北新闻协会规约、役员并社员名簿》、（日伪）新民报社史编纂委员会《新民报社史》等，共15种。

4. 抗战胜利后的新闻事业部分，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和晋察冀日报社《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民国）行政院新闻局《新闻事业》、《直辖报社经理部业务总检讨》、《直辖报社言论编辑电讯概况检讨报告》、（民国政府行政院）新闻局统计室《新闻局一年来业务统计概要》、邓文仪《军事新闻工作概论》等6种。

5. 地方新闻事业历史与状况部分，（日伪）新民会《京津新闻事业调查》、（日伪）中华民国新民会中央指导部调查科《京津新闻事业之调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部政治部《北平市新闻记者调查表》、首都新闻记者公会总务组《首都新闻记者公会会员录》、项士元《浙江新闻史》、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上海市教育局《小报审查》、上海日报公会《上海之报界》、郭箴一《上海报纸改革论》、（日伪）宣传部直属报社苏州区改进委员会《苏州区报业调查报告书》、秋虫《武汉新闻史》、长沙市新闻记者联合会《长沙市新闻记者联合会年刊》、《广东省新闻记者恳谈会实录》、台湾省政府新闻处《台湾省政府新闻工作报告》，共15种。

6. 新闻界人物（传记与回忆录）部分，黄梁梦《新闻记者的故事》、余戾林《中国记者之路》、译 Mcnern《梁发——中国最早的布道者》、赵

敏恒《采访十五年》、赵敏恒《新闻圈外》、鲁莽《夜生活：二十年报纸生涯甘苦录》、桑榆《新闻背后》、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计8种。

7. 各种报刊史略部分：《北平华北日报社业务报告及检讨事项》、《天津民国日报业务报告》、民国日报社《民国日报概况》、中央日报社《中央日报社工作报告书》、马星野《南京中央日报工作报告暨计划书》、中央日报社《中央日报胜利周年日纪念特刊》、《南京中央日报三十六年度业务报告》、胡道静《上海的日报》、申报馆《申报概况》、陈冷《申报二万号纪念册》、陈冷《时报馆纪念册》、新闻报馆《新闻报卅周年纪念册》、陈铭德《一年来的工作》、《上海中央日报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中央日报社业务报告及检讨事项》、《中美日报苦斗记》、民国日报社《绍兴民国日报元旦特刊》、新兴日报社《新兴日报二周年纪念册》、吉林自治日报社《吉林自治日报社开办章程》、张复生《国际协报》、包头日报社《包头日报三周年暨新屋落成纪念特刊》、石门新报社《石门新报四周年特刊》、新新新闻编辑部《新新新闻五周年纪念特刊》、民意报四周年纪念特刊编委会《陕西民意报四周年纪念特刊》、西京日报社《党报业务会议西京日报社报告及检讨要项》、贵阳中央日报社《贵阳中央日报民国三十六年度业务报告》、河洛日报社《河洛日报创刊九周年纪念专册》、王风文《汉口中西报万号纪念刊》、湖南中央日报社《湖南中央日报社业务报告》、长沙市民日报社《长沙市民日报周年纪念特刊》、《福建中央日报社三十四年度业务报告》、《福建中央日报社三十五年度业务报告》、福建民报社《福建民报六周年纪念特刊》、广州七十二行商报社《广东省七十二行商报廿五周年纪念册》、《广州中山日报社三十六、七年度业务报告计划书》、《广西中央日报社营业计划书草案》、《台湾中华日报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台湾中华日报社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名册》、《台湾中华日报社股份有限公司现有财产目录》、《台湾中华日报三十六年度二十七年业务检讨计划报告书》、《台湾中华日报社业务报告书》、自由日报社《自由日报二周年纪念专刊》、《香港国民日报社业务报告及检讨》、周德之《编辑平民报纸的经过》、老宣《实报疯话》、实报社《实报恢复观后》、《复报社招股细则》、华西日报社《华西日报一周年纪念专刊》、顾德钧《党军日报八周年纪念特刊》、《中兴日报社三十六年度业务报告计划书》、胡道静《上海定期刊物》，计51种。

8. 通讯社部分，余戾林《中国的通讯社》、王慕陶《远东通讯社丛录》、远东通讯社《上海远东通讯社一周年纪念册》、申时电讯社《十年》、

《大华新闻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缘起、招股简章、章程草案、计划大纲》、第二战区文化抗敌协会《民族革命通讯社通讯手册》、民族革命通讯社《民族革命通讯社周年纪念专刊》、江西建国通讯社《江西建国通讯社周年纪念特刊》、张帆《华声报六周年纪念刊》、张帆《华声报七周年纪念刊》、全球通讯社福州分社《全球通讯社福州分社两年特刊》、华南新闻社编辑部《华南新闻社成立两周年纪念特刊》、雷电新闻社《雷电新闻社两周年纪念特刊》、中央电讯社《中央电讯社第一年》，计 14 种。

9. 广播事业部分，民国行政院新闻局《广播事业》、张景明《燕大的报学教育》、佐佐木健儿《中华新闻学院概况》、吴宪增《中国新闻教育史》，计 4 种。

七、参考工具书

这一阶段，出版了第一批新闻传播类工具书，为新闻从业人员、研究教学人员和广大新闻受众提供了不少方便。这方面的著作有：戴广德《新闻语汇》、宾符和宜闲《国际新闻辞典》、余庚林《时事小辞汇》、余润棠《新闻学手册》、《新闻记者手册》、香港新闻工作者编辑委员会《新中国记者手册》、东北日报通讯采访部《通讯员手册》、内蒙古日报社采通科《通讯员纪念手册》、（民国）国防部《新闻工作手册》、西安和立劳《读报手册》、燕京大学新闻系《中国报界交通录》、许晚成《全国报馆刊社调查录》、李文倚《全国日报调查录》、杨家骆《中国期刊社报社通讯社一览表》、（国民党）宣传部新闻事业处《全国报社通讯社一览（1938）》、（国民党）宣传部新闻事业处《全国报社通讯社一览（1939）》、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全国报社通讯社一览（1940）》、（国民党）宣传部新闻事业处《全国报社通讯社一览（1942）》、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全国报社通讯社一览（1943）》、（国民党）宣传部新闻事业处《全国报社通讯社一览（1944）》、时事资料社《报刊调查统计材料汇编》、（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第三处《全国报社通讯社一览（1947）》、（民国）行政院新闻局《全国报社通讯社杂志社一览（1947）》、（民国）行政院警察处《全国报社通讯社一览（1947）》、高向杲《中国新闻学文字索引》，计 25 种。

第二节　美英新闻思潮和新闻学研究的展开

上面长长一列新闻学著作、资料的名称及其作者说明，在 20～40

年代，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高潮时期。作品中，既有新闻学者的潜心之作，也有相当的官方文件，少量还是日伪当局的文件和日伪时代的作品。本书的着力点，是评介那些标志着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进步的代表性作品和权威性学者，而以一般研究者的成果作为研究深度及广度的佐证材料，而官方文件或资料作为这种研究成果的折射，有时也略带着作一点分析与评价。

对大量研究性著作分析的结果以及从20年代开始兴起的中国新闻教育，都可以说明美英新闻思潮对当时中国学界的影响是大量的、主要的、深刻的，也是中国最初向新闻学子们灌输和传授的主流新闻观念。

1949年以前，在中国新闻学界和在中国新闻学子课堂上传授的主要来自美英的新闻思潮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内容。

一、报纸起源于人的"新闻欲"

中国学者认为报纸是依据人的社会需求而问世而变化发展的。任白涛指出：

格劳德（Groth）明确地认为新闻报道是与人类社会的发生同时的事情，他说，"想知道人及事物的欲求，是由于希求生存的保证或安全化而促成，而形成之原始的冲动。经验新的事情，或等到报知的希望，是自然的人类感情之表现；是生活意志之本质的核心；是形成并维持社会的最坚强的力量之一种。"

约斯特曾说："报纸是适合于探求新闻报道的人类性的一般需要和欲望的东西，报纸不是创造它的需要的；反过来说，需要是常存在着的，而报纸乃是它的必需的产物。"①

任白涛在这里引述了格劳德和约斯特的观点来说明新闻的起源。他在书中表明，他是同意这些观点的。日本新闻学者杉村广太郎在《新闻概论》中，十分细致地分析过这一观点。他说：

"欲知道；欲使人知道；欲被人知道。"这种声浪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一种共通的欲望，由这种愿望才产生新闻纸。

由"欲知道"的愿望才生读者，由"欲使人知道"的愿望才生新闻纸，由"欲被人知道"的愿望才生新闻的广告。

这三种欲望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有的。从这些欲望产生的

---

① 任白涛：《综合新闻学》，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239、239～240页。

所谓新闻纸是与人类同时发生的，就是人类发生于这个世界的时候，新闻纸也就产生了。可是它的形体没有完整。有人说："海滨的沙滩上残余着人的足迹"是新闻纸，也就是这个意思，"沙滩上的人的足迹"就是为欲使人知道那个人往来的踪迹。依此意味，那末贫民街里的女人们的井边会议，实在是没有印刷好的新闻纸。她们互相谈着西邻舍壁的有些事。谈话者的心无非是欲知道她所不知道的，及她已知道了的，欲使别个没有知道的知道罢了。设探访粗漏，传达不实，那么这事就增添热闹了，也有故意的枉传事实，其中当然也有要辩驳正误的人，也就是自然地实行新闻纸法的正误辩驳。

人类固有欲知道事物的欲望，故一天也不停止的欲知道所能知道的事，因为有这种知识欲，人类才前进。

新闻纸是寻觅 news 而应人类的需要及欲望，这种需要不是新闻纸做的，是古来始终存在着的，新闻纸是从这种要求里发生的必然产物。①

任白涛介绍的约斯特也有类似的论述。后者在《新闻学原理》中有这样的说法：

人类对新闻的嗜好并不是文化发展后才产生的。人一生下来就有着一个传播消息的说话器官，和一个收受消息的听觉器官，这两个东西不仅是生着而已，而且永远在想发挥它们自己的作用。人类同时又被赋有无尽的好奇心，它创造了一种对事物不断的兴趣，关于别人的举动行为，对于自然所发生的程序和事情，对于不论远近每一个人物的情况，都有无限的兴趣。

这些对于事物的好奇心和兴趣，是新闻欲的源泉，也实在是文化和人类进展的基础，因为如此，才把人类知道的境界扩大起来，和鼓励知识在新的范围内发生新的活动。……一切知识和一切由知识中产生的进步，都是从人类贪得无厌的好奇心中及其需要知道事情的欲望中产生出来的。

新闻和意见的出版，就成了新闻事业。这是一种职业，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商业。它的发展，完全由于人类不可抑制的天性。它可以满足人类探求消息的无穷欲望，可以满足人类永远活跃着的

① 杉村广太郎：《新闻概论》，联合书店 1930 年 5 月初版，第 1～1 页。

无穷的好奇心，也可以满足人类追求兴趣的无穷需求。[1]

西方关于新闻起源的观点，对30～40年代的中国新闻学者有相当深刻和普遍的影响。前面提到的任白涛是这样，其他不少学者也是这样。比如刘元钊在《新闻学讲话》中是这样表述的：

我们讲到新闻的原始，就要提到"新闻欲"的问题了，新闻之所以发生，实缘于"新闻欲"。人类的本能是富于"新闻欲"的，如果没有"新闻欲"，人类就决不会进化，文化也决不会发达的。

所谓"新闻欲"者，乃由于"欲知道"，"欲使人知道"，及"欲被人知道"三个心理作用而发生了"新闻欲"。"新闻欲"在人类的原始时代就已随着产生了。在每一个人当他呱呱坠地时，就跟着发生的。譬如：一个人刚生下地时，就是一阵呱呱的啼哭，这种啼哭就是"新闻欲"的作用，盖当他从母胎坠下地时，突然变换了一个环境，觉得四周的一切和在母胎时很异样，而且很不舒服，因此只好啼哭，啼哭者所以"欲使人知道"他的不舒服也。[2]

刘元钊的这些论述，需要作科学的论证，其中的一些分析也未必精当。但他的论述，非常明显地表现出美西新闻学者的影响。在30～40年代，中国新闻学理各流派中，美英等西方新闻学派的影响是最强的，是主流学派。

二、报纸的性质是公共性和营利性

美英新闻学者皆认为，新闻纸既是公共舆论机关，又是创造利润的营业工具，这种"双重性"的认识，对中国新闻学者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当然，中国新闻学者中，有的偏重强调新闻事业的社会服务性，对于营利、经商的一面不重视，甚至忽视，有的则反之，强调新闻事业营利的一面，而将它的公共服务、公共教育性质放到一边。但从总体上看，认为公共性和营利性兼而有之者居多。

20年代以后的学者中，邵飘萍是较多讨论新闻事业性质与功能的人之一。在《新闻学总论》中，他这样写道：

从事于新闻事业者认明此种事业之特质第一当彻底觉悟新闻纸之为社会公共机关，根据事实与信奉真理皆以社会公意为标准。

---

① 卡·约斯特：《新闻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据美国1924年版译本，第3、4、6页。

② 刘元钊：《新闻学讲话》，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6年版，第35～36页。

> 新闻纸既为社会公共机关，同时即为国民舆论之代表乃新闻事业之第二特质。……欲考察一国国民之言论思想者，多于新闻纸中求之。
>
> 此外尚有意味更为重大之一种任务，可称新闻事业之特质之一者，则新闻纸有最普遍的指导国民之效果，即教育的特质是也。……新闻纸皆与社会政治之变迁有关，其范围之伟大不啻国民之无边大讲座也。
>
> 益欲新闻纸之完美无缺，非仅读书能文者所可胜任而愉快，其中实含多量艺术的要素，亦新闻事业之一特质也。……新闻纸之灵魂应冷静活跃于理智之世界，而耕于世人之感情之畎亩，常以最新之事实与最有兴味之问题，涵养一般人之趣味性，将世人从枯寂冷酷之心境中救出。凡此皆缘于新闻纸之有艺术的特质。决非政府之官报、警厅之公示、裁判所之记录，与夫银行公司之报告书等所可同日而语者矣。①

郭步陶在《本国新闻事业》中谈到新闻事业性质，观点非常明确。他说，新闻事业非个人事业；新闻事业非经商事业；新闻事业非御用事业；——新闻事业乃为社会服务的事业；新闻事业乃一般事业的导师；新闻事业乃一切事业的缩影。

张九如和周翥青在《新闻编辑法》说，新闻事业的特质是：社会的公共事业，全世界人类的事业，最普及的教育事业，高尚的娱乐事业。

黄天鹏在《新闻学概要》中说，新闻事业的性质共有五种，即：公共性，舆论性，教育性，艺术性，一般性。这种分析，同邵飘萍的见解较为接近。但他又集中强调了新闻事业的公众属性。他说：

> 新闻事业最重要的性质，可以说是以公共的事业为基础。换句话说，新闻事业是公众的事业。……新闻事业，虽是一种营业，但这种营业的立足点是建筑在公共利益上面，凡事以公众的利益为前提，有损害公众利益的，纵能获利也不应该为。……总而言之，新闻事业应以公益为精神，以营业为手段。②

也有人不同意上面的看法，而认为新闻事业最重要的是可售性，是营业性，是获得营利。管翼贤在《新闻学集成》中说：

---

① 邵飘萍：《新闻学总论》，第7～25页。

② 黄天鹏：《新闻学概要》，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111～113页。

报纸的第一个要件是可以卖出。报业的第一个要件是出产一个可以卖出的报纸。报纸可以创造最高的东西，可以表示高尚的理想，也可以效忠于一个尊然的运动，但是产品若是不能出售，完全归于无用。因为一个报纸虽载着金字，若没有人去看，不过是一片白纸而已。①

学者和报人张季鸾是从两方面看待报纸之性质的。他说，"盖报纸性质，一面应作商业经营，一面则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②他以当时的新闻纸为例，说明后一个方面，更为重要。新闻学者刘元钊也是这样看的，他说："新闻纸的第一个特质，就是公共性。……新闻纸是为社会大众服务，为公众谋福利的一个公共的机关，和别种专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业组织完全不同，因新闻纸之最大目的之一，即在报告以公众为本位的新闻，并表现世界的公正的事理，而代表公众宣达公众之舆论者也。故新闻纸乃是一个为公众所孕育扶养的产儿，其富于公共性的特质也无疑。"③

在这一阶段，还有学者从报纸同政治、同社会的不可分离的关系，分析报纸的性质。张忧虞在《新闻之理论与现象》有这样一段论述是很有意思的：

……报纸大概分别起来，可以有两类：一是站在支配阶级的方面，对于被支配阶级，营着思想上统治的作用之"御用新闻"；一是站在被支配阶级的方面，对于支配阶级的思想统治，表示反抗的"反抗新闻"。所谓"思想上的统治"，就是拿一个思想支配了许多人的思想，结果，使许多人的思想都融化在一个思想之内，而实现了"思想统一"。实行统治思想的方法，可有种种：或用教育，或用电影，或用戏剧……但最有效的，要首数报纸。因为教育等，都限于一定的场所，都以有限的人为对象；只有报纸在社会上的影响，没有限制，故在思想统治上，报纸的效力最大。政治是支配者对被支配者统治的工具，而报纸尤其"御用新闻"，也便是这种统治工具的一方面……

所以政治和报纸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有人以为报纸对于

---

① 管翼贤：《新闻学集成》第一册，中华新闻学院1943年版，第111页。

② 参见《季鸾文存》下册，转引自储玉坤：《现代新闻学概论》，世界书局1948年版，第12页。

③ 刘元钊：《新闻学讲义》，乐华图书公司1936年版，第26～27页。

政治，是中立的，超然的，不偏不党的；其实不然，任何报纸，也脱不了政治作用，也就是任何报纸对于政治不是中立或超然的。……

就报纸发达的历史看来，在它最初发生的时候，就是统治者之统治的工具，及被统治者之反抗统治的工具。至到资本主义很发达的现在社会，在表面上看，报纸已变为一种商品，报馆成了一种营利主义之企业。但在紧要的时候，仍然要露出它的政治的统治的工具的本性。①

中国这一阶段新闻学者对于新闻事业性质的认识，同美英不少学者的看法颇为相似，这可能由于二者的理论均来自相同的资本主义报业，也由于中国新闻学的学术渊源乃是西方新闻学所致。美国学者勃莱纳在《报纸的特殊地位》中对新闻事业性质讲得十分明确，他说，报纸有两重性，报纸一方面是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制度下的私营企业，另一方面报纸也是在我们民主社会和政府能够顺利存在下去的情况下的一种半公性质的事业。甘塔尔在《新闻学探微》中讲得更简洁：美国报纸既是一种社会组织，又是一种商业组织。读者希望于它的是为社会服务，股东希望于它的是能够赚钱。美英学者的众多学者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卡·约斯特在《新闻学原理》中的一段论述：

商业才能、原理及方法，对有效的新闻事业是不可或少的东西。虽然我们这样说，但新闻事业决不能完全受制于谋利的欲望，即使此种利益无损于人，也不应如此。报纸的生产，决非单纯的生产企业而已，照规矩讲，每一个报纸的刊行，主要的是在阐扬某项原理，支持某种原则，完成某些公共服务，或满足某种大众的需求。……在竞争的商业制度下，利润是很可能获得的，事实上报纸确实能够获得利润。报纸获得利润，当然是一件美事，然而如果把利润放在第一位，从而压制其他一切新闻学的基本原理的时候，利润却往往会自然地消失。②

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在许多中国新闻学者关于新闻事业性质的论述中，都可以发现约斯特等这些美英学者的影响。所以在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所谓"肃清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影响"的批判运动中，把约斯特的这本书列为"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资料"的第一本。

---

① 张忧虞：《新闻之理论与现象》，太原中外语文学会1936年版，第14～16页。

② 卡·约斯特：《新闻学原理》，第6～13页。

三、新闻定义和新闻价值

西方新闻学者认为,重要的事情或反常的事情的及时报道才是新闻。所以他们关于新闻的定义,基本上是沿着这两种思路思考与论证的。如《今日新闻编辑》一书提出的新闻定义之一是: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报纸读者感兴趣的重要事件的报道"。①

"一切反常的事物都是新闻。"②

当然,其中也有既不强调重要性,也不强调反常性的新闻定义。比如前面提到的约斯特的新闻定义是:"新闻是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报道。"但他立即对这个定义加以限制,说,"只要是新鲜的报道,就足以称为新闻。"③

中国新闻学者关于新闻之定义和定义方法,取材于西方学者不少。例如徐宝璜和邵飘萍的新闻定义分别是:

> 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之事实也。(徐宝璜)
>
> 新闻者,最近时间内所发生认识一切关系社会人生的兴味实益之事物现象也。(邵飘萍)

其他学者的新闻定义也大致相似:

> 新闻就是新发生发现或发表的事件,它具有时间性社会性和正确性的程度,和新闻的价值为比例。④
>
> 所谓新闻,就是在最近的期间以内所发生而被认识的,并能有影响及于社会,正确地报告出来的事实。⑤
>
> 新闻应为最近发生的事实,而能使多数人发生兴趣;并为大多数所欲知而对于其生活发生影响的一切事件。⑥
>
> 最近发生的事实,能引起多数读者的兴味,能给予读者以实益,方是新闻。⑦
>
> 新闻就是最多数人所注意而感到兴趣的最新的事实。⑧

---

① 乔治·巴斯蒂恩等:《今日新闻编辑》,美国1948年版,第28页。
② 乔治·巴斯蒂恩等:《今日新闻编辑》,第27页。
③ 参见卡·约斯特:《新闻学原理》,一、二章。
④ 田玉振:《新闻学概论》,第12页。
⑤ 李公凡:《基础新闻学》,上海联合书店1931年版。
⑥ 上海文化函授学校:《新闻学》,1947年版。
⑦ 潘公展:《新闻概说》,见黄天鹏:《新闻学名论集》,上海联合书店1929年版。
⑧ 黄天鹏:《新闻学概要》。

新闻定义常常同新闻价值一起研讨。这是因为，判定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总是离不开价值判断。刘元钊在《新闻学讲话》中指出："新闻价值就是判断采录于新闻纸 news 的价值的多少的标准，即这纪事与读者兴趣的多寡，亦即 Spencen 博士所说的：'依刺激的程度如何。'"[①]徐宝璜也说，"新闻之价值者，即注意人数多寡与注意程度深浅之问题也。"[②]

这种认识，同西方学者对于新闻价值的理解很接近。约斯特认为，新闻的意义，限于仅指那些当天发生的事件或情况的报告。因为按照戴纳的说法，新闻在本质上的意义和它在新闻学上的意义是不同的。每个人差不多都要和他们碰到的熟人交换新闻，他们的目的，大多在打听关于他们本身或他们朋友间的事，至于其他的一切，他们就不怎么感兴趣。这些新闻，在他们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但对别人则毫不足道。"新闻在新闻学上的意义上，一定得由某种共同兴趣，一定得包含公共的重要性。"约斯特指出，作为报纸编辑，"我们所要做的，并不是要把一切新闻都放在报纸上，因为这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们所做的，只是把一切最好的新闻，登在报纸上。在做这种抉择工作时，编辑是直接处理新闻的人，他们必须以新闻价值作判断的标准。"[③]由此可见，新闻价值问题，是从新闻选择的实践中提出的，是属于新闻学意义上的问题。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约斯特的论述里，他是将新闻价值同新闻的趣味相提并论的少见的学者之一。他说，"在报纸的立场来看，趣味是新闻的第一要素。新闻可以有趣味，除供娱乐外，别无价值。不错，娱乐是销路的先驱，它可以争取报纸的读者，这点确不容我们忽视；但我们仅能把这类新闻当作一个工具，用以达到我们真正的目的，这就是说，使那些有内含价值的新闻，能因而获得大批读者。这些有价值的新闻，也可以像娱乐性新闻一样地吸取公共趣味，说不定它们在公共趣味上超过娱乐性新闻。因此，天下最好的新闻，莫过于那些既有趣味又有价值的新闻。"[④]

① 刘元钊：《新闻学讲话》。
② 徐宝璜：《新闻学》。
③ 卡·约斯特：《新闻学原理》，第 20～34 页。
④ 卡·约斯特：《新闻学原理》，第 31～32 页。

西方新闻学者，大多将趣味性列入新闻价值诸因素，并认为趣味性（有的用"人情味"一词代之）是"新闻价值的基石"。

从20～40年代中国新闻学者分析新闻价值各组成要素时，所列各项从内容到文字表述，同西方学者极为相似。这也表明美英新闻学观念对中国新闻学建设的历久与广泛的影响。徐宝璜声明自己的不少见解取自于西籍。他关于新闻价值的分析，已有前述，此不赘言。又一学者田玉振，在《新闻学新论》中，是这样论述这个问题的：

> 识别新闻的标准，就是衡量新闻价值的尺度。新闻价值的大小，即以事实所具有的时间性社会性正确性的程度为比例，那么识别新闻的标准，也以事实的时间性社会性正确性程度为依据。
>
> （一）时间性：事实的发生、发现或发表和人类知道的时间距离，这个时间距离的长短，和事实时间性的程度为比例，事实发生发现或发表和人类知晓的时间距离愈短，则新闻的时间性程度愈大，而它的新闻价值也大，反之则相反。
>
> （二）社会性：事实和人类的关系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事实和人类关系及社会影响大，它的新闻价值就大，反之则相反。
>
> （三）正确性：事实存在的可能差别，这个差别的大小，和事实的正确性程度成比例，事实存在的可能差别大，它的正确性程度就小，它的新闻价值也就小，事实存在的可能差别小，它的正确性程度就大，它的新闻价值就大。[①]

梁士纯在《实用新闻学》中认为新闻价值的要素可以作这样的归纳：

> （1）临时发生的事项；
>
> （2）具有特殊性质的事项；
>
> （3）随环境或时序变迁所发生的情景或活动；
>
> （4）重要人物的言动；
>
> （5）关于当地的事项；
>
> （6）有关读者自身的利益。各种日报的宗旨不同，对于这几种价值，各有注重，并不一律。可是对于材料的选择，则有一个共通的原则。那就是：所选的材料为大多数读者所喜阅，而同时复不

---

① 田玉振：《新闻学新论》，新闻出版社1944年版，第17～18页。

失时间性。①

不少学者，如胡仲持在《关于报纸的基本知识》、鲁风在《新闻学》、任白涛在《应用新闻学》、储玉坤在《现代新闻学概论》、吴晓芝在《新闻学之理论与实用》等论著中，也都表明了类似梁士纯、田玉振的关于新闻价值的看法。当时，论述理论新闻学的著作，以及一部分谈及应用新闻学的著作，没有不讨论新闻价值问题的。这些学者对于新闻价值的研究热情，说明这个问题是新闻传播的核心问题之一，它对于新闻传播的理论与实务都有着重要意义。他们对于构成新闻价值诸要素的认识，同西方学者的分析相当接近，一方面说明西方关于新闻价值的论述，对中国学者有深刻与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说明新闻价值问题，主要是从实际应用中产生并由实际应用中解决，随着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国人对认识与解决新闻价值问题，也在理论上达到相当于西方学者的认识水平，这种情况，可以用"殊途同归"一语来概括。

四、新闻自由、新闻法制与新闻伦理

这一阶段，中国新闻学者关于新闻自由的论著不多，据第一节统计，大致只有袁殊《新闻法制论》、马星野《新闻自由论》等七八本书。《新闻法制论》1937年由上海群力书店出版，全书共15章，包括序论、新闻纸法、法制论上的新闻纸、法制论上的新闻事业、新闻记者、新闻记事、记事之消极的限制、记事之积极的限制、新闻广告——特殊的新闻记事、新闻纸之发行及其条件、新闻纸之责任者、对于新闻纸之行政处分、司法处分——一般新闻犯、各种违反新闻纸法罪（新闻犯）、新闻纸之一般犯罪与不法行为。书尾还收集30年代欲发的出版法与新闻检查法等中国新闻法制资料。马星野的《新闻自由论》由11篇讨论新闻自由的论文组成，主要有《中国新闻记者信条》、《新闻自由与世界和平》、《到世界新闻自由之路》、《美国报界之道德律》、《中国新闻事业展望》等。这本书中不少内容涉及新闻伦理与新闻职业道德修养的内容。

在长达30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与著述中，研究新闻自由的著作之少，同西方国家正好相反。西方新闻学研究之初，就以出版自由为第一课题，以至有的学者指出，不是宪法产生了出版自由，而是出版自由产生了宪法。这是百年中国新闻学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值得研究的现象。

① 参见梁士纯：《实用新闻学》，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引人注目的还有，这一阶段有几本研究新闻政策的著作。如杜超彬的《新闻政策》、赵建新的《新闻政策》、梁士纯的《战时的舆论及其统制》、赵占元的《国防新闻事业之统制》、赵超构的《战时各国宣传方策》、穆超的《非常时期的宣传政策》等。这说明，国人尤其是新闻学者和报人，对新闻政策是重视的。在杜超彬的《新闻政策》中有黄天鹏作的一篇序，黄在序中说："有了新闻政策，对外才有喉舌，外人的毒素宣传，便无所施其伎俩；有了新闻政策，对内幼稚的报业，才有轨道可循，可以逐渐地发展。故此，新闻政策在现在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1]同黄天鹏的看法相异，不少人指出新闻政策实际上是个"坏东西"。他们把新闻政策看作帝国主义实行新闻垄断、压迫落后国家的手段。杜超彬认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新闻政策就是文化侵略。他说：

严格的说起来，新闻政策所表现出来的是怎么样的一件东西呢？抉要的举出来，大约有下列：

(a) 惟偏惟倚：对于某种场合，意存左袒，务使其真实情况，不获表现。……

(b) 不忠不实：新闻纸的责任有三：即报告新闻真相，采集扼要时事，力谋发表敏捷。假如含有新闻政策作用的新闻报告，则不独离新闻的真相远甚，且有时画蛇添足，完全不忠不实了。……

(c) 党同伐异：现在的世界上，有二个森严的壁垒，其一为帝国主义的恶势力；其一为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高潮。所以各帝国主义在各方的利益上，虽有若干的冲突，然大体上的目标，类皆相同。故凡可以停熄弱小民族的反抗的革命火焰，各帝国主义者无不互相帮助，施行党同伐异的劣伎。……

(d) 虚构新闻：为新闻政策主力队的通讯社，倘因事态对彼等不利，而日趋严重时，他们竟置一切新闻价值和新闻信条于不顾，公然伪造新闻，以惑视听。……

(e) 挑拨离间：有时候新闻政策的暗示着挑拨政潮，离间甲乙的联络。以巧妙的措辞，辣险的手腕，即久经沧桑经验宏富的政客，有时亦自叹不如。在我国外人所办的通讯社，恃领事裁判权力为护符，可不负任何言责，其举止更为奸险。……

(f) 湮没理性：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的，不过有"理性"二字罢

[1] 杜超彬：《新闻政策》，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1年版，序文部分第3页。

了。现在各帝国主义，平日的理性，已丧失殆尽，倘遇与其利害冲突时，更湮没天良，自外于人类，而与禽兽为伍。他们惟一的表现，可在他们运用新闻政策时看出来。

(g) 画云托月：巧妙的新闻政策，在于不在表面显出，例如1919年秋，欧洲经济会议开幕，伦敦每日邮报，常冠以"盗牛的德奥人"，"德国婴儿营养很好"，"法国婴儿应受公平待遇"等醒目标题和纪事，似与该会所讨论的媒荒绩权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即在揭露德奥人的卑鄙，将法国的牛夺为己有，使多数读者，嫉恨德奥人的心理浓厚，便可在该会政治上或经济上获得美果。

新闻政策主要的元素，有如右述七种，并各举列强操纵下的诸通讯社所发表的消息为例。总括一句，不外"私心自用"四字而已。[1]

上述分析表明，当时不少学人把新闻政策看作帝国主义的宣传政策，宣传政策同武力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政策一起，调和着帝国主义者的矛盾，而集中力量欺凌弱小民族，"使他们慑于武力的胁迫，憾于经济的高压，危于文化的侵略，而噤若寒蝉的无言。"[2]但学人们同时又看到帝国主义的新闻政策正在没落，一种新的新闻政策——新闻自立政策正在兴起，"近来各民族鉴于新闻事业效能的宏伟，基于民族自强不息的新闻自立政策，遂如旭日之东升，方兴未艾了。"[3]不过又感到这种新闻自立政策执行起来很难，因为民族的壁垒和成见太深，所以又主张实行"新闻均益政策"。

提出"新闻均益政策"，是基于学人们对世界经济走势的分析和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以及对新闻学从政论本位到新闻本位到营业本位到独占本位和到公有本位的分析。杜超彬说，"经济组织到了世界经济，资本主义到了大众资本，而新闻学到了公有本位，于是各民族的民族意识自然泯灭；国际间的利害冲突，消于无形；种族不生偏见，国家不分强弱；化干戈为玉帛，却猜忌于乌有。这种情形，便成为极乐的天国……"

在这种情况下的新闻事业，按杜超彬的期望，有这样几个特点：

---

① 杜超彬：《新闻政策》，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1年版，第36～43页。

② 杜超彬：《新闻政策》，第44页。

③ 杜超彬：《新闻政策》，第11页。

(1) 绝对允许甚至鼓励出版自由，俾私人可以出版新闻纸，书籍，定期刊物等；关于匿名和诽谤的法律，因新闻记者品格的高尚与社会人士富有新闻学的涵养故，已悉数弃置不用；新闻纸的一切措施，咸一反从前"私有新闻纸"的弊端，除尽瘁为人群谋幸福外，其他毫无所企求。

(2) 新闻事业成为一种法定的职业，和法律与医药一样，从事者必须有相当资格，并须遵守明定的职业行为的法规。

(3) 各国政府及政党，毫无机关报。全球的新闻事业，统由"新闻裁判团"主持。这个裁判团，便负有公平无私的宣布新闻的职责。

(4) 新闻事业成为最崇高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事业，新闻纸成为全社会明察秋毫的亮镜。

(5) 全球人类，人人都有阅报的可能与机会，批评和监督的能力；且无时无地，不努力于新闻纸的改善运动。

(6) 人类宁可不得温饱，而不愿一刻离开新闻事业的领域；新闻纸所表现的一切，不次于上帝的纶音。

如上所说，大同世界的新闻事业，其所抱的政策，为均益的，共利的，公有的；造福尘寰，其机会是均等的，普遍的，重群的。①

这种对新闻政策的期望，显然是乌托邦式的。连杜超彬自己也说，"安知是项思想，不有如愿实现的一日？"但上述对未来新闻政策以至整个新闻自由的构想，反映着当时年轻学人的可贵理想，他们将这种理想写诸书册，并为之呼喊传播，确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按新闻学常识，法律和政策是他律，而新闻伦理与职业操守则是自律。这一时期的新闻学人，大多重视新闻伦理的研究。这既受到西方新闻学的影响，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使然。

卡斯柏·约斯特指出："报纸表现在违反伦理规律和原则方面，往往比遵守的要多。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报纸要利用反常现象，来抓住大众的注意力。不正常和不平常可以引起兴趣及好奇心，因而造成所谓新闻。""报纸接触违反伦理的现象，不论是正面或反面的，范围相当广泛；而报纸本身也应该是，而且常常是促进伦理原则和实践的重大势力。报纸在这个意义上既是伦理原则的代表者，它就特别要遵

① 杜超彬：《新闻政策》，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1年版，第113～114页。

循这些原则，而且要生活在、也必须生活在光天化日之下。……报纸不能有私生活，它既然由于有了公开性才能生活，就不能把自己隐瞒起来。不错，它的动机可以说明或不说明，但它的行为每天都要受到舆论的审判。所以它自己的伦理实践，经常包含在每天的报纸当中。伦理对于新闻职业和报纸经营的实践，已成为特别重要的事。"[1]

在中国人撰写的第一本理论新闻学著述中，徐宝璜就强调了约斯特在前文提出的有关新闻伦理的问题。他说，"新闻纸应立在社会之前，导其人正当之途径，故提倡道德，亦为新闻纸职务之一。使新闻纸素得社会之信任，则恶者因其劣行登载而受舆论之攻击，善者因其善行登载而受舆论之赞扬，虽不必发生严如斧钺，或荣如华衮之力量，然足以惩恶励善，则毫无疑也。至学术之介绍，思潮之输入，新闻之正当，均足使阅者注意于正当之事业，亦为事实。吾国报纸，虽无不以提倡道德自命，然查其新闻，常不确实，读其论说，常欠平允，往往使是非不明，致善者灰心而恶者张胆。更观其广告，则诲淫之药品，冶游之指南，亦登之而无所忌讳。甚至为迎合社会心理以推广销路起见，于附张中或附印小报，登载'花国新闻'，香艳诗词，导淫小说，及某某之艳史等案件。且有广收妓寮之广告并登妓女之照片，为其招徕生意者。是不惟不提倡道德，反暗示阅者以不道德之事。既损本身之价值，亦失阅者之信任，因阅者将渐视其为一种消闲品耳。此于记者之道德，亦大有关系。因迎合社会，乃贱者之所为，与敲诈同为不德也。"[2]

百年以来，自徐宝璜始，直接论述新闻伦理的著述很多。理论新闻学中，常设有伦理一章。每言新闻伦理，必批评当时记者、编辑和传媒之不道德品行，以及分析这些不道德新闻传播行为产生的原因。

管翼贤在《新闻学集成》第一册中指出当时有些传媒弃置有价值的新闻和使新闻"带色彩"的原因，有如下几点："1. 报纸主人希望藉报纸以促进他们自己的及其属党的利益；2. 广告户及商业利益方面，想保护他们的商业；3. 使新闻较实际更为动人听闻及有引诱力，以吸取多数的读者；4. 政府的检查及宣传。"作者在书中还说，"新闻之带有色彩者对于读者舆论上的害处，有如不洁的有毒的食物对于人身体的害处一样。在立法机关，限制食品之掺杂不良成分的立法实施以前，人民的命运都

---

① 卡斯柏·约斯特：《新闻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1960年内部批判版，第113～114页。

② 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

在食品制造家的手心里，同样的，报纸的读者，也受毫无忌惮的报纸的祸患。人民虽然曾向政府吁请禁止不良的食品，却未曾努力求禁止不良的思想的粮食。"①

学人伍超从记者的品性讲到从业资格。他说，"确立品性，在记者实为精神上惟一之要素。但品性有广狭义之别。常人之目为有品性之人者，在新闻记者视之，未必能即称含意，只不过一种庸碌无能之好人而已。是以在新闻事业上立言之谓品性者，乃包含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勉励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笔可焚而良心不能夺，身可杀而事实不可改。'此乃新闻记者之训练修养所最不可缺者也。"②伍超还强调，新闻记者的品性应完全独立，绝对不受社会恶风之熏染，不为虚荣利禄所羁勒。

学人田玉振则从记者要有正义感和责任心讲到记者的职业操守。他说，"新闻事业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福利事业，从事于这种事业的新闻工作人员，必须要以人类社会的福利为目的，无论是新闻的发表和业务的推广，必须要顾到人类社会的福利，在新闻工作人员的道德上来说，就是要有正义感和责任心，所谓正义感，就是对于事物是非判别能力，有了这种正义感才能够保持新闻事业独立的人格；所谓责任心就是对于事业抱负的热忱和尽忠，有了这种责任心才能够发挥新闻事业高尚的道德。"③

针对有人以"薪金微薄"和"面子难却"为借口为新闻伦理失当辩护的情况，学人们也作了有力的反驳。任白涛的论说最为有力。他说："对于社会文化负着极大责任的新闻记者的道德，怎么会堕落到上述地步？……'薪金微薄……而曲其笔，也是应有的事'和'是为面色啊！''是为某种欲望啊！'的说法，也只算一面的理由，在另一面的理由，就是记者的意志薄弱，学力欠缺尤其是缺乏纯正新闻学的修养。……要之，'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两句老话，也是永远的真理，但'仓廪实'非现代新闻记者之所必需，'衣食足'实为万不可缺少的条件。不过就中国新闻记者的现状况，企图学问上的补充，或许比谋衣食更重

① 管翼贤：《新闻学集成》第一册，中华新闻学院1943年版，第164页。
② 伍超：《新闻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49页。
③ 田玉振：《新闻学新论》，新闻出版社1944年版，第205页。

要些,因为记者文化水平提高之后,新闻事业自然会发达起来,那么,记者生活不提自高。"

任白涛还提出,要采取有力措施制裁记者的失节行为。他说,"新闻记者的失节,乃是整个的新闻界的问题,不是少数记者的问题。而在另一方面,新闻记者的不肯刻苦自励,不知自己振拔,也是问题中的一个要点……所以本身已经得到相当优厚的报酬而仍卖其节操的记者,也是有的。因为卖节操的代价,总比其原有报酬多得多。所以我们与希望报纸的根本改革的同时,还不能不想出制裁失节的办法。"任白涛提出由国家、社会、新闻社或全新闻界、记者个人四种办法进行制裁。其中第四种办法,就是对在职的或将就职的新闻从业员强化"贞操观",提倡"礼、义、廉"、人格、气节,不宽恕"无耻"。[1]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关于新闻自由、新闻法制和新闻伦理三个问题的论述,常常是交叉在一起展开的。任白涛等学人对这些问题的论述比较系统和全面。

五、新闻学是一门科学

前已有述,中国新闻学研究在这一阶段走过了一条由报业到报论到报学并进而跨入新闻学的曲折历程,初步确立新闻有学、新闻学是一门科学的认识。但其间的争论不少,分歧很多,对于"新闻学是一门科学"的结论尚待进一步论证。

关于新闻学是一门科学的争论中,刘元钊和储玉坤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下面我们较为详尽地评述他们的论述。

刘元钊在其代表性著作《新闻学讲话》中,以第一章来讨论新闻学是不是一门科学。

在简述了近年新闻纸的发展之后,刘元钊指出:"因了客观的环境的需要,新闻学(journalism)这个专门的东西,也就在各种的学术领域里奠定了它的基础,可是,新闻学虽然已经有了它的基础,但是在这基础上的建筑,还没有充分地完成,它在学术领域里的地位也并不牢固,因此,我们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新闻学是不是一种科学呢?这个问题现在是有许多人在讨论……"

刘元钊从词源学角度对新闻学是不是一门科学作了分析。他说,"新闻学的原名叫 journalism,这个字的语尾是 ism,这三个字母的意义

① 参见任白涛:《综合新闻学》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79~117页。

是'方法'的意思,不过在普通的外国的科学名词中,它们的语尾,后面都是logy四个字,而新闻学的名词却独异。在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测外国学者对于新闻学的这个东西,并不把它列于科学的地位。"

刘元钊认为欧美各国对于新闻学是不是科学也不一致,一派认为是科学,代表这一派的人大都是美国各大学新闻学系的教授们,另一派则反对,他们大都是研究已经成为科学的如政治经济学等的学者,他们认为新闻学可以附属在别种学术部门之下,不必独立成为一种科学。在叙述了一般科学形成过程和新闻学发展状况之后,刘元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 新闻学到现在,确实已经是能够独立成为一种专门性的学术了,虽然在现在还没有充分的发育完全,但到将来它的本身系统一定会完成的。换句话说,新闻学在目前,或者是不能说它是一种科学,但到最近的将来是一定可以成为一种科学的。

刘元钊接着分析了新闻学同各种科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论理学(逻辑学)、心理学、教育学以及优生学、犯罪学、稽核学等关系之后,确立了新闻学的意义。他说:

> 新闻学乃是研究新闻现象与新闻事业者也。
>
> 新闻现象便是指新闻记者们,搜集了社会里的许多新闻拿来提供一些自己的意见,或加以批评,然后把他整理印刷成为报纸,再送至社会,给社会上的人看;待人们看了以后,必然地会引起一种精神作用,这种精神作用,对于社会一定会发生一种影响,这一种过程,便是新闻现象。
>
> 什么是新闻事业呢?凡经营关于新闻纸之出版印刷广告发行等的业务,统称之为新闻事业。
>
> 我们要研究新闻事业的问题,大约不外是下列的几点:一、新闻事业的类别及它底精神与任务。二、新闻机关组织的方法与形式,是不是合乎科学呢?是不是合乎这种特殊的事业的?三、新闻记者的种种条件。四、新闻问题。五、言论自由与新闻事业……①

刘元钊的上述观点和他对这些观点的分析,是有代表性的。他的观点,简言之即是:新闻有学,新闻学应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新闻学在目前还没有成熟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

① 刘元钊:《新闻学讲话》,乐华图书公司1936年版,第1~25页。

储玉坤在《现代新闻学概论》中提出的看法同刘元钊略有不同。他的这本书也用第一章来论述新闻学是一门科学的问题。他起笔就写下这样一段话：

新闻学(journalism)被公认为科学(science)还是近四十年的事。说得好听些，新闻学是最年青的一种科学；说得不好听点，就是最幼稚的一门科学。是否能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可以学校教育的方式来教授与学习？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至今还有许多悲观论者，以新闻学形态的混乱及其内容的庞杂，坚称新闻学是一种未成的科学；惟这些悲观论者，因为新闻学的发展，也就日渐减少了。①

储玉坤借用美国新闻学者的话，说明中国新闻学的发展历史并不短。1929年美国新闻教育家威廉博士在北京大学演讲新闻学时说，"中国为印刷术最先发明之国家，世界若无印刷之术，新闻学绝对不能产生；是以余在中国谈新闻学，犹如小儿女向其父母报告晚辈之经验，实为最为有兴趣之事。"②尽管中国最早发明印刷术，但并没有用于新闻学。西方国家如美国，有了报纸之后也还没有开始对新闻学的研究。到了后来，由于报业的发达，"报业随着印刷术的进步而日渐发达，对于社会的功能，也日见其重要；在报业的自身，因为生产经营的扩大，为求内容的充实起见，对于报业的管理、编辑、采访、发行、印刷等，都深感到有加以研究的必要。此在另一方面，因为社会的重视报纸，对于不学无术的记者，也感到有加以职业训练的必要。同时一般社会学者对于新闻的研究，也因为报纸的发达而深感兴趣了。"于是，"以新闻为对象而从事科学研究"，自20世纪真正开始了。③

储玉坤认为，新闻学研究虽然始于20世纪，但总的看来，"新闻学尚在萌芽时期，在欧美研究新闻学的人数多数，但也没有什么伟大的成就。所以新闻学至今没有具体的有系统的理论。"他举例说，对于何谓"新闻"的问题，也难有切实的解答。美国曾悬赏征求新闻的定义，请威廉博士等人为评判员，审征的结果，以华莱许(Wallach)的答案为第一，他的定义是："新闻是一种商品，由报纸分配，供给认识文字者以消费，

① 储玉坤：《现代新闻学概论》，世界书局1948年版，第1页。

② 转引自储玉坤：《现代新闻学概论》，第1页。

③ 储玉坤：《现代新闻学概论》，第2页。

每天把新鲜的东西送到市场上；但是具有腐败性。新闻在智力方面，情绪方面，兴趣方面，用文字将世界、国家、省州、及都市所发生的事件表现；这些事件不论是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科学的或是个人的；但须有引起多数世人注意的重要性才行。其制造的慎重，品质的优良以及目的的纯正与否，均为反映制造者的名誉，可以信任与否？若以虚伪代真物，或者捏造消息，都是以欺瞒公众的信任，对于一般人心的健康，不啻为一种威胁。”[1]储玉坤还提到徐宝璜的新闻定义和与他差不多的美国学者海特(Hyde)的新闻定义。所有这些新闻定义，都不甚满意，说明新闻学这门科学太年轻，太幼稚了，连基本的定义都须继续花费研究精力。此外，新闻学还要靠许多学问来做它的基础。储玉坤提到下列各种科学：中国史地、世界史地、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外国语、人类学、心理学、伦理学、哲学、文学、体育。作为记者，还要有许多针对担任的职务的专门研究，要做一个国际新闻编辑，就要下工夫研究：世界史、欧洲近代史、各国史、国际公法、国际贸易、各国政府及比较宪法、现代各国经济问题、现代政治思潮、名人传记等。

综合刘元钊和储玉坤的观点，总的是，新闻有学，新闻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新闻学迄今仍是一门水平不高、幼稚年轻的新兴的社会科学。

除了上面的看法，这一阶段还是有人反对将新闻学视作一门科学。顾执中1937年在上海《新闻记者》杂志1卷2号上发表题为《经验便是新闻学》的文章，明确表示：“经验便是新闻学，新闻记者是时代的，是领导时代。时代的前进关系于新闻记者极大。你假使现在已是一个新闻记者，那末你天天所得到的新经验，便是你的最好的新闻学，用不到再进什么学校。”

还有人对新闻学能否成为独立的科学表示怀疑。1948年出版的《报学杂志》创刊号上有一篇题为《新“三字经”——泛论新闻写作的几个定律》，作者杜绍文说，“新闻学所以迄今尚少坚实的基础，主要的弱点，便是缺乏像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那样的原理、原则和公式，于是威胁其独立存在的价值。”

但是多数学者都持刘元钊、储玉坤相似的看法，认为新闻学是一种独立科学。钱克显在《新闻科学导论》中说得十分清楚：“我们知道每一

---

① 储玉坤：《现代新闻学概论》，第14～15页。

种科学的成立必定是在其研究对象得到特别发展而发生了许多问题要待解决和说明的时候。新闻纸的出现虽有十数世纪的历史，可是那时候新闻现象很简单。及到近代生产力借机械而飞速的提高时，新闻纸踏入一种新的境界，新闻现象复杂了，因此在近几十年出现了新闻科学。”“新闻科学是研究客观存在的新闻现象，解释和说明其自存的规律和因果性。它的发展是由于人类对新闻现象与自己的社会斗争的必要而发生和发达起来的。”①

邵飘萍有一段论述，简略地记叙了中国新闻学产生的历史，也可为我们这一节作一个很好的小结：

> 我国之有新闻学，始于一二海外学子之编译；多注重于说明新闻之原理，而方法则较少焉。——至民国七年，蔡孑民先生长北京大学，愚与徐伯轩君合商之于蔡校长，于是北京大学始创设新闻学会，听讲者百余人，愚与徐君分任其事。愚则讲述新闻记者外交术，专研究探索新闻之方法。去年(1923年)所出版之拙著《实际应用新闻学》盖即以斯会为其动机。此百余人者，自北大毕业以后，今正从事于新闻事业者颇众，且多优秀之分子焉，是为我国大学中有新闻学之始。②

第三节　国民党新闻统制的确立和法西斯新闻思潮的影响

1927年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之后，建立和形成了庞大的新闻传播网，国民党新闻统制的制度和格局最终确立。在这种新闻统制下，加上日伪新闻压制与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影响，法西斯新闻思潮在国统区与敌占区出现并产生了极坏的作用。

一、国民党新闻统制政策的确立

中国国民党自1927年掌握全国政权以后，即着手营建自己的新闻传播事业。

《中央日报》1927年3月22日创刊，时为武汉国民党中央机关报。

---

① 钱克显：《新闻科学导论》，《复旦青年》创刊号(1940年1月1日)。
② 邵飘萍：《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东方杂志》21卷6号(1924年)。

该报于9月15日停刊，上海《中央日报》于1928年2月1日出版，成为南京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无论是武汉的《中央日报》还是上海的《中央日报》，虽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之喉舌，但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离心倾向。于是，1928年6月和9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专门讨论了设置党报和指导党报的问题，并通过了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设置党报条例草案》、《指导党报条例》和《设置党报办法》等三个重要文件。文件规定，凡中央及各级宣传部直辖之日报杂志，其主管人员及总编辑由中央或所属之党部委派之，中央及各级党部对各报除将所定各项宣传纲要及方略先发给以资遵守外，并应随时指导宣传以为立言取材标准。上海《中央日报》迁南京后，新《中央日报》于1929年2月21日发行，国民党进一步加强对其控制。不久，《中央日报》办起了夜报、周报。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至1936年也扩大为11个分社。另一喉舌中央广播电台扩建为75千瓦，成为东亚最大的广播电台。国民党军队系统的报纸《扫荡报》、"复兴社"的《中国日报》、《晨报》以及地方党部的一批党报，也陆续出版。

1930年，国民党提出"党报原则"，为：

1. 以三民主义为最高指导原则，以党的政纲为宣传材料；

2. 站在党的立场，以中央的态度为态度，严守党的秘密，绝对受上级党部的指挥；

3. 尽量避免为一派一系所利用，维持党德。①

同时，还提出了对党报职员的要求：

1. 确信三民主义；

2. 遵守党的纪律；

3. 具有新闻的学识与经验；

4. 具有丰富的知识；

5. 具有"智"、"仁"、"勇"的革命人格；

6. 具有"清"、"慎"、"勤"的优美德性。②

国民党在构建自己的新闻宣传网的同时，加强了对全国新闻传媒的控制，出台了一批新闻政策与法规，从1929年起，主要法规有：

1929年　国民党中宣部公布《宣传品审查条例》

① 同材：《党报的原则》，福建《民国日报·新闻学周刊》第17期，1931年9月1日。

② 同材：《党报的职员》，福建《民国日报·新闻学周刊》第19期，1931年9月18日。

1930年 国民党政府公布《出版法》
1937年 国民党政府公布《修正出版法》
1931年 国民党政府内务部公布《出版法施行细则》
1937年 国民党政府内务部公布《修正出版法施行细则》
1931年 国民党政府公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1932年 国民党政府公布《军机防护法》
1932年 国民党中央公布《宣传品审查标准》
1933年 国民党中央公布《新闻检查标准》
国民党中央公布《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
1934年 国民党中宣部公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
1937年 国民党中宣部公布《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办法》
1934年 国民党政府公布《戒严法》
1937年 国民党中央公布《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
1939年 国民党中宣部公布《战时新闻检查办法》
国民党军委公布《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
国民党军委公布《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
1940年 国民党政府公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
1941年 国民党政府公布《杂志审查须知》
1942年 国民党政府公布《图书审查须知》
国民党政府公布《国家总动员法》
1943年 国民党政府公布《新闻记者法》
国民党政府公布《图书印刷业管理规则》
国民党政府公布《通讯社报社管理暂行办法》
1944年 国民党政府公布《战时出版品审查法规与禁载标准》
国民党政府公布《修正图书杂志剧本送审须知》

通过上述法规与规定，国民党施行了严厉的新闻检查制度。《宣传品审查条例》规定，当局有权审查"党内外之报纸及通讯稿"，各级党部要"随时查察征集"，"凡不属本党而与党政有关的各种宣传品"。《修正出版法》规定对下列内容实行禁载：1. 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违反三民主义；2. 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者；3. 意图破坏公共秩序者。从1933年起，先后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汉口等大都市设立归属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指导的新闻检查所，进行事先的新闻稿件的内容检查。1935年，还成立中央新闻检查处，强化了新闻检查。

在国民党的新闻统制下，进步报刊和书籍受到打击和压制，新闻自由受到严重损害。十年内战时期，被查禁的社会科学书刊达1028种，进步文艺刊物458种。1938年至1941年间，被查禁的书刊达961种，被查禁的报纸通讯社更多，无法统计。直至1945年10月，迫于全国新闻出版界进步人士的强烈反对，新闻检查制度才宣布废除。但是，国民党当局是不会实行真正的新闻自由的，到1949年退出大陆之前，查封进步报刊社和迫害进步记者的事件始终没有停止过。

从新闻理论的视角看，国民党新闻统制的构建，成套的新闻法规的出台，使人们对于党报的本质、新闻自由的本质和新闻法制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上海《中央日报》发刊词是由何应钦撰写的。他在题为《本报的责任》的发刊词中说："本报为代表本党之言论机关，一切言论，自以本党之主义政策为依归。"发刊词强调该报近期的任务是："与民更始"、"摒弃共产党理论"、"进一步宣传三民主义"、"准备宣传方案"、"打倒一切恶势力"。[①] 但《中央日报》同时又标榜是"人民的喉舌"。该报社长程沧波撰写的《敬告读者》说，"依吾人之见，党之利益与人民利益，若合符节。换言之，人民利益即党之利益，为人民利益而言，即为党之利益而言。故本报为党之喉舌，即为人民之喉舌。"[②]实际上，无论是中央党报还是国民党地方党部的机关报，无一不是国民党最忠实的喉舌。国民党力求构建新闻统制，其目的就是钳制舆论，压制异己传媒，造成有利自己一统天下的党营传媒。

在这种传媒布局和钳制舆论的态势下，再来谈论所谓"言论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那就十分可笑了。1929年12月27日，蒋介石发表通电，承诺从1930年1月1日起，"于国事宜具灼见，应抒谠言"，各传媒对于国民党当局"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司法"，"凡弊病所在……请尽情批评"，政府对于这些批评，"凡属嘉言，咸当拜纳，非仅中正赖以寡尤，党国前途亦与有幸焉"。[③] 为此，国民党政府于1932年1月通令取消电报新闻检查，1933年9月1日又发出《保护新闻工作人员及维护舆论机关令》。1934年8月，杭州市记者公会以此为据通电

---

① 《中央日报》发刊词：《本报的责任》，《中央日报》1928年2月10日。

② 《中央日报》，1932年5月8日。

③ 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1995年第二版，第252～253页。

全国，请定"九·一"为中国记者节，得到全国新闻界响应。国民党政府无奈，承认了这个节日。实际上，通电也罢，取消检查也罢，设立记者节以显示尊重新闻自由也罢，并没有丝毫改变国民党新闻统制下的新闻自由状况。这里摘录1947年1月11日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文章《检讨和勉励》中的几段话，就足以戳穿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所承诺的"自由"的虚伪性了。

> 首先，新华日报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一张人民的报纸，因此它所处环境正和广大人民所处的环境一样，是政治上不民主不自由的环境，这种不民主不自由的环境更随时局的急剧恶化而日甚一日，从而经常造成对业务发展极端不利的情势。就言论出版的自由说，过去有新闻检查，固然受到很大的压迫，现在新闻检查虽然取消，而压迫仍然没有减轻。比方，在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的报纸到处"接收"，而本报用自己的力量筹备发行沪版竟被禁止。又比方我们也得不到充分采访自由的权利。在国民党统治区，除南京、上海外，我们的记者根本没有活动的可能；至于派出特派员到外国去，那根本没有可能。在解放区，我们是有特派员的，但由于内战扩大，交通阻隔，很不容易和我们联系；解放区向我们寄送的报纸杂志书籍，都被各地国民党当局扣下了，一分也收不到。就发行和读者联系来说，困难就更多了。

国民党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表明，通过新闻出版立法，是垄断新闻传媒、压制共产党和进步报刊活动，使新闻出版自由成为国民党一党权利的主要途径。例如，1932年1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增订公布的《宣传品审查标准》是这样规定的：

（一）适当的宣传：

1. 阐扬总理遗教者；
2. 阐扬本党主义者；
3. 阐扬本党政纲政策者；
4. 阐扬本党决议案者；
5. 阐扬本党现行法令者；
6. 阐扬一切经中央决定之党务政治策略者。

（二）谬误的宣传：

1. 曲解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者；
2. 误解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者；

3. 思想怪癖或提倡迷信足以影响社会者；

4. 记载失实，足以淆惑视听者；

5. 对法律认可之宗教非从事学理探讨从事诋毁者。

(三) 反动的宣传：

1. 为其他国家宣传，危害中华民国者；

2. 宣传共产主义及鼓动阶级斗争者；

3. 宣传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及其他主义，而有危害党国之言论者；

4. 对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恶意诋毁者；

5. 对本党及政府之设施，恶意诋毁者；

6. 挑拨离间，分化本党危害统一者；

7. 诬蔑中央，妄造谣言，淆乱人心者；

8. 挑拨离间及分化国族间各部分者。

这个《标准》是对1929年《宣传品审查条例》的增订。该《条例》规定的处理办法是："谬误者纠正或训斥之"，"反动者查禁查封或究办之"。①

对《标准》的分析，足可以看出，在阶级社会里，法律总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对于新闻法制的认识，也是如此。

总之，新闻统制、新闻自由、新闻立法，都是为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的。1927～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地区所实施的新闻统制，是这个政权和经济政策的必然结果。

二、法西斯新闻思潮的恶劣影响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铲共"的方针，为法西斯新闻思潮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

以墨索里尼、希特勒、戈培尔等人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者从其政治需要出发，对新闻事业的性质、功能和作用等提出了一系列新闻理论观点，我们谓之法西斯新闻思潮。这一思潮的核心，是"新闻即政治性本身"。陆定一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中说："在阶级社会里，每条新闻归根结蒂总有其阶级性或政治性，这是对的，那么，如此说来，这种'政治性'的'性质说'岂不是正确的么？乍看起来，这的确是正确的。但如果仔细一看，就知道这种说法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异常阴险，异常恶毒，竟是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基础。我们革命的新闻工作者，既然

① 转引自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第524～525页。

有唯物的社会观，就一定承认每个新闻归根结蒂具有政治性。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政治性比起那包含这种政治性的事实来，乃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而第一性的东西，最先有的东西，乃是事实而不是什么'政治性'。说'新闻就是政治性本身'就是把事实与其政治性的关系，头足倒置颠倒过来。颠倒过来有什么害处呢？颠倒过来，立即就替造谣、曲解、吹牛等等开了大门。既然'新闻就是政治性本身'，凡是有政治性的都可以算新闻，那么，政治性的造谣、曲解、吹牛等等不是也就可以取得新闻的资格了么？德意日法西斯'新闻事业'专靠造谣吹牛吃饭，不靠报道事实吃饭，岂不也就振振有辞，有存在的资格了么？"①

有研究者指出，法西斯新闻思潮的内容主要包括：

1. 认为报纸是国家事务的一部分，应严格由政府控制，不允许私人自由办报。

2. 报纸应绝对服从政府指挥，凡对法西斯主义不忠者，不得从事新闻工作。

3. 报纸言论应趋于一致，新闻工作者不应被言论出版自由的谬论所迷惑。

4. 报纸应是对群众进行通俗政治教育和思想宣传的重要工具，应尽力向群众提供保持本民族健康的内容。

5. 群众极易相信报纸宣传，因而报纸宣传对群众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6. 报纸宣传的根本目的在于使群众思想进一步简单化，使他们将政治、经济生活的复杂过程理解为最简单的信条，以便更忠诚地为国家和民族服务。

7. 谣言重复千遍即可变为真理，报纸可以通过重复宣传争取群众相信。

8. 大谎话比小谎话更易使人相信，报纸宣传可以据此使群众将谎言信以为真理。②

在当时的中国，"大后方反动派特务崽子们，在提倡所谓'三民主义

---

①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陆定一新闻文选》，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② 参见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法西斯新闻理论"条，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

的新闻理论’，这就是德意日法西斯‘新闻理论’的变种。在这种‘原理’之下，特务们提倡‘合理的谣言’，公然伪造民意，压制舆论。”①

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宣扬法西斯新闻思潮的新闻性著作有：孙义慈的《战时新闻检查的理论与实际》，国民政府宣传部中央报业经理处的《新中国新闻论》，以及管翼贤纂辑的《新闻学集成》的部分章节。

（一）孙义慈之《战时新闻检查的理论与实际》

孙义慈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新闻检查局副主任秘书。此书成于1941年，军委会曾为此书出版发专电，指出“该书所列举之理由与改进之办法颇为详明切实，可供从事新闻检查人员之指南”。孙义慈自己则表明，“数年来著者从事于新闻事业及新闻检查工作，久拟就个人经验所得，管见所及，著为专编，卒以仆仆鲜暇，未能如愿。迩因委座谆嘱，凡新闻检查员对于本位工作，应多加研究，乃不揣谫陋，掇成斯篇，藉供同好。”②

孙义慈之书，通篇是为新闻检查寻找“合理”依据。孙义慈指出，实行新闻检查，目的在提倡积极的宣传政策，领导全国各单位的宣传，同时也实行消极的宣传政策，取缔各方面不正当的宣传。“新闻检查便是宣传政策的督导者，它具有消极和积极的两种性能。因为消极为积极的基础，没有消极，就没有积极，不能达到消极的目的，便不能发挥积极的力量。例如我们能制止反动宣传，然后始能建立战时的正当宣传，这意义很为明显。所以我们把消极看成平淡，新闻检查就是用消极的统制，而达到积极的意义的。例如纠正反动的新闻和反动言论，分析并指示宣传的方法，藉以集中战时宣传的力量，而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就是一种积极的性质。”③

孙义慈借助“历史教训”，强调宣传的意义。他说，“所谓宣传，是以作之于人类本能的方法，而煽动其直接感情，以获得最好的效果。那么战时宣传是怎样一件事呢？简言之（一）树立我国人民对于正义及胜利的信念，（二）唤起我国人民的敌忾同仇心，（三）利导第三国舆论对于我国有利，（四）搅乱敌人的人心，而促进其内部崩溃。但要达到这样目

①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陆定一新闻文选》，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② 孙义慈：《战时新闻检查的理论与实际》，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1941年版，序文部分第1、3～4页。

③ 孙义慈：《战时新闻检查的理论与实际》，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1941年版，第7页。

的，必须统制我们在战时的宣传力量，因此，我们认为新闻检查在战时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宣传统制的手段。大家都还记得第一次欧战是德国吃了亏。德国为什么吃亏呢？许多人以为是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崩溃所致。但仔细研究起来，德国经济崩溃，固然是它吃亏的原因之一，但另外还有一个内在的重要的原因，便是没有一个强固一贯的宣传政策，往往军事长官和外交官站在一个立场上说两种话，反映于新闻纸的，便是错杂分歧，失掉了战时宣传的重心。鲁屯道夫曾说，德国之所以败，是没有泰晤士报，就是这个道理。"①

孙义慈在批驳"有闻必录"原则无论在平时或战时均不正确之后，肯定新闻检查有利于国家民族的生存，同言论自由的宪法精神并无矛盾，强调指出，"新闻检查人员代替新闻记者担负了他们对于国家社会应尽的一部分责任"，所以不仅不是取消了人民的言论自由，反而是帮助了新闻记者的自由言论。

作者指出新闻事业应遵循的原则应该是：以（一）建立三民主义的文化，为其最高理想，（二）教导并感化民众，为其着手方针，（三）树立新闻国防，为其斗争目标，（四）不妨害国家民族利益，为其指导范围，"这里第一原则是规范的，第二原则是启导的，第三原则是斗争的，第四原则是保障的，而这四个原则均为达到'增进并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目的。"②

孙义慈还专门设立一节谈论"现在使新闻界乐于送检的办法"，这也许就是出版者所说的，是孙的"经验之传授"了。他一共谈到五点。

第一，确立新闻检查制度。孙认为，新闻检查，不仅战时必需，平时也应进行。他说，"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来看新闻检查的制度，是有永久的需要，战时固然非此不可，平时也仍有存在的价值。我们为求新闻检查的进行，与时俱进，不受政局的影响，首先应把新闻检查制度确立起来。制度确立以后，就奠定了坚固不拔的基础，一切设施，就可有计划地进行，而新闻界人士的视听，也可随之转移。这样，新闻检查的本身，既可逐渐充实，新闻界藐视的态度，也必随之消失。"③

---

① 孙义慈：《战时新闻检查的理论与实际》，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1941年版，第6～7页。

② 孙义慈：《战时新闻检查的理论与实际》，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1941年版，第9～10页。

③ 孙义慈：《战时新闻检查的理论与实际》，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1941年版，第50～51页。

第二,健全新闻检查机构。

第三,慎选新闻检查人员。

第四,改进新闻检查技术。新闻检查员一面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一面还要照顾到新闻界人士的心理。

第五,新闻检查人员应当常与新闻界人士晤面恳谈。孙义慈指出:"新闻界人士因习于言论自由之说,对于新闻检查,每多误解,新闻检查员应对之谅解,并应以坦白诚挚之态度,说明检查的任务,仅系对于国家民族利益相违背之消息言论,予以必要的修正,并无妨碍新闻事业之意图。新闻检查员对于国家重要事项立言纪事之标准,因有上级之随时指示,了解较多。本于'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的古训,各种稿件,送经检查,当然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能以这种态度和旨趣,时常与新闻界人士,往还恳谈,不独可以消除彼此隔阂,且能增进新闻界人士之对于检政之了解。这样,新闻界自然不会有不送检的事情。"①

作者在最后一章(第十四章)中,对当时中国的新闻检查作了总结。他指出:"宣传工作的手段与方式,种类颇多。最普遍而最重要者的,即为文字宣传。古人说:'笔力扫千军',这是说明文字宣传力量之大。文字宣传当中,最普遍而最重要的,即为新闻纸,若宣传而不知利用新闻纸,就等于自弃其最优的武器,决不是聪明的办法。良以新闻纸是大众的精神食粮,流传至为广泛,不仅国内识字的人,每日多加披阅,即外籍人士,亦多购阅,故无论对内对外宣传,新闻纸实据于极重要之地位。且新闻纸为国家宣传政策之所寄。而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之动态,人民生活之情况,社会舆论之向背,又可于此一纸窥其全豹。因其关系之重要,故须有严密之检查,然后发言立论,纪事遣词,方能符合国策、荷负使命。否则'载舟覆舟',利之所在,害也随之,一种宣传的利器,容易变成宣传的障碍。"②

书在附录收集了有关新闻检查的文件、表格共57件,是当时最为齐备的关于新闻检查的出版物。

孙义慈的这本书,完全是为国民党的新闻统制服务的,为新闻检查论证的著作。作者所阐发的理论,是典型的法西斯新闻观点,在当时的

---

① 参见孙义慈:《战时新闻检查的理论与实际》,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1941年版,第51~52页。

② 孙义慈:《战时新闻检查的理论与实际》,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1941年版,第68页。

儿本论新闻政策的书中，具有代表性。

（二）报业经理处之《新中国新闻论》

汪伪政权的国民政府宣传部中央报业经理处编印的《新中国新闻论》出版于1942年7月，全书分大东亚建设和宣传、新中国建设与报人之使命、报纸的新理念、报人和新国民运动、报纸的企划和技术、报纸组织化的重要性、报社的组织和管理等7章，汇辑发表在汪伪中央报业经理处发行的《报业旬刊》上的有关文章，其目的为宣传汪伪的所谓"计划新闻政策"。

这本书的作者完全肯定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指责国人"漠视世界的变革"，"执迷过去的错误民族意识"，鼓吹"扶植及诱导国民的正当观念，结成以全东亚为单位的新国家体制"，并进而指出："处此情形之下，报纸是宣传攻势的核心；是宣传计划的基本。报纸是国民精神食粮，是大米面粉一样，是日常生活上一日也不可缺的。任何阶级的人，都是用了和读普通的印刷物如杂志小册子不同的观念来阅读报纸的。所以报纸的任务，就不同异常，而是绝对的，其性格之应正大，更不待言了。"①

作者将所谓日本的"东亚精神"——"势"，引入到中国的新闻学理念，说："我们眼前应该做的工作，是要把我们的武器——报纸，如何使其保有伟大的吸引力，如何使其纸面充溢着迫力。报纸的气魄乃至'势'，实在是东洋的宣传之要谛。在世界战史上占灿烂一页的此次日军的空袭夏威夷，与飞机体一并冲人敌战斗舰的'势'，——我们应该以此种精神为宣传行动的精神。宣传的泼剌的跃动——即宣传之'势'，才能攫住读者的心理，才能击破敌人宣传反攻。我们应把此'势'由一张报纸推广到全国的报纸，由一国推广到二国、三国，使大东亚的全体新闻，成为东亚解放的尖兵。"②

作者鼓吹报人对战争尽力，为战争服务。在"大东亚战争"中，作者要求报人"应以中华民族的一员，新中国建设者的资格，发展地突破此现实的困难。……报纸不是舆论的反映者，而是舆论的创造者，激发者。处此大时代，报纸应该最高度地发挥其指导力，作为社会的木铎。"③

---

① 国民政府宣传部中央报业经理处：《新中国新闻论》，中央书报发行所1942年版，引言第2～3页。

② 国民政府宣传部中央报业经理处：《新中国新闻论》，中央书报发行所1942年版，第9页。

③ 国民政府宣传部中央报业经理处：《新中国新闻论》，中央书报发行所1942年版，第12～13页。

作者号召赋予报纸以“公”的性格，以“公”为报纸本体，发挥其指导力。这种情况下，报纸成了“国家的机关”，既不仅是政府的机关，又不仅是民众的喉舌。这样，对报纸就可实行“计划新闻政策”，即通过国家的力量，扶助与强化报纸的“公”的性格和令报纸产生指导力。作者把这种看法称为报纸的“新理念”，说，“报纸若能立脚于这样的新理念、各级报纸又能在全体上组织化之时，才能够逐次为社会各阶层认识，对它的信仰程度也可提高。如此，报纸所具有的指导力，才能自然而然地，骎骎乎渗透于社会的全面。”①

谈到报纸指导力时，作者反对“有闻必录”的原则。作者说，“但报纸决不可仅是‘有闻必录’的机关。报纸应是官民连锁的机关，推动政府，唤起民众，发挥强大的指导力，以引导政府和人民的结合。详言之，就是用‘诚明坚毅的精神’和‘遇变不乱，临难不苟’（汪主席训条第八及第九条）的态度，不屈服强权，（请回想袁世凯时代的报纸为如何！）不取媚民众，而发挥其根据宣传伦理的强大指导力。”这种指导力，须一方面推动政府，另一方面领导民众，“应是兼有‘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的双方面的指导力。这就是今后报纸应该具有的新性格。”为此，作者指出，报纸应该办到以下三点：确立新的宣传伦理；确立‘公’的经营体；各报社构成一个组织体。②

作者由建立“大东亚体”新中国的政治理念，提出报纸应为新中国服务的新闻理念（即具有新的指导力）。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新闻方针和社论方针。关于新闻方针，“不问是国外消息，或国内消息，材料的选择，内容的斟酌，要点的标明等新闻要素，应该视各社的信念理想而定。所以我们对于国际消息的取舍，国内消息的取材的态度，当然应根据和平理想，加以严明的判断。由新闻的本质，为制造舆论的元素一点说，则即是琐细的文字的排列，也不可不渗透着从新中国观点所产生的指导性。”③关于社论方针，作者指出，“社论是一张报纸的代表主张。这原则，无论是自由主义报纸，党派的报纸，抗战的报纸或和平报纸，都可以同样适用的。因为鼓吹自己的主张，旨在要求对象的共感，

① 国民政府宣传部中央报业经理处：《新中国新闻论》，中央书报发行所1942年版，第40页。

② 国民政府宣传部中央报业经理处：《新中国新闻论》，中央书报发行所1942年版，第46、50、51页。

③ 国民政府宣传部中央报业经理处：《新中国新闻论》，中央书报发行所1942年版，第54～55页。

使对象(读者)共鸣自己的主张。因此,发生了提高社论指导性的必要。换言之,社论非有指导性不可。没有指导性的社论,是毫无意义可言的。我们和平报纸,所担负的使命,是贯彻和平的理论和信念。社论主要使命,是指导民众,创造和平的舆论。"[1]

作者在这里强调新闻取舍要依据"和平"理想,社论立言要以"和平"为依归,"和平"自然有着特定的含义。这在本书的引言中已有明确说明。作者说,"和平反共建国的'和平'两字,是对重庆的抗战而言。和建的目标,是要在东亚建设新秩序,创造东亚全民族共存共荣的天地。所以对象不是中国一国,而是东亚全体;在中国四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尚没有如此规模宏大的建设运动的先例。"[2]这一番说教,活生生画出了一副汉奸走狗的嘴脸,也和盘托出了这本书所贩卖的法西斯新闻观点的本质。

(三)管翼贤之《新闻学集成》

《新闻学集成》共8册,由管翼贤纂辑,日伪中华新闻学院印行,于1943年出版。这是供学生使用的教学参考书,将以往一些大学及该学院的新闻学教材汇编而成。第一册含总论、新闻、报纸、舆论4篇,第二册含新闻记者、编辑、副页三篇,第三册含采访和社论篇,第四册含广告和报业经营篇,第五册含报社组织、通讯社和宣传三篇,第六册为各国新闻概况篇,第七册含报史、报业名人事略和新闻教育篇,第八册含新闻法律、报业守则及特殊作品篇。各册均附设相同的中、日、英文参考书目。

编纂者管翼贤为中国报人、日伪政权新闻部门负责人,中华新闻学院教务主任兼教授。他编纂的八册《新闻学集成》中,第一册涉及理论新闻学的内容最多。书中论及的许多观点,按管氏介绍,来自当时燕大、平大、朝大、民大等四校讲述新闻学总论的材料,(这些材料论及的观点,管氏自然是赞成的。)也有日伪中华新闻学院三年间的教材,其中不少是管氏自己的东西,因此,对于第一册总论中关于新闻传播的许多观点,我们主要视为管氏的观点加以评点。由于集中了许多新闻院校的教材,所以不少观点具有相当的科学性;也由于中华新闻学院系日伪

---

[1] 国民政府宣传部中央报业经理处:《新中国新闻论》,中央书报发行所1942年版,第55页。

[2] 国民政府宣传部中央报业经理处:《新中国新闻论》,中央书报发行所1942年版,引言第1页。

政权所办，管氏本人又是日伪政权的新闻官员，自然观点中也少不了法西斯新闻观点的成分。下面，对第一册中含有法西斯新闻观点的论述作必要的分析。

1. 关于新闻的本质。管翼贤说，"新闻是一种日刊的年代记，把世界史上各时代的现象，连续的直接的表现出来记录出来。全世界和各种事件，都由新闻来搜集、整理、解释、单纯化、图式化。并且凡是一度经由新闻滤过的世界，都相信它是客观的真实的。新闻是一种终局现象。真正发生的事件，在新闻上作为记录而表现出来，渐渐固定化、整理化。""这样看来，我们可以说新闻（注意其表现形态）是'现代'的事物化、相貌或征候，我们的社会知识，不外是由新闻所图式化了的社会形象。"[1]由这样的分析，管翼贤得到这样的"结论"：

> 因此，一方面新闻是虚伪的贮藏，是浸入人们知识之中的一种谬误。有人主张新闻只不过为特定的利益关系者而制造的宣传物。虽然如此，而一般人在直观的形式上，仍然相信新闻所报道的事实是真实的。即使相信新闻是制造虚伪，然而因为缺乏能够判断真伪的正确标准，所以一般人的印象也就认为它是真实的了。
>
> "新闻化的世界"，对于一般社会人，是"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变成了"虚伪的世界"。因为"新闻化的世界"被用作"真实世界"的判断规准了。在这种意义之下，占支配地位的，乃是判断的倒错。
>
> 换言之，存在于我们意识之外的实在是虚伪，存在于我们意识之内的假构是真实。社会的事实，经过新闻而凝固于我们意识之中，因而，对于我们，在新闻上所显示的世界是真实，不在新闻上所显示的实在毋宁是虚伪。所谓真实不过是虚伪之一种，这句话最适合于新闻。新闻是"由伪作真"。纵然是完全虚无的事实，只要新闻把它作为事实报道出来，在社会上就有实在性。新闻具有"由无生有"的神秘力。
>
> 新闻好像是一根魔术杖，一切东西，甚至空虚的东西，只要经新闻的魔术杖一接触，就获得客观性和具体性。因为新闻有一种特殊的力量，超越单纯报道（社会事实的反映）的机能以上。[2]

---

① 管翼贤：《新闻学集成》第一册，中华新闻学院1943年版，第2页。

② 管翼贤：《新闻学集成》第一册，中华新闻学院1943年版，第2～4页。

管氏作了上述大段结论之后，虽也有若干批判，但很快折服于"宣传的需要"而容忍新闻的这种"机能"。他说："有意识的想来利用这种错觉，无非是要使新闻变为形成'同化征服'的锐利武器，变为'主观'的'客观化'或宣传的现实化的手段。于是，新闻遂成为支配多数个人的意识内容，以支配统一多数力量，而展开新的创造或高贵的社会目的的一种方法。"[1]这种看法，同新闻要服从政治，新闻要服从"大东亚圣战"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2. 关于新闻和新闻学的功能。管翼贤把这种认识，视作"应用学而提供新闻政策的规准与武器"，并由此而指出新闻及新闻学的社会功能。对于新闻学，管氏指出："在现今不安的时代之下，新闻学不仅与单纯的职业教育问题有关，而且可以提供战术的基础理论，以作政治的斗争手段。因为所谓权威，如乔列斯所说，不外是实际化了的舆论。"至于新闻的功能，管指出，"独裁国家，不把新闻作为单纯的报道手段，而更作为指导手段。"[2]换言之，无论新闻学还是新闻报道，在管翼贤看来，统统是实现政治目的的一些手段而已。

3. 关于统制新闻的必要性。管翼贤指出："新闻是国家对国民之一新政治教育，负有对全国国民教导之责任，应为国家之一机构，本自国之精神，使国民对建国之理想，国民之使命，有深刻之认识与坚强之自信，绝不为反国家反民族之思想所动摇，而确保民族思想与国家观念，一方面还要使民众了解生命之意义，在牺牲个体拯济人群，行动之所止，在服务而不在掠夺，精神之所止，在牺牲而不在享受，使全国国民养成为国家为民族而牺牲一己之崇高伟大之精神，在现代国际情势极度复杂错综之下，一国家民族为适应世界潮流与目前需要非政治集权经济统制不能对内统一，对外自保，尤非全国人民对国家领袖绝对信仰与服从，不能应付非常事态，以上种种，均新闻对国家应担之重责，而有待于统制以期实现者，况国际风云紧张之今日，其所形成国防要素之宣传战，更有赖于新闻统制以为胜利之保证也。"[3]这一大段说教，十分明确地表明了管氏一类人的法西斯新闻统制思想。

4. 关于报纸的读者分析。在管翼贤看来，报纸的读者水准都是很

① 管翼贤：《新闻学集成》第一册，中华新闻学院1943年版，第4页。
② 管翼贤：《新闻学集成》第一册，中华新闻学院1943年版，第13页。
③ 管翼贤：《新闻学集成》第一册，中华新闻学院1943年版，第14—15页。

差的，因此，"报纸的权威，可使读者把它看做一种神圣的报道，在原始社会，维持秩序和权威的，是民众迷信的表征，在现代社会的势力，便要算报纸了。因为根据人人心中皆有一种迷信的信赖新闻权威的心理。一般人在理性方面虽然知道新闻的报道，误传失真的记事，常占大部分，可是人们依然是很信赖，假令捏造一件虚伪的事，一经新闻登载，世人便都信以为真，新闻的权威常因登载奇怪的事而增大。……他们（指民众——引者注）既无理解新闻的能力，他们的意见批评都是无条件赞成新闻，新闻本有选择内容的自由，选择新闻内容的自由权，完全操诸民众手中，新闻在道德上有与社会相反的影响，其根源即在乎此。……社会群众中无知识失教养的人常占最多数，新闻都用这种的读者做目标，所以新闻不得不带有浅薄性和低劣性。"①对读者的这种片面的、不公正的评价，是法西斯主义者视群众为"群氓""阿斗"的思想最好的流露。

由国民党的反动政治本质导致必然的严厉的新闻统制，由法西斯主义的反动哲学观和政治观导致必然的法西斯新闻思想，这是中国在20世纪30～40年代难以避免的新闻现象和新闻思潮，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态势和国际斗争风云下必然的历史产物。

第四节 人民新闻事业经验的理论总结

作为国民党新闻统制的对立面，这一时期出现了以张友渔、邹韬奋、范长江等人领导或参与的人民新闻事业与进步新闻事业。范长江等后期也参与和领导了党领导的新闻事业的工作。他们对于新闻传播的理论阐述，既是人民新闻事业与进步新闻事业丰富经验的理论总结，又明显地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观点的影响。

一、张友渔与《新闻之理论与现象》

有研究者指出，张友渔是我国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新闻传播活动的新闻学者。张友渔从1918年开始给报社投稿，至1949年有30年新闻生活经验。他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以左派文化人、大学教授身份为《世界日报》等进步报刊工作。1936年，他出版了《新闻之理论与现象》。在这本书中，张友渔运用阶级与阶级斗

① 管翼贤：《新闻学集成》第一册，中华新闻学院1943年版，第139～140页。

争观点考察与分析新闻传播的几个基本问题。这本书由《新闻的性质和任务》、《何谓社论》等27篇论文与译文构成，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著作。1982年，重庆出版社将这本书的主要论文连同张友渔的新作结集再版，书名为《报人生涯三十年》。我们根据新版本，对张友渔当时的新闻观点作如下归纳。

1. 新闻和报纸是阶级斗争之武器。张友渔认为，"新闻是社会的一现象，是社会意识的一表现。所以说到新闻的性质和任务，也不外是以社会组织为基础，应社会实际的需要而产生的东西。""社会本身既是阶级斗争之社会，因而成为社会的一现象之新闻，也不能不是阶级斗争之一表现，故所谓新闻，不外是阶级对立的人类社会中之阶级斗争的武器。即压迫阶级，用新闻维持他的支配地位，被压迫阶级，用新闻反抗压迫阶级，还有同一阶级，在分解过程中有时也用新闻互相攻击。"张友渔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社会和无阶级社会进行分析之后，说，"总之，在原始社会乃至将来的社会，都是没有阶级，没有阶级斗争的。不过，新闻的发生、成长和发达，是在阶级社会里；尤其所谓真正的新闻，即近代乃至现代的新闻，是发生、成长和发达于阶级社会之最高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所以不能不说新闻是阶级斗争之武器。"

张友渔对于报纸阶级性在社会斗争中的不同表现形态作了分析。他说，"新闻最能表现它的性质和任务的时期，是在旧社会和新社会间，正在变革，旧势力和新势力间，正在斗争，以及新社会代替旧社会而成立，但新势力还没有巩固地确立了它的支配地位的时候。""但随着资本主义的支配之确立，新闻也在资本主义的支配之下而商品化了。商品化了的新闻和一般的商品一样，是以在数量方面的多量销售，为第一重要的事情的。所以在新闻经营者，常努力于投社会之所好，而以在新闻上露骨地表现出其为自己的机关之性质为厉禁；同时，标榜所谓'严正中立'，'不党不偏'及'超阶级'等，以欺骗社会大众。一见的时候，也许有人会相信新闻不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实则，新闻经营者，决没有忘却利用新闻于阶级斗争的这件事。他们对于新闻，一方面，固抱有不可不获得利润的要求；而一方面，也另具有利用新闻于自己之阶级的意识之支配的要求。"①

---

① 张友渔：《新闻的性质和任务》，《报人生涯三十年》，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117～122页。

2. 报纸与政治的关系。张友渔指出，报纸既是阶级斗争之武器，同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说，要明白政治同报纸的关系，第一要知道"政治是什么"，"政治是站在支配地位的支配阶级，对于站在被支配地位的被支配阶级的一种统治工具。"第二要知道"报纸是什么"，"报纸大概分别起来，可以有两类：一是站在支配阶级的方面，对于被支配阶级，营着思想上统治的作用之'御用新闻'；一是站在被支配阶级的方面，对于支配阶级的思想统治，表示反抗的'反抗新闻'。所谓'思想上的统治'，就是拿一个思想支配了许多人的思想，结果，使许多人的思想都融化在这一个思想之内，而实现了'思想统一'。实行统治思想的方法，可有种种：或用教育，或用电影，或用戏剧……但最有效的，要首数报纸。因为教育等，都限于一定的场所，都以有限的人为对象；只有报纸在社会上的影响，没有限制，故在思想统治上，报纸的效力最大。政治是支配者对被支配者统治的工具，而报纸尤其'御用新闻'，也便是这种统治工具的一方面——在思想的统治上，而'反抗新闻'呢？却正是同一统治工具的反作用。如其政治上的反抗的势力，得到成功，则'反抗新闻'一变而为'御用新闻'了。所以政治和报纸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有人以为报纸对于政治，是中立的，超然的，不偏不党的；其实不然，任何报纸，也脱不了政治作用，也就是任何报纸对于政治不是中立或超然的。"①

3. 新闻统制就是支配阶级斗争。张友渔谈到政治与报纸之关系时，提出两点看法，一是报纸是政治的一种统治工具，二是"统制言论（即统制报纸）的本身无可反对，问题是统治阶级的自身，是否应该反对？以及统制言论的方法，是否妥善？"②他由此而进一步指出，在阶级社会，所谓新闻统制，就是支配阶级同被支配阶级间的斗争。他说，"新闻是阶级斗争之武器，即支配阶级对被支配阶级，在暴力的统制之外，又借新闻，来实行一种思想的统制；同时，被支配阶级，也在暴力的反抗之外，常拿新闻来作一种反抗的工具。因而在阶级社会里，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之间，必然地发生新闻的斗争（即思想言论的斗争之一形态），像必然地发生暴力的斗争一样。在革命的过程中，这种斗争，更显著地暴露着。在支配阶级，想要在此种新闻的斗争中，获得胜利，必须

---

① 张友渔：《政治与报纸》，《报人生涯三十年》，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160～161页。

② 张友渔：《政治与报纸》，《报人生涯三十年》，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162页。

一方面，整饬自身的军容，扩充自己的实力，即增加自身的新闻，且统一作战的步骤；另一方面，凭藉政治的权力，摧毁对方的壁垒，即对于被支配阶级的新闻，威胁利诱，使其投降，否则消灭。这两方面的作用，便是所谓'新闻统制'；也便是一方面利用能够利用的新闻，另一方面，压迫不能够利用的新闻。"

张友渔认为，"自有新闻以来，便已同时有'统制新闻'。所以阶级社会里的'统制新闻'其本身，没有讨论'应该''不应该'的余地，纵然是不应该，但它必然地产生了。所成为问题的，只是：第一，什么人即哪一阶级的人，才有'统制新闻'的资格与能力？才能获得'统制新闻'之最后的胜利？第二，在某一特定时期，'统制新闻'，应该采用何种方法？实行到何种程度？"[1]

4. 报纸与舆论之构成。张友渔指出，"人们都说，报纸是代表舆论的、指导舆论的，乃至构成舆论的。但报纸和舆论的关系，究竟怎么样呢？所谓代表舆论，就是说报纸和已经存在的舆论是一致的；所谓指导舆论，就是说报纸要构成和它相同的舆论；总之，二者，都不外是要把报纸和舆论打成一片的，也就不外是要拿报纸构成舆论，或它自身为舆论所影响。报纸和舆论之构成，有交互影响的作用；它们的关系，就在交互影响这一点。"

张友渔分析舆论形成的过程，说，"极抽象的讲起来，舆论构成的过程，和'流行'之构成的过程，很相似。所谓'流行'，便是一个新的模型，被创造出来后，大众都来称赞它，模仿它，传播它的过程。……所谓舆论，也像这样，不外是关于某一特定的事象，创造了批评或要求的新模型，而大众都称赞它，模仿它，传播它罢了。""因此我们可以说，无论是关于流行的构成，或关于舆论的构成，都有两个不可缺的必要因素。即：一方面，须有新模型的创造；他方面，须有大众对新模型的称赞、模仿和传播。"

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张友渔指出，"报纸是创造关于批评或要求的新模型者之一，所以舆论是依靠报纸而产生的，即是报纸创造舆论。实则报纸自身不能不为社会关系所制约，即报纸所提出的批评或要求，不是凭空造出来的，而是以当时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并且新模型创造后，非经大众赞成、模仿和传播，不能成立，不能存在。报纸无论有怎

---

[1] 张友渔：《论统制新闻》，《报人生涯三十年》，重庆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44～145 页。

样的新奇主张，离开大众是不能成为舆论的。”这样，张友渔把社会关系中的大众、报纸、舆论三者之关系比喻为：“大众好像是田地，报纸好像是耕农，舆论好像是耕农在田地里所种植所收获的谷物。没有田地固然不会有谷物，没有耕农，谷物也不能很容易地长成。”

张友渔还指出，报纸和大众在舆论的构成上，不是无规律、无统制的，随便营着交互作用的。这是因为，任何报纸的后面，都站着支配它的某一阶级。因此，“在舆论的构成上，既有阶级关系参加，那么，不管是好是歹，舆论，是不能不具有阶级性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形成两大对立的阶级，因面舆论，已变成两大阶级的舆论了。”①

5. 机关报的性质和价值。张友渔认为，机关报是必要的，机关报不是坏东西。他说，“其实，报纸，原为政治斗争即阶级斗争的武器，严格讲起来，没有一个报纸，不是‘机关报’。例如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之商品化的报纸，营利的性质，较政治斗争的武器之性质为显著，好像不是什么‘机关报’，实则，还不外是资产阶级的‘机关报’？在政治斗争激烈的时候，报纸，是公然挂起‘机关报’之旗帜的，而且愈是‘机关报’愈有价值。……在一般资本主义社会里，政治斗争不甚激烈时，报纸走向商品化之途，常装着‘中立’、‘公正’、‘不党不偏’的态度，不愿自己承认为‘机关报’。然而公然承认为‘机关报’的，也还不是没有，例如各国政党的‘机关报’。所以我们在原则上，不必反对‘机关报’。其实，我想，也没有绝对反对真正的‘机关报’的。‘机关报’之所以为人鄙视，实在，不是因为它是‘机关报’，面是因为它所代表的那种背后的势力，是一般人所反对的势力。……其次，‘机关报’本身的内容，太不完善；办‘机关报’的人，本身不得人望，也是使‘机关报’失掉价值的一个原因，而且可以说是主要原因。”“总之，‘机关报’的本身，不一定是应该鄙视的；‘机关报’而办得不像一个报，那才值得鄙视呢？”②

6. 报纸的煽动功能。张友渔认为，报纸具有煽动的作用。他说，“报纸，具有煽动的机能，能够煽动群众去实行一种行动。所以在任何一种革命时代，报纸常是站在斗争的前线的。”他分析，报纸对于群众之所以具有煽动作用，是由于报纸可以影响到群众心理，尤其是报纸的评

① 张友渔：《报纸与舆论之构成》，《报人生涯三十年》，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129～131页。

② 张友渔：《论“机关报”》，《报人生涯三十年》，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157～159页。

论，比报纸的叙述更具有煽动作用。

张友渔运用心理的刺激-反射机制，说明报纸对群众的煽动，主要表现为间接的作用。"这是因为报纸是社会的感觉机关，社会上，一般人们所具有的社会的感觉，是由报纸给予了有力的决定的。所谓社会的感觉，就是对于现社会的生活条件的感觉。"这样，便引发读者对报纸的叙述和评论作出自己的反映。再者，报纸"也能特别成为表现社会的知觉深刻，社会的感觉锐敏之所谓少数先觉者的意识之机关；所以对于知觉的刺激，具有对于一般钝觉的人，启发其知觉的效果之力量。"

张友渔还指出，报纸的这种间接的煽动的力量，不能不依靠一些所谓的"新闻技巧"，尽可能的范围内，应力求能够判断消息的真伪，因而发表自己所认为可靠的消息。常常登载可靠的消息之报纸，可以博得社会的信任，不但对于社会有所贡献，在报纸自身，也是很有利益的。"①

张友渔上述八个方面的新闻观点，明显地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光辉。他对许多进步报刊实践经验的理论阐发，也具有可贵的科学性，说明了这一时期我国新闻学研究理论水平的提高。

二、邹韬奋之"大众喉舌"新闻观

作为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邹韬奋的新闻理论观点在历史上和在当前，都产生过和产生着深刻而经久的影响。其主要新闻观点是：

1. 办报目的"以民众的福利为前提"。邹韬奋无论是办"抗战"系列报刊还是"生活"系列报刊，其办报刊的目的始终只有一个：为大多数民众谋利益，而不是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私利。他接办《生活》周刊初期，就明确表示："我们办这个周刊不是替任何个人培植势力，不是替任何机关培植势力，是要藉此机会尽我们的心力为社会服务"。他自己也"不想做什么大人物，不想做名人"，②而是"完全以民众的福利为前提"。③邹韬奋在香港办《生活日报》，也表明自己的立场："言论要完全

---

① 张友渔：《由消息的真伪谈到天津〈益世报〉的失败》，《报人生涯三十年》，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125～126页。

② 邹韬奋：《〈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生活》周刊4卷1期（1928年11月18日）。

③ 邹韬奋：《本刊与民众》，《生活》周刊2卷21期（1927年3月27日）。

作人民的喉舌，新闻要完全作人民的耳目"，要把报纸办成真正的"人民的报纸"。[①]

2. 办好报刊"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邹韬奋指出，办一份报刊，内容不能"人云亦云"，形式不能"亦步亦趋"，而要有创造性，"尾巴主义是成功的仇敌"，"要造成刊物的个性或特色，非有创造的精神不可。"[②]之所以要有创造精神，邹韬奋认为有两个原因，其一，时代在前进，担负着领导和反映任务的报刊也应与时并进；其二，新闻工作自身也应不断地变化发展，自己有所进步，才能推动社会进步。

3. 办好报刊要不畏强暴，坚持"报格"。邹韬奋一生主持报刊工作，始终坚持崇高的报格。他说，"记者所始终认为绝对不容侵犯的是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也就是所谓报格。倘须屈服于干涉言论的附带条件，无论出于何种方式，记者为自己人格计，为本刊报格计，都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③]

作为报刊的"保姆"的编辑与记者，邹韬奋时时强调要以崇高的理想去培育报刊的报格。在谈到《生活日报》的方针时，他说，什么是我们理想中的《生活日报》呢？换句话说，我们希望这襁褓儿，将来长成怎样的一个伟大人物呢？理想的《生活日报》：

> 必须是反映全国大众的实际生活的报纸；
>
> 必须是大众文化的最灵敏的触角；
>
> 必须是五万万中国人（连国内国外的中国人合计）一天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④]

邹韬奋无畏地指出，《生活日报》的这种理想，只有在新中国才能实现。而在旧中国，在遭受无理压迫和迫害的情况下，为保全人格报格，不惜报刊被查封，"决无迁就屈伏之余地"。

4. 真正的舆论才能发挥舆论的伟大力量。邹韬奋高度重视舆论的力量。他说，"民主政治的社会最重视民意的表现，表现的方法除选举外，便是舆论。就一般说来，舆论的表现虽也有着种种的途径，但是报纸和杂志上的言论，尤其是社论，更被人视为直接的表现。"报刊言论

---

① 邹韬奋：《〈生活日报〉的创办经过和发展计划》，《生活日报》第55号（1936年7月31日）。
② 邹韬奋：《几个原则》，《经历》，三联书店1978年第2版，第77页。
③ 邹韬奋：《与读者诸君告别》，《生活》周刊第8卷第50期（1933年12月16日）。
④ 邹韬奋：《关于〈生活日报〉问题的总答复》，香港《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第1卷第3号（1936年6月21日）。

尤其是报刊社论由少数人甚至主笔一人执笔，又何以有如此伟大的力量？韬奋指出，这种力量，“绝对不在执笔的个人或少数人的自身，却在所发表的言论确是根据正确的事实和公平的判断，确能言人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这一点当然也还须有着相当的客观条件），真够得上舆论，才能发生舆论的伟大力量。”

对于当时旧中国的舆论形态，韬奋发表了重要的见解：“所以‘舆论’这个重要的——也可以说是神圣的——宝物，不是有钱办报，有笔写文，就可以夺取到手的；也不是强迫任何人拿起笔来写出你所要说的文章，印在纸上，送到读者的手里，就可以发生什么舆论效力的。有钱有势的人尽管可以压迫舆论、收买舆论，乃至摧残舆论，但这些手段只是做到表面上像煞有介事，在实际上丝毫收不到所希望的舆论的效果，因为‘舆论’这个宝物也是奇物，真正的舆论有如真理，无论如何是压不下去的！”

韬奋指出，读者对于报刊言论有主动审察的能力和机会。他说，“写文章的人不要以为读者是易欺的，读者不都是瞎子聋子，他们也有听到正确事实和公平判断的机会，他们自己也有根据正确事实，引申公平判断的能力。所以惯于下笔胡说八道的人固然引不起读者的信任，即使平日持论比较公平，被人视为社论能手的先生们，一旦写了违心之论，或有意歪曲事实的文章，也仍然要引起读者的不满以至愤怒。在写者以为他既可以舆论权威自居，好像说出的话都可以发生意想不到的效力，其实他根本就不明白他平日所以得到人们的信服，并不是他个人有着什么魔力，全恃他的‘持论比较公平’，一旦他的这个特点抽去，令人信服的因素便寿终正寝，所得到的只是人们的唾弃和齿冷罢了！”韬奋由这番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说明言论固然可以发生舆论的力量，但却不是一切言论都可以发生舆论的力量。只有根据正确事实和公平判断的言论，才可能发生舆论的力量。”①

5. 兼顾事业性与商业性。韬奋认为，办报刊，只有兼顾事业性与商业性，才能发展事业，维持报业生存。他首先强调事业性的重要意义。他说，“我们这一群的工作者所共同努力的是进步的文化事业，所谓进步的文化事业是要能够适应进步时代的需要，是要推动国家民族

① 邹韬奋：《舆论的力量》，转引自张之华：《邹韬奋》，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218页。

走上进步的大道。我们在上海开始的时候，就力避'鸳鸯蝴蝶派'的颓唐作风，而努力于引人向上的精神食粮；在抗战建国的伟大时代中，我们也力避破坏团结的作风，而努力于巩固团结坚持抗战及积极建设的文化工作。这可以说是我们的事业性的含义。为着要充分顾到我们的事业性，我们有时不惜牺牲，我们的同事往往为着抗战建国的文化事业而受到种种折磨与苦难，毫不怨尤。但是在经济方面，因为我们要靠自己的收入，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仍然要严格遵守量入为出的原则。这里便牵涉到所谓商业性。我们的业务费，我们的资金，既然要靠自己的收入，所以我们不得不打算盘，不得不赚钱。这可以说是我们的商业性的含义。"

韬奋认为，对报刊工作来说，事业性和商业性是要兼顾而不应该是对立。但是，这两个方面处理不好，超出了应有限度，也会出现对立的流弊。他举例说，"倘若因为顾到事业性而在经济上作无限的牺牲，其势不致使店的整个经济破产不止，实际上便要使店无法生存，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机构消灭，事业又何从支持，发展更谈不到了。在另一方面，如果因为顾到商业性而对于文化食粮的内容不加注意，那也是自杀政策，事业必然要一天天衰落，商业也将随之而衰落，所谓两败俱伤。"韬奋提出，在事业性和商业性的问题上，"我们不许有所偏。因为我们所共同努力的是文化事业，所以必须顾到事业性，同时因为我们是自食其力，是靠自己的收入来支持事业，而发展事业，所以必须同时顾到商业性，这两方面是应该相辅相成的，不应该对立起来的。"①

6. 编务工作要抓"一头一尾"。韬奋认为，办好报刊，重要的是抓好"一头一尾"。"头"是言论，"尾"是处理读者来信。韬奋重视言论的作用，他说，"报纸的评论一方面是代表舆论的，一方面是指导民意的"。②他主张，报刊发表的言论，要真能反映出最大多数人的愿望与要求，决不为少数特权阶层的人说话，"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伏的。"③韬奋对于这"头"的工作是全力以赴的，《生活》周刊每期小言论，虽仅仅数百字，却是他每周最为费心血的一篇。

---

① 邹韬奋：《事业性与商业性的问题》，重庆《店务通讯》第92号(1940年4月15日)。
② 邹韬奋：《可以不必做的文章》，《生活》周刊5卷21期(1930年5月4日)。
③ 邹韬奋：《答复一封严厉责备的信》，《生活》周刊4卷1期(1928年11月18日)。

对于读者来信，韬奋是精心处理，慎重回复的。他说，"我们对每一封信都用赤诚来处理，只需在力量上能做得更周到更满意一点，必要做到那样的地步而后肯休，而后肯甘心。这种'服务精神'成为集体的产物或遗产，而身体力行于不自知。"对于他的主办的这种"服务精神"，他曾经说过，"《生活》周刊常说它自视是读者的一个好朋友，这不是一句空话，必须在实践上帮助读者解决种种困难，凡是在自己力量内所能勉力办到的事情，必须尽忠竭诚为读者办到。""我们往往忙得夜以继日，汗流浃背，为某一读者办成一件事，手软脚酸，筋疲力尽，不但不以为苦，且以能为读者有所尽力，在实际上做到'好朋友'，视为至乐。"①

7. 报刊工作者要有活动力。韬奋认为，"新闻记者的思想和行动是要立在时代的最前线的，所以对于知识的补充和当前切要问题的内容，都须有继续不断的研究和探讨。"他结合自己体会和冷眼旁观记者同道的经历，"深刻地感觉到做新闻记者最应该有的是活动力，尤其应该有的是活动的正确动机。""就新闻记者的立场看来，所为活动力是不怕麻烦的研究，不怕艰苦的搜索，有时也包括不怕艰险的奔波。"所谓正确的做记者工作的动机，"便是要为社会大众的福利而活动，不要为自己的私图而活动。"②

对于撰述评论的主笔，韬奋认为此种人应具很高素质，"做主笔的主持论坛，不但须有学问，须能文章，并须精锐远大的眼光和见解，须有浩大的胸襟。"③

韬奋在《征求一位同志》一文中谈到一位"合格"主笔应具备的条件。他写道："我此刻心目中所最注重的至少有四个条件：(一)撰述评论的人最最重要的品性是要能严格的大公无私，在言论方面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动机要绝对的纯洁，要绝对不肯夹杂私的爱憎私的利害在里面，要绝对能秉着自己的良知说话，不受任何私人或团体的指使威吓利诱，或迁就私人的情面而作违心的言论。我深信任何刊物的信用——也就是刊物的命脉——最最重要的是这一点。(二)锐敏的观察与卓越的见识，再说得简单些，就是思想须能深入，遇着一件事或是

---

① 邹韬奋：《〈生活〉的服务精神》，《患难余生记》第三章未完稿的草稿，标题为《邹韬奋》作者张之华所加，转引自《邹韬奋》，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页。

② 邹韬奋：《新闻记者的正确动机》，汉口《新闻记者》创刊号(1938年4月1日)。

③ 邹韬奋：《想念新闻学》，《生活》周刊4卷40期(1929年9月1日)。

一个问题，不要人云亦云，总要运用自己的脑子深入的想他一下，这种工夫含有分析、组织、及创造等要素的能力。（三）文笔畅达，这一个条件是从事撰述评论的人所不可少，是很显明的，用不着多说。（四）至少须精通一种外国文。主持评论的人有八个字很重要，就是'搜集材料，贮蓄思想'。所谓贮蓄思想，是平时无论如何忙，要能静想，想些抽象的好意思，蓄在胸中，好像'贮蓄'一样，遇事触机而发为言论，便较有精彩。与贮蓄思想有密切关系的便是'搜集材料'，多阅平时出版的中外书报，所以至少须精通一种外国文。"①

韬奋是很看重经营管理，也十分善于经营管理的。在用人方面，他积累许多经验。他说，"关于用人方面，我们严守人才主义，力戒安插冗员的恶习，尤注意紧缩政策，非万要不了的人不得任意添请"，"职务上应请的人才，须经过干部全体的通过，或用公开考试的办法"。②他主持周刊工作以来，未曾用过一个亲戚，"对于用人，最主要的基本态度是大公无私，是非明辨"。在人才选用方面，韬奋主张"当注重真才实学而不必问资格"，"以实际才能为标准，绝对不讲情面"。③

人民出版家和新闻记者韬奋的上述新闻观点，是30～40年代人民新闻思想的光辉结晶，开创了20世纪中国新闻思想新的天地，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三、范长江之新闻观点

范长江是从30年代起，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开始新闻工作的，同时又有许多阐述新闻规律的论著，还从事过新闻教育和新闻团体的组织工作。他的新闻观点，是有代表性的，既是对进步报刊经验之总结，又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色彩。

1. 新闻、报纸与政治的关系密切。范长江指出，"新闻事业为社会各种事业部门中最富于变动性的事业，它不只是迅速的多样的反映时代的变化，而且如果有正确政治认识作指导，新闻工作又是加速推动社会的重要力量。""报纸是政治的工具，这一个基本的新闻学原理，在我们中国新闻记者中还没有成为普遍的意识。报纸独立主义，新闻至上

---

① 邹韬奋：《征求一位同志》，《生活》周刊5卷34期（1930年8月3日）。

② 邹韬奋：《正在积极筹备中的〈生活日报〉》，《生活》周刊7卷13期（1932年4月2日）。

③ 参见邹韬奋：《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生活书店1940年版；《征求一位同志》，《生活》周刊5卷34期（1930年8月3日）。

主义，在战前一般地流行着，战后也还有若干人在信仰着。而抗战一年半的经过却告诉了我们，任何一个报纸在实际上也没有脱离了政治。……一般说来，私人经营的报纸，有可能没有直接的党派组织关系，而在其政治言论立场上，则不可能没有一定的归趋。"①

范长江认为，新闻工作者不要害怕、更不能回避政治，应该主动地把新闻工作与政治工作结合起来，"从此我们新闻工作者不要怕谈政治，不要故意表面避开政治，而重要的在能不违反时代性。'识时务者为俊杰'，一个报纸只要抓紧了时代政治要求，是会受欢迎的。"②

范长江指出，一家报社或一个记者，不怕谈政治，只怕谈得不对。而如果一家报社或一个从业员代表了主导社会的势力，那就有了正确的保障。在今日之社会，任何报社和从业人员，是不可能不代表一定的社会势力的。"任何报纸与通讯社，都代表着一定社会势力的利益，绝对没有超社会的事情。只有它所代表的社会势力，在那时的全社会中是主导的势力，而且在正确的政治主张的条件下，这个新闻事业才是主导的新闻事业。但是它不是也不可能是'超社会阶层'的存在。"③

2. 报纸的时代性。范长江指出报纸有阶级性，不具备"超社会性"的同时，又指出在一定条件下，报纸又具有时代性。他说，"报纸在根本上有它一定政治态度或趋向，但是在民族问题还存在的世界，一个正确的报纸，还应有它的'国家性'或'民族性'，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在一定时间之内，有那一个国家或民族内各阶级各党派的共同利益，为了全国共同的利益，各种态度及各种范畴的报纸，都应修正其原有态度，一致为此共同利益而奋斗，违反国家或者民族的要求，固执狭义的党派的成见，这是落伍的或幼稚的报纸，不是时代的报纸。"他强调，一家报社，在成为政治工具的同时，"重要的在能不违反时代性"。所谓讲政治，指的是"时代政治"，我们要抓的，是抓"时代政治"。④

3. 新闻记者学会的性质和任务。在30、40年代，范长江以满腔热

① 范长江：《新阶段新闻工作与新闻从业员之团结运动》，《通讯与论文》，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213、214页。

② 范长江：《新阶段新闻工作与新闻从业员之团结运动》，《通讯与论文》，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页。

③ 范长江：《"国新"两年》，《通讯与论文》，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246页。

④ 范长江：《新阶段新闻工作与新闻从业员之团结运动》，《通讯与论文》，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214～215页。

情和大量心血投身于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组织工作，有许多文件是他起草的。其中不少涉及新闻学研究的一般规律。他指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是“中国永久性的被雇用的新闻从业员及进步新闻记者的组织”。“我们诚心诚意促进报业公会等业主组织，但是我们不能放弃我们自己的组织，我们新闻从业员没有很好的团结，散漫无力是不能完成我们的历史任务的。”

范长江认为新闻记者学会的任务主要是服务。“服务工作是学会中心工作。在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上，记者学会的性质，应该是新闻界的服务团体，不是政党组织的一部，也不是生产营业的团体。服务于时代新闻工作，从新闻岗位促进民族与人类之解放与建设，就是记者学会的目的。因此学会的工作，一方面是以新闻事业为出发，一方面是以服务为基点。我们的工作无论如何开展，我们服务的基本性质仍不宜丝毫变更。”①结合当时情况，范长江指出对于新闻学教育与研究方面应做的工作有：

开办新闻讲习班；

出版新闻学书籍杂志；

设立小型新闻图书馆；

出版“记者通讯”；

出版中国新闻手册；

协助华侨记者并与海外有新闻兴趣的青年发生联系。

4. 记者工作原则和记者条件。范长江对于新闻记者的原则有明确论述。他指出，抗战以来，由于新闻工作影响日大，人们对于记者工作应守原则的讨论也日多。他同意这样的看法：“新闻记者第一个原则，是要修养人格的。”他赞成韬奋先生的话：“新闻记者活动的动机，应当是‘为社会大众的福利而活动，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图而活动！’”他还欣赏这样的口号：“真理是新闻记者惟一的武器，忠实是新闻记者惟一的信条。”引述了这些人的看法之后，范长江说：“所以似乎很神秘的新闻记者职业，还是把最平凡的人格问题，作成了根本的第一的信条。有了健全高尚的人格，才可以配做新闻记者。有了健全的人格，才可以谈到其他各种技术的问题。新闻记者应当是社会所敬重的人物，如果在

---

① 范长江：《新阶段新闻工作与新闻从业员之团结运动》，《通讯与论文》，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242～243页、237页。

人格上有了根本的缺点，就不能算做新闻记者。因为新闻记者是一种特殊的职业，它的影响太大，不能作普通人看待。所以有人说：'新闻记者责己要格外严，律己要格外密。丝毫不苟，丝毫不乱，才配做新闻记者。'"①

范长江强调高素质的新闻记者对于新闻事业成败的关键作用。他指出，"新闻干部是新阶段新闻事业决定的因素。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决定胜负的关键，主要的是'人'的因素，而新阶段新闻工作的发展与支持，主要的还是决定于新型新闻工作干部之强弱。因为在新的艰苦相持阶段中的新闻事业，物质设备之比重相对暂时减低，在危险的、变动的、物质缺乏的情形下，要担负起积极推动新闻工作的任务，已不是也不能是工资主义的记者所能担负，工资权威在今后必然要相对地减少其威力，而把新时代的新闻工作的任务，客观上寄付于广大富于青年战斗性的新闻记者。"

这种新闻记者"必定在基本上有下述几个条件：（一）正确而坚定的政治认识；（二）献身于新闻事业的态度；（三）刻苦耐劳的身体；（四）相当的知识修养和写作能力；（五）比较干练的组织能力；（六）相当的编辑和印刷技能；（七）以及最基本的社会关系。"②

以后，范长江又在一次新闻讲习班上讲到人民新闻工作者的四个信条，对新闻记者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这四个信条是：消息绝对真实，思想要正确，群众观点的建立，开展自我批评。他把学习新闻学，树立这四个信条看成一种新的起点，说，"今天是大家走向人民的起点。大家学习要深刻的、仔细的分析自己。批评错误的地方，保留正确的部分，把自己锻炼成人民新闻工作的战士。"③

范长江还结合自己当记者的体会，撰写过一篇题为《怎样学做新闻记者》的文章，这篇文章是韬奋先生请他写的。长江讲了四点。第一，正确而坚定的政治态度对于新闻记者的重要。"没有正确的政治认识，等于航海的船没有了指南针。新闻工作变动最大，等于交通工具中的飞机，如果没有了定向，乱飞一阵，非闯祸不可！"第二是操守问题。"我

① 范长江：《建立新闻记者的正确作风》，《通讯与论文》，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275页。

② 范长江：《新阶段新闻工作与新闻从业员之团结运动》，《通讯与论文》，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227～228页。

③ 范长江：《人民新闻工作者的四个信条》，《通讯与论文》，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301页。

想世界上很少人有像新闻记者这样有更多诱惑与压迫的。一个稍有能力的记者，在他的旁边一方面摆着：优越的现实政治地位，社会的虚荣，金钱与物质的享受，温柔美丽的女人，这些力量诱惑他出卖贞操，放弃认识，歪曲真理。另一方面摆着：诽谤，诬蔑，冷眼，贫困，软禁，杀头，这些力量强迫他颠倒是非，出卖灵魂。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着真理的火炬，在夹攻中奋斗，特别是在时局艰难的时候，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真理，本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实在非常重要。”第三个是知识问题。“新闻记者之所以可贵，除了有正确政治认识与坚贞的人格而外，就是要有丰富的知识。这个知识，既要博，又要精。所谓‘博’，就是常识要丰富。无论国际国内、上下古今的问题，虽然不能无所不知，但是一个记者无论如何要对非常广泛的学科知道一些简单的概念。至少能对许多问题，谈起来总能找着些门径，不能连几个基本名词都不懂。因为常识不丰富，一个记者的活动就很难展开。许多很忙的人物，叫他们对去访问他们的记者们上 ABC 的初级课程，他们一定不高兴。但是单单常识丰富，就会成俗语所谓：‘门门懂，样样不通’。新闻记者是无法不分工的。所以每一个人在广泛的常识基础上，更应有自己的专长，如外交、经济、军事、政治等。在这些专门部门中，记者必须比常人精通，能有独到的见解。这样的记者的意见，才是权威的意见。这就联系到新闻记者的学习问题。新闻记者不是有了一支笔，就可以信口开河，也不是会有什么天才记者，而是要有终身不停的刻苦学习，向博与精的途上迈进。”第四个是技术问题。长江说，“上面三个条件，可以说是基本的修养。而运用起来，就要有技术条件，否则可能是学者，不一定是记者。一个健全的记者所不可少的技术，是采访方面。流利的谈话、速记、打字、摄影，和至少一种外国语。在表达方面：写论说、通讯、特写、译电、翻译和演说。在行动方面：骑马、游泳、骑自行车，开汽车、打枪、驾船，长距离徒步、航海习惯，将来最好能开飞机。我们中国新闻界同业学习技术的机会，比较旁的国家差得很远。我们也须急起直追，尽可能利用四周可能的环境，受技术锻炼。因为在基本原则决定之后，技术就决定一切了。”第五是健康。范长江指出，“这本不是新闻记者单独的需要，不过新闻记者更加需要而已，新闻记者的生活秩序不能固定，就是作内勤的编辑，也是日夜颠倒。”①

---

① 范长江：《怎样学做新闻记者》，《通讯与论文》，新华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90～293 页。

阐述了上面各点的内容之后，范长江也对社会提出了几点希望，恳请社会配合新闻记者，在严格要求记者的同时，支持和关心记者，也对社会的一些错误看法与做法，提出了批评。他指出，“过去社会对于新闻记者的观感，似乎也有不很正确的地方。有些人根本不理新闻记者，以为这些都是坏东西，而自己标明‘不尚宣传’，以为自己埋头作了就算。”“……收买式的招待记者，全然以物质的优厚，虚伪之态度，欲以物质享受换得新闻记者的欢心，而为其个人宣传，这不但是过失，而且是‘罪恶’。我们有值得表扬的事实，我们当不反对重要事实之能得社会认识。但是我们要认识，如果内容并无特点，而必欲新闻记者为之宣传，这对于被强求之记者，心理上亦必大为反感。”“总之，社会必须认识新闻工作对于社会之根本作用。社会对记者以及记者之自持，都应以民族利益、抗战利益、民众生活为前提。我们观察批评报道都不应脱离这个中心。”①

5、战地新闻工作和战地报道。范长江对战争同战地新闻工作的联系作了这样的论述：“中国新闻界到今天（指 1938 年——引者注）还没有造成便利于我们新闻记者学习的环境。但是空前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把读者的观点改变，把读者的要求提高，他们要求新闻记者能够对于整个民族存亡所系的战争，作深刻而正确的报道。能够把战争的实况，和战争有关联的政治经济社会现象，迅速地，系统地，周全地，报告他们。他们更希望从这些战争报道中，能指出前途，因而确定他们的认识，和自己应如何致力于战争的途径。”

范长江指出，“战地新闻工作，主要的是发战事电讯，写战地通讯和战地摄影。”“新闻报道，主要的靠电报，因为它迅速，能很快地报告读者以主要的消息。特别在战争时期，读者要求迅速的程度，远过于平时。”

长江认为，战事电讯大致可分三类，即紧急战讯、说明性电讯和描写性电讯。紧急战讯，“以重大的战争收获为内容。特别是克复重要城市，或者重要决战已经摧毁了敌人，或者俘获或击毙敌人重要将领等。这种电讯，大半可以作为‘号外’发表，所以电文要简短，内容要确实，词意要鲜明，拍发立（力）求迅速。目的在告诉读者一个大概。”说明性电讯，“这是以战争全局或一部作为对象，以数日或一日的经过内容，系统地加以叙述，它的特点是要周全、要扼要，要深刻，电文不妨稍长，要使

① 范长江：《战时新闻工作的真义》，《通讯与论文》，新华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82—283 页。

读者从电文本身得着一个结论。普通人名要说出关系，不熟知之地名，要指出方位和对于有关联的大城市的距离。"描写性电讯，"这是以局部战争事实，或与战争有密切关系的个别事实为内容，把一点来描绘，来发挥，如描绘一战时人物，或一激烈战斗，或一部战场景象，或者一个俘虏，或者一个士兵，或者一个夫子或者一个难民、一个伤兵，只要能反映深厚的意义，我们就不惜为之发电讯。"

长江分析当时战事电讯的毛病有两个，一是太杂乱，二是太抽象。"一个发电访员，应当对于他所担负的战区的全局，多多留心，尽可能要了解全局。我们每天的电报，必须不离战局的重心，虽然我们的电报不是每个都要说全局，但是我们必须是与全局有谐和性的。"这样可以避免电讯过于杂乱。发电讯，不能没有具体内容，只用"术语公式"，人名地名也应尽可能具体，否则读者不知所云。这样，可使电讯避免过于抽象。

"电讯始终受字数的限制，在通讯工具无特殊进步的条件下，通讯始终有它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抗战中，有真实内容、写作技术成熟的通讯，影响读者的力量非常大。"但范长江指出，只报道战地记者个人生活经历和少数上级军官的通讯，读者并不喜欢。读者喜欢的是这样两种战地通讯："第一，战局或一个重大战役或一个问题的详细叙述。这里面不但要有具体周全的经过，而且贯在经过叙述中，有批判的暗示，反映出成败得失的教训，显示出战事和战事有关的问题之前途。这是带有史料性的。我们的态度要庄重严肃，要慎重下笔，要严守是非曲直的标准。第二，战场或人物的描写。这类通讯的目的，不在周详地记述多量的事实，而在就特殊事实充分描绘，以浓厚的情感，流露若干深沉的宇宙和人生至理"。①

张友渔、邹韬奋、范长江等人的新闻观点，是人民新闻事业的理论结晶，是我国几十年新闻学研究积累发展的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一个方面。人民新闻观念的形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

① 范长江：《怎样发战事电讯与写战地通讯》，《通讯与论文》，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277～280页。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传入和发展

"五四"时期，伴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无产阶级报刊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以《新青年》杂志为先锋的第一批新文化运动报刊的问世，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为主导和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党报学说经过30年发展，已日臻完备与成熟。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传入

马克思主义以《共产党宣言》出版为标志，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半个多世纪之后，1899年，英人李提摩太在上海广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上发表了用中文节译的英国社会学家颉德著的《社会的进化》，译名为《大同学》，同年出版了单行本，文中曾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中文说，"今世之事，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稽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为德国之马客偲立于资本者也。"又说，"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思。"这里的"马克思"、"马客偲"、"恩格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早译名。中国人在自己的著述中最初提到马克思的，是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1902年9月，他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对马克思作了简要介绍："麦喀士（即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赵必振翻译日本人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书中有"加陆马陆科斯（即卡尔·马克思）及其主义"一章，称马克思是"一代之伟人"，介绍恩格斯是马克思"有力之同志"，"野契陆斯（即恩格斯）与马陆科斯（马克思）相亲善，终始同其难

苦"。梁启超和赵必振，很可能是中国人最早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两个学者。根据现有资料，中国人最早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并摘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朱执信。他于1905年11月，在《民报》第2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其中《马尔克》(即马克思)，第一次比较详细地叙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活动，并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要点，且节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项纲领，还提到了《资本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要早于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但他们的新闻思想却迟于后者传入中国。

一、马克思主义对第一批无产阶级报刊方针的影响

中国第一批无产阶级报刊的先声当数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这篇具有发刊词性质的纲领性政论，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思想文化，倡导民主与科学。1918年11月，《新青年》编撰之一李大钊在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政论《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标志着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开端。"五四"前夕，李大钊又将由他轮值主编的《新青年》6卷5号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目的在向国人介绍"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思潮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报刊工作者的影响。1920年，陈独秀在筹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过程中，把《新青年》7卷6号编成《劳动节纪念号》，体现出报刊工作者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中的努力。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等又创办《每周评论》，使《新青年》重在阐明学理，《每周评论》重在批评事实，通过一刊一报将思想文化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在《每周评论》带动下，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一批相类似的时事评述性周报，其中有湖南《湘江评论》、上海《星期评论》、浙江《钱江评论》、成都《星期日》等。

这一时期，不少报刊的创刊词等文字，表达出以往中国不曾有过的新闻学观点，这里略举几例：

陈独秀执笔、以"新青年同人"名义发表的《本志宣言》一文中有一段写道：

我们因为要实验我们的主张，森严我们的壁垒，宁欢迎有意识有信仰的反对，不欢迎无意识无信仰的随声附和。但反对的方面没有充分理由说服我们以前，我们理当大胆宣传我们的主张，出于决断的态度：

不取乡愿的、紊乱是非的、助长惰性的、阻碍进化的、没有自己立脚地的调和论调；不取虚无的、不着边际的、没有信仰的、没有主张的、超实际的、无结果的绝对怀疑主义。[①]

毛泽东写就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有一段文字气势磅礴，内容独到：

>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②]

由周恩来执笔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极其详尽地列出该刊的责任和任务：

> ——本日刊是学生联合会的舆论机关，所以必须同联合会一致终始。
>
> ——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
>
> ——本日刊完全是学生自动的组织。
>
> ——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
>
> ——学术研究的发表不分派别，但以稿件合于社会的生活作标准。
>
> ——对于政府的政策有指导同监督的责任。
>
> ——对于联合会有建议的责任。
>
> ——文字以浅白为主。
>
> ——新闻的记载以有关社会生活、人类进步为范围，并且力求敏捷。
>
> ——对于社会生活同各种学术用哲学的眼光科学解析，公允正确的批评。
>
> ——介绍国民必需的常识于社会。
>
> ——介绍现在最新思潮于社会。
>
> ——文艺的登载以切合人生为范围。
>
> ——报中职员共同工作一切组织守合议的制度。

---

① 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

② 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

——联络各新闻纸同各通信社交换新闻消息。

——联络各地团体同个人征求各种稿件。

——联络各地学者求其学术上的辅助。

——代表全津学生的舆论。

——职员由学生联合会新闻科随时聘请,额数不加限制。

——职员的学业仍积极的研究,不加间断。①

从政治抱负、办报宗旨到办报风格和方法,这20点均有详细周全的说明,其中许多观点都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光辉。从《新青年》到《天津学生联合会报》,都具有同样的特色。现在只能有根据地说,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努力将它传播于全中国;还缺乏足够的根据,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点如何影响并指导《新青年》等报刊,有充分依据说明这种影响和指导力的例子,出现于中国无产阶级报刊形成,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后。

1920年8月,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接着,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在筹建党的过程中,各地先后创办一批报刊,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正式问世。其中最有代表者,是改组后的《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由陈独秀执笔的《共产党》第一号短言(相当于发刊词)明确宣告:"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②以这样鲜明的文字说明自己的方针和宗旨,这在过去的报刊上是未曾有过的。实际上,《短言》阐述的是由上海发起组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的中心思想。这表明,到1921年前后,中国报刊、工人运动和党的建设,三者已经结合起来了。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表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已经对中国共产党及党的报刊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关于宣传部分规定:

杂志、日刊、书籍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

---

① 1919年7月12日《南开日刊》第35号。

② 1920年11月7日《共产党》月刊第一号。

各地可根据需要出版一种工会杂志、日报、周报、小册子和临时通讯。

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应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

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①]

上述规定的内容甚至行文的方式，都同列宁拟定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极为相似。至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则完全承认并照录了共产国际关于无产阶级报刊党性原则的要求，如："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不管整个党目前是合法的或是非法的，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职权，执行不完全是党的政策。"而共产国际的这些要求，完全是由列宁亲自拟定的，列宁 1920 年 7 月发表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1921 年发表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第二十条，都被共产国际接受。刚刚问世的中国共产党，也无条件地接受了列宁提出的这些要求。

依据列宁提出的这些要求，中共中央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和各种无产阶级报刊，并且先后成立了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报纸编辑委员会，并且为各级机关报制定了方针与宗旨。

中共中央的第一个政治机关报《向导》于 1922 年 9 月 13 日创刊。创刊词《本报宣言》提出了和平和统一的要求，表示"本报同人依据以上全国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经济的事实所要求，谨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告于国民之前！"[②]

中共中央理论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于 1923 年 6 月 15 日创刊，由瞿秋白执笔的《〈新青年〉之新宣言》指出，"《新青年》杂志是中国革命的产儿。中国旧社会崩坏的时候，正是新青年的诞辰。于此崩坏的过程中，《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革新思想的代表，向着千万重层层压迫中国劳动平民的旧文化，开始第一次的总攻击。……真正的解放中国，终究是劳动阶级的事业；所以《新青年》的职志，要与中国社会以正确的指

---

①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新华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 页。

② 1922 年 9 月 13 日《向导》第一期。

导，要与中国平民以智识的武器。《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①

党创办的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的发刊词中写道："创造世界文化的是热的血和冷的铁，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②

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创刊号的发刊词表示，《中国青年》要引导一般青年到活动的路上，要引导一般青年到强健的路上，要引导一般青年到切实的路上，去拯救衰老沉寂的中国。③

具有统一战线组织的《政治周报》初由毛泽东主编，他拟定的"发刊理由"起笔就是干脆利落的这样几句话："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④

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的报刊如《劳动周刊》，也制定了明确的方针。发刊词说："这个《劳动周刊》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换言之，就是中国全体劳动者言论机关。我们这个周刊是不比得有产阶级的报纸，有产阶级的报纸，是只记得金钱，哪里记得什么公道正义呢？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我们希望中国的工人们都拿材料来供给这个惟一的言论机关，都来维护这个惟一的言论机关，扩大解放全人类的声浪，促进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实现。中国的工人们，快快把我们的头抬起来呀！"⑤

这一系列发刊词无一不表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由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列宁新闻思想和共产国际新闻政策的传播的影响，中国的新闻学的马克思主义一翼开始形成并发展。根据新闻史学家方汉奇、张之华等人的研究，认为这一时期中共的办报思想的要点，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点：

（一）关于报刊的性质和作用。明确提出报刊的阶级性质，指出

---

① 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报刊第一号。
② 1925年6月4日《热血日报》第一号。
③ 参见1923年10月20日《中国青年》第一号。
④ 1925年12月5日《政治周刊》第一期。
⑤ 《〈劳动周刊〉发刊词》，1921年7月7日《共产党》月刊第六号。

不同阶级的报刊总是为不同的阶级利益服务的。《新青年》改组后，陈独秀即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指出，资本家制造报馆，报馆制造舆论，是世界各民主共和国报纸的普遍现象。前引《劳动周刊》的发刊词指出，《劳动周刊》不是营业性质，而是专门为劳动者说话，鼓吹劳动组合主义。《向导》则公开宣称：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机关报。《新青年》季刊也明确宣告自己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同时，党领导下的报刊旗帜鲜明地揭露资产阶级报刊和他们的法律一样，是对付工人阶级的工具。《向导》和《中国工人》指出，资产阶级报纸是资产者的“御用品”，是拥护他们阶级利益与压迫劳动阶级的巧妙工具。

（二）关于报刊的任务。明确提出党领导下的报刊是党的言论机关，是党的宣传工作部门，宣传和组织是报刊最首要的任务。恽代英主持《中国青年》时多次强调，报刊的基本使命是宣传、组织最广大民众认识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奋斗。毛泽东主持《政治周报》时明确宣告：办报纸的目的是为了革命，为了要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上的幸福。《向导》、《中国青年》等党的报刊的实践和论述表明：正确宣传和贯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策略，反映社会和民众的实际需要，报道和评论国内外时事，廓清反动势力的欺骗宣传，用马克思主义战胜各种错误思想，是无产阶级党报的主要任务。

（三）关于报刊的业务工作原则。《向导》、《中国青年》等党的报刊在这一阶段以自己出色的新闻工作实践，奠定了业务工作的重要原则，并摸索出有效的工作方法。

1. 了解和适合群众的普遍需求。《中国青年》多次告白，欢迎读者多多搜集和投寄有关青工、学徒和农民生活状况的各种调查材料，以使更多读者了解民间真情，讨论民间问题。这家报纸多次利用寒暑假发起“到民间去”的大规模农村、青年工人运动调查，反映工农的痛苦和呼声。它还重视通过调查了解到的群众意见，改进报纸工作。一次，收到读者来信134封，编辑部表示要根据读者的批评与建议，改进《中国青年》的工作，使它更加“青年化、群众化”。

2. 重视事实，确保报道真实。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说，“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

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①恽代英主持《中国青年》时，努力确保新闻报道真实无误。当人们惊讶于《中国青年》成功的宣传报道时，他列举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中国今天一般青年在实际生活上需要革命，一个是因为报纸说的是真话。在中共旅欧组织和旅欧共青团合办的机关刊物《赤光》对国家主义派机关报《先声》周刊的论战中，邓希贤（小平）揭露和抨击《先声》“自造新闻”的伎俩。这次论战结束时，周恩来曾作总结，指出，从报刊宣传态度上说，这是《赤光》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论态度，反对《先声》造谣中伤的唯心论态度的胜利。

3. 提倡朴实动人的文风，有的放矢，力避空谈。恽代英指出，对工农大众宣传，要运用工农的语言和思想，避免用工农不懂的学生腔。他强调，深挚的意思，要用极浅易的语言来阐发，才会得到民众的理解和同情。“五卅”运动中，《热血日报》提出“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中国人不能受外国人的压制”的口号，这口号有的放矢，说出了各界民众的心里话，因而得到各界读者的同情和支持。

（四）关于党报工作者的品格。《向导》、《中国青年》等党的报刊的实践和论述表明，无产阶级党报工作者的基本品格是：忠诚党的事业，立志献身大众利益；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洞悉国内外政治时事；深入群众，勇于实践，不怕艰苦牺牲。《向导》曾向读者表示，本报是有组织的活动的表征，本报并不像别的报纸一样，只是发空议论，本报所发表的主张，是有数千同志依着进行的。恽代英在《怎样做一个宣传家》一文中说，革命报刊宣传家，不是一般的学者文人，首先是一个信念坚定、忠于人民利益的革命者。中共早期的党报工作者，是记者、政论家，但他们首先是政治活动家，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等，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②

上述观点表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派，已开始在中国出现。

二、李大钊的新闻思想

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又是杰出的报刊活动家，他的新闻思想，在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发展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他的新闻思想要点是：

---

① 1925年12月5日《政治周报》第一期。

② 上述理论分析，参见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第218～222页。

1. 关于新闻和新闻事业。李大钊指出,"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新闻同历史有联系,但新闻不是历史,因为"历史是过去,旧的,社会状况的写真。现在的新闻就是将来的历史。"新闻和历史都应把目光关注于全社会,"历史不应是专给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或专记一方面的事情,应当是注重社会上多方面的记载,新闻纸更应当如此。"李大钊批评当时的新闻界,遇着督军和阔人的活动,用大字排在前几版,而对于穷人自尽,社会变故,反用小字,排在报纸末几版不注意的地方,"这是旧习惯未退尽的一个最大的表现,也就是新闻界的一个大缺点"。①

李大钊认为新闻事业是一种社会的事业。他说,"我认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因为社会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关系。"所以记者"要想把这不断的、发生的、多方面的社会现象描写出来,而加了批评或指导,非有相当的学问和知识不可。以前新闻界,所以有很多缺点,就是因为从事新闻业者的眼光不能映注全社会的生活的缘故。"他指出,"新闻记者的责任,于记述事实以外,还应该利用活的问题,输入些知识。"有些知识,表面看是死知识,如果运用得当,也未尝不可把这些死知识变成活的。总之,"新闻界对社会灌输知识的职分和方法",应十分注意。②

2. 关于报刊的社会使命。李大钊强调报刊应以祖国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他为《晨钟报》写的发刊词,对此有十分深刻和动人的论述:

> 一日有一日之黎明,一稘有一稘之黎明,个人有个人之青春,国家有国家之青春。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旧稘之黄昏已去,新稘之黎明将来。际兹方死方生、方毁方成、方破坏方建设、方废落方开敷之会,吾侪振此"晨钟",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尽二十稘黎明中当尽之努力,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由是一一叩发一一声,一一声觉一一梦,俾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自我之民族的自觉,一一彻底,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幸勿姑息迁延,韶

①② 李大钊:《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词》,1922年2月14日北京《晨报》。

光坐误。……

……青年所以贡其精诚于吾之国家若民族者，不在白发中华之保存，而在青春中华之创造。《晨钟》所以致命于胎孕青春中华之青年之前者，不在惜恋龙钟就木之中华，而在欢迎呱呱坠地之中华。是故中华自身无所谓运命也，而以青年之运命为运命；《晨钟》自身无所谓使命也，而以青年之使命为使命。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晨钟》之声，即青年之舌，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不觉醒，青春中华之克创造与否，当于青年之觉醒与否卜之，青年之克觉醒与否，当于《晨钟》之壮快与否卜之矣。[①]

李大钊认为，一张报纸上的新闻消息和社评论说，都要根据报纸所肩负的社会使命而展开。拿作为报纸灵魂的言论来说，最重要者要"苟其言之确合于真理"，而"不敢有所逡巡嗫嚅以迎附此社会"。言论要确合于真理，"一在查事之精，二在推论之正"，二者之中，"尤以据乎事实为要"。[②]

3. 关于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李大钊指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③]他认为，北洋军阀乱捕记者，乱封报馆是违反约法的，"约法上明明有言论自由，可是记者可以随便被捕，报馆可以随便被封。"[④]他又指出，这种对新闻记者和报馆的镇压，对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压迫，是无济于事的，越镇压，自由的力量越强大。他说，"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抑制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⑤]他奉劝禁遏言论、思想自由的人，要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危险思想，不要借口危险思想来禁止言论自由。

4. 关于帝国主义的"新闻侵略"。李大钊较早地把帝国主义通讯社的对华造谣报道定性为"新闻侵略"。1924年6月，路透社驻华记者编造"孙中山逝世"的假报道，引起极大混乱。李大钊写《新闻的侵略》一文加以揭露与批评，说，"自经此次中山先生逝世谣言之传播，我们应

---

① 1916年8月15日《晨钟报》创刊号。

② 李大钊：《真理之权威》，1917年4月17日《晨钟报》。

③ 李大钊：《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1919年6月1日《每周评论》第21号。

④ 李大钊：《那里还有自由》，1919年11月16日《新生活》第13期。

⑤ 李大钊：《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1919年6月1日《每周评论》第21号。

明了外国的通讯社在中国宣传之可惊”，“他们挟资本雄厚的优势，在内地时时操纵新闻，传播于已有利之消息，暴露华人之弱点，以图引起国际公管；表彰外人在内地之言论及事业，以坚华人对西人之崇拜”。他对外国记者以采访为名，行刺探情报，操纵中国金融和商业的活动也进行了鞭挞。李大钊主张：“中国政府应根本取缔外国利用通讯社在国内各地宣传，应将那些造谣生事的、侮辱中国的外国记者，驱逐出境，一个不留，才是正办”。[1]

5. 关于新闻的教育与研究。李大钊指出，从事新闻记者工作的人，应有较多的知识。他希望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在“改造”和“提高”新闻界方面，作出贡献，“因为大学是一个最高的学府，所研究的学问，是多方面的，故由大学出身的人，必有比较的多方面的知识，或有与多方面的知识界接近的机会，希望诸同学出其所学，把新闻界在社会上的地位提高，给新闻界开一个新纪元。”[2]李大钊认为，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的人，固不必主张一致，但应有一个共同认定的大目标，以便尽到自己的责任。他说，“胡适先生说，不希望主张必定一致，希望人人能发挥个性固然不错，但是有了这个团体，总可以借此情谊，立在同一的，知识的水平线上，常有机会来交换各人不同的意见。遇有国民的运动发生时，我们总可以定一大目标，共同进行，以尽指导群众，而为国民的宣传的责任。”[3]

三、陈独秀的新闻思想

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发起者和缔造者之一，也是党的报刊最早的活动家与领导者之一。党建立前后，他的新闻思想对于当时革命报刊与党的报刊的存在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该时期他的新闻思想的要点有：

1. 关于党的报刊的宗旨与方针。这一时期经他确定或直接由他撰写的发刊词、告白等文字，表明他认为党的报刊的宗旨及方针，应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提倡和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他对有人反对《新青年》的几条“罪状”作了如下明确的答复：“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

---

[1] 李大钊：《新闻的侵略》，1921年6月18日《向导》第71期。

[2][3] 李大钊：《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词》，1922年2月11日北京《晨报》。

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下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一切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①

二是引导青年走正路。在《新青年》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在这篇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政论中,陈独秀针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希望青年从六个方面努力,使自己成为于国家于社会有用之才,这六个方面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面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向青年呼喊:"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国家面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②这六个方面,是他对当时中国青年之期盼,也是《新青年》向青年宣示的内容和重点。

三是鼓吹主持公理,反对强权。陈独秀为《每周评论》拟定的发刊词,便以"公理战胜强权"为主题。他在文中写道:"列位要晓得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呢?简单说起来,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他援引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这个"强权"被世界"公理"打败的例子,指出,"世界各国的人,都应该明了,无论对内对外,强权是靠不住的,公理是万万不能不讲的了。""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只希望以后强权不战胜公理,便是人类万岁!本报万岁!"③

2. 关于报刊要有明确的政治主张的原则。陈独秀主张一张报刊,必须有明确的政治主张,而且要向读者和社会公开地申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的这一观点,在为《新青年》写的《本志宣言》中,表现得最为彻

---

① 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六卷一号。
②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新青年》初名为《青年》。
③ 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第一号。

底和完整。《宣言》一开头，就说：

本志具体的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上颇因此发生误传。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社员的公共意见，明白宣布。就是后来加入的社员，也公(共)同担负此次宣言的责任。但"读者言论"一栏、乃为容纳社外异议而设，不在此例。

陈独秀接着历陈《新青年》同人对时局和理想的"公共意见"：

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

陈独秀还讲到同人们对"政治"的看法：

我们虽不迷信政治万能，但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这种政治，确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是运用政治应有的方法；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①

如此明确而公开地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是《新青年》的特色，也是陈独秀新闻思想可贵之处。在筹建党的过程中，陈独秀的政治主张更为明确和坚定，他拟定的具有发刊词性质的《共产党》月刊第一号短言，明确写道：

我们要逃出奴隶的境遇，我们不可听议会派的欺骗，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②

3. 关于自由权利。陈独秀主张，党的报刊要为民众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项自由权利。他说，"所谓近代政治，即民主政治、立宪政治，是怎样发生的呢？他的精髓是什么呢？老老实实的简单说来，只是市民对于

---

① 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七卷一号。

② 1920年11月7日《共产党》月刊第一号。

国家所要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这几项自由权利。所以有人说，宪法就是国家给予人民权利的证书，所谓权利，最重要的就是这几项自由。所以世界各种民族，一到了产业发达人口集中都市，立刻便需要这几项自由，也就立刻发生民主立宪的运动，这是政治进化的自然律，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可以说没有一个例外。……在共和名义下，国家若不给人民以这几项自由，依政治进化的自然律，人民必须以革命的手段取得之，因为这几项自由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

陈独秀由国内分析到国际局势，说："现在的中国，军阀的内乱固然是和平统一与自由最大的障碍，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

由这样的分析，陈独秀得出结论，为争取自由民主，中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内反军阀，外反强权。他说，"现在，本报同人依据以上全国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经济的事实所要求，谨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于国民之前！"①

上述分析表明，在领导党的报刊工作中，陈独秀是将言论出版自由，同整个阶级斗争的总态势、同无产阶级争取阶级统治的总目标联系在一起来思考和阐述的。这里充分显示出这种言论出版自由观的马克思主义性质。

第二节　中国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的形成

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闻事业有了很大发展，随着延安党的整风运动的完成，以《解放日报》改版为代表的新闻改革的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宣告形成。这一理论形成的标志是：积20余年党报实践经验，共产党人对于党报的性质和功能，党委与党报之关系，党报工作的方针与原则，党报工作者的队伍建设等问题，有了系统的、深刻的、科学的认识，并以具有一定规范的学术语言将其阐述出来，同时，全党和全体新闻工作者对此有相当的认同。

一、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

1939年2月7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改组为中共

---

① 1922年9月13日《向导》第一期。

中央机关报，同时仍兼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改组，改变了延安没有中共中央机关报的状况，加强了中共中央的新闻宣传力量。而在此之前的1月15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属下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出版，毛泽东为其撰写的发刊词指出，杂志的出版将有利于八路军抗战力量的提高，也有助于供给抗战友军与抗战人民关于八路军抗战经验的参考材料。

同年，由全国青年联合会延安办事处主办的《中国青年》杂志于4月16日出版、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办的《中国妇女》于6月1日问世。中共中央出版的以党的建设为中心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于10月20日创刊。

1940年，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办的《中国工人》于2月7日出版。越一周，由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主办的《中国文化》于2月15日创刊。3月25日，党领导的供普通群众阅读的通俗小报《边区群众报》问世。

与此同时，新华通讯社出版的刊载新闻电讯稿的小报《今日新闻》、边区政府教育厅出版的以推广拉丁化文字为主旨的《新文字报》，也一一先后问世。八路军系统除军政杂志外，还出版了《前线周刊》、《红星杂志》等多种报刊。

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试验播音，呼号为：XNCR。党的无线电波加强了红色政权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不仅使中共中央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大为加强，而且从空中突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把党的声音送到了国民党统治区。

这一时期，新华社的业务有很大发展。除创建新华广播电台外，还在发稿量、对外广播、分社建设等方面有长足进步。发稿数量，由每天一两千字发展到四五千字。1944年9月，正式开始英文文字广播，这是新华社正式对外广播报道的开端。抗战时期，新华社从只有十几个人，发展到总社有100余人，并在各抗日根据地共拥有9个总分社、40多个分社，成为一个统一的独立的通讯社。

1938年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要求，要在敌前敌后创办各种地方性的通俗报纸，以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觉悟。随后，抗战初期建立起来的华北、华中、华南等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报刊纷纷问世。仅据华北、华中两个根据地的不完全统计，就有各种小型报纸700多种。1939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宣传教育工作指示，要求从中央局

起，一直到省委、区委，以至比较带有独立性的地委、中心县委止，均应出版地方报纸。1941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工作的指示，规定集中力量办好主要的报刊，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地区上有独立性的区党委应根据条件，集中力量办好5种报刊：一个政治性的报纸，一个政治性的杂志，一个党内刊物，一个党指导下的综合的文化文艺性质的杂志，以及一个通俗的报纸。

总之，进入20世纪40年代之后，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有了很大的全面的发展，这些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台的发展经验，为党报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实践论的基础。

二、延安《解放日报》的整风改革

1941年，在新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将《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改出大型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解放日报》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出版，到1947年3月27日停刊，共出版2130期。这家报纸是在中国革命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个大型的、每日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贡献最大、影响最大的一个革命报纸。《解放日报》新闻宣传的实践经验，党和毛泽东在领导与指导这家报纸日常工作的大量文件，尤其是《解放日报》在整风与改革中的许多理论总结，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的形成与成熟。

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整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要求从思想上清算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特别是清算王明路线的错误，是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推动革命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党的新闻工作的整风改革，是全党整风的一个重要部分。

根据整风运动的要求和党中央的部署，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42年3月16日发出《中宣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这是新闻界整风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通知》指出：

> 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每天与数十万的群众联系并影响他们，因此，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各地方党部应当对自己的报纸加以极大注意，尤应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

《通知》对报纸的整顿和改革提出了四方面的要求。第一，关于报纸的内容。《通知》指出：

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符其实的党报。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么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不过为别人的通讯社充当义务的宣传员而已，这样的报纸是不能完成党的任务的。如果各地党报犯有这样毛病，就须立即加以改正。

第二，关于党报编辑部和党委关系。《通知》指出：

要使各地的党报成为真正的党报，就必须加强编辑部的工作，各地高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亲自注意报纸的编辑工作，要使党报编辑部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生活联成一气，要把党的政策，党的工作，抗日战争，当地群众运动和生活，经常在党报上反映，并须登在显著的重要的地位，要有与党的生活与群众生活密切相联系的通讯员或特约撰稿员，要规定党政军民各方面的负责人经常为党报撰稿。

第三，关于加强党报的战斗性。《通知》规定：

党报要成为战斗性的党报，就要有适当的正确的自我批评，表扬工作中的优点，批评工作中的错误，经过报纸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在党报上可以允许各种不同的观点的论争，可以容许一切非党人士站在善意的立场上对我们各方面工作的批评或建议的言论发表。另一方面，要有对于敌人的思想的批判。

第四，关于党报的文字的要求。《通知》提出：

各地党报的文字，应力求通俗简洁，不仅使一般干部容易看懂，而且使稍有文化的群众也可以看。通俗简洁的标准，就是要使那些识字不多而稍有政治知识的人们听了别人读报后，也能够懂得其意思。①

《解放日报》是新闻界整风改革的重点，也是成功改革、有重大进步的典范。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延安亲自召开改版座谈会，征求各方面人士对报纸改革的意见和建议。他在会议结束前发表了重要讲话：

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

---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宣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26～127页。

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1]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实施改版。当天，报纸发表改版社论《致读者》，总结创刊十个月来的工作和提出今后的方向，表示为使《解放日报》成为真正的党报，今后要：贯彻坚强的党性，密切地联系群众，洋溢着战斗性。社论表示今后要努力具备党报必需的品质：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表示："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要达到这个目的主要的环节，就是要使我们整个篇幅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这样来贯彻我们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2]

《解放日报》的改革，前后持续了四个年头，从1942年3月开始，到1945年8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才告结束。其间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942年3～8月为第一阶段，在整顿三风、检查报纸工作的党八股表现的基础上，重点进行版面调整和改革，改变过去版面安排上一国际、二国内、三根据地、四边区，以大量篇幅登载国内外通讯社消息的做法，而以报道边区和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为主，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42年9月至1943年3月为第二阶段，报社建立了编委会，取代过去以个人负责的主笔制度，强化了全党办报方针，努力加强报纸的群众工作。1943年4月至1945年4月为第三阶段，运用典型报道宣传和推动大生产运动，根据报纸特点改进和提高宣传艺术。1945年5～8月为第四阶段，根据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提出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党的优良作风的精神，总结党的新闻工作的经验，进一步改进党的新闻工作。《解放日报》在这四年的整顿与改革中，始终抓住和做好两件事，一是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念，批评和克服资产阶级新闻观念的影响，二是加强新闻工作队伍建设，实行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方针。

关于新闻观念，1943年9月1日发表于《解放日报》的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有很好的说明和阐发。在那篇论文里，

---

① 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90～92页。

②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

陆定一指出各地来到延安参加党的新闻事业的知识分子，有人带来了旧社会的一套思想意识和新闻理论，而"了解这套从旧社会里带来的思想意识和新闻学理论，懂得它的谬误在哪里，对于我们，曾经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真正与这一套坏东西作斗争，还是解放日报去年四月改版才开始，这是在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理论是从实践中来的，与不正确的新闻学理论和实践作斗争，就同时丰富了和发展了我们自己的关于新闻学的实践和理论。"①

二是队伍建设，1944 年 2 月 16 日《解放日报》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有很好的论述。社论说，"改版之后，本报依据中央方针，实行改革。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又十个月了。这一年又十个月中间，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由于实行了这个方针，报纸的脉搏就能与党的脉搏呼吸相关了，报纸就起了集体宣传者与集体组织者的作用，报纸就能经过党的组织组成了在边区包含六百余人的广大通讯网，并能改革了文风，改进了技术。"

经过延安整风和《解放日报》改革的经验积累，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形成了。

三、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

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不同于孙中山时代的党报思想，也不同于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之后新闻统制下的党报思想，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阶级特色。

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学术和实践来源是：（一）20 世纪 20 年代和 40 年代无产阶级报刊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二）列宁、斯大林、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共产国际、苏联党和政府的新闻学论述及文献；（三）毛泽东、刘少奇、陆定一、博古、张闻天、胡乔木等新闻工作领导人与指导者的新闻论述；（四）中共中央、中宣部、党的各高级领导机关关于新闻工作的文件；（五）《解放日报》等重要党的报刊的社论及新闻学论文；（六）萨空了、恽逸群等学者型新闻工作领导人的新闻学著作。

结合上述各种文献和著述，对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的主要内容作概括性的梳理：

（一）关于唯物主义新闻观。党报理论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其核心是对于新闻的本源的解释和认识。这种唯物主义新闻观，有

①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1943 年 9 月 1 日延安《解放日报》。

着经典的表述：

> 唯物论者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自然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
> 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这是唯物论者的观点。
>
> 因此，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无论在采访中，在编辑中，都要力求尊重客观的事实。①

坚持唯物论的新闻观，就必须反对唯心论的新闻观。新闻学理论中的唯心论，是很早就有的。唯心论者对于新闻的定义，认为新闻是某种"性质"的本身，新闻的本源乃是某种渺渺茫茫的东西。这就是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中所谓"性质说"(quality theory)。但是，新闻的"性质"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呢？我们回答道：是由新闻所报道的事实决定的。事实决定新闻的"性质"，而不是"性质"对于客观事实或新闻（事实的报道）有什么决定作用。唯心论的"性质说"，把片面的东西夸大成为全面的东西，把形式当作本质，把附属的当作主要的，把偶然的当作必然的，因而是错误的。照此做法，必致误入歧途。

根据这种对唯物论新闻观与唯心论新闻观的对照分析，可以看出，"唯物论与唯心论在新闻学理论中的一条明确的界线，就是是否主张尊重事实，而且是否在实践中真正尊重事实。"这里，立场也是十分重要的，"只有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才能做个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反动的阶级，为什么不能尊重事实，必定要歪曲事实，而且要闭着眼睛造谣呢？因为他害怕事实。有些人为什么不能彻头彻尾尊重事实呢？因为他们对反动派有所畏惧，有所迎合。只有无产阶级这个最革命的阶级，不怕面对事实，对反动派没有任何畏惧，也无所迎合，因此就能彻底尊重事实。"②

（二）关于党报的性质。党办的报刊，是党的这个巨大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党经过报纸来宣传，经过报纸来组织广大人民进行各种活动。报纸是党的喉舌，是这一个巨大集体的喉舌。"③毛泽东在陕甘

---

①②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1943年9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

③《解放日报》社论：《党与党报》，1942年9月22日《解放日报》。

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说，"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报纸这个东西是反映和指导经济工作的一种武器。""过去我们学会了一种工作方式，就是开会。……但那时还没有学会用广播、报纸做工作。现在我们要学会这种工作方式。现在我们边区，开会是最重要的工作方式，报纸发出去可以省得开许多会，所以报纸也可以当做重要的工作方式，教育方式。"①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关于《抗战日报》工作的决定指出，《抗战日报》是晋绥边区六百万人民的报纸，是根据地党政军民的喉舌，是体现党和政府一切政策的有力工具，是反映人民生活和要求的镜子，是对敌斗争的锋利武器。前面引述的中宣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中也清楚地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这样做才是名副其实的党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的发刊词起笔就明确地宣称："本报之使命如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该发刊词结尾时又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② 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说，"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③

毛泽东为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起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通知指出，"五月十六日起，将延安《新华日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是为至要。"④

上述文献无一不说明，无产阶级政党认为，党的报刊是党的肌体的一部分，是党的喉舌耳目，是党这个大集体的宣传员和组织者。党报的

---

① 毛泽东：《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118页。

② 1941年5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

③ 1942年4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

④ 毛泽东：《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

使命，由党的使命所决定，它在党的组织肌体内的分工，是把党的方针政策，宣达给全党和全体人民群众。因此，"党的组织的喉舌"，即为党报的性质，担任"党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即是党报的任务和党报在党内的地位和所担当的角色。

（三）**关于党报的特性。**党报的特性也是党报的品格、品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社论《致读者》就提出，党报所必须具备的品质是：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改版一年又十个月之后，报纸在《本报创刊一千期》的社论中坦诚地表示，《解放日报》至今仍没有具备这四个品质。可见，要真正做到这四个特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博古曾对这四个特性作过分析。他说：

> 党性——按党的立场，党的观点去分析问题，每一则新闻评论、编排都围绕着它。
>
> 群众性——我们是群众的报纸，要把群众的观点反映到我们的报纸上，我们的报纸要反映工农兵的生活与工作，我们要依靠最广大的通讯员。
>
> 组织者——不单反映现实，要指导现实，组织运动，指导一定工作。看到我们生活里新的东西来赞扬，看出旧的给批评，起组织领导作用；但所有这些都是在党的方针路线下的，配合党委去开展运动。
>
> 战斗性——要贯彻党的立场，要有战斗性，自己的力量怎样团结，反对的力量怎样去斗争。①

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社论对这四个特性也有阐释。讲到党性时，社论说：

> 这里不仅要"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列宁），不仅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而且更重要的是报纸必须与整个党的方针党的政策党的动向密切相联，呼吸相通，是报纸应该成为实现党的一切政策，一切号召的尖兵、倡导者。

社论对群众性的阐发是：

---

① 博古：《党报记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03～205页。

> 密切地与群众联系，反映群众的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记载他们的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的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宣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报纸的任务：不仅要充实群众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启发他们的觉悟，教导他们，组织他们，而且要成为他们的反映者、喉舌，与他们共患难的朋友。

讲到"洋溢着战斗性"时，社论写道：

> 党报必须是为着党的革命方针和路线而奋斗的战士；报纸必须根据当前的政治事变而进行热忱的鼓动，而鼓动的成功，则极有赖于明朗锐利的揭露一切黑暗和腐败，抨击一切有害于抗日团结的阴谋和企图。尤其在思想战线上，报纸应该进行经常的坚持的思想斗争，宣传共产主义的民主主义的思潮，反对一切反动、复古、黑暗、愚昧。同时，报纸亦应该是我们党手中的有力的自我批评的武器，对于自己队伍中的错误和弱点，党报应该以实事求是的同志的态度加以批评和指摘，帮助其克服和改正。

对于组织者，社论提出这样的要求：

> 响应党的政府的号召，或者根据党的方针倡导各种群众运动，经常注视和指导运动的展开，具体的帮助各种群众运动和工农大众的斗争。党报决不能是一个有闻必录的消极的记载者，而应该是各种运动底积极的提倡者组织者。①

（四）关于党报的办报方针。依靠谁来办党报？也即党报实行怎样的组织路线？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样几个字：全党办报。前引延安《解放日报》总结自己改革经验的社论中曾说，我们的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实行全党办报的方针，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在新闻工作领域的生动体现。

所谓全党办报，一是加强全党对报纸的领导，全党的每一个成员，都要关心和阅读党报，讨论党报的重要言论和新闻，积极为党报写稿写信，党报不但要忠实于党的总路线总方针，而且要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和活动呼吸相关，息息相通。毛泽东和延安《解放日报》有几篇社论，都谈到这个问题。毛泽东甚至为《解放日报》第四版拟定了征稿办法，请各方面的专家每月供应规定数量的作品。党中央作出规定，要求各级党委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定期讨论党报工作。

---

① 1942年4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

二是加强报纸群众工作，开展通讯员网组织的建设与活动。1942年8月25日《解放日报》社论《展开通讯员工作》指出：

我们的报纸，如果没有广泛的通讯员，如果没有参加实际工作的、生活在群众中间的党与非党的通讯员，是不可能办好的。因为我们的报纸是党的报纸，同时也是群众的报纸。群众的利益、群众的情绪，是党决定政策的依据；群众的意见、群众的行动，也是考验我们的政策与工作的标尺；党教育群众，不是高高在上地用空洞的原则、死板的教条去照本宣读的说教，而应该是站在群众之中，通过群众耳闻目见的活生生的事实去分析与理解，使群众逐渐提高他们的认识。我们的报纸正是要负起这样的任务，这也正就是我们的报纸之所以异于一般资产阶级的报纸的基本的一点。因此，我们的报纸就不仅需要有能干的编辑与优秀的记者，而尤其需要有生活在广大人民中间的、参加在各项实际工作里面的群众通讯员。①

陆定一把实行全党办报方针，称之为专家办报与非专家办报相结合的路线。他说：

这种报纸（党报——引者注），不但有自己的专业的记者，而且，更重要的（再说一遍：更重要的！）是它有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非专业的记者。它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结合的方法就是：一方面，发动组织和教育那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非专业的记者，积极的为报纸工作，向报纸报道他自己亲身参与的事实，因为他们亲身参与这些事实，而且与人民血肉相连，因此他们会报道真实的新闻；另一方面，教育专业的记者，做人民的公仆，对于那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联的人们，要做学生又做先生。做学生，就是说，要恭敬勤劳，向他们去请教事实的真相，尊重他们用书面或口头告诉你的事实真相，以他们为师来了解事实，来检查新闻的真实性；做先生，就是在技术上帮助他们，使他们用口头或书面报告的事实，制成为完全的新闻，经过这种结合，报纸就与人民密切结合起来了。

这条路线，这个方针，就是解放日报的建设报纸的路线和方针。只有共产党的党报，才能这样建设自己的报纸，因为它有共产党的领导，而共产党乃是人民的先锋队，因为它有共产党组织可以

---

① 1912年8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

依靠，而每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共产党的基本骨干乃是与人民血肉相联的，并且是人民中最优秀的分子。①

（五）关于党报的作风。党的作风就是党报的作风。党的三大作风：理论与实践结合，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党报的作风。延安《解放日报》曾发表题为《提高一步》的社论，分别对党报如何贯彻这三个作风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于理论与实践结合，社论说：

现在我们决不能满足于仅仅片断的反映实际，而应当力求更有系统的反映实际，我们要把实际工作中的经验总结为理论，再在实际工作中去考验这种理论的正确性与不正确性，不断坚持真理，不断修正错误。

关于密切联系群众，社论指出：

这就必须要把报纸办成人民的报纸，反映群众的生活和要求，介绍群众的活动和创造，与群众的脉搏息息相关；就要提倡为人民兴利除弊，表扬社会上的好人好事，批评坏人坏事；就要吸引广大人民——特别是工农群众为报纸写稿，实行群众写，写群众，把通讯工作建筑在广大群众的基础上；就要经常供给有益人民的精神的食粮，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种知识，消除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愚昧落后；就要征求读者对报纸的意见，语言文字力求通俗、适合读者口味，使报纸真正为广大群众所喜见乐闻。总之，要把办报成为群众自己的事业，为人民服务，由人民大众大家来办。

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社论阐述了这样一些看法：

表扬和批评，同是报纸推进工作的武器，两者不可缺一。过去报纸曾经做了许多表扬工作，表扬模范典型，以推动全盘工作，为人民大众及其事业而欢唱讴歌，这是完全正确的，以后也还应当这样做。但是缺点错误在实际生活中是不断发生的，必须如毛主席所说的，天天打扫，天天洗脸，扑去灰尘，消灭微生物，使我们的肌体更加健康。……报纸对于批评应该有认真负责的态度，必须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掌握确实可靠的材料和根据，郑重其事，合乎分寸，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决不能滥用"新闻

①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陆定一新闻文选》，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

权威"、捕风捉影，乱说一通，或者是疾言厉色，叱此斥彼，无视具体对象和客观环境，以致反而对工作起不好的影响。……人民事业中的缺点，是前进道路上的副产物，能够公开揭发错误，克服弱点，正是证明我们的坚强。应该认识，我们是处在旧势力的包围当中，周围有不少脏东西侵入到我们的屋子里来，我们一定要用自我批评的扫帚把它扫出去。①

社论指出和论述的上述各点，不仅针对《解放日报》贯彻三大作风中的重点与问题，也是对一般党报三大作风要求的阐发，是党报理论的重要内容。

（六）关于党报的三个关系。 党报运作中，存在三个关系，即党报与党委、党报与群众、党报与实际工作的关系。在认识与处理这三个关系问题上取何种原则，有何种规范，也是党报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于党报与党委的关系，延安《解放日报》社论《党与党报》作了原则性规定。由党报性质所决定，党报作为党委的喉舌，作为党这个巨大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自然被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社论说，"在党报工作的同志，只是整个党的组织的一部分。一切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顾到党的影响。报馆的同人应该知道，自己是掌握党的新闻政策的人，自己在党报上写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选的消息和题目，直到排字和校对，都对全党负了责任，如果自己的工作发生了疏忽或错误，那并不是仅仅有关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问题，而是有关于整个党的工作和影响的问题。"这是对党报而言的，另一方面，对党委来说，党委也有自己的责任，"那就是党必须动员全党来参加报纸的工作。如不这样做，党报也同样不会成为真正的集体宣传者和集体组织者。"要这样做，"首先是党的领导机关要看重报纸，给报纸以宣传方针，而且对于每一个新的重要的问题，都要随时指导党报如何进行宣传。党的领导机关与党报的关系，也应当是很密切的，呼吸相关的，息息相通的。"其次，党的机关"有严重的责任来向党报供给消息，供给文章，提供意见等等。"最后，党的各级机关和各级组织，以至于每个党员，都对党报负有责任。"这种责任就是：不要对党报漠不关心，而要阅读党报，讨论党报上的重要文章、消息和谈话，推销党报，向党报通讯等等。"②

① 1945年5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
② 1942年9月22日延安《解放日报》。

关于党报与群众的关系，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党报既要反映群众，又要由群众自己反映自己，所谓写群众，群众写。二是对党报工作者来说，既要当学生，又要当先生，在学习上，工作上，在了解事实和反映事实上，拜群众为师，向他们请教；在文字上，在技术上，在写稿业务上，做群众的先生，或者“理发员”，帮助整理修饰群众的来稿。

关于党报与实际的关系，主要要求新闻工作者要尊重实际，无论在采访中，在编辑中，都要力求尊重客观的事实。1945 年 3 月 23 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新闻必须完全真实》指出：“旧型的新闻事业，对于社会多少是不大负责任的，而法西斯的新闻事业，则以欺骗社会、愚弄社会为目的。我们就要改革这种风气，要建立新闻事业对社会对人类完全诚实完全负责的风气，对党对人民完全诚实完全负责的风气。我们要把这种革新风气的责任担负起来。”

（七）关于党报的业务指导思想和文风。党报的新闻业务最重要的一个指导思想，是摆正政治与技术的位置。技术对党报工作是不可缺少的，“办报需要必要的技术修养，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技术，不管是写论文、通讯和消息的技术，或者是编排的技术，或者是校对的技术，其作用只在于表现报纸的政治内容，好的技术能把正确的政治内容最完善地表达出来，坏的技术则不能做到这点，甚至会起相反的作用。技术的作用，技术的可贵，就在这个意义上。”“但是我们队伍中有些同志把技术的作用过分夸大，有些记者同志把技术神秘化，造出种种名词，如‘文艺性’、‘趣味性’之类，作为对新闻事业的最高要求，并且以这些要求来和政治内容对立起来，走到‘技术第一，政治第二’的错误结论。”“‘技术第一，政治第二’，这是反对党性的口号。把政治放在第二位，其直接的结果，就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技术第一，政治第二’，这又是反对群众性的口号。照着这个口号，那么具有新闻技术的人，就应该是至高无上的，就应该是‘无冕之王’，他以技术为标准，对于取舍稿件，对于取舍通讯员，对于报纸的一切，就可以‘生杀予夺’。不仅如此，甚至对于什么是报纸，什么是新闻，也可以随心所欲作出自己的定义；对于报纸的方向，也可以随心所欲作出自己的主张。这种‘无冕之王’的思想，既是主观主义的又是宗派主义的，说得更坏一点，是一种‘报阀’的思想。”“‘技术第一，政治第二’，这又是反对战斗性的口号。革命报纸的战斗性，是为了改造社会而必须具有的品质。战斗性的意义就在于从实际政治情况出发，提倡为了改进社会而必需的东西，批评阻碍社会

发展的东西，这种提倡与批评，越是切合实际就越有价值。而'技术第一'论则不然，他的'技术'标准，或者是所谓'文艺性'，或者是所谓'趣味性'等等，引导别人远远的离开现实，离开战斗。"

因此，我们必须反对"技术第一"的观念，采取"政治第一"的口号。"新型的新闻记者，他们的技术修养是和政治修养分离不开的，是和为群众服务、和群众结合的精神分离不开的。只有这样的新型记者，才能不为旧的新闻'理论'所束缚，而创造真正为群众服务的新闻理论。"[①]

党报业务的又一个指导思想，是新闻必须完全真实。旧型的新闻事业，目的是做生意，虽然有广告上写着"消息翔实"的招牌，然而决不能完全实事求是。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说，共产党人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这才是真正的我们的新闻事业的方针。

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也讲到真实报道，"例如，最初步的新闻学，就说到每条新闻必须有五要素，即时间、地点、人名、事实的过程与结果，新闻中有了这五个要素，缺一不可，才算是新闻。再例如资产阶级的新闻学主张记者报道新闻时必须亲自到发生事件的地点去踏看，而且主张摄影的报道等等。资产阶级新闻学中这些主张，我们认为是对的（理由不必多讲了），但我们同时要指出，要想求得新闻十分真实，这是非常不够的，所谓新闻五要素，所谓新闻记者亲自踏看和摄影报道，还是形式的。这些形式是必要的，但如果以为这便是一切，乃是大错的。""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②]

在真实报道上，当时的报纸也有不足。"应当指出，我们有了若干新闻在分寸上夸大的毛病，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对于我们的抗战成绩与建设成绩还宣传得不够。这两个毛病似乎是互相矛盾的，但实际上还是统一的。这两方面的毛病，都说明我们的新闻工作还不够深入群众，不够深入运动。因此，就一方面有许多应该报道的没有报道，应该着重报道的没有着重报道。但另一方面又有空洞的赞扬，即夸大了分寸的赞扬。"[③]这些毛病，应该被克服之列，因为它们同真实报

---

① 延安《解放日报》文章：《政治技术》，1943年6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

②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陆定一新闻文选》，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6～8页。

③ 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新闻必须完全真实》，1945年3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

道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毛泽东对讲真话有专门的指示。他在党的“七大”大会上说："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猪鼻子里插葱——装象'，吹就是吹牛皮。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关于要讲真话，我们现在发了一个通令，要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我们曾经有个时期分对内对外，内报一支是一支，外报一支是两支。现在我们专门发了这个通令，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支为一支，两支是两支，是知也。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①

党报业务还有一个指导思想，即多写新闻，写好新闻。"因为新闻是今天最主要、最有效的宣传形式，可以说，不学会使用这种形式，他就不要说什么宣传——而宣传，当然是我们大家都有责任。""要谈作品之多同读者之多，从来没有一种文字形式能够同今天的新闻相比。"从这两方面看，人人都要学会写新闻，是理所当然的。

怎样写好新闻？"新闻的表现既要迅速，又要准确，既要明了，又要经济，缺哪一项都不成"。"学写新闻还叫我们会用叙述事实来发表意见。我们往常都会发表有形的意见，新闻却是一种无形的意见。从文字上看去，说话的人，只要客观地、忠实地、朴素地叙述他所见所闻的事实。但是因为每个叙述总是根据着一定的观点，接受事实的读者也就会接受叙述中的观点，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们从来不说我以为如何如何，我以为应该如何如何，他们是用他们的描写方法、排列方法、甚至特殊的（表面上却不一定是激烈的）章法、句法和字法来作战的。他们的狡猾，就是当他们偏袒一方面，攻击另一方面的时候，他们的面貌却是又'公正'又'冷静'的。"正因为新闻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可以说"新闻是一种时代的科学，时代的艺术，它的发展前途正是辽阔无限。"党报应该全力提倡多写新闻，写好新闻。②

党报力倡的文风，是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是在反对"党八股"的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历数党八股的

---

① 毛泽东：《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128页。

② 胡乔木：《人人要学会写新闻》，《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24～227页。

八种表现：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毛泽东指出，"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并不是偶然的东西。"毛泽东指示要努力学习语言，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第三，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他还重申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口号，要求人们做到：

>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①]

毛泽东所指出的，是中国党报所力倡的文风，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正是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八）关于党报工作者的修养。党报是党的机关报，是党的喉舌，但是党报上的每条消息，每个标题，都是从党报工作者的笔下写出来的。没有党报工作者对党的事业的绝对忠诚，对于人民的利益的极度尊重，对于工作的非常认真，则党报不可能有完全的党性。对于党报来说，党报工作者是不可缺少的力量。

党报工作者，决不能像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那样，自称为"无冕之王"，而是老老实实自称为公仆，是党和人民这个大集体的公仆。党报工作者为党工作，为人民工作，把自己个人融合在党和人民的大集体之中，把自己个人的利益、兴趣等等服从于这个大集体的利益，在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中求得自己的发展。

有的时候，党报出现党性不纯，损伤党报的威信的情况，"原因就在于有两件东西还在作祟：一是资产阶级报纸的影响；一是主观主义的作风。"[②]这两种坏影响必须克服。

陆定一专门讲到党报工作者为人民服务，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的问题。他说，"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时时勉励自己，做人民的公仆，应知我们既不耕田，又不做工，一切由人民供养，如果我们的工作，无益于

---

①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70～89页。
② 延安《解放日报》社论：《给党报的记者和通讯员》，1942年11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

人民，反而毒害人民，那就比蠹虫还要可恶，比二流子还要卑劣。”“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是学了些新闻技术的，但万勿以此自满，看不起人。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做专业的新闻工作者的人，却有很大的缺点，因为你对于你所报道的事实，没有感性知识，无论如何不会像亲身参加那个工作尤其是领导那个工作的人知道得那样透彻、了解得那样亲切的。所以在你作报道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请教那亲身参加或领导这件工作的人，细细的听，好好的记，写成之后还要请他看过（或听过）和改过，写得不好就要听他的意见重新写过，以便真正求得忠于事实。”“我们办党报的人，千万要有群众观点，不要有‘报阀’观点。群众的力量是最伟大的，这对于办报毫无例外。”①

党报工作者作为新型的新闻记者，要坚持“政治第一，技术第二”的原则，懂得政治修养和技术修养是分不开的，克服旧的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束缚，创造真正为群众服务的新闻理论，这样，共同努力，“我们报学史上新的光荣的一页将被创造出来”，②党报工作者，“成为报纸与工农兵之间的良好的媒介”。③

以上，是对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的概述性总结。这一理论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1942年至1945年初步形成，1948年趋于完备，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发展。

党报理论基本上是在思想整顿和新闻改革的经验总结基础上形成的，除了马、恩、列、斯的理论及苏联新闻理论的影响，基本上可以说是我党独立思考与理论探索的结晶。对于这一点，除我们在上面引述大量的论著与社论等文献可资证明，笔者还可以提供一件事例辅以说明。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闻界于1979年掀起又一轮新闻改革热潮。新闻理论界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空前的理论研究。有人怀疑40年代党报理论中若干新闻学命题的提出，受到西方新闻学的影响。笔者为此给当时尚健在并参与全国政协工作的陆定一同志去信，反映学术界的一些争论并向他了解当时他撰写《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的情形，定一老人很快给笔者回信，兹录于此：

---

①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陆定一新闻文选》，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1页。

② 延安《解放日报》文章：《政治与技术》，1943年6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

③ 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1944年2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

童兵同志：

九月十四来信收到。

所说关于新闻定义的意见，我都同意。

这文是在延安写的，住的是窑洞，点的是蜡烛，看不到外国有什么新书。

当时我的参考材料很可怜，只有一本戈公振的新闻学。但当时有大批青年从苏区外面来，他们在辩论新闻学，各执一辞，总起来说，就是所谓"性质论"。这种唯心主义的东西，花样甚多。但原理很简单。情况就是如此。你说的约斯特的书，我至今不知道。

即致

革命敬礼

陆定一

1981.10.4.

作为一种新型的新闻理论，党报理论也有不够完善之处。由于当时处于战争时期，加上学习苏联经验的片面性，笔者认为该理论尚存在两方面的不足：

第一，对于党报的民主监督功能认识不足，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论述很少。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强调后者而对于批评则重视不够，且对于批评者的态度又责之过严，令人有所顾忌，不敢放开手脚去做。

第二，由于向苏联学习中的片面性，致使新闻宣传中出现一些僵化死板的做法。如学习《真理报》每天发一篇社论，造成无话有话都要写社论，改革之后有所调整，但问题仍然存在。说报纸的新闻和言论，要本着对党负责的态度去做，是正确的；但强调报纸上的每个字每句话每个标题，都要代表党讲话，则失之于过于宽泛，这不利于充分反映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和看法，不利于实行人民内部的舆论不一律。

党报理论的这些不足，在以后发展的过程不仅没有引起重视与改进，反而有所严重。这就给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发展造成了隐患，带来了损害。新时期新闻改革难度之大，同此不是没有关系的。

第三节 毛泽东早期新闻思想

毛泽东是在中国继承发展由列宁加以丰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新闻

思想的代表，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移植苏共和苏维埃新闻政策和新闻模式的组织者，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积极探索者。

毛泽东作为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卓越的报刊活动家，他的学说和观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在第三世界各国享有崇高威望。他的新闻思想，不仅对中国，而且对那些同中国情况相似的国家，都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尽管他已故去，他的新闻思想至今仍对中国新闻界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他的新闻思想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中国大地上的发展。

这一节，我们先对毛泽东早期——从 20 年代至 40 年代——的新闻思想作一个大致的概述与分析。

一、毛泽东新闻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

毛泽东新闻思想是在本世纪 40 年代全面形成的，它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同下面几方面的历史和文化条件是不可分的。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久影响

毛泽东一生好学，阅读不倦。还在青少年时代，凡是近代中国进步思想家所能见到的一切著作，从孔孟儒学、朱明理学到王船山、颜习斋，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到孙中山，从赫胥黎、斯宾塞尔的进化论、康德的二元论和 18、19 世纪欧洲的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到托尔斯泰主义，他都如饥似渴地拿来阅读，都作了深浅不同的研究。

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最广泛、最持久。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他几乎无所不读。年轻时他十分推崇朱明理学，相信精神万能，认为"精神心思，愈用愈灵。"后期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失误，同他受到的唯意志论以及惟我独尊等观念的影响，不能说没有关系。

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认为，中国思想从根本上比西方思想更为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这个事实也许对毛泽东的思想有相当的影响，对他发生影响的还有佛教和道教——两者都倾向于按照对立面来思考——中的辩证法因素：每一种存在都包含着阴阳的矛盾。他无疑更直接地受到他读过的《水浒》那样的小说的影响，这些小说赞美了农民起义及其军事业绩。[①] 麦氏的这一分析，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在毛

①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68 页。

泽东的藏书中，除马、恩、列、斯和鲁迅的全集以外，一些著名的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四部备要》、《万有文库》、《古今图书集成》，占有重要地位；他晚年还专门找人为他念《水浒》一类古典小说，并围绕农民战争发表了一些意见；他还对《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等一些佛教宗派的经典作过一些探讨，都是很好的佐证。

毛泽东从大量的古籍中汲取和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他说过，应该充分地利用遗产，要批判地利用遗产。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其中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期，它有很多的东西还是不错的。[1]

毛泽东的这一看法是正确的。他从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汲取许多有生命力的精华，作为从事报刊活动、形成报刊观点的营养。

（二）研究马列著作

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毛泽东正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在这里，他同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李大钊接触，阅读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阅读《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刊登的陈独秀等先进分子的文章。他还同学生运动左翼领袖和工人群众交谈。这一切有力地推动着毛泽东思想的转化，推动他转向新的天地——共产主义思想体系。

"五四"运动和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最深的影响是：中国也应当走俄国的道路。他的信仰和追求开始发生根本改变。他说，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毛泽东从1920年读第一本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共产党宣言》起，一生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地阅读马、恩、列、斯的著作。在长征路上，他患病的时候，躺在担架上还阅读马列的书。毛泽东似乎更喜欢读列宁的书，在他看来，列宁的作品生动活泼，充分说理，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所以，在学习研究马列著作

---

[1] 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0[illegible]页

的过程中，毛泽东受列宁思想的影响更深、更全面。列宁关于党报工作的观点和关于党性的论述，对毛泽东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毛泽东特别看重列宁的著作和他的观点，还因为中国的情况同俄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①因此，列宁关于党报的思想，最易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接受。有时，我党关于报刊工作的文件，几乎是全文抄转列宁的论述或列宁指导下的共产国际的有关规定。

毛泽东在阅读马列著作，学习借鉴俄国革命的经验时，逐渐明确并不断坚持这样的指导思想：这时的中国不是那时的俄国，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另外的题目。毛泽东讲过这样一段很有教益的话：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②

毛泽东正是在刻苦攻读马列著作，掌握了先人的伟大思想的基础上，又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和针对中国的新闻工作实践，产生和形成自己的新闻思想的。

（三）接受新闻教育，投身报刊实践

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样，毛泽东也堪称报刊活动大师。

早在少年时代，毛泽东就迷恋于阅读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报刊，其中受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影响颇深，作文尽习梁启超的文体，他的老师袁吉六说，毛泽东的文章都是，“报馆味”！

不久，毛泽东又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活动所吸引，使他进一步体验到创办报刊的意义。他指出，报刊不仅是人人要看的东西，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好办法，而且是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并发国民之新思想的最好的工具。在新文化运动的召唤下，他弃康梁，迎新潮，开始以报刊活动从事唤醒国民、鼓吹新思想的斗争。

毛泽东于1919年创办《湘江评论》并自任主笔，继而接编《新湖南》，该刊被封后又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文章。在驱张（敬尧）斗争中，他又再赴北京，以新民学会代表身份组织平民通信社，身任社长，竟

---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页。
② 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35页。

日编印，还在驱张刊物《天问》上撰稿。建党初期，毛泽东先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为党的刊物《向导》撰稿，继而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代理宣传部长身份担任《政治周报》主编。后来，在《红色中华》、《斗争》、《红星报》等报刊上经常发表文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共产党人》、《中国工人》、《八路军军政杂志》、《解放日报》等报刊的创办和出版，为它们撰写发刊词，拟定出版方针，指导新华社（及其属下的电台）的日常编辑和播发新闻的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新闻和宣传工作所发表的论述、指示、谈话，光收入《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就有120多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为新华社撰写和修改的新闻稿、评论文章，超过200篇，其中以新华社社论、评论形式收入《毛泽东选集》三、四卷的，共18篇。

比马、恩、列、斯幸运，毛泽东1919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曾经参加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系统地学习徐宝璜主讲的新闻学基本知识和邵飘萍主讲的新闻采编业务知识。这使他得以有机会全面了解资产阶级新闻学的理论与业务，日后在同无产阶级新闻实践的比较中逐渐形成自己的新闻思想。

二、毛泽东早期新闻思想

毛泽东早期的新闻思想，萌生于20世纪20年代，形成于30～40年代，这里分别加以概述。

（一）20年代

20年代毛泽东受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思想的影响，同时又在“五四”运动之后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与李大钊等人革命报刊活动的启发，因而他的新闻思想具有新鲜的政治内容和新时代的风格特征。这一时期主要的新闻观点是：

1. 办政治报纸以针砭时政。毛泽东在分析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经验时看到，他们虽然十分重视报纸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但忽略对社会实际的了解，“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①]因此，毛泽东认为办报必须“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他在《湘江评论》、《新湖南》、长沙《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都针对现实生活的重大问题，或抨击，或评论，或歌颂。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提

① 1919年7月25日《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

出："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世界上什么力量最强？"发人深思，令人猛醒，引导着人们沿着如此现实的问题去思考，去奋争，去寻求改造社会的答案。

2. 以民众为宣传鼓动的对象。毛泽东曾经研究过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他认为，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脱离群众才导致革命失败，任何革命，若要成功，革命中的知识分子领袖必须同国内的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他在发表于《湘江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中说："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他还指出，"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①所以，他特别撰写《民众的大联合》，号召人民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争取自己的真正的解放。毛泽东以很大的热情帮助湖南《通俗报》的工作，就是因为他认为该报的读者，主要是一般劳动群众，通过《通俗报》，可以向群众进行教育和鼓动工作。

3. 指出报刊的阶级属性。在报刊实践中，毛泽东开始对报刊的阶级属性有所认识和阐述。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指出，"现在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之中"，"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议会'以制订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的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的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②

20年代毛泽东较有代表性的含有鲜明的新闻观点的著述主要有《〈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政治周报〉发刊理由》和《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其中最著名的是《〈政治周报〉发刊理由》。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

1. 关于办报目的："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向反革命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

2. 关于用事实表明立场的办报原则："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

---

①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1919年7月25日《湘江评论》第二号。

② 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友信》，《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3页。

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

3. 关于报纸的体裁："《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①

(二) 30～40年代

这20年是毛泽东新闻思想形成时期。在领导革命战争中的报刊建设，尤其在指导延安《解放日报》整风和新闻改革的过程中，他的新闻思想有了极大的发展。这一时期他的新闻学著作有：《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工人》、延安《解放日报》等报刊创刊撰写发刊词，指导《解放日报》整风改革的一系列讲话和指示，关于在农村调查的讲话，《反对党八股》，关于增强报刊宣传党性清除资产阶级新闻思想影响的一系列指示文电，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关于新闻宣传的部分，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一系列指示文电，关于新闻写作的一系列指示文电，《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30年代的代表性论著是《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40年代是《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是对落后的中国农村，在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下如何开展新闻宣传的出色的研究，同时又是对一般的新闻传播规律深刻的揭示，其主要观点有：

1. 关于办通俗性报纸的意义。毛泽东通过说明举办《时事简报》的目的，分析在像中国农村这种落后地区开办通俗性群众报刊的意义。他说，"农村里头，小市镇里头，小城市里头，都是没有报纸看的。斗争的群众，革命以前和革命以后，在消息不灵通、见闻狭隘这一点上讲，是差不得很远的。井里虾蟆井里跳的现象，依然在群众中保持着。……这种现象引导群众把斗争的热情降低下去，引导群众走向保守局面上去。这是和扩大斗争、争取全国胜利的任务相冲突的。努力地扫除这种现象，是苏维埃和民众团体的责任。扫除的方法，代表大会、群众大会、巡行演说、团体参观等项固然都是好的，举办《时事简报》更是一种好的办法。"

2. 关于通俗化报刊的编排方法。毛泽东指出，像《时事简报》这种

① 毛泽东：《〈政治周报〉发刊理由》，《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页。

小报，要不登文章，只登消息，少发议论。他说："《时事简报》不做文章，只登消息。登的消息是：(1)群众斗争消息(打土豪，分田地，捉AB团，起贫农会，消灭地主武装，发展红色区域，甲乡瘟死十头牛，乙乡无盐吃，没菜等等)；(2)苏维埃的活动(开了代表大会，出了重要布告等等)；(3)红军的活动(作战胜利，帮助群众分田等等，但军事秘密如红军的人数、枪支、编制、行动、番号等不可登载，以防泄漏)；(4)统治阶级情形(军阀混战等等)。毛泽东又指出："也不是完全不发议论，要在消息中插句把两句议论进去，使看的人明白这件事的意义。但不可发得太多，一条新闻中插上三句议论就觉得太多了。插议论要插得有劲，疲疲沓沓的不插还好些。不要条条都插议论。许多新闻意义已明显，一看就明白，如插议论，就像画蛇添足。只有那些意义不明显的新闻，要插句把两句议论进去。"毛泽东根据新闻传播接近社会的要求，指出："登消息的次序，本乡的，本区的，本县的，本省的，本国的，外国的，由近及远，看得很有味道。""红军编的《时事简报》，它的内容国内国际消息要少，只占十分之三，本军、本地、近地消息要多，要占十分之七。只有这样，才能引动士兵和群众看报的兴趣，取得我们所要取得的效果。《时事简报》的新闻，特别是本地的和近地的新闻，一定要是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

3. 关于通俗性报刊的语言和取材。毛泽东指出："地方的《时事简报》要完全用本地的土话。从别处报纸抄下来的那些文字不通俗的新闻，要把原文完全改变。红军的《时事简报》，不会写本地的土话，也要用十分浅白的普通话。"

4. 关于通俗性报刊的真实性要求。毛泽东对此尤为重视，他强调："严禁扯谎，例如，红军缴枪一千说有一万，白军本有一万说只一千。这种离事实太远的说法，是有害的。《时事简报》不靠扯谎吃饭。"[1]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经典著述，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集中概括，又是毛泽东新闻思想发展的里程碑，其主要观点有：

1. 关于党报的作用和力量。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我们正在进行土地制

---

[1] 毛泽东：《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6～33页。

度的改革。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政策，都应当在报上发表，在电台广播，使广大群众都能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2. 关于全党办报的方针。毛泽东认为，实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在报纸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他说："我党二十几年来，天天做群众工作，近十几年来，天天讲群众路线。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但是在有些同志的工作中间，群众路线仍然不能贯彻，他们还是只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做工作。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做一件事情，总不愿意向被领导的人讲清楚，不懂得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他们主观上也要大家动手动脚去做，但是不让大家知道要做的是怎么一回事，应当怎样做法，这样，大家怎么能动起来，事情怎么能够办好？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当然要从思想上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同时也要教给同志们许多具体办法。办法之一，就是要充分地利用报纸。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办报和办别的事一样，都要认真地办，才能办好，才能有生气。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3. 关于向群众学习。毛泽东指出："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同志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往往不懂事，对于实际事物往往没有经历，或者经历很少。……要使不懂得变成懂得，就要去做去看，这就是学习。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参加一个时期的土地改革工作，这是很必要的。在没有出去参加群众工作的时候，也应当多听多看关于群众运动的材料，并且下功夫研究这些材料。……报社的同志也要经常向下边反映上来的材料学习，慢慢地使自己的实际知识丰富起来，使自己成为有经验的人。"

4. 关于党报的风格。毛泽东指出："应当保持你们报纸的过去的优点，要尖锐、泼辣、鲜明，要认真地办。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

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①

在30～40年代，除了上面两篇经典性新闻论著，还有关于党报必须同中央保持一致，加强党性等方面的论述。以时间为序，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

1. 党的路线和方针，也是党报的路线和方针。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的发刊词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②

2. 务使报刊宣传服从于党的政策。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一封电报中指出，务使报刊的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③

3. 克服报刊工作者闹独立性的倾向。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批评了一个时期各地宣传曾发生若干不适合目前党的政策的事件，他指出，"查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对当地通讯社工作及报纸工作注意甚少，对宣传人员及宣传工作缺乏指导，尚不认识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的作用，尚不懂得领导人员的很多工作应该通过报纸去做。"他要求各地"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在给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林枫的电报中，毛泽东还指出，"整个通讯社及报社的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分局必须经常注意，加以掌握，使我们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④

4. 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毛泽东在一个党内指示中提出，"各地领导机关（包括中央局、区党委两级）对于报纸、通

① 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49～154页。

② 毛泽东：《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55～57页。

③④ 毛泽东：《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96～98页。

讯社等极端重要的宣传机关放弃领导责任，或者虽未放弃领导，但是抓得不紧，听任许多错误观点广泛流行，宣传工作极不严肃。此种状况，必须坚决改正。改正方法之一，是中央局（分局）及区党委（省委）对于自己的报纸，必须于每天出版之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大样看一遍，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出版。”“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并不得在宣传中将中央和受中央委托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机关（即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和前委会）相平列。相反地，必须公开向党内外声明，各受中央委托的机关是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在发出自己的决议、指示、命令和训令时，亦必须注意到此点，不得将自己和中央相平列，甚或向党内军内将自己造成高出中央的影响。”①

5. 禁止擅自向外表示态度。针对一个干部不向上级请示擅自同意外国记者采访并表态，被敌人钻了空子的严重事件，毛泽东批评该上级组织说，“这件事证明你们反对下级事先不请示的无纪律状态的斗争，并未展开和深入。你们必须以此事为例证通令所属，引为鉴戒。”并且规定，“以后各地对于从国民党区来的一切情况不明的中外记者，必须拒绝接谈任何问题。对于确系革命的或同情的记者，是否接谈，亦须请示上级决定。任何下级人员，不得擅自表示态度。”②

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文风等也有重要论述，本书已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的形成节中于延安《解放日报》的整风改革及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这两个专题中作了详尽概述，在此不再赘言了。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中国的发展

由于革命事业的需要和党的领导人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视，也由于毛泽东本人对于新闻学研究的身体力行与组织指导，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都以很高的热情和不少的精力投身于党报理论的研究、出

① 毛泽东：《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55～156页。

② 毛泽东：《勿擅自向外表示态度》，《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62页。

了许多至今读来仍极有价值的新闻学论著，从而在总体上极其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中国的发展。

一、张闻天的新闻思想

张闻天是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于1931～1935年间，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书记处书记。1935～1938年间，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1938年后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马列学院院长。这些年间，他领导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发表了一些重要的新闻宣传论著，主要的论文有4篇：《怎样完成党报的领导作用》、《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关于我们的报纸》、《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下面我们从30年代和40年代各选取一篇，分析和概述张闻天的新闻思想。

《关于我们的报纸》写于1933年12月1日，从总结苏区的《红色中华》、《红星》、《青年实话》等报刊的经验与不足入手，阐述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的报刊的性质、任务和原则、方法。

1. 关于党和苏维埃政府报刊的任务。张闻天指出："把党与苏维埃政府的任务，最清楚的放在我们报纸的前面，继续不断地为这些任务的实现而斗争，应该是我们报纸的基本工作。"但是，当时的报纸并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比如："大部分我们报纸上的新闻，都是空洞的浮面的记载。在我们报纸上不容易找到关于一个村、一个乡、一个机关、一个企业某一部分工作的比较有始有终的记载。比如关于合作社的记载，我们只看到'大批群众踊跃加入合作社'的一般记载，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关于一个合作社的比较有头有尾的记载。我们的合作社到底怎样工作，群众同合作社的联系等许多具体的问题，我们从报纸上都无从知道，报纸也不注意这许多实际的问题，也不提出值得党与政府注意的问题，也不提出对于一些问题的具体意见与具体办法。"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张闻天指出："这是因为我们报纸没有真正的去了解下面实际情形，检查我们的实际工作，揭发在我们实际工作中发生的一切严重问题所必然产生的结果。这种报纸当然决不能起为了党与苏维埃所提出的中心任务的实现而坚决斗争的作用。"

2. 关于党和苏维埃政府报刊的方针。张闻天指出，报刊应该提供具体的大量的实际材料，来教育群众和改善工作。但是当时的一些报刊不是这样。张闻天批评说，"在我们报纸上空洞的议论与叫喊多于利用具体的材料来开展斗争，来改善工作，来教育广大的群众。在我们的

报纸上差不多经常议论到应该反对官僚主义，甚至有些地方由于叫喊反对官僚主义把嗓子都弄哑了。然而关于官僚主义的具体事实的记载，则是少到再不能少的地步了。”“奇怪的现象！到处都在喊要打倒官僚主义，但是官僚主义的具体事实在我们的报纸上却很难找到。在反对浪费、反对贪污腐化、反对开小差，反对反革命活动以及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常常看到空喊多于具体事实的揭发。这种空喊不但不能打击罪恶的负责者，不但不能改善实际工作，而且也不能教育群众。”“我们的报纸是革命的报纸，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对于一切损害革命利益，损害苏维埃政权的官僚主义者，贪污腐化分子，浪费者，反革命异己分子，破坏国家生产的怠工工人等，必须给以最无情的揭发与打击，使他们在苏区工农劳苦群众的面前受到唾骂、讥笑与污辱，使他们不能在苏维埃政权下继续生存下去，这样来改善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来教育广大群众。”

张闻天认为，党和政府的报刊必须真实，他说，“我们所需要的是真实，我们不需要在我们的真实上加上什么粉饰。在苏维埃革命中，我们有着数不尽的群众的英勇与光荣的壮烈的事实，我们有着新社会创造中一切伟大的设施与工作，但是我们还有许多弱点，还有许多不能容忍的现象，还有许多坏蛋分子在我们的内部进行破坏工作。我们需要我们的报纸，如实的反映出苏维埃的实际，真正为党与苏维埃政府所提出的具体任务而斗争。我们不是沉醉于自己美妙的空想家，我们也不是由于我们自己工作的缺点与错误，陷于悲观失望的无气节分子。我们是从目前的现实出发，依照我们的路线改造这一现实而稳着脚步前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张闻天还批评报纸宣传不真实的表现，“像我们那样的记载，没有法子使读者知道到底我们的‘模范’而‘光荣’在那里。在我们的报纸上很难找到有系统的关于一个机关、一个企业、一个工厂、一个乡、一个支部的某一工作的模范的通讯。我们只要在那里看到扩大了几个红军，我们立刻笼统地给他一个‘模范’的名字。我们往往拿一些表面的数目字来决定模范与落后，对于工作的实际的内容与质量，我们照例是不注意的。但是工作的模范正是决定于工作的内容与质量。”

3. 关于加强党和政府对报刊的领导。他指出，“各级机关对于自己的报纸的注意，领导与帮助是极端不够的。比如《红色中华》是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但是中央政府对于《红色中华》中除了要它登载中央政

府的文件之外，可以说没有什么帮助与领导。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但是中央政府不去利用，不去领导，这是不能容许的现象。""应该指出的，在中央政府中有些个别的同志，以为利用自己的机关报，就是利用它来登载自己油印的文件，关于如何经过报纸来进行活的领导，却是不了解的。所以《红色中华》一直到现在名义上虽是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但是实际上还没有达到中央政府机关报的目的。这不能简单的责备《红色中华》，中央政府也要负很大责任的。我们不但要使我们的报纸成为集体的宣传者，而且也要它成为群众运动的组织者。把列宁这句名言拿来一千零一遍的背诵，并不能在实际上真正转变我们的工作。这里同样的需要坚持到底的布尔什维克的具体的实际工作。"①

《中宣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写于1941年6月20日，是张闻天为中宣部起草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宣传学的高度，极其详尽地阐释了鼓动与宣传的特点和关系，涉及宣传鼓动的重要问题，几乎都谈到了，择其要点作些分析。

1. 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任务。文件说，"我们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任务，是在宣传党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党的纲领与主张，党的战略与策略，在思想意识上动员全民族与全国人民为革命在一定阶段内的彻底胜利而奋斗这种宣传与鼓动，同时包含有对共同思想进行联合，对敌对思想进行斗争的两个方面。宣传鼓动是思想意识方面的活动，举凡一切理论、主张、教育、文化、文艺等等均属于宣传鼓动活动的范围。因此，宣传鼓动工作的活动范围是非常广泛的。所以把宣传鼓动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的了解，是错误的。这种了解的结果，往往放弃许多重要的宣传鼓动工作的阵地，因此就不能把我们宣传鼓动工作的活动扩展到社会的各方面去。而只有扩展我们宣传鼓动工作的范围，才能使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任务得到完成。"

2. 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特点与相互关系。文件指出，"我党宣传鼓动与其他党派的宣传鼓动有基本的原则的区别，就在于我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原则。这些基本的原则的区别，具体表现在：第一，我党所宣传的理论、纲领、政策等，是符合于客观真理的，符合于客观发展的规律的。我们在认识客观真理、客观规律中，指

---

① 张闻天：《关于我们的报纸》，《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75～184页。

出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前途，并为着这种前途而奋斗。因此，我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是有生命的，有力量的。第二，我党所宣传的理论、纲领、政策等，是符合于全民族与全国人民的利益的。我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就是为着全民族与全国人民的利益而服务。因此，我党的宣传鼓动是能为群众所接受与拥护的。第三，我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是与党的行动相符合的。言论和行动的一致，是我党的特点。群众所重视的不仅是言论，而主要的是行动。要是一个政党，它的言论与它的行动不相符合，要是它不履行自己的言论，要是它的言论不兑现，这样的政党必然要失去群众的信任，必然要遭受失败。共产党有别于其他阶级的政党，就是严格的保持言论和行动的一致。因此，我们党的宣传鼓动，是行动的，战斗的。”

文件还指出，对宣传鼓动相互关系可以这样认识："宣传与鼓动是组成我党整个宣传鼓动工作的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是统一的，同时又是有区别的。宣传工作是在于把一个问题从理论上解说得明白，使比较少数的人了解这个问题的原因、结果、前途和发展规律，给比较少数的人以许多观念。鼓动工作是在于从一个问题中抓住人人都知道的事实，给广大群众以一个观念，极力激起群众的感情。所以从任务上、内容上、对象上、方式上来说，宣传与鼓动都是有区别的。宣传工作主要是文字上的，并带更多的经常性，而鼓动工作则主要是口头上的，并多带临时性。鼓动工作为宣传工作开拓更广泛的基础。鼓动工作可能在一个场合中就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宣传工作又帮助巩固鼓动工作中已经取得的地盘。宣传工作又是鼓动工作的加深，使群众由对某一事实的同情和愤怒，而走向对某一问题的发展规律的认识。鼓动工作做得愈好，则宣传工作愈容易进行；宣传工作做得愈好，则愈容易扩大鼓动工作的范围。”

3. 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基本原则。文件指出有七个原则，即第一，必须掌握党的路线与党的政策。第二，必须正确估计客观的环境，了解具体的情况，了解宣传鼓动的对象。第三，必须区别各种不同情况下的宣传鼓动工作：(1)党内与党外；(2)干部与群众；(3)公开环境与秘密环境；(4)战时与平时；(5)各种不同的区域(如大后方、抗日根据地、敌占区、城市、农村等等)。第四，必须根据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使群众接受党的宣传鼓动。第五，必须使我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循着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道路来进行，并善于同各种不同的同盟军建立各

种不同程度的合作。第六，必须善于使用一切宣传鼓动的方式，从通俗的形式到高级的形式，以及由这种形式过渡、转变到另一种形式。第七，必须善于使用一切宣传鼓动的工具，熟知它们一切的性能。

4. 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方法。文件指出，宣传鼓动的共同方法有五个，即第一，你要讲什么？第二，对什么人讲？第三，要达到什么目的？第四，怎样讲？第五，随时留心群众的反映。

文件还指出，宣传和鼓动又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对宣传来说，要注意四点：第一，宣传的内容必须是充实的，而不是空洞的；第二，宣传的语句应当是简单、明了、清楚、透彻的；第三，宣传的事实应当是真实的、生动的、恳切而带有说服性的；第四，由具体到抽象，由近到远，由中国到外国。对鼓动工作来说，要注意这样四点，第一，抓住为广大群众所熟悉的事实；第二，抓住为广大群众最切身的、最迫切的、最易感动的事实；第三，讲话要生动，富于情感，富于煽动性；第四，时间要短。

5. 关于报刊、通讯社和出版工作。文件指出，"报纸、刊物、书籍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党应当充分的善于利用这些武器。办报，办刊物，出书籍应当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的最重要的任务。除了中央的机关报、机关杂志及出版机关外，各地方党应办地方的出版机关、报纸、杂志。除了出版马、恩、列、斯的原著外，应大量出版中级读物，补助读物以及各级的教科书。应当大量的印刷和发行各种革命的书报。在现代无线电业发展的情形下，以及在中国交通工具困难的情形下，发展通讯社的事业，无线电广播事业，是非常重要的。应当在党的统一的宣传政策之下，改进现有通讯社及广播事业的工作。"

6. 关于宣传鼓动工作干部的培养。文件指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发展，首先决定于宣传鼓动工作干部的培养。培养掌握马列主义而又富于实际工作经验的宣传干部，这是党的一个严重的和长期的任务。党应当经常的注意到从知识分子党员和知识分子工人中培养出党的宣传家。"文件还提出，"在高级党校内设立专门培养宣传鼓动工作者，报纸编辑，及新闻记者的科系，是非常必要的。"[①]

二、博古的新闻思想

博古，原名秦邦宪，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报刊活动家。

---

① 《中宣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03～113页。

1930年后，领导出版《中国工人》、《劳工报》、《工人报》、《赤色海员》等工人报刊。1937年红中社改名新华社后，博古一度任社长。1941年后，任延安《解放日报》社长兼新华社社长。曾为《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整风改革做出贡献。博古的新闻思想，主要表现在领导延安《解放日报》整风改革期间，报纸社论所体现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之中。这在第二节已有详述，此不再提及。除此之外，这里分析博古撰写的三篇文章中的新闻思想。

第一篇《愿〈红色中华〉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写于1933年8月10日。在文章中，博古指出："《红色中华》是苏区千百万群众的喉舌，是我们一切群众的集体宣传者与组织者。"他对《红色中华》提出许多期望："热望着'红中'更提高它的集体宣传者与组织者的作用；热望着'红中'更大的成为在国内战争中鼓励前进的喇叭，经济战线上的哨兵，保卫党的总路线而斗争的卫士与为着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华而奋斗的战士；热望着我们《红色中华》从有四五万读者的刊物变为有四五百万四五千万读者的刊物，从有几百个通讯员的刊物成为有几千万通讯员的刊物；热望着《红色中华》成为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华的最广大的群众的读物。"①显然，这些"热望"，生动地表明了博古对党和政府报刊的性质和使命的认识。

第二篇文章题为《我们应该怎样拥护红军的胜利——评我们对于拥护红军的宣传鼓动工作》，也写于1933年。他通过评述，尤其是批评一些报刊未能很好地开展拥护红军的宣传鼓动，阐明报刊对于红军宣传上应有的立场和正确的做法。博古指出，"我们的群众报纸，对于红军的光荣与伟大的胜利没有充分的加以宣传和散播。个别的报纸，甚至于没有一个字提出最近的工农红军的空前的伟大胜利！"他认为，正确的立场与方法应该是："我们的报纸不仅要经常的广大的传播红军胜利的消息，而且要成为拥护红军运动的组织者。每一个红军的胜利消息应该与号召群众拥护红军联系在一起。每一个群众报应该在读者中间进行收集'一个铜板的拥护红军募捐'，'动员工人加入红军'，及'组织红军之友'等等的活动！报纸不仅是宣传者，它同时应该是组织者。"

博古还指出，对于红军的胜利，不仅要有充分及时的报道，而且还

① 博古：《愿〈红色中华〉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55～156页。

要有必要的宣传、解释和说明。他说："对于工农红军的作用及最近的光荣胜利的历史的意义的解释与宣传是非常不够的，而且有时是完全不了解这种意义的。"

博古指出，不仅要报道红军的胜利，而且要号召广大工人拥护红军，支援红军。他说，"一般的说来，正像我们上面所指的，我们的宣传品上，没有很好的来号召广大的工人群众来拥护和援助苏维埃运动和红军，常常仅仅限制在空洞的拥护苏维埃和红军的口号中，而没有告诉工人群众怎样来拥护和援助红军的行动，特别是青年团的组织，说尽了一切最空洞与抽象的大的政治口号，而没有一个提到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怎样真正地去援助红军，拥护红军。"他还指出，"这里除了李立三式的空喊总同盟罢工之外，一点具体的东西都没有！这是黄莺的歌唱，不是真正的组织青年工人去反对进攻苏联和苏区！团省委的宣言甚至《劳动青年》的社论都是同样的空洞，与一般的空喊！"博古还说，"在我们的报纸上看不到在上海工人群众增长着的拥护红军苏维埃的情绪，更说不上，我们的报纸对于这种运动的组织作用。应该即刻的消灭这种情形，应该在我们的报纸上反映一切工人群众间援助红军的热忱，并且组织他们的热忱，这里最主要的是使各厂的工人及劳苦群众了解其他工人群众的拥护红军苏区的活动，他们的方法，组织方式等等，给他们以好的先例和模范，使他们能够采用别人的经验来进行这个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运动。工农红军的英勇的斗争和光荣的胜利责成我们的一切报纸和宣传品，要进行一个广大的拥护红军的运动与在这方面的彻底的转变！我们的一切群众报纸应该即刻的来完成红军的胜利所给他们的光荣的任务！"①

第三篇文章是作于1944年秋天的《党报记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估计是个讲话稿，由他人记录成文。这篇文章主要讲党报的性质任务和对党报记者的要求。博古指出："我们是党的机关报，在工作上有很大的责任，作党的喉舌，党每天经过报纸向群众讲话，没有别的工具能如报纸这样更紧密的和群众联系；另方面党报又是党的眼睛、耳朵，经过它了解下面的情形，应该说报纸比其他的线索更快更生动。党报是党的领导工作上重要一环——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我们两方面都

① 博古：《我们应该怎样拥护红军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65～174页。

担负:(一)我们收集,分析,批判,提出意见,供给党采用;(二)党决议了的事情,又要报纸宣传下去。但也因为它是党的日常的耳目,如果报道不正确,会影响党的政策。我们要成为党的喉舌,必须要贯彻党性、群众性、组织性、战斗性。"

博古讲到对党报记者的要求,他说:"党报记者的一言、一行、写东西等均要时时反省自己是否站稳立场,有群众性没有,给群众有什么好处,起什么作用?党报的采访通讯工作者,应注意自己是共产党员的新闻记者,要首先是好党员,熟悉党的路线,政策,要有共产党员所有的一切品质。对党的路线、政策不研究熟悉,你便无法去发现问题和真实报道问题。而你要别人了解的更深刻,就首先要自己在对党这个问题上的政策了解得更深刻,否则,会困难。"博古又说,"既是党报的新闻记者,除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外,还要有新闻记者的品质:(一)要能接近人,要和群众搞得来,谈得来话;(二)要有冷静批判的能力,作报告、作调查、写新闻、写通讯,目的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一样一个合作社,一样一个文化卫生教育,在他那个地区总一定有它的特点和优缺点。首先要好好采访,加以研究调查,到要怎样表达时,这才是写的问题,要写好当前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就要组织材料把重点表达出来,这就要求记者练好写作能力。这里,要谈到新闻工作上最重要的要快,要有时间性,我们要锻炼自己写稿迅速。最后,要谈到,每一个做党报记者的同志要认识到自己作党的喉舌、党的眼睛、耳朵是很光荣的,要打下长期事业心,使本身的业务也更钻研,这是我对大家的希望。"①

三、陆定一的新闻思想

陆定一早年担任过《中国青年》、《青年实话》等报刊主编,长征中编过《红星报》,1942 年 8 月担任延安《解放日报》总编辑。新中国建立后长期担任中宣部部长。他在实施《解放日报》整风改革中,有许多言论和经验,他撰写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具有广泛影响。

本书第二节已对《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的观点即唯物论新闻观作过详尽介绍。这篇论文讲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新闻的本源",说明新闻的本源是事实,因而新闻的定义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

① 博古:《党报记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新华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03～205 页。

这个问题是针对资产阶级新闻学中的"性质说"而提出的,"性质说"认为"新闻乃是时宜性与一般性之本身"。第二个问题是"新闻如何能真实",强调光注意新闻五要素、踏看、摄影是不够的,要真正做到真实,记者就要同广大群众一起,深入到运动中去,发现新闻。

强调新闻必须完全真实,是陆定一新闻思想的核心内容。除了《观点》这篇论文,专门阐发真实性之外,我们至少还可以找到五篇陆定一的论文,其中的主题都是讨论真实性的。

第一篇是发表于1946年1月11日的《人民的报纸》,陆定一在文章中说:"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现代的报纸?这是因为人民大众要求知道真实的消息。现代报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几乎是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时产生出来的。专制主义者不要人民聪明懂事,只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是很不喜欢现代报纸的。新专制主义者,即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比其先辈,就更高明些了。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辈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糊涂,最后,成千成万替希特勒去当炮灰。所以,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很大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所以,也有两种记者。一种记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告诉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另一种记者,是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

中国有少数人,集新旧专制主义者的大成,他们一面办报造谣,一面又禁止另一些报纸透露真实消息。他们很怕真正的记者,因为他们有不可告人之隐,所以喜欢鬼鬼祟祟,喜欢人不知鬼不觉,如果有人知道他干的什么,公开发表出来,或者说,把他所要干的老老实实地'暴露'出来,那他就会大发雷霆,跟着就会不择手段。把外国记者放上黑名单,时时刻刻以有形无形的手段在恐吓着中国记者们,叫他们'小心!

小心！'就是这种手段的举例。

记者是应该'小心'的。但他们的'小心'，不应用来服侍专制主义者，而应用来服务于人民，当人民的勤务员。人民，是记者们最尊贵的主人。如果为这样的尊贵的主人服务，当然应该自觉的'小心'。这种'小心'，不是不许发表真实消息，恰恰相反，是要竭尽一切可能，使消息能够十分真实，使言论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思。"①

第二篇是一篇谈话稿，题目为《在〈晋绥日报〉编辑部的谈话》，时间是1948年3月30日，在这次谈话中，陆定一讲到正确的思想方法，是保证新闻报道正确和真实的前提，他说，"我们办报的多是知识分子，思想上常有一种绝对观念，对复杂问题单纯化，公式化，往往被单个现象所迷惑，常是看到一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便否定全体、否定历史，甚至对马列主义一些基本原则在认识上也发生动摇。为了克服这个错误，就要头脑冷静，具体分析问题，多方研究情况，而不要顺流而下，人云亦云。"②

解放以后，他仍然处处提醒新闻工作者要注意真实报道。1982年他对《新闻战线》记者谈话，就讲到真实性的重要。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闻工作是很有成绩的。'四人帮'造的谣言没有了，夸夸其谈的所谓'大批判组'的文章没有了，面貌为之一新。主要的缺点，是有些新闻发出去，人家不大相信。这样的新闻，哪怕只有一件，就是大事情，就应该把它看得很重很重。我听到过一次批评：大连有个模范人物，还没结婚，新闻里面却讲人家家庭这么样那么样，人们有意见。本来是一件很好的新闻，就因为里面写了些不实事求是的东西，人家就不相信了。所以，写新闻一定要实事求是，就是要真实。有些东西不便公开讲的，当然不要讲，不该讲的话就不要讲。凡是要讲的，就要讲得完全真实。这样子，报纸就有威信，党也就有威信。我们过去在延安办《解放日报》，就是这一条：要真实。文字上好一点差一点，比较不要紧。真实了，人家就相信。不单我们解放区的人相信，连国民党统治区的人也相信。"

"你们要多听，多听些意见，多检讨检讨自己。要讲清楚这个道理：

① 陆定一：《人民的报纸》，《陆定一新闻文选》，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71～73页。

② 陆定一：《在〈晋绥日报〉编辑部的谈话》，《陆定一新闻文选》，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67～70页。

新闻工作搞来搞去还是个真实问题。新闻学千头万绪，根本性的还是这个问题。有了这一条，就有信用了。有信用，报纸就有人看了。"①

1984年陆定一同《新闻业务》特约记者谈话，依然强调真实性的重要意义。他说，"一九四二年我在延安办报，有两条主要经验：一条就是新闻要真实，哪怕慢一点也要真。能够做到快当然是一件好事，但不能因为快就失实。要强调真，在这个基础上再去争取快、争取有一个好的写作技巧。抓住重点，一语道破，需要写详细的再写下去。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失实，不能说空话，说假话。第二条是要依靠党的领导。当然要区别真假共产党。林彪、'四人帮'就是假共产党，那时是反革命篡去了党的很大的权力。什么叫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不是照抄文件，而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敢提实际办法，敢讲真话，这才是真正的一致。"②

同一年，他同人民日报记者纪希晨谈话，再次就真实性问题发表看法。他说，"现在有的记者又发热了，可得警惕呵！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是反映了客观经济规律的。记者在反映党的政策执行情况时，一定要实事求是，要真实。

新闻真实性，是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根本原则。违反真实性，新闻就失去生命，写不真实新闻的记者，随之也会失去'生命'。党和人民怎会相信说假话、写假新闻的记者呢？真实是记者必须遵守的起码的职业道德。

记者的职责，是老老实实反映实际事物。应该教育记者，做老老实实的人，做具有科学态度的人，肯下功夫进行调查研究的人。记者写的新闻，应该使人相信。搞虚夸的人应该受到批评，是失职行为。不批评这些，怎能维护记者的尊严呢？

记者是党的耳目，人民的喉舌，真理的卫士，是建设新生活的战士，是一种高尚的职业。新闻记者的岗位是，生活在群众中，战斗在第一线。他虽然不是党政领导人，但他应该具有政治家的胸怀、眼光和气魄，善于在复杂的社会现象中，辨明真假，判断是非。要做到这点，需要终生的努力。

---

① 陆定一：《新闻必须完全真实》，《陆定一新闻文选》，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80～82页。

② 陆定一：《宣传好整党是当前新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陆定一新闻文选》，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83～87页。

记者不要光把自己看作记者，而要把自己看作政治家。记者虽然不是决策者，但会影响决策者。记者写的情况和新闻报道，可供决策者参考。

记者一定要学会思考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都曾经走过不同的曲折道路。我们的农业生产，近几年为什么能迅速闯出新路子，出现新局面，原因就在于摆脱了'左'的束缚，听了农民的话，能够按照实际情况办事，按客观规律办事。

实际这个东西，硬的很呐！谁违背它，谁就要碰壁。王明'左'倾路线时期，教条主义者讲得头头是道，照搬书本，就是不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左'倾错误之所以根深蒂固，原因就是违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情况总是不断变化的。一定要使我们的思想符合实际。无论对什么事，都要开动脑筋，想一想，进行独立思考。要想一想是否符合马列主义，想一想是否合乎实际情况。只要开动脑筋，就不会顺流而下，人云亦云。看风转舵，看眼色办事，不是共产党人的品格。"①

对于陆定一的这些论述，我们应该视为一个老革命家、新闻界老前辈给后人的不忘的教诲。

四、胡乔木的新闻思想

胡乔木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重要领导人之一，新闻理论家。1931年以后编辑过革命报刊，为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和新华社撰写过大量评论和新闻。1948年以后先后担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长、新闻总署署长、中宣部副部长等工作。胡乔木有影响的新闻学论文是《人人要学会写新闻》和《记者的工作方法》。

《人人要学会写新闻》1946年9月1日发表于延安《解放日报》，论述的新闻观点有：

1. 关于新闻的重要性。胡乔木提议，人人要学会写新闻，做革命工作而又能识字作文的人都应该学会写新闻。他说，"说起来写新闻的好处真是不少，写新闻第一要言之有物，有话即长，无话即短。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所以学会了写新闻，可以叫人避免说空话，避免说不确实的话，新闻是从群众中来的，要采访新闻，又需要深入群众，善于接近

---

① 陆定一：《新闻记者应是政治家》，《陆定一新闻文选》，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88～90页。

群众中的各种人物。新闻是一种新的、重要的事实，但是究竟什么是新的事实？什么是重要的事实？什么是群众所关切有兴趣的事实？宣传什么新闻，能达到什么目标、造成什么结果？这都得要一番观察、辨别、选择的工夫。所以练习写新闻也就是练习观察、练习调查研究、练习打开脑筋——思想。"他还说，"新闻是一种时代的科学，时代的艺术，它的发展前途正是辽阔无限。如果人人都学会这门科学同艺术，不但对于我们新闻工作有极大好处，而且对于我们的全部工作，甚至每个工作人员的工作品质，一定都有极大好处。"

2. 关于新闻的特点。胡乔木指出，新闻有迅速、准确、明了、经济四个特点。他说，"写新闻不光是练习观察，而且更要紧的是练习表现。新闻的表现既要迅速、又要准确，既要明了、又要经济，缺哪一项都不成，这个功夫合上两句俗话，叫做'看人挑担不吃力，是非经过不知难'。须知我们在农业国家的环境里，说话作文绝大多数正是既不迅速，又不准确；既不明了，又不经济，慢慢腾腾，了了草草，糊糊涂涂，啰啰嗦嗦，学写新闻正是对症下药。新闻的发表不光是论日子，而且要论钟点。在延安虽然不要计算火车、飞机的钟点，但是你总不能不计算邮局发信、通讯员送信、报馆发稿排版、广播电台送稿广播的钟点，耽搁一小时，往往就是耽搁二十四小时。所以在十分钟里写成一条新闻，所谓'倚马可待'，我们确是要练成这副本领。但是快了可不允许马虎，我们有许多新闻就是写得马虎，不是把时间、地点、姓名、数目、名词这些方面闹错了，就是说得太笼统，叫人摸不着头脑。至于初学写新闻的人，更可以保险在开始写的十条新闻里就有九条犯不准确的毛病。这个毛病虽然很有害，可并不难救治，多叫医生诊断几日就会痊愈的。新闻的明了却比准确难得多，因为人们总是认为自己明了的事情人家也明了，这就使自己总是说话不明了。不说新闻的读者和作者多半相隔几千里、几万里甚至几十万里，哪怕只隔几十、几百里，他就和你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他读你写的新闻时，既不会随时翻字典、看地图、查各种参考书，也不会把你过去的作品和其他有关的新闻都找在一起来对读。你可能给他的各种麻烦，全靠你写作时像情人一般的细心体贴，防患未然，礼多人不怪，你把你的读者每一次都当作对你的知识一无所知，准没有错。因此，你得在你的新闻里，每一次供给他详细的注释，纵断面和横剖面的背景、色、香、声、味，呼之欲出，人证物证一应俱全。这样，你的新闻就叫做

'立体化'了，就叫做让人明了了。但是问题又来了，五脏俱全，但是麻雀仍须很小。你的全部作品最好就在一百字上下，再多也就是几百字，如果过了一千，这就成了长篇小说，有些面目可憎了。这可是我们学写新闻所遇到的最大难关呀！想想看，按我们的习惯，一开会就是半天，一动笔至少三千，这才该服多少剂泻药呀！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你只能在两样里选择一样，或是写得长而没人看，或者压缩压缩再压缩而人人愿意看。如果我们养成说话、演讲、作文都力求经济的习惯，那我们一天可以多做多少事！就这样，经过学写新闻的路子，你就能够找到一种迅速、准确、明了和经济的表现方法。"

3. 关于新闻的倾向性。胡乔木指出，新闻是通过"无形的意见"来表达自己的倾向和立场的。他说："学写新闻还叫我们会用叙述事实来发表意见。我们往常都会发表有形的意见，新闻却是一种无形的意见。从文字上看去，说话的人，只要客观地、忠实地、朴素地叙述他所见所闻的事实。但是因为每个叙述总是根据着一定的观点，接受事实的读者也就会接受叙述中的观点，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们从来不说我以为如何如何，我以为应该如何如何，他们是用他们的描写方法、排列方法、甚至特殊的（表面上却不一定是激烈的）章法、句法和字法来作战的。他们的狡猾，就是当他们偏袒一方面，攻击另一方面的时候，他们的面貌却是又'公正'又'冷静'。我们不要装假，因为我们所要宣传的只是真实的事实，但是既然如此，我们就更加没有在叙述中画蛇添足的必要了。"①

《记者的工作方法》，是1948年他为华北记者团作演讲准备的文稿。主要讲同记者工作相关的理论问题，大致是：

1. 关于记者产生的社会原因。他说，"为什么要有记者？人生活在社会上，为什么会发生记者这一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种职务或职业？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其根本问题是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消灭以后，还有生产问题，所以社会问题根本上还是生产问题。生产斗争以及围绕生产所进行的斗争，产生了种种经验，对于这些经验，有加以宣传之必要，于是，有些人自告奋勇，或被指定介绍这些经验，使世人周知，特别希望与他利益相同的人，根据这些经验办事，这就是记者产生的根

① 胡乔木：《人人要学会写新闻》，《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24～227页。

本基础。”

2. 关于新闻的分类。胡乔木指出,“围绕生产所进行的斗争,产生了许多经验,这就是政治经验,生产斗争的经验,则是经济的经验。因此,我们的新闻就有两种,就是政治新闻与经济新闻,有没有别的新闻呢?有的,但它是附属于前两者的。对于这一点,有的人敢于公开承认,有的人却不敢公开承认。但是,不管它是不是敢于公开承认,实际上新闻是只有政治和经济的两种,或者是附属于这两种的。我们的报纸是明白的承认这一点的,我们这个新闻就是为了生产斗争以及围绕生产所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有的报纸登了连篇的社会新闻,说那些新闻是超政治的、超经济的。资产阶级新闻学喜欢这样说,但这正是把它的政治经济目的隐藏在背后罢了。”

3. 关于两种宣传观的区别。胡乔木指出,“为了传播经验,不能不负很大的责任。因为别人在进行生产,你脱离生产,专负传播经验的责任。因此,应该采取负责的精神。既然你的任务是传播经验,那么你就想一想,你传播了经验没有?无论传播的是生产经验,或是阶级斗争的经验,对群众是不是有好处呢?既然你的任务是传播经验,那么对于人们的生活中的规律,人们所认识的真理,就应该采取严肃的态度。什么叫做严肃?就是坚持性。比方说:现在这个桌子上放的是碗,即使一万人否认它,你还要坚持说这是碗,要有勇气和别人斗争。既然如此,新闻工作既然对群众担负了传播经验的责任,群众既然把传播经验的职务交给了我们,让我们把群众的经验总结起来,加以传播,那么在这里,对于宣传这一概念,我们就必须和统治阶级严格区别开来。统治阶级把宣传看成吹嘘、扯谎,或者说:‘别人给我来了个反宣传’,这就是说:别人打击了它。社会上有阶级斗争,对宣传应有这么多荒谬看法。这些看法和记者的工作是分不开的,人们把这些看法和记者工作连在一起了。有些戏剧家,专门以记者为题,描写记者这些手段,翻云覆雨,合纵连横,拉拉扯扯,打击别人提高自己……我们是不能这样做的,我们一定要采取严肃态度。”

4. 关于给记者以主动权。胡乔木认为,上级领导既要给记者规定任务,又要顾及到记者的主动性。他说,“有些同志提出了不适当的任务,限制了记者的活动,限制了记者的工作质量,使他难于坚持真理。有些同志是不管记者碰到什么东西,而只问他要什么东西。比方说,在反右倾的时候,就专门让记者去找右倾的材料,等到反左

了，又让记者去找左倾的材料了。这样一来，记者就不能按照客观本来的样子进行报道。比方说：任务是找右倾的材料，而记者在实际中所见到的并不是这类东西，或者不完全是这类东西，但为完成收集右倾材料的任务，他所见到的材料，不仅不能发表，而且也不能写出来。现在应该把记者的手足耳目解放开，让他按照实际事物去报道，按照实际去追求真理。所谓唯物论，就是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我们要求记者，也应该是这样子的。""上级给予任务时，应该是这样说：我们正在实行一个什么东西，你们看看各地是怎样执行的，有什么问题，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还是执行的问题。记者考察的结果，如果所见到的是执行中间的问题，那么上级就可告诉下级要好好执行，否则，群众要受到损失的；如果是政策本身的问题，那么上级就可以向下级说明，政策适应情况还不够，可以变通。这样，记者就帮助了领导。"

5. 关于新闻报道的全面性。胡乔木说，"所谓全面，是当作方法来说的，而不是当作一个具体的东西来说的。叫你对石家庄作全面报道，并不是叫你写石家庄大全。我们所说的全面，是对片面而言的。为什么会发生片面的问题呢？因为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矛盾的，有发展的衰亡的，有正确的错误的，有优点缺点，有有利条件与困难条件……因此，报道上应该把握矛盾的两个方面，这就是全面，如果只看见一面，就是片面，今天我们所反对的，就是这种东西。""所谓全面，就是两面，没有第三面，一是分裂为二，如偶尔分为三，本质上还是二。全面者，两面也。要看到过去，也要看到将来；看到有利条件，也看到困难条件。但是两面并不等于两面相等，不是折衷，因此，要看到主要的一面，要看到在那一时期那一问题上，主要的一面是什么？如果主要的是成绩，我们主要的就讲有利的一面。就中国形势来说，有利条件是主要的；但是当我们来研究工作困难的时候，就可以把困难放在主要地位，因为我们这是专门为了解决困难的。"

6. 关于记者的"独立见解"。胡乔木说，"记者应不应该有独立见解？应该的，每个革命者都可以有他的独立见解，不是说共产党员就不能有独立见解？不是的，问题在于你的见解要正确，不是为独立而独立。其次，独立见解还要一致行动。各人都有独立见解，又都以为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谁也不会说：'我坚持我这个错误的独立见解！'这怎么办？行动能不一致吗？不能，行动还要一致。所以独立见解的发表，

都须受上述两个原则的管理。"[1]

五、刘少奇之《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

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过不少革命报刊并为之撰稿。他曾对新闻工作发表过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论文与指示，新中国成立之前，具有广泛影响的，是1948年10月2日发表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刘少奇在这篇讲话中，提出了这样一些重要的新闻观点：

1. 从两面认识报纸工作的意义。刘少奇提出，要用两点论的观点认识报纸工作的意义。他说，"报纸办得好，就能引导人民向好的方面走，引导人民前进，引导人民团结，引导人民走向真理。如果办得不好，就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会散布落后的错误的东西，而且会导致人民分裂，导致他们互相磨擦。因此，新闻工作的影响是很大的。你们的工作做得好，就很好；做得不好，就要受历史的处罚。""报纸要能够密切联系群众，那是很好的；但是，如果给群众以错误的东西，散布坏影响，散布错误的思想、错误的理论、错误的政策，把群众中的消极因素、落后因素、破坏因素鼓动起来，就要犯大的错误。因此，报纸工作如果做不好，就是最厉害的脱离群众，就会发生很危险的情况。办报是联系群众很重要的工作，你们就是做这个工作的。""党依靠你们的工作，指导群众，向群众学习。因此，你们做得好，对党对人民的帮助就大；做不好，帮助就不大；如做错，来个'客里空'，故意夸大，反映得不真实，就害死人了。因此，这是个很严肃的工作，一定要认真负责地从事你们的事业，要对党对人民有很大的责任心。"

2. 报纸的作用在于联系党和人民群众。刘少奇指出，"列宁说，党要通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而你们的工作、你们的事业，就是千百条线索中的一条。报纸每天和群众见面，每天把党的政策告诉群众。军队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人民代表会、合作社等也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没有这些桥梁，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断了，党和人民之间就有了鸿沟，因此必须有这些桥梁。千座桥，万条线，主要的一个就是报纸。""我们的报纸现在有几十种，将来会有几百种，如果能比较真实、全面、深刻地把群众的情绪、要求、意见反映出来，那不知会起多大的

---

[1] 胡乔木：《记者的工作方法》，《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71～284页。

作用。”

3. 记者要全面反映群众的情况。刘少奇指出，要当好记者，必须“要有正确的态度。你们是人民的通讯员，是人民的记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们要了解人民群众中的各种动态、趋向和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反映。人民包括各阶层，要加以区别。要善于分析具体情况，看各阶层人民有什么困难、要求和情绪。要采取忠实的态度，把人民的要求、困难、呼声、趋势、动态，真实地、全面地、精彩地反映出来。‘精’，就不是拉杂，‘彩’，就是漂亮，挂点‘彩’，读起来爱读。你写得不‘精’，人家看不了那么多，你写得不‘彩’，人家不愿意看。所以要拣重要的写，重要的就是‘精’的。要做到真实，就要全面，缺一面就不是真理。”

“你们的报道一定要真实，不要加油加醋，不要戴有色眼镜。群众对我们，是反对就是反对，是欢迎就是欢迎，是误解就是误解，不要害怕真实地反映这些东西。唯物论者是有勇气的，绝不要添加什么，绝不要带着成见下乡。党的政策到底对不对，允许你们去考察。如果发现党的政策错了，允许你们提出，你们有这个权利。如果你们看到党的政策大体上是对的，但是还有缺点，也要提出来。这是不是不相信党的政策呢？不是的。党的政策是否正确要在群众实践中考验。你们要把党的政策执行结果如实告诉我们，中央时刻在准备考验自己的政策。中央是这个样子，各级党委也应该是这样子。如果政策有错误，就修正它，如果它是不完全的，就把它补充得完全起来。马列主义的领导，应该如此。因之，鼓励你们去考察，依照你们的材料、看法提出问题来，如果政策正确，就说正确，如果政策错了，就说错了。你们不仅可以这样做，而且你们的任务就是如此——在群众中考察党的政策执行得怎样。你们不要怕反映黑暗的东西，当然，有的是不宜发表的。你们要从各方面去考察，用各方面的材料证明自己的判断。第一是真实，不要过分，再就是全面、深刻。

说到全面、深刻，应该说，不深刻不会全面，提不到理论高度，是不会全面的，那只能是零碎的、现象的、无系统的。全面，就要综合，要总结，要提到政策、理论的高度。提不到理论高度，就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理论的东西就是要‘透’，不是光说明现象、皮毛，而且能说明内部的联系。

要全面，就不要笼统地讲，得分析。一个政策在执行时，要看各阶级、各阶层有什么意见，各种人有什么意见，看这个政策什么人拥护，什

么人反对、什么人怀疑。如果该拥护的却反对起来了，就要看是政策的问题，还是执行的问题。你们的责任，就是要从各方面把事情搞清楚之后，再下判断。考察不清楚，就没完成任务，你的通讯人家就不会相信，因为没有材料，没有分析。问题不在于人家是不是相信，而在于你是不是把事情搞得清楚。你们应敢于说：'相信我的通讯吧，不会有危险的。'你们要负起这个责任。""如果能够真实、全面、深刻地把群众情绪反映出来，作用就很大。人民的呼声，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你们说出来了。如果能够经常作这样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的记者就真正上路了。""你们的笔，是人民的笔，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你们不能采取轻率的、哗众取宠的、'客里空'式的态度，而应当采取负责的、谨慎的、严肃的态度去做工作。"

4. 记者要努力加强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刘少奇指出，记者"要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要做马克思主义记者，却不大懂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就在这里。你们不提高理论修养，工作是做不好的。""你们缺乏经验，特别是缺乏马列主义理论，看问题不是马列主义观点，而是别的观点，比方小资产阶级观点等，这样，写东西的盲目性就很大。因此，要提高理论水平，要熟悉马列主义，特别要学习唯物史观、认识论，学习阶级分析的方法。你们学习这些，不是看一遍书就行，而是要不断地学，直到能够运用，有能力看出别人用得对不对。那时，写东西就自由了。不熟悉马列主义，就不自由，你们现在还没有获得这种自由。共产党记者最可宝贵的知识，是理论知识，在这方面，你们特别缺少。所以，要继续学习，不只要二个星期，要三个月、三年、三十年，努力把马列主义学好。"

5. 记者要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刘少奇指出，记者"要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为了及时地正确地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就要经常学习、研究，时刻注意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自己不懂的问题，应当勤问，可以写信问你的上级。不懂得党的路线，是搞不好工作的。你们还要懂得两条战线的斗争，善于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办报。坚定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既批评左的倾向，又批评右的倾向。这是基本的方法，马列主义的方法。不否定左和右的谬误，就没法肯定真理，要确定真理，就得否定谬误。

你们不仅要宣传党的政策，还要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察政策是不是正确，有没有缺点，这里就表现出你们的创造性了。你能了解群众的

真正情绪，他就不能；你能有力地宣传党的政策，他就不能；你写得真实、精彩，他就不能；你能发现党的政策的缺点，他就不能。你的创造性就表现在这里，党不是限制而是鼓励这种创造性。"①

六、萨空了之《科学的新闻学概论》

萨空了是中国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新闻教育家、新闻理论家和新闻工作领导者。他长期从事报刊工作和新闻学教育，代表性的新闻学著述是1945年3月出版、1946年6月再版的《科学的新闻学概论》。

《科学的新闻学概论》共18章，各章标题分别为：什么是新闻学，新闻学研究些什么，新闻报道的发展过程，报纸言论的发展过程，怎样使报纸有益人类，中国新闻事业展望，今日中国报纸的新闻来源，什么是"新闻"和"记者"的任务，新闻的采访，怎样写报纸文字，新闻的编辑，今日中国报纸中的言论，改进中国报纸言论的计划，管理报纸的原则，编辑部的组织，经理部的组织与工作，印刷厂的组织与管理，总管理处的组织和工作。

萨空了的这本书，是在国民党的牢房里写就的，身边无什么参考资料，全凭他对新闻学研究的心得与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因此，深刻的哲理性与广泛的实用性，是这本书的特点。加之他长期在新闻院校执教，逻辑的严密性和史料学理结合的成熟，成为此书的又一特点。

从理论新闻学角度考察，这本书重点阐发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新闻学是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萨空了指出，"新闻学，可说是一种新兴的社会科学，尽管现在还很幼稚，但相信将来一定会有极广邃的发展。这由它在世界上出现极晚，而立即在各国的大学中迅速的占有一席地位——新闻学系纷纷成立——来看，即可证明。""新闻学的产生，和其他的社会科学一样，是适应着人类的生存需要而产生。因为人类社会中先有了凭种种工具(如报纸杂志)相互报道消息并提供意见这一事实，大家又感觉到这种事实对人类生存的影响广大而深邃这一现象；遂不能不拿它当作对象，而加以研究，希望能够发现它的运动法则，或因果规律，以期正确的把握它，运用它，减灭它可能加诸人类的不幸，发扬它有益于人类的使命。"②

---

① 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刘少奇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6～407页。

② 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香港文化供应社1946年版，第2页。

新闻学研究什么？萨空了提出两点：

第一，"我们研究新闻学，是要研究'人类社会中，以种种工具相互报道消息提供意见这一事实，在人类社会中造成巨大影响这一现象的因果法则'，因为现社会的相互报道消息提供意见的主要工具是报纸，我们遂决定以报纸为主要对象来从事研究。研究的方法是看报纸在怎样的社会环境下产生，又怎样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发展到今日，成果如何。基于由这些已知的材料中，寻求出来它的发展和对人类的影响的运动法则，而决定今后我们应当如何正确的把握它，帮助它再发展，使它在人类社会中发生更宏大，且绝对有益的作用。"

第二，"为了达成前一目的，即正确把握报纸，帮助它再发展，使它在人类社会中发生更宏大，且绝对有益的作用。我们遂不只需要作如上所述的理论上的研究，我们同时还要研究那使报纸可以发生偌大作用的制作与管理技术。"①

（二）新闻报道的演变和发展过程。萨空了说，有许多写新闻史的人，说人类生来就富有好奇心，所以自有史以前他们随时随地都喜欢交换新闻。他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人类最初注意新闻，决非出源于人类有好奇心，像现代人类之关心桃色新闻那种情形。实在是由于生存的要求。就是到今日也仍是和他们的生存关系最密切的新闻，最为人类所首先注意，而且被注意的最普遍。对桃色新闻不感兴味的人，在社会上很多。但是粮价陡涨的消息，却没有一个人不注意，不但传播的普遍而且非常迅速。所以世界上新闻报道最为人类所注意的，第一是经济性新闻，注意的人也最多；其次才是政治性的新闻，注意的人已比较少些了。"②

萨空了指出，报纸的发展，正是完全顺应着人类这种要求而展开的。他指出了新闻报道演变与发展的"四种发展"和"三度扩张"。

"四种发展"指的是新闻报道者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萨空了分析说："新闻报道的最初期，大致是采用'有闻必录'这一原则的，听到什么就把什么写出来，写新闻的人处于被动的地位。不参加主观的意见，对新闻的选择只注意其性质与商业有关的、战争的、政治的需要报道，此外的不要。与商业有关，或是战争的政治的新闻是否可信，完全不管。

① 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香港文化供应社1946年版，第11页。

② 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香港文化供应社1946年版，第14－15页。

新闻如不可信，那新闻对于商业，就失掉了参考价值，甚至根据错误的新闻作了错误的判断，还会不利于商业，于是新闻报道，需要正确的要求最先产生。这是新闻报道的第一种发展。”

“在报道新闻时，那新闻是否正确有时不能立即判断，对于一件事，可能有三四个分歧不同的消息，同时传来，报道者为了尊重这件事在发展中的实际情形，自应将各种传说一一列举，但为了供阅读者易作判断起见，报道者有时必须提供一些他个人对那种种分歧报道的看法，（因为他接近事件发生的环境，如果他只报告不加判断，远离当地的人自更无从判断。）例如列明种种分歧消息的来源，而以过去经验，判断某一来源比较可靠。这种提供看法，可说是新闻报道的第二种发展。”

“以后报道新闻的人，渐渐认识了，那新闻报道影响社会民众之大，在作报道之前，便先想到这报道可能发生的影响，而在报道的手法上设法，使不利的影响减少，有利的影响增强，例如明明是军事失利，被逼后撤，而报道时却说‘任务已达，转移阵地’。这就是新闻报道的第三种发展。”

“认识了新闻报道的影响之大，主观的想灌注一种认识，或激起一种反应，于是利用一桩新闻甚至制造一桩新闻，予以扩大的宣扬，以求达到一种目的：例如希特勒为求自己能够达到执政的目的，鉴于在国会中纳粹议席不是多数，难于如愿，于是遂想到如能将共产党议席排出国会之外，纳粹议席即成多数。于是由戈林导演，制造出来一个举世知名的‘国会纵火案’，然后诬称共产党主使党徒火烧国会，广为宣传，而将共产党议员全体逮捕，造成纳粹党议席，在国会中的多数。——这可说是新闻报道的第四种发展。”

新闻报道除了在主观上由被动向主动发展之外，还有一种发展，就是客观上依人类的要求，它的报道范围，日趋广阔。

“最初新闻报道是基于人类要求知道与生活有关的经济新闻，因为政治对经济的影响一天天的增强，于是凡足以影响人类经济生活的新闻，如战争、政治变动，全为人类所注意了。这是第一度扩张。”

“又进而知道不只政治足以影响人类的经济生活，一般社会环境的每一不大的变易也会影响到人类的经济生活，于是新闻报道也开展到了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的晚被注意，是因为过去的社会太狭小，一个村落中有什么新闻，当日全村都可以知晓，自然用不着什么报道。他村距离虽远，但是没有经济往来，也就无须关心。一个现代的大城市，没有

报道，同住在一市的人就会因为市区辽阔的关系，连霍乱传染的极凶猛都不知晓，更以交通密接，经济关系密切，他市的新闻也会影响到这一市人民的生活，于是社会新闻之要求以生，这是第二度的扩张。"

"基于人类生活之进步，也是基于人类物质生活为了生产的进步而臻于富裕，精神生活要求因以产生，文学艺术竞技等都发达起来，报纸是人类生活的反映，于是这种种也成了新闻报道的主题。于是在报纸中，这类主题向好一方发展而形成的结果如学术副刊艺术批评专栏的建立等，向坏的一方发展像黄色新闻的侵入报纸，像无聊的报屁股版，娱乐版的辟设等。这是报纸范围的第三度扩张。"

"总观上述，新闻报道的发展过程，主观上，由被动到主动；客观上，范围由狭隘到广阔。无一不是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渐变而成。社会不断的发展，新闻报道也将不断的随着演变。"这是萨空了为我们揭示的新闻报道的演变规律。[1]

（三）报纸言论产生与发展的规律。萨空了指出，在新闻报道发生第二种发展时，"新闻报道者为事实所迫必须提供意见，这大约就是报纸中言论之滥觞了。"这是因为，"本来人类在知道一种新闻之后，大都会依据其生活经验而有些意见的。……而有意见产生，也是在求生存中不能少的条件。"所以，"报纸在新闻报道之外，有提供意见的言论出现，自然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对于报纸言论的发展，萨空了作了这样的分析："报纸中的言论，最初是夹杂在新闻报道中，或给新闻报道添一条尾巴，但在这形式下自然不能畅所欲言。于是言论在报纸中自然遂以独立姿态而出现。这是言论在报纸中的第一次展开。"

接着有社论的出现。萨空了分析说，"有知识有经验的人，在世界上发生了一件新的事变之际，陈述依据他个人经验知识而断定那事变的影响与结果，对于一些知识经验不够，而对着这新的事变，而惶惶然的人，自然极有兴味。因为这些人可能知道这一新的事变对他们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影响，可又不能预料是怎样的影响，有人能说出来一个轮廓，他们怎样不感到兴趣盎然？——报纸中每日必有社论，就是适应着这些人的要求而产生。"

"这些人的这类要求不只使报纸中产生了社论，另一种形式的刊

---

[1] 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香港文化供应社 1946 年版，第 17～20 页。

物——杂志,也顺应着这要求而产生。每周,每半月,每月,或每季,甚至每年,印行一种刊物,纯为言论,(这言论当然须与人类的求生存有着关连)供给人类,作为求生存挣扎中的参考。办的好,于是也会有很大很大的销路。——这可说是言论在报纸外展开的一股旁流。"

"这种杂志中的言论,尤其是研究政治经济的,现在因为世界政治经济的改变太快,在周刊,月刊中发表,往往成为明日黄花,而读者为了了解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变易,也等不及看周刊,月刊。于是这一类言论,又适应大众的要求,转而侵入报纸,这就是现在一般报纸中的专栏论文了。……这可说是言论在报纸中的又一度展开。"

至于报纸上的学术副刊,艺术批评专栏,也可看作言论的一方面。上面的言论性文章,是报纸言论的又一展开。但是,报纸上的这类文章多了,加上世界政治舞台上要人的言论多了,就会出现"报纸杂志化"。萨空了指出:"考报纸杂志化,原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报纸的一种新的趋势,这新的趋势并不是坏的趋势,为了人类生活的日趋复繁,人类为应付生活而需要的知识,也一天比一天来的广阔,一些与人生关系密切的论文,(如一般性的政治经济艺术论文)在报纸上取得经常的地位,使人人都有因这日常必读的报纸而得接触它们的机会,当然很好。不过如果报纸中再没有了算得上新闻的新闻,再没有了关于政治的辩论讨论,再没有了一点点老百姓喉舌的意味,只充满了一些毫不相干,可有可无的甚至是迎合低级趣味的论文时,——这种所谓杂志化,就不是顺应着人类生活要求面产生的杂志化,而是一种畸形的杂志化了!"

萨空了对于报纸言论的发展作了这样的总结:"由附属于新闻报道而独立,由独立而分成社论与杂志性论文,更以好的或坏的特殊的环境要求,而在报纸中取得极重要的地位,在未来的报纸中,显然已至少可以与新闻报道分庭抗礼,成为同等重要的两大内容。这些发展也无一不是追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展开,将来也自然不会随着社会的进展面演变。"①

(四)报纸有益人类的标志。萨空了指出,"在有史以前的社会中,大家都有相互报道消息提供意见的要求,也就都有权向他人报道消息提供意见,他人也都会留心倾听他报道的消息和提供的意见。"可是,现在不同了,"在今天的社会中,这情形完全不同了。大家在要求上,关于

① 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香港文化供应社1946年版,第20～27页。

报道消息和提供意见虽然是'双方'的,可是在实际上却已成为'单方'的,社会上,大多数的人类,已失掉了向他人报道消息提供意见的权利,而只剩下了倾听他人所报道的消息所提供的意见的义务。"

萨空了认为,从"双方"变成"单方",是现代报纸所有种种不良倾向的主因。他指出,从一个方面看,这种结果是社会进步造成的。从另一方面看,报道消息提供意见的工具被某些人独占了,使原本同样可以报道消息提供意见的人,变成了纯接受者,也使报纸的新闻与言论出现不良倾向。因此,如何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使"单方"又恢复到过去的"双方",是今后报纸努力的目标,也是报纸有益于人类的标志。①

(五)新闻与宣传。萨空了指出,我们对"什么是新闻"的解答是:"凡世界上新发生的新发现的与人类生存有关的事实与现象,都是新闻。"而什么是宣传呢?"宣传的意义,照著者的理解,应当是把一桩不为一般人所了解的事实或一种现象向一般人详细说明。……所以宣传本是一件以先知,知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工作,并不是坏的事情。"

萨空了还指出,判断一条新闻的价值时,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这新闻是不是与人类的生存,直接或间接有关。那关系对于某些人类愈是直接愈是密切,对于他们也就是最重要的新闻,如果直接密切之外,还有'有益'这一条件,那就是重要而好的新闻了。"第二,"新闻的价值除了凭上述的条件决定而外,还有两点不可缺少的要素:(甲)是新,(乙)是真。有了第一条的条件而不'新',当然不算新闻。有了第一条的条件,也新,而不真,也就没有了新闻的价值。"

萨空了说,"说到这里,我们已可以作一个结论了。那就是:新闻是'世界上新的、真的,有关人类生存的事实与现象。'而新闻记者的任务,则是把有益于人类的'新闻',向大众宣传,并指明那含有毒素的新闻的宣传,使大家在这宣传下组织起来,向不利于人类的含有毒素的恶宣传,作无情的战斗!"②

(六)新闻记者的条件。萨空了认为新闻记者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第一是具备知识。"外勤记者须具备科学的基础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更为重要。新闻记者应当是引导人类前进的先锋,他自己一定要站在时代的最前哨,并对更远的前线有极清晰的认识。"第二,"须具

---

① 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香港文化供应社1946年版,第28~30页。

② 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香港文化供应社1946年版,第52~57页。

备犀利的深刻的观察能力、判断能力。”第三，“勤奋不怠的工作精神健壮的体格”。有了这三个条件，才能当记者，当了记者之后，还要切记两点，一是“不要处处都以记者的资格出现，而应处处都是普通民众，这样才易于获得有价值的新闻。”二是“采访新闻应当争取主动”。①

（七）管理报业的原则。萨空了指出，“报纸和普通的商品虽然不同，但它今日仍然是商品，制造是为了销售，在这原则未变前，管理一个报社和管理一个商品制造工厂，应当毫无不同。”以报社作为一个企业看待，它的管理原则应该是：“1. 权力集中，2. 厉行法治，3. 由细密分工而归于机动合作”。

萨空了强调指出，“办报在经营管理方式上尽可企业化，但是这企业到底与一般纯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不同。对民众讲，它是他们的精神食粮，对社会讲，它是军队而外的最有力的武器。想经营这企业的人，决不单纯是为了营利，……虽然可能利润很厚，而附有教育民众、监督社会的目的，甚至这是主要的目的，根本是否牟利并不介意。”②

以上便是《科学的新闻学概论》的主要内容。从内容分析可以看出，这是一本体现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观点，富有学术生命力的科学著作。在40年代众多的新闻学著述之林中，它占有重要的地位。

七、恽逸群之《新闻学讲话》

恽逸群是我国著名记者、报人和新闻教育家。1946年2月，他为华中新闻专科学校讲课，学员将其授课内容整理以后发表于新华日报华中版，1947年7月由冀中新华书店出版单行本，1948年7月又由山东新华书店出版增订本。此书还有华中版、胶东版等版本。讲课时名为《新闻学概论》，出版时书名为《新闻学讲话》。

全书共六讲，分别为：什么是新闻，新闻怎样取得，怎样写作和传递新闻，怎样处理新闻，新闻纸怎样指导社会，新闻机关的组织及其他。全书的内容，从理论新闻学角度看，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构成新闻的要素和衡量新闻价值的标准。恽逸群指出，“新闻科学是社会科学的一种，但同时是比较后起的，也是内容最贫弱的一种。新闻事业虽然日益发展，日益受人重视，但研究新闻学的著作者依然并不多，而我们中国更为贫乏。”

---

① 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香港文化供应社1946年版，第62～66页。

② 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香港文化供应社1946年版，第131～134页。

对于什么是新闻，他认为，“新奇不是构成新闻的惟一条件，有时刻意求‘奇’，就会脱离新闻事业的正轨，成为‘野狐禅’。”他指出，构成新闻的要素是下列四个：

第一，和大家有利害关系的，为大众所关心的或足以引起大众关心（或注意）的事物；

第二，新鲜的事物；

第三，用最迅速的方法及时传播；

第四，大量散播。

“具备了上列四个要素，才能称为新闻——完全的新闻，也就是‘报纸’。狭义一些讲，则构成报纸上的主要材料，也叫做新闻，必须具备上述一二两项条件。”①

恽逸群认为判断新闻价值大小的标准有下列9项：

1. 和大众利害关系的密切程度；
2. 受到这一事件影响的人数；
3. 关心这一事物的人数；
4. 时间的久暂；
5. 空间距离的远近；
6. 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
7. 阻碍社会进步，或造成社会倒退的作用；
8. 发展性；
9. 反常性。

他指出，“每一条新闻并不单纯包含一个因素，而各种性质常错综复杂的，时间、地点，对大众的利害关系，影响或关心他的人数多少，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常常都牵涉到的，判断一则新闻的重要与次要，必须综合各种因素然后下判断：如利害关系的程度相等，则以影响到的人数来判断；关切的程度与数量相等，以时间空间的远近来判断。但有时各种因素的轻重大小是不一致的，那就要看编辑人的经验与判断能力，不能规定出哪一项是最重要，哪一项是次要，必须看当时当地的情形，就事论事，加以处理了。不过，新闻的发展性及其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必须掌握的，如果看不到或忽略了某一事物的发展及其对社会进步的作用，那就是庸俗的新闻工作者，即使技巧再好再熟练些，也只是新闻匠

① 恽逸群：《新闻学讲话》，华中新华书店1948年版，第2～3页。

而已。”

真实性要不要列入衡量新闻价值的标准？恽逸群认为不必列入，也不应列入，这是因为，“新闻是必须真实的，如果不真实，那就不是新闻而是谣言。不真实的新闻，是没有价值的。这属于新闻价值的有无问题，而不是大小问题。”

要不要把“符合于党的政策”，列入新闻价值标准？恽逸群也认为不必。他说：“因为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除了为最大多数的人民获得利益，促使社会进步之外，我们的党就没有另外的政策。我们党的政策，就是为了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所以不必另外加上一个标准。”①

（二）新闻的政治性和新闻自由的阶级性。恽逸群指出，“新闻是和政治不可分离的，任何新闻机关，不论是报纸或通讯社，都有它的政治立场，它为什么一类人服务，说什么人的话，它所赞成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你所赞成的是代表什么人的利益，你所反对的又是代表什么人的利益），怎能说超出政治之外呢？”“新闻既与一定的政治立场及政治态度不能分开，其制作的全过程，从材料的搜集，写作，到编辑，出版，都是经过选择的，那就无所谓‘客观’‘不客观’，更无所谓‘纯客观’。”

谈到“新闻自由”，恽逸群说，“自由是不能离真理而独立存在的，符合真理的自由才是真自由，是人民大众所拥护的自由；违背真理的‘自由’则是伪自由，是人民大众所要反对，所要消灭的。……什么叫做真理呢？真理就是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的最长远的利益。革命与反动的分别就在掌握真理与违背真理，也就是一个是为了争取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最长远的利益而奋斗，一个是为了剥夺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致力。对于违背真理的，也就是以危害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其目的的‘新闻自由’，应该加以限制，也必须加以限制，否则就是助长了反动派的‘杀人自由’。”“如果极少数人的榨取、奴役、屠杀的自由有了保障，则大多数人的生存、发展的自由就必须被剥夺了，反之，为了保障大多数人的生存、发展的自由，就必须限制极少数人的榨取、奴役和屠杀的自由。”②

（三）保障新闻的真实性。讲到新闻处理时，恽逸群认为要注意两

① 恽逸群：《新闻学讲话》，华中新华书店1948年版，第1～6页。
② 恽逸群：《新闻学讲话》，华中新华书店1948年版，第6～8页。

点，一是看新闻的作用何在？对读者发生什么影响？二是新闻的真实性。他说，"新闻必须真实，那是天经地义。"怎样判断其真假呢？主要考虑三点：

"第一，考虑其可能性。一切社会现象，都不是凭空发生的，有了前因才有后果，无论什么变动，必先经过相当时期的酝酿。"

"第二，供给新闻者的背景及其与这个新闻稿内容的关系。"

"第三，是供给新闻者平素的信誉如何？可靠不可靠？"

恽逸群强调，对上述三点，要综合起来考虑与判断，如有可能，还要通过驻外地记者核实。新闻处理中，保障新闻真实十分重要。"对于自己也没有把握的事，最好不要马马虎虎地就采用刊载，因为我们的报上，每一个字都应向读者负责任的，你不能把自己也不相信的事，叫广大读者去相信它。"[①]

（四）新闻和新闻纸的指导作用。恽逸群认为，新闻纸和它上面的新闻，都具有指导社会的作用。他说，"新闻纸（报纸）的主要任务是指导社会的，它报道社会各方面（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从市井以至于全世界）的现实情况，反映各方面人士的生活与意见，批判与表扬，检查过去，预示将来，刺激人们的向上思想，使现有的社会成就更进一步、更提高一步。不论报纸的立场如何，它的基本目的是一样的，所差别的只是道路不同：进步的报纸要促使社会更进步，指导读者朝进步的方向努力；反动的报纸要使社会更反动，指导读者走反动的道路。就是低级趣味的无聊的报纸，表面上没有政治作用，实际上它所起的麻痹作用是大有助于反动派的，我们只要看香港澳门及沦陷时的平津等地流行色情小报之多，就可以看出帝国主义是何等宽纵与奖励这些刊物的发行了。"

恽逸群指出，报纸上的各种材料，新闻的指导作用最大。他说，"新闻纸的指导作用，一般只重视言论，以为言论的指导作用最大，因此其所占的分量（比重）也最重；这并不正确。新闻纸的任何一部分都有指导作用的，而新闻的指导作用为最大，最有效；言论（社论、短评、专论）虽有时占极重要地位，但一般说来是远落在新闻之后，有些与副刊的作用相等，有些则甚至不及副刊的引人注意。读者中有专看新闻而不看言论与副刊的，但专看言论或副刊而不看新闻的人则极少极少。因为

---

① 恽逸群：《新闻学讲话》，华中新华书店1948年版，第23～25页。

新闻是报道事实，言论与副刊文字则发表主观的意见；大多数读者对于事实报道是信心较多，对于别人的意见则不免有些将信将疑。所以新闻的指导作用最大，而言论与副刊次之。"[①]

恽逸群分析新闻的指导作用表现为：鼓励作用，刺激与推动作用，批评与警惕作用，教育作用，组织作用。他在强调今后要努力运用新闻的这些指导作用时，批评了一些机关和一些报社不重视新闻而过于依赖言论的指导作用，还对改进言论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以上便是《新闻学讲话》论及新闻理论的主要内容。前已提及，此《讲话》是恽逸群1946年2月在华中新闻专科学校讲课的讲稿，以后又多次公开出版，分别有冀中版、华中版、胶东版，可见各地对该书的迫切与广泛的需要，也说明这本书作为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专著，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建设中的地位。我们在第五章第二节中介绍过的储玉坤的著述《现代新闻学概论》，是1949年前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惟一的部定大学用书，在旧中国是一部较有影响的大学新闻学理论教材。从研究和阐发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完成对新闻学子传授新闻精神和新闻科学的使命看，《新闻学讲话》和《现代新闻学概论》都已达到了相当的学科水平，它们共同为20世纪中国理论新闻学研究的前50年，划上了一个尚可珍视的句号。

---

① 恽逸群：《新闻学讲话》，华中新华书店1948年版，第40～43页。

下　编

第七章

新闻传播的新时代新政策新观念

全国解放前夕的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指出：

> 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
>
> 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
>
>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①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纲领》第49条指出：

> 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禁止利用新闻以进行诽谤，破坏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煽动世界战争。发展人民广播事业。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意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

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开启了，一系列崭新的新闻政策运行了，一种新的新闻传播理念开始成为全国性的新闻传播指导思想。

---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6～1427页。

第一节　新的时代　新的政策

一、新中国第一批新闻政策

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一大批城市回到人民怀抱。处置旧政权下这些城市中运行的新闻传播媒介,亟待出台一批新的新闻政策。

194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决定指出,"我军现已解放许多大中城市,以后还要解放许多大中城市,这些城市中存在着大量的对城市人民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其中并有少数对国际宣传极有影响并与外交有关系的外国通讯社,外国人办的报纸、刊物,以及外国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派驻中国的记者。这些新闻宣传工具,绝大部分是反动派所掌握的,少数是中间性的,只有极少数是进步的。在许多城市中则根本没有进步的和中间性的报纸刊物。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是一定的阶级、政党与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是生产事业,故对于私营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一般地不能采取对私营工商业同样的政策。除对极少数真正鼓励群众革命热情的进步报纸刊物,应扶助其复刊发行以外,对其他私营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均不容采取鼓励政策。而且因为中国所谓私营的新闻宣传事业,绝大部分有反动的政治背景,对这些所谓私营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如采取毫无限制的放任政策,也会使某些反动的政治势力容易获得公开地合法地联系与影响群众的阵地,则对人民极为不利。但旧有报刊中既有少数中间性的和进步性的,如不分青红皂白,轻率地一律取消,亦于人民不利,无限制地放任的政策和一律取消的政策,这两种政策均不符合于我党保护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和剥夺反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至于旧有的编辑,与记者则有不同情形,他们中的大部分,一方面,也受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与剥削,故应当争取,也可能争取他们,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因为他们受了长期的反动政治教育与长期从事于程度不同的反动宣传工作,或有浓厚的糊涂思想,故在被我党所接收的新闻宣传机关中,对旧有人员不能采取一律留用的政策,而应当采取慎重的甄别留用,和有步骤地使用的政策。由于这是

一个严重而复杂的问题，我们必须采取既严肃又慎重的态度，方能处理适当。”①

194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对新解放城市的原广播电台及其人员的政策的决定》。决定规定，“所有敌方政府军队及党部管理之电台，必须全部接收。”“大城市中还有少数民营广播电台，因其直接联系群众且可能为敌人作通讯联系之用，故在我之军管期间，应一律归军管委员会统一管理，并令其分别具报资本来源、政治背景、经理、广播员、编辑员历史等，听候处理。”②

上述两个《决定》，除对新解放城市新闻传播工作者去留作了规定之后，还具体规定了禁载条例。对允许继续存在的报纸、刊物、通讯社、广播电台宣布下列命令：

“凡经政府登记许可出版之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民主政府对于他们实行事后审查制度，并向所有报纸、刊物、通讯社宣布下列各项命令：

(1) 不得有违反人民政府法令之行动；

(2) 不得进行反对人民解放战争，反对土地改革，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宣传；

(3) 不得进行反对世界人民民主运动的宣传；

(4) 不得泄漏国家机密与军事机密。”

对允许继续营业的民营广播电台的规定是：

(1) 转播新华台节目。

(2) 不得有反对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之任何宣传。

(3) 广播节目须经军管会之审查。③

边破边立。在处理新解放城市新闻传媒的同时，党积极拟定党和人民的新闻传媒在新的传播环境中正确运作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1948年8月15日发出的《中宣部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和1949年2月18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对北平市报纸、杂志、通讯社登记暂行办法的批示》。

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指出三点，“(一) 虽然，报纸读者是县、区干部、知识分子及工商业者，报纸要为他们服务，但我们的报纸，主要

①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89～190页。
②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94、196页。
③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92、196页。

地是为工人和农民服务。这就是说，我们主要地是代表工人农民（同时也代表工商业者与知识分子），向工商业者与知识分子说话；我们的消息，主要地是反映党的政策和战争、生产、支前、工农兵生活等，同时也有关于工商业与学校等的消息；我们要以报纸来教育读者，工农兵是最可贵的，知识分子要为工农兵服务，要懂得工农兵的生活。这里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忘记了我们主要是代表工农兵的，另一种倾向是拒绝为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服务，与他们格格不入。

（二）报纸的主要消息，应来自农村和工厂，其次来自市场、学校等其他地方。必须在重要产业中（例如盐湖、铁路）、工厂及农村中，组织通讯网、黑板报、墙报等，作为党报的基础，必须深刻了解那里的动态和问题，多写那里的情况和问题，并加以解答。同时，也要在市场、学校等中有通讯员、墙报等组织，报道那里的消息，并经过报纸的论文等给以指导。这类消息与指导，要使工人、农民也能懂得市场与学校的情形，并且知道那里的某种问题对自己有什么重要性，为什么应该是这样或那样处理。也就是说，要教育工人农民（和我们的干部）如何做国家政权的领导者。这样的原则，与资产阶级报纸的原则，是不同的。

（三）副刊在城市是很重要的，必须办。办副刊的原则，应是深入浅出地对读者作教育工作。不管是论文、小说、随感、常识介绍、批评、群众意见与答复等，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观点上来看，总要是有益的，至少是无害的。在作品的形式上、笔调上，迎合读者的兴味是可以的，但勿在原则上去迎合坏的倾向。即是说，必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观点。"①

上述三点，已明确规定了党在城市办报的目的、方针和可依靠力量。

经过中共中央修改而颁布的北平市报纸杂志通讯社登记办法，明显地带有新闻法规的性质。该办法共9条，重要内容有，"1.为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剥夺反革命分子的言论出版自由，所有本市已出版或将出版之报纸和杂志，及已营业或将营业之通讯社，均须依照本办法向本会（北平市军管会）申请登记。2.凡报纸、杂志和通讯社，于申请登记时，应详细而真实地报告下列各项并填写申请书。甲、报纸、杂志或通讯社的名称；乙、负责人的姓名、住所、过去和现在的职业、过去和现

---

①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01～202页。

在的政治主张、政治经历及其与各党派和团体的关系；丙、社务组织；丁、主要编辑与经理人员的姓名、住所、过去和现在的职业、过去和现在的政治主张、政治经历及其与各党派和团体的关系；戊、刊期(日刊或周刊、月刊等)、每期字数、发行的数量与范围；己、经济来源与经济状况、重要股东的情况；庚、兼营事业；辛、印刷所及发行所的名称和所在地。"

"5.所有在本市出版或营业的报纸、杂志和通讯社，均须遵守下列各项：甲、不得有违反本会及人民政府法令的行动；乙、不得进行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宣传；丙、不得泄漏国家机密与军事机密；丁、不得进行捏造谣言与蓄意诽谤的宣传。6.凡报纸、杂志和通讯社，违反本办法第2条各项规定，而有重要隐瞒或报告不真实企图骗取登记者，一经发觉并证实后，除不许其登记，或撤销其登记外，当视其情节之轻重，予以处分。7.凡报纸、杂志和通讯社，有违反本办法第5条各项规定者，当视其情节之轻重分别予以警告，定期停刊或停刊的处分。其有涉及刑事范围内之行为者，当由法庭予以审判。"①

新闻总署成立后，颁布了《全国报纸杂志登记暂行办法草案》，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新闻传媒登记法规。该办法第一条指出，"为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新闻出版事业，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特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49条精神制订本办法。"第九条规定了禁载条例，"各报社杂志人员之行动，及其报纸言论之记载，须遵守下列各项：甲、须遵守共同纲领，拥护人民民主事业。乙、须遵守各级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丙、须保守国家的国防、外交、财政、公安等有关机密事项。丁、须报道真实新闻，并禁止利用新闻以进行诽谤，破坏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煽动世界战争的言论与记载。"该办法对申请登记者没有规定明确的资格限制。②

二、新闻行政主管部门的设立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于1949年11月1日设立新闻总署，统一管理全国新闻工作并即刻运行办公。1950年4月25日，新闻总署作出关于统一新华社组织和工作，改新华社为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的决定，此后，新华社沿着全国"消息总汇"的道路加强了自身建设。由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改组而成的广播事业局也划归新闻总署领导。1950

①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73～275页。

②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2页。

年2月27日，新闻总署规定中国的广播电台的任务是发布新闻、传达政令、社会教育、文化娱乐。这样，各种新闻传媒统一由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初步实行了党政分开。实行新的新闻体制的目的，中央有一个解释。1949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中央政府成立后党的宣传部门工作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在中央政府未成立以前，党的中央宣传部不得不实际上暂时代替中央政府的文教机关，管理国家的文化教育工作。为了便利工作的进行，在中央宣传部领导下，近一年来，还组织了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中央出版委员会，中央电影管理局等机构。在过去中央政府还未成立的情况下，这是完全必要的。现在，中央政府已经成立，管理全国文化教育事务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及其所属之各部、院、署亦已先后成立。原本部所属之新华通讯社已改为国家通讯社，广播事业管理处已改为广播事业局，均隶属于新闻总署。本部所属之电影管理局，已改为电影局，隶属于文化部。在出版总署下成立了出版局，原本部所属之出版委员会及其地方组织，应即取消，新华书店改为国家书店，受出版总署的领导。除了上述组织已改属政府以外，全国的文化教育的行政工作，此后均应经由中央政府文教部门来管理。各地区有关文化教育行政的工作，此后均应经由各地政府及军管会之文教机关（其组织办法最近即将由政务院通过）向中央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或适当部门报告和请示。所以需要这样做，目的在于使中央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门，在党（通过政府党组）的领导和党外民主人士的参与下负起管理全国文化教育行政的任务，以便党的中央宣传部和各级宣传部能够摆脱行政事务，集中注意于党内外的思想斗争，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领导和党的文化宣传政策的制定，而这些方面的工作，中央宣传部和各级宣传部长期间做得非常薄弱，是必须坚决加强的。”①

在此之前的10月30日，中宣部和新华总社已发布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宣传工作中应注意事项给新华社各总分社和各地党报的指示。指示指出，“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的事，应经由政府讨论决定，由政府明令颁布实施。其属于全国范围者应由中央政府颁布，其属于地方范围者由地方政府颁布。不要再如过去那样有时以中国共产党名义向人民发布行政性质的决定、决议或通知。我

①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88～289页。

们通知各地不要发表中共中央华北局的建立村、区、县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定和新区土地改革的决定，就是因为这样的决定应由政府来公布，而不应由党的决定来公布。根据同样的道理，今后各地中国共产党党报的社论、论文和新闻按语，也要注意不再用行政命令的态度和口气，而应该用号召、建议和商讨的态度和口气。报纸用行政命令的态度和口气，不仅现在是错误的，就是过去也是不对的。"①

新闻总署根据中央的规定，忠实地执行自己权力范围内的职责。新闻总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辱自己的使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统一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重要新闻的暂行办法，规定：

"1. 为了保障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的新闻的正确性和负责性，实行统一发布新闻的办法。

2. 凡须经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通过或同意的一切公告(如文告、法律、法令、决议、命令、训令、通令、计划、方针、外交条约、外交文书、判决、起诉书等)，以及须经上述机构负责首长同意后发布的一切公告性新闻(如关于政府会议、政府重要措施、政令解释、工作总结、外交事件、重要案件等的新闻)，均由国家通讯社即新华通讯社统一发布。

3. 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院、委、部、会、署、行首长，均应负责以有关新闻稿件供给新华通讯社，或将应发布之新闻材料通知新华通讯社。

4. 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院、委、部、会、署、行均应设置一个专任或兼任的新闻秘书在各该机关首长领导之下，负责协助各该机关首长执行有关新闻的发布工作。各机关新闻秘书应与新华通讯社保持经常联系。

5. 凡属下列范围者，除有特殊规定者外，各报社、广播台、杂志社、画报社记者得向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机关进行采访：

(1)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及所属各机关已公布的政策、计划、决议、法令等执行情形。

(2)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各院、委、部、会、署、行及其所属业务机关(如工厂、贸易公司、铁路局、学校、广播台、电影厂、监狱等)的工作情况

---

①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24页。

和工作中的问题。

(3)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各院、委、部、会、署、行及其所属业务机关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

6. 下列各项，不得作为新闻发表：

(1) 属于国防、军事和公安机密者。

(2) 属于外交机密者。

(3) 属于财经机密者。

(4) 属于国家其他机密者。

7. 对于外国记者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的新闻一事，由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统一办理。各政府机关不得自由对外国记者发布新闻。"①

根据政务院指示，新闻总署作出了关于报纸采用新华社电讯的规定，要求"一般大报对新华社所发表的各种有特别重要性的稿件，如政府公告，外交文书，社论和重大的政治外交新闻等，不得删节。通俗报和小型报对于最重要的公告亦不得删节，但可附加通俗解释。对其他文件，在必须改写时，可以改写，但改写后即不得用原有文稿，或新华社电讯名义。"②新闻总署还作出了重要新闻稿件必须经有关方面审阅后方得发表的规定，要求"今后无论记者、通讯员，采写新闻均应首先交由各该新闻的机关、团体负责人，和各该新闻本事的当事人审查(包括各党派和无党派的组织和人士在内)要求他们考核事实是否准确，政治上、政策上有无问题，新闻本身可否发表，最好由他们签字同意，然后送往编辑部。这种审查是必不可少的。应该定为新闻稿件的必经手续和采访记者的纪律责任。编辑部在处理稿件的时候，首先就应检查这些审查手续是否完成。如有特殊原因无法交给当事人审查者(例如采写敌方情况或俘虏官兵谈话的新闻)，也应经过有关机关的负责人考核。"③

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于1950年5月30日联合作出《关于各级新闻出版机关的任务与组织暂行规定(草案)》，对新中国新闻出版行政主管机关的政府行为进行规范。规定指出："各级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大

①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90～291页。

②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1页。

③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63页。

行政区设新闻出版局，或分设新闻与出版两局，重要省市设新闻出版处，一般省市有必要时设新闻出版室）的任务，主要为新闻与出版行政的管理，除发布同级政府必须统一发布的公告性新闻外，不负担其他新闻出版的业务工作，其具体职掌如下：

1. 传达与执行各级人民政府关于新闻出版的政策与法令；

2. 办理新闻出版事业机关及报刊发行与广播周率、输出力、时间等的登记及对当地报纸、刊物、图书及出版、发行、印刷机关，进行调查统计工作，并分别向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与出版总署提出报告；

3. 对有关新闻出版的合法权益（如版权著作权等）的保障事项及对有害于人民的报刊、书籍、广播节目等的取缔事项；

4. 组织关于报刊、书籍的批评介绍工作，以收推进新闻、出版工作之效；

5. 适应记者、编辑、著作家和其他新闻出版工作者的需要，组织关于实际工作情况与政策的各种报告与座谈，及记者招待会等；

6. 发布同级政府必须统一发布的地方性公告性新闻；

7. 审核各公营报纸及广播台的预决算等事宜；

8. 执行新闻、出版用纸的补贴分配事宜；

9. 协助审查当地新华书店出版书稿；

10. 用事后审查及抽查方法，审查当地出版或经售的书刊与本地区播送的广播节目，及国外进口的报纸与书刊。"①

上述规定，可以说是新中国对新闻传播行为实行行政调控的最初尝试。遗憾的是，1952 年春，中央人民政府由于机构调整而撤销了新闻总署。从此之后，又由中宣部统一领导与处理新闻传播的具体业务，党政又合一了。直至 1987 年，这种"合一"才再次分开。

三、几项重大新闻工作决策

从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到 1957 年整风反右，新中国的领导者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有几项重大的新闻工作决策。

（一）关于利用报刊开展批评的决定

1950 年 4 月 19 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决定共 5 条，其中第一条鲜明地指出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说："吸引人民群众

---

①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册，新华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78～79 页。

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教育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纸刊物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在今天是更加突出地重要起来了。因为今天大陆上的战争已经结束，我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的政权，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由于这些新的情况的产生，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党的人民政府的及所有经济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共中央特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①

（二）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

1954年7月17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全国第二次新闻工作会议讨论的决议，要求切实改进报纸工作。决议共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报纸工作的成绩与不足作了总结："全国的报纸工作在最近几年内有很大成绩，在各种斗争和建设事业中已成为党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导实际工作，联系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武器。但是，目前许多报纸的党性和思想性仍然不强，联系实际和联系群众不够密切，报纸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还没有经常的充分的开展，部分的批评不严肃、不正确，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宣传和关于党的生活的宣传都很薄弱，报纸上的经济宣传存在许多缺点，关于国际问题的宣传也注意得不够。大多数报纸的评论工作非常薄弱，在新闻报道方面也存在着反映人民群众的多方面的活动不够，以及公式化、概念化、迟缓、冗长、不通俗等严重缺点。这些缺点，是和各级党委对报纸工作缺乏经常领导的状况分不开的。"

第二部分提出改进报纸工作的重点是：理论宣传，党的生活的宣传，经济宣传，国际问题的宣传，评论工作。

第三部分总结4年多来报纸批评工作，分析了报纸批评开展得不好的原因和今后的要求，指出："主要原因是：党委对于领导和支持报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得不够；党的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骄傲

①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情绪和压制批评的现象，缺乏对批评特别是劳动人民自下而上的批评的'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报纸上发表的批评有一部分发生事实错误和态度不适当，甚至有些报纸曾发生过脱离党委领导的倾向。中央责成各地党委并领导党报编辑部，对于四年以来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情况做一次认真的检查，采取有效的改进办法，并向中央报告。各级党委要经常注意，把报纸是否充分地开展了批评、批评是否正确和干部是否热烈欢迎并坚决保护劳动人民自下而上的批评，作为衡量报纸的党性、衡量党内民主生活和党委领导强弱的尺度；要保证党委的机关报能够经常地开展正确的健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要通过报纸广泛地吸收来自人民群众的意见，正确地负责处理人民来信。"①

第四部分讲发展各类报纸尤其是工人报纸。第五部分讲新闻干部的培养和训练。第六部分讲党委领导，强调了党委任命和管理新闻干部。

（三）制定规范批评的规定

1953年中宣部发出关于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问题给广西省委宣传部的复示。复示指出，"关于《宜山农民报》在报纸上批评宜山地委一事，我们认为广西省委宣传部的意见是正确的。党报是党委会的机关报，党报编辑部无权以报纸与党委会对立。党报编辑部如有不同的意见，它可在自己权限内向党委会提出，必要时并可向上级党委、上级党报直至中央提出，但不经请示不能擅自在报纸上批评党委会，或利用报纸来进行自己与党委会的争论，这是一种脱离党委领导的做法，也是一种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党委会如犯了错误，应由党委会用自己的名义在报纸上进行自我批评。报纸编辑部的责任是：一方面不应在报纸上重复这种错误，另一方面可在自己权限内向党委会直到上级党组织揭发这些错误。报纸编辑部即在上述情况下亦无权以报纸与党委会对立。这是党报在其和党委会的关系中必须遵循的原则。"②

而在复示之前的1950年8月14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在就利用广播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的指示中规定，"在进行具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工作上，大行政区台与中央台一般地不是一个适当的武器。

---

①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19、323页。

②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79页。

因为它的电波发射出去的范围可以远及国外，而向国外听众去播送我国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大多数情形下是不适宜的。除了影响全区的、带总结性的不妨为敌人听到的问题与事件外，均不宜在区台广播。""省台不像市台一样，它的范围扩及全省，所以省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时，只能选择结论性的和省各级政府机关团体部队有普遍教育意义的播送，如果在确有必要批评到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组织时，要与被批评者的检讨反省同时播送。在省台不应进行枝枝节节的批评。"①

1954年4月，毛泽东在对胡乔木等人的谈话中还提出了报纸批评的三字方针："关于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三字方针。开，就是要开展批评。不开展批评，害怕批评，压制批评，是不对的。好，就是要开展得好。批评要正确，要对人民有利，不能乱批一阵。什么事应指名批评，什么事不应指名，要经过研究。管，就是要把这件事管起来。这是根本的关键。党委不管，批评就开展不起来，开也开不好。"②

（四）向苏联新闻界学习

新中国外交路线的基点之一，是向苏联"一边倒"。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明确宣布："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③在既定的基本国策下，向苏联新闻界学习，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新闻界的必然方针。加上我们对新的历史时期从事新闻传播没有经验，"向老大哥学习"也就更迫切了。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新闻界学习苏联新闻界的理论和经验，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了。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说，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发表了一篇演说，只有我们《解放日报》一篇

①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94页。

② 毛泽东：《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方针》，《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77页。

③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1473页。

社论那样长，要是我们的老爷写起来，起码得有几万字。1942 年重庆《新华日报》改版，以《真理报》为参考模式。共和国成立不久，1950 年 1 月 4 日，《人民日报》即开设《新闻工作》专栏，旨在“介绍苏联新闻工作经验”，从此开始系统学习以《真理报》、塔斯社为代表的苏联新闻工作的理论和经验。1954 年至 1955 年，中苏新闻界多次互访，向苏联新闻界学习的活动达到高潮。

向苏联新闻界学习，是年轻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得以有机会系统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特别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观点，全面了解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传统，这方面的收获，是极其珍贵的，一再强调诸如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新闻批评的方针，报纸工作的群众性，工农通讯员运动，对新中国的新闻工作者起着教育、启迪和指导的作用。

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应该实行何种体制？这是共和国成立后亟待解决的问题。当然，延安清凉山时期的新闻体制基本搬到了新中国，但新的体制中也有《真理报》、塔斯社、全苏广播体系的广泛影响。1954 年赴苏访问《真理报》代表团，访问塔斯社代表团，访问全苏广播系统代表团，系统考察了相关的苏联新闻界的经验，回国后分别整理出版了《真理报的工作经验》、《塔斯社工作经验》、《苏联广播经验》，以后又根据苏联报刊工作者代表团访华所作的报告编成《苏联报刊工作经验》，这四本书全面提供了苏联报刊、广播和通讯社经验，极其详尽地介绍了他们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我国不少新闻单位，包括《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以其为样本，调整和重组了自己的管理体制。

向苏联新闻界学习活动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问题还是十分严重的，学习中的不足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不看具体条件，不分中国外国，只要是苏联的经验，是《真理报》、塔斯社的经验，都机械地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之一，是以党和政府的各种决议作为新闻最主要的来源。学习的结果完全照抄经济机关和政府部门设置来安排报社的分工，设立相应的专业部同经济部门相呼应。苏联强调国内新闻的任务就是肯定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切重要成就，于是在我们的报道中也片面地强调成就报道，以致最后变成“报喜不报忧”，极大地冲击了批评报道。苏联认为，社论和短评不应该是漫谈，不应该是议论，而应该是政治指令、法令。于是我们提出，报纸上的每一条消息，每一篇社论，以致每一句话，

都应该代表党讲话，起到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的作用。

第二、绝对化。学习过程中，绝对化、一切惟苏联是从，惟《真理报》、塔斯社是从的倾向相当严重。一些同志中，"凡是真理报的标题就是好标题，凡是塔斯社的导语就是好导语"。有些单位和新闻工作者提出，"不向党闹一个字的独立性"。而所谓"一个字的独立性"，即指发现新闻或社论中有个别错误乃至错别字，因为上级党委已经审阅，就不能也不应该再改，这种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原则的做法，也是从苏联学来的。《人民日报》和一些报纸曾提出，为每天一篇社论而奋斗。于是报社每天为"每天一篇社论"冥思苦索，即使成文，也属无的放矢之类，总觉太浅太泛，没有说服力。在当时，新闻八股，曾严重泛滥。

第三，"一切向苏联看齐"，迷信苏联，盲目依赖。在学习中，割断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忘却延安清凉山的传统，对苏联经验不作历史的批判的分析，一切以《真理报》、塔斯社为转移，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全盘西化"。在新闻界助长了迷信苏联，迷信外国，没有创造精神的恶劣风气，助长了不尊重本民族历史和本民族文化的错误倾向，对新闻界的影响是不可小看的。

这三方面的毛病，到 1956 年初，已十分严重，稍有见识的人都已发现它的危害。问题已到了非克服不可的程度。刘少奇 1956 年 5 月 28 日谈到新华社学习塔斯社时批评说，人家的东西，有的能照搬，有的不能照搬。不要把人家错误的东西搬过来。在我们同志中间要破除迷信，遇事要有分析，要有批判，不要迷信，不要盲从。要有思考，要有创造性，要有独立性，才可以把事情办好。依赖塔斯社是不好的。我们要建立自己的通讯事业，要把新华社办得比塔斯社好。毛泽东也指出，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要有批判地接受，不能无条件地接受。

毛泽东、刘少奇的指示和新闻界的批评，终于使学习苏联的活动冷了下来，使不少人的头脑清醒起来。"要把新华社办得比塔斯社好！"这一号召鼓舞新闻界，激励新闻界，推动他们酝酿一场新的新闻改革。

第二节　党的新闻传媒的第二次改革

一、人民新闻传播事业的蓬勃发展

新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从 1949 年至 1956 年，呈现蓬勃发展的可

言局面，从下表中的数字可以看到新闻传媒的飞速发展：

数字＼名称 年份	电台（座）	市县广播站（座）	邮发报纸（种）	邮发报纸期发数（万份）
1949	49	11		
1950	65	68	140	230
1951	74	188	214	514.3
1952	72	331	236	803.1
1953	63	501	247	797.7
1954	61	547	237	927.5
1955	58	750	249	1200.5
1956	58	1458	1236	1537.8

7年间，我们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全国布局，形成了同经济政治基本适应的新闻体制和新闻政策，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新闻业务指导思想，建立了一支立场、观点、作风和业务素质各方面符合要求的新闻工作队伍。借鉴苏联《真理报》和塔斯社等新闻传媒的经验，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理论水平和管理水平。这7年有着重大的进步，可贵的经验，也有不少教训，具体说：

第一，新闻宣传的重点，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改变有根本的变换。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战略任务是推倒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所以，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以致军事斗争，是党领导的新闻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和主要内容。而在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战略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所以，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工作重心，主要的报道内容，和为之服务的主要对象。

我们在前面提及，党中央对这一战略重心的转移是有思想准备和一定的物质准备的，对实现这一战备重心转移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有充分的估计。共和国成立后最初7年的新闻宣传实践表明，党领导的新闻传媒对经济建设这一重心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并倾注了较大的热情，新闻宣传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向社会主义过渡（一化三改）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生力军的作用。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无论是报道的规模

和声势，还是宣传的深度和广度，离开战略重心所应具有的程度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的。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第二，中国共产党从领导部分地区——根据地或解放区政权的党，变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惟一的执政党，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于这一变化，党也是早有准备的，在前面引述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这一重要文件中，对党作为政权领导者容易产生的骄傲情绪和腐败行为，以及如何反对官僚主义的毒害，也有深刻的论述。在这7年的新闻宣传中，反对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以公开刊登惩治刘青山、张子善一案为发端，始终占据一定的重要地位。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这一阶段新闻传媒的特色之一。新闻界对于这一阶段新闻传媒的战斗性，几乎是有口皆碑。

然而，如果从执政党严格治党和治政的角度反观这7年的党建报道和批评报道，还是有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党和政府的决策过程的报道很少，影响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和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实行舆论监督的积极性与可能性，建设性的意见、可资人们镜鉴的廉洁奉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典型报道太少，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执政党的建设缺少规范和榜样。就利用报刊所进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言，无论是深度和广度，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以致中央认为，从各地党政机关和各级干部到各种新闻媒介，对于中央1950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执行得并不很坚决，情况也很不平衡。

第三，较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历史地提到年轻的共和国面前，对于必须过多地强调集中、强调服从和主要依赖行政命令和军事指挥的战争环境来说，这无疑又是一种新的变化。毛泽东曾对黄炎培说，我们找到了一个防止和反对执政党和执政阶级的腐败堕落的好方法，那就是民主。毛泽东把发动人民监督政府和官员看做新政权人不亡、政不息的重要前提。但是，由于共和国初期仍很严峻的阶级斗争态势和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由于繁重的经济恢复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一化三改的紧张工作，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未能在民主和法制建设上采取更为有力和更为扎实的措施，共和国建立最初7年的新闻宣传中，民主和法制建设未能占据必要的重要地位，新闻媒介未能广泛而深入地向我们的干部和群众积极有效地灌输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社会主义的民主教育和社会主义的法制教育，多年来始终是一

个薄弱环节。这一失误的后遗症和它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在我们当前仍看得十分显明。

第四，全国范围的繁荣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在稳定的政治和较为发展的经济的基础上，已经蓬蓬勃勃地展开。党和政府对于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是重视的，在财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地给予扶持和推动。最初7年的新闻宣传中，这方面的内容占据着一定的地位，出了一批有声有色、有深度有新意的好新闻、好专栏、好报刊。但是也要实事求是地指出，对知识、文化重视不够以及对文化人尊重不够的毛病在这一阶段已初露苗头，对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界的宣传远少于其他战线，而新中国成立不久即开始的对于部分文化领域代表人物的上纲上线、超纲超线的批判，则开始导致了对整个文化科学战线的清算。

第五，从延安到北京，从农村办报到大城市办报，不仅新闻事业的创办地点出现了位移，更重要的是一系列新闻体制、新闻观念、新闻业务指导思想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换。新中国成立前后，新闻工作剧烈变动的关键时刻，党中央、中宣部等领导机构发了几十个文件，作出一系列指示，发表一连串讲话，就全国范围进行新闻传播活动和大规模开展对外报道的领导体制、审读程序、工作方式、事业布局和必要的观念更新进行了调整和部署。实践证明，其中不少文件、指示、讲话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及时的，效果也是积极的。但也有不全面和不甚恰当之处，特别是新闻工作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同城市办报的新特点多有碰撞，常常因此而妨碍了新闻的快、新、短、活，影响了新闻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这方面的弊病，几十年来日积月累，尾大不掉，以致成为今后新闻改革最感为难的课题。

总之，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从延安清凉山到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历史前进了，环境变迁了，政治和文化氛围改换了，党指导新闻宣传工作的政策以及新闻传媒的业务指导思想也应该采取相应的变动和调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应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针对上述5个方面的转换，一方面，党不失时机地对于新闻工作作了一定的政策上的调整和改变，采取了不少便于操作的决策和措施，从而确保新中国建立后最初7年新闻事业能够首战告捷，能够在推动新中国顺利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斗争中立下大功，能够以很好的声誉自立于世界新闻业之林。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前7年新闻宣传也不断暴露出不少问题。自然，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无

可否定，一些重要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应有的新闻观念没有成为全党的共识，一些重要的新闻政策没有及时调整，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二、刘少奇对新闻改革的指导

作为党的政治局分管新闻工作的领导人，1956年5、6月，刘少奇曾对新华社与广播事业局工作作过三次指示，详尽而明确地指出新闻工作要整顿和改革。连同他在解放前夕的1948年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我们在第六章第四节已有详细分析），1961年对人民日报社工作的指示，我们一起作简要的评析。刘少奇的这些观点充满着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学理精神和理论力量，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新闻学的重大发展。刘少奇的主要新闻观点是：

（一）"报纸存在一个很大的危险性"

对于报纸的功能，刘少奇是从两方面考察的。他高度评价报纸在联系党和人民群众中的作用，指出：列宁说，党要经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是的，我们要经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而其中最重要的办法，就是报纸、新华社。它每天和群众见面，每天把党的政策告诉群众。刘少奇的这番论述，同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等人谈到报纸功能的言论基本上相同。值得注意的是，他还从另一角度考虑报纸的功能。就在上述谈话的后一段，刘少奇又非同寻常地说了这样一段话，报纸要能够密切地联系群众，那是很好的。但是，如果给群众以错误的东西，散布坏影响，散布错误的思想，错误的理论，错误的政策，把群众中的消极因素、落后因素、破坏因素鼓动起来，就要犯大的错误。因此，报纸工作如果做不好，就是最厉害的脱离群众，就要发生很危险的情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1961年5月，刘少奇再次表达对报纸作用的看法。他详细分析《人民日报》过去三年的错误与缺点，指出："你们《人民日报》上登的新闻，有多少是真的？你们天天用大字登头条新闻，今天说那里生产如何好，昨天说那里的公共食堂办得好，究竟有多少是真的？你们想用这些典型事例来指导实际工作，典型本身就不真，怎么能指导实际工作呢？你们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我就不看你们那些头条新闻，我不看，报纸来了只看七、八版。""《人民日报》应该好好总结一下三年来办报的经验。三年来，报纸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宣传方面的片面性，这些，对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恶果。你们宣传了很多高指

标，放卫星，在这个问题上使我们党在国际上陷于被动。报纸宣传大办万猪场，结果是祸国殃民。""报纸威信很高，大家都以为《人民日报》代表中央，《人民日报》提倡错误的东西，大家也以为是中央提倡的，所以，这几年很多事情，是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领导一半。《人民日报》搞了这么多错误的东西，影响很坏，可以说，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害处还大。"[1]

（二）"要根据群众的实际去考察政策"

党的新闻传媒和新闻记者应该抓什么新闻？抓与政策相关的事件与情况报道，无疑是责无旁贷的重要任务之一。毛泽东说过，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够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刘少奇在赞同毛泽东的这一观点的同时，又提出自己醒人耳目的见解。他对记者说，你们不仅要宣传党的政策，还要根据群众的实际去考察政策是不是正确的，有没有缺点，这里就表现你们的创造性了。1961 年刘少奇谈到报纸工作的经验与教训时指出，"这几年，你们喜欢搞表面现象，搞形式主义东西，搞耸人听闻的报道，还没有完全摆脱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影响。报纸是斗争最尖锐的工具，几年来报纸在敌我界限方面分得比较清楚，有敌我观念；但是非界限方面就分不很清楚，是非不分，什么是不正确的，不应该宣传，你们还搞不清楚。"针对这些问题，刘少奇再次强调要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他对记者指出，报纸工作人员是什么人？是调查研究的专业工作人员。报上的一切文章都应当是调查研究的结果。调查研究是一门学问。[2]

（三）"新华社还是当老百姓好"

刘少奇对新华社的性质采取了新的视角。他说："新华通讯社做国家通讯社好，还是当老百姓好。我看，不做国家通讯社，当老百姓好；新华社干部不作为国家干部，不受行政级别限制，记者的薪水也可以比毛主席薪水高，新华社的评论、新华社记者的评论，不是代表国家发言。新华社也不要学习塔斯社那样代表政府辟谣。新华社如果当了老百姓，不搞国家通讯社，国务院可以成立新闻处，发公报新闻，声明、辟谣由它来做。"[3]

---

[1] 参见北京新闻学会编：《刘少奇同志关于新闻工作的几次讲话》，第 26 页。

[2] 参见北京新闻学会编：《刘少奇同志关于新闻工作的几次讲话》，第 27 页。

[3] 参见北京新闻学会编：《刘少奇同志关于新闻工作的几次讲话》，第 15 页。

刘少奇的这一主张，并非要新华社完全割断同国家、同政党的联系。他在同一次讲话中指出："今后不要强调新华社是国家通讯社。比如说，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虽然已经写入宪法，但并不常常强调，只有在必要时才写一句。"联系前后两段讲话分析，可作这样的引申：新华社常把国家通讯社挂在嘴上，并无必要，平日里以民间通讯社身分出现，反而更好。

新华社改变身分，以"老百姓"出现，并不是不要党的领导，更不是否定立场，完完全全自由化。刘少奇指出，我们的新闻报道，要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党，有利于当前斗争。新闻记者要坚持真理，要有斗争性，头上要长角。即使新华社变成了老百姓，也依然会处于党和政府的领导之下，新闻记者也依然是党的新闻宣传队伍中的一员。

刘少奇认为，新华社要走向世界，办成世界性通讯社，也应该放弃国家通讯社的身分，当老百姓。他说，外国记者强调他们的新闻报道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报道；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报道，是他们的口号。如果我们不敢强调客观的、真实的报道，只强调立场，那么，我们的报道就有主观主义，有片面性。如果这样做，就是下决心要片面性。新华社的报道，如果有了片面性，就会丧失一切，对自己不利，对人民不利，就不能成为世界性通讯社。作为国家通讯社，当然未必就不客观不真实，但世界上看新华社，总会认为既然是国家通讯社，首先代表国家发言与表态，立场是第一位的。这样的审视定势，自然会影响国外对新华社客观公正报道的打分。而如果以民间通讯社出现，评价则又会不一样。所以世界上主要通讯社，都是以民间通讯社身分出现的，并且千方百计地表白自己的民间性和非官方性。

(四)"让人民知道世界上有骂我们的人"

刘少奇主张适当地发表西方通讯社批评中国的报道。他说："有些报纸刊登国际新闻只登说我们好的，骂我们的或者说一句美国好的都被删去，这种做法是不好的。比如说，美国政府首脑人物骂了我们，这个新闻在我们的报纸上是否可以登？我看可以登。他在骂我们，是一种真实的情况，是客观事实，骂得岂有此理；我们的报纸登一些，让人民知道有人在骂我们，帝国主义在造谣，引起人民反感。这样的新闻，虽然占我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几的反革命分子看了会高兴，但是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已经有相当高的政治水平，是可以看出是非来的。周恩来总理骂了美国，有的美国资产阶级报纸就刊登出来。为什么资

产阶级报纸敢于把我们骂他们的东西登在报纸上，而我们的报纸却不敢发表人家骂我们的东西呢？这是我们的弱点，不是我们的优点。”“现在我们的国际报道只有一面：骂美国的，说我们好的。这种片面性的报道，会造成假象，培养主观主义。”①

刘少奇谈到上述观点时，首先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新闻报道不能超阶级，不能有客观主义，要有坚定的人民立场和阶级立场；新闻报道要客观、真实、公正，同时要考虑利害关系，看看对人民是否有利。刘少奇指出，刊登西方通讯社骂我们的新闻，应该是有选择的，有分析的，是充分考虑到发表时机的。我们记者的报道，一是要把人家说我们好的和骂我们的东西都加以报道，二是注意不能把人家骂我们的东西全部照登出来。他还指出，要学习西方记者的报道手法和技巧。报道西方国家骂我们的东西，同时又令这种报道于我有利，至少不造成过大伤害，正需要这种手法与技巧。刘少奇说，“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记者的报道技巧。他们善于应用客观的手法、巧妙的笔调，既报道了事实，又挖苦了我们，他们的立场站得很稳。人们从他们的报道中能够看到一些真实的情况。”“新华社的报道要真实、生动、有兴趣、文笔也好。这样做了，你们就会建立起威信来的。”②

不仅对于国际报道要做到全面真实，刘少奇还提出，对于国内报道，也要“有好报好，有坏报坏”，力求全面客观。他说：“现在的新闻报道有偏向——只讲好的，有片面性。应该好的要讲，不好的也要讲。”“当错误从地平线上刚刚冒头的时候，如果不加以揭露和制止，是对人民不利的；应该及时地在新闻报道中提出来，要人民注意。另外，有些事件，如抚顺龙凤矿瓦斯爆炸、火车互撞、轮船沉没等等，显然，事件本身（在苏联、美国都会发生这样的事件）不是重要的，可以报道，也可以不报道，因为它是个别的特殊事件。如果把这些事件和安全生产联系起来，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报道生产竞赛中对安全问题不注意，举几个有普遍意义的例子加以说明。”“对某些问题要及时报道，一定要问题解决了才报道，是不好的。例如，在北京各高等学校能不能搞先进集体，我们可以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不要等待做出结论才报道。报纸上应该有很多问题，对没有做出结

① 参见北京新闻学会编：《刘少奇同志关于新闻工作的几次讲话》，第11页。
② 参见北京新闻学会编：《刘少奇同志关于新闻工作的几次讲话》，第21页。

论的问题应该有议论，应该有几种不同的意见。这个地方就是'百家争鸣'。"①

刘少奇的这些新闻观点，成为党领导下的新闻传媒第二次改革的指导方针。

三、对第二次新闻改革的理论考察

党的新闻事业的第二次改革、共和国新闻事业的首次改革，是以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改版社论《致读者》为开端的。社论说："《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从它创刊到现在，一直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正因为这样，《人民日报》在创刊八年多以来，备受广大读者的令人心感的支持，工作也逐年得到进步。但是我们工作中仍然有很多缺点。在最近，我们将着重从以下三方面改进我们的工作。

第一，扩大报道范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变化的世界。各种不同的读者要求从不同的方面了解这个变化着的世界。尽量满足读者的多方面的要求，这是我们的天职。在过去，我们的篇幅比较小，不能容纳很多材料，这是一个困难。我们所以在目前纸张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扩大篇幅，正是为了解决这个困难。但是问题并不尽在于此。我们没有努力在有限的篇幅中多发新闻，发多方面的新闻。生活里的重要的、新的事物——无论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或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是通都大邑的，或者是穷乡僻壤的，是直接有关于建设的，或者是并不直接有关于建设的，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是并不令人愉快的，人民希望在报纸上多看到一些，我们也应该多采集、多登载一些。在报纸改出八个版以后，我们的新闻在数量上将增加一倍半左右，在题材上也将尽量扩大范围，力求适应读者的需要。

第二，开展自由讨论。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社会的成员不可能对于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抱有同一种见解。党的和人民的报纸有责任把社会的见解引向正确的道路，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应该采取简单的、勉强的方法。首先，报纸的编辑部无论凭着什么名义，总不能设想自己是全知全能的，或者故意摆出这样一副神气，活像对于任何问题可以随时作出绝对正确的结论。不是的，事实决不是如此。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群众性的讨论中逐渐得到答案。有一

---

① 参见北京新闻学会编：《刘少奇同志关于新闻工作的几次讲话》，第12～15页。

部分问题甚至在一个时期的讨论以后暂时也还不能得到确定的答案。有许多问题,虽然已经有了正确的答案,应该在群众中加以广泛的宣传,但是这种宣传也并不排斥适当的有益的讨论。相反,这种讨论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答案的正确性。而且就是正确的答案也经常需要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补充和修正。我们不提倡无休止的讨论,报纸的篇幅也不允许对于任何问题都去讨论,但是无论如何,害怕讨论的人总是可笑的人。在开展讨论方面,过去我们的报纸是作得很不好的,因而也减少了报纸的生气。今后我们希望力求改进。为了便于开展自由讨论,我们希望读者注意: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虽然是经过编辑部选择的,但是并不一定都代表编辑部的意见,——这不是说代表编辑部的意见就不可以讨论,而是说,我们发表的某些文章的某些观点跟编辑部的有所不同,这些文章的作者的观点彼此也不同,这种情形希望读者认为是正常的。这种情形不但不妨碍而且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无论问题是由于一种观点战胜了其他的观点而解决,或者是由于不同观点在争论中互相接近而解决。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的事实,编辑部都力求经过调查证实,但是有时某些问题(特别是读者来信中提出的问题)在个别细节上不容易很快地查得一清二楚,却有必要及时地发表出来,以求迅速解决,那么编辑部也将加以发表,而让它们的某些细节在实事求是的讨论的过程中弄清。这也是希望大家谅解的。

第三,改进文风。报纸是每天出版的,它每天都要用几万字去影响几百万读者,因此,报纸上的文字应该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而且言之成章。古人说得好: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实际上,文风不好,不但读者不愿意看,而且还会造成有害的风气,不利于思想文化,也不利于政治经济。在过去,我们的报纸上虽然也登过不少好文章,报纸上的文字虽然也逐渐有些进步,但是整个说来,生硬的、枯燥的、冗长的作品还是很多,空洞的、武断的党八股以及文理不通的现象也远没有绝迹。我们希望努力改变这种状况。除了编辑部自己努力以外,我们请求作者们在给我们稿件的时候,也务必注意到广大读者的呼声,尽量把文章写得有条理、有兴味,议论风生,文情并茂,万不要让读者看了想打瞌睡。报纸是给几百万人看的,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很难有时间看长文章,因此除了很少的例外,报纸上的文章总是越短越好,这一点也特别希望作者们能跟我们合作。"

1956年8月,中共中央批转《人民日报》编委会就七月改版向中央

的报告,中央的批复,肯定了改革的方向与方法,强调党中央的机关报又应该同时是人民的报纸,指出:“为了便于今后在报纸上展开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过去有一种论调说:‘《人民日报》的一字一句都必须代表中央’,‘报上发表的言论都必须完全正确,连读者来信也必须完全正确’。这些论调显然是不实际的,因为这不仅在事实上办不到,而且对于我们党的政治影响也不好。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的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这样做就会使思想界更加活跃,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越辩越明。各地党委今后也要强调地方党报是地方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党的各种报纸,都是人民群众的报纸,它们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如果片面强调它们是党的机关报,反而容易在宣传上处于被动地位。《人民日报》和各地方报纸还应该多登新闻,扩大报道的范围。新华通讯社发出的新闻,《人民日报》应该首先尽量采用。但是,各地方报纸收到新华社的国内外新闻,除了最重要的以外,不必完全同《人民日报》一样重复刊登,可以摘要改写,也可以不登,以便留出篇幅登载本地新闻。全国性的重大政治会议,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的发言,凡是决定公布的,《人民日报》必须一律发表全文,各地方报纸却不必全文发表,只要刊登发言的摘要,或者选登有关本地问题的个别代表的发言。其他如各民主党派的会议,青年、妇女的会议,工业、农业、商业、科学、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会议,无论是全国性的或者是国际性的,《人民日报》和各地方报纸都只要选登有关这些会议的重要消息和重要决议,至于这些会议的报告和发言等应该由其他有关的全国性报纸分别发表。”①

中央的批示态度明确,支持有力,给了《人民日报》和全国其他报纸以很大的鼓舞。

《人民日报》带头改革,全国新闻传媒纷纷跟上,使1956年下半年全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呈现出繁荣兴旺的景象。新华社编委会根据中央

① 《中共中央批转〈人民日报〉编辑委员会向中央的报告》,《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483～484页。

和刘少奇指示，给中央写报告提出新华社改革设想，主要有：少以“官办”面孔出现、多采“民办”作法；办成“消息总汇”；参加国际新闻“竞赛”；切实改变国内报道中存在的“报喜不报忧”状况。全国第四次广播会议提出，必须千方百计满足大量的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兴趣、不同政治见解的人许许多多不同的要求。中共中央宣传部转发《广播事业局关于组织地方人民广播电台承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集体记者的决定》，指出“集体记者”的任务在于向中央台供给本地区的各项重要新闻，和适合于全国广播的通讯、录音报道和讲话等。各地报社和广播电台也纷纷进行改革，发表社论、文章等欢迎读者、听众参与监督，有的地方报纸发表社论表示要在当地党委领导和群众支持下，根据人民的需要把报纸办好。

在改革和开放的气氛中，一系列新的报纸和刊物如雨后春笋般问世，至1956年年底，全国各类报纸达1 236家，至次年又增至1 325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参考消息》也从2 000份扩大发行到40万份。同国外新闻界的友好往来和业务交流也明显增加，1957年春，以民主党派成员徐铸成为团长的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访苏成行。

这次新闻改革的理论上的成果是：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性质问题。社会主义中国的报纸、广播和通讯社，既是党领导的事业，又是人民自己的事业。中央认为，《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各地党委也应强调地方党报是地方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党的各种报纸都是人民的报纸，它们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毛泽东一次讲到报纸工作时甚至谈到，报纸应该是人民的公共财产，公共武器，公共汽车，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刘少奇谈到新华社的性质时说，新华社做国家通讯社好，还是当老百姓好。我看，不做国家通讯社，当老百姓好。刘少奇还主张，各种新闻传媒应该一律平等，不能说《人民日报》是党报，其他的不是，级高一等，应该一视同仁。

第二，关于扩大报道范围满足读者广泛需要的问题。中央指示，《人民日报》和各地报纸应该尽量多登新闻，扩大报道范围。人民日报社表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变化的世界，各种不同的读者要求从不同的方面了解这个变化着的世界，尽量满足读者的要求，是我们的天职。中央在对《人民日报》改版报告的批复中，还对《人民日报》及各地

报纸如何报道种种会议及使用新华社电稿作了明确而详尽的规定，总的精神是要留出篇幅，尽可能多地登载本地新闻、本报独家新闻，中央各报要实行分工，《人民日报》不要什么战线的会议和决议全登。新华社的国内新闻如何选择？刘少奇指出，我们的新闻报道，要考虑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党，有利于当前的斗争。但是，当错误从地平线上刚刚冒头的时候，如果不加以揭露和制止，也是对人民不利的，应该及时地在新闻报道中提出来，对某些问题要及时报道，一定要问题解决了才报道，是不好的。对于美联社、路透社等外国通讯社的消息，也应该有选择地登一些，有些报纸刊登国际新闻只登说我们好的，骂我们的或者说一句美国好的都被删去，这种做法是不好的。刘少奇主张广播应从多方面考虑满足听众需要，为听众热心服务。他认为，广播跟人民的思想，人民的生活，人民的需要有密切的联系。广播有各方面的听众，广播应该关心所有听众关心的问题。广播一切都要替人民想到。有一些问题，报上不必多讲，广播要多讲。刘少奇还主张广播电台可以搞广告，因为人民是喜欢广告的。他主张办广播要从人民的实际支出水平出发，农民的收入还不多，工厂生产的喇叭，不要算利润，只够成本就行了，扩大机的价格也要降低。至于是否收收听费，他主张迟点收，待广播普及后再讲，收费原则是：不妨碍广播发展才收，如妨碍发展就不收，一切要从发展广播事业，有利人民利益的大局出发。

第三，关于展开各种不同意见公开讨论的问题。中央主张《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的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意见，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见解相反的文章。经过中央批准的《人民日报》改版社论，对于自由讨论问题论述的更为深透。社论认为，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社会的成员不可能对于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持同一种见解，因此自由讨论是十分必要的。

第四，关于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问题。新华社在设计改革的时候，曾对新闻报道提出如下4项要求：1. 新闻应该有普遍意义，能引起共同注意。是为广大读者写的，不是为少数专家写的。只讲主要的，不讲细节。2. 新闻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在每个时期报道要有中心。3. 简短，一般新闻长三五百字。4. 报道及时，在正确的基础上力求快。刘少奇说，新华社的这4条很好，但不全面，还要加上几条更重要的、更基本的要求。比如，新闻报道要真实，不能作假；反

对我们的可不可以报道，缺点和错误可不可以报道；要不要有立场，要不要客观，等等。这是塔斯社所缺少的。

第五，关于新闻界的自由竞争问题。新闻机构之间，报社之间，报社和新华社之间，搞自由竞争，搞社会主义竞赛，是必要的。刘少奇建议新华社自己办一张报纸，同《人民日报》竞争，创造一种独特的风格，新闻齐全，新闻短，能反映世界情况。喜欢看新闻的人就来看这家报纸。

第六，关于培养名记者的问题。中央主张要培养名记者。在新闻报道中，应该把记者姓名写在前面。这不是个人崇拜。应该让记者出名，要他对报道负责；如果犯了错误，他也要作检讨。刘少奇要求在尖锐的斗争中锻炼出几十个成名的记者，他们不造谣，讲真话，不仅对帝国主义讲真话，而且对共产党的错误也讲真话。记者是单独劳动的，各有个性，各有风格，有些人就喜欢某一记者的报道，只要是他的报道就愿意看。在稿件上署名，这是给予记者名誉，也是给以压力。新闻记者要坚持真理，要有斗争性，不要怕人家报复，不要怕人家把你赶走。新华社记者除写新闻以外，应该写些通讯、评论，写各种文章，要提倡记者写署名评论，发表自己的一得之见，这是记者的任务。

第七，关于向外国通讯社学习的问题。对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的经验要有批判地接受，不能无条件地接受，要去掉依赖性，依赖塔斯社是不好的。要学习塔斯社，同时也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记者的报道技巧，他们善于运用客观的手法，巧妙的笔调，既报道了事实，又挖苦了我们，他们的立场站得很稳。

第八，关于文风问题。中央对报纸的文风十分关心，将改进文风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指出，报纸是每天出版的，它每天要用几万字去影响几百万读者。因此，报纸上的文字应该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人民日报》也呼吁作者尽量把文章写得有条理，有兴味，议论风生，文情并茂。刘少奇批评新华社的新闻报道，学塔斯社的新闻格式，死板得很，毫不活泼，这是党八股，我们不能学这种党八股。

可惜，这次新闻改革的时间并不长，1957 年"反右"之风一起，甚至在这年春季稍后一些，毛泽东等人对一些新闻单位包括《人民日报》的指摘批评之声已不绝于耳。改革成了昙花一现，"走中国自己的路"，实际上只是作为初步的探索而走出了不大的一步。

第三节 新闻教育的调整和新闻学研究的重新展开

一、新中国新闻教育的调整

(一) 旧中国新闻教育的回顾

我们在第四章第二节《学从西方来:西方新闻学的移植》中,极其简要地提及过中国新闻教育发端的情况。这里继续作些必要的回顾。继1918年蔡元培执掌北大开设新闻学科之后,1924年燕京大学成立新闻系,1929年复旦大学在开设新闻学讲座5年之后正式创办新闻系。当时,上海圣约翰大学,福建厦门大学,北京平民大学、国际大学,上海南方大学、光华大学、国民大学等也都先后开设新闻系或报学系。一些新闻专科学校,如成舍我创办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和顾执中创办的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也开办问世。1943年,创办于1935年的中国国民党主办的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系改组为新闻学院。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教育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23年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办设立的新闻学科。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先后开设新闻系和新闻学课程。40年代后期,党先后在北平、华东、华中等地开办几所新闻学校,如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华中新闻专科学校,中原大学新闻系,华东新闻学院。新华总社还举办过三期新闻干部培训班,该班在建国后改名为北京新闻学校。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大专学校新闻教育机构主要有:上海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圣约翰大学新闻系、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中国新闻专科学校,苏州的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北京的燕京大学新闻系和广州的国民大学新闻研究班,在校学生共460余人。

(二) 建国初对新闻教育的调整

1949年10月,北京新闻学校正式成立,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新闻总署,开始改变过去短期新闻班以"政治理论教育与思想改造为主,业务为辅的教育方针",而采取"理论与业务并重的教育方针"。中央政治局1954年通过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中规定,"为了加强对新闻干部的培养和训练,中央责成马列学院设立新闻班,负责训练现有省(市)委机关报的总编辑、副总编辑、编委委员,省农民报的总编

辑，省以上报纸的党员编辑组长和记者，及条件与此相当的新华通讯社的、广播电台的和出版机关的党员干部。省（市）委及其以上的党校、干部训练班和团校也应该调训地委报纸的党员领导骨干、省（市）报记者、编辑及条件与此相当的新华通讯社的、广播电台的和出版机关的党员干部，提高他们的理论和政治水平。所有报纸的编辑部都应注意领导在职干部的理论、政治和业务学习。扩大现有的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数目，逐步地充实省（市）以上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期刊和出版机关的干部。中央民族学院及各地方少数民族干部学校应负责培养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报纸、期刊、出版机关以及广播台和通讯社所需要的少数民族新闻干部。上述院校的新闻班或选修的新闻课程，应由所在地区的党委机关报、通讯社和广播台的负责人员担任教课工作并编写教材。"①

根据这一规定，马列学院（即现在高级党校）设立了新闻班，负责训练《决议》指定级别的新闻干部。这个新闻班开办三期，于1957年结束。1955年，成立了以轮训在职新闻干部为主要任务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此外，根据《决议》要求，扩大了大学新闻系招生名额，并积极培养少数民族的新闻干部。

与此同时，党还对原有的新闻院系进行了调整。燕京大学新闻系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改为新闻专业。上海解放后，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暨南大学新闻系停办，在校学生并入复旦大学新闻系。1951年，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停止招生，原有学生并入复旦大学。1952年，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停办，其师生并入复旦大学。

（三）新闻学教材的编写

新的教育方针和教学计划，要求调整和修改原有的教材。1957年3月15日胡乔木在中国新闻工作者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现在的高级新闻教育机关如党校训练班，人大、北大新闻系也还是不能把我们新闻工作方面的各种问题，把新闻工作方面的知识、经验等充分地有系统地整理出来，编辑成教科书。这说明我们对专业的知识经验还不成熟。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知识的系统的整理，也就给我们培养干部、培养新闻工作人员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

①《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27～328页。

这里举一个例子。1954年，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全面学习苏联新闻教学经验，以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教学大纲作模式，制订《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大纲，共24讲，为：

一、序言

二、人民报刊的性质和任务

三、人民报刊的基本原则

1. 党性

2. 思想性

3. 战斗性

4. 群众性

5. 真实性

四、新闻工作干部的培养

五、我国当前报刊、通讯社、广播概况

六、报纸编辑部的工作和计划性

七、报纸的群众工作和读者来信工作

八、报纸的编辑工作

九、报纸的记者

十、报纸的出版技术

十一至二十二、有关报纸上的经济、文化、教育、理论、政法、军事、国际等问题的宣传

二十三、报纸上的图片

二十四、报纸的发行工作

这个教学大纲既庞杂又肤浅，理论业务一把抓，有的部分如报纸编辑所占教学时间过于短促，难以达到教学要求。大纲所提出的五个原则，以后成为所谓"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五性一统论"的"理论来源"，即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就是由"党性、思想性、战斗性、群众性、真实性"这报纸工作的五个原则，和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论"这一报纸的根本性质两部分组成的。这"五性一统论"，不仅助长了新闻教育界、理论界和新闻实际工作部门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而且也给以后的新闻改革制度造了很大的理论障碍。

显然，正如胡乔木所指出，这样的教科书是无法完成培养新闻干部和新闻工作者的任务的。即便是这样的教材，在当时教员也不敢公开出版。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长

达29年时间里，新中国没有公开出版过一部新闻学理论教科书。

二、新闻学研究的重新展开

新中国建国初期，新闻传媒和新闻教育处于废旧布新的调整变动时期，一般的新闻学研究也有所改变，呈现出若干新的特点。这种改变和特点，可以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新闻出版物来认识。

（一）新闻学出版物内容分析

据林德海主编的《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统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87年底止，我国（不计台湾及港澳地区）共出版新闻学书籍983种，其中包括一部分内部出版物。这些书中，1949年到1976年共计308种，而1949年至1959年215种。换言之，在长达38年的983种新闻学书籍中，前27年只出版了308种，占38年出版总量的31.3%，后11年却占了总量的68.7%。而在27年出版的308种书籍中，前10年共出版215种，占27年总量的69.8%，后17年出版93种，占27年总量的30.2%。同我国1903年出版第一本新闻学著作至1949年9月，全国共出版新闻学著作468种，即每10年101种相比，新中国成立最初10年出版新闻学著作215种，显然比旧中国有很大发展。但后17年出版93种，平均每10年出版55种，比旧中国每10年101种、建国初10年125种和改革开放以后都要少得多，其原因在第八章中将作分析。

这是从数量上分析，下面再从内容上作分析。建国初10年215种新闻学著作，主要可分为八类：

一类以传播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为主题。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列宁论报刊》。这类书基本上是选编马、恩、列、斯等经典作家的新闻学论文，没有研究者直接的学术成果。

一类以普及新闻学知识为主题。如陈笑雨著的《新闻杂谈》，是一本真正的杂谈，作者就新闻报道中的批评和表扬，新闻报道中的问题，政治事件的报道，实际工作的报道，报纸要有声音等谈到新闻的"新"与"真实"，新闻写作的方言土语简字，新闻要用事实说话，记者要深入采访、熟谙事理等等。戈扬写的《新闻采访与写作》，共17章，从记者要有新闻嗅觉谈到新闻为何写不短。毛松友写的《新闻摄影》，从摄影技巧谈到记者采访，暗房洗印、摄影化学。

一类以总结和介绍新闻工作经验为主题，这方面的著作数量最多。如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宣传处编的《怎样办党报》，柯兰写的《怎样编写通

俗报刊》，四川农民报编辑部编的《怎样办农民报》，中共河南省鲁山县委宣传部写的《怎样办县报》，顾我先著的《怎样办厂报》，吴兴县文化馆编的《怎样办社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校报研究组编的《怎样办校报》，邵西编的《怎样办好黑板报》（这方面的书有15本之多），武广久著的《怎样办队室队报小画廊》，九台县文化馆编的《怎样办画廊报》，朱金贵著的《谈谈厂矿广播站工作》，陈海峰和朱金贵著的《怎样办农村有线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编的《怎样做一个广播收音员》，新湖南报社编的《怎样做一个工农通讯员》，东北人民出版社辑《我怎样当报纸通讯员》，南方日报编辑部编的《通讯员的思想和写作修养》，易征编著的《怎样搞好通讯工作》。

一类以传授新闻业务技巧为主题。如叶克写的《怎样写稿》，江新和戈风编的《怎样写新闻》，厉树仁等编著的《怎样给报纸写稿》（同样题目的书出版了好几本），长江日报总编室编的《人人要学会写新闻》，沈联清著的《怎样写特写》（同样题目的书也有好几本），惠伯和嘉平著的《怎样读报》（同类主题的书有七八本）。

一类是关于新闻学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如复旦大学新闻系写作教研室编的《采访·写作·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编辑教研室编《报纸编辑讲义》，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教研室编《社论范文选》，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编《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编《中国现代革命报刊史讲义》。

一类是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办报路线与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论文集。如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的《批判光明日报参考资料》、《批判文汇报的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关于研究新民报的材料》，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坚持社会主义办报路线肃清资产阶级办报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批判王中反动的新闻理论》，青海日报编辑部编《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译《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资料》，中共浙江省委宣传处辑《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新闻路线》。

一类是总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经验的论文或报告集。如邓拓著的《新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59年毕业班集体写作的《学习省报跃进经验》，全国文教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经验和事迹选编《文教战线红旗飘》，南方日报编辑部编的

《总路线的灯塔照耀着我们的报道工作》,四川农民日报编辑部编的《四川农民日报在一九五八》,闽南日报社编《大跃进中的闽南日报》。

还有一类,也是数量最大,达到48种之多的,翻译出版的苏联新闻学著作,这些著作占到新中国成立最初10年202种的24%。这些译作中,著名的有:萨丘柯夫和扎斯拉夫斯基著《布尔什维克报刊·资产阶级报刊》,人民出版社编《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诺维科夫著《报纸是党的有力武器》,北京大学新闻教学研究室译《苏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学教学大纲》,中国人民大学译《党和苏维埃报刊的理论与实践教学大纲》,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译《党和苏维埃报刊理论与实践的几个问题》,新闻总署办公厅译《联共(布)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选译》,人民出版社编《联共(布)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续编》,人民出版社编《联共(布)中央直属党校新闻班讲义汇编》及第二集,贝林斯基著《书刊编辑教学大纲》,沃尔契克著《报纸的图片》和《怎样处理报刊图片》,斯洛保加纽克著《苏共报刊史概要》,人民出版社译《联共(布)关于报刊书籍的决议》,特列齐雅柯娃著《论党对报刊的领导》,莫罗佐夫著《报纸上的批评与书刊评介》,萨奇洛夫著《报纸是教育军人的强有力武器》,库兹涅佐夫著《斯大林的〈斗争报〉》,别尔沙茨基著《苏联的区报纸》,冈察洛夫著《苏联地方报刊为提前完成五年计划而斗争》,舍比洛夫著《报刊为争取农业的进一步高涨而斗争》,穆雅科夫等著《苏联报刊的推广工作》,塔塔西等著《报刊发行工作的发运组织和技术》,谢多夫著《怎样组织报刊推广员》,人民出版社编《学习〈真理报〉的经验》,巴里古诺夫著《报纸新闻的基础:塔斯社和它的作用》,新华通讯社访问塔斯社代表团编《塔斯社工作经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与电视委员会科学方法研究部编《苏联广播与电视事业资料》。

除上述八类之外,这10年出版的新闻学著作还有新闻作品集、外国新闻传媒介绍和新闻工具书等。

(二)1949～1956年新闻学研究的特点

新中国最初10年的新闻学研究,基本上是由两部分组成的,1949～1956年前7年学术上相对自由一些,所以出版了一些新闻学基础知识、介绍西方国家新闻传媒的著作,大量的是译介苏联新闻传媒体制和运作经验的著作。由于1956年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新闻界尤其是新闻院系还展开了一些不同新闻学术观点的争鸣,个别学者发表了有独特学术见解的论文。后3年则主要是围绕着政治

运动转，先是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办报路线和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后是论证传媒为“三面红旗”摇旗呐喊的意义与经验，学术性与思维性都很差。

前7年的新闻学研究，大致表现出这样四个特点：

第一，注重新闻学知识的普及，研究性的成果贫乏。几本普及新闻学知识的著作中，大部分属于介绍新闻学ABC之类的作品，前面提到的《新闻杂谈》，其谈之杂，颇有代表性。一些介绍党报、报纸、广播的著作，也流于一般的科普知识传播，真正谈得上科学研究的东西，这一时期极少。译介苏联的新闻学作品，虽有苏联几十年新闻学研究的成果，于扩展我们的视野有益，但其僵化不变的研究方法和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内容，以及“语录注疏”的成果形式，也害了我们不少研究人员。

第二，注重实用性知识的传授，基础性学理的探讨不够。从前面提及的著作可以发现，这一阶段以“怎样”命题的作品很多，意在向新闻界传授新闻采、写、编、评及发行管理等技艺，而对于新闻传媒的性质、特点、功能，新闻事业同社会政治经济诸因素的关系，新闻传播运作的基本规律的研究很少，这方面的著作几乎一本都找不到。

第三，注重苏联新闻学著作的译介出版，对其他国家的新闻学著作关注极少。这7年中，对苏联党和政府主管的新闻传媒，尤其是报纸、通讯社、广播事业，对苏联党和政府调控新闻传媒的政策与方法，对苏联新闻界采、写、编、评、摄、播、发行、印刷等方法技艺，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著作很多，而其他国家则极少。拿业务部分说，这7年中出版苏联新闻传媒工作方法的书籍共18本，而介绍其他国家传媒的只有印度1种、英国1种和美国1种。排山倒海似地向中国传播苏联的经验，是这一时期一个明显的特点。

第四，低学术层次重复出版的新闻学著作多，有特色的刻意研究的学术成果少。这7年中，许多著作流于低学术层面的重复操作，如前已提及的，谈怎样办黑板报的书即达15种，怎样读报的达8种，怎样给报纸写稿的也有好几种。这一方面说明我国解放初期，新闻事业发展水平还很低，另一方面也说明，包括新闻学研究在内的国民文化水准也不高。除了刘少奇等有许多创新意识的新闻学论文外，真正有学术水准的科研成果可以说凤毛麟角。在这一方面，值得赞赏和令人敬佩的，是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教授的新闻学研究成果。

三、王中之《新闻学原理大纲》

1956年，是思想解放年，也是新闻改革年。这一年，党中央提出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这一方针，毛泽东后来有一个很明确的阐述。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①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是努力在党内外的社会生活和学术活动中贯彻"双百"方针的。这里举一个例子可作佐证。1956 年初，一位在中国讲学的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论点的不同看法，此事我方认为是件了不起的大事，一直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于 1956 年 2 月 19 日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伯达、陆定一写信，指出：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

---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388～389 页。

（时任苏驻华大使）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①]

正是在中央的“双百方针”和毛泽东的这种自由讨论之风鼓励下，新闻界开始有人提出自己对于新闻传播原理的一些看法，开始突破传统党报理论的某些固有观点和苏联新闻理论与实践的模式。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是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教授。

王中1940年起先后担任山东滨海区《农民报》、《鲁中日报》、《大众日报》、新华社山东总分社等传媒领导，调入复旦大学工作后，于1952至1957年、1979至1983年两度出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1957年7至8月间，王中率领新闻系部分教师赴无锡、南京、济南、青岛等地考察和探讨新闻改革的经验与问题，应邀在一些新闻单位发表学术演讲。同年9月，撰写《新闻学原理大纲》，并就新闻改革继续发表自己的见解。可惜，由于次年他被错划为“右派”而无法使自己的新闻观点公开出版。1979年平反之后，他公开发表《论新闻》、《论传播工具》、《论宣传》、《谈谈新闻学的科学研究》等许多富有真知灼见的新闻学论文，使自己的新闻思想逐渐趋于系统化、深刻化。

王中拟定的《新闻学原理大纲》共18章，各章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章　绪论。新闻学的形成与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新闻学的基本内容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内容；新闻学在科学的地位及其趋向。

第二章　新闻事业产生的社会条件。资本主义社会以前未能产生现代报刊的原因；现代报刊的形成与发展，现代报刊的特征及职能；报刊演革的基本规律；社会主义报刊的社会基础。

第三章　政党与报刊，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原则。政党的性质及其活动的特征；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各种宣传武器的特性；共产党宣传鼓动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的文风；无产阶级报刊对资产阶级报刊的继承、改造与否定。

第四章　共产党及其他革命报刊的基本原则。世界无产阶级报刊的先驱；中国无产阶级报刊的形成；无产阶级报刊的职能；党报的两重性。

第五章　中国报刊。总论，各种报刊发行的原则；通讯社的职能；

---

① 毛泽东：《致刘少奇、周恩来等》（1956.2.19），《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0页。

广播事业及电视；新闻画刊；杂志；书籍出版；各种出版物的相互关系。

第六章 新闻自由问题。新闻自由的产生与发展；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实质；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闻自由。

第七章 出版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法，新闻法规的基本内容、实质；我国对新闻事业的基本政策及若干有关条例。

第八章 报刊文章体裁。文体总论；消息的性能及写法；通讯的性能及写法；描写文的种类、性能及写法；讽刺故事与讽刺散文，评论文；图片。

第九章 报纸群众工作。无产阶级报刊与资产阶级报刊的区别；革命报刊群众工作的历史；通讯工作；读者服务、来信来稿；报纸群众工作发展趋向。

第十章 采访工作。记者的作用；采访。

第十一章 编辑工作。编辑的沿革；编辑的任务；处理材料的原则；报道计划制定的原则；版面组织；文字修饰、改写与综合；标题；资料的应用；副刊编辑；检查；校对。

第十二章 资料工作。资料的重要；资料的建设；资料的应用。

第十三章 出版与印刷。报纸生产过程；印刷技术；编辑与印刷。

第十四章 发行。发行工作的历史；邮发合一的研究；厂矿企业的发行工作；编辑部与发行工作的关系。

第十五章 广告。社会主义报刊与资产阶级报刊的区别之一；广告的积极作用；刊登广告的原则与广告设计；广告收费计算原则。

第十六章 读者调查。读者调查是不断改进报纸的基本保证；适用读者要求的原则，读者调查的方法；正确地科学地研究读者意见。

第十七章 报社组织机构与制度。报社组织机构的演变及其原因；报社组织机构建立的原则；集体领导制度原则；现在报社组织存在问题的研究。

第十八章 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研究。资本主义国家新闻教育事业状况；中国新闻教育的历史；当前中国培养新闻干部的制度；新闻干部培养目标；新闻干部培养方法。

《新闻大学》1993年秋季号发表了由姚福申教授整理的王中教授新闻学观点集粹，这里摘其要者作为对王中新闻观点的归纳。

（一）办报要根据读者需要

王中指出，报纸要根据读者需要来办，这是办好报纸的根本问题。

离开了读者的需要，只把报纸当作党的宣传武器，不把它当成读者要花五分钱购买的一种商品，报纸必然不会受读者欢迎的。

王中认为，办报人并不是因为自己看报才办报，而是因为别人需要才办报的。而办报人所追求的则是利润或政治目的。一份报纸，只有当它能满足人们某一方面的需要，人们愿意读它、买它，那么办报人的目的才能达到。你想通过办报来赚钱，必须有销路，才能有钱可赚；你想通过它来宣传某一政治主张，只有人们读了，才会产生影响。……这虽则是起码的常识，但有些人却偏偏忘了这样常识。像“四人帮”办报就是这样，他们不管人们要不要读，不管人们的反感和厌恶，只要报纸印出来就是“辉煌胜利”。

王中说，新闻的定义是什么，对人们无关紧要，人们决不会按照新闻定义去获取新闻，他们也不会把自己的新闻活动局限在读报纸上。他们只有一个信条：获取与己有关的新闻。如果新闻机构发布的新闻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没有不透风的墙”，大道不传小道传。谁能取消、禁止得住？

王中指出，强调读者共同兴趣是否会背弃无产阶级政治？一桌筵席必须分成若干道菜，研究问题也是这样，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谈。“性质说”和“新闻价值说”都是解决什么样的事实读者爱看，而什么样的事实对谁有利，则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我们不能把新闻价值当作应有尽有的饺子馅，把什么东西都剁成菜馅吧！有的同志念念不忘阶级政治、政策，他们似乎只会吃饺子，每一口都要吞到一点政治才舒服。其实，所谓共同兴趣并不排斥政治。一个国家内发生的重大政治变动，有关国计民生的政策都是具有重大新闻价值的事实。不论你喜欢不喜欢，人民都是关心的。对此关心，就是对此有兴趣。我们的土改政策，地主分子都曾仔细推敲研究，我们的俘虏政策，敌军也很关心。当然，关心不等于拥护，只是说这些事实关系到许多人的切身利或害，因而报纸登出来，就会有人看。

（二）报纸的两重性

王中认为报纸有两重性：一重是宣传工具，一重是商品，而且是在商品性的基础上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商品就是要使人买后有用，改进报纸工作，主要是解决如何把报纸变成为群众所需要的东西。报纸先要为群众所喜爱，然后才能发挥指导作用。

王中认为，最初的报纸是作为商品出现的。有了印刷机、交通发达等条件，才产生了报纸。在政党产生前就产生了报纸，政党产生后，才把商品的报纸作为自己的工具，即是在商品的基础上政党夺取了报纸作为自己的工具。法国革命时，不是任何政党都有报纸的。商品性并不是坏东西，商品性并不排斥指导性。

王中指出，报纸是不是商品呢？政治经济学以及经济学家都是肯定了的。高教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说："有些商品是满足人的胃口需要，如面包；有些商品是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如书籍。"这就是说，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是真理，报纸是"商品"也是真理。两者并不互相排斥，而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一个是从办报的目的提出的，一个是从经济学角度提出的。

（三）新闻事业与阶级性

王中指出，所谓社会产物是指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人和周围的制约关系紧密到一定程度，就迫切需要了解周围事变，随着这种需要的强度与广度，决定新闻事业的产生。所谓阶级斗争的产物，则意味着凡有阶级斗争就有新闻事业，凡阶级斗争消灭，新闻事业也随之消灭。新闻事业完全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意味着只是为了阶级斗争别无其他。……无产阶级报纸是起源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政党运用了社会已形成的定期出版物。新闻事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因为社会需要新闻，因此各种不同的党派才可能把自己的观点和政治目的通过新闻影响读者。新闻事业是社会产物包括了新闻是阶级斗争工具的含义，但只说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则失掉了所以能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理论基础。

王中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观念是对事实的一种看法。新闻不是对事实的看法，而是对事实的反映。……那么新闻和意识形态有什么关系呢？当人们在反映事实时，可以用一定的观点，诸如政治观点、道德观点、哲学观点，来分析事实，并把这种观点结合事实来写新闻。事实上附着政治观念，就可列入政治思想这种意识形态，附着道德观念，就可列入道德这种意识形态，余此类推。凡附上一定观念的新闻均可分别纳入上述七种意识形态中的一种。但是只有特定形式的观念，没有事实，那不能构成新闻，只能是评论或学术论文。然而，没有观念，只有事实的新闻却是存在的。在有一定观念的新闻中，新闻中的事实和观念是可以分离的，它不像意识形态那样，去掉了观念，什么也没

有了。在新闻中,读者可以去掉观点,留下事实。就是因为这个特点,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可以从带有鲜明的资产阶级观点的新闻中,获取有用的材料。在解放前夕的渣滓洞国民党集中营中,我地下党员完全从国民党报纸上所刊载的新闻中,编写共产党的《挺进报》。

（四）论宣传

王中指出,宣传的目的在于使你产生一种信仰,接受我的政治主张,跟着我走,而不是裹胁入伙。新闻并不使人深刻理解到党的主义,新闻发布人提供事实,即令加上自己的观点立场,还是不能完全控制每个人的行动的。打倒"四人帮"的消息一传开,有人欢呼,游行庆祝,有人要跳楼自杀,有人安排潜伏等等。各类人都关注这件新闻,不过"四人帮"分子叫做"右派政变",革命人民叫做"一举粉碎"。当然,新闻和宣传不能等同,但也不是无关的。政党可以利用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新闻来证明自己某种主义、理论、政策的正确,把人们鼓动起来,例如"七七"事变发生了,报纸刊登这方面新闻,把民众鼓动起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奋起抗日。……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是:新闻并不全部是政治宣传,并不是所有新闻都为政党的政治目的服务,我们报道天气、疾病、奇闻异事、人体特异功能等等新闻,这跟"主义"并无多大关系,纯粹是为了满足读者某一方面的需要。

王中说,政党的宣传包括极其复杂的对象和目的,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内容和方法。不了解这一点,政党的宣传就会失败。

王中还指出,我们必须懂得宣传对象是个活人,是有一定生活经验,有思维能力,有自身利益要求的人,不要把他们当作木头人,西方的"传学"50年代盛行过"魔弹说",认为只要你一宣传,就像魔弹一样立即把对象击倒,全盘接受,这种学说实践证明行不通,不久就抛弃了。而"四人帮"则把宣传对象当作垃圾箱一样,往那里倒了10年垃圾,结果以惨败告终。

（五）改进党报工作

王中指出,我们有些报纸的改进,大都根据党委指示或批评后,就来一下改进,很少经常听取读者意见来改进报纸。报纸是办给读者看的,人们要花五分钱才能看到报纸,人们出钱买的是商品,商品就应该为人民服务,但我们往往对读者群众的意见不够重视。最近各报根据中央指示,在酝酿改进,实际上,中央指示的意见,早在半年乃至一年以

前，读者早就写信向报社提出了。报纸工作者习惯于讲办报要有群众观念，而报纸工作的群众观念，首先就是"读者观念"。当你写稿、做标题、安排版面，你都要首先为读者着想。读者究竟在想些什么呢？这就需要做好读者意见的调查工作。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很注意这个工作，他们有专人调查研究读者心理；我们要做好报纸宣传工作，也必须如此。

王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也要依靠新闻事业来辅助。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充分地发扬民主，充分地使每一个社会主义的成员，行使他的批评和监督的权利，他也需要了解，受人民所委托的行政机构、办事机构的工作状况。所以，随着社会主义的民主逐步发展，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是越来越大。①

---

① 姚福申：《王中教授新闻学论点集粹》，分别摘自王中论文：《办报人要有读者观念》、《论传播工具》、《论新闻》、《论宣传》、《新闻学的第二课题》、《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和报纸的职能》、《1957 年 2 月 21 日在上海市委宣传部报纸座谈会上的发言》、《论评论文写作和新闻学上的几个问题》、《论新闻事业的阶级性》，参见《新闻大学》1993 年秋季号，第 7～12 页。

第八章

政治运动与新闻学研究的畸变

从 1957 年反右派运动开始，至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对中国新闻学术界来说，多的是寒风凛冽的严冬，少有阳光明媚的春天。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重压下，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从总体上呈现停顿、倒退、畸变的状态。1966 年至 1976 年 10 年，简直可以称为“新闻理论研究的黑暗时期”。总结和吸收这 20 年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新闻学研究来说，不能不视为一笔难得的宝贵学术财富。而且，总结和清算这一时期新闻传播和新闻学研究的严重教训，比梳理同一时期的成绩和经验，要重要得多，意义也深刻得多。

第一节　极左思潮与新闻导向

一、极左思潮欲罢难休

从 1957 年春末开始，对于中国公众来说，政治气候已是“晴转多云”。作为政治建构神经的中国新闻界，已经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凉风阵阵，乌云密布了。

1957 年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不幸，由于党的指导方针严重失误，反右斗争被极不应该、极其令人心痛地扩大化了。

其实，早在前几年的几次批判事件中，已经可以依稀地看到这条严重失误的指导方针的影子了。

首先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部电影所宣扬的主题和倾向应否批判尚且不论，但这次批判采用政治运动的形式无疑是错误的，批判者在《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评指摘一系列有关文章和作者（据说至少

有43篇文章和48位作者),把其错误上升到反对土改、反对镇压反革命、破坏抗美援朝的"政治高度",由此开了以政治斗争解决意识形态领域是非问题的先例。

其次,是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这次批判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批判俞平伯研究《红楼梦》中的反现实主义文艺观和资产阶级唯心论。第二个阶段,由对俞平伯的批判扩大到对胡适及其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从文艺领域扩大到各个学术领域。这次批判的教训是,用开展政治运动的方式批判一种学术研究中的错误观点和错误的研究方法,不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还会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这种方式也难以避免简单粗暴和在政治上无限上纲、扣大帽子以至把人一棍子打死的做法,这对于像俞平伯这样的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知识分子是不公正的,也不利于团结广大知识分子。这次批判助长了只有批评的自由没有反批评的自由的不平等和不民主的学术风气,也使社会上的人际关系、特别是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影响了党和政府在知识分子中的形象。

第三次批判事件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胡风文艺思想体系渊源复杂,他既受过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影响,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比如,他主张作家要尊重和掌握文艺规律,注重创作实践,反对创作中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倾向,强调写真实,反对题材决定论等,都是针对我们文艺工作和作家创作实践中的问题而提出的很有见地的好意见,但也有一些错误的言论和文艺主张,对这些言论和文艺主张可以在适当的范围、运用适当的方法进行同志式的批评、论争,以达到既弄清是非又帮助同志的目的。但当时采取了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发表了为数众多的批判文章,并无限上纲。后来,还把他同他人来往信件中的某些言论,以及讨论文艺问题的一些不同见解,没有分析地说成是反革命言论和反革命活动,以此为"依据"将胡风等人打成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集团。毛泽东亲自动笔,为《人民日报》公布所谓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撰写序言和按语,使此次批判最后酿成新中国成立初期最大的政治错案。

上述共和国初期的三次全国范围的大批判,无一例外地都采取了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无一例外地都对属于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理论是非问题的人物进行无限的上纲上线,无一例外地都背离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无一例外地助长了批评和论战中的不民主风气和不平等作法,无一例外地通过新闻传媒编发社论、新闻、文章搞舆论倾泻,制造一边倒的新闻舆论态势。

出现这样的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十分清楚的是,"左"的思潮逐渐侵入我们党的某些领导人的指导思想和决策过程已经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事实,随着批判规模的扩大、上纲调门的升格和"帽子"规格的增大,这种"左"的思潮日益强化,对于党的指导思想的干扰不断扩大,新闻传媒越来越深地陷入这种政治斗争也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

二、新闻导向和政治"阳谋"

由于新闻界在整风鸣放、反右斗争中的特殊作用,加上当时对知识分子和新闻界人士的一些不公正评价,致使新闻界在运动中成为最早受到触及和冲击的对象。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副总编辑胡绩伟、王揖、林淡秋等,严厉批评说,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会议已经开过一个月,共产党的会议没有声音。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多半是同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

毛泽东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毛泽东于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报告,《人民日报》的报道中没有引述。3月12日毛泽东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人民日报》没有发消息。作为党的喉舌来说,《人民日报》显然是失职的。

《人民日报》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也有个中不便和苦衷。当时中央的新闻宣传纪律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毛泽东的讲话没有公开发表前不得引用。因此,也可以说,《人民日报》出现这些问题(抑或说是错误),说明这种新闻宣传纪律规定有不妥之处,应加以适当的调整和改变。毛泽东把板子全打在《人民日报》的屁股上,是不客观和不公平的。特别是那些说《人民日报》反对中央的方针的批评,全社上下都觉得言之过重,吃罪不起,有一种"惶惶然"。

现在看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发那么大的火,斥责之言如泰山压顶,主要在于他对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分析,他觉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已经犹如"黑云压城城欲摧",不反击他们怎么行。实际上,正是他对国内外阶级斗争态势和"阶级敌人"的布局错

误估计导致了反右斗争扩大化，连《人民日报》都被他看成"闹鬼"的地方，所以他要从《人民日报》"抓鬼"做起，把新闻界这个"鬼国"打得落花流水。

毛泽东把报社看作"闹鬼"的地方，也正是他一段时间对文化界、知识界，特别是对新闻界最持偏见的一种具体的、突出的表现。公正地说，毛泽东对报纸的作用和力量是很看重的，他对报纸的驾驭也相当老练和有效，但他同时也一再说办报的唯心论最多，新闻界最易出修正主义，他几次鼓动要造报社的反，强调把斗争矛头对准报社，对准新闻界。从这一点看，后来搞反右扩大化，先对报社和新闻界开刀，也是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要到新闻界"捉鬼"已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一方面，他把报纸作为实施"阳谋"的工具，利用报纸实行所谓"引蛇出洞"和"钓鱼"的策略，另一方面，对于新闻界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先"引"后"钓"。这里且以《文汇报》为例。

1957年3月，《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率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出访苏联，行前毛泽东接见代表团时对徐说了一番颇为赞赏的话：你们《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松竹菊，花鸟鱼虫，应有尽有，真是不错！我下午起床，必先找你们报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工夫翻翻其他报纸。当徐铸成请教毛泽东如何掌握"双百"方针时，毛泽东回答，如何掌握，还是从打仗中学习打仗。他还说，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有的。他问徐铸成宣传"双百"方针还有什么具体困难，徐铸成说，我体会"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政治意义上是高价征求批评，让人民畅所欲言。当说得不对时，不要一下压下去，我认为这样才能征得批评。毛泽东听后说，你的意见很对，很好。[1] 后来徐铸成出国，在此期间国内开展了大鸣大放，编辑部负责人几乎天天接到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指示，要《文汇报》加温再加温。结果，《文汇报》这条"大鱼"、"毒蛇"被钓了上来，引出洞来。

北京的两次新闻工作座谈会的情况也大致如此。第一次于1957年5月16日到18日由全国记协研究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联合召开。从上海、辽宁、山西等地邀请不少人发

---

[1] 参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86～194页。徐铸成：《报海忆旧》中关于鸣放整风一节的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言，对党的新闻政策及新闻学基本理论问题发表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其中自然也免不了有失偏颇和过激的言论。后来这次会议被说成是“提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的大会。第二次会议于36天后召开，对邀请来的人所发表的所谓“反动意见”进行反击，“否定之否定”。这两次会议使用的也是“阳谋”，引而不发，聚而歼之。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教授便是被这样钓上来的“一条大鱼”。

在毛泽东制定的新闻政策和斗争策略的指导下，这一阶段全国新闻界普遍施展了“阳谋”。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的给党内的指示中要求：在一个时期内，党报正面文章少登；高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他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强调，在一个时期内只登错误意见，“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①

事实证明，通过报纸“钓鱼”，借助新闻传媒“引蛇出洞”，并非一点收获没有。运用“阳谋”，确实钓到若干“大鱼”，逮到若干“毒蛇”。诚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言，在整风过程中，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

然而，事实也表明，“阳谋”的实施，所付出的代价也委实太大。仅以新闻媒介而言，既动员和组织人家鸣放，又抓住几许辫子不放穷追不舍；既以一级党委之威要求报纸加温又加温，却又说别人蓄意进攻；既不远千里特邀作为专家发表高论，又以言治罪且不容分辩，试问，今后新闻传媒何以取信于民？以何再鼓动人民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以何再塑人民代言人的职业形象和人民融洽相处？一位记者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造访当年因报刊言论获罪而当了多年右派的一位老者，老夫人极其冷淡地让记者吃了“闭门羹”，并留下一句话：“你们让他过几年舒心日子吧，当年你们让他撰写文章，成了右派，如今还想叫他再当右派吗？”反右之后报社群众来信来稿之少，也是一个佐证。

新闻传媒作为“阳谋”的工具，自己也没有能够逃脱“阳谋”的惩罚。据了解，新闻工作者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远多于一般党政机关；编

①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写鸣放稿件积极的记者编辑、编辑批评专栏和小品文等一类专栏的，相当多的人没能逃脱右派的厄运。

平心而论，造成反右扩大化严重错误的，其中也有新闻界的一份责任。但在反右斗争的全过程中，新闻界的情况十分复杂。有的是一开始就被揪被斗，如《文汇报》、《光明日报》；有的是在高压之下不得不为之，如被说成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的《人民日报》；还有的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党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相信真有那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兴风作浪。尽管出发点不同，动机和目的不同，全国绝大多数新闻传媒，都程度不同地做了不少助长反右扩大化之风的令人心痛的事。

三、大跃进和反右倾中的新闻界

(一) 为“三面红旗”大造舆论

从 1958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到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整整 20 年，我国的经济建设，几乎都是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引下进行的。这条总路线的实质是追求高速度。

毋庸置疑，高速度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然而，现实又是无情的。落后的经济文化和民族素质又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建设的步伐，不可能为经济建设的高速度提供必需的条件。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告诉我们，经济建设的速度不可能太高。

党和人民面临着两难选择！

有的领导人的逻辑是：右派的进攻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巩固，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必须加快建设速度；“匈牙利事件”的发生，说明社会主义要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两方面加以巩固，也要有一个高速度；台湾海峡紧张局势也表明美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不加快建设速度怎么行？高速度不仅必须力争，而且可以实现，他们认为：我国一穷二白，人民迫切要求革命，要求改变落后状况，这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力量，可以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完全可以实现高速度。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基本情况认识不足，由于党和政府的一些领导人在解放后最初 7 年工作胜利的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力求高速度的口号下，使得以

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我国新闻界在这些运动中扮演了一个令人注目的角色。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是一支热爱党、忠于党的可爱而可敬的队伍。1957年反右斗争后,新闻界开办了一系列新闻学校和夜大学,开始反思几年来的所作所为和扎扎实实的学习马列的活动。同样,根据对反右斗争的思考,中央和各地党委也强化了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所以,无论是新闻工作者还是各地党委,经过学习和整顿,都没有消极,没有彷徨,而是重新振作精神,以高昂情绪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和经济建设。毛泽东在1958年1月12日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无疑给了各级党委和全国新闻工作者莫大的鼓舞,成了新闻界大跃进的强大推动力。这年年初,毛主席表扬了《人民日报》,指出现在大家对报纸的反映比较好,报纸有进步,新闻、评论都有进步,但还要改进,不要满足。接着又对报纸的评论和记者工作,向地方学习的问题,作了正确而亲切的指示。这一年,毛泽东多次对报纸工作发表指示,这对报纸以及广播、通讯社和这年刚刚问世的电视工作在全国贯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精神,是号令,又是战鼓。

上述事实表明,在1958年追求过快速度的日子里,新闻界头脑发热,推波助澜,有着复杂的主客观原因。这样认识,才能理解并接受后来刘少奇对新闻界的一系列批评和责备。

这里无需举许多例子说明新闻传媒在大跃进中所起的恶劣作用,刘少奇后来说,这一时期的工作,是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领导一半。1961年4、5月间,刘少奇三次谈到报纸宣传工作,谈到大跃进时期的教训,也对中央的新闻政策作了若干反思。这些意见是坦率的,直接的,对当时和目前的新闻宣传都很有意义,我们将这些意见作些梳理,权作对大跃进时期报纸宣传的一些总结和批评。

刘少奇说,《人民日报》应该好好总结一下三年来办报的经验。三年来,报纸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宣传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对实际工作造成很大恶果。他的批评是非常尖锐的,但丝毫没有夸大这几年新闻传媒的错误和缺点。他的批评点到了问题的要害:"这几年,你们喜欢搞表面现象,搞形式主义的东西,搞耸人听闻的报道,还没有完全摆脱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影响。"这是指记者思想上犯错误的原因,同时也谈到了组

织上的原因："这几年你们比较注意服从党委领导，强调依靠党委办报，但又完全依赖地方党委，自己不作调查研究工作，也不敢反映问题，不敢提出意见。"①

历史已经证明，刘少奇的这些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他对大跃进时期的新闻宣传作了马克思主义的总结，这是对新闻界的批评，也是党中央的自我批评；是对新闻工作者的责备，也是对他们的关怀和爱护。生活往往不公正，刘少奇的这些语重心长的教诲和深刻的理论总结，很快被束之高阁，冷落起来，不久又被视作"修正主义黑货"受到了鞭挞和批判。

正是从 1957 年开始，毛泽东提出的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开始成为中国新闻学的立论之本，成为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最基本的指导原则。经过 1958 年大跃进运动中的实际运用，特别是在"反冒进"斗争中的实践，阶级斗争工具论业已全面形成。从此，报纸、广播和 1958 年问世的中国电视，俨然成了党领导下的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而 1958 年中恶性膨胀的"假、大、空"新闻作风则成了这种工具的一个特色。无疑，这是中国新闻事业的悲哀。

（二）反右倾前后的初步反思

1958 年秋天，毛泽东到河北、河南等地农村巡视，看到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影响下的许多混乱现象，受到很大的触动。这一年冬天至次年 7 月，毛泽东和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

出于对新闻传播工作的重视和关心，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对新闻界有过几次重要指示。1958 年 11 月，他指出，做报纸工作的，做记者工作的，对遇到的问题要有分析，要有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态度。讲到瞒产和虚报时，毛泽东认为，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所以，他要求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他还要求记者必须善于比较，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如果别人说全好，那你就问一问：是不是全好？如果别人说全坏，那你就问一问：一点好处没有么？毛主席特别告诫：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他规劝记者：这

① 刘少奇：《关于人民日报工作的谈话》，北京新闻学会编《刘少奇同志关于新闻工作的几次谈话》。

种思想方法，首先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北京的编辑部要有。不要人家讲什么，就宣传什么，要经过考虑。他说，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头脑要清楚，要冷静。1959年6月，毛泽东看了新华社关于广东水灾的内部参考材料，提笔给胡乔木、吴冷西写下如下的批示："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①

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几次谈到，我们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几次批评有些干部和新闻记者"头脑发胀"，不尊重经济工作规律，讲假话。1959年4月29日，他给省、地、县、社、队(即后来的生产大队)、小队(即后来的生产队)六级干部写信，其中第6个问题重点讲到不该讲假话的问题。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毛泽东还对1958年大跃进以后部分地区、干部头脑发热时讲了假话表示理解和谅解，他说："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他呼吁各级干部："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②

在毛泽东和中央的这种正确指导思想下，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对于大跃进中的高指标、高速度、"放卫星"的宣传报道开始降温，记者的头脑也开始冷静，不再像几个月之前那样，"高音喇叭高调门"了。但是，从党中央到各级机关，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左"的错误的严重性，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以追求高速度为实质的总路线这"三面红旗"，是基本上肯定的，所以，这一阶段的所谓"纠偏"、"纠左"是局部的，效果也是轻微的。正因为这个根本性的"左"的路线没有得到清算，等到1959年8月庐山会议，当彭德怀等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表示一些不同看法，提出一些轻微批评，立即遭到毛泽东的坚决抵制，并组织对彭等展开了无情的批判，八届八中全会后，又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

① 毛泽东：《如实报道灾情》，《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11页。
② 毛泽东：《假话一定不可讲》，《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13页。

反右倾斗争基本上是在党内展开的，新闻传媒公开报道不多。在当时的一些党内主要负责人看来，“右倾”在广大干部思想上的表现，主要是：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缺少认识，没有充分看到成绩，夸大了缺点和错误，对高指标和高速度有抵触情绪。因此，赋予新闻传媒“反右倾”的主要任务，除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言论，就是大力宣传“三面红旗”的“伟大成就”，继续鼓吹高速度、大跃进。

在这样的新闻政策指导下，毛泽东从 1958 年冬天到 1959 年春天对新闻传播工作的某些调整，大跃进宣传的某些降温，统统都冲跑了。这一阶段，是新闻工作最困难的时期之一。明明 1958 年的浮夸报道已造成严重恶果，但迫于政治压力又不能不反右倾，继续搞浮夸报道；明明各项工作、各条战线存在着大量的缺点错误，却又不得不报喜不报忧，继续制造“持续跃进”的假象。所以，在 1959 年，四川、河南、湖南等省委，以及不少新闻单位都先后围绕新闻宣传中的疑问和困难开过讨论会，进行过议论和研究。1960 年，人民日报编委扩大会议曾围绕当时的新闻宣传问题讨论过，提出关于人民公社化宣传，共产风和浮夸风还是应该反对的，不过要注意从正面宣传，多登好人好事，不要暴露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种做法，较为典型地反映出当时新闻界的矛盾心态。这年冬天，分管农业的谭震林对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同志说，主要的大量的是进行正面宣传，但也要把困难和问题适当讲一讲，九分宣传好的，一分宣传困难。五风中的瞎指挥风可适当批评，其他四风不公开说。宣传报道要实事求是，要留有余地。不报道最好的，拔尖的，那是少数，要报道第二流的。要贯彻两点论精神，不要把话说得太绝对。谭震林的这些指示清楚地表明，以往的新闻宣传不改弦更张是显然不行的。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只报喜不报忧只讲成绩不讲缺点，实在不行了，形势强迫着人们走向改革。

新闻界的这些看法和谭震林的这些意见，我们可以看作是对大跃进和反右倾时期新闻宣传的一些初步的反思。

第二节 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发展及其评价

一、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发展

什么是毛泽东新闻思想，人们有几种界定。笔者认为，毛泽东新闻

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闻传播的观点与学说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领袖和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伟大指挥者和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权威领导人，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有了比以往更为优越的条件与广阔的天地建构自己的新闻思想。从建国前后党的新闻政策的制定，到一系列传媒方针的确定，从新闻导向的取舍，到报道战役的指挥，从办报原则的定夺，到重大新闻观念是非的评判，都使毛泽东新闻思想在各个方面把自己推向前进。加上他的刻苦读书、勤奋命笔和长于思索，从而使毛泽东的新闻思想更趋丰满与成熟。

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主要内容是：

（一）报纸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

毛泽东根据人的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的原理，认为报纸属于意识形态范围，是一种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在资本主义国家，报纸则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报刊是人类作为主体对社会存在——客体——的反映。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报刊是运用新闻手段反映社会经济的产物。就社会结构和社会活动（主要是经济活动）来说，毛泽东对报刊本质属性的分析，似乎更加深刻，更加具体，也更能说明现代条件下的报刊及其特征。

毛泽东基于对报刊本质属性的上述分析，曾正确地指出，首先，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要围绕着经济工作这一中心，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其次，在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在资本主义国家，通讯社报纸和广播电台，由它们的经济基础所决定，都毫无疑问地具有阶级性，是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二）报纸的作用：迅速广泛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出自对上层建筑作用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十分重视报纸的社会功能。

毛主席高度评价报纸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指出："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

幸福。"①为此，他提出报刊宣传应注重研究实事和真理，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

毛主席视报刊为革命之手段，把报刊称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出于两方面考虑，其一，认为报刊可以扩大群众的视野，增长人们的见识。其二，毛泽东认为可以利用报刊做为自己组织和领导工作的极为重要的工具，特别是利用报刊传达政策和政令。他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因此，办好报纸，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

传达政令和宣传政策，是毛泽东一再强调指出的报刊的主要社会功能。他将省报的作用经典地概括为"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五个方面，其核心仍然是传播党的政策，通过宣传政策来组织群众，推动斗争和工作。

(三)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

毛泽东根据群众路线的精神，提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这就是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方针。②

这个方针的要旨，其一，是动员和组织各级党的组织和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积极关心和参加报刊工作，切实地、有力地加强党对报刊的领导。

毛泽东要求，党组织对报刊工作的领导，必须是通过党委会的集体领导，"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③毛泽东强调党委领导干部要带头为报刊撰写文章，要求党委书记、宣传部长、秘书长参加社论以及文章写作，第一书记要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

其二，毛泽东提出的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方针旨在实行"开门办

① 毛泽东：《〈政治周报〉发刊理由》，《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② 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页。

③ 毛泽东：《关于健全党委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0～1341页。

报”，面向群众，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他指出，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任何人都不会是全智全能的。因此，党委领导和报纸工作者一定要真心实意地依靠群众。他同时要求广大群众踊跃地投入到办报行列中来，常常提出意见，写短文短信，表示欢喜什么，不欢喜什么。

其三，群众办报、全党办报的方针还包括这样的旨意，即办报人员要有群众观点，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毛泽东指出，一切从事宣传工作和报纸工作的人员，要常常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的，给什么人听的，“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从事报刊工作的人，心里要想着群众，为他们的福利服务，也为教育和组织群众服务。

报纸工作本身，也要走群众路线。毛泽东举例说，报上常常有错字，如果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报上有了错字，就把全报社的人员集合起来，不讲别的，专讲这件事，讲清楚错误的情况，发生错误的原因，消灭错误的办法，要大家认真注意。这样讲上三次五次，一定能使错误得到纠正。小事如此，大事也是如此。

（四）舆论一律又不一律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出版自由的观点，可以用“舆论一律”和“舆论不一律”来概括。

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提出，必须剥夺反动派的出版自由。包括：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接收属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地方系统下的各机关、各反动党派（如国民党各个反动派系、青年党、民社党等）及反动军队的各组织所出版和发行的报纸，接收他们的通讯社和电台。毛泽东把只许反动分子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的这种政策形象地叫作“舆论一律”，而且指出，这种“一律”，不仅指舆论，而且包括法律。这种“一律”体现了“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①

在人民内部，实行舆论不一律的方针。这个方针提出了人民群众应该享有充分的出版自由权利，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包括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两方面的思想。毛泽东指出，所谓“不一律，就是批

① 毛泽东：《驳“舆论一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58页。

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就是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

毛泽东指出，人民内部实行舆论不一律的方针，是由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缺点错误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而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则是合法的行为。在外部，放纵反革命乱说乱动是犯罪的行为，而专政是合法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正相反，那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不许革命人民乱说乱动，只叫他们规规矩矩。”①

毛泽东把这种舆论不一律的方针，又称为“放”的方针。他指出，所谓“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大家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所谓“放”，就是在文艺和学术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谓“放”，就是对于错误意见，不是压服，而是采取说服教育和以理服人的办法，不搞“一棍子打死”。

(五) 报刊宣传的策略和艺术

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进行报刊宣传，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毛泽东要求报刊工作者“迈开两脚”，学孔夫子的“每事问”，扎扎实实地做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没有资格从事报刊工作。因为不了解敌友我三方的状况，就无法正确地决定我们的宣传政策，无法写出有针对性的文章。他对一切宣传工作者提出的口号是：“注重调查！反对瞎说！”②

毛泽东要求向人民群众作真实的报道，不仅充分地报道我们的成就，而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③，天灾人祸，

① 毛泽东：《驳“舆论一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58页。

②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7页。

③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5页。

如实报道。他提出，新闻要不要新？当然要新。现在新闻太少、太严、太不自由，不好，要改。不要把党的政策保密起来，应尽可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同时又要注意，新闻不要守旧，也不要赶时髦。新闻有新闻、旧闻、不闻。

毛泽东强调新闻要注重事实，“力戒空谈”。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反革命宣传的辩论”。革命报刊是“对于革命工作的忠实报告”。[①] 报道一定要有根据，并注意留有余地。特别是对外宣传，不要夸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谦虚谨慎，把尾巴夹紧一些。”[②]在宣传我们的成绩的时候，要冷热结合。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报刊工作者要多注意报道我们的困难和不足，做冷静的促进派。

毛泽东提倡典型报道。他要求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用这些典型推动实际工作。

毛泽东强调指出，报刊工作者写文章时不能“神气十足”，“没有货色”。他说，不要总以为“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写文章要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吓人。

关于文章的“短”和“软”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短是必要的，软也可以研究。文章不能太硬。文章应该通俗一些，使读者读起来亲切，引人入胜，这种软法就很好。扳起面孔办报不好。即便批评，也不能把弓弦拉得太紧。报刊工作者应该懂得“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道理。

（六）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文风

作为报刊活动家，毛泽东十分重视文风，他身体力行，倡导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文风，他在为《中国工人》撰写的发刊词中写道，希望《中国工人》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这是他对党领导的宣传和文艺事业的共同要求，即不但内容好，而且表现形式和文字好。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时提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

---

① 毛泽东：《〈政治周报〉发刊理由》，《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②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5页。

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①

毛泽东的这个要求，也适用于新闻写作。

毛泽东还提出，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还要讲文法。就是不要省掉不该省的主语、宾语，也不要把副词当动词用，更不要省掉动词。还要注意修辞，尽量把文章写得生动一点。总之，一个合逻辑，一个合文法，一个较好的修辞，这三点是作文时务必要注意的。

他提倡写短文，写得简明扼要。他说，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正是“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毛泽东提出，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布，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

毛泽东提出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要求。他说，“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②他要求下苦功学习语言，第一，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第三，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力的东西。

毛泽东在批评“党八股”时，列举这种文风的八条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他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③

---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9～870页。

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③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毛泽东还要求报刊要办得尖锐、泼辣、鲜明。他说:"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①

(七)政治家办报

毛泽东提出了"政治家办报"的观点,对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寄托着殷切的期望。

他说,办好报纸的根本问题是报社人员的思想革命化问题。为此,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刻苦改造世界观,学习社会,学习工农群众。作为教育者,新闻工作者要先当被教育者,先做群众的好学生,然后才能成为群众的好先生。为此,要懂得工人农民,热爱他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

毛泽东提出,新闻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热忱,要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他为纪念邹韬奋所题的词是: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毛泽东用邹韬奋这一精神境界要求和培养新闻工作者。

毛泽东特别告诫新闻工作者不要成为只会跑衙门的记者。他指出,衙门没有多少东西,跑不出什么名堂,他要求记者常常到工厂和农村去,呼吸那里的新鲜空气,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反映他们的生龙活虎般的生活。他还指出,只有了解实际和群众的需要,同他们心心相印,呼吸与共,才能写出好东西。

在不同的传播环境下,毛泽东还规定党的传媒和记者要遵守新闻宣传纪律。除前已提及的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党和国家重大新闻由新华社统一发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等纪律外,还规定了涉外事件的报道、不得擅自向中外记者发表意见、重要稿件送审、建立内部参考制度、请示报告、重视处理人民来信等方面的纪律。毛泽东指示党的领导机关,要同违反党的纪律的现象作斗争。

---

① 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154页。

毛泽东要求新闻工作者工作一生，学习一生，永不骄傲，不断前进。他指出："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①

二、毛泽东新闻思想评价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贡献，在于他把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同中国无产阶级报刊实践结合起来，使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在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

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毛泽东明确指出，一定社会的报纸，是该社会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报纸受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又为这种经济基础服务，从而深刻地揭示了新闻事业同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依靠群众办报的传统上，明确地提出了"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方针，把群众路线创造性地运用于新闻工作实践，更大规模地动员和组织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开创了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新局面；强调政治家办报原则，指出报刊工作者应是又红又专、坚持实事求是作风、善于调查研究的无产阶级战士，从而对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的素质和修养，提出了明确的规范和严格的要求；积极倡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强调并培育具有民族特色的文体和文风，引导中国新闻事业走出了一条民族化、群众化的发展道路。

毛泽东继承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特别是列宁新闻思想，运用苏联报刊工作和通讯社工作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和党情，奠定了新中国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体制模式。伴随着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毛泽东新闻思想，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作出了贡献。

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未被彻底清除的封建意识的严重影响，以及毛泽东本人的缺点错误特别是后期所犯的严重错误，加上向苏联新闻界学习过程中由于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影响所造成的弊病的干扰，致使毛泽东晚年在某些方面背离了毛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页。

泽东新闻思想。毛泽东晚年的新闻观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些缺陷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中国的进一步普及和发展，而且严重地干扰了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健康成长，在一定时期内所造成的历史悲剧中，新闻事业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

毛泽东晚年的新闻观点的缺陷，大致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片面强调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毛泽东虽然在个别场合，比如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过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来进行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但他总的指导思想，是把报纸、广播、通讯社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并逐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仍一再强调报纸的主要任务是从事阶级斗争。他的这一观点和对于报纸工作错误的指导，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而且对中国的新闻事业造成了重大的失误和破坏。

漠视新闻工作的规律。毛泽东虽然也要求过领导干部要读一读新闻学，但有时漠视新闻工作的规律，把报纸工作看成主观意志随意驰骋的领域。

片面对待新闻自由问题。毛泽东把新闻自由看作资产阶级的口号。虽然偶而他也谈到，要是在西方，就不可能出现像斯大林那样的破坏法制的现象，但他有时轻视新闻自由问题，过于夸大地对待思想文化战线的阶级斗争，认为新闻界“牛鬼蛇神”最多，最容易出修正主义，唯心论最多，他们要求新闻自由，就是“秀才造反”。

压制报刊民主监督职能的发挥。毛泽东早期强调通过报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但后期很少提到报刊的民主监督和批评与自我批评，很少注意让报刊独立负责地发挥这一职能。相反，他一度把报纸批评视为“钓鱼”、“引蛇出洞”，即引诱人们批评尔后抓辫子、打棍子的一种手段，而他还把这种手段称为“阳谋”。

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党情，毛泽东晚年的新闻观点中的这些缺陷给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普及带来不小的损失，这种错误指导，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集中的体现，在某些方面，直至今天还有着不良的影响。清除这些影响，是发展中国新闻事业，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中国普及的前提之一。

第三节 举步维艰的新闻改革和新闻学研究

一、艰难的新闻改革

1961年,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了为期5年的大调整。中央要求全国新闻传媒,要把经济调整的宣传,作为这一阶段的工作重点。

新闻界利用这一有限却又十分宝贵的机会进行了一些新闻改革。这些改革尽管由于各方面的牵制和改革的内容基本不涉及根本的新闻观念、新闻体制而收效甚微,但它却表现了党内部分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不少新闻工作者在极其困难境遇下的无畏进取精神。

1962年10月,邓小平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针对有些人什么都往阶级斗争上靠的现象,提出:宣传上不要强调阶级斗争,一般讲讲大道理,不宜联系当前工作。报纸上阶级斗争讲多了,就会使人紧张,会妨碍调整。胡乔木在另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详细分析了几年来报纸宣传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如不真实、浮夸,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刘少奇在一系列插话中,严厉批评了宣传中的唯心主义倾向和片面性错误。陆定一在全国文教书记会议上,批评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开展的错批事件。梅益对广播工作指示说,广播宣传联系实际要有一定的距离,这看来好像与实际脱离,其实这是最好的联系实际的做法。他的这番指示,实际上强调了广播宣传不要那么卖力地去宣传高产和高速度,是几年来的经验之谈。

新闻改革中,《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的动作较大。为了倡导和谐和宽松,使绷得很紧的“阶级斗争的弦”松弛一些,《人民日报》从1960年底决定每星期拿出4个版登知识性和艺术性的材料,还专门开辟了知识版。从1962年5月4日开始,《人民日报》开辟杂文专栏《长短录》,这个专栏的编辑方针是: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识。邓小平对此表示赞成,支持开设这一专栏,觉得有些杂文写得满有味道。1961年,北京市4家报刊(《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前线》、《北京文艺》)举行“神仙会”,担任市委书记的邓拓就当前报刊工作提出改进意见,指出目前北京报刊面临一个共同任务,大家必须努力打开一条新路。在此之前,《北京文艺》发表了吴晗写的历史剧《海瑞罢官》,

《北京晚报》开始登载邓拓的《燕山夜话》。之后，《前线》开辟了杂文专栏《三家村札记》，作者吴南星是吴晗、邓拓（邓的笔名是马南邨）、廖沫沙（廖的笔名为繁星）。由于这些措施，北京的报坛一时变得热闹起来。这一时期，各地新闻界程度不同地都进行了若干改革。

实际上，由《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率先展开的这次新闻改革，只是昙花一现，它们的失败是必然的。从1957年开始，"阶级斗争工具论"已为一切中国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通讯社规定了明确的任务和功能：它们都是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既为斗争工具，怎么还谈宽松、自由？还谈什么知识性、趣味性？在毛泽东和一些领导干部看来，这种关于新闻改革的议论和尝试，就是鼓吹阶级斗争熄火论，就是冲击新闻传媒的阶级性，就是动摇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政治方向。毛泽东对于这种新闻改革很不以为然，相反，他几次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许多报纸是地主资产阶级专政，是牛鬼蛇神泛滥，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挂帅。因此，不久后他在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首先把新闻界作为他要清算的"资产阶级独立王国"。

从60年代开始，随着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的深入开展，一股个人崇拜的暗流在新闻界开始涌动。1960年11月，《红旗》杂志对革命领袖引文，首次用黑体、仿宋体等与正文相区别的字体排出，在此之前，个别书刊曾用比正文小一号的字排印引文。经《红旗》倡行，各报纷纷仿效。1961年4月，林彪视察部队时提出，"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从5月1日开始，《解放军报》摘登毛泽东语录，成为以后各报大量刊登领袖语录的发端。1964年3月，林彪又在《关于办好〈解放军报〉的指示》中指出：《解放军报》在稿件的内容和标题上，要用《人民日报》使用的党中央、毛主席的全国性语言。例如"一分为二"、"比学赶帮"等等。如果来稿没有这种语言，编辑部审稿时要加上去。此后，《解放军报》等一些报刊照此办理，并成为一条纪律。

对于上述个人崇拜的暗流，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中宣部是有警觉的，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一定的抵制和反对。1961年初，当这股暗流刚刚形成并初有抬头的时候，中宣部就向中央提出了《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的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刘少奇和邓小平批准了这一报告。学习毛泽东著作中的简单化、庸俗化和形式主义的倾向及时得到了纠正。但由于林彪一伙作梗，这些错误倾向并未能根本克服，后来变本加厉，越发泛滥。1964年，刘少奇再次提出，现

在学大庆、学毛选、学解放军都有形式主义，并批评新闻宣传也有形式主义，批评《人民日报》发表的典型太多了，太多了就可能出现虚假。邓小平、薄一波也提出，典型不要太集中，对典型要作全面评价。直至1966年2月，吴冷西还向宣传部门传达中央的指示：对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提法，现在有不同的意见。既然过去已经宣传了，以后可以慢慢不说了。今后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要起哄，不要庸俗化、简单化，不要搞形式主义。这些指示一再表明，中央不少同志对于林彪策动的这股个人崇拜的暗流始终是反对的，在相当的程度上尽自己所能加以抵制。

然而，毛泽东不仅听不进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意见，而且认为这些意见本身，就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政治纲领，是阶级投降主义。同时，在林彪一伙人的操纵下，"左"的思想在党内进一步恶性膨胀，报刊和广播出现了对一个领域接一个领域，一个学术权威接一个学术权威的批判高潮。鞭挞所至，几乎遍及全部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学科。这种名曰"学术批判"实为整人的批判浪涛，把新闻事业的"阶级斗争工具"的属性，最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这些"淋漓尽致"的背后，极其鲜明和清晰地勾勒出一条新中国新闻传媒滑坡的轨迹。而这一系列批判，正是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毛泽东通过新闻传媒，以"革命大批判"开路，拉开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二、重重阻力中的新闻学研究

在困难的形势下，新闻传媒要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从下表的数据可以看出，全国报纸的总数在这6年(1960～1965)里呈下降的趋势：

1957—1965年我国传媒一览

名称 数字 年份	电台(座)	市县广播站(座)	电视台(座)	邮发报纸(种)	邮发报纸期发数(万份)
1957	61	1698		1325	1508.6
1958	91	2580	2	1776	4473.1
1959	122	2375	7	1390	3237.1
1960	137	2404	17	1274	2104.1
1961	135	2078	20	451	1285.9

（续表）

名称 数字 年份	电台（座）	市县广播站（座）	电视台（座）	邮发报纸（种）	邮发报纸期发数（万份）
1962	94	2029	14	308	1342.8
1963	89	2130	13	289	1946.5
1964	86	2155	13	329	2454.8
1965	87	2365	12	343	2784.8

在极左思潮一阵紧过一阵，批判恶浪一浪高过一浪的局势下，要依据"双百"方针进行自由的新闻学研究，其困难与阻力是可想而知的。据统计，从1949年至1976年共出版新闻学著作308种，其中1960年至1965年"文革"前夕，新闻学著作共出版50种，仅占总量的16%。这6年间出版的主要新闻学著作列举如下：

1960年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译《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资料》
天津市广播函授大学编《政论文写作参考资料》
石少华著《新闻摄影与摄影记者工作》

1961年 山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编《省委书记论报刊》
团结报编辑部编《关于新闻写作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省县报纸跃进经验调查》
上海图书馆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总目》
复旦大学新闻系编《中国报刊通讯报告选》上、下册
新华通讯社编《新华社社论选》
新华通讯社编《新华社评论集》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广播电视事业概况》
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办公室编《文教战线红旗飘》

1962年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报刊工作文集》上、下册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新闻选》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通讯特写选》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报刊史教研室编《外国新闻事业概

况参考资料》
杭州大学新闻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新闻事业史》
穆欣著《搞奋》

1963 年 曹余贺编《怎样编写黑板报》
汪韵之编《怎样写新闻稿和广播稿》
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写作指导教研组编《怎样给报纸写稿》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报刊体裁教研室编《报刊评论选》

1964 年 田流著《怎样写通讯报道》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广播稿选》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亚非新闻工作者会议文件集》
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编《我们的经验》
光明日报编辑部编《编辑记者手册》

1965 年 叶圣陶著《评改两篇报道》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编《亚非新闻事业概况》
天津日报和天津晚报编《通讯员手册》

根据上面统计，可以看出，从 1960 年至 1965 年新闻学著作的出版呈逐年下滑趋势。随着政治运动的升级和"文革"的临近，不仅出版物数量减少，内容也有变化，1960 年尚有几本研究新闻传播经验的著作，以后逐年减少，到后来只有经验汇编了。

三、人民大学新闻系"错批事件"

1958 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人大新闻系实力大增，成为人大最大的系，不仅培养本科生，还办起了新闻专修科和各种新闻培训班。第二年，根据教学需要，教师们鼓足干劲编写出新闻采访、报纸编辑等 6 本讲义。到了 1960 年 6 月，该系一些思想较"左"的学生，以这些讲义为"靶子"，掀起了一场揭批"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新闻学"的运动。

这些讲义中涉及的基本新闻观点，主要是阐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诸如"报纸是经济教育的工具"、"报纸是人民教科书"、"记者是社会活动家"等观点。不料在批判中，被极左思潮搞得晕头转向的部分学生和教师，竟然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这些科学观点，提出报纸不是意识形态范畴的东西，报纸同法院一样，统统都是"暴力机关"、"专政工具"。他们认为报纸是经济教育工具、人民生活教科书等观点是丧失阶级性

的口号，认为报纸的"提供消息、传授知识、交流经验"的功能的观点是修正主义新闻观。他们指出，新闻记者是党的驯服而又奋发有为的工具，不同意记者是社会活动家的观点。

1961年3月4日，饱受批判和围攻之苦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党员教师甘惜分给中宣部写信，反映这个在极左路线支配下背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错批事件。中宣部于4月份派出调查组到人民大学调查，为受错批的教师和教材平反。后来，中宣部长陆定一在全国文教书记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开展的所谓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新闻学的批判，是错误的。人民大学"错批事件"，是当时全国十大"左"倾典型之一，竟然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批判了。

人大错批事件说明，当时新闻学研究是多么困难！

四、两份新闻学原理教学大纲

新闻院校的部分教师，执著于新闻学原理的研究，这一期间，仍时有成果问世，只是没有公开出版罢了。1960年，由复旦大学新闻系副教授李龙牧主持，编写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原理大纲》。大纲共9章33节，为：

一、绪论

二、资产阶级新闻事业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

三、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

四、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在争取解放斗争中的任务和作用

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闻事业的任务和作用

六、新闻事业的国际问题宣传与国际宣传斗争

七、全党办报——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根本方针

八、政治家办报

九、新闻工作中的内容与形式等问题

1964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副教授甘惜分也编写了一份题为《新闻学理论基础》的教学大纲，分上下两篇共8章：

上篇　无产阶级和新闻事业

第一章　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性质和作用

第二章　新闻事业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历史任务

第三章　在新闻事业性质问题上的原则争论

第四章　掌握新闻事业的特性

第五章　无产阶级专政与新闻自由

上述两份新闻学原理教学大纲都突出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阶级性和党性，都适当地注意到了联系中国新闻事业的实际探讨新闻事业的功能和作用，对于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例如政治家办报、新闻自由，内容与形式，政治与技术也有相当的涉及，这些在当时都是难能可贵的，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新闻院校的理论新闻学研究，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五、邓拓的新闻思想

邓拓，中国著名记者、报人、政论家。30年代开始投身报刊事业，1937年进入根据地从事党的报刊工作并担任负责人，1949年起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1957年当选为全国记协主席，1958年任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主编理论刊物《前线》杂志，并经常为《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前线》杂志的《三家村札记》专栏撰稿。他所涉及理论新闻学的论文，主要有收于《邓拓文集》第一卷《论新闻工作》部分的15篇。这些论文，反映了邓拓以下几个新闻观点：

（一）办报的目的和任务

在抗日战争条件下，邓拓认为报纸的任务是，"为了适应这一客观的要求，传播民族抗战的理论与消息，交换斗争的经验与教训，教育广大的人民，发动广大的人民，参加到抗战中来，加强抗敌的力量，发扬正确的舆论的威力，粉碎敌伪汉奸的欺骗宣传"。① 邓拓尤其强调公开报纸的意义，他说："我们的同志应该了解：在新的环境下，公开的党报是更大规模地培养强有力的政治组织的工具。当然，假如不培养地方上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包括党的和群众的），就是有最好的党报也是没有意思。但是，另一方面正如列宁同志的指示，问题是在于我们没有广泛发行的公开的党报，就再没有别的更有力的方法来大规模培养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在今天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中，我们要想在实际上能够集中一切抗日的力量，领导长期残酷的抗日斗争，随时随地有节奏地发动广大的人民从事一切抗战的动员，那我们就必须建立并发展强有力的

① 邓拓：《这一年来》，《邓拓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240页。

公开的有威信的党报。"[1]

新中国建立后，邓拓强调，全国性报纸和地方性报纸的目的和任务应有所区别。他说，"全国性报纸的责任是全面地反映全国建设工作的成就，解释全国性的问题和任务；从全国的观点出发并照顾到各地方的特殊条件来反映地方生活，解释地方的成就和经验，并把它们普及到全国去。全国性报纸应当解释中国的国际状况，我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我国人民的国际任务，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思想斗争。""各级地方报纸应当以大部分的篇幅来发表地方的材料。按日出版的地方报纸，在一般情况下，国际国内新闻和文件所占的篇幅不应多于二分之一，其他应为地方的材料。非按日出版的报纸和通俗的群众报纸，除最重要的文件以外，对其他国际的和全国性的材料，应加以综合改写、压缩和通俗化，然后发表。地方报纸对于国际问题除了发表通俗的解释文章以外，一般地不应该发表自己的关于国际问题的评论。地方报纸应该从地方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宣传全国的任务，并按照地方的实际需要来选择发表其他地区的经验和材料。"[2]

（二）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

邓拓对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方针有很高的评价，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办的报纸，应该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组织者'，这是马列主义新闻政策的基本观点。今年一月间我们提出全党办报的方针，正是为了贯彻这一基本精神的。在整风运动当中，要更好的克服主观主义的毛病，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必须依靠全党进一步的深入工作，密切与群众的联系，经常把各地群众斗争与工作经验，有系统的反映与报道，并不断从群众的创造中，发掘出来大量宝贵的东西，把它总结提高到理论的水平，再拿来指导各地的群众斗争与实际工作。只有这样，理论与实际才不至脱节，只有这样，党与群众才可以保持密切的联系，也只有这样，党才能做群众的学生，又做学生的先生。而所有这一切，如果没有全党办报方针的实现，那是很难通过其他的办法来达到的。"

邓拓认为，实行全党办报方针，是两种报纸的基本区别，"我们的党报所以不同于资产阶级报纸的基本特点，就是我们不仅有专业记者，而

---

[1] 邓拓：《论党报与党的工作》，《邓拓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242～243页。
[2] 邓拓：《怎样改进报纸工作》，《邓拓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299～300页。

且更加万分重要的，就是我们还有广大的与群众血肉相连的非专业的记者。这两者必须是互相结合着的。这就是说，非专业记者除了亲自给党报写稿之外，还必须供给专业记者以实际斗争的材料，来充实他的通讯内容，而专业记者除了虚心向非专业记者采访之外，还必须热情帮助他们不断提高写作的技术。经过这种结合，党报的内容就会日益充实而生动，就会成为反映广大群众斗争的一面镜子。"①

邓拓指出，要改造我们的通讯工作和报道方法，就要从群众内容、群众形式、群众写作这个"新路线，新观点"入手，实行全党办报的方针。对于群众内容，邓拓说"今天我们应该进一步认识到真实的群众内容才是我们通讯的惟一生命。我们的通讯所以有价值，正因为它具有最真实的群众内容。我们坚决反对新闻通讯对现实群众斗争的反映采取不负责任的夸大而损坏了它的真实性。"对于群众形式，他说，"要想最恰当地反映群众的内容，就必须采取群众的形式。这就要求我们的新闻通讯最大限度地运用群众的思维结构、群众的语言，而不是生硬地搬用它们，不是在洋化的结构中套进一些群众的思维片断，在洋化的句子中格格不入地装进几个老百姓的土语，而是真正为群众所讲的和懂得的通俗的群众思维结构和语言，这种思维结构和语言是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化到群众里头去，从群众中发出来的。"关于群众写作，邓拓说，"这是我们通讯工作实现群众路线的最根本的要求和最高的标志，因为只有当群众自己写出他们的生活和斗争的时候，才是最真实最生动的，而当群众自己能够写作通讯的时候，也才是我们通讯工作发展的最高峰。"②

（三）加强报纸的理论宣传

邓拓十分重视报纸的理论宣传，他指出，"要使报纸进一步成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地。""报纸应该经常地就党和国家的总任务和实际生活的各项问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应该强调理论宣传的文章要从实际出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力戒教条主义倾向，不必要的大量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随便'创造'不成熟的理论的现象必须停止。同时，各级党委应督促报纸编辑部去组织理论宣传的

① 邓拓：《贯彻全党办报的方针》，《邓拓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256～260页。

② 邓拓：《改造我们的通讯工作和报道方法》，《邓拓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261～263页。

队伍，发动高级干部加强理论学习，把学习的结果写成论文，择优在报上发表。"①

（四）重视社论工作

邓拓认为，"一篇社论是一期报纸的旗帜；其他形式的评论文章也都代表报纸的政治见解。因此，报纸的评论工作应该被看成是思想工作的主要表现形式。"②"一个报纸有没有社论，是不是经常有社论，广大读者对社论阅读的情况怎样，这些都是重要的政治问题。我们有理由认为：社论是表明报纸的政治面目的旗帜，报纸必须有了社论才具有完全的政治价值。""社论在我们的各种报纸上逐渐居于首要的地位。我们报纸的社论已经完全不是个别'主笔先生'所包办的产品，而是整个编辑部集体劳动的产品了。从我们的党办报以来的传统口号'全党办报'的意义上说，现在我们报纸的社论就是全党办报的一个重要结晶。"③

邓拓说，"为什么我们这样重视社论呢？这是因为它是最重要的政论，它所涉及的问题都是广大群众最关心的最迫切的现实问题。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我们党的机关报，只有通过社论这一个战斗的文字体裁，才能够最便利地指导广大群众，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对待和处理当前的每一个重大问题；向广大群众及时地明确地提出一项主张、一个行动方针、一个斗争任务，并要求为其实现而奋斗。广大群众所以重视阅读我们党的机关报的社论，就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社论是代表我们党的领导思想的。而我们党的机关报的社论有的是由党的负责同志亲自执笔的，它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会发生巨大的影响。"

邓拓认为两种新闻学对社论有着不同的认识。他分析说，"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著作对于社论的说明充满了许多虚伪的词句，说什么'它表示一家报纸的独立个性'，'它只就发生的事件做客观的剖判'，'它代表全民的利益'，'它最足以表示自由言论的权威'等等。这一类骗人的话有谁能够相信呢！那些资产阶级的新闻巨头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自己代表什么阶级或什么小党派的利益，但是他们偏偏要

① 邓拓：《怎样改进报纸工作》，《邓拓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288～289页。
② 邓拓：《怎样改进报纸工作》，《邓拓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289页。
③ 邓拓：《关于报纸的社论》，《邓拓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308～309页。

向人民群众隐瞒他们的阶级和党派的立场，而假装做'独立'、'公正'、'超然'、'客观'的样子。同资产阶级完全相反，我们是属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和这个阶级的最先进部分的革命组织——共产党的舆论代表，我们坦率地指出报纸是阶级斗争中最尖锐的思想武器；报纸的社论则是这个武器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在斗争中的广大人民群众每时每刻都要求从报纸上得到思想武器，使他们有日益充分的信心和力量，去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我们必须满足人民群众的这种需要。"①

邓拓提出了写好社论的4项要求，第一，要面向广大的对象。第二，要有一定的思想水平。第三，要切合实际情况需要。第四，要正确运用活的语言。

（五）重视和改进新闻报道

邓拓重视新闻报道，他说，"报纸的新闻必须改革。现在我们报纸的新闻，都是长篇大论，不是新闻，而且千篇一律，枯燥无味。这是必须改革的。对于过渡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极其丰富的内容，报纸必须用新闻的形式及时地作充分的报道。要善于用生动的事实，通过活的人和他们的活动，迅速地反映实际生活和各种工作的成就，反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在各方面实施的情况，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反映人民群众在过渡时期的各种要求。新闻必须用事实说话，必须选择全国人民有共同兴趣的事实；必须报道刚刚发生的事实；必须写活的人和人的活动；必须对稿件进行认真检查，保证事实的准确。缺乏以上条件的就不能叫做新闻。"②

还在战争年代，邓拓就提出要改进新闻报道，开辟新闻报道的新形式，当时他提出四种新闻报道的新形式，这就是：典型的报道、重点报道、发展的报道、批判的报道。所谓典型的报道，他说："各种工作、各种斗争要报道得好，必须抓住典型。典型最富有代表性，因此报道典型就是对现实做了最好的反映；同时典型又最富有指导性，因此报道典型又是对群众进行了最好的教育。这种代表性和指导性，恰恰是党报最迫切需要加强的。"关于重点报道，他说，"斗争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是

① 邓拓：《关于报纸的社论》，《邓拓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311页。
② 邓拓：《怎样改进报纸工作》，《邓拓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293页。

它是有中心的，因此，我们的报道也必须有重点。所谓重点的报道方法，就是对于重要的事件、重要的问题，集中力量来报道，在报纸上不但要有新闻、有通讯，而且要有论文，要有各式各样足以反映这个事件、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的文字，使读者能够全面地深刻地认识它。"所谓发展的报道，他说，"由于实际斗争是发展的，因此报道的方法也必须能够反映和指导斗争发展的全部过程。"所谓批判的报道，他说，"党报的新闻通讯和评论文章一样，对各种工作、各种思想、各种现象，好的或坏的，要进行批判，要发扬好的，批判坏的。新闻报道的批判性也就是党报的指导性的一种表现。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必须贯彻到报道工作中去。"①

（六）思想性和专业化

邓拓主张新闻记者工作要加强思想性，实行专业化。所谓思想性，他说，"以前我们有一个标准，是思想性。每人都愿意自己写的稿件有很强的思想性，这是对的。但思想性的意思很抽象，不易捉摸，各人有各人的解释。究竟什么是思想性呢？我以为思想性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反映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与斗争中的重要情况与问题。有重要问题，就应该分析研究，予以解决。但是，只有情况，没有直接提出或解答什么问题，没有直接的分析与批判，并不就等于没有思想性或现象罗列。只要你报道的情况是重要的，能鼓舞人们前进的，就应该说是有思想性的，应该报道。材料罗列得合理，选择得恰当，本身应能说服人，鼓舞人。思想性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我们的报道，主要靠事实来说服人。"

谈到专业化，邓拓说，"记者专业化，是确定不移的方针。现在记者还很少，将来要求有大批的专业记者派遣到各地，对各地工作真正有所帮助。记者的发展道路是无穷无尽的，记者对国家各方面的工作，要非常熟悉，有丰富的知识。我们当然不一定要当技术专家，我们应该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指导；但是，对自己所担任采访报道的业务部门，却应该有尽可能多的知识，不要因怕陷入技术的圈圈，就给自己机械地划出学习的范围，对可能学到的知识与可能了解的技术也不学。记者的任务，是通过实际的斗争来帮助党和国家解决问题，那就必须了解实际斗

① 邓拓：《改造我们的通讯工作和报道方法》，《邓拓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361～367页。

争。"①

(七)报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邓拓主张,通过报纸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他说,"应该向全党重申中央决定的精神,向所有的党员干部说明: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推动我们各项工作的动力。在我们日常的各项工作中,正确的和错误的、新生的和死亡着的事物,随时都在进行着尖锐的斗争。正确的和新生的事物要求不断地发展,错误的和死亡着的事物总是在起阻碍作用和破坏作用。这种斗争极为广泛,在每一个地区、每一个部门、每一项工作中存在着,而且每天每时都在进行着。我们各个地区各项工作如果要得到不断改进,就不只是要求我们各级干部经常检讨和批评我们各项工作中所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而且还必须通过报纸吸引广大人民群众来监督我们的工作,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及时的批评和建议,监督我们和帮助我们克服缺点,纠正错误,使我们的工作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任何干部,不管他的职位多高,功劳多大,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他们就会失去警惕,在工作中疏忽起来,有些人则会骄傲起来,而骄傲就会把他们拖着向后倒退,以致使他们失去热情和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泥坑中去。因此,我们一定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把自下而上的公开批评当成空气和水一样,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不能缺少的东西。"

邓拓对报纸批评提出这样的要求:"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必须完全正确,包括所批评的事实的完全正确,和批评时所采取的态度、观点的完全正确。发表的时机也要恰当。在报纸工作干部中有一种错误的思想,认为报纸上的批评不可能作到完全真实,只能是基本上正确的。自然,我们对广大人民群众寄来的批评稿件是不能要求完全真实的,同时,对被批评者来说,哪怕批评只有百分之五的正确性,也应该欢迎。但是当报纸要把这些批评登载出去,就必须事先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核对,只有调查完全确实了,并且所用的词句完全正确了以后才能刊登出来。因为刊登在报纸上的批评,不是作者个人的批评,而是代表党的批评,它是公正的强大的社会舆论力量,是不能不真实,不能不正

① 邓拓:《在人民日报记者会议上的谈话摘要》,《邓拓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282—283页。

确的。”[1]

（八）树立简明的科学的生动的文风

关于文风，邓拓提出，“我们要求树立一种简明的、科学的、生动的文风。说简明而不说通俗，是因为通俗这个词曾被人误解，滥用地方性的土语方言以为通俗，实际多数人看不懂。”“正如演员对自己的表演经过反复推敲之后，演出的结果是非常自然而优美，不使人觉得是在做戏。这中间的关系，分寸与火候，应该仔细研究。朴素了，还必须科学，不要使人觉得词不能达意，或发生误解。这里要求适当吸收各种表达意思的方法。生动，就是不要枯燥乏味。大家可以多看看冯至写的东欧散记，那些通讯都是很好的散文，真正有斤两的。”[2]

（九）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新闻工作

邓拓是难得的一位深刻全面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新闻工作关系的新闻理论家，他强调具体掌握辩证法是做好报道工作的关键，他对辩证法的16个要素逐个进行分析，说明哲学对新闻工作的巨大的方法论的指导作用。他以大量的事例说明，“新闻工作是最经常的，最有力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党领导的新闻报刊是我们党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一个重要武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唯物辩证法在我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具体运用。为了更好地掌握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了更好地完成新闻工作的任务，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认真地学习并且熟练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彻底的革命宇宙观，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这方面我们的任务是重大的。”[3]

六、几个重要新闻观点的畸变

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到1966年“文革”爆发，历经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一个又一个学术领域的批判，使得无产阶级党报理论中的一些观点，被扭曲以至发生了畸变，从而使我国的新闻学术水平，从根本上受到了伤害。这里择其最主要者，分析三点。

首先，中国新闻传媒的性质发生了畸变。原先，在一般人的心目

---

① 邓拓：《怎样改进报纸工作》，《邓拓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295～298页。

② 邓拓：《在人民日报记者会议上的谈话摘要》，《邓拓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283～284页。

③ 邓拓：《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新闻工作》，《邓拓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331～355页。

中，新闻传媒只是一种新闻舆论工具，而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毛泽东突出地强调新闻传媒在阶级社会中是有阶级性的，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当然是正确的。不过，毛泽东提出这一命题，目的仅仅是为了强调新闻传媒只是从事阶级斗争的工具，从而确立他的“阶级斗争工具论”。这样一来，就把新闻传媒的其他属性、多样性的功能全给淡化以至抹杀了。从1957年开始，至1966年春天，“阶级斗争工具论”从确立到全国普及，成为中国新闻学的理论基础，成了毛泽东新闻思想最重要的核心。

一般说来，“阶级斗争工具论”有其正确的一面，对敌对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是新闻传媒的重要使命。但是，新闻传媒还有其他的多种使命，如推动经济建设，促进文化传播，提供服务和满足娱乐等等。所以，不能以某一种使命代替或取消其他的使命，更不能把某一种使命看成是新闻传媒的根本性质。新闻传媒的性质，由它的本质特征所规定。新闻传媒是以传递新闻和信息，影响社会舆论的一种交流工具，其性质应是新闻舆论工具。从这一点看，“阶级斗争工具论”作为新闻传媒的性质来描述，作为新闻学的一个基本理论，是片面的、不科学的。

其次，中国新闻工作者的主体地位被逐渐削弱。开始，不少人坚持：新闻传媒是党的工具，新闻工作者不能是工具，新闻工作者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看法，新闻机构应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性。继而，改提新闻工作者要做党的奋发有为的工具，这“奋发有为”，仍保留了一定的独立自主性，肯定新闻工作者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最后，要求新闻工作者必须做党的“驯服工具”，既是工具且又要驯服，已无一点主体意识可言，根本没有什么独立自主的可能。在1957年反右斗争和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新闻工作者都充分地发挥了这种“驯服工具”的作用。

第三，新闻界“讲真话，求真理”的无产阶级办报作风被严重破坏。在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经1958年的大跃进，到1959年的反右倾，新闻界实事求是的作风和文风受到根本性的破坏。开始，新闻失实，编造事实，可能还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到后来，搞“假、大、空”则已是故意为之。“产量越高新闻报道就越有价值”、“卫星越大新闻越有分量”，在这种情况下，报道者自然就去刻意炮制。这一时期，还跑出来一个“本质真实论”，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主流总是好的，成绩总是九个指头，缺点和不足只是支流，属于一个指头，所以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就是报道九

个指头,不去报道一个指头,凡是报道九个指头的新闻,就是报道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种新闻总是真实的。

从"阶级斗争工具论"到"本质真实论",从"驯服工具论"到"假大空",中国无产阶级的新闻传统逐渐滑向一条错误的道路,中国的党报理论逐渐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正确轨道。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对新闻科学的扼杀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借助了新闻传媒的威望和力量,通过全国的报刊、广播、电视,发号令,造舆论,搞批斗,判是非,定生死。新闻传媒,成为"文革"中最得力、最自如的实施"全面思想专政的阶级斗争工具"。同时,由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新闻传媒在这一时期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重要武器和主要战场。新闻传媒的荣辱存亡,完全同"文革"的起伏盛衰密切相联。新闻界成了"文革"重灾区。而新闻科学,则成了被扼杀的对象。

一、毛泽东用新闻舆论指挥"文革"

从60年代开始,毛泽东利用新闻传媒在意识形态各战场全方位出击,"狠抓革命大批判不放松",完成了"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他利用报纸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亲自点燃了"文革"的第一把火。

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明确指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

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以后运动发展的事实表明，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彭、罗、陆、杨以及后来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就是他笔下的所谓的“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邓拓等“三家村”或“四家村”人物就是“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毛泽东这种对中国社会阶级斗争的错误估计，处理党内意见分歧的错误方针，对一线领导人的不民主作风，以及对中国新闻界的唯心主义分析，先天地决定了新闻界在“文革”中绝对只能是一个挨整的角色，决定了一批有作为的新闻工作者的可悲命运。在这种错误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支配下，一些新闻传媒在推动“文革”的进程中起了摇旗呐喊推波助澜的作用，个别利禄熏心或别有用心的人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干了一些同记者使命不相容的勾当，所有这一切又都进一步从新闻基础理论、新闻职业道德和新闻记者形象上败坏了新中国的新闻事业，使一个好端端的中国新闻界，在十年“文革”中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成为积重难返的重灾区。

新闻界是《五·一六通知》下达，“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之后首先受到大规模冲击的一个部门。1966 年 5 月 17 日，即《通知》通过的第二天，邓拓含冤离开人间。5 月 25 日，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撤销《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编委会，成立新的编委会，撤销范瑾的社长职务，撤销《前线》杂志编委会，《前线》停刊整顿。5 月 31 日，陈伯达奉派进驻《人民日报》，不久，这家中国的第一大报即开始积极鼓吹极左的东西，为“文化大革命”竭尽犬马之劳，总编辑吴冷西也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拉下马来。陈伯达一进《人民日报》就责成专人撰写鼓吹“文革”的社论，社论初稿的题目是《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陈伯达将其改为火药味十足的《狠扫一切牛鬼蛇神》。陈伯达进驻报社不到 24 小时，这篇社论就出笼了。从此，人民心目中的《人民日报》的形象改变了。

1966 年 8 月 5 日，毛泽东在 6 月 2 日的《北京日报》头版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边空白处，写下了以后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明眼人一下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是专攻刘少奇的。邓小平后来也说，主席是炮轰少奇和我的。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是写在《北京日报》头版的边页上的，而头版上转

登的是前一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这至少说明这两家报纸在当时是毛泽东每天必看的报纸。

从《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后，几乎涉及毛泽东的每一个"伟大战略部署"，每一个"最新指示"，凡利于实现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者，均通过报刊、广播发表社论、编辑部文章，或者新闻、通讯直接传达，布告天下。新闻传媒，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红色司令部"的司号员。十年"文革"期间的新闻传播活动，是毛泽东调动新闻传媒指挥"文革"进程的历史纪录。

二、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全面专政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革"中利用他们所篡夺的权力，通过新闻传媒，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了野蛮的思想专政。

首先提出"枪杆子"、"笔杆子"，革命要靠"两杆子"的是林彪。"文革"期间，这个身为副统帅的林彪，处心积虑地拼凑由他、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组成的反党集团，为最终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作了重要准备。但在"笔杆子"方面，他自知还不如江青拥有的人马和阵势，所以他故伎重演，除了全力掌握《解放军报》等军内舆论阵地，还主动勾结和利用江青的势力，以扩大自己的宣传队伍和宣传阵地。在"文革"期间，凡遇到重大事件或重大节日，《解放军报》常常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编辑部文章或社论，"两报一刊"社论和编辑部文章具有很大的威力，因为它们象征着"笔杆子"和"枪杆子"的结合，意味着"伟大统帅毛主席"和"林副统帅"的双重支持。

"文革"期间占据新闻舆论阵地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破坏力最强的，当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康生和陈伯达一伙。从"文革"的舆论准备与前哨仗开始，他们就是一群居心险恶、蛮横无理的文霸，得志之后，尤其是1971年"九一三"林彪覆灭事件之后，他们加快了以"文"夺权的步伐，利用新闻舆论阵地，在中国实行野蛮的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最怕别人说"文革"搞错了，最警觉有人说"文革"是极左思潮的产物。他一再强调："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人民日报》社王若水曾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左"，而《人民日报》的极左思潮还没有批透。他表示赞成周恩来批极左的主张，认为周恩来的主张对于报纸宣传也是适用的。毛泽东不以为然，他对张春桥、姚文元说：

"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

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

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①

毛泽东坚持自己的看法，要求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江青一伙正好利用毛泽东的这种心理，开展所谓"反右"、"反复辟"斗争。于是，周恩来和随后邓小平的一系列纠"左"的努力，全付之东流。

"四人帮"的一切倒行逆施，自然要受到全国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和反对。1976 年 1 月 8 日，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与世长辞，神州悲恸，举世哀悼。对"四人帮"的愤怒的浪潮和对人民好总理的不尽悲思，最终汇成揭露和声讨"四人帮"的震惊中外的"四五"运动。

"四五"之后，"四人帮"一伙要《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组织人马赶写"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的政治事件"的报道，姚文元要求，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要快。毛泽东听取汇报时也指示要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的报道。这些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报道，更激起人民的义愤。《人民日报》收到一封署名"一个现场的工人民兵"的信。信封正面是"人民日报总编辑收"，背面是"戈培尔编辑收"。信封里装着一份 1976 年 4 月 8 日《人民日报》的一、二版。上面批着："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为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建议"从今日起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的确"令人震惊"，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发生了质变！

从 1921 年党建立之前的《新青年》起步，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历经数十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发展到社会主义新时代，其间虽有失误和挫折，但其铮铮铁骨，光彩照人的形象，其与党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呼吸与共的血肉关系，始终没有改变和动摇。想不到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新闻事业竟然被林彪、江青一伙控制和利用，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毒害，完全置于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成为对人民群众实行思想专政的工具，成为人民群众唾弃和责骂的对象，这着实令人捶胸顿足，痛心疾首，深感可悲，可恼，可怒，可惜！

无可置疑，"文革"期间的中国新闻传媒，是新闻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

① 于午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51 页。

三、中国新闻事业大滑坡

对于中国新闻界来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这短短的十年，中国新闻事业大滑坡，新闻学研究跌入低谷，新闻教育一度被取消，封建法西斯新闻观点抬头并极大地伤害了中国新闻传媒的健康肌体。"左"倾思潮对中国新闻队伍的毒害，至今还没有完全清除。

让我们看下表：

1966—1973 我国传媒一览

名称 数字 年份	电台（座）	市县广播站（座）	电视台（座）	邮发报纸（种）	邮发报纸期发数（万份）
1966	78	2181	13	49	2519.8
1967	78	2200	13	43	2309.3
1968	79	2254	15	42	2136.4
1969	81	2299	19	42	2327.7
1970	80	2346	31	42	2322.4
1971	81	2389	32	195	3249.3
1972	85	2427	31	185	3305.7
1973	86	2444	32	192	3442.0
1974	88	2455	32	189	3728.0
1975	88	2481	32	231	3998.0
1976	89	2503	32	236	1403.1

从上表可以看出，"文革"期间的主要新闻传媒数量骤减。以报纸为例，是近百年来最少的。公开出版的报纸，1966 年 49 种，1967 年 43 种，1968 至 1970 年 42 种，1971 年有所复苏，也只有 195 种，至"文革"告终的 1976 年，仅有 236 种。而在鸦片战争后至 19 世纪 90 年代，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仅外文报刊即有 120 种以上，传教士办的中文报刊至 1890 年达 76 种，国人自办的报刊更多至数百种，戊戌变法短短四年间，使涌现七八十种。新中国成立到 1956 年，我国报纸即达 1236 种，至 1958 年更达 1776 种，经过整顿，到 1960 年还有 1274 种。就是在极左思潮已经恶性膨胀的 1965 年，还有报纸 343 种，不料至 1968～1970

年竟跌到42种，新闻业之倒退，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说，数量的滑坡只是表面现象的话，那么，党和人民新闻事业优秀传统以至本质特征的丧失，则是一种属于深层的蜕变。举其大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否定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踢开党委闹革命"，"夺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是"文革"中叫得很响又为毛泽东所赞同的"革命口号"。1969年1月3日，《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联合上海及外地驻沪造反派，夺取了《文汇报》的领导权，并以革命造反派机关报的名义于第二天出版了"新生的《文汇报》"。1月5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也宣布夺权，权归造反派 1月8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这两家报纸的夺权活动深表赞赏。他还发出这样的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说："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让我们高举起双手，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和鼓动下，在《文汇报》、《解放日报》"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史的一个创举"的鼓舞下，全国各地的党委机关报普遍被夺了权，随着被夺权，党领导新闻事业的传统，也被彻底打破了。

第二，篡改全党办报方针。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新闻工作，共同办好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办报原则。但是，在十年"文革"中，全党办报的方针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1973～1974年，《人民日报》开展过一场名为"批邪"，实为围剿报社健康力量的运动。张春桥针对周恩来对报社的人事安排，说《人民日报》有"一股力量，一股邪气"，必须镇压。在这场运动中，排挤了许多忠于党的新闻事业的编辑和记者，拼凑了一个以鲁瑛为头子的领导班子，《人民日报》此后也变成了"四人帮"的帮报、派报，全党办报在《人民日报》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1968年，毛泽东指示："不应当关门办报，应面向群众，又要有大方向，又要新鲜活泼。""四人帮"一伙歪曲这一指示，提出办报纸要那么多

人干什么？必须精兵简政，必须彻底改变那种轻视工农、关门办报的资产阶级老爷作风，要吸收有无产阶级觉悟的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到报社来，打破知识分子成堆的状况。这就是“掺沙子”的政策。此后，下放劳动，开办干校，“不在城里吃闲饭”，“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舞台”等一系列运动，把一大批编辑记者赶出新闻机构大门，受到种种迫害和摧残，让那些对新闻工作并不在行的人占据着采编岗位，给新闻事业造成很大的破坏。实践证明，“掺沙子”的政策是对全党办报方针的反动。

第三，践踏新闻的真实性。客观真实，是新闻的基本要求，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重要范畴。“文革”期间，林彪、江青一伙对新闻真实性大加践踏，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罄竹难书的程度。“文革”中有一个“原则”，即所谓“事实为政治服务”。林彪说，如果来稿没有这种语言，编辑部审稿时要加上去，要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各个时期所提出来的全国性口号、提法、语言来变化。江青说，材料要从斗争需要出发，不是从有什么材料出发，应该有什么题目，然后寻找材料，这样材料的运用就活了，这就叫做事实为政治服务。新闻失实，在我国新闻史上时有发生，有时闹到十分严重的地步，比如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但像“文革”时期这样，失实的性质几乎全是“故意失实”，假报道遍及全国，为时长达十年，影响如此恶劣，对实际生活和广大群众造成的损害如此严重，不仅在中国新闻史上，而且在世界新闻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第四，败坏马克思主义文风。我国新闻界以马、恩、列、毛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典范，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和积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风。林彪、江青一伙控制新闻舆论阵地时期，对这种文风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和败坏。人们用“假、大、空”即假话、大话、空话形象地表述“文革”期间的文风。假话，前面已有分析。当时流行事实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只要“文化大革命的革命需要”，什么“事实”都可以编造，任何“典型”都可以出笼。

空话、大话、以至绝话，在这一时期的报纸版面、广播节目中俯拾即是，简直没有一天听不到，没有一家报纸看不到。“文革”期间的新闻和文章，使用的全是高调词，话都说得很绝，人称“文革”语言。这类新闻和文章，总是大段大段地引用毛泽东、林彪等人的语录，借以代替应有的必要的论证。有的社论，几乎全由语录和文件摘录而成。当时，语录全用黑体字排出，所以版面看上去黑乎乎一片。文章的结尾，全是以口号或祝词的形式告完。“文革”时代的文风，是一场拙劣文风大比赛的

结果，"文革"文风和"文革"语言，对中国新闻事业造成的破坏，擢发难数，新闻传媒以往长期培养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文风，几荡然无存。

四、"文革"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倒算

"文革"十年，中国的新闻学理论研究受到极大破坏，人被整了，书被抄了，观点被批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受到封建法西斯新闻学的反攻倒算。据统计，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新闻学著作一共才出版 43 种，基本上都是新闻单位内部编印的业务小册子，公开出版的寥寥无几：

1968 年 9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小册子。

1976 年 6 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吉林师大中文系与吉林德惠县达家沟人民公社三结合编写组编写的《怎样办好农村黑板报》。

1975 年 10 月，北京市朝阳区工农通讯员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 73 级工农兵学员联合编写了这一时期惟一的一本"新闻理论"著作，重点讲革命导师的办报活动和新闻战线的两条路线斗争。就连这本书也不是由出版社公开出版的。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攻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论文"，是发表于 1968 年 9 月 1 日《人民日报》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对这篇奇文有作简要分析的必要。

这篇文章是由陈伯达、姚文元一伙炮制的。他们首先把刘少奇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观点，说成是资产阶级新闻路线。说"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一贯仇视和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他们代表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疯狂推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把叛徒、特务、走资派安插到各个新闻单位中，妄图使新闻事业变成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这篇文章集中攻击刘少奇等人从对华北记者团讲话以来所发表的，在 1956 年新闻改革中所实践的下列四个新闻观点。

第一，关于"为读者服务"。文章认为，"为读者服务"是超阶级的资产阶级口号，因为读者是分为阶级的，不同阶级的读者，决没有相同的爱憎。中国赫鲁晓夫要为之"服务"的是哪个阶级的读者呢？文章认为刘少奇所要服务的读者就是地主资本家。显然，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

第二，关于自由化。文章认为刘少奇所倡导的新闻改革，实质上是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种自由化，表现为三个方面：1. 让新华社当老百姓，不当国家通讯社，其实质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2. 所谓"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报道"，就是反对新闻报道的阶级性。3. 所谓"报纸上应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报纸的政治倾向，使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不许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发言权。

第三，关于"反革命策略"。文章攻击刘少奇关于新闻工作者要学会联系实际，"与实际保持一定距离"的观点，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策略。

第四，关于宣传毛泽东思想。文章攻击刘少奇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指示是挥舞"形式主义、简单化、庸俗化三根大棒"，是竭力阻挠宣传毛泽东思想，阻挠报道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文章在上述四点"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今后的四项任务：按江青一伙的指示"继续宣传毛泽东思想"；在新闻界清理"阶级队伍"；深入持久地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新闻机关要走精兵简政的道路。实际上第一条，是在保卫毛泽东思想的旗号下，抵制刘少奇等人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和方针。第二条，是为了夺取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领导权。第三条，是为了抵制新闻改革和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观点。第四条，是把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赶出报社大门，而让那些所谓的"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舞台。总之，这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倒算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夺取无产阶级舆论阵地的纲领，它所体现的，是封建法西斯新闻学的观点。

五、取消新闻教育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对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可以作各种理解，有人认为，文科可以不必办。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加上又有人批评大学新闻系培养不出新闻记者，新闻又无学可言，所以在《人民日报》开展关于《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如何办？》的讨论时，驻复旦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发表文

章说，我们主张彻底革命，有些系，如新闻系，根本培养不出革命的战斗的新闻工作者，可以不办。上面提到的《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也鼓吹办报纸，不需要那么多人；主张吸收有无产阶级觉悟的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到报社中来，实际上是否定新闻教育、否定经过新闻教育的新闻从业人员的骨干作用。1969 年，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和舆论导向，北京广播学院被停办。1972 年，包括新闻系在内的我国第一所文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被停办。在此前后，许多学校的新闻专业也被追下马，新中国历经艰辛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新闻教育事业，由此步入了低谷。

六、历史的沉思

中国新闻界是深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毒害的"文革重灾区"。一个好端端的有着灿烂前景的新闻事业，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新闻队伍，数以千计的为广大群众干部喜欢、享有很高信誉的新闻传媒，被林彪、江青一伙摧残践踏得满目疮痍，面目可憎。

痛定思痛，中国新闻界应该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地反思新闻传播的指导思想，联系整个社会运行机制，无情地解剖导致十年新闻滑坡的政治和社会原因，向历史、也向未来作出负责的交代。

"文化大革命"是有着崇高威望的毛泽东发动的，是毛泽东晚年推行阶级斗争扩大化方针的产物。毛泽东始终坚持中国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建成社会主义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观点，他急于求成，执著地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为此，毛泽东将任何主张实事求是，根据中国国情把握建设速度与进度的观点，一律说成"右倾保守"，当这种批评无济于事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动用政治斗争手段，将反对者斥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实际上，毛泽东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理想社会，是"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他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体经营，统统将它们说成是"资本主义黑货"。在分配制度上，毛泽东倾心于民主革命时期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他一再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将一切关心劳动者物质利益的主张，都指责为"鼓吹个人主义"，"实行资产阶级人性论"。"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样的广阔背景下展开的。

应当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推进，同林彪、江青一伙阴谋家、野心家长期把持新闻舆论工具，无所不用其极地制造种种舆论也是分不开的。从 60 年代开始，林彪将群众性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引上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实用主义的邪路，将罪恶之手伸向《解放军报》，并先后

同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勾结，利用新闻传媒散布"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有资产阶级司令部"等谎言，通过长期的破坏性新闻批评打倒一批又一批党内和军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打击各条战线的优秀分子。林彪、江青一伙把握新闻舆论工具，是文化大革命得以步步深入，使全党和全国人民长期囿于迷津而不知返的重要原因。

党和新闻界的共同教训是：

第一，新中国建立以后，没有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新闻宣传的重心，而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第二，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内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态势，没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并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

第三，没有努力宣传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没有强化舆论监督机制和依法办事的意识。

第四，没有分清无产阶级新闻观点和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界限，没有坚持党对新闻事业的马克思主义领导。

1957～1976年，特别是"文革"十年间的许多教训，对于中国新闻界来说是永志难忘的。面对这些教训，富有优良传统、曾为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广大新闻工作者，是深感自责的。他们每天灌满广大人民群众的啧啧不满声，时时受到职业责任感和职业良心的深深责备，他们空有一腔热血和横溢才华想有作为而不得为。"新闻必须改革！"成为"四人帮"覆灭之后新闻工作者最强烈、最迫切的愿望和呼声。于是，一场伟大的改革，一场党领导的新闻事业改革史上最宏伟、最持久、最有声势、最有成效的改革，一场符合党心、民心和每个新闻从业人员心愿，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新闻改革，在1979年的中国大地上开始了。

第九章

改革开放和新闻学研究的兴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全面发展的时期。这次全会召开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早在开国的时候就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经过艰苦的斗争，克服重重困难，我们粉碎了'四人帮'，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现在，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这种形势的出现已经为期不远；真正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马克思主义方针的条件，也在日益成熟。我国文学艺术蓬勃繁荣、争奇斗艳的新阶段，必将通过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展现在我们面前。"①

和文艺工作一样，中国的新闻事业也进入了有史以来最活跃、最发达的时期。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阶段，以新闻传播飞速发展所提供的物质力量与经验总结为基础，新闻学研究也迎来了自己史无前例的黄金时代。

第一节　新时期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了广阔天地

一、重塑中国新闻形象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回到党和人民手中的新闻传媒，凋敝败落，气息奄奄，面目可憎，声誉俱毁。共和国的新闻事业面临着重建家业、再塑新闻形象、恢复优良传统的紧迫任务。

根据党中央的号令和部署，新闻界首先以极大政治热情投入揭批

---

①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3～214页。

林彪、"四人帮",清除其在新闻界流毒的斗争。在连续几年的时间里,新闻传媒发表了成千上万篇揭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社论、评论、批判文章,结合中央公布的三批材料,将这些祸国殃民的千秋罪人的倒行逆施,无情地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

在这一时期,新闻传媒及时报道中央为一系列冤假错案平反的决定。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报道中共北京市委决定:为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平反。28日,《人民日报》登出新华社电讯:邓小平副总理会见外国客人,透露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是党中央的决定。1979年1月15日新华社报道,党中央为"中宣部阎王殿"的大冤案彻底平反,认为"文革"前17年,理论、教育、宣传、对外宣传、文艺、新闻、出版、体育、卫生等部门,革命路线一直占统治地位。这一系列报道,不仅及时传达了中央的深得人心的重大决定,而且极大地鼓舞了新闻工作者轻装上阵,斗志昂扬地投入斗争。

新华社、报刊社、电台和电视台在配合中央开展揭批查斗争的同时,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清理"四人帮"对新闻事业的破坏上。

1977年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打倒帮八股》的署名文章。10月8日,又发表上钢五厂工人来信,揭露《人民日报》被"四人帮"控制时期的严重错误。1978年3月31日,该报又刊登复旦大学新闻系一位教师的文章,揭露和分析"四人帮"控制时期《人民日报》的错误编排。这年4月12日,《吉林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彻底扫除"四人帮"的"新闻学"垃圾》,由此开始,新闻界转入较全面地清除封建法西斯新闻理论。不久,《解放军报》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呼吁从假字开刀整顿文风。新闻教育界在批判清理中是一支活跃力量。他们开专题课,写一大批论文,召开理论讨论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甘惜分于1980年写出了《新闻理论基础》一书,该书既是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原理的首次系统论述,又是全国新闻界清算"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新闻观点的理论总结。

从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社会是在徘徊中前进的。这是因为,当时的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及部分高层领导坚持"左"的错误,"左"倾思想在全国没有肃清。新闻界也是如此。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主张。"两个凡是"的方针,是华国锋阻碍彻底

清查，干扰拨乱反正的“左”的错误路线的产物。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指导和支持下，新闻界和理论界挺身而出，同“两个凡是”的方针展开了英勇斗争。这场斗争，是围绕着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展开的。经过讨论，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受到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打下了思想基础。

这一时期另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论战是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借助新闻传媒组织的这两次讨论，不仅倡导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有力地推动了全党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开始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重新塑造了党领导下的新闻传媒的形象，提高了新闻宣传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望。

“文化大革命”期间，新闻传媒虽然不乏新闻批评，但几乎全是破坏性批评，对全党全国的工作以至广大干部群众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一个时期，新闻传媒在“四人帮”大搞“全面专政”的阴谋活动中起过很坏的作用。“文革”以后，这种情况已有根本的改变。这一时期新闻批评的主题是，克服“左”的错误，批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鞭挞工作中的错误和不足。这些批评，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大量来信来电来访表明，仅仅经过几年的努力，新闻传媒的形象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变，党的新闻工作者，开始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敢于坚持革命原则的战斗风格。

1981 年 11 月，在庆祝新华社建社 50 周年茶话会上，习仲勋代表中央书记处对新闻报道提出 5 点希望：一是真，新闻必须真实；二是短，新闻、通讯、文章都要短；三是快，新闻报道的时间性很强，不快就成了旧闻；四是活，要生动活泼，不要老一套、老框框、老面孔；五是强，要做到思想性强，政策性强，针对性强。这就是著名的“五字方针”。这个方针，既是中央对新闻工作的要求和希望，也是广大新闻工作者为重塑新闻形象努力的方向。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在新华社的带头下，全国各新闻机构纷纷行动起来，开设新栏目，创办新媒介，出现了一大批新创刊和复刊的新的报纸、刊物、电台和电视台，发表了一大批既有指导性又充满着可读性的好新闻、好通讯和好节目。

二、新闻改革对新闻学研究的企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济改革启动，在它的推动下，新闻改革也开始酝酿和出台。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一些新闻改革的动作。

197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引用毛泽东的话第一次不排黑体字,以后各报争相仿效,遂成惯例。在此2个多月前,5月1日,《光明日报》告知读者将实行改版,随后一些报纸开始倡导短新闻、快讯、今日讯和昨日讯。

从1979年开始,有三次重要会议,为全国性新闻改革指出了方向,添加了动力。

1979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召开新闻工作座谈会,会议的首要议题是:新闻工作的中心如何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来? 中宣部长到会讲话,号召解放思想,改进工作,把发挥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加强党的集中领导密切结合起来,把新闻媒介办得既有思想性、科学性和战斗性,又丰富多彩、引人入胜。10月,在北京地区社会科学界庆祝建国30周年学术讨论会新闻学组上,与会者提出,新闻媒介要进行自身改革,以更好地满足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1980年2月,北京新闻学会成立,胡乔木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阐述了邓小平的要求:报刊要成为巩固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思想中心,促进这个政治局面的发展。会议提出,为了当好党的思想中心,就要从加强同实际工作和人民群众结合抓起,从抓重大主题、新生事物、重大典型、最能说明问题的材料入手,这是新闻改革的突破口。

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了,新闻传媒起初还在抱着"阶级斗争为纲"不放;蓬蓬勃勃的经济建设大潮激荡着每个炎黄子孙,可是报上还是没有经济新闻的重要座次;亿万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新生活的壮丽画卷急切地等待着记者去描述和反映,但是报纸的篇幅和电视的屏幕上到处是领导人的一般日常活动和无穷无尽的会议报道……对于这一切,群众是有意见的。他们在充分肯定新闻传媒粉碎"四人帮"后的进步的同时,也尖锐地批评种种缺点和不足。他们期待着新闻记者去找他们,期待着自己的活动、欢乐、忧思能在报纸、广播、电视上得到充分的表现和反映,期待能对官僚主义作风和腐败行为进行无情鞭挞,期待读到色彩鲜明、清新爽朗、可信可亲的作品,期待新闻传媒能在推动民主和法制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真正成为既是党的、政府的喉舌也是人民群众自己的喉舌。这一系列期待,汇成推动新闻改革强大的动力。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国门洞开,海外新闻传媒为人们提供了评价和修正新闻传播活动的新的参照系,广大群众和几十万新闻工作者的价值标准得到了一定的改换和更新,他们不仅看到我国新闻传媒的优势

和成绩，也逐步发现了新闻传媒以至新闻政策的缺点和不足，并且敢于大胆地呼吁改革，设计改革，推动和参与改革。

可见，实行新闻改革，不仅是新时期的历史性要求，而且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不仅是巩固粉碎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胜利成果、进一步肃清封建法西斯新闻观点的需要，也是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不仅是客观形势使然，也是新闻工作者出自内心的要求。

但是，新闻改革怎么进行？它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改革的重点又在哪里？对一些重大的理论分歧怎么认识？对一些传媒方针和传播原则怎么取舍？实践呼唤着深入的新闻学研究。比如，当有人对"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命题提出质疑时，有不少人为它辩护。当有人提出报纸有商品属性的时候，立即遭到不少文章的反驳，当党报刊登广告时，更有人把这种做法同"向钱看"相提并论，而当新闻价值、趣味性、新闻自由、传播学、民意测验、舆论调查等这些新观念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入而出现于口头或书面上时，几乎没有不受到非议甚至非难的。以上种种现象，主要是"左"的错误影响还没有肃清，尤其是在新闻领域对于林彪、江青的批判还不够深入造成的。在改变和更新新闻观念的过程中，还常常遇到一些保守、僵化势力的阻碍。在一个时期，这些势力还占据着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地位。他们往往以各种形式给予改革者以压力。比如，关于如何使用"传播工具"、"媒介"这些从海外泊来的学术名词，这些年来就几经反复。在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过程中，围绕着使用还是不使用这些词，发生过几起争论。如何对待这些非议、非难和争论，是摆在新闻理论研究工作者面前的，必须正确回答的课题。

新闻改革的主力军是数十万新闻工作者，由于新闻事业的急速发展，这支庞大队伍还来不及进行严格的训练和培养，而其中个别人的新闻素质以至政治素质又不符合要求。这些，也给新闻改革带来不少困难。对这支队伍进行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是当时一项迫切而重要的任务。

总之，新闻改革和新闻事业的发展都迫切地呼唤着新闻学研究，推动这种研究不断地向深度和广度进军。

三、西方新闻学传播学的引进和两岸学术交流的加强

改革开放以来，为西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引进，提供了良好条件，新闻学的中外学术交流活动日益活跃。1981 年 11 月，中国和澳大利

亚新闻界人士在北京联合举办了新闻学研讨会。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同行第一次坐在一起，探讨新闻学问题。此后，美国著名的新闻学府纷纷派人来华，讲授新闻学和传播学，发表这方面的学术演讲。这些美国学校有：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斯坦福大学新闻系、明尼苏达大学新闻学院、密执安大学新闻系、夏威夷大学新闻系和美国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等。1982年4月传播学创始人之一的美国著名学者施拉姆博士在其弟子香港中文大学余也鲁教授陪同下来华访问，同中国同行研讨在华普及传播学知识等问题。1981年以来，外国新闻学者来华访问讲学的不下百人。在请进来的同时，中国学者也大胆地走出去，到西方高等学府学习研讨新闻学和传播学，1983年以来，中国派往国外的访问学者中，有70余人是以新闻学和传播学为课题的。

随着两岸经贸关系的改善、经济交流的增多，两岸新闻交流也日益频繁。两地新闻学者通过共同举办新闻研讨会、参观考察、交换学术著作、访问讲学等渠道，学术交往和合作不断加强。自1991年新华社和中新社记者实现首次赴台采访后，两岸新闻交流日趋活跃，一系列新闻学术研讨活动在两地举办："两岸三地传播与经济发展研讨会"，"海峡两岸广播事业交流研讨会"，"两岸大众传播与展望研讨会"，"两岸及香港新闻实务教育教学研讨会"，"两岸新闻教育学术研讨会"等。两岸和港澳新闻学术研讨会，这些年来已经连续召开五届，学者们围绕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畅所欲言，屡有建树。两岸许多新闻院校的教学人员和少量研究生，还到对方院校从事短期讲学和研究。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传播馆等出版机构还将自己编印的数以百计的新闻学和传播学著作，赠送给大陆新闻院校图书资料室，大陆新闻学者的学术著作也为台湾学者所收藏。

在同西方新闻学者和港澳台新闻学者的交往中，我们获得了许多研究资料，借鉴到有益的研究方法，这对新的历史时期开拓研究思路，扩大学术视野，推进新闻学研究是大有好处的。

第二节　新时期新闻学研究概略

一、1978～1999年的新闻政策要旨

1978～1999年期间新闻传播事业的迅速发展和新闻学研究的深

入进行，始终是在党的新闻政策和邓小平、江泽民的一系列指示下进行的。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新闻界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上文中，邓小平提出："我们希望报刊上对安定团结的必要性进行更多的思想理论上的解释，这就是说，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宣传党的领导、党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的威力，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的巨大成就和无限前途，宣传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而奋斗是当代青年的最崇高的使命和荣誉。总之，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①

198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这个文件是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党中央就新闻工作作出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决定指出："报刊、新闻、广播、电视是我们党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武器。近几年来，它们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对党的事业有很大的贡献。"这是党中央对新闻传媒在粉碎"四人帮"以来几年工作的充分肯定和表扬，是对广大新闻工作者的鼓励和支持。决定也指出新闻界存在的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地、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经常和有系统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和言论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在有的问题上与党的步调不够合拍；有的报道和理论、政策宣传有片面性，有少数报道失实；在领导工作中，对一些思想原则问题，缺乏认真的讨论，没有坚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针对新闻界的这些错误不足，以及国际大气候对新闻改革所造成的冲击，中央提出了六方面的要求：

1. 报刊、新闻、广播、电视必须严格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宣传。

2. 要认真进行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

3. 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精神文明。

4. 要正确处理表扬和批评的关系。

①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5页。

5. 报刊的文艺作品或评论，广播、电视的文艺节目，一定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正确贯彻执行“双百”方针。

6. 报刊、新闻、广播、电视是党的舆论机关，要加强组织纪律性。

1985年2月8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发言，这一发言，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1981年以来新闻界同仁学习、批评、改革和重新认识的集中反映。新闻界普遍拥护这一讲话，表明在这些问题上新闻界已同中央有了共识，对于新闻改革的一些冲击已被克服。

1987年3月29日，根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精神，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坚决、妥善地做好报纸刊物整顿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端正新闻、舆论阵地的思想政治方向，首先要把有关报刊及其出版单位整顿好。这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保证这场斗争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对实际上已成为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阵地，而又没有继续存在必要的报刊，应予停办。对错误比较严重，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影响的报刊，一般应先停刊整顿，视整顿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出版。对政治方向不端正，发表过不少错误言论，但不宜停刊整顿的，应坚决调整领导班子和充实领导人员，边出版边整顿。对根本背离原定办刊宗旨，不具备办刊条件，社会效果很坏的，要下决心停办或合并一批。”①

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风波”之后，中央重点抓了新闻队伍的反思与清理，江泽民和李瑞环分别作了《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重要讲话。江泽民的讲话重点论述党的新闻工作的性质、地位、基本方针、党性。

性质：新闻事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既说明了新闻工作的性质，又说明了它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新闻工作之所以具有这样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因为，它作为现代化的传播手段，能够最迅速、最广泛地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并变为群众的实际行动；能够广泛地反映群众的意见、呼声、意志、愿望；能够及时地传播国内国际的各种信息，直接影响群众的思想、行为和政治方向，引导、激励、动员、组织群众为认识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① 中共中央：《关于坚决、妥善地做好报纸刊物整顿工作的通知》，《新闻工作文献选编》，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297～302页。

基本方针: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我们党指导新闻工作,还有许多其他的方针、政策、原则。这些方针、政策、原则,都是体现和服从党的路线和这个基本方针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新闻工作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就要坚定地全面准确地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宣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决策,宣传全国各族人民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业绩和经验。

党性:新闻工作是党的整个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党性。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不能发生疑问,要反对所谓人民性高于党性的主张。坚持党性原则,要求新闻宣传在政治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要求新闻工作者必须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广泛最深刻的联系,从群众的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要求在新闻宣传中旗帜鲜明地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在新闻自由、真实性、新闻批评等问题上,树立马克思主义的观点。①

李瑞环的讲话,着重论述当前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方针的意义和贯彻这一方针的要求。

当前,改进新闻工作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很多。无论是从新闻工作的一般意义上讲,还是从当前各方面的实际情况来讲,或是从稳定是压倒一切这个大局来讲,关键的问题是新闻报道必须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必须遵循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指导方针。坚持这个方针,就是要准确、及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主流,让人民群众用创造新生活的业绩教育自己,形成鼓舞人们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在当前就是要造成一个有利于稳定局面的舆论环境。

李瑞环说,我们所说的"正面",所说的"为主",就是要着力去宣传报道鼓舞和启迪人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热爱伟大祖国和弘扬民族文化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而斗争的东西。总之,一切鼓舞和启迪人们为国家的富强、人

① 参见江泽民:《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新闻工作文献选编》,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189～200页。

民的幸福和社会的进步而奋斗的新闻舆论，都是我们所说的正面，都应当努力加以报道。

李瑞环结合近年来新闻传媒的经验和教训，就舆论导向、新闻批评、舆论监督、宣传艺术、新闻工作特点等问题论述了正确的看法，批评了错误的主张和做法。[①]

上述一系列新闻政策，同样也是新的历史时期从事新闻学研究必须遵循的方针和政策。

二、重大学术活动和事件

我们以理论新闻学研究为主线，罗列新闻理论研究22年来重大学术活动和事件于下：

1978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新闻学研究机构。1997年更名为新闻与传播研究所。20多年来，该所在全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中充分发挥了骨干与组织作用。

1979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意在新闻工作领域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一次新闻界盛会。会议围绕"文革"中新闻工作许多重大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当时的中宣部长胡耀邦，就党的新闻工作的性质、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新闻工作的领导等问题，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新时期的新闻工作》的讲话。他认为，我们的新闻工作有很高的党性。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离开了人民性就不叫党性。从党的根本性质来说，党性和人民性是融合在一起的。党性就是人民性。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的观点，得到与会人员的广泛认同。

1979年10月，在北京，首都社会科学界举行庆祝建国30周年学术讨论会。新闻学组会议的代表就30年来我国新闻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会上还对陈伯达、康生新闻无学、取消大学新闻教育的错误观点和错误主张进行了批驳。

上述几次会议，直至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新闻学术界热烈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也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邓小平明确批评了"党性来自人民性"的说法。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只能来源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

---

① 李瑞环：《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新闻工作文献选编》，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201～222页。

因此，说“党性来自人民性”，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这一点，多数参与争论的人士，差不多已成共识。他们还认为，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这是因为，党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外，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私利。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同坚持新闻工作的人民性，不仅在理论上是统一的，在实际运作中也是可以做到的。

但也有人坚决反对把“人民性”这一概念引入新闻学。胡乔木在一封信中详细地论证了自己的这种看法。他说，对人民和人民性应作历史的和阶级的考察。人民这个概念，在各个历史时期有各种不同的含义，使用人民这个概念时不能离开阶级分析的方法。他还从语源学角度分析，说明“人民性”一词有着复杂的含义。胡乔木认为，国外迄今使用“人民性”这个概念，一般限于文学艺术范围，有时也扩大到社会科学领域，但新闻学中没有见过。胡乔木的结论是：党报必须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既代表党也代表人民的利益，遇有某些复杂的情况需要分别采取适当措施，而不要笼统引用“人民性”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来作为包治百病的药方。因此他建议，目前最好不要再用这个提法。

1980 年 2 月，北京新闻学会成立，后更名为首都新闻学会，这是由首都各中央新闻单位组成的新闻学术团体。其宗旨是组织和推动新闻学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它推动下，各省市自治区陆续成立新闻学会，在此基础上，于 1984 年 12 月，成立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这是全国各专业新闻学会、研究会的联合组织，是研究新闻学的全国性学术组织，该组织曾创办新闻学术杂志《新闻学刊》。

1980 年 5 月，西北五报在兰州召开大型新闻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名为西北五报会，实际上，全国大多数省报、主要新闻院校、部分新闻研究单位及中宣部新闻局都派员参加，成为文革后第一次全国性的新闻学术活动。参加会议者提交的论文几乎涉及以后 20 年中所研究的主要重大课题，如新闻是否是一门科学，新闻传播有无规律可循，新闻事业的性质和功能，无产阶级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报纸指导性，新闻真实性，报纸批评等。关心和指导这次会议的兰州军区第一政委肖华、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积极评价这次会议，他们说，这次会议开得生动活泼，盛况空前，对于活跃新闻学研究空气，对于肃清林彪、“四人帮”对报纸工作的流毒影响，对于党的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对于报纸更好地担负起四化建设的舆论工作的历史重任，都将产生较大的影响。

1982 年 5 月，传播学创始人之一施拉姆博士在他的学生、香港中

文大学的余也鲁教授陪同下来华访问讲学，提出向中国系统介绍传播学的设想。在此推动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一些学者为骨干，加强了传播学尤其是大众传播学的研究，并在全国渐成风气。这年11月，全国第一次传播学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我国研究传播学的基本态度。这年年底，出版了《传播学（简介）》，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本有关传播学的著作。

1982年6～8月，由北京新闻学会发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人民日报社等参加，实施大规模的“北京市读者、听众、观众调查”，这是中国第一次采用传播学的受众调查方法进行的受众研究。以此为开端，新时期的受众研究和受众学建设上马，每年都有一批相当规模的传媒和受众调查活动。1986年5月，在安徽黄山召开了首届全国新闻受众研究学术讨论会，同年10月，中国第一所舆情与传媒调查研究机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成立，该所于1988年进行了影响广泛的“首都知名人士龙年展望”。

1982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全国有关单位支持下，开始编纂《中国新闻年鉴》。1986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开始出版。

1983年3月，在北京举行“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提交论文与资料28篇。这是我国第一次举行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新闻思想研讨会。这年年底，在长沙举行纪念毛泽东90诞辰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会议收到学术论文60余篇，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关于毛泽东新闻思想学术研讨会。这两次会议，摈弃过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十三经注疏”式的方法，联系实际，敞开思想，倡导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学风。这两次会议后分别出版了论文集。

1984年6月和1985年5月，分别在山西太原和安徽合肥召开新闻真实性学术讨论会。为一个新闻理论与实践的具体问题，接连两年召开两次全国性会议，一方面说明真实报道存在着不少问题，亟待从理论上建立共识，从举措上交流互补；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学术界对真实性这一理论新闻学重要范畴的高度重视。

1985年4月，“关于世界新闻新秩序讨论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新闻学术界最早关注和研究自60年代以来全球新闻传播秩序，呼吁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打破西方新闻霸权的一次会议。

1985年10月，在重庆召开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40周年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回顾和交流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我国新闻界团结抗日的贡献和经验，对抗战时期的有关报纸和新闻界人士作出了公正的历史主义的评价。

1986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省报总编辑座谈会指出，我国正在深入进行的新闻改革，是在新闻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这次会议还提出，报纸发表什么不发表什么，应由总编辑说了算。

从1986年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设立社会科学基金，其中新闻学科在"七五"、"八五"、"九五"15年间对经申请和批准的新闻学课题总支持力度达150万元以上。教育部（原国家教委）从1996年起，开始组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申报工作，新闻学与传播学也列于其中。

1987年12月和1988年2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中宣部、广电部、新闻出版署和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单位主要负责人，受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委托，就新闻改革两次举行座谈会，并写出《新闻改革座谈会纪要》。纪要认为新闻改革应抓四项工作：提高开放程度，增大信息量；组织好社会协商对话的报道；正确开展批评，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提高宣传水平，增强宣传效果。

1988年3月，中华全国报纸行业经营管理协会成立，不久改名为中国报纸行业经营管理协会，1996年再次更名为中国报业协会。报协的成立，不仅适应了当时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后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全国报业发展的需要，而且有力地引导和组织了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开展。

1988年9月，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学成立，这是一家以新闻法制研究，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新闻法制建设为主旨的民间学术研究机构。

1988年10月，由华中理工大学发起，在武汉召开全国首届新闻学新学科学术讨论会，大会交流的50多篇论文涉及多种新闻学新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新闻心理学、新闻经济学、新闻哲学、新闻伦理学、新闻管理学、新闻社会学、新闻法制学、新闻广告学、新闻美学、新闻统计学等30门学科，这次会议对新闻学研究的拓宽和深化有重要意义。

1989年1月，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在北京成立，不久在北京召开

全国第一届新闻文化研讨会，会议对新闻文化的特征、功能等进行了广泛讨论。

1989年11月，中宣部在北京举办省报总编辑新闻工作研讨班，李瑞环和江泽民先后在会上作了题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和《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的重要讲话。研讨班后，根据有关方面安排，各新闻单位，尤其是新闻院校，对过去的新闻宣传和学术论文进行了清理。

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发表，极大地鼓舞了新闻学研究工作者。邓小平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①]在邓小平讲话精神推动下，中国的新闻学研究进一步端正了方向，有了新的发展。1992年以后，在本世纪最后的八年里，每年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数以十计，出版的新闻学著作数以百计，发表的科学论文数以千计，以至我们不可能在这本书里一一给予完整的记录。

三、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交相辉映

1977年全国高校恢复统一招生制度，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复旦大学新闻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和广西大学新闻专业即开始正式招收新闻学专业本科生。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办，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师生回到人大，人大新闻系即开始招生。暨南大学恢复新闻系，北京国际政治学院（1984年改名为中国警官大学）、河北大学和四川大学分别建立新闻系或新闻专业。随后，郑州大学、安徽大学、杭州大学、厦门大学、江西大学、西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也都设立新闻教学点，湖北、浙江、广东三省建立了广播电视专科学校。

①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373页。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新闻系，招收新闻理论等6个专业硕士研究生85名。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也分别招收硕士研究生8名和4名。这是中国恢复学位制度、首次在新闻学设立硕士学位的首批研究生。随后，北京广播学院等院校陆续开始招收硕士学位研究生。

1983年5月，中宣部和教委在北京召开新中国建立以后第一次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规划新闻教育发展和讨论新闻教育改革问题。会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和上海外国语学院开始试办第二学士学位制的国际新闻专业和国际文化交流专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于1983年举办旨在为新闻专业培养师资的史论两个方向的教师进修班。在会议推动下，一批新的专业和新的课程出台，如国际新闻、新闻摄影、播音、电视编辑、电视导演、广告学等专业；传播学、公共关系学、新闻美学、新闻管理学等课程。在这种新闻教育空前繁荣的基础上，1984年成立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在其组织下，1988年召开了"全国新闻改革与新闻教育改革研讨会"和"全国高等学校新闻教育改革座谈会"，新闻教育改革开始形成高潮。

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新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当年招收2名，于1985年入学。1988年首批博士生毕业，中国开始有自己培养的最高层次的新闻专业人才。

1987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先后扩建为新闻学院。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被国家教委评定为全国惟一的新闻学专业重点学科点。

1987年，新华社在职业培训的基础上，成立中国新闻学院，招收第二学士学位生和开展职业培训，随后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

业余新闻教育和新闻继续教育在这一时期迅猛发展。1984年，安徽日报社开办新闻刊授大学，近2万人报名。1985年，全国省市以上13所新闻刊授、函授学校在学学员达23万人。同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始设立新闻专业并着手招生，当年招生近2万人。1986年，国家教委成立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新闻专业委员会，制定新闻学专业自学考试计划。职业培训缓解了新闻事业迅速发展中新闻人才奇缺的状况，从1984年到1988年，经过培训和自考，取得新闻专业大专文凭的人数达2万余人。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研究生专业目录，新闻学由过去

的二级学科调升为一级学科，列为"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这标志着经过近20年的努力，我国新闻教育水平和新闻学学科水平均有重大提高，也预示着新闻传播学在下个世纪将有新的更大的发展。

据教育主管部门统计，到1996年底，经国家教委批准备案的设有新闻类本科专业的普通高校共55所，专业点88个，在校生达9000人，教师1011人。如果加上近几年未经国家教委备案的专业点，全国大约有120多个新闻专业教学点。截止1999年底，全国共有新闻学和传播学专业硕士授予点23个，博士授予点6个，博士后流动站1个，形成了本专科、硕士和博士层次齐全的办学格局。

1978年以来，中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力地保障和促进新闻学研究的开展与深化，两者相辅相成，交相辉映。首先，新闻教育向学生系统传授新闻学的基础知识与基本原理，对于新闻学的普及是最扎实最具体的基础性工作。学子们掌握了新闻学之后，一方面可以在新闻实践中检验理论的正确性，又可以用更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充实和深化理论，在不断的实践与总结中提高新闻学的科学水平。22年来，这些学子们通过理论学习和生产实习，撰写的论文数以万计，成为新闻学研究中的重要成果。其中一些硕士和博士论文，具有较好的水平，有的甚至填补了我国新闻学研究的某些空白。

其次，新闻院校的教师，一般都具有较好的理论功底、全面的知识结构和较强的科研能力，外文和计算机的运用水平也较高，研究方法较为先进，又具备一定的时间保证。因此他们的新闻学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可观(一千多名教员，按两人公开出版一部教材或著作计算，也在五百种以上)，而且质量也较好。22年间，高校教师撰写的新闻学著作，其研究水平在同专业或同专业方向中，往往处于领先地位。因此高校教师是新闻学研究的骨干和主力。

第三，中国新闻院校师生由于不在新闻采编第一线，同新闻主管部门及其他社会利益集团保持相对距离，加上平时有一定的理论思维能力的训练，所以他们的新闻学研究常常比较超然，理论抽象程度高，对现实的评论较公正和客观，能避免纯粹经验的描述和就事论事等新闻学研究中的常见病。

以上三点，指的是新闻教育对新闻学研究的积极意义。而新闻科学的进步及其成果，又为新闻教育提供对于新闻传播规律的正确认识

和方法论原则，使新闻教育有教材、资料和信息的保障，优秀的新闻学研究工作者，常常又是新闻院校不可多得的教学人员。国外多年来实行系所一体的教学科研体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研究生院新闻系长期合作办学的经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学研究与新闻教育携手合作，相得益彰，使双方都收到很大益处。我国新闻学研究 22 年来的重大进步，同新闻教育的巨大发展是分不开的。

第三节　丰硕的新闻学研究成果

"文化大革命"告终，我国迎来了新闻学研究的春天。这些年，就研究状况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 1980 年 2 月新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新闻学会（后改称首都新闻学会）成立为标志，前 4 年主要着力于新闻学的拨乱反正，后近 20 年着力于新闻学的基础建设。这近 20 年，就研究人员之众，学术成果之丰，其对新闻界以至全党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水平提高之大而言，超过了新中国建立以来任何一个时期，可以说是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党报理论初创以来新闻学研究最广泛、最系统、最有成就的 20 年。

一、新闻事业的发展和新闻学著作的出版

1976 年 10 月一举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即有发展，公开出版的报纸（包括邮发与自办发行）至 1995 年第一次超过 2000 种，达到历史空前的水平。1977 年至 1999 年的新闻传媒发展之迅速可从下表看出：

年份 \ 数字 \ 名称	电台（座）	市县广播站（座）	电视台（座）	邮发报纸（种）	邮发报纸期发数（万份）
1977	90	2539	32	238	4340.7
1978	93	2553	32	253	5542.5
1979	99	2560	38	283	6288.8
1980	106	2610	38	382	7415.4
1981	114	2643	42	451	7996.0
1982	118	2631	47	538	8437.1

(续表)

名称 数字 年份	电台 (座)	市县广播站 (座)	电视台 (座)	邮发报纸 (种)	邮发报纸期发数 (万份)
1983	122	2619	52	604	10416.8
1984	167	2570	93	714	13202.0
1985	213	2568	202	944	14500.0
1986	278	2560	292	984	20722.0
1987	386	2576	366	1482	18600.0
1988	461	2521	422	1628	13780.0
1989	531	2525	469	1618	15148.0
1990	635	2466	509	1446	13986.0
1991	724	2464	543	1514	15318.0
1992	812	2452	586	1666	19066.0
1993	987	2382	684	1775	17948.0
1994	1107	2342	766	1951	17753.8
1995	1202	2592	837	2089	17230.1
1996	1244	2106	880	2163	17877.2
1997	1363	2055	923	2149	18258.7
1998	298	1304	347	2051	18210.7
1999	299	1562	359	2038	18632.4

这一时期,公开出版的新闻学著作也呈逐年增长之势。前已提及,1949年10月到1987年12月,出版新闻学著作983种,其中1949～1976年出版308种,1977～1987年则有675种。据《中国新闻年鉴》提供的名录统计,1977～1990年间出版1380种,除去1977～1987年间的675种,1988～1990年出版了705种。以1949～1976年的27年间出版308种,1977～1990年的14年间出版1380种计,后者为前者的4.48倍。1991～1999年这9年,目前尚无准确的统计。但估计每年不会少于100种,尤其是1998和1999这两年,有多种系列新闻学著作问世,如中央电视台纪念建台40周年丛书,中国新闻媒介名专栏丛书,北京广播学院系列教材,复旦大学新版系列教材,每套都在十多本以上,

全国每年当在150种以上。按保守估计，说这9年出版1000种应不成问题。这样估计的结果，从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7～1990这前11年的1380种，加上后9年的1000种，23年间出版新闻学著作共2380种。从这一数字看，从1903年中国出版新闻学著作以来，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一阶段，是中国新闻学著作出版最多的一个时期。这从一个方面，有力地说明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新阶段，也是中国新闻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新阶段，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时期。

下面，我们分述这一时期新闻学研究重大发展的大致情况。

二、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著作研究结出硕果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新闻理论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根本原因是拨乱反正的需要，改革开放的需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需要。在这种迫切需要的推动和催促下，新闻理论的首要课题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著作。

1983年春天召开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和这年冬天举行的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以及纪念列宁、斯大林、周恩来、刘少奇等的一系列学术讨论会，成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著作的直接组织者。前两次盛会气势之大，与会者之众，提交论文之多，研究经典作家新闻观点之深，在中外新闻史上多属少见。会后部分论文汇编成集，以《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研究文集》和《毛泽东新闻理论研究》为题出版，为这一时期经典著作研究留下宝贵财富。

这一阶段公开出版了一批(达十余种)新闻经典原著的文集，影响大者有：《马列主义新闻学经典论著》、《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马恩列斯论报刊》、《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斯大林论报刊》等。这些原著选本系统汇集了经典作家的新闻观点，对长期流行的马列新闻语录进行了考证，订正了若干错误，达到了新的水平。

一批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专著和文集相继问世。其中有甘惜分教授指导下童兵和郑保卫完成的《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余家宏教授指导下秦中河完成的《列宁报刊活动编年》、赵水福和傅显明撰写的《列宁与新闻事业》、康荫和傅俊卿撰写的《毛泽东新闻理论研究》、窦其文撰写的《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童兵的博士论文《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史前、形成、发展的370

年历史的研究，得到我国共运史、马克思主义史、新闻等各界专家学者的好评。该书设上下两编，共12章，各章标题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史前期，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形成的时代氛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主报刊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人报刊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党报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对新闻传播规律的探索，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发展（一）（二），联共（布）报刊活动家的新闻思想，欧洲各国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贡献，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新闻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现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陈力丹撰写的《精神交往论》，是又一本有特色的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研究专著，该书共16章，各章标题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交往观，从民族交往到世界交往，人的本质与精神交往，交往媒介——语言，交往媒介——文字和印刷术，交往革命，交往形态——宗教，交往形态——文艺，交往形态——舆论，交往形态——宣传，交往形态——新闻，交往媒介——报刊，交往政策，交往心理，工人的精神交往，交往的三种社会形态。除上述两本专著外，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夏鼎铭和华中理工大学教授吴廷俊等都出版了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原著的教材。此外，中宣部和新闻所等编辑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工作文献选读》、《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等也受到重视。上述成果表明我国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的总体实力和功底已达到相当水平。与此同时，还整理出了一批我党关于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工作的历史文献，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料不仅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有关重要观点，而且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与普及。

对新闻经典论著的研究，开始走出高等学府。一大批记者、编辑、总编辑对经典作家的报刊论著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各种学术讨论会上，在各家新闻期刊以至大学的学报上，常可读到他们撰写的大量研究经典论著的论文。其中新华社原副社长、中国新闻学院教授缪海稜对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研究，原陕西日报总编辑、武汉大学何微教授对马列新闻思想的研究，都达到很高的造诣。原湘潭日报副总编谭一长期潜心研究马恩和毛泽东报刊思想，出版了与此题有关的专著。

一批以研究生为代表的年轻学者成为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原著的活跃人士。从1978年起，部分新闻院校和新闻所每年都招收以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为课题的研究生，这些年从无间断，取得了一批高质量的

研究成果。

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主要围绕下列课题展开：

1. 结合正本清源学懂弄通马列新闻论著的一些基本观点，如怎样正确认识新闻事业的阶级性与如何理解"阶级斗争工具"、"阶级专政的机关报"等。

2. 阐释领会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重要范畴，如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报刊和自由报刊思想，马、恩、列、毛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党报关系的思想，关于出版自由和新闻法制的思想，关于党性、党报是党的思想中心、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济宣传和党报工作改革的思想等。

3. 研究探讨经典作家的新闻思想形成的历史渊源、时代背景、文化氛围，对资产阶级教育与报刊经验的批判继承，他们的报刊活动如何从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认识等。

4. 研究经典作家的新闻思想对现代政党的报刊和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指导意义。

5. 研究经典作家报刊工作的特色和新闻业务指导原则及新闻作品的风格。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还有一个可喜的特点：理论研究正逐步克服长期以来形成的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形式主义和"教科书观点"，正摆脱"语录新闻学"的影响。新闻工作者结合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体会，深刻地认识到邓小平的下列论述是多么正确：理论建设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

三、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趋向繁荣

这些年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是在极其困难、底子薄弱的基础上起步的。由于"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的冲击和苏联"教科书观点"的影响，"文革"后留给我们的只有数十种报纸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五性一论"(即在"阶级斗争工具论"的帽子下片面强调报纸的阶级性、思想性、群众性、战斗性、真实性)。新闻学的绝大部分概念、范畴、原理，既没有明确和稳定的质的规定性，又缺乏必要的严密的科学论证，新闻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却没有自己的学科体系，连学科知识的积累都少得可怜。针对这种情况，在掌握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武器的基础上，新闻研究的重点放在新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上是理所当然的。当时，胡乔木就明确指出，新闻研究机构、新闻学会的主要责任、

是从事新闻学术研究。回顾起步维艰的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不能不提到甘惜分、王中两位教授。王中教授的著述和新闻思想已在第八章第三节作了详细评介，这里评介甘惜分教授的理论著述。

甘惜分生于1916年，我国著名新闻教育家和新闻学者。1938年去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后在八路军120师政治部任政治教员和政策研究员。1946年任新华社绥蒙分社记者，参加《绥蒙日报》创刊工作。1949年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1954年调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副教授。1958年随该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校学位委员会委员、吴玉章奖金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新闻理论基础》、《新闻论争三十年》及新闻学术和史学论文多篇。

甘惜分教授对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经年，造诣很深。"文革"前就几次撰写新闻学原理教学大纲。1980年4～7月，为解决教学急需，也为了庆祝中国人民大学30周年校庆，他赶写了《新闻理论基础》，这本教材先内部印发使用，并分发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等许多理论工作者讨论，于1982年首次公开出版，至今已发行20余万册，是一本有广泛影响的、我国第一本公开出版的新闻理论教材。这本书分绪论和上下两篇，共7章，各章的标题为：新闻，舆论，新闻事业、新闻事业的作用，新闻事业和现实生活，新闻事业和群众，新闻事业和党，书尾附录：对新闻理论几点分歧意见的看法。

《新闻论争三十年》是甘惜分的论文集，他在前言中说：这本文集，除了少数几篇之外，大都是针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而发。文章写于最近这不到十年之间，而所涉及的问题却作俑于1957年，到今年(1987年)刚好三十年，所以本书名曰新闻论争三十年。新闻学还很年轻，不成熟的事物，有待于在讨论中成熟起来。收于这本文集的论文有《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关于新闻工作的客观规律问题》等15篇，其中不乏精辟之作。如关于新闻工作的客观规律的论述，作者指出有7条：第一，新闻事业是表达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社会舆论机关，它以新闻报道、时事评论以及其他形式反映舆论、影响舆论和组织舆论，每日每时对群众施加思想影响。第二，新闻事业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党性，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第三，新闻事业同群众的关系是新闻事业诸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第四，新闻事业是报道新近的事实和评论新

近的事实，因此，让事实说话反映事实真相，这是新闻事业的又一规律。第五，现实生活的实际状况是检验我们的宣传工作的试金石。第六，新闻事业的状况决定于社会经济基础，有怎样的社会制度，就有怎样的新闻事业。第七，新闻事业是适应人们交流情况、交流经验和交流思想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它又必然要求自己能够最迅速、最敏捷地和最广泛地反映现实。甘惜分将上述7点规律简单化为四言如下：舆论机关，政治倾向，依靠群众，事实说话，实际出发，经济决定，迅速广泛。

又如对立统一规律与新闻工作关系的认识，作者重点论述新闻工作者应有科学的思维方法，他说："我们在这里所强调的方法论，是指新闻宣传工作中的思想方法，也就是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这属于认识论的范畴，而不属于新闻业务的范畴。这种思想方法问题是每个新闻工作者无论他分工报道什么总要每天思考的问题，他的工作的成功或失败常常有赖于他对方法的掌握如何而定。"作者列出20个题目，详尽分析对立统一法则对新闻工作的重要性，这20个题目是：辨利弊，分敌我，观全局，明冷热，务虚实，判真伪，兼褒贬，顾上下，操攻守，表主客，见点面，察快慢，求异同，论质量，定正反，审动静，据轻重，重奇突，别内外，通古今。通读全文，可见作者对于新闻学中的辩证法的娴熟运用。[1]

这一时期从事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相当丰富，影响广泛。由于飞速发展的新闻教育的需要，其中较多的是以教材形式出版的基础理论研究作品。1978年6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印了一本《新闻学概论》，内容分上中下三篇，共9章，各章的标题是：新闻的本质和特征，新闻事业的阶级性，无产阶级报纸的任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革命性与科学性的高度统一，又要有大方向又要新鲜活泼，坚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靠全党和全体人民群众一起来办，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办事。以后，这个大纲几经充实修改，成为教材，于1985年6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除绪论外全书充实为12章，各章的标题是：新闻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孵化了新闻事业，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事业的阶级性，新闻事业的党性，新闻事业的社会功能，新闻必须完全真实，新闻事业的指导性，新闻事业的群众性，运用

---

① 甘惜分：《对立统一规律在我们笔下》，《新闻论争三十年》，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76～210页。

新闻工具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新闻选择，我国新闻事业对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要求。

在此之前，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和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也分别编写出理论教学大纲。1977年9月，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编写出《新闻学理论教学大纲》，共分10章，分别为：报纸是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工具，宣传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报纸要自觉服从党的领导，正确地全面地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正确地反映实际和指导实际，抓革命促生产，正确宣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热情宣传和扶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文风，办好报纸的根本问题是报社人员的思想革命化问题。1978年1月，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写出《广播电视宣传概论》教学大纲，除绪论外共9章，分别为：我国人民广播事业的战斗历程和广播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社会主义广播电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舆论工具，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旗帜，全面地正确地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是广播电视的根本任务，大力宣传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正确地反映实际和指导实际，广播电视宣传的基本原则和革命的战斗风格，加强党对广播事业的绝对领导，依靠全党依靠群众办广播电视，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广播电视队伍。

1981年1月，甘肃《新闻理论与实践》开始连载复旦大学徐培汀编写的《新闻学概论》讲授提纲，共15章，开新闻学术报刊发表新闻学教材之先河。1982年1月，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康荫撰写的《新闻广播学研究》出版，全书共13章，即：历史，本源，特征，路线，性质（上下），作用，形式，风格，传统，队伍，领导，规律。1982年8月，黑龙江省记协、省新闻研究所出版由黑龙江省新闻学研究班编写的《新闻学专题讲座》，这是由新闻实务工作者编写的理论教材，共10讲，各讲标题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性质、任务、作用，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群众性，新闻的思想性、指导性与知识性、趣味性，新闻的真实性，报纸、广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新闻及新闻改革，新闻价值与新闻规律，新闻采访，编辑工作。

1983年9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张宗厚、陈祖声编写的《简明新闻学》，全书共分5章，分别为：新闻学，新闻，新闻事业，社会主义新闻工作，新闻业务。这年12月，人民日报

出版社出版由胡绩伟、李普、戴邦等人撰写的《新闻干部培训讲座选》。胡绩伟在代序中说，新闻干部的培训是当务之急，本书即为适应干部培训之需而编写的。

1984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戴邦、钱辛波、卢惠民合编的《新闻学基本知识讲座》，这本书多次印刷，影响很大。1985年9月，复旦大学新闻系余家宏、宁树藩、叶春华三位教授合撰《新闻学基础》，这是第一次将理论新闻学、应用新闻学、历史新闻学的主要知识体系合于一书，适应了正在兴起的新闻职业教育的需要。1986年7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成美、童兵合撰的《新闻理论简明教程》，此书是应我国首次招生的广播电视大学新闻学专业的教学需要而编写的。

1987年3月，长征出版社出版了由郑旷主编、全国20所新闻院校教师联合编写的理论新闻学教材《当代新闻学》，全书除绪论外共18章，各章标题为：新闻与信息，新闻价值，新闻与宣传，新闻事业的性质和功能，新闻事业和舆论，新闻事业与受众，新闻事业的自由与控制，新技术革命与新闻事业，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真实性原则，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指导性与服务性，新闻宣传中的典型和典型报道，新闻传播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新闻传播中的信息反馈和通联工作，新闻业务中的创新意识，新闻伦理，大众传播学与今日新闻学，新闻边缘学科简介。

1988年5月，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益民教授撰写的《系统理论新闻学》，该书由4部分组成：论新闻现象，论新闻事业，论新闻工作的政治规范，论新闻工作的业务基准。该书于1999年4月出了第三版。1990年12月，中国新闻学院教授郑保卫撰写的《新闻学导论》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全书除绪论外共15章，即：什么是新闻，新闻价值，新闻的真实性，新闻的客观性与倾向性，新闻的指导性，新闻与信息，新闻与舆论，新闻与宣传，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新闻事业的性质与功能，新闻事业的活动自由与限制，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人民性，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舆论监督与新闻批评，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的修养。1993年4月，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校新闻学院教授吴高福撰写的《新闻学基本原理》，该书共11章，各章标题为：新闻本体，新闻传者，新闻受众，新闻媒介，新闻作品，新闻传播，新闻与价值，新闻与真实，新闻与自由，新闻源流，新闻事业。这年11月，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成美、童兵撰写的又一本理论新闻学教材《新闻理论教程》。该书设三编12章，各章为：信息与新闻，事实——新闻报道者——新闻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新闻价值，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新闻事业的性质，新闻自由，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基本特征，坚持党性原则和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坚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加强新闻事业的群众性，舆论监督和新闻批评，新闻工作者。

这一时期出版的新闻学教材还有黑龙江省新闻研究所杨思迅的《新闻学教程》，武汉大学李卓钧的《新闻理论纲要》，安徽大学芮必峰的《新闻学基础理论》，北京广播学院雷跃捷的《新闻学教程》等。这些作者中，杨思迅是一位著作勤奋、思路敏捷的理论工作者，他善于用独特的语言表达自己独到的见解，每每新论问世，总会引起一阵不小的轰动。他的《新闻学教程》除卷首絮语外，设15章，分别为新闻篇（新闻特性论，新闻传播论，新闻价值论，新闻宣传论），事业篇（进步需要论，性质功能论，区别联系论，社会制约论），工作篇（真实立命论，服务受众论，党的观念论，软性指导论，褒贬扬抑论，新闻职业论）。

进入90年代以后，一些理论工作者试图将传播学的一些知识和原理运用于新闻学研究，以此为突破口，编写和出版了较有特色的理论新闻学教材。1997年7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了胡钰编著的《新闻传播导论》。1998年，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黄旦的《新闻传播学》。1999年1月，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清华大学传播系教授刘建明撰写的《现代新闻理论》，该书除绪论外共13章，这本新作突出了新闻学的理论思维，有一些新的知识点和理论架构。这年3月，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刘卫东撰写的《新闻传播学导论》，该书运用新的理论体系研究新闻传播的规律，全书12章，标题为：新闻传播学本体论，新闻传播客体论，新闻传播主体论，新闻传播载体论，新闻传播媒体论，新闻传播过程论，新闻真实论，新闻价值论，新闻传播受体论，新闻传播效果论，知识经济时代与新闻传播，新闻传媒市场论。同年5月，由童兵、展江、郭青春合撰的《新闻传播学原理》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设绪论和上中下三编共14章，上编为新闻传受编，5章，标题是：新闻传播的起源，新闻传播的过程，新闻传播的要求，新闻传受的心理机制，新闻传播的选择；中编为新闻媒介编，5章，标题是：新闻传播的演进与新闻事业的产生，新闻事业的性质与功能，当代新闻媒介，新闻媒介的有机运动——新闻自由，新闻媒介的有机运

行——社会控制；下编为操作规范编，3章，标题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新闻从业人员的行为规范。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新闻理论著作，如1989年2月出版的胡绩伟著《新闻工作论说集》，这是作者的论文集，收集了作者不同时期的论文35篇。安岗的《新闻论集》于1982年出版，安岗原名安正元，笔名郑远，1938年开始在抗日根据地从事新闻工作，1946年担任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49年4月任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55年4月奉派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为首届系主任(1955～1960)。他的《新闻论集》一书，积极主张新闻有学，提倡开展新闻经济学的研究，号召建立受众学，倡导新闻竞争。在他参加新闻工作50年之际，经济日报社还为其出版了《安岗新闻工作50年》纪念论文集。这个阶段出版的新闻学论著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戴邦的《论社会主义新闻工作》，林枫的《新闻理论与实践》，何光先的《现代新闻学》等。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新颖的理论著作，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童兵撰写的《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是新中国第一本史论结合、全面评述党和政府的新闻政策、传播人的新闻观点和媒介体制的研究性著作，该书以史立论、论从史出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精神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该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除前言外，共设5章，即：共和国的喉舌，回眸七年，阶级斗争的工具，“文革”重灾区，改革风云。又如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副主编朱光烈的《现代文化批判与新现代化道路》，运用文化学和社会学的方法，研究了新闻传播的文化本质，新时代传媒的展望及其社会功能的延伸等为人们关心的课题。徐耀魁主编的《西方新闻理论评析》，是我国第一本全面评介西方新闻理论的公开著作，全书除绪论外，设三编，分别为新闻理论探源，主要新闻理论评介，分析与评论。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几种较好的新闻工具书，其中有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冯健主编的《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刘建明主编的《新闻舆论学大辞典》，余家宏、宁树藩、徐培汀、谭启泰编写的《新闻学简明词典》，这些工具书的出版，标志着基础理论研究的进步。

这些年基础理论研究活动总的特点是：

参与理论研究的人员日益增多。

研究园地不断得到开拓。目前全国有各级新闻学会和新闻研究所、室近200个，公开出版的新闻学术报刊达40余家，内部印发的学术刊物更多。

新闻研究领域向纵深扩展。新闻学基础理论始终是研究的主题，并由此而延伸到一系列相近学科，如新闻心理学、新闻美学、新闻社会学等普遍受到人们的重视。

开始重视理论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如复旦大学新闻系王中教授就新闻学研究方法和新闻学研究者的思维特征发表的一些论文产生过很好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一些年轻学者就新闻学研究的方法改进发表过很多论文。人们不仅在研究中注意考察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对新闻学研究的影响，而且重视了解学术环境、媒介生态、学科修养、思维模式等更为广泛的多种因素，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越来越多地开始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这一时期新闻基础理论研究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研究方法的进步。

四、新闻改革中新闻理论研究渐次深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闻界迎着改革、开放、搞活的春风，掀起了改革的热潮。改革呼唤理论，理论推动改革，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新闻理论研究渐次深化，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纵观二十年新闻改革，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985年之前，新闻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指导思想和改革新闻业务。指导思想上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为中心。业务上针对空泛、陈旧、拖沓、迟缓等弊病，以"真、短、快、活、强"为目标，使新闻的信息量、时效性、可读性有较大的改进。

响应这一阶段改革的呼唤，新闻理论研究的重点是加强业务理论建设，基础理论研究则着力围绕新闻的特点、新闻是报纸的主角等内容展开。为此，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及解放日报等新闻院校和新闻单位撰写过一批很有质量的论文。

这一时期新闻改革与新闻学研究突出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新闻观念的更新和一些新观念的树立上，主要有：第一，破除单一的党报观念，确立国家和人民新闻事业的观念，以推动形成和发展以党报和新华社为核心，报刊、广播、电视相互配合、多类型、多样式、多层次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网和报业结构。

第二，破除单一的党性观念，在突出和强化党性的前提下，确立新闻事业的党性、人民性、群众性、民族性等多种观念，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对领导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结合起来。明确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既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又是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

第三，破除单一的指导观念，确立指导就是服务的观念，把新闻的指导性和新闻的服务性、新闻的思想性和新闻的知识性趣味性结合起来。明确大众传播工具的社会责任不仅是上情下达，而且肩负着下情上达、下情互达的使命。

新闻改革中，对新闻的基本功能进行了全面的探索和大胆的实践，由单一的宣传功能，转变为新闻、宣传、信息、舆论等多种功能。长期以来，中国新闻事业只注重宣传功能，看重新闻以至媒介的宣传价值，而对新闻的新闻价值、信息价值则注意不够，缺乏强有力的措施。在改革中，逐步认识并强化了新闻的传播信息和新闻、引导舆论、沟通情况、传播知识(教育功能)、提供娱乐、刊登广告等功能，使新闻事业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在全面发挥功能的过程中，进一步使自身得到改革和完善。

在改革中努力办出我国新时期新闻传媒的特点，这些特点是：

改变过去单向传播模式，代之以双向交流、上下沟通的新模式。新闻传播畅通的基本条件，是新闻发布者根据受众反馈及时进行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是经常倾听群众意见，不断改进新闻和宣传的内容和方法，把为人民服务提高到新的水平。所以，由单向传递转向双向交流，不仅是新闻工作向科学化的一种进步，而且是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新闻工作的必然趋势。

改变过去说教式的宣传方式，代之以对话、交谈的平等协商的方式。以往新闻发布者常以教育者自居，动辄批评训斥，空泛说教，把受众当作“我打你通”的消极对象；有的新闻领导机关把大众传播媒介视作单纯的传声筒，指令性新闻满天飞，新闻工作者难以充当领导和群众之间真正的“精神导线”。在改革中，逐步克服陈旧低效的宣传方式，强调平等相处，协商对话，坦诚交谈，畅所欲言，以事议理，以理服人。这种新的宣传方式，受到受众欢迎。

改变过去封闭僵化的传播秩序，代之以开放、灵活的新秩序。过去

新闻工作禁令太多，禁区重重，以致千人一面，众口一词。在改革中逐渐放权"松绑"，增加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透明度，强调新闻报道的公开性，"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扩大了新闻报道范围，增加了新闻言论自主性，减少了新闻批评的限制，强化了新闻工作者的独立意识，整个中国新闻事业，呈现出开放搞活的态势。

从总体上看，上述新闻观念已为多数新闻工作者和理论研究工作者认同，这既是新闻改革深化的结果，又是理论研究工作者努力工作的成绩。

1985年以后，新闻改革进入第二阶段，在转变和更新新闻观念的基础上，探索新时期新闻工作的新特点和审视新闻工作体制的利弊。这一阶段所撰写的数以千计的研究论文，现在看来，除一部分作者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冲击，或对中国国情不甚明了，因而所论所议曾对新闻改革产生过一些不好的影响外，多数论文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审慎的，所起的作用也是积极的。

这一阶段已经有少量的关于改革经验的研究成果，这种成果的共同特点是，既对过去几年改革尤其是观念更新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又面向未来，评判现有新闻体制，包括新闻传媒外部的领导体制与内部管理体制的有效性与低效性及无效性。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公开出版的如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的、沈阳日报总编刘黑枷撰写的《新闻创新谈》，这是作者的论文集，其中不少文章谈到管理体制的利弊。如开拓新的报道领域，走中国式道路等。内部编印的如中国青年报社研究部的《继承与探讨》，其中的论文如中国青年报编委会的《努力适应四化建设和青年成长的需要》，钟沛璋的《坚持方向讲究方法》等都强调新闻改革必须深入，在体制上要有所突破，追求新的个性与特色。四川《新闻界》编辑部编的《新闻改革与新闻实践》等，也有不少论文论及新闻体制的改革。

从这一时期起步的中国民意测验和传媒调查，给新闻改革以极大的推动与有益的指引。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所开展的《首都知名人士龙年展望》，其调查结果和研究报告，对新闻改革的深化与某些重点的突破，有着直接的冲击。这次调查结果是：

91.5%的人认为新闻媒介反映群众呼声太少，特别是为群众参政议政提供的机会和版面太少；

87%的人认为我国新闻媒介在报道政务和决策方面的公开程度不高；

77%的人认为我国新闻媒介对党和政府的政策只是宣传贯彻，而不对其利弊得失公开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首都新闻学会对全国七届人大代表也进行了类似调查，调查结果表明：

61.8%的全国人大代表认为，目前我国新闻媒介在社会协商对话中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不充分；

90.3%的代表认为，新闻媒介应成为人民议政的讲坛。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对全国新闻界人士的抽样调查得出如下的结果：

99.4%的被调查者认为，报纸必须尊重人民的知情权、发言权和监督权；

96.8%的人主张新闻媒介应进一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全面反映各方面的舆论和意见；

91.2%的人认为报纸有权对政府的具体政策和工作提出批评，有权对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生活和工作上的失误提出批评。

这些调查结果发表，当时对新闻界有很大震动，也有许多启发，同时对主管部门的推动也很大，引起他们的关注和研究。

舆论调查由此起步，出现了一批不错的成果。普通舆论学研究，有刘建明的《基础舆论学》、《当代舆论学》等，其中《基础舆论学》是中国大陆第一本普通舆论学著作，全书11章，各章的标题是：舆论研究与舆论学，舆论的起源与发展，舆论的产生与形成，舆论的要素与结构，舆论的特征与本质，舆论的类别，社会舆论的运动法则，舆论的社会功能，造成舆论的手段，当代舆论与现代新闻事业，舆论的测量。

《基础舆论学》之后，全国又有同类著作问世。较有新意的是，秦志希和饶德江主编的《舆论学教程》，该书设第一章绪论及三编11章，即：第一编舆论本体，含舆论的本质特性，舆论类别，舆论内在构成，舆论功能4章；第二编舆论过程，含舆论的形成，舆论演变及运动规律，舆论传播3章；第三编舆论史概及调控，含舆论形态的历史演变，舆论测量，舆论调控3章。这方面最新成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陈力丹研究员撰写的《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该书运用接受原理研究大众传播与舆论的互动机制，有不少新意与实用价值。该书共9章，即：认识舆论，舆论的形成，大众传播媒介与舆论的互动，舆论形态及相应的媒介引导，我国当代舆论的特征与媒介引导，接受理论与引导舆论，大

众传播媒介引导舆论的几种方式,我国当前舆论导向中的若干问题研究,区域性媒介引导舆论研究。

舆论学研究中以实际材料剖析为特色的著作很多,代表性的如陈崇山、弭秀玲主编的《中国传播效果透视》,喻国明的《中国新闻业透视》和《嬗变的轨迹》,喻国明和刘夏阳合著的《中国民意研究》,卜卫的《进入地球村——中国儿童与大众传播》等,这方面的新作是陈崇山与孙五三主编的《媒介·人·现代化》,全书共11章,各章标题是:传播与现代化的理论及其实证研究,中国的传播与现代化研究,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勃兴,我国受众媒介接触的若干人口特征,受众接触媒介行为与观念现代化,媒介内容偏好与人的现代化,受众媒介观念,人际关系和大众媒介的共同作用,传播与儿童的现代化(上下),结论与讨论。

尽管对于新闻体制改革的呼吁与探讨早在1985年已经开始,但是进展甚微,这是因为,体制改革是新闻改革中难度很大的一场攻坚战,体制问题又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稳妥谨慎地进行。加上新闻改革又是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的,因而必须全面规划,从长计议。在1989年北京风波之后,在党的领导之下,新闻改革在继续改善新闻机构内部体制的同时,重点放在新闻业务的改革上,抓短新闻,抓现场报道。改革者和研究者的这种思路和步骤,充分体现了积极、审慎和求实的精神。新闻体制改革,有大的进展和动作,是在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讲话发表之后。围绕体制改革的争鸣和经验评述,出现了一批论著。余心言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收集了作者在主管新闻工作期间的重要讲话及有关论文,其中不少涉及新闻体制及其改革。新华通讯社社长郭超人的《喉舌论》,涉及体制部分,从新华社的消息总汇与党的喉舌的角度,审视这些年来新华社体制的演变与改革。范敬宜的《总编辑手记》则从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角色定位,记叙他在这一体制运作中的经验。直接论述体制改革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组织教员编写的关于新闻传媒新闻体制改革经验的丛书,由北京青年报原社长崔恩卿写的《报业经营论》等著作。

同新闻体制改革直接相关的论述,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梁衡著的《新闻原理的思考》。该书对新闻事业与市场经济,新闻事业与新闻行政管理,有相当充分的阐述,对市场经济下中国新闻传媒的属性,也有全面和突破性的分析。新华出版社1999年开始设立的新闻传播学博

士文库，出版的赵鹏的《中国报业集团发展研究》，陆地的《中国电视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分别是对中国报业体制和电视业体制深入研究的成果。常德日报社周奇的《地市党报概论》，其中以主要篇幅研讨地市党报的体制改革。1993 年 5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同无锡日报和江阴市委宣传部联合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新闻事业研讨会”，会后论文汇编成集出版，这本文集主要是研讨新闻体制改革的，论文作者来自各新闻机构、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由此可见，新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已在全国范围内吸引了一批研究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

总之，从 1992 年开始的以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新闻改革第二阶段正在深入进行，其理论研究的成果也必将不断涌现。

广播电视理论研究，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新闻改革的深化也有重大进展。这些年，在以往实务研究的基础上，电视理论有新的突破。1998 年，《中国电视论纲》出版，该书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理论课题组完成，杨伟光主编。这本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从中国电视实际出发，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电视的基本特色。在考察中国电视发展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阐明了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中国电视事业的性质、任务和功能，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节目、技术、经营和管理发展的基本规律，论述了中国电视观众、从业人员素质、理论建设同发展社会主义电视事业的密切关系，描绘了 21 世纪中国电视发展的目标，说明了加强中国电视发展战略研究对实现总体目标的重要性。全书除长篇序言外，设 12 章，即：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电视事业，中国电视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电视节目的社会主义方向，多样化的电视节目表现形态，树立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形象，先进技术是电视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电视产业经营的探索，科学化的体制和法制化的管理，观众反馈是电视传播的重要环节，造就一支高素质的电视队伍，重视和加强中国电视理论建设，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电视。

这些年，与新闻学相关的学科，随着新闻传播实践的发展和新闻改革的深入，一个接一个建立起来。新闻法学（又称新闻法制学）的研究是其中较早、较快的一个。从 1979 年开始，就有人撰文呼吁制定新闻法，并随即有学者着手新闻与法律的相关性研究。孙旭培、魏永征、曹三明、张宗厚、陈泰志等学者或从公民权利入手研究，或从新闻官司剖析进行探讨，撰写出一批论文，有的则在书中辟出专章进行研究。这一

时期，介绍各国新闻传播与媒介的立法及法律文件的著作，也不断问世。孙旭培的《新闻学新论》设有新闻立法的专章。曹瑞林的专著《新闻法制学初论》已于1998年9月出版。这本书设绪论，新闻出版法论，著作权法论，新闻侵权责任论等四论，评论者认为这一体例安排有新意。王强华、宋克明、魏永征、顾理明等学者也就传播者的法律责任、英美新闻法规、新闻官司和新闻法学出版了自己的专著。

由于新闻侵权事件日趋增多和新闻从业人员防侵权意识薄弱，由新闻学者或法学家执笔的关于新闻责任的著作已出版多部，较重要者有：孙旭培主编的《新闻侵权与诉讼》，该书共10章，即：绪论，侵害名誉权，侵害隐私权，其他侵权形式，新闻侵权的责任分担，更正与答辩，新闻纠纷的仲裁与调解，起诉、应诉与辩论，新闻侵权的损害赔偿，如何防止侵权和减少涉讼。魏永征著《被告席上的记者——新闻侵权论》，全书除前言外共7章，即：新闻侵权诉讼的历史回顾，侵害名誉权：最常见的新闻侵权行为，容易被新闻忽略的"误区"：隐私权，新闻媒介与肖像权，侵权主体——谁承担新闻侵权的责任？新闻侵权行为的补救和自我调整，新闻侵权纠纷法律关系的两重性。王利明和杨立新合编的《人格权与新闻侵权》，该书共三编23章，第一编人格权总论，含人格权概述，人格权的历史发展，一般人格权，侵犯人格权民事责任构成，人身伤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第二编具体人格权，含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信用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贞操权、著作人身权；第三编新闻侵权，含新闻侵权与新闻侵权法，新闻侵权民事责任主体，新闻侵权损害的救济方式，新闻侵害名誉权，新闻侵害隐私权，新闻侵害肖像权。此外，还有张守文和周庆山合著的《信息法学》，郑成思著的《版权法》等。

新闻文化学也是起步较早的一个边缘学科。新闻文化学把大众传媒作为亚文化现象来研究，是研究新闻传播过程中的文化特征与文化现象及其规律的新闻新学科。其开山作是刘智的《新闻文化论》，这本书除绪论外共7章，各章标题为：文化论，新闻论，现象论，形态论，传播论，符号论，传统论。这是一本关于新闻文化学的概论。秦志希的《新闻舆论与新闻文化》，则对新闻舆论的文化渊源进行挖掘，弘扬现代新闻传媒的传统文化精神。方延明的《新闻文化外延论》是从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美学、科学学等与新闻文化相关的诸学科，透视新闻文化的内涵及其特征。由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改换传播学的特殊视

角去分析新闻文化现象，实际上也是一次对源远流长的中国新闻文化之旅的考察。

新闻心理学是近年崛起的又一新闻新学科。1981年，徐培汀开始将读者心理学改提为新闻心理学，不久他的同事张俊德教授和刘海贵合著的《新闻心理学》问世。这是大陆第一本新闻心理学专著，全书共7章，即：采访对象心理，记者心理，写作心理，编排心理，读者心理，新闻敏感，记者修养与心理学。以后陆续有新作出版，如1988年10月出版的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教授汪新源的《新闻心理学》，该书除绪论外共12章，即：记者要组织注意品质，采访情绪的促和控，记者的采访表情和风度，记者气质、性格的探讨，培养记者的意志力，采访对象的访前心理，采访中的互感效应，采访中反馈的应用，读者心理规律的探索，读者的阅读心理，读者的共同性心理，挖掘读者的记忆潜力。1988年1月出版的广西大学新闻系教授虞达文的《新闻读者心理学导论》，该书共9章，标题为：引进心理学研究新闻读者，适应读者的需要，引起读者的注意，唤起读者的表象，诱发读者的再造想象，促进读者的联想，新闻评论与读者思维，记者与读者的情感相通，新闻的真实客观全面公正与读者的逆反心理。这年3月，《当代新闻》和《大石头林业报》编辑部联合印制了徐培汀教授撰写的《新闻心理学发凡》，共9章，即：一门诱人的学科，新闻传播与心理效应，采访心理的研究与应用，记者心理品质与采访心理过程，文章心理学与新闻写作心理，"读者需要"与读者心理研究，编辑工作与编辑心理学，新闻人才与新闻管理心理，新闻广告与广告心理学。从上述五位教授的四本新闻心理学著作中可见，他们的研究深度已较最初问世的著作有许多开掘，这也应了先有后好的著作之道。

1993年出版了北京广播学院刘京林的《新闻心理学概论》，这本书的篇幅比先行者有所拓展，共三篇10章，即：绪论，新闻心理学理论，新闻传者篇含新闻工作者的心理素质，新闻采访心理，新闻写作心理，新闻编辑心理，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心理；新闻受众篇含新闻受众心理的一般概念，受众的态度；新闻管理篇含新闻活动中的思想工作管理。

新闻心理学研究已开始向新闻传播过程的各环节、各方面扩展。1992年8月出版的席文举撰写的《新闻批评心理学》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作者对新闻批评过程中的各行为主体心理活动进行描述与分析，提出改进报道技巧，减少心理障碍的各种心理调谐举措。这本书共6章，

即：概论，受众心理，被批评者心理，作者心理，编辑心理，新闻批评的艺术，书后附有我国社会主义新闻批评史上若干重大批评报道。

甘肃省新闻研究所和北京广播学院曾先后大力推动新闻心理学研究，主持召开学术研讨会，出版论文集。中国的新闻心理学研究有今天的进步，这两个单位功不可没。

新闻心理学研究的最新出版物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郑兴东的《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该书1999年4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全书除前言外共9章，即：受众分析，受众的需要与期望，受众的注意，受众的理解，受众的接受，传受关系，传播者形象，传播媒介的引导，受众的逆反心理。

新闻美学是又一个新开辟的新闻学研究领域。早在1981年，由《新闻研究》杂志发表的题为《研究新闻应重视与其他科学的关联》一文中，作者张达就提出"新闻美学"一词，主张开展对于新闻美学的研究。以后，不断有论文研究新闻美学的特征、分类、本质、及其在新闻传播中的功能。重要者有何舟的《新闻特写形式美初探》、时统宇的《试论新闻写作中的审美信息的作用》、危明华的《新闻美学断想》、杨秀国的《关于建立新闻美学的构想》、徐培汀的《新闻美学是一门新闻学的新学科》等。1993年10月，邱海理撰写的《新闻美学》由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后记中说，这是他20年新闻工作的总结，也是向新闻界、美学界老前辈和同仁们学习的心得。这本书共14章，标题为：绪论，新闻美学的地位与作用，主题思想美，结构美，标题美，细节美，意境美，语言美，风格美，报刊编排美，广播音响美，新闻摄影美，新闻图像美，新闻工作者应有美学修养。从全书看，基本上包含了这些年新闻美学探讨的主要内容。1993年3月，出版了徐文武的《音响美学初探》，作者认为，音响美学，就是音响物质运动规律的审美评价学。

新闻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是新华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的杨健著的《新闻审美》，穆青为此书作序言指出，这本书从新闻实践出发，探讨新闻审美的规律，对提高新闻报道的审美价值，推动新闻学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这本书共14章，标题为："人面桃花相映红"——新闻与美，"二月春风似剪刀"——新闻的审美环境，"万古长青，只有一真耳"——新闻的真实美，"力拔山兮气盖世"——新闻的崇高美，"一枝红杏出墙来"——新闻典型美，"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新闻的形象美，"言外之味，弦外之响"——新闻的意境美，"豪华落尽见真

淳"——新闻的质朴美,"林无静树,川无停流"——新闻的流变美,"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新闻的文约美,"清冰一片光照人"——新闻的主题美,"回眸一笑百媚生"——新闻的标题美,"不畏浮云遮望眼"——新闻的审美思维,"润物细无声"——新闻美的接受。

新闻社会学的研究也有不少进展。1981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作题为《社会学与新闻学》的报告时,就提出建立新闻社会学的设想,同时指出了四方面的研究内容。不久《新闻研究》杂志发表了夏邦斯撰写的论文《新闻社会学刍议》。随后,关于新闻社会学的研究论文不断问世,运用社会学方法对传播效果及受众收受传媒行为进行的调查也日益频繁。1987年出版了日本学者的《电视社会学》中译本,1988年出版了苏联学者的《新闻社会学》中译本。1990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一届亚运会期间,一些新闻研究机构、新闻机构和教育机构联合进行了亚运会宣传调查,调查结果和研究报告汇集成《中国社会心理的轨迹》出版,这是社会调查法运用于传播效果研究的一次实践。1998年,两位电视理论工作者李春利和周军合作出版了《广播电视的社会结构》,作者将广播电视放在社会结构的宏观架构中考察广播电视的社会本质。该书共7章,即:研究的方法及对象,从社会结构关系到传播活动,现代媒介的社会特征,广播电视符号系统的社会性,广播电视的意义理论,传播效果的社会性,具有中国国情的广播电视。

宣传学是同新闻学相关性极密切的学科。宣传学早已有之,新时期的宣传学研究的首倡者,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林之达,他于1987年组织了全国首届宣传学学术研讨会,并于次年出版《宣传科学研究纲要》。目前流行较广的两本宣传学著作,一本是复旦大学教授李良荣主编的《宣传学导论》,全书12章,标题为:宣传的性质,宣传的社会功能,社会舆论和宣传,宣传和宣传效益,宣传和宣传者,宣传和宣传对象,政党宣传,宣传管理,宣传渠道和媒介,事、理、情——宣传三元素,宣传方法和技巧,新时期新任务新挑战。另一本是兰州大学戴元光教授主编的《现代宣传学概论》,全书由上中下三篇组成,上篇为总论,由概述、历史上的宣传理论与实践组成,中篇为宣传过程与效果,由宣传符号、宣传者与把关人、宣传效果、宣传策略、宣传技巧组成,下篇为宣传类型,由演讲与劝服、新闻宣传、经济宣传、公关广告宣传、民族宣传、军事宣传组成。

随着职业道德建设的进展，新闻伦理学近年也有较大发展。1982 年王晨的论文《社会主义新闻道德初探》是最早呼吁建立新闻伦理学的论文。1983 年《职业道德广播讲座》中收有当时北京新闻学会副会长戴邦一文，题为《真实准确实事求是——谈谈新闻工作者的道德》。1985 年知识出版社出版的王大学编著的《编辑的修养》，集中谈到编辑的素质和道德。1990 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姚文华著的《记者素质与成名》，集中讨论新闻记者应有的修养。1992 年黑龙江省记协和省新闻研究所主编的《新闻队伍建设学术论文集》，其中不少篇幅论述新闻职业道德建设问题。1995 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闻学院教授周鸿书著的《新闻伦理学论纲》，是以新闻伦理学冠名的新中国第一本专著。这本书共六篇 20 章：概论篇含什么是新闻伦理学，新闻伦理学是个独立的学科，新闻伦理学的特征和价值 3 章；历史篇含新闻道德的起源与形成，新闻伦理学的形成和现状，新闻道德与新闻立法，外国报业自律的评介 4 章；关系篇含建立感情良性传递的新闻道德关系，新闻机构内部的各种道德关系，新闻机构外部的各种道德关系 3 章；规范篇含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新闻必须真实客观公正，遵纪守法廉洁奉公，新闻道德的几个范畴 4 章；功能篇含新闻媒介对社会道德建设的任务，新闻作品影响社会道德的方式，新闻媒介对社会道德建设的作用 3 章；修养篇含新闻工作者追求的道德境界，道德教育的基本规律和方法，修养是形成优良道德品质的关键 3 章；书尾附录有关国家新闻道德准则。1996 年，由董炜博士执笔的《新闻职业道德》出版，这本书的主体是董的博士论文，全书共 8 章，即：新闻道德的产生与发展，新闻道德的特征与作用及其原则与规范，新闻传播行为的道德选择与评价，新闻道德的失衡与错位现象，新闻工作中若干新型关系与问题的道德辨析（上下），新闻道德与法律规范，市场经济发展与新闻道德建设。1997 年出版了由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和杭州大学四院校联合编著，陈桂兰主编的《新闻职业道德教程》，全书共 10 章，即：道德与职业道德，新闻事业与新闻职业道德，新闻职业道德品质的培养与提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真实客观全面公正，忠于职守团结协作，清正廉洁遵纪守法，中外名记者道德风范，外国新闻职业道德综述，我国台港澳地区新闻职业道德概观，书尾附录有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新闻道德规约。

新闻经济学又称媒介经济学，在这 20 年里，尤其是确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从兴起到发展十分迅速。安岗在1982年提出建立新闻经济学的呼吁，不久中宣部开办报业经营管理研讨班，迄今不仅成立中国报业协会，出版中国报业杂志，而且专著也不断问世。1993年，胡太春博士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此文于1998年12月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我国少见的报业经济史，除导言外，设4章，即：19世纪初叶至20世纪初叶中国近代报业初期的经营管理，20世纪初叶到40年代末期中国资产阶级报业的经营管理，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无产阶级报业的经营和社会主义报业向科学化管理迈进，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报业的经营管理。而提出关于体制改革的两篇博士论文，是研究媒介经济的成果。曹鹏的《中国报业集团发展研究》于1999年4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这篇研究中国报业新进展的论文，共7章，即：新闻改革的突破：从报社到报业集团，报业经济：商品与产业特征解析，近20年中国报业经济潮流走势，中国报业集团的生成机制与管理模式，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探索与实践，组建报业集团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限制，结语：报业在中国市场中的经济前景展望。陆地的《中国电视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此书于1999年9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全书共7章，即：绪论，中国电视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基本问题、指导思想及方法，电视产业的基本功能，中国电视产业经营现状，中国电视产业的管理现状，中国电视产业发展战略分析，中国电视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和实施。

由北京青年报原社长崔恩卿撰写，总结这份在北京崛起多年的报纸经营管理经验的《报业经营论》，于1998年5月出版，这本近40万字的专著，从观念与战略、经营与管理、规划与总结三个方面描述了北京青年报卓越的管理业绩，书尾还附有该报的规章与发展数据，这些材料是不可多得的。四川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4月出版的《中国有线电视经营论》，作者是四川大学广播电视研究所所长吴信训教授和四川广播电视厅厅长李之侠。这本书研究了新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中国有线电视台的经营管理。1998年2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面向21世纪的中国报业经济》，这本经验性的论文汇集可以看作自把报业看作产业以来的理论与实践的一次大检阅，内容除许中田等四位领导人的论文外，分趋势前瞻，经营方略，定位选择，行业报专论，欠发达地区报业发展，发行，广告，多种经营，印刷厂及纸张管理，财务管理，无形资产，从事管理，回顾与反思等部分。

可喜的是,新中国第一本新闻统计学的专著也已出版。1998年5月,由中国新闻学院教授姜秀珍撰写的《新闻统计学》问世,新闻统计学可以看作新闻经济学的延伸,也可以看作是一门独立的新闻新学科。《新闻统计学》除前言外共设16章,即:新闻统计的产生与发展,新闻统计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方法,新闻统计调查,新闻统计资料的整理,描述性新闻统计,总量数和比率数,平均数,变异数,推测性新闻统计,统计抽样,均值差和比率差分析,方差分析,卡方分析,相关和回归分析,非参数统计分析,多变量统计分析。

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不同地域、制度下的新闻现象和新闻传媒进行对比分析的研究,这几年开始展开。1985年,宋晓男的《比较新闻学初探》,1986年李海容的《东西方民意测验的比较研究》,1987年徐培汀的《比较新闻窥探》,是最初的一批论文。由陶涵主编的《比较新闻学》于1994年4月问世,是大陆第一本比较新闻学的著作。这本著作对理论、法制、所有权、管理、世界新闻史5个方面进行了对照分析。同年9月,由樊凡和单波合作主编的《中西新闻比较论》出版,此书侧重于文化学的考察比较,全书共6章,即:绪论(含当代新闻的理解、沟通与重建),中西新闻思维的相似与歧异,中西新闻传播的文化制约力,中西新闻道德意义的描述与理解,中西新闻文体的流变,中西记者的新闻实践。1997年1月,出版了由刘夏塘主编的《比较新闻学》,此书从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进行中西对比研究,全书18章。

比较新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是1999年9月由童兵主编,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西新闻比较论纲》,这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全书除前言外,共设7章,各章标题为:中西新闻事业的历史回顾,中西编辑方针的比较,中西传媒组织的不同架构,中西新闻传媒社会调控观照,中西新闻法制和新闻伦理异同,中西新闻教育对比,中西新闻观念辨析。

未来新闻学是未来学方法在新闻研究领域的运用,是未来学的分支学科,又是新闻学的新学科。四川大学张惠仁教授于1988年在《未来新闻学》论文中,首次提出研究未来新闻学的主张。云南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4月出版的颜建军博士的《第四产业大崛起》,是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作者预测第四产业——信息事业和高智力、高科技、高技术策划社会活动的产业,正在成为中国的新兴产业,他主张"凭智力赚钱"。全书共14章,即:沟通——兴起一个产业,信息战打出了第四产业,韩

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第四产业的区域策划，市场给第四产业的机遇，第四产业的中坚力量，媒介渗透当代社会，媒介产业化浪潮，返回到沟通的原始构想，历史给第四产业的启示，第四产业人才观，第四产业是知识产业，符号在当代的妙用，一个运用文化形象的产业。这本书是颜建军博士论文的主体部分，以第四产业为研究课题作博士论文，颜也是第一人。

五、学术研究中新闻观点的共识与分歧

这 20 年，我国新闻学研究开始倡行百家争鸣，平等讨论，因此新论迭出，新闻新学科不断衍生，每一学科又不断细化，对于新闻学基本范畴的共识越来越多，生动地表明学术研究繁荣中的进步和深化。

下面从四个方面对新闻学基本范畴的若干共识进行大致的归纳：

（一）关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对什么是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过去有三种主张：或从信息始，或从新闻始，或从事实始。经过争鸣，多数人赞同从事实如何成为新闻即从“传播”始，还有人为此称新闻学为“事学”，以与称为“人学”的文学相对。

对新闻的定义，20 年讨论起伏延宕，提出定义不下 30 种，但多数人坚持继续用陆定一“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的定义，认为该定义正确表达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新闻本源观，揭示了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主客观关系，抓住了新闻共性，符合科学规定性。所以他们主张在没有找到更新的更好的定义以前，继续使用陆定一的定义。还有较多的人认为，新闻的定义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传递。

关于新闻价值，人们开始从主观标准的测试转向将其视作新闻事实内涵的客观素质，提出新闻价值是新闻事实满足社会需要的功能。同时，又提出宣传价值则是宣传者的主观意愿适应客观社会发展规律的功能，大部分新闻既有新闻价值，又有宣传价值，是谓“新闻的双重价值”。但要指出，目前主张淡化新闻的宣传功能的也不乏其人。

新闻与宣传之关系，是 20 年讨论的一个热门课题，大致有交叉、包容、等同、并列四说，其中以交叉说者为众，即认为新闻与宣传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主张新闻工作者同时应负起宣传的责任。

对新闻的本体与新闻根据，目前形成了这样的共识：要尊重本体，因其决定一件事何以成为新闻；但又必须重视新闻根据，因其决定一件

事何时成为新闻，我们既要探求群众未知的、共同关心的事实，又要务力寻求成熟的发表时机，因而对时效性的认识，应从时间性、时新性、时宜性三方面加以正确把握。

关于新闻真实性的科学涵义，多数人主张：事实真实、总体真实、揭示事实本质。反对重提"本质真实"的口号，认为该口号不科学，且在过去曾危害过我们的工作。对真实性的重视，引发了对"新闻文学"的实践与理论的激烈争论，至今仍有两种对立看法。一种人坚决反对，指出新闻和文学是两种不同范畴，强调新闻的文学性，将助长失实报道。另一种人则热烈赞同，认为新闻文学的出现是新闻改革的必然产物，逻辑上不会助长失实。因为新闻文学不是新闻加文学，它只是采用文学的某些手法，在不动摇真实性的情况下报道新闻事实的一种边缘体裁。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全国性的和有影响的部分省级新闻学术刊物所发表的文章几乎都站在后一种观点一边。

关于新闻的指导性与服务性，目前有三种意见：应以服务性为主，不宜再提指导性；两者应相辅相成；强调指导性寓于服务性之中。但持第一种意见者为数不多，持第三种意见者众。

（二）关于新闻事业的性质与功能

关于新闻事业的性质，是20年来长期争辩的论题，至今存在两种相左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新闻事业在阶级社会，既主要作为反映和引导舆论的工具出现，又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因而用"阶级舆论工具"概括其性质较为准确，后又补充概括为"阶级新闻舆论工具"或"有阶级性的新闻舆论工具"，目前的多数辞书和教科书均采用此种提法。可以说，对此基本形成了社会共识。但也有人认为，表述新闻事业性质，从理论上还应考虑无阶级时代条件下它的属性，而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性则成了新闻事业的主要特征；即使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性也不是新闻事业的主要属性，而用社会性更能突出新闻事业的广泛社会功能，因而主张用"社会舆论工具"表述新闻事业性质。

与对新闻事业性质的认识有关，对社会主义及其初级阶段的报纸要不要继续强调"灌输作用"和"组织作用"也曾进行过争鸣。一部分人认为，现阶段已非建党时期，这两种作用已时过境迁；再者，数十年来因曾强调这两种作用而给我党我国带来很大损失。但大多数人不同意这种看法，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意识不仅要靠引导而且要靠"灌输"，这一原理并没过时，社会主义报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和

引导社会舆论，成为宣传党的思想和政策的中心方面负有光荣而艰巨的职责，这两种作用不仅不能放弃、削弱，还应在新的形势下不断得到加强、改善和发展。

对于“喉舌论”，也发生分歧和争论。多数人认为，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喉舌论”，是新时期新闻事业性质的一种形象化的表达。也有人表示担心，怕过分强调“喉舌论”导致新闻传媒职能的单一，妨碍新闻工作者的主动性，甚至会影响新闻自由。学术讨论中人们对这种担心进行了有说服力的分析。

党性和人民性及其相互关系，是早期争论的焦点问题。应该指出，1989 年江泽民和李瑞环就此问题发表的意见，也是经过多年讨论后我国多数新闻理论研究者的共识，即在肯定党性的核心地位的前提下对人民性给予相应的重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既有鲜明的党性，又有强烈的人民性。反对党性以及淡化、削弱党性的一切观点、主张和口号都是错误的，否定人民性，也是不正确的。应当把党性和人民性有机地统一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割裂开来。从 1983 年以来，对于人民性高于党性，党性来自人民性的观点已有较深刻的辨析和批评，“党性只能来自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科学社会主义”，“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因为党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私利”，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当然，也还有少部分人对这些观点正在思考，他们原认为党性和人民性是对立的、矛盾的。从新闻学研究的角度看，学术观点上的分歧也允许存在，并应给予必要的反思的时间。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报纸该不该抓典型报道，20 年期间展开过热烈讨论。基本看法有三种：充分肯定，基本否定，基本肯定但又指出必须改善。多数人强调新时期典型报道仍要坚持，但应有所改进，要突出时代特色，使典型具有双重价值，求真求新，并赋予典型报道以新的形式。

由新闻立法而展开的新闻法制观念的论辩在以下各点基本形成共识：我国新闻法应是一部以确立和保护公民新闻自由、同时又防止和打击滥用这种自由的社会主义法律，应为正当的舆论监督提供法律保护，针对我国国情对新闻诽谤、新闻失实等法律责任、更正与答辩作十分明确和便于操作的规定。

此外，这些年对新闻事业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两为”方针，对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对坚持正确的新闻舆论导向诸问题，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以江泽民和李瑞环讲话为基本共识的基础

上，提出了若干新的观点。

（三）关于如何对待西方新闻传播学说

经过50年来尤其是近20年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目前我国新闻理论研究工作者在基本态度上已普遍建立起这样的共识：作为指导资产阶级新闻实践的资产阶级新闻理论，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性，它维护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反映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对此应有清醒的估计。另一方面，其理论也含有反映新闻传播活动一般规律的科学的成分。因此，我们应当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和方法，对资产阶级新闻传播学说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既不全盘照抄，也不一概排斥，实事求是地吸收其中有益的内容为我所用。在如何继承发扬本国传统的问题上，也有了如下共识，学习外来知识和外来理论，必须立足于本国的文化传统，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新闻工作的实际出发。排斥传统，否定传统，盲目迷信和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的倾向是错误的。

20年中，虽然也存在一些偏离理论研究正确方向的现象，但总的来说，关于传播学、公共关系学、舆论学等源于西方的同相关的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由于研究者的政治方向正确，方法对头，也还是取得了一些较好的成果。比如传播学的研究，20年中几起几落，但总的研究进展是健康的。多数人对这门学科已具有下列正确共识：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传播活动的新学科，它的研究内容为：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传播的社会功能和机制，传播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传播的社会控制方式，传播的社会效果；它的研究方法强调把理论的归纳和推导建立在严格准确的数据资料及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包括实地调查、内容分析和控制实验，以及广泛吸收和借鉴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内容和方法，不仅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而且对新闻学的建设也是很有意义的。

（四）关于新闻学新学科

经过20年的研究与交流，多数研究者认为新闻学新学科的建立，是必要的，是新闻科学研究深化和繁荣的需要。认为新闻学新学科指新闻学与其他交叉学科共生的新枝，也是新闻边缘科学的延伸与结合。人们认为，新闻学新学科包括：新闻心理学、新闻经济学、新闻通联学、新闻哲学、新闻伦理学、新闻管理学、新闻社会学、新闻法学、新闻广告学、新闻美学、新闻文化学、新闻文学、新闻统计学、新闻敏感学、新闻语言学、比较新闻学、新闻人才学、新闻政治学、新闻逻辑学、新闻宣传学、

新闻信息学、新闻传播学、新闻舆论学、新闻控制学、新闻教育学、新闻思维学、新闻读者学、微电子新闻学等近30门学科。

对于上述新闻学新学科中的下列几种，大致已形成这样的共识：

1. 新闻哲学 对一切新闻传播现象的哲学研究。它主要借助哲学方法研究新闻传播现象，探究其本质、规律，总结其工作经验。

2. 新闻文化学 研究新闻传播中人类的文化心理、文化意识和新闻传播的文化机制的学科，是介于新闻学与文化学之间的一种边缘学科。

3. 新闻社会学 研究新闻传播的社会结构，社会功能和社会效果以及整个社会关系的学科，是介于新闻学与社会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

4. 新闻心理学 研究新闻传播活动中心理现象发生和发展规律的学科，是介于新闻学与心理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

5. 新闻美学 研究新闻传播内容与形式的美学价值及其规律的学科，是介于新闻学与美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

6. 新闻受众学 以新闻受众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它借助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等现代科学方法考察新闻受众的构成及心理特点，研究新闻受众接受新闻传播的动机、渠道及方式习惯，探讨新闻传播适应受众需要的特点及其规律等。

7. 新闻法学 研究新闻立法以及新闻与法制的关系及其规律性的学科，是介于新闻学和法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

8. 新闻经济学 研究新闻传播领域内的经济关系和新闻传播中经济活动的特点与规律的学科，是介于新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

9. 新闻统计学 研究新闻传播中的数量关系的学科，是介于新闻学与统计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

10. 新闻伦理学 研究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形成及其规律的学科，是介于新闻学与伦理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

11. 宣传学 研究宣传活动和宣传工作的特点与规律、宣传与其他社会行为的关系和作用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政治学、历史学、新闻学、传播学等学科。

12. 舆论学 研究各种舆论现象，揭示舆论的本质、特征及社会功能，探讨舆论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学科，下属分支有：理论舆论学、道

德舆论学、新闻舆论学等。

13. 比较新闻学　一门用比较方法研究各国新闻活动、新闻事业和新闻制度，从中探求基本新闻规律的学科。

14. 未来新闻学　未来学是根据现时资料，研究并预测未来的一门综合性新兴学科。未来学主要基于新闻报道的信息，研究现代科技、经济和信息传播对社会发展的综合后果，预测未来社会的状态和发展趋势。未来新闻学是未来学的分支学科。它指根据历史和现实的新闻资料，研究和预测未来新闻传播、新闻传媒、新闻教育、新闻学研究的一门综合性新兴学科。①

六、新闻理论研究工作者梯队初步形成

20年理论新闻学研究既出了成果，又出了人才。

我国新闻理论研究人员主要分布在三个方面，一在新闻实践部门，二在全国及地方各级新闻研究部门，三在新闻院校。

经过20年理论探索和争鸣的锻炼，我国新闻理论研究者已逐渐形成老中青相结合的合理梯队。其中老同志凭借他们的经验、学识和威望，在这支队伍中起着学科带头人和稳定情绪、把握走向的骨干作用。在20年研究中，他们表现得活跃、热情，常给理论之树增添时代的活力和实践的绿素。甘惜分对党和人民新闻事业的忠诚，和追求真理一往无前的理论胆略，令中青年敬佩不已，他的每篇新论，总有新的思想，新的见解，他对非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点的批判也毫不留情，又总是谦逊地听取别人的批评，勇于修正自己的看法。安岗常常首开某个新领域的研究先河，受众学、新闻经济学、公共关系学的研究道路上，有他最初洒下的汗水。穆青提出新闻报道的形式和结构应向自由的活泼的散文式的方向发展的意义，并不限于提倡写作创新，而更着眼于思想的解放和新闻工作更好地为读者服务。每当研究面临雾障和困惑的时候，戴邦就推出自己研究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新闻思想的论文，商恺发表记者素质和修养的文章，为研究廓清是非，祛除疑窦，规箴激励人们坚持研究，多出成果。李庄出版《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用自己的经验与教训，引导人们不忘过去的历史。康荫以其勤奋，每二三年出版一部书稿激励青年人努力攀登，为繁荣新闻科学尽心尽力。徐培汀可以说是老

① 参见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9～102页。其中，未来新闻学系著者所撰。

一代学者中最勤勉最刻苦的了，理论新闻学和一系列新闻学新学科的研究中，不少地方有他研究的足迹，说他是一系列新闻学新学科研究第一人，也不为过。

从总体上看，中年新闻理论研究者执著、稳健，课题明确、稳定，成果也较系统、完善。例如，黑龙江省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杨思迅以5年之久潜心研究和撰写了《理论新闻学述要》（出版时改为《新闻学教程》），在众多的基础理论论著中占有一定地位。上海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魏永征从剖析新闻案例入手，进行新闻立法与记者法制观念的系统研究，在全国有相当影响。《光明日报》记者樊云芳和丁炳昌，运用立体思维方式，不仅写出了许多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作品，而且对这种主体思维和"全息摄影"文体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他们的著作《新闻文体大趋势》同《人民日报》记者艾丰的专著《新闻采访方法论》及《改革方法论》，是近年来问世的研究思维方式和新方法论的上乘之作。

青年新闻理论研究者在20年里表现了极大的理论兴趣和研究热情。他们凭着年轻人对事物的敏感，较为全面的知识和娴熟的外语能力，20年来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论著、新闻基础理论研究的诸多领域，成为热情、执著、勤于思考因而也颇有收获的理论研究者。这支队伍中，刘建明、童兵、郑保卫、李良荣、孙旭培、陈力丹、明安香、徐耀魁、戴元光……都以精湛的学识、无畏的胆略和丰硕的成果在新时期新闻理论研究的史册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如今，他们都已步入人生的中年，一批更年轻的学者以自己的优秀的研究成果耕耘在理论新闻学的论坛上。

以老中青相结合，理论知识经验互补为特点的新闻理论研究梯队，其科学性和有效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年龄层次合理。老者持重，中者稳健，青年热情敢闯，使我国新闻理论研究事业不断，后继有人；

知识素养全面。实践、教育、研究三个领域的研究者便于实现知识互补，使新闻学这一政治性和思想性、理论性和实践性极强的学科拥有知识结构健全、实践经验和理论素质齐备的数以千计的理论研究工作者；

研究领域广泛。老中青三支队伍分别根据自已的实力和研究兴趣选定大中小课题，从基础理论到应用学科，从宏观到微观，从经典到非经典，从亚文化到大文化，都有人辛勤耕耘。这为今后进行更为扎实、

稳妥和重大选题的理论研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七、理论新闻学研究的不足

20年新闻理论研究主流是好的，应予充分肯定。但其中的不足和失误，值得总结记取。20年理论新闻学研究中的不足，择其要者有五：

（一）受到"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特别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干扰。从总体上说，20年新闻理论研究是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进行的，但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对研究人员及研究工作的不良影响不可低估。一方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对研究工作的冲击。据一位研究者总结，新闻理论研究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是：对无产阶级新闻学持虚无主义的态度；极力把新闻学同政治分开，宣扬诸如"新闻学与政治的分开，是新闻改革的必然趋势"；鼓吹实行绝对的新闻自由；反对新闻研究应面向中国改革和新闻事业的实际的观点，主张所谓的应"站在世界立场看中国"、"认同世界新闻学"，实质上是鼓吹全盘西化的观点。[①]另一方面是思想保守、观念落后以及在学术讨论中挥舞政治大棒压制不同意见等极左思潮对研究工作的干扰。

（二）新闻理论研究缺少全国性的统一领导、全面规划和统筹部署。长期以来，我国新闻决策机关基本上不抓学术研究。从全国到省市，研究活动大多处于自发、自流状态，研究内容十之八九为经验评析，专注于新闻基础理论研究者不多。这种状况，既不利于从宏观上对理论新闻学研究予以把握引导，以期更贴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要求和实际，又助长了不良的、有害的思想自由地滋生、蔓延。

（三）新闻学研究的理论学术水平不高。"新闻无学论"虽然有所纠正，但新闻学研究尚未走完从术到学的科学化进程。新闻理论研究从总体上看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要么简单地描述新闻业务经验，要么对某些新闻政策作图解式的阐释，探讨基本新闻规律、扎扎实实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人和作品都太少，研究成果中论题重复者甚多。学术争鸣尚未在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真正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气氛。

（四）研究经费严重不足，学术成果发表困难。新闻学术著作发行量小，发行渠道不畅，加之定价高，有些新闻政策朝令夕改，学者不易把握，出版部门不愿意接收新闻理论研究的书稿，那些层次较高的学术著

① 姚文华：《总结经验理清思路》，1991年8月26日《新闻出版报》。

作更难问世。新闻学研究一般没有专项经费，即使有也是杯水车薪，这一状况与时代发展及新闻事业的要求极不相称。

（五）同海外的学术交流不够。国际局势的发展，对外开放的深入，党和人民对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研究的要求，都希望新闻学术界同海外有更广泛更深入的交流。20 年来，我们同海外学术界的交往比过去有所加强，但还存在很大的距离。

针对上述不足，作者建议：

第一，切实从思想上、制度上、学术研究上抵制和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努力探索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闻学理论体系。

第二，建立强有力的领导、协调和管理机构，对新闻学研究统筹规划，加强领导和指导。建议制定理论新闻学研究中长期规划，创办全国性的以新闻理论为主题的学术刊物和新闻学术论文文摘，建立各种新闻分支学科的研究团体。

第三，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活跃学术空气。提倡理论工作者对理论问题不同观点的平等争论，保护批评和反批评，发扬民主学风，做到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

第四，设立新闻理论研究基金，鼓励和扶植新闻学术著作的出版传播，特别要保障对新闻学研究有重要推动作用的重点著作的出版。

第五，扩大海内外新闻学术交流活动。全国和各省市新闻研究机构和新闻教育团体，应尽多地扩大同海外的学术交往。同时，还应加强国内同其他学术界的交往，广泛吸收他们的成果。

结语：

任重而道远——又一个世纪之交

当我们在键盘上敲打这几行简短的结语时，日历上标出的日子是：1999 年 9 月 15 日，也就是说，21 世纪离我们还有一年又 107 天。

又一个世纪之交！

一百年前的那个世纪之交，对中国来说，真是不堪回首！梁任公说："呜呼！国事不可问矣！其现象之混浊，其前途之黑暗，无一事不令人心灰望绝。"①"内忧外患，相逼而来。东海愁云，浸及满洲原野。歃血之约，恐又使马首欲东者，转而西图，新亡国民之臭名，岂独戴高帽子之族含无穷之痛乎？嗟嗟！将不远矣！迎秋一叶，已先零矣，恐此后切切凄凄之声难断也。"②

在这国将灭族将亡之际，志士仁人欲办报刊而图救亡，孙中山办《民报》，以渲染革命，"风潮所激，醒其渴睡"。③于右任更以雄言滔滔，论述新闻记者之使命："秋高马肥，记者当整顿全神，以为国民效驰驱。使吾国民之义声，驰于列国；使吾国民之愁声，达于政府；使吾国民之亲爱声，相接相近于散漫之同胞，而团体日固；使吾国民之叹息声，日消日灭于恐慌之市面，而实业日昌。并修吾先圣贤，闻人巨子自立之学说，以提倡吾国民自立之精神；搜吾军事实业、辟地殖民、英雄豪杰独立之历史，以培植吾国民独立之思想。重以世界之知识，世界之事业，世界之学理，以辅助吾国民进立于世界之眼光。此则记者之所深赖、而愿为同胞尽力驰驱于无已者也。"④

---

①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1902 年 10 月 2 日《新民丛报》第 17 期。
② 于右任：《〈民立报〉发刊词》，1910 年 10 月 11 日《民立报》创刊号。
③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1905 年 11 月 26 日《民报》第一期。
④ 于右任：《〈民立报〉发刊词》，1910 年 10 月 11 日《民立报》创刊号。

为救亡图存和为革命办报,乃本世纪初中国报业勃兴之两大缘由。积数十年报业经营之经验,始有新闻学之研究。蔡元培在为徐宝璜《新闻学》初版作序中说:“凡学之起,常在其对象特别发展以后,烹饪、裁缝、运输、建筑之学旧矣,积久而始有理化;树艺、畜牧之业旧矣,积久而始有生物学、农学;思想、辩论、信仰之事旧矣,积久而始有心理、论理、宗教诸学;音乐、图画、雕刻之术旧矣,积久而始有美学。以此例推,则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日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①

学问之道,先有术后有学,学从术来,术以学精。中国新闻学治学历程如何?这一百年来业绩与不足如何?我们在前面已作了大致的勾勒。在又一个世纪之交到来的时候,我们的现状和前景又是怎样和又会怎样呢?尽管中国内部和外部都还有许多的困难,但总的说来,国运昌盛,国力渐强,国民渐富的前景是明朗的。有学者估计,从1980年到2020年,我们将用40年时间完成经济起飞和大国兴起的过程。这样的经济背景加上稳定的社会环境,无疑将为新闻学研究提供最良好的条件。问题是新闻学自身的发展,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

几个最明显不过的例子摆在面前。如果我们加入了WTO,国门洞开,西方国家的新闻传媒产业“入关”中华,我们的新闻观念、新闻政策、新闻体制及新闻运作机制应该有哪些必要的调整与转换?这是摆在政府面前、新闻机构面前,也是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不得不研究和回答的问题。

如果全国人大批准了已由政府签署的国际人权两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的相关法律、政策以及新闻制度,又应有哪些不得不进行的调整与改变?这对理论工作者来说,又是一个责无旁贷的任务。

在承担着重大研究课题的同时,理论新闻学自身的健全、扩展、深化、完善,又有着做不完的事情:第四(有的说第五)媒体的发展是那么迅猛,电子传媒,网络传播,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更为激烈的跨国、跨文化传播,它对传统理论新闻学的冲击,理论新闻学应有哪些应对,新闻学提升为国家一级学科之后,其学科的科学性和现代化应有相对的根本

① 蔡元培:《徐宝璜〈新闻学〉序》,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序言部分第5页。

性的提高，而目前的现状是令人担忧的。一系列新闻学新学科的建立，要求理论工作者投入以更多的精力与智力，而目前的分散与自发的研究状况又亟待改进。新闻教育早已形成专本科、硕士、博士的办学格局，新世纪必将进一步提出向全社会普及新闻学与传播学知识的新任务，而迄今科学的教材体系还不完备，各教育层次还拉不开学术档次。

对外新闻交往与新闻合作日益频繁，而我们能够拿得出多少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与专门人才同人家交往、合作？……

这一切，远不是“繁忙”和“苦干”几个字可以概括和解决的。它需要从上到下，从业内到业外，上上下下，四面八方，建立共识，调整政策，统筹计划，组织力量，创造条件，投入资金，有重点有步骤地研究、策划、实施。

如果说，百年前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先行者们是开天辟地——展开理论新闻学研究的领域，从报业入手渐次深化报纸的性质、功能、特点的研究，辟设发表理论新闻学成果的论坛、书刊、讲堂，使研究有广阔的学术表达、交流、争鸣的园地；那么，百年后的21世纪，我辈新闻理论研究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则是走向未来、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不断地向理论新闻学及其新学科的广度与深度进军。

任重而道远——这就是又一个世纪之交对我们的嘱托。

主要参考书目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华出版社，1980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献，新华出版社，1983

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徐培汀、裘正义著，重庆出版社，1994

中国新闻事业简史，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新闻文存，余家宏、宁树藩、徐培汀、谭启泰编，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

新闻学大辞典，甘惜分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童兵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1903—1987)，林德海主编，新华出版社，1989

西方新闻理论评析，徐耀魁主编，新华出版社，1998

世界新闻史，李瞻著，(台)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68

新闻学，李瞻著，(台)三民书局，1994

新闻理论中的中国历史观，王洪钧编著，(台)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新闻理论，郑贞铭著，(台)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

新闻传播法规，张宗栋著，(台)三民书局，1983

后　记

《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一书的发起者是童兵。1995年11月上旬，童兵应兰州大学新闻系之邀，以兼职教授身份赴金城为新闻系硕士研究生讲授《新闻理论专题》。讲课之余，与时任兰州大学西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戴元光教授茶叙，谈及撰写此书的心愿，但此事需集合一批朋友，兼需大量资金，心有余而力不足，不料戴兄一拍即合，爽快答应，钱由他筹集，并拟定了主要合作者。

不料杂事缠身，童兵奉派去香港工作一年，回京以后又是教学科研两头忙，到1998年此事仍无下文。这年暑假，兰州大学再次邀请我们夫妇前往讲学并西游敦煌。自青海返金城当夜，戴元光来宾馆叙旧，再次谈及撰书一事，戴兄相告此事已有进展，由于他正商调上海大学，资金与出版社已略有着落，台港也有教授朋友乐于参与。于是我们进一步商谈细节，约定半月后上海碰头。

七月底，在上海大学乐乎楼举行课题组人员的首次会议，拟定全书分理论新闻学、传播学、历史新闻学、应用新闻学、宣传学、公共关系学等6卷，台港澳由于制度不同另设专卷，邀三地学者撰写，共7卷，约300万字。于是，这部大书开始启动。

这一年手头事情太多，国家社科规划办的项目《中西新闻比较研究》结项在即，本着“先公后私”原则，童兵主攻“比较”一书，由夫人林涵教授对付“新闻百年”一书。林涵在上海中学念书时已是校刊总编，社会科学知识和笔头功夫颇佳，她虽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但我们已合作出版过一本服饰文化方面的书，以纪念我们的银婚之喜，这次她爽快答应当“志愿军”，我们一起商定简要的提纲，由林涵寻觅资料、遣词造句，尔后由童兵润笔定稿。由于我们两个人都忙，只是在业余搞这本朋友们合作的书（我们负责其中的新闻理论卷，50万字），所以大家

都搞得疲惫不堪。

1999年正是多事之秋。童兵去香港讲课两个月,《中西新闻比较论纲》一书改动两次,9月问世。童兵和两个朋友合作的教材《新闻传播学原理》也在这年4月出版。所以"新闻百年"这本书的写作主要落在林涵身上。原想9月前完成初稿,不料,"半路杀出程咬金",教育部又指示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牵头编《新闻传播学科同等学历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院领导责成童兵主编,且时间限在2个月内。今年暑假北京酷热难挡,有几天气温高达40多度,为在9月前赶出"新闻百年",我们一天也不敢偷闲。其间,黑龙江方面朋友安排我们去镜泊湖小休,住了三晚就匆匆赶回北京,为"新闻百年"甘受煎熬。

现在总算把这件事做完了。笔头上可以放松一下,但精神上又紧张起来。试想,把中国百年来的理论新闻学研究的全貌描述出来,把数以千计的学术成果作一番评介,会不会挂一漏万,抑此褒彼,到头来落个吃力不讨好?尽管在研究与写作的过程中,我们两个人都时时提醒要有"学术良心"和"理论胆略",既不怕压力又不避亲疏,连反对和压制过我们的人和书,也要公允评价,但个人的阅历和视野毕竟是有限的,更不用说理论功底和学术水平了。我们还有一个担心:本书引用的资料很多,有的书刊是八、九十年之前出版的,大部分则是三四十年代问世的,其中不少用词同今日不同,加之当时印刷校对之粗糙,用错、印错的字与词及句子定然不少。对于个别明显的错误,我们发现之后已一一订正,但一些没有把握的地方,我们只能半信半疑地留待今后找到可靠的依据再改正了。再说,交书期限已到,手头又有新的写书任务,也只好"丑媳妇硬着头皮见公婆"了,等到出版之后静候读者和学者的批评与指正。

平心而论,想总结新闻百年这样的大书,不仅要有一批人,分各专业研究,就是一个专业,如理论新闻学一门,也应有一批专家学者反复讨论修改,集思广益,几上几下,才有可能磨出一部好书。可惜目前我们的精力、财力和时间,不允许这样做。

这是我们伉俪合作写作的又一部书。想到这里,一切疲劳和辛苦,都忘得一干二净。

谢谢各位。

童　兵　林　涵

1999.9.15 于北京塔院迎春园寓所